

第一章 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的束缚

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在形势驱使下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回顾双方关系的发展。一方面，他们始终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意识形态和对改变乾坤的世界革命的信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双方奉行的出自不同利益的政策又不断地把他们引向冲突和恼怒。

早在 20 年代，双方之间就开始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自 1935 年开始，毛泽东上升为党的领导，他在冲突中的实力显著加强，并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从莫斯科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进程。这一进程直到战争行将结束时才完成。对于本书的主题来说，1935—1945 年这段时期作为前史比 1935 年以前的时期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章所作的历史回顾将集中在这段时期。至于 1921 年至 1935 年这段时期的发展，只作为本章的第一节作一些粗略地探讨。^①

^① 1921 年至 1935 年期间的文献资料太多，因此不可能每处都摘引全文。作者在以下段落中只以少量的提示来引证它的论述。自 80 年代以来，苏联、俄罗斯和中国方面发表了许多关于这个时期的出版物、新的资料，其中也包括档案文件。例如：郭恒钰、洛伊特纳、费尔伯、季塔连科、安德逊、格卢宁、格里戈里耶夫编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一卷，1920—1925 年，1994 年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德文版由郭恒钰、洛伊特纳、费尔伯、季塔连科、安德逊、格卢宁、格里戈里耶夫编辑，1996 年在帕德堡 / 慕尼黑 / 维也纳 / 苏黎士出版）季塔连科、洛伊特纳、安德森、格鲁宁、格里戈耶夫编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文件集，第二卷，1926—1927 年，莫斯科 1996 年出版；《周恩来年谱 1898—1949》，北京 1990 年出版；《毛泽东年谱 1893—1949》第一、二卷，1993 年北京出版；《刘少奇年谱

第一节 在共产国际牵制下的中共（1921—1935）

只有当人们不仅从苏联对华政策，而是超越这个范围，从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去观察，人们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在 20 年代的上半叶，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个偏离国际主义路线、转向俄罗斯民族主义路线的变化。1927 年斯大林粗俗地、诡辩地把这一过程的结果归结为一句话：谁决心毫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①

1919 年成立的共产国际逐步变成了向其他共产党转达莫斯科政策的传送带。自 1920 年起，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都要受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决议的约束。^②按照章程，共产国际有权在任何时候介入各国党的事务。

但是，所有重要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并不是共产国际自己作出的，而是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中作出的。^③自 1922

1898—1949》第一卷，1996 年北京出版；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88 年上海出版；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1992 年北京出版；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两卷，1989 年北京出版（在第二卷 339—372 页附有 1979—1987 年发表的大量参考文献目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纪实 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北京出版（限国内发行）向青主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1985 年上海出版；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以下简称：《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限国内发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集 1925—1927》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内部发行）

斯大林 1927 年 8 月 1 日讲话，见《斯大林全集》1954 年中文版第 10 卷第 47 页。

参见 1920 年 7 月至 8 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 3 条和章程的总则，见诺劳：《共产国际》第 311 页和 318 页。

该党在 1918—1925 年称俄国共产党（布），1925—1952 年称苏联共产党（布），1952 年以后改称苏联共产党。

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日益明显地代表苏联的利益。布哈林要求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捍卫苏维埃国家。第五次代表大会还提出，各“支部”有义务考虑俄国共产党的经验。1925—1930年期间，共产国际最终变成了斯大林惩戒外国共产党、使其贯彻苏联利益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人张国焘于1928年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国际不再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而已发展成“斯大林鞭策各国共产党人的指挥所”。^①

在中国，莫斯科从1919年起就开始谋求俄罗斯民族利益，它与沙俄扩张主义是相连接的。这方面的一个标志就是：当时的苏联政府撤回了曾作出的允诺，拒绝无偿地把中东铁路交还中国。^②苏联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它要维护或重新取得俄国在满洲和外蒙古的传统影响。三年后，当时的满洲统治者张作霖向孙逸仙谈了他对苏联对华态度的印象。他说，莫斯科在中国奉行的是帝国主义政策，尽管他们说要完全相信他们的友谊等等，但就是不归还中东铁路和蒙古。^③从苏联领导集团在其对华政策中试图继承沙皇俄国的遗产这个事实中，中国所有政治力量都在随后的时期里感到心情沉重，从军阀到国民党，直到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领导者，尽管他们对世界革命的信仰程度有所不同，但他们作为中国的爱国者都因此而感到很大的压力。这一点特别符合毛泽东^④。

自1922年起，对华政策的一切事务都明显地操纵在斯大林

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年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中文版，第2卷第445页。关于这一段落可参见京特·诺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科隆1959年出版，第45—91页，特别是82和90页。

^② 详细情况参见迪特·海茵茨希：《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第24—27页。

参见鲍罗廷1925年1月24日的书面报告中关于1924年12月5日张作霖与孙逸仙的谈话，引自郭恒钰等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96年德文版第1卷第612页。

参见 Stuart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P.161—168。

的手中。^① 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也证实：在所有关系到中国的事务中斯大林是最高权威。^② 因此，在论及1922年以后的苏联对华政策时，混杂地使用“苏联”、“苏联领导集团”、“共产国际”、“莫斯科”、“斯大林”等用语都是合理的，在本书中也是如此。共产国际曾对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早在20年代，在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就出现了分歧。这首先是因为当时斯大林把国民党看做是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伙伴。直至40年代末，斯大林原则上奉行的就是这一战略。^③ 它来自这样一个看法：国民党作为中国最强大的进步政治力量，似乎最有可能战胜反动军阀，统一中国，把所有外国影响（不包括苏联）排除出中国，从而无意识地为共产主义接管政权作好准备，即由苏联领导下的中共来实现政权的接管。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夺取政权，但他们在莫斯科的心目中，由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薄弱，而不占据重要的角色。直到1948年底，斯大林才不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将在内战中取得胜利。

1922年，当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逼迫中共与国民党建立同盟时，紧张关系开始出现。这一结盟在1923—1927之间是作为苏联军事援助的基础而提出的，而这一援助实际上只有利于国民党。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东以一种政变的方式极大地削弱了共产党人和苏联在国民党中的军事顾问的影响，但共产国际无视这一切，继续与蒋结盟。当上海已有迹象表明，蒋介石要对工会组

当时的外交部长（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曾在他致斯大林的信中对斯大林掌管对华政策表示满意。这一情况是作者的俄罗斯同行康斯坦丁·舍维廖夫从《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查阅契切林的书信中获悉的。

^② 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年中文版第2卷第424页。

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对此有明确的陈述，参阅 Fisher, Louis: < Russia's Road from Peace to War.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41 > . New York/Evanston/London 1969, P.118 f.

织中的工人进行 1927 年的 4 月 12 日大屠杀时，共产国际还劝说共产党员和工人避免公开斗争，这本质上有利于把他们送到屠刀之下。即使在此之后，共产国际的代表还继续在武汉努力维护与蒋的统一战线。斯大林在论述对国民党右翼的政策时曾说，“要充分利用 就像挤柠檬汁那样 挤干后再扔掉”。^① 几天之后 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几经踌躇地把蒋介石谴责为“革命的叛徒”。1927 年 4 月，蒋介石国民党右翼与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决裂了。此时，斯大林通过鲍罗廷指示中共领导，支持武汉的国民党左翼政府，共产党人应像抓住救生圈一样抓住它。^② 当 7 月份武汉国民党也把共产党人从队伍中清除出去之后，苏联军事顾问也只有离开中国，而别无其他事情可做了。但斯大林却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方式把长期固守与国民党联盟的责任推给了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陈被当作了替罪羊，并由瞿秋白接替了总书记职务。^③

1927 年夏，莫斯科和中共突然想在 4 个省组织武装起义，但起义都失败了。这个动议显然来自斯大林，他企图以这种方式

^① 引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的中国问题》1928 年汉堡 / 柏林版 (1967 年米兰再版) 第 124 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338 页。

此段参阅 Isaacs:《The Tragedy》; Allen S. 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1953, North:《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诺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科隆，1959 年 第 85—89 页 ; Conrad Brandt:《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New York 1966 多梅斯：《推迟了的革命》第 65—206 页 ; 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3—1928》; Martin Wilbur, and How Julie Lien - ying:《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ss. / London 1989; 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Vol. II, Leiden/ New York/ Kobenhavn/ Koeln 1991 ; 格鲁宁：《国民革命前夕和期间的中国共产党 1921—1927 年》第 2 卷 莫斯科，1975 年 ; Leong Sow - Theng:《Sino - 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6》, Canberra 1976 迪特·海因茨希：《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 1923—1927》，载于《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第 1 卷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 1924—1927 年》帕德博恩，1979 年 ; Ch'en, Jerome:《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 P. 505—526; Eastman:《Nationalist China 1927—1937》, P. 116 f.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1988 年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两卷 北京，1989 年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北京，1992 年。

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争论中掩盖他迄今为止的中国政策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加伦——译者注）参与了与中共领导的有关密商。第一次武装起义于 8 月 1 日在南昌举行。接着是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 4 省的农村“秋收起义”，以及长沙的暴动。12 月在广州进行的武装暴动也失败了，共产国际代表海因兹·诺伊曼在广州暴动的策划和执行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这次暴动导致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而诺伊曼则得以逃脱。尽管如此，中共领导，而不是共产国际领导，不得不在 1928 年 7 月的共产国际大会上就长期固守与国民党合作而导致失败的起义作了自我批评：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在 1928 年 7—8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由共产国际严格控制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不是斯大林，而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领导单独承担了 1927 年下半年暴动失败的责任：他们执行了一条“盲动主义路线”。大会是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冲突的阴影之下举行的。而毛泽东在此之前已因他筹划的湖南秋收起义失败受到了中共领导的批评。^②

莫斯科奉行的、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改造国民党的策略失败了。1927 年 12 月，重新联合起来的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断绝了与苏联的关系。苏联的中国政策因此彻底失败。1928 年蒋介石战胜了华北的军阀，并开始在南方围剿共产党人。

此处和以下两句参阅 North: <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 P.117—121; 诺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第 88 页及下页; Isaacs: < The Tragedy >, P.272—29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卷第 350 页。

此段参阅上一段引证的参考材料,特别是 Isaacs: < The Tragedy >, P.272—292; North: <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 P.113—121; 诺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第 85—89 页;多梅斯:《推迟了的革命》第 219—237、238 页及下页;夏乐平:《毛泽东编年史——生平和著作年代》,第 31 页及下页;海因茨希:《苏联军事顾问》,第 285—287 页; Ch'en, Jerome: <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 >, P.525; Ch'en, Jerome: <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7—1937 >, P.83—188 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388 页; Wilbur: <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3—1928 > P.147—169

显然，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失败。该党只是在几个大城市留下了一些分散的支部，一些起义部队的残部和一些农民武装。继续听从共产国际的党领导试图在城市中重建党组织，而在湘赣山区的毛泽东则把他的农民部队与朱德的部队实现了合并，并建立起苏维埃区。在其他省份，如：湖南、湖北、安徽和福建，也出现了苏区，它们被作为巩固的根据地，由此把革命扩展到城市。从共产国际建议的城市革命的失败中，毛泽东得出结论：革命只能从农村开始走向成功。从此，中国的共产主义开始了一个独立于莫斯科和当时的中共领导而自行发展的新阶段，并最终获得成功。^①

斯大林对毛泽东和朱德的行动持怀疑态度。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与他协商一致。由于这涉及革命策略问题，莫斯科对过去的错误也进行了总结。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领导提出建议，暂时放弃进行城市暴动和农民起义，而应在苏区进行土地改革，并从那里开展游击战。这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毛泽东的方案。这一建议对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产生了影响。^②自1930年2月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领导从上海批评毛泽东和朱德，说他们坚持“分散逃避”的“陈旧的思想”，要求他们把部队用于攻打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认为农村包围城市的计划是一大错误。8月，李制定了占领长沙、南昌和其他大城市的全盘计划。^③他同时要求莫斯科在中国东北进行军事介入以示支持。当

此段参阅：多梅斯：《推迟了的革命》，第279页及下页；Ch'en, Jerome: <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7—1937 >, P.183—198；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年中文版第2卷第386页；夏乐平：《毛泽东编年史——生平 and 著作年代》第30页及下页。

^② 参见周恩来1944年3月3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引自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及下页。

此处和以下两句可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年中文版第2卷第440页。

共产国际拒绝了这一要求后，李指责他们违背国际主义，并威胁要中止对莫斯科的效忠。当 8—9 月占领长沙失败时，并非来自莫斯科指示的“李立三路线”遭到挫折。^①

至此，共产国际开始直接介入中共领导的组成。李立三被召至莫斯科在 11 月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的盘问，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并受阻而不得回国。与此同时 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其东方部的副主任帕维尔·米夫到中国 操纵 1931 年 1 月中共领导的改组 使一批为共产国际信任的、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中国同志担任领导职务。他们的反对者给这批人起了一个别名：“28 个布尔什维克”或称“中国斯大林派”。为首的是王明（陈绍禹），他于 20 年代中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又流亡于苏联，直至 1974 年客死于莫斯科，他以忠诚于苏联路线而出名。1932 年，王明回到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直工作到 1937 年。在这一工作岗位上，他支持直至 1933 年设立在上海的党中央，力图控制各个苏区，首先是毛泽东领导的江西中央苏区。^②

1931 年以后，出于种种原因，共产国际的影响有所减弱。

此段可参见 Richard C. Thornt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mintern Strategy for China: 1928> in: Milohrad M. Drachkovich and Branko Lazitch (ed.): <The Comintern: Historical Highlights>, New York 1966, P.90 ff.; Carr: <Twilight>, P.319—28.

此段和下段参阅 North: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122—167; Charles B. McLane: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 New York 1958, P.5—50 页; Hsiao Tso-ling,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 Seattle 1961, P.13, 23, 125, 128, 320, 343; John E. Rue: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Stanford, Cal. 1969 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448 页 汪其畀音:《中国共产党党史稿》1965 年台北版第 2 卷 特别是第 100 页; Richard C. Thornton: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28—1931>, Seattle/ London 1969 海因茨希:《奥托·布劳恩 李德——译者注 回忆录和毛泽东上台》第 274—288 页 格里戈列夫:《巴维尔·米夫 1901—1938 年》收于《著名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莫斯科，1970 年；郭恒钰:《毛泽东通往权力的道路与共产国际》，1975 年帕德博恩版；Carr: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New York/Toronto 1982, P.328—365; Jerome Ch'en, : <Th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1937>, P.168—229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88 年上海出版；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1992 年北京出版；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

1935 年底，中共领导通过信使得知：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今后将不再干预中国共产党人的内部事务，而只对他们的政策进行监督。^① 而这一监督，与过去一样，是为维护苏联利益，而不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这一点在一年前就已被证实。当时，共产国际把日本的对华侵略行为解释为是针对苏联的，从而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②，而根本未提保护中国。

关于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关系的第一章第一节，到此就结束了。一般说来，本章节在很大程度上着重刻画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结束并非由于共产国际在 1935 年实行了自我限制，而导致变化的主要原因则在于中共内部的、非莫斯科所能影响的发展过程。

第二节 毛泽东上升为党的领导人：独立解放的前提

始于 1935 年的新发展 逐步导致 1945 年中共从苏联束缚下的解放。1935 年 1 月当神话般的长征正在进行之际，毛泽东在遵义 贵州省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了成功 排除了一直听命于莫斯科的派别。这一事实可视为中共开始获得解放的最重要的因素。自 1927 年以来，毛泽东通过独立的行动得出这样的认识结论 莫斯科的指示是在对中国形势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 它很难帮助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各种现象表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接管了军事领导，并为他上升为党的领导人奠定了基石。

在此之前，总书记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德国

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 年中文版第 3 卷第 296 页。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164 页及下页。

人奥托·布劳恩（李德、华夫）是当时党领导中的“斯大林派”头目，并同周恩来一起掌管军事。在遵义会议上，他们二人被免去了职务，并从 1936 年开始对军事决定已无实际影响。在遵义，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博古被排除出这一机构。两个月后，博古又失去了“中央负责人”或称“总负责人”（相当于总书记）的职务，这一职务由洛甫（张闻天）所接替。此时，毛泽东进入军事领导，并最终担任了由他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的领导。“三人军事小组”在以后的长征期间构成了军事最高司令部。毛泽东以此而取得的地位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当时的主要问题为军事性质的问题，而党的问题退居于后。^① 1935 年 10 月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陕北显然已成为三个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的最高领导人，这三个领导机构是：党的领导（由洛甫为代表），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为代表）和苏维埃政府（由博古为代表）^②

对这一发展过程，莫斯科已不能施加影响，即使要施加影响也无法实行，因为在 1934 年夏末或秋季莫斯科与中共领导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它直到 1936 年年中才重新恢复。^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中，特别强调了这一发展事实，并把遵义会议作为摆脱莫斯科束缚和走向解放的重大突破而加以庆贺。“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的若干细节以及此后高层领导中的发展，在研究界至今仍有某些争议。此段参阅《中国共产党创业 30 年》第 313 页及下页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145 - 152 页；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 - 1939）》1973 年东柏林版第 131 - 149 页，207 页及下页；Ch'en, Jerome: < Resolution of the Tsunyi Conference, in: TCQ, 40, 1969, P.1 - 38 ；迪特·海因茨希：《奥托·布劳恩与遵义会议》载于 TCQ, 第 42 期，1970 年。

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 - 1939）》1973 年东柏林版第 207 页及下页。

关于无线电中断的时间，Michael Sheng 提出是 1934 年的 8 月，黄修荣提出的是 10 月，奥托·布劳恩则认为在 9 月底以后。见 Michael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 - 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 - 1937 > in: TCQ, 129, 1992, P.151 f.;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148 页；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 - 1939）》1973 年东柏林版第 111 页。

召开之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中断。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选择它自己的、符合本国条件的道路。……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①关于毛泽东在遵义赢得权力的这一事实是如何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接受的，这在研究界是有争议的，并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证明。^②不过，有许多迹象表明，至少在共产国际中国部的王明和康生对此是不满意的。^③

1936年夏，毛泽东明显地表露出新的对莫斯科的自我意识：

在苏联是共产党掌权，即使在那里，第三国际也不实行统治，对人民根本没有权力。同样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但根本不意味着苏维埃中国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我们为争取中国解放而进行斗争，当然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交给莫斯科。^④

1937年底，王明搭乘第一架在延安降落的苏联飞机回到了中国。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他极力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从而在一些专门问题上取得了对毛泽东的胜利，至少是形式上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同国民党进行抗日的紧密合作，而毛泽东曾对此持拒绝的态度。1935-1943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乔治·季米特洛夫曾试图劝阻王明不要谋求正由洛甫担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有迹象表明，王明仍为此作了努

^① 《中国共产党创业30年》第314页。类似的评价可见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2卷第148页。

参阅 Garver 和 Sheng 之间的争论，见 TCQ 第 113 期，1988 年，第 37 页及下页；TCQ 第 129 期，1992 年，第 15 页及下页，178 页及下页。

参见 Garve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CQ, 113, 1988, P.38

毛泽东于 1936 年 7 月 23 日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引自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Washington/London 1969, P.419. 这一谈话没有收入北京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力，但没有成功。这个职务被撤除了。^①

另一个影响莫斯科和中共领导关系的情况是：王明在 12 月会议上坚持要求中国党的领导也应像斯大林在苏联那样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并提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1929 年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的前领导人陈独秀的重新入党申请，不管陈独秀是否真的是一个日本特务，但他如果被重新吸收，斯大林将会得知，这将导致“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党领导虽然作出决定，拒绝陈独秀的请求，但鉴于王明狂热地坚持实行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迫害措施，许多领导成员显然对此感到不舒服。毛泽东也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他曾赞成重新吸收陈独秀，并曾在私人谈话中说过，斯大林在“镇压反革命分子”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在新疆，王明对五名党的老干部进行了迫害，并处死。张国焘因与他们有过密切合作，并感到有压力，因此于 1938 年 4 月离开了党。不管王明对陈独秀的攻击是否是针对毛泽东的，但张国焘这位曾是毛泽东的重要反对者的出走，这是毛泽东在通往最高领导者的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胜利。^②

1938 年夏季和秋季，王明不顾延安指示，推行保卫武汉的战略并遭到失败，而毛泽东的战略却使北方共产党的根据地得以巩固。此时，王明这颗明星开始坠落了。对此，莫斯科也不能视而不见。此外，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新代表任弼时，于那年的春天

此段参阅 Thomas Kampen: < The Zunyi Conference and Further Steps in Mao's Rise to Power > . In: TCQ.117, 1989, P.131 ;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New York/Oxford 1988, P.11 - 13, 64 - 67 ;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440 页及下页，第 454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 年中文版第 2 卷第 418 - 425 页；Kuo: < Analytical History > , Vol.III, P.336 - 341； 《中国共产党创业 30 年》第 375 页。此段还参阅 Frederick C. Teiwes: “The Formation of the Maoist - Leadership from the Return of Wang Ming to the Seventh Party Congress”, SOAS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Research Notes & Studies Series, No.10, London 1994。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1980 年中文版第 3 卷第 424 - 432 页；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New York/Oxford 1988, P.67 - 70

成功地说服了季米特洛夫，应把毛泽东，而不是王明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正领袖。7月6日，《真理报》第一次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并把他说成是“中华共和国特区政府主席”。^① 1938年8月，季米特洛夫公开对任弼时和王稼祥确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与王明拉开了距离。^②

1938年9至11月期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中央全会表明，毛泽东进一步战胜了王明，虽然还不能说是完全击溃。此时，毛泽东与斯大林达成了一个妥协。毛泽东，至少在形式上，顺从了来自莫斯科的、关于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的压力，并承认国民党是“执政党”，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莫斯科方面，同样也至少在形式上，承认毛泽东在与国民党结盟方面保持中共独立性的要求，批准毛泽东为扩大共产党的根据地在农村进行“持久战”的策略，尽管这将会导致与国民党关系的紧张。此时，莫斯科已勉强接受了毛泽东作为党的实际领导人的地位。^③

在1940年末和1941年初与共产国际争论之后，毛泽东开始反击忠于莫斯科的、围绕在王明和博古周围的批评者，他们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把他们贬低为“主观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④ 1941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激烈争论中最终把代表莫斯科路线的王明挤入墙角。^⑤ 据说，王明被迫背

^① 《真理报》1938年7月6日，第184（7509）期，第4版。

周恩来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至少到1940年为止仍信任王明，或者说与他保持着良好关系，见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414页。

参见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New York/Oxford 1988, P. 74 - 79, 及有关引文来源；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455 - 458页、460页、和468页及下页；汪明：《中共50年与毛泽东的叛变》，柏林（东）1981年出版。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361页及下页；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1942 - 1945》，第236页。

详见本章第9节。

着毛泽东，通过苏联驻延安代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与莫斯科联系。^①数年后，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由于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而出现的形势时，谈到了莫斯科和中共关系中的三个主要冲突。^②毛泽东说，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

1942年至1944年毛泽东在康生的帮助下，在延安组织了“整风运动”所有党员都被迫表示对他本人及其“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的忠诚。显然，这次宣传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排除王明的追随者。按苏联行话，他们被称为“国际主义者”，而毛泽东则把他们贬称为“莫斯科集团”。那些曾在苏联停留过的党员被贬低为“教条主义者”，有时也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者”。1943年12月，即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同各国共产党联系的季米特洛夫，指责中共领导错误对待“莫斯科集团”的成员，他具体提到周恩来和王明的名字，并批评了康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③毛泽东的这场运动制造了一种恐惧的气氛。正如其他共产党执政国家所常见的那样，人们利用了心理恐怖的方法。无数的党员受到了荒谬的指责，被迫进行自我指控和告密。相当多的人被捕，被长年监禁，有些人甚至自杀。王明在政治上遭冷遇，但显然出于对莫斯科的顾忌，他仍然被继续留在中央委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第 257 页。

^②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 年第 1 期，第 17 页。

季米特洛夫 1943 年 12 月 22 日给毛泽东的信。引自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 414 页；并可参阅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第 296 页。

员会里。^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编撰学中，人们承认康生曾搞过逼供，但同时认为这种方法是他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清洗运动中学来的。此外人们还指出，在季米特洛夫提出批评时，毛泽东和党领导早已纠正了这种“错误”。^②

“整风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彻底战胜了他的对手。1943年6月8日共产国际解散，这也有助于毛泽东清除“莫斯科集团”。当延安得知此消息时，毛泽东几乎无法掩饰其满意的心情。^③

毛泽东在清除“莫斯科集团”方面进行得很巧妙，他在逐步孤立亲苏政敌的同时，利用各种合适的机会以非常高的调门赞扬共产国际、苏联和斯大林。1943年3月20日，他在形式上接任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职务。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4月至6月）最终完成了这一发展：毛泽东于1945年6月19日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就开始了。党代表大会前夕，通过了一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使一项经过修改的党史描述具有了权威性，它肯定了毛泽东

此段参见 Boyd Compton: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 - 1944)*, Seattle 1966; Dai Qing, *Wang Shiwei and White Lilies: < Rectification and Purg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42 - 1944 >*. Armonk, N.Y. 1994; Gregor Benton and Allan Hunter (Eds.): *<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 - 1944 >*,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5, P.7 - 13, 69 - 84 ; 弗拉基米洛夫: 《中国特区 1942 - 1945》特别是第 147 页及下页, 233, 343 页; 杨奎松: 《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362 页;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 P.242 - 247, 并附有引文出处; Klein/Clark: 《人物辞典》第 1 卷第 233 页; 汪明: 《中共 50 年与毛泽东的叛变》, 柏林(东) 1981 年版 第 70 - 75 页; Byron and Robert Pack: *<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New York/London/Toronto/Tokyo/Sidney/Singapore 1992, P.172 - 175 ; 列多夫斯基: 《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年1-2月)》载于《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4页。并可参见本章第3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② 周文琪、褚良如: 《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 第 414 页。

详见本章第 9 节。

的圣徒般的事迹，并对党内的著名反对派，如陈独秀、李立三和张国焘，进行了清算。由于考虑到与莫斯科的关系，王明的名字没有被点出。从编撰历史的质量角度看，该决议可以与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相媲美，很可能也作了仿效。^①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是在意识形态上对莫斯科的挑战

整风运动最后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毛泽东的理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实际中的运用。但同时意味着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的挑战，因为苏联领导人自认为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处于垄断地位，无论在个别与整体、局部与全球方面都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与中国和亚洲处于世界中心的思想紧密相联系的。1936年夏毛泽东已通过暗示方式提出了这一观点。当时毛泽东首次认为，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中国革命得到全力发展，那么，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将追随中国的榜样。^②

1937年下半年，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社会条

此段参见 Thomas Kampen: < The Zunyi Conference and Further Steps in Mao's Rise to Power >, In: TCQ.117, 1989, P.118-134, spec. P.132 ;王明:《中共50年与毛泽东的叛变》,柏林(东)1981年版,第49-56页;《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文版1991年第2版,第952-1003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莫斯科出版。

② 毛泽东于1936年7月23日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引自 Schram: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 P.374. 此段和下一段还可参见 Raymond F. Wylie: <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 Stanford, CA 1980.

件下，毛泽东开始发展其哲学基础。^①1938年10月他在第六次中央全会上第一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表述，但显然考虑到莫斯科，而没有把它写进决议。毛泽东以这一表述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的特殊形式：

因此，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此外，毛泽东也有意以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奠定一个意识形态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应偏离以维护苏联利益为主的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而应把中国的革命，即共产党夺取政权，作为行动的首要目标。^③

1940年1月毛泽东明确地离开了“苏联的道路”。“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阶层构成了国家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基础。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毛泽东还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提高为“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要采取的形式。诚然，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最低纲领，只适用于“现在”；在将来，则是实现“社会主义”，

此段参见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 P.79 f.; Stuart Schram: < Mao Tse - tung. 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 Hongkong 1983, P.37

引自 Minoru Takeuchi: 《毛泽东记》，1970年东京版第6卷第261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用语，在北京官方出版物中被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选集》1991年中文版第2卷第534页；另可参阅 Schram: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 - tung > . New York/Washington/London 1969, P.112, 171 - 175

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539页。

一个最高纲领。由此，毛泽东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国家体制：“旧民主主义的”形式，它在此期间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苏联的形式，它正在“旧民主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并将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最后是新民主主义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它如同在今天的中国所存在的、抗日的“统一战线”，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并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实现革命而承担义务。^①

1945年春，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称颂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完成这项艰巨事业的天才：

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②

在同一篇文章中，刘少奇还做了进一步论述，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③此后直至1951年，他们曾多次提出，要为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他们认为，中国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已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形式，并为所有亚洲和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④被选为政治局副主席之后的刘少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中文版第2卷第662-711页，特别是第675页及下页，第686页

② 刘少奇：《论党》，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9、336、337页。

③ 同上，第335页。

④ 参见 Donald S. Zagoria: 《中苏冲突 1956-1961》，1964年慕尼黑版第25-27页。

奇，于 1946 年春再次提出，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变为亚洲形式。^① 马克思和列宁是欧洲人，他们论述的是欧洲问题，而很少涉及亚洲和中国。由于东亚和南亚国家有着与中国相类似的条件，中国的道路对所有这些国家都有影响。

这对苏联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苏联自认为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并掌握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莫斯科对毛泽东的行为感到不愉快。^② 同样，莫斯科对中国含蓄地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等地位的企图也是不高兴的。莫斯科对有关的表述保持了沉默。

可以认为，毛泽东在 1937—1938 年起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表述，首先是为了想与莫斯科拉开距离，并强调有权在意识形态领域走自己的路。但当时，这条道路仍停留在抽象的理论的水平上。经过两年的时间，这条道路开始具有了具体的、深刻的社会内容。50 年代末，在未同苏联党的领导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后果严重的方案。这对莫斯科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针对性很强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中苏冲突的爆发。

第四节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和苏联：有保留的服从

自毛泽东在遵义上升为党的领导之后，苏联领导就从未能够完全地限制中共的自由。就此意义而言，这意味着从莫斯科的束缚下得到了解放，这就是指中共领导对苏联的指示（自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以建议的形式出现）已不再是惟命是从了。

刘少奇对美国记者的谈话，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思想》转引自 Donald S. Zagoria：《中苏冲突 1956—1961》，1964 年慕尼黑版第 25 页及下页。
参见杨奎松：《苏联因素与……》第 29 页。

但这一变化往往也表现出毛泽东对莫斯科的一定程度的矛盾心理：意识形态上的忠诚和民族感情上的冲动。紧随之后的两段话可以作为例证。

1935 年秋毛泽东在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说：“我们不是独立的共产党，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① 而 1936 年秋，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与一位美国记者的谈话，他却又说，中共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但苏维埃的中国绝不会由莫斯科来掌管，中共将不会把中国交给莫斯科。^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共领导奉行的政策基本上随着苏联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至少在对外时是如此。但是，当莫斯科的建议涉及到中共关于中国内战和抗日斗争的政策时，中共就不那么顺从了。人们坚守一句内部的口号：对苏联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③ 分歧的核心在于：苏联力图说服中共同国民党一起对日本展开坚决的斗争。莫斯科认为，中国的抵抗越强大，日本在军事上就会更加陷在中国，从而也就更多地减少日本进攻苏联的危险。斯大林的这个打算与毛泽东的路线是相矛盾的。毛泽东要在抗日战争中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便为同国民党进行最后的斗争作好准备。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莫斯科出于对国民党的顾忌而拒绝向中国同志提供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关于这两个争论将在下面作详细的探讨。

当时中共领导的这种矛盾心态也反映在今日中国的历史编撰方面。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莫斯科的对华政策，赞赏和批评同时存在。赞赏的是：苏联为建立国共间的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引自 Michael M.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 - 1937 >, in: TCQ, 129, 1992, P. 159 附有引文出处。

② 1936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引自 Schram;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 P. 419. 该段引文已在本章的第二节中摘录。

③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给彭德怀电》，1941 年 5 月 18 日，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534 页。

苏联曾是“中国对日战争的主要援助者”，以及苏联红军在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批评的是：莫斯科只重视“蒋介石及其二百万军队”和轻视中共的军事力量，苏共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仍自以为对中国共产党人拥有领导作用，并以错误的决定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和试图阻挠他们的革命，莫斯科通过雅尔塔协定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的主权。^①

第五节 苏联、中共、国民党与 抗日统一战线：一个纲领的形成

1935年8月至1937年8月，莫斯科和中共领导之间是否在建立国共抗日统一战线方面出现了分歧？如果是，那么，它是以一种何种方式出现的？这些问题在研究界是有争论的。^②这里不必详细列举各派的论证，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产生于使用了不同的资料来源，就是对同样的材料作了不同的解释。但应当对这些论据的核心进行可信性的考证，并同时提出新的文件，以便梳理出一条发展的总体脉络。

1935年7/8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在这一框架内，共产国际虽然建议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没有明确国民党，特别是由蒋介石领导

参见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268、409页。

^② 在这场争论中，John W. Garver 和 Michael M. Sheng 是作为一方代言人出现的。参见 Garver: <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 in: TCQ, 113, 1988, P.29 - 59; Garver: < Comment: Mao The Comintern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 . in: TCQ, 129, 1992, P.171 - 179; Michael M.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 - 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 - 1937 > . in: TCQ, 129, 1992, P.149 - 170; Michael M. Sheng: < Response: Mao and Stalin: Adversaries or Comrades, in: TCQ.129, 1992, P.180 - 183。总体说来，Sheng 的观点是可以赞同的，他依据的是比较新和比较有说服力的材料来源。

的国民党，可以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即使是王明及由他领导的共产国际中国部在大会期间和以后几个月内提出的纲领，也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要求。自 1933 年秋只是偶尔提出这样的口号，如：“联合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敌人”^①，并认为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是可能的，“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②但总体上看来，至少在 1935 年 12 月以前，共产国际、王明的中国部以及中共领导的公开讲话都或多或少地把日本和国民党相提并论（按党的口头禅称“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③，主要遵循的原则是“反日反蒋”或“抗日讨蒋”。大约到那年的年底，当国民党显得日益强大时，这条路线在中共领导中才开始软化。^④

由于无线电通讯联系的中断，中共领导起初并不知道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根据新的中国资料来源，中共领导直到 1935 年 11 月底通过林育英（张浩）才得知决议的内容，林育英是共产国际工会的代表和共产国际中国部成员，他是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交通员进入陕北的。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要求中共

王明和康生于 1933 年 10 月 27 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275 页。

② 王明在 1935 年 8 月 25 - 27 日共产国际七大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引自库库什金：《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 - 1943）》，收于《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 年，第 353 页；1935 年 12 月 14 日毛泽东也有类似的讲话，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353 页，以及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275 - 279 页；王明 1935 年 7 月在《救国报》上的文章，引自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214 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338 页。

中共政治局会议决议，1935 年 12 月 25 日瓦窑堡（陕西省），引自《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 330 页。

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287、291 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340、353 页及下页；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207 - 209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卷第 416 页及下页；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 - 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 - 1937 > . in: TCQ, 129, 1992, P.153 - 155 , 并附有引文出处。

与所有愿意抗日的力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同时加强反蒋斗争，即遵循“抗日反蒋”的路线。与此相适应，1935年12月底政治局在瓦窑堡作出了战略路线的决议，“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①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②

张国焘也曾提及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七大宣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路线”的报告。但张还进一步谈到，据林的报告称，共产国际认为应以建立统一战线来代替苏维埃运动。迄今为止的“抗日反蒋”口号应由“联蒋抗日”所代替。这条新路线不仅为陕北的领导，也为西康的张国焘所认可。^③

但是，今天仍有一些未被澄清的矛盾。最早人们认为，张国焘的记忆可能有误，他把后来才作出的共产国际新路线与中共赞同这条路线在时间上后移了，并把它与林育英的使命相联系。而从别的材料来源看，共产国际直到1936年3月才改变“抗日反蒋”的路线。由于无线电通讯的中断，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新决议的消息一时并未传达到中共领导。在无线电通讯重新接通后，季米特洛夫在7月底批评中共领导固守“抗日反蒋”口号，并要求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④

^① 1934年12月25日政治局决议，引自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279页；另参阅《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331页。

^② 此段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84页及下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47、373、375页；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2卷第209页及下页、214页；杨云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纪实 1919-1943》，第120页；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275、278及下页；《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330页及下页；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1937 >, in: TCQ, 129, 1992, P.154 f.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卷第444-447页。

^④ 参见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1937 >, in: TCQ, 129, 1992, P.155 f.

至今，人们还不可能根据可靠的资料来源说明共产国际改变想法的原因。但人们可以推测，一个重要的推动是：莫斯科于 1935 年年底获得了德日准备缔结反共协定的消息。^①自那时以后，斯大林惶惶不安，担心德国和日本同时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②似乎起作用的还有 1935 年 10 月初日本外相广田向国民党政府提交的、并于 1936 年 1 月公开的那个计划。^③该计划包含了这样一些建议：南京应发展同满洲国的紧密经济关系；应与日本一起“消灭共产主义”；由于“在北方出现了来自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威胁”，中国必须与日本合作保卫它的北部边界地区。看来，这是可信的，斯大林害怕日中合作反对苏联，从而要极力阻止东京与南京结成联盟。在中国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共产党人也参与的抗日统一战线，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手段。

显然，直到 1936 年 8 月 10 日中共领导才开始转向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新路线，并宣布了“逼蒋抗日”的口号。^④但人们还很难证明，这个转变究竟是出于自己的认识，或是仅仅迫于莫斯科 7 月底改变路线的压力（自 6 月中旬起共产国际已恢复了与中国同志的无线电联系）。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如下表示：“1936 至 1937 年我们共产党人接受了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条件，因为国家受到日本的外来威胁。我们首先是中国人。”^⑤共产国际执委会在 8 月 15 日的指示中对中共领导作了让步，明确

^① Garver: <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 in: TCQ, 113, 1988, P.49

参见 Adam B. Ulam: <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 - 67 > . London, 1968, P.323

参见广田计划文本，见 Keiji Furuya: < Chiang Kai - shek. His Life and Times > , Abridged English Edition by Chun - ming Chang, New York 1981 . P.473, 474。

^④ 1936 年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见《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 342 页。

^⑤ 1944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对谢伟思的谈话，引自 Esherick (ed.): <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 . New York 1974, P.300。

表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红军和共产党要统一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完全相反：党和军队必须保持他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并壮大他们的力量。这一指示强调了莫斯科和中共领导经过较长时间才取得一致的军事战略路线。^①

1936年初，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人展开了进攻。1936年8月25日，中共第一次正式和公开地向国民党领导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②南京政府向中共提出了合作的先决条件：苏区要解散，红军^③要减少到3,000人，全部高级军官到国外去。鉴于这样苛刻的条件，共产党领导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意图，联合国民党党内的反蒋力量，逼迫蒋介石共同对日本敌人进行斗争，8月初提出相应的口号“逼蒋抗日”。^④

诚然，国民党和中共间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非在中共的倡议下产生的，而是由于“西安事变”和1937年夏开始的抗日战争促成的。

1936年12月12日受蒋介石委任、对共产党人进行讨伐的张学良，在共产党领导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并要求蒋停止内战，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参加政府，以便共同开展反对日本的“拯救祖国的斗争”。中共领导从这一发展中

此段参见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1937 >, in: TCQ 129, 1992, P.156 ;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2卷第227、233页以及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88页。

^② 杨云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纪实 1919-1943》,第125页; Furuya: <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 P.508; Garver: <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in: TCQ, 113, 1988, P.56;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1937 >, in: TCQ, 129, 1992, P.157 f. 162; Schram: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 P.201

自1927年中共武装力量被称为“红军”，1946年7月以来改称“人民解放军”。苏联的武装力量自1918年称“工农红军”，简称“红军”。为避免搞混，在本书中苏联武装力量一般简称为“苏军”。

^④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1937 > in: TCQ, 129, 1992, P.163

得到鼓舞，并把它理解为是一次实现其多年计划的机会，即排除蒋介石，共同与张学良部队以及其他国民党部队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把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包括到这一统一战线之中。朱德主张要张学良处死蒋介石。^① 毛泽东曾表示赞同，但出于策略原因，建议避免使用“处死”一词。中共在有关的电报中还包含了一个击退效忠南京的集团的进攻计划。对中共的有关电报，张学良反应谨慎，并提出要共产党人首先了解苏联是否将继续对整个西部军给予支持。在随后的那几天，中共领导曾多次致电莫斯科，其中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蒋介石必须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其下属人员应被争取加入联盟，在西安必须建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作为南京的一个制衡体。在一份致南京政府的电报中，他们要求罢免蒋介石，并交付人民审判。^②

斯大林持另一种立场。他认为，在中国惟一能对日本侵略进行有效抵抗的是蒋介石。此外斯大林还顾及华盛顿和伦敦的态度。^③ 《真理报》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宣布了一个离奇的说法：“日本代理人”汪精卫，在“其外国主子鼓动”下，发动了张学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的事变，这是为了在这个国家引起新的骚

此处和下一句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卷第 482 页及下页。

^② 关于西安事变的各种观点及有关参考资料非常之多，这里不能详细列举。但值得提示的是 Wu Tien-wei：< The Sian Incident. 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26, Ann Arbor, Michigan 1976，以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比较新的论述，其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资料来源，如：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286 页，294 - 297 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385 - 395 页；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240 - 255 页；杨云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纪实 1919 - 1943》，第 126 页及下页。1936 年 12 月 12 和 13 日中共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内容见：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306 页及下页。此外，还可参阅 Sheng：<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 - 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 - 1937 >, in: TCQ, 129, 1992, P.129, 163 - 165；郭恒钰：《毛通往权力的道路与共产国际》1975 年 Paderborn 版第 76 页。

^③ 王明 1937 年 12 月的报告，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卷第 483 页。

乱，从而使侵略者更易得手。^① 共产国际在 12 月 16 日给中共领导的两封回电中作了完全类似的表示，说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鼓励日本的侵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领导，努力实现和平解决，只要蒋介石准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参加政府，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围剿红军，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与那些同情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合作。对中共领导来说，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犹如“晴天霹雳”。毛泽东反应强烈，并担心中共奉行莫斯科路线会被张学良指责为搞阴谋。中共领导最终还是服从了，但感到他们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②

中国公众舆论对蒋介石的被扣留和张学良与共产党人合谋，大部分表示愤慨。从军事上看，这一反叛行动的结局难以肯定，因为南京政府向西安方向大量调集部队。周恩来出于策略考虑，建议共产党领导，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这一保证的条件是，南京不向西安调集军队。周恩来和叶剑英是属于主张逼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人。12 月 18 日，蒋介石口头允诺：他将放弃消灭共产党人的计划，并进行抗日斗争。接着，中共领导通知国民党领导，如果蒋介石把发动内战的政策转变为抗日的政策，他将获得

^① 1936 年 12 月 14 日《真理报》。该文没有署名，它显然反映的是苏联领导的意见。同样的声音在其他苏联报刊文章中也可见到，如 1936 年 12 月 15、16、17 和 18 日的（真理报）文章。

^② 此段参见 Ch'en, Jerome: < Th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 - 1937 >, in: TCHC, Volume 13, 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London, 1986, P.226 ;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卷第 483 页及下页，498 页。关于电报内容参见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308 页；《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78 页，引自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 - 1937 > in: TCQ, 129, 1992, P.165 f. 一封电报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的，一封是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后一封因电码错误，中共领导于 12 月 18 日请求重发。此处可参阅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308 页。有两位中国作者认为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攻击和污蔑”，见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308 页。

释放。这封信同时标志着中共政策的一个转变，它具体表现在“联蒋抗日”这一口号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莫斯科的压力不是无足轻重的。^①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它打开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进行谈判的道路。莫斯科的反应是轻松的：人们认为，由于军事上较多地被牵制在中国，日本进攻苏联的危险已暂时被排除。当初，毛泽东担心，蒋介石会因共产党与张学良秘密合作而对共产党进行报复。^②后来，即使抗日联盟已经建立，两党对外虽表示一致，但双方对新的联盟都有很大的保留，他们更多地是从策略上看待这一联盟，而不是从战略上。在执行对国民党的政策方面，中共领导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紧密的协调。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国共两党谈判经常出现分歧。首先涉及的是，共产党人要求保持其军队的独立性。在共产国际催促下，中共力求达成一个形式上的和解，并于1937年2月向国民党建议，把苏维埃政府改称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把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③

此段参见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308 页及下页；《周恩来传》第 331 页；《周恩来年谱》第 1 卷第 335 页；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 - 1937 > . in: TCQ, 129, 1992, P.166 f. , 及出处提示；Eastman: <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 1927 - 1937 > . in: TCHC, Volume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 - 1949, Part 2, 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London 1986, P.162 f ; Ch'en, Jerome: < Th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 - 1937 > , P.226; 郭恒钰：《毛通往权力的道路与共产国际》1975 年 Paderborn 版第 77 页，及资料来源的提示；Adam B. Ulam: <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 - 67 > . London 1968 . P.249 f.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卷第 496 - 498 页。

^③ 此段参见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 - 1937 > , in: TCQ, 129, 1992, P.167 - 169; 郭恒钰：《毛通往权力的道路与共产国际》1975 年 Paderborn 版第 82 - 91 页；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7 年 1 月 20 日电报，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 396 页；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256 页。

1937年7月7日日本袭击中国在北平郊区卢沟桥的驻军。紧接着，日本大举进攻北平和天津地区。8月13日，日本军舰炮击上海。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这些事件不仅导致了军事抗击日本侵略的开始，而且也导致了国共谈判的突破。日本袭击后，中共领导向蒋介石表示这样的意愿：“全体红军将士”“在总司令的领导下抗击敌人的入侵”。8月22日南京政府宣布将红军改编为政府军中的“八路军”，朱德和彭德怀为总指挥。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改编过程。内部文件表明，毛泽东把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看做是“最低纲领”，这就是说，作为一种暂时的策略，而“中国革命”才是“最高纲领”。周恩来较早地就从因果关系上把这两个纲领联系到了一起，并以预言的方式指出其结果：“对蒋介石来说，抗日战争的第一天就意味着毁灭的开始。”^①

第六节 苏联在延安的联络员：是同志，还是敌人？

奥托·布劳恩（李德）于1939年夏末回苏联后，有3个俄罗斯人作为塔斯社的代表来到延安，但到达时间不详。他们与莫斯科保持着无线电联系，他们一直逗留到1943年10月。据苏联报告称，1941年下半年，他们受到中共领导的不友好对待，12月

^① 1936年夏周恩来对埃德加·斯诺谈话，见 Edgar Snow: <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 London 1936, P.76；此段参阅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1937 > . in: TCQ, 129, 1992, P.169；郭恒钰：《毛通往权力的道路与共产国际》1975年Paderborn版第91-97页；郭维仁；《Analy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第3卷，1970年台北版第286-289页；Conrad Brandt, Benjamin Schwartz, John K. Fairbank：《共产主义在中国》一部文献史，1955年慕尼黑版第178-180页；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1969年法兰克福/美因版第197-202页。

以后甚至遭到敌视。中国领导避免与他们会见，并派人监视他们。^①

1942年5月，又来了另外3人，加强了这个小组。其中有彼得·弗拉索夫（别名：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孙平，他是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身份出现的。据种种现象表明，他的真正任务是为苏军情报部门（格贝乌）工作。弗拉索夫担任这个小组的领导。他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向莫斯科报告延安的重要情况和日军在满洲国和华北的运动情况。此外，他看来也为加大苏联自1940年起对中共领导施加的压力而工作，以敦促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与国民党争斗，并与他们一起尽可能地开展对日斗争。弗拉索夫与中共领导中几个亲苏成员，如王明、博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他陈述，这几人被毛泽东轻蔑地称之为“莫斯科帮”或“莫斯科人”，而弗拉索夫称赞他们“忠于国际主义和对苏友好”。显然，弗拉索夫和毛泽东各自拥有一套与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的密码。一般说来，他们相互不知道对方向莫斯科发送了什么，以及从那里获得了什么消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有时也使用弗拉索夫的发报机。莫斯科是如何分别接受弗拉索夫和毛泽东的电讯的，这也不得而知。^②

与彼得·弗拉索夫在延安的角色有关，这里要插入一个问题：1973年在莫斯科发行了一本书，据称，它是弗拉索夫1942-1945年在延安逗留期间写的，以日记形式出版。问题是该书及其资料

^① 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1973年东柏林版第362页；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1942-1945》，柏林（东）1976年版第13、34、43、70、253页。

^② 此段参见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莫斯科，1973年版第61页；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1942-1945》，柏林（东）1976年版第5-11页，472页和全书；尤·弗拉索夫《关于父亲的故事》，载于《远东问题》第1990年第6期第125页；俄罗斯汉学家对作者的谈话；参阅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395页及下页关于弗拉索夫在延安的活动。

的可信性到底有多大。^① 这个真实性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该书包含了许多独特的、一个旁观者了解到的信息，它涉及当时延安发生的事情，包括中共对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关系。从信息角度看，它似乎甚至超过了埃德加·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中译本的书名为：《西行漫记》——译者注）。此外，该书的可靠性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许多西方作者不加分析地把该书作为资料来源加以引用，尽管他们可能知道该书的真正产生历史。^②

正如 1990 以后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发表的并不是一本真正的日记，而是彼得·弗拉索夫的儿子尤里的伪造。后来，小弗拉索夫承认，“与制造同中国的紧张关系相联系”，并鉴于乌苏里江事件（指珍宝岛事件——译者注）之后军事冲突的威胁，受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撰写了这本书。下达这项任务的可能是苏共中央联络部负责同执政党关系的副部长奥列格·拉赫曼宁，他当时协调整个反华宣传。尤里·弗拉索夫承认，书稿是根据以下信息材料编写而成的：他父亲用密码发回莫斯科的无线电电报，苏联情报部门的其他信息材料，以及曾一度与他父亲一起在延安逗留的两位同志提供的信息材料。此外，他还依靠了他与其父在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1973 年莫斯科出版。该书后来出版了多种外文版，其中也有德文版：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1976 年柏林（东）出版。

^② 参阅 Byron and Robert Pack: <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New York/London/Toronto/Tokyo/Sidney/Singapore 1992, P. 151-153, 169, 174, 188; Wesley M. Bagby: <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Americ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World War II >, 1992 年伦敦/多伦多出版。John W. Garver 1988 年可能不知道小弗拉基米洛夫的陈述，曾原则上认为《日记》一书是真实的，但从论证的角度也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参见 Graver: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第 265 页及下页，注 13。

1948 年至 1953 年去世前的谈话回忆。

尤里·弗拉索夫承认，他的书曾受“各级权力机关，直至最高权力机关”的审查。^②这本日记从头到尾贯穿着对毛泽东及其政治路线的极度不信任，这条路线的实质被说成是仅仅为了利用苏联，而不是与苏联团结一致和互相承担义务。人们从中可以看出，有些部分，特别是加进了一些抽象化的意识形态用语的部分，显然是根据拉赫曼宁的指示杜撰的或修饰的。人们不时地还会发现一些这样的事实陈述，这些事实被错误地套用到了延安的账上。^③尤里·弗拉索夫后来发表的关于他父亲的信息也包含着一些荒诞的说法。^④他一方面说，毛非常仇恨彼得·弗拉索夫，以至要“肉体上消灭”他。但另一方面又说毛把弗拉索夫当作知己，让其夫人到莫斯科的一家医院去看望他，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向彼得·弗拉索夫举杯祝贺，并紧接着送他一块贵重的光绪皇帝收藏的表，并说没有人像他一样，给中国共产党人如此多的帮助。

看来，该书主要反映了彼得·弗拉索夫及其苏联同志当时在

此段参见尤里·弗拉索夫：《关于父亲的真相》，载于《论据与事实》1990 年第 18 期；《关于父亲的故事》，载于《远东问题》，1990 年第 6 期，第 124-134 页，以及 1991 年第 1 期，第 171-181 页。《关于父亲的故事》的英译本是不准确的，参阅 Yuri Vlasov: <The Story of my Father> in: <Far Eastern Affairs> No.1, 1991. P.189-207; 同上 1991 年第 2 期，第 193-208 页。

见尤里·弗拉索夫：《关于父亲的故事》，载于《远东问题》，1991 年第 1 期，第 176 页。

参见贝尔纳德·格维茨曼与历史见证人约翰·谢伟斯的谈话，载于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76 年 2 月 13 日。作为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佩者之一的谢伟斯，列举了一些事实。他甚至有点夸大地认为，这部《日记》“主要是为反华而伪造的”。此外，可参阅 Peter M. Kuhfus 的书评《重新看待 <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载于《东欧》，1991 年第 1 期，第 69-77 页。

参见尤里·弗拉索夫：《关于父亲的故事》，载于《远东问题》，1990 年第 6 期，第 128 页和 1991 年第 1 期第 173-175 页。

延安进行观察时得到的印象。^① 这一点在与其它资料来源的比较中，以及从总的历史关系的考察中，都可以得到证明。根据几位能进入苏共档案馆阅读彼得·弗拉索夫来电的苏联汉学家称，《日记》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来电的观点。^② 例如，来电中确实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把共产国际视为将其意志强加于中共的“外国机构”，认为它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持敌对态度，并不止一次地给中国革命带来损害。^③ 又如，1942年发回的报告中也确实有曾引起愤怒的内容，说八路军不愿与日军作战。^④ 许多在《日记》中谈到的、中共领导中发生的事情，只有像彼得·弗拉索夫这样接近中共领导的人才能得知，但有些党内秘密显然是“莫斯科集团”的成员所提供的。

书中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哪些不是，这需通过有关档案材料和历史见证人的报告来验证。只要它还没有被验证，这本书就必须小心对待，就只能有选择地作为材料来源来使用。就是说，只有通过其他材料或证据证实后，或者从总的历史关系看是可信的，书中的有关陈述才能被使用。显然，书中有些观点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如：认为毛泽东和多数中共领导人早在战争时期就以“本能的不友好态度”看待苏联。^⑤ 有些陈述就更难作出评价，如：毛及其志同道合者主要把苏联当作与国民党进行争斗的工具来使用，为此，不惜引发一场苏美战争。^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① Reardon - Anderson 也这样认为，参见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第 182 页，注 5；曾积极从事这一真实性问题研究的俄罗斯汉学家康斯坦丁·谢维列夫对作者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俄罗斯汉学家列夫·杰柳辛的看法更具有批评性，他认为（日记）是中苏冲突时期反华方面“错误地利用历史材料和文件”的一个“典型的事例”，见杰柳辛：《苏联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过去》，载于《论据与事实》，1990 年第 5 期。

康斯坦丁·谢费列夫对作者的谈话。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1973 年莫斯科版，第 311 页。

同上，第 99 页。

同上，第 634 页。

^⑥ 同上，第 627、629 页，及其他几处。

文献中能够得到证实的只是：1936年，中共领导曾试图与张学良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然后再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缔结反日联盟条约。^① 奥托·布劳恩当时也曾认为，毛自1935年起就曾打算把苏联首先拖入与国民党的冲突，然后拖入与日本的冲突。^②

但有些论述看来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如：1941年底德国国防军向莫斯科推进时，毛泽东曾说了一些讥讽斯大林的话，《日记》对此做了逐字的引证：“斯大林曾扬言，他们（指德国国防军——译者注）不会继续向前。我们倒要看看，这位领袖现在会说些什么，在莫斯科……。”^③ 又如毛泽东关于斯大林的这样一些言论：“他不了解中国，也不会了解中国，但他自以为能对一切作出判断。他提出的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所谓论点，都是愚蠢的空话。在共产国际，人们说的也都是同样的空话。”^④ 可以想象，这类话是毛在他最信任的圈内人中间说的，而王明、博古等“莫斯科集团”的成员从圈内人的不慎泄露中得知，并转告了弗拉索夫。

尽管人们可以认为，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根据彼得·弗拉索夫当时发回的报告写的，但这些内容也只能谨慎地使用。从尤里·弗拉索夫对其父的讲述中可以看出，彼得·弗拉索夫是一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路线的狂热追随者。在他看来，哪怕是偏离一点莫斯科政策，或他所认为的苏联利益，那就是背叛。在这方面，他几乎以一种病态的不信任感去注视中共领导的发展过程。就这点而言，他可以与奥托·布劳恩相比，布劳恩在回顾其执行中国使命时承认：“我一生都把对苏联的态度看做是衡量每个共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86页。

②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1973年东柏林版第219页。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年》，1973年莫斯科版，第63页。

④ 同上。

产党人的试金石，不管他是哪个民族的，以及在什么情况下。”^①

本作者在随后的行文中将不加评论地援引《日记》中某些陈述，但只是在上面提到的意思下，在作者认为可信和合适的情况下才加以引用。

1945年11月，彼得·弗拉索夫及其小组回到苏联。据他儿子陈述，几位于1943年从延安召回的苏联同志曾向季米特洛夫告发彼得·弗拉索夫，说他在延安有越权行为，并因单方面的支持王明而在政治上陷入了盲目性。弗拉索夫在莫斯科的住所曾遭搜查。但季米特洛夫还是信任弗拉索夫的。据他儿子称，他从中国回来后，被授予了高级奖章，斯大林并听取了她的汇报。与弗拉索夫一同回国的一个同志是安德列·阿洛夫（化名为：杰列宾），医生和秘密工作者，他曾是毛泽东和江青的保健医生。阿洛夫同样也为军事情报机关（格贝乌）工作。^②他使用“中国特别住院医生”的称号进行军事情报机关的秘密工作，他直接把无线电报发往莫斯科总部，并由总部转给斯大林。毛泽东很赞赏他的医术。1946年应毛的请求，斯大林第二次把他派往延安。他在那里再次从事秘密工作，并利用弗拉索夫留下的无线电发报机与莫斯科保持联系。后来，一位在延安为苏联内务部工作的苏联医生米尔尼柯夫秘密告发了阿洛夫，说他为华盛顿做间谍工作。据师哲称，阿洛夫于1949年秋被召回莫斯科。据说，在此前不久，师哲也对内务部说了批评阿洛夫的话。在臭名昭著的内务部莱夫托夫监狱，阿洛夫在拷打下被迫作了假交代，其中也加害了彼得·弗拉索夫。后根据斯大林指示，他获得了自由，恢复了名誉，但不久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但据尤里·弗拉索夫称，阿洛夫是出于政治原因被清除的。彼得·弗拉索夫自1948年至1951年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1973年东柏林版第365页。

参见科瓦廖夫1948年7月1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45号全宗，1号目录，331号案卷，第59—61页。

任上海总领事，1952年出任缅甸大使。他儿子确信，彼得·弗拉索夫是在贝利亚指示下通过“抗癌注射”而被害的。^①

对本节标题中提出的问题不得不作这样的回答：斯大林在延安的联络员与其说是毛泽东的同志，不如说是他的敌人。

第七节 中日战争时期莫斯科片面的对华政策

如前所述，斯大林害怕与日本和德国进行两线作战，并估计日本如深深卷入对华战争，将使日本在军事上受到很大牵制，甚至将使其耗尽精力，使东京难以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因此，应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促使所有抗日力量的联合，巩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如果以夸大的和恶意的方式来描绘这种政策，人们可以说，斯大林已决心让中国人抗击日本而斗争到最后一个人。^②而中共领导的政策则是另一个目标，首先是在抗日战争中珍惜自己的力量，以准备同国民党作最后的斗争。

在战争期间，不仅是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华盛顿的中国政策也是试图促使内战双方搁置争斗，以便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人们从这种努力中可以看出，苏联想在整个战争期间把精力集中于欧洲。

1940年秋，斯大林曾向赴重庆国民党政府担任苏联首席军

此段可参阅1948年7月14日阿洛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9号全宗，1号目录，31号案卷第40页。摘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年1-2月）》载于《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99页；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1942-1945年》，1973年莫斯科版第768页；尤·弗拉索夫：《关于父亲的故事》载于《远东问题》1990年第6期第126-128页，131-134页；同上，1991年第1期第171页及下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1991年北京版第315页、390页；师哲访谈录，见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记——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载于《人物》1993年第2期，第95页。

参见巴扎诺夫：《中国和外部世界》，1990年莫斯科版第35页。

事顾问的瓦西里·崔可夫表述了他当时的中国政策的意图：“最重要的是，联合中国的所有力量，以打退侵略者……。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袭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①

关于物质援助应给谁的问题，莫斯科显然首先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是苏联在外交上承认了国民党政府，并通过 1937 年 8 月 21 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承担了义务，不支持任何对国民党政府持敌对态度的“第三国”或“第三种势力”。^②虽然这一条款在国际法上可作不同的注释，但南京可以对它扩展为包括内政的敌对者。另一个更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产生于中国内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它也是决定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在战争初期，国民党的军队有 200 万人左右，而红军只有 10 万人左右。^③抗日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决定与较强者结盟，并且不允许通过帮助内战的另一个对手而打乱这一战略。^④

斯大林曾向崔可夫说起这两个因素。当崔可夫赴华前问道，为什么派他去蒋介石那里，而不是去中国红军那里时，斯大林极其坦率地说：

斯大林对崔可夫的谈话见崔可夫：《在中国的使命——军事顾问札记》，1981 年莫斯科版第 57 页及下页；此段还可参阅约翰·加弗尔：《中苏关系》第 15-122 页；加弗尔：《蒋介石为促使苏联卷入中日战争的探索》，载于 TCQ 第 102 期，1987 年，第 295-316 页 特别是第 315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外交札记》，载于《远东问题》，1991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中文文本见：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958 年台北版第 486 页；俄文文本见：《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61 页及下页。

^③ 关于部队人数有几种说法。可参阅 < History of the Sino - Japanese War > , P.172; O'Balance: < The Red Army > London, 1962, P.125 f. ; Liu: < A Military History > , London, 1956, P.135.——在新公布的俄罗斯材料中，共产党的部队人数被引证为 6 万人 见列多夫斯基：《外交札记》载于《远东问题》，1991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④ 列多夫斯基：《外交札记》。载于《远东问题》，1991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应比蒋介石更靠近我们。看来，人们应给他们最多的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将被看做是向与我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实行一种革命输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现在还太弱，不能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与蒋介石政府已缔结了相应的条约。您要熟悉所有这些文件，您的一切行动都要与这些文件相一致。^①

斯大林在延安的联络员彼得·弗拉索夫本人在 1942 - 1945 也使用了与此相同的论点：

苏联不能向特区（由中共控制的独立区）提供装备和武器的援助，正是这一点，人们指责我们，这也正是不满的主要原因。

苏联向特区进行任何的武器提供，都将意味着违反与重庆中央政府签订的条约，瓦解抗日统一战线。这种军事提供将导致重庆和莫斯科之间的裂缝……这在将来也会引起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武装冲突。

这样一种转折对日本法西斯来说将是极好的前景

但在这里（在延安，在特区），人们正期望从苏联获得军事支持，而在我看来，这绝对不是为了加强对日本占领的抵抗，……我相信，人们在这里想的是内战。^②

崔可夫：《在中国的使命 - 军事顾问札记》，1981年莫斯科版第 56 页及下页。

②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1973年莫斯科版第 33 页。

总体上可以确定，自 1941 年 4 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和 1941 年 6 月德国袭击苏联起，斯大林很少注意东亚。这一点直到 1944 年 6 月西方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后才得以改变。^①

美国外交人士也认为，斯大林是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视为优先选择的伙伴。哈里曼特使在 1943 年 11 月开罗会议期间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曾作了如下表述：苏联政府希望战后在中国实现和平，并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一目标只能借助蒋介石来实现。斯大林希望蒋要么承认中共是一个独立政党，或者把它“吸收到他的政府之中”，以此来解决“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② 斯大林的这一估计反映了他自 20 年代以来的明显倾向，即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比中共的强。莫斯科是否真的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的中国，或者它宁愿要一个分裂的、软弱的中国，这一点却得不到证实。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曾不断指责苏联，说它力求形成两个政体。

1944 年 6 月斯大林再次对哈里曼说，他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恰当的”，他将努力去统一中国。在这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的能力似乎较小。^③ 1945 年 4 月斯大林在与赫尔利大使

W.M. Bagby: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Americ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World War II》, 1992 年 London/Toronto 版第 69 页。。

^② 1943 年 11 月 23 日备忘录 引自哈里曼 / 阿贝尔:《秘密使命——作为罗斯福特使访丘吉尔和斯大林 1941 - 1946》, 1979 年斯图加特版第 208 页。

^③ 1944 年 6 月 1 日斯大林同哈里曼的谈话, 引自哈里曼 / 阿贝尔:《秘密使命——作为罗斯福特使访丘吉尔和斯大林 1941 - 1946》, 1979 年斯图加特版第 368 页; 参见 Reardon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 - 1946 >, New York 1980, P.71. 1945 年 5 月斯大林对霍普金斯的类似谈话, 见 W. M. Bagby: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Americ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World War II》, 1992 年 London/Toronto 版第 213 页。也可参阅 1945 年 7 月初 Hurley 的报告, 载于《中国白皮书》, 第 99 页; Michael M. Sheng: < Response: Mao and Stalin: Adversaries or Comrades, in: TCQ.129, 1992, P.182, Sheng 的观点是, 斯大林信任毛胜过蒋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谈话中也称赞了蒋，说他是“不自私的”和“爱国的”。^① 随后不久，斯大林又向霍普金斯保证，为促进中国在蒋的领导下实现统一，苏联将竭尽全力。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有能力统一中国。^② 在美国外交官面前，苏联领导人明显地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了距离。1944年6月，斯大林在哈利曼面前如此地蔑视中国共产党人，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人造黄油—共产党人”，尽管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抗击日本。^③ 斯大林同赫尔利谈话时也使用了“人造黄油—共产党人”这个用语。^④ 莫洛托夫宣称，有些贫穷的中国人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⑤ 他们仅仅以此来表示对他们的生活条件的不满，只要生活状况有了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一政治倾向。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种“共产主义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指责苏联政府。

可以认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拉开与延安的距离，这实际上是莫斯科早已形成的轻视中国共产党人的那种倾向的反映。据说斯大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把中国同志讽刺为“红皮萝卜共产党人”（外红内白）。同样，他在其最亲密的同事圈子里给毛起了一个“普加乔夫”的外号，把他比作俄罗斯18世纪的一个最终被

赫尔利关于他1945年4月15日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谈话，引自《中国白皮书》第95页。

^② M. Bagby: *The Eagle-dragon Alliance—Americ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World War II*, 1992年London/Toronto版第213页。

^③ Reardon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1946 >*, New York 1980, P.71；参见芭芭拉·图赫曼：《沙与风—美国和中国1911—1945》，1973年斯图加特版第470页。

^④ Gordon H. Chang: *<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 Stanford, CA 1990, P.10。

此段和以下两段话见1944年底莫洛托夫与赫尔利的谈话，载于《中国白皮书》第72页；也可参阅Henry Wei: *< China and Soviet Russia >*, Princeton, New Jersey/Toronto/London/New York 1956, P.170。

处死的人民起义领袖。^① 但是这些援引的表述并不能轻信，不能完全把它当作是真话。可以认为，这些话也可能是为了唤起美国盟友的信任，苏联当时迫切指望美国盟友对德国的持续进攻。因此，这样一种推测也是有说服力的，即认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尽力以这种表态来抵消在华盛顿和重庆广为流传的关于共产主义世界图谋的指责。不能完全排除的是，斯大林为使延安理解其对华盛顿的这种姿态，已向中共透露了这一游戏。中共领导 1945 年 11 月底的指示可以说明这一点。指示中说，苏联不得不“在官方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距离”。^② 至于另一种说法的可能性则比较小，即认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想以此表述来促使美国领导不仅向国民党，而且也向中共提供武器，以加强他们打击日本的军事力量。^③

此外，苏联的信息在华盛顿也不是没有作用的。哈里曼在 1944 年和 1945 年得到的印象也不完全是错误的，即：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并无视斯大林的忠告”，开拓他们谋取政权的道路。^④ 在赫尔利大使的影响下，杜鲁门总统也日益相信，中共在独立于莫斯科而行动。乔治·马歇尔也相信，他们没有从外国共产党人那里获得支持。^⑤ 这种估计也基本上是对的。

尤·弗拉索夫：《关于父亲的真相》载于《论据与事实》1990 年第 18 期。弗拉基米洛夫援引与当时的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的一次谈话和档案材料。

^② 中共中央 1945 年 11 月 28 日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1991 年北京版第 455 页。

这是亨利·卫的推测，见亨利·卫：《中国与苏俄》，1956 年纽约版第 170 页。

哈里曼/阿贝尔：《秘密使命——作为罗斯福特使访邱吉尔和斯大林 1941-1946》，1979 年斯图加特版第 209 页。

^⑤ Gordon H. Chang: <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 . Stanford, CA 1990, P.11.

第八节 不向中国同志提供苏联武器

中日战争期间，苏联拒绝向中共提供武器，这显著地影响了与中国同志的关系。据已公开的材料看，斯大林在扼守这一原则方面出现过 3 个例外。但这都不是出于中国的利益，而是苏联的利益。其中两次是斯大林由于担心日本进攻苏联，请毛泽东把部队调遣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以牵制日本军队。与此相联系，斯大林表示愿意以现代军事装备来配备这些部队。^①

战争爆发前，斯大林曾持另一种态度。1935 年，第一次出现了苏联可能向中共提供武器的问题。当时，这一问题是与长征后在中国北方或西北建立共产党统治区紧密相联系的。1935 年夏，党的领导在四川第一次辩论应向何处进军的问题。张国焘坚持在四川、甘肃和新疆建立新的根据地，而毛泽东主张继续向北方进军。在 8 月初毛儿盖政治局会议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和其他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领导的成员带领部队向甘肃、宁夏和陕西进军，并于 10 月在陕北会合。张国焘和朱德却带领他们的部队继续向西康、西南方向进发。1936 年夏，张国焘曾启程去甘肃和陕西，但后改向新疆方向进发，最后又不得不折回甘肃。^②

1935 年夏，作出向北或向西北进军的决定时，都包含了一个打算，即向地理上靠近苏联的地区进发。这一意图是与想获得

此段参阅李海文：《毛泽东与斯大林交往》，载于《瞭望》1992 年第 52 期，第 90-96 页。详见本章第九节。

此段参阅夏乐平：《毛泽东编年史——生平和著作》，1976 年慕尼黑/维也纳版第 145 页及下页；Boorman/Howard：《Biographical Dictionary》第 2 卷第 81 页及下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英文版第 2 卷第 374-473 页（东方出版社中文版第 3 卷第 217-321 页）

苏联物质支援相联系的。鉴于当时军事上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人们迫切希望得到这种援助。8月初，首次明确地说出了这一意图：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靠近^①。1935年9月中，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得到帮助，“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中共不是独立的党，而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组织。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首先要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然后向东延伸”。党领导接受了毛的建议，并作出决定，“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和扩大队伍。^②

11月，共产国际派到陕西的林育英（张浩）向党领导传达说，斯大林不反对共产党的部队向苏联和外蒙古靠近。据说，林还向张国焘表示，斯大林同意张在新疆和甘西的发展计划，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准备提供必需的武器和训练红军，使之成为一支劲旅。^③此时，洛甫致函毛泽东，建议经宁夏向外蒙古进发，以便从那里取得技术援助。^④毛表示“完全同意”。但他建议首先扩大苏区，以便再靠近蒙古边界，“与苏联和外蒙共和国打成一

^① 1935年6月8日中央委员会决议，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88年上海版第374页。此段可参阅 Michael M.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1937 >. in: TCQ, 129, 1992, P.159.

^② 毛泽东 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甘肃省）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以及中央决议，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88年上海版第374页，以及 Michael M.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1937 >, in: TCQ. 129, 1992, P.159, 以及《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325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英文版第2卷第448页（东方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296页）。

^④ 此处和下段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1993年武汉版第276页。

片”，“武装制止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并吞全国，进攻苏联”。^①在地理上与苏联和蒙古打成一片的战略，被称之为“打通国际路线”或“打通苏联”。^②

与此相联系，出现了一个至今尚无答案的问题：斯大林是如何得知中国同志的这项计划和愿望的，而当时中共领导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已经中断。

显然，林育英还带来这一消息：共产国际纠正了他们过去提出的，中共必须先占领中心城市或几个省城的主张。莫斯科现在把上述主张视为托洛茨基思想。共产国际并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已在某些省区取得了首先胜利。^③

1935年12月，“打通苏联”的战略得到批准并具体化。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巩固陕西和甘肃的苏区，并从那里“东征”，由山西向绥远进发，以便建立与外蒙古的联系。人们力求以此“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并首先从莫斯科得到装备和物资。^④但在1936年，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依然是消灭“汉奸卖国贼的军

毛泽东 1935年11月23日的建议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88年上海版第375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1993年武汉版第276页。奥托·布劳恩也大体证实了这一陈述。此外，布劳恩还说，洛甫和毛泽东两人都让第一方面军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进军，但洛甫以悄悄的方式进行，而毛则大张旗鼓。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1973年东柏林版第209页及下页。

此段参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88年上海版第347、375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1993年武汉版第275页；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2卷第209、214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84-286页。

^③ 中共中央 1935年11月18日给第四方面军的电报，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275页。

^④ 1935年12月23日中央委员会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375页。

队”，^①即国民党。关于这个问题，在瓦窑堡会议上曾出现不同意见。奥托·布劳恩表示担心，向山西和绥远进军可能会引起日本进攻苏联。^②

奥托·布劳恩在 1936 年 1 月初召开的一次党和军队领导人会议上，以及在接着写给毛泽东的信件中，反对这一计划。布劳恩怀疑，毛想以此种方式把苏联先拖入与国民党的冲突，然后再拖入与日本的冲突之中，以便利用它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认为，向蒙古边界进军可能被东京当作袭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借口，并可能进而迫使苏联进行军事干预。自 1934 年以来，毛一再强调，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和日本的矛盾。因此，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斗争是世界性革命斗争的决定因素。而布劳恩则与斯大林的路线相一致，认为保卫社会主义摇篮苏联和反对潜在的敌人是主要因素，并认为，从日本的潜在威胁看，中国同志的抗日斗争可减轻对苏联的压力。在布劳恩看来，这是中国同志理所当然的“国际主义”义务。1936 年初布劳恩和毛的争论反映了两个共产党之间的一种民族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利益矛盾。^③

上文已提到，斯大林曾表示同意中共向苏联边界进发的计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278 页。

^② 此段参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 375 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278 页及下页；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 2 卷第 209 页；《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 330 页及下页；Michael M.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 - 1937 >, in: TCQ, 129, 1992, P.159, 及注 48；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 - 1939）》1973 年东柏林版第 209 页及下页。不清楚的是：莫斯科是否批准了这样的“东征”，参见 Carver: <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in: TCQ, 113, 1988, P.48。

此段参阅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 - 1939》1973 年东柏林版第 217 - 220 页。布劳恩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在中国的材料中也得到了证实，但这一过程被移到了 1935 年 12 月底（瓦窑堡会议），见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278 页。

划。但看来布劳恩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似乎有些费解。如果上述情况属实，斯大林与布劳恩之所以不同，要么是当时斯大林未能与布劳恩取得联系，从而未能看清这一战略的影响，要么是布劳恩比斯大林更多疑。

实际上，当时的中共在奉行两个战略路线。其一是在“打通抗日路线”的口号下，把国内战争同抗日战争结合起来，这是主要任务。其二是作长期的努力，把苏区向苏联和蒙古的边界扩展，并期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如可能，把苏联也拖入反对国民党和日本的斗争中，即：“打通国际路线”，或称“打通苏联路线”。^①

1936年2月开始的“东征”在5月以失败而告终。红军在山西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打击，并越过黄河，退回到陕西。^②此时，中共领导开始这样来阐明“抗日反蒋”战略的含义：力求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结成反对蒋介石和日本的联盟，与宁夏—甘肃的联合政府一起创建一个中心地区，并由那里经外蒙或新疆建立与苏联的联系，以此取得苏联的援助，并最终与莫斯科和乌兰巴托缔结抗日援助条约。8月底，与日益困难的财政状况和食品供应相联系，中共领导通过共产国际请求苏联军事援助，其中包括飞机和大炮，理由是：这些是占领甘肃西部、宁夏和绥远的需要。邓发被派往莫斯科很可能就是为了转达这一请求。^③9月中，苏联领导答应给予援助，其中包括200吨军事物资，如果红军占领了宁夏，他们就可从那里拿到这些物资。但是

此段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347、375页及下页。

此段参见 Garver: <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in: TCQ, 113, 1988, P.47-53. Garver 关于“东征”与苏联利益相矛盾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Sheng 以更有说服力的材料来源回驳了 Garver 的观点。参见 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1937 > . in: TCQ, 129, 1992, P.158-163 , 及全文。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1973年东柏林版第210页。

在 10-11 月，建立一座连接苏联的地理桥梁的企图失败了。莫斯科想通过新疆运送援助物资，但这一努力也因运输问题而无结果。此时，中共领导开始把“打通苏联”的计划视为长远目标。^①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斯大林在春天就已决定在中国促进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同时又要向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共产党人提供武器，不惜承担引起南京政府对立的风险。目前，回答这个问题还缺乏资料来源。但这样一个假设似乎是最可信的，即：斯大林首先要以秘密方式提供，其次他想作两种准备，如果抗日统一战线失败，南京与东京结成反苏轴心，一个靠近苏联势力范围的、由友好的中国同志统治的政权基地就是第二支剑。

随着中日战争的开始和莫斯科与南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向中共提供武器的准备工作中断了。从此，来自延安的有关请求，斯大林一概充耳不闻。

王明在 1937 年底抵达延安时就已向他的同志们道出了这一不愉快的事实真相：苏联根本不可能向延安空运武器和弹药。原因是已同国民党达成协议：苏联空军飞机越过中国领土必须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因此，王明乘空军飞机来延安是秘密的和非法的。对武器供应问题特别感兴趣的毛泽东叹息地说：“拿那么

此段参阅 1936 年 8 月 25 日洛甫、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给王明的电报，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293 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 380 页，意见《周恩来年谱》第一卷第 318 页；1936 年 11 月 11 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294 页；1936 年 11 月 8 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林彪给朱德、张国焘、贺龙和任弼时的电报，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 384 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286、293 页及下页；《周恩来年谱》第一卷第 321 页及下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 380、384 页及下页；Sheng: <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1937 > . in: TCQ, 129, 1992, P.162 f.

多军火给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稍稍分给我们一点。’^①

不仅是毛一个人不能赞同这种意见，许多延安的共产党人显然对此感到失望。实际上，苏联的民用和军事援助都给了国民党，而中国同志仅得到一些药物、医疗器材和政治文献，其中包括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在延安可以听到这样一些冷嘲热讽的话，如“给资产阶级武器 给无产阶级书。”^②看来，当时中共领导出于纪律性以及因在共产国际缺少其他盟友而没有对这种单方面支持国民党的行为提出公开抗议。

1938 和 1939 年苏联在国民党中的首席军事顾问声称，苏联通过新疆陆路向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可观的援助”，但没有说明具体的内容。^③ 1938 年苏联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是这样解释单方面援助的，他说，苏联给国民党的援助导致蒋介石愿意与中共建立统一战线，这样也就拯救了中国共产党人免遭国民党的消灭，因为蒋介石很清楚：国民党不能一方面拿苏联的援助，而同时又打共产党人。^④ 实际上，如在 1943 年 7 月，当国民党计划向共产党边区大举进攻时，莫斯科曾提醒他们注意，苏联的武器不是为内战，而完全是为抗日提供的。^⑤

此段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英文版第 2 卷第 566 页（东方出版社中文版第 3 卷第 418 页）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1973 年东柏林版第 289 页及下页。

谢列潘诺夫：《武汉战役的总结》，载于《在中国土地上，苏联自愿人员回忆录（1925-1945）》第 137 页。

卢加涅斯-奥列尔斯基大使同首席军事顾问谢列潘诺夫的谈话，见谢列潘诺夫：《武汉战役的总结》，载于《在中国土地上，苏联自愿人员回忆录（1925-1945）》的 136 页。此段可参阅梅里克塞托夫：《40 年代……》，收于《在变化的世界中的苏联和中国：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谈苏中关系的历史和前景》，1989 年莫斯科版第 26 页；刘之清（音）、史伦（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载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1988 年第 2 期第 73 页；P.P.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 年》，1973 年莫斯科版第 27 页。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 410 页；P.P.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 年》，1973 年莫斯科版第 200-205 页。

因此，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1937年至1941年期间苏联的援助全部给了国民党政府。已知的、惟一的一个苏联向中共提供武器的例子，就是1943年初通过国民党向满蒙边区的共产党部队提供了6门高射炮和120挺机枪。实际上，苏联破例提供武器的动机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斯大林格勒战役处于紧要关头之际，莫斯科的人们特别希望中国加强对日本的抵抗，并把日本部队牵制住。^①

与此相反，国民党根据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莫斯科得到3笔总额为2.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主要用于购买苏联武器。武器供应包括1,000多门大炮，900多架飞机，82辆坦克，100万枚手榴弹，3万2千枚左右的炸弹，近1万挺机枪和5万支枪支。援助物资一般是用卡车经新疆运送的。有1,5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约2,000名空军人员在中国一边参与对日作战。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最早是德拉特温，1938-1939年是切列帕诺夫，1940年12月至1942年2月是崔可夫。当然，莫斯科的援助不是无偿的。作为交换，苏联获得了有价值的物资，如皮革、钨和其他稀有金属以及大量的粮食。最后一批军事物资是1941年8月提供的。1941年10月苏联宣称，由于它自己要进行抗德战争，苏联已不能再继续提供援助。

埃娃·玛丽亚·斯托尔贝克：《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 1945-1953》，关于冷战背景下苏中结盟的产生历史的研究，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第1部分第29页，及资料来源的提示。

同月，美国军援逐渐进入。^①

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谈到1927年蒋介石放弃苏联的继续援助时说：“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②但这个论断听起来有些令人惊讶，因为当时的问题并不在于拒绝苏联援助，而是在于莫斯科并不愿意给这种援助。

1941年1月毛泽东请求崔可夫提供武器和派遣技术人员。他提出的理由是，没有重武器，包括飞机，红军就不可能夺取如兰州这样的城市。斯大林间接地拒绝了这一请求。他认为，人们不必攻击坚固据点，而应以优势兵力孤立日军据点，使敌军力量分散。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很不严肃的建议：中国同志可以向国民党要求，从苏联援助的武器中分一些给你们。很显然，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能满足这种要求。^③

1941年夏，德国袭击苏联后，斯大林再次和更加担心，出现日德两线夹击的局面。这显然是他露出本意，并向中共抛出诱饵的原因。他表示将提供军事物资，但条件是：共产党部队向蒙

^① 卡利亚金：《在不熟悉的道路上——军事顾问中国札记》，1979年莫斯科版第2版补充版全书；《在中国土地上——苏联志愿人员回忆录（1925—1945年）》，莫斯科，1974年；谢列潘诺夫：《武汉战役的总结》，载于《在中国土地上，苏联自愿人员回忆录（1925—1945）》的134—181页；鲍罗京：《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援助（1937—1941）》，1965年莫斯科版，全书；杨奎松：《苏联因素与40年代中共对美政策》载于《中国历史》1992年第1期第18页及下页；梅里克塞托夫：《40年代……》，收于《在变化的世界中的苏联和中国：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谈苏中关系的历史和前景》，1989年莫斯科版第26页；列多夫斯基：《外交札记》，载于《远东问题》，1991年第1期，第109页；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P.18—21, 37—52, 104—108页；Tucker：〈Patters……〉，第16页及资料索引；Arthur N. 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Mass. 1963，第254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第680页。

^③ 1941年1月（无具体日期）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转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373、377页。

古人民共和国方向进发，以便从那里取得军事物资。从各种迹象来看，斯大林想以此种方式推动犹豫不决的毛泽东，干扰日军向苏联的进发。毛拒绝了，因为对他来说，在当时形势下，任何一种方式的撤出边区都将冒很大的风险。^①

第九节 莫斯科和延安在对国民党 和日本的政策方面的冲突

抗日战争（1937年7月7日）开始后，红军作为“第八路军”被编入国民党军队。几天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上断言，国民党不会改变其反动本质，因此也不能战胜日本。国民党将分裂，一部分将投降，另一部分将被消灭。八路军，不管它以什么形式隶属于蒋介石的总指挥之下，它实际上是独立的，受命于中共的领导。共产党人不应受爱国主义驱使。他们的部队必须提高战斗力，避免与日本人进行正面战斗，而在敌人后方进行游击战，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抗日战争对解决国内政治矛盾是重要的。总书记洛甫更明白地表述了这一立场，他回到了共产国际与中共原来商定的路线：中共既要抗击日本，也要抗击国民党。它们中的一个失败了，也就意味着另一个的失败。两者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毛泽东和洛甫的这种思路使人想起中国的“坐山观虎斗”的战略。^②

张国焘和周恩来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显然主张，不要有较大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361页；Garver：<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P.238f. 具体过程见下面的第一章第九节。

^② 此段和下段参阅郭维仁：《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析》第三卷，1970年台北第1版第286-289页；郭恒钰：《毛通往权力的道路与共产国际》1975年Paderborn版第93-95页；Sheng：<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 - 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 - 1937 > in: TCO. 179. 1997. P.169

的保留，而应尽最大的努力同国民党一起抗击日本的侵略。也就是说，要认真对待“抗日统一战线”，不能认为蒋介石要投降，人们有义务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遵守诺言。他们还认为，避免与日本人进行正面作战，将在人民中间引起错误的印象，似乎共产党人在抗战中并不尽力。在辩论的最后，人们勉强地以一种妥协掩盖了分歧。

1937年底，如人们期望的那样，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时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抗日战争不能通过反对国民党，而只能在同国民党实行紧密的军事合作中取得胜利；两支军队可以在组织上统一起来，并必须在国民党的最高指挥下行动。12月中，王明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敦促，中共必须认真与国民党合作，以反对日本。他说，这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如果中国进行了有效的抵抗，日本就不可能进攻苏联，而这将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看来，王明在这次会议上“像一个钦差大臣”，传达圣旨。与8月洛川会议不同，毛泽东和洛甫避免向共产国际的权威进行公开的挑战，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王明路线被一致批准，尽管没有作为正式决议通过。^①

这次会议之后，中共在无数的公开言论中声称，他们是“真诚地”对待“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抗战救国”的。^②显然，当时毛泽东对莫斯科路线的不同意见主要是针对合作的形式和策略方面。随后几年的发展表明，毛坚持了他的原则：必须与国民党结

此段参阅张国焘：《我的回忆》英文版第2卷第566-573页（东方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418-424页）；郭维仁：《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析》第三卷，1970年台北第1版第333-337页；郭恒钰：《毛通往权力的道路与共产国际》1975年Paderborn版第97-99页；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1973年东柏林版第300308页；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 P.65 - 67。关于王明和毛泽东在党内的分歧见本章的第二节。

^② 1937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对局势宣言》，引自郭维仁：《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析》第三卷，1970年台北第1版第342、368-371页；同上，第342-346页。

盟，但也要与它斗争。^①很可能，王明在 12 月会议上传达的斯大林的一段话，也使毛在推行其两面手法上受到了鼓舞，斯大林认为中共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别无其他选择。^②就蒋介石方面而言，他关心的是阻止共产党统治区的扩大和日本军队的向前推进。他动用了 20 万精锐部队中 15 万军队封锁共产党人“特区”。^③

因此，“抗日统一战线”更多的地存在于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上。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军队的指挥权也只是停留在形式上。^④但是双方的合作在开始时还是比较满意的，直至 1938 年年底出现了紧张状态，这主要是国民党在武汉解散共产党群众组织而引起的。^⑤

苏联对中共领导不断施加压力，要他们以最大可能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在军事上抗击日本，以便把日本拖在中国，阻止它进攻苏联。这种不断施加的压力于 1940 年底导致了莫斯科与延安之间的严重分歧。^⑥

苏联很早就要求中国红军进行阵地战，以阻止日军的推进，而中共领导则优先选择游击战。^⑦材料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在 1940 年下半年曾进行了规模很大，但战果很小的进攻战，即“百团大战”。这是一次在共产党人方面有 40 万士兵参加的，实

张国焘：《我的回忆》英文版第 2 卷第 568 页（东方出版社中文版第 3 卷第 420 页及下页）；F.F.Liu：《现代中国军事史》，1956 年华盛顿/伦敦版第 205 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英文版第 2 卷第 568 页（东方出版社中文版第 3 卷第 420 页）。

③ 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 . Port Washington, N.Y./London 1956, P.205.

④ Lyman van Slyke (ed.), : <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 July 1945, Stanford, CA 1968, P.67.

⑤ 崔可夫：《在中国的使命 - 军事顾问札记》，1981 年莫斯科版第 141 - 150 页及全书。

⑥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 523 页。

⑦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二卷，1989 年北京版第 282 页。

际上是在苏联压力下进行的非游击方式的战役。^①在整个战争期间，有过几次共产党人的大规模进攻。^②据当时驻重庆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称，毛泽东认为这些大规模进攻无助于中国和中共的利益，而只是为阻止日本进攻苏联服务的。崔可夫说，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结束了对日战争。^③

10月中旬，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部队受到削弱的机会，向它发起军事进攻。当时，共产党领导认为，蒋介石准备投降日本，准备变成贝当。1940年11月初，毛泽东一度有过这样的想法：按“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是进攻”的口号，宣布取消与重庆的抗日统一战线，并动用15万军队进攻国民党。^④相反，苏联领导则继续对坚持统一战线感兴趣，并认为，人们必须保护蒋介石，以免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拉拢过去。^⑤中共的这一强硬的反国民党的路线被莫斯科批评为“左”倾。^⑥

毛暂时转向了莫斯科，并提出：要保护蒋介石，使其免受“暗藏的亲日集团的影响”要友善对待他。^⑦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毛也改变了迄今为止的、认为无论蒋倒向日本还是倒向美英都是同样有害的这一观点。^⑧毛此时认为，蒋介石加入德意日阵

^①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 P.141 f., 以及资料来源提示。杨云若和杨奎松在论述有关情况时，没有提到苏联的压力，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15页。

崔可夫：《在中国的使命 - 军事顾问札记》，1981年莫斯科版第144页；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1980年纽约版第14页。

^③ 崔可夫：《在中国的使命 - 军事顾问札记》，1981年莫斯科版第145页。

^④ 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和王稼祥给彭德怀的电报，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16页；Sheng: 《America's Lost Chance in China?》，第145页及下页，以及资料来源提示。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18页。

^⑥ 同上，及资料来源的提示。

^⑦ 毛泽东1940年11月6日给李克农的指示，引自 Sheng: 《America's Lost Chance in China?》，第146页，以及资料来源的提示。

^⑧ 毛泽东1940年11月1日，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16页。

营应断定是不利的，而与华盛顿合作则是有利的。^① 他甚至谈到中共、中国人民、苏联与英美四种力量的联合。

1941年初，莫斯科和延安再次在对待国民党的态度方面出现了冲突。根据1940年6月国民党和中共的协定，大部分驻扎在长江以南的、陈毅领导下的共产党部队向苏北转移，然而这却挤压了驻在那里的国民党部队。重庆方面就此对共产党人采取了强硬态度。1940年12月底，作为红军惟一留驻在长江以南的正规兵团新四军的一部分，没有按重庆的命令从皖南向北越过长江，而是向南向江西方向运动。于是，国民党部队包抄、袭击共产党的这些部队，并挑起一场给双方都带来重大损失的战斗（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了7000人。共产党领导决定，军事上准备全面反击。^② 从这以后，共产党部队也开始袭击国民党部队。八路军领导接到指示，不再向蒋介石作报告。“统一战线”仅存于纸上，并成为一种并不总是被遵守的停战协定。^③

在决定向新四军发动进攻时，蒋介石因莫斯科的消极反应而有所犹豫。他甚至估计苏联的军事援助将中断，但他聊以自慰的是希望美国将给他以更多的支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实际上就袭击新四军批评了蒋介石。苏联外交部敦促国民党大使邵力子恪守统一战线。苏联新闻报刊表示了忧虑，但都没有明确表示站在中国同志一边。莫斯科继续通过新疆—甘肃向重庆运送武器，尽管延安多次请求停止供应。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还缔结了一个贸易条约。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建议中共领导遵照国民党的指示，让

此处和下句参阅毛泽东1940年11月6日给周恩来的电报，引自同上第517页。

毛泽东1941年1月15日给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电报，引自同上第521页。

此段参阅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Cal. 1962年版，第136—140页；郭维仁：《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析》第四卷，1971年台北第1版第275—294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19—521页。关于皖南事变的因果关系，似乎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弄清。

新四军余部北移。季米特洛夫坚持要共产党严格把握他们的政治路线，并避免与蒋介石争斗。这意味着他坚持一种绥靖的、平息的立场。^①

延安感到失望。在领导人的圈子里，毛泽东对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作出了消极反应。他确认，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中共、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与国民党的破裂是蒋介石发动的，并将延续下去，这“对我们甚为有利”。三个月来，莫斯科的政策（原话是：“远方的政策”）与中共所想的不一致，并几经往复，尚未解决。人们必须悄悄地作反击的准备，以便在4个月或6个月后可以转入攻势。但在蒋宣布全面破裂之前，反攻必须暂缓进行。仅在这一点上，崔可夫延长时间的意见是对的。毛还说：“苏联如再接济重庆武器，甚为不好”，应考虑如何使其停止。^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当时出现的形势作了如下的切合实际的表述：“当时，中国共产党同联共（布）党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已十分明显，……前者为的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而后者为的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现实需要。”^③

当1月底蒋介石在河南发动了一次抗日攻势，并放出准备与中共和解的信号时，延安也发出了平和的声音，并认为内战可以

^① 此段参阅 1941年1月17日苏联副外长与邵力子的谈话；1941年1月14日崔可夫与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谈话；1941年1月20日和2月15日季米特洛夫给中共领导的电报；1941年1月25日潘友新与蒋介石的谈话，以上谈话转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374页及下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20页及下页。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374—376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19—522页。

此段参阅毛泽东1941年1月20日和1月29日致周恩来的电报，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375页及下页，以及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23页；194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1991年北京版第26—30页。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375、377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22页。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23页。

避免。^① 2月中，崔可夫被告知，现在是逼迫皖南事变后陷于守势的蒋介石作出让步的时期，而不是相反；现在是蒋介石受内外责难最甚之时，而共产党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中国舆论（原文为“群众”）的支持。^② 的确，在反日情绪高涨的中国舆论中，人们对重庆攻击新四军的愤慨是很显著的。同时，“百团大战”的后果之一就是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共产党人的抗日斗争比国民党更坚决。华盛顿方面也告诫蒋介石，不要拿与中共的统一战线来冒险。中国共产党人的威望上升了。但蒋介石不顾这些，于三月初断言：国民党与中共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三个月就可在军事上消灭共产党，即使在政治上尚不许可。^③

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缔结了一个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高度恭维。日本为的是要放手推行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扩展计划；苏联则要避免两线作战。该条约和共同宣言确保了莫斯科和东京在外蒙古和满洲国的各自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引起了中国国民政府的抗议。^④

毛泽东则显然从中受益。他在内部谈话中对此表示欢迎。他认为，这两个文件的签订，对苏联来说，彻底解除被日本攻击的危险；国民党投降日本和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危险也因此减小；英国和美国陷入很大的困境。当时，毛似乎对苏联确认日本在满

同上第524页。

^② 1941年2月1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引自（周恩来传）第491页，以及同上。

^③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26页。此段参阅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加州斯坦福1962年版第139页及下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24页及下页。

条约和共同宣言，见1941年4月14日《真理报》。此段参阅 Adam 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1968年伦敦版第308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0页及下页；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 P. 114 - 117

洲国的统治并没有表示反感。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削弱国民党政权：条约给蒋“一个沉重的打击”。^① 条约缔结后，共产党部队对日军的作战不如过去积极了。^② 即使在针对党员群众的宣传和公众舆论中，中共领导也维护中立条约，称它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伟大胜利”。它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增大了莫斯科在东方和西方的发言权。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没有受到限制。^③

苏联通过缔结中立条约获得了与日本的和平，但这与莫斯科不断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发出的与日本占领者进行持续斗争的号召发生了明显的矛盾。^④ 苏联要求编在苏联远东军之下的中共部队停派部队回满洲，因为这可能激怒日本。^⑤ 这些部队是由共产党的“抗日联军”残部所组成，他们是在 1940 年和 1941 年期间被日军击溃后逃到苏联的。^⑥ 抗联指挥官周保中对苏联的这一要求提出了抗议。^⑦ 信中提出，满洲的游击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部

^① 1941 年 4 月 17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379 页；1941 年 4 月 14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同上。

^② 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56 年华盛顿 / 伦敦版第 205 页。

此段参阅郭维仁：《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析》第四卷，1971 年台北第 1 版第 502 页及下页，第 547 - 549 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380 页；以及两篇的资料来源的提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献书籍中也指出了这一反差，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参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 530 页及下页。

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379 页。

^⑥ Steven I.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 - 1948)》，1987 年纽约版第 19 页及下页、103 页；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 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1993 年纽约版第 85 页；朱列夫：《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中共武装力量（20 - 40 年代）》，1983 年莫斯科版第 225 页。

^⑦ 此处和此段参阅 1941 年 5 月 10 日周保中给苏联代表王新林（化名）的信，转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第 381 页及下页。

分，苏联必须顾及到这一点，而不能仅考虑苏联自己的需要，中国部队的斗争“客观上就是保卫苏联”。周最后表示，他虽然同意暂不派主力部队回满洲，但要派遣小队到那里。

1941年5月崔可夫要求周恩来和董必武，配合国民党驻山西南部的部队从后方和侧翼向日本军队发动进攻，以便使日本难以发动对苏联的进攻。^①中共领导的反应是避而不回答。但从一个内部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在这方面的策略考虑是：“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我们只要注意“使国民党觉得我们正在打就好了”。^②

当崔可夫进一步向国民党提议，对所有不愿意合作的部队（这首先指的是共产党部队），予以“处罚”时，他引起了中国同志的强烈抗议。^③毛指示周恩来转告崔可夫，请他“不要随便乱说”，而应对国民党有正确的分析。他应看到，国民党并非真的要打日本，而是要打共产党。^④毛提出，中共将团结对敌，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予有计划的配合。毛指出，武汉失守后，红军与国民党部队不同，对日展开了

崔可夫：《在中国的使命—军事顾问札记》，1981年莫斯科版第146页及下页；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第2卷，1989年北京版第292页及下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3页及下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383页。

^② 1941年5月18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给彭德怀的电报，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4页和杨奎松：《中间地带》第356页。——并可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387页。但该书把这份电报的时间错误地移至1941年7月。

^③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4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387页。

此段参阅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指示，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4页；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387页。

有力的进攻（毛在这里暗示的可能是“百团大战”）^① 希望崔可夫不要相信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对日妥协”的宣传。^② 周恩来和董必武拒绝与崔可夫讨论共产党的军事计划。^③

如前提及，此时，中共领导对于莫斯科的关系有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说法：对于苏联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④

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中共领导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莫斯科的多变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呢？1939年春中共领导（至少在对外表态上）认同了斯大林关于国际关系的新估计，不是法西斯而是西方民主国家是苏联的最危险的敌人，并得出结论，英国是“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⑤ 莫斯科并以此放弃了第七次共产国际执委会大会决定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路线。诚然，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公开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毛依然固执地轻视“资本主义国家”和“法西斯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他说：“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或法国，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都是出自一个原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战争，那就是，为了瓜分世界和掠夺世界各国人民。”^⑥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号召所有外国党重新回到“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上来。延安对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指示（未注明日期），引自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关系史》第2卷第293页；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指示，日期为1941年5月，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383页。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指示，日期为“1941年5月”，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383页。

崔可夫：《在中国的使命-军事顾问札记》，1981年莫斯科版第144、147页。

^④ 1941年5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4页。

^⑤ 参阅杨奎松：《苏联因素和中共40年代对美政策》，载于《Chinese Historians》，No.1, vol.V (Spring 1992), P.19 以及有关资料来源。

^⑥ 此段可参阅《解放日报》1941年6月23日，引自 C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238; 《解放》第85期，1939年9月30日，引自 Sheng: < America's Lost Chance…… >, P.142.

此立即声明支持。但在表述上有所不同。莫斯科只提及苏联和德国之间的斗争，而中共领导则声称，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和援助苏联和中国的行动，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①毛泽东在一项内部指示中称，在新的条件下要坚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以此援助苏联，并联合英、美和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反对共同的敌人。^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共的这种提法不能使莫斯科满意。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则比过去更加强调苏联的利益，并以此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矛盾。^③

德国国防军入侵苏联后，莫斯科更加害怕面临两面作战的局面。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催促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日本应占领海参崴和西进，以便在冬季到来之前与德国国防军会合。^④松冈洋右曾就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向里宾特洛甫表示：在德苏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该条约立即失效。^⑤

看来，从 1941 年夏至 1943 年初期间，即斯大林格勒战役导致战争转折之前，斯大林曾 5 次请毛泽东把部队派到长城附近，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附近。目的是，如日本进攻苏联，这些

^① 1941 年 6 月 22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和号召书，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 383—385 页；1941 年 7 月 3 日斯大林演说，《真理报》1941 年 7 月 3 日 第 1 页；1941 年 7 月 12 日中共中央指示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卷，1991 年北京版第 164 页（重点线为作者所加）

^② 1941 年 6 月 23 日毛泽东指示，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第 385 页，见：《解放》第 131—132 期，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 532 页和 535 页。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 532 页及下页，535 页。

^④ 1941 年 7 月 1 日里宾特洛甫致松冈洋右的信，见：Adam B. Ulam: <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 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 - 1967) > . London 1968, P.323.

^⑤ 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全宗 7867，目录 1，案卷 275，第 266 页，引自阿卡杰耶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对苏政策（1934—1941）》载于《苏联—日本：纪念苏日建立外交关系 50 周年（1925—1975）》，莫斯科，1978 年第 38 页。

部队可牵制日军，从而减轻对苏军的压力。其中有两次请求提到了将以苏联现代武器装备这些部队的承诺。但毛对这些请求不是拒绝了，就是采取了拖延的政策。^①

1941年6月底，斯大林首次向毛提出上述请求，那是在他得知所谓大量日军向苏联边境调动的消息之后。^②他请中共领导进攻日本部队，干扰其后勤线，特别是切断至北平、张家口和包头的铁路线。^③此外，还要求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在山西南部发动进攻，以减轻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压力。^④显然，斯大林心里一直为日本进攻的念头所缠绕，以至于不相信苏联在东京的间谍发回的关于日本不会发动进攻的报告。^⑤

据苏联材料称，朱德向莫斯科报告说，如日本进攻苏联，八路军将以其拥有的全部力量投入抗击日本的斗争，给苏联以足够的支持。^⑥据说毛于7月3日也证实了这一允诺。虽然中共领导

李海文：《毛泽东与斯大林交往》，载于《瞭望》1992年第52期，第90-96页。李曾进入党的档案馆。他的陈述部分地为其他作者援引的档案材料所证实，参见随后的有关段落。这些陈述也可在1984年莫斯科出版的O.弗拉基米洛夫：《40-80年代的苏中关系》一书中第64-66页得到验证。

^② O. 弗拉基米洛夫、W. 亚桑采夫：《毛泽东政治传记摘编》，1973年东柏林版第63页及下页。虽然这是苏共中央副部长拉赫曼宁的反华宣传机构炮制的作品（弗拉基米洛夫是他的一个化名），但这里和以下的陈述显然是以档案材料为依据的，因此原则上可视为是可信的。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5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387页；弗拉基米洛夫、亚桑采夫：《毛泽东政治传记摘编》，1973年东柏林版第64页；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238, 以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387页。——9月初莫斯科再度要求延安，让八路军在日军进攻苏联的情况下展开行动，见同上第389页。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6页。——9月，东京最终决定不向西扩张，而是向南。参见Adam B. Ulam: <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67) >, London 1968, p.321 f. ;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6页。

^⑥ 此段参阅弗拉基米洛夫、亚桑采夫：《毛泽东政治传记摘编》，1973年东柏林版第64页。

拒绝莫斯科关于立即展开大规模进攻战的要求，但它下指示：制订一个破坏日本交通路线的计划，并开始相应的行动，以及在情报工作方面给苏联以支持。^① 中共领导在内部指示中也称：如日本进攻苏联，“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目前并没有这种进攻。^② 当7月中崔可夫询问中共准备以何种行动援助苏联时，他得到以下回答：^③ 八路军已开始破坏交通路线，但尚不能展开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因为它在部队数量和装备方面远不及敌人。它缺少子弹、机枪和大炮，以及炸药。因此，中共只能固守在敌人后方的根据地和进行广泛和持久的游击战，而不能“孤注一掷”。中共也拒绝了苏联关于八路军应向外蒙古边境推进，以便逐渐从苏联获得武器的建议，它指出：这太危险。^④

毛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需要用其部队对付当时正在加强的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以及日益加强的日本对这个地区的进攻。^⑤ 1941年夏，为集中力量巩固主要根据地，延安把部队从对日前线撤下，并避免对日军采取较大规模的战斗行动。不管苏联兄弟国家处于何种境地，毛绝不准备为了苏联的意志而牺牲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利益。^⑥

据苏联材料称，9月3日莫斯科再次让人询问延安，在日本

此段参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5页及有关材料来源的提示；杨奎松：《中间地带》第361页。

^② 1941年7月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叶剑英致彭德怀的电报、1941年7月6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5页及下页，以及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385页。

此处和以下4句参阅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536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第361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387页及下页。——据苏联材料称，中共领导没有满足苏联关于干扰铁路交通的要求。见弗拉基米洛夫、亚桑采夫：《毛泽东政治传记摘编》，1973年东柏林版第64页。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361页。

^⑤ C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 p.238. f.

^⑥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361页。

进攻苏联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将做些什么，以支持苏联。对此，毛泽东以“含混不清的和支吾其词的”声明来对应，并提出了难以满足的要求。当苏联谈判代表坚持要求给一个明确的回答时，毛指责他“缺乏辩证思想”，并中断了谈话。^①

莫斯科对中国同志的这种拖延态度不满。10月7日季米特洛夫发出了一个包含15个严厉问题的单子，询问中国为牵制日本和防止使苏联陷入两面作战的局面，将计划与国民党一起采取什么军事措施。电报的语气无疑是要让人意识到，这关系到中国同志与苏联的团结问题。^②

据称，中共领导对此没有预料到。为安抚莫斯科，中共领导对国民党采取了较为妥协的态度。在出席参政会问题上，它放弃了皖南事变后提出的、在德苏战争爆发后已降低了的先决条件，它派员出席了参政会。^③

然而，莫斯科对延安的期望却更多，要延安与国民党一起对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战略攻势，以牵制日军，阻止日本进攻苏联。^④但是，只要日本还没有真正进攻苏联，中共领导是不准备这样做的。它坚持迄今为止的路线，继续开展游击战，以“节省与保持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⑤

季米特洛夫的“15个问题”在中共领导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王明因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而重新占据了优势。他扮演了苏联

^① 此段参阅弗拉基米洛夫、亚桑采夫：《毛泽东政治传记摘编》，1973年东柏林版第64页。

^② 1941年10月7日季米特洛夫致中国中央的电报，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第537页和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的第389页及下页复述了电报的内容。——显然，电报的全文至今没有公开。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第537页。

同上，第538页。——很可能这些要求包含在10月7日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单子里，虽然杨云若和杨奎松没有明确指出。

^⑤ 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的指示，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第538页。

立场的代言人，并在 10 月 8 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这样的观点：党的政策过左，并妨碍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它违反了“国际主义原则”，没有坚定地、足够地维护苏联的利益；今天“最主要的是共同打日本”，为此应团结所有人民阶层，包括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必须维护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关系；争取“新民主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应退居后位，它是最终目标。主明以此明白无误地反对毛所代表的基本原则立场。^①

毛担心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和王明的登台亮相会严重损害他的威信。有些高级领导人，据说其中有王稼祥、陈云、任弼时和康生，很可能因来自莫斯科的干预而变得糊涂起来。许多党内同志习惯于不加分析地（毛称之为教条主义地）看待斯大林和苏联。另一方面，“皖南事变”后，要求与重庆合作的呼声已声名狼藉。总之，在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干预后，如中国历史学家所说，出现了对毛意味着“潜在危险”的局面。毛则日益坚定地主张“独立（独立于莫斯科——作者注）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②

至此，毛泽东认为应对王明进行总清算。在 10 月 8 日书记处会议上，毛指责王明违反党的总路线，其中包括对国民党斗争不坚决，支持游击战路线不坚定，以及滥用职权等。^③ 虽然详情

王明在 1941 年 10 月 8 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第 541 页，以及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的第 390 页（这里把王明的发言标明为 10 月 18 日，这很可能是错误的）；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362 页；王明：《中共 50 年和毛泽东的背叛》，1981 年东柏林版第 48 页（王明标注的部分日期是不准确的）。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第 539 页。——此段参阅同上 537—542 页以及王明：《中共 50 年和毛泽东的背叛》，1981 年东柏林版第 49 页。杨云若和杨奎松的论述时而出现不清晰，因为有些论述显然涉及不同的时间，并建立在不同说服力的基础之上。有一处是不合乎逻辑的，因为从所引的一些日期之间看不出因果关系，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第 541 页，注 3 和注 4 以及第 542 页，注 1。

同上，第 540 页。

未公开，但毛达到了击败王明的目的。书记处会议的与会者“几乎一致”^①批判王明的立场，并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要求王明在会上说清楚他“在武汉六中全会以前的错误及目前政治问题的立场”。^②看来，王明以失败结束了他反对毛的最后一次斗争，“毛泽东的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③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的判断，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关系由此开始改变。在过去，这种关系是由“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决定的。^④实际上，这是一个早已开始的、而现在达到其顶点的过程。

书记处会议之后，王明声称有病，并且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从此，他的健康情况开始严重恶化，以致卧床达 4 年之久。^⑤

关于中共对季米特洛夫“15 个问题”的回答，一点也没有透露。实际上，中共依然坚持其“开展分散的游击战”、“节省与保持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的路线。^⑥

1941 年 10 月底，中共领导召开了有 10 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代表出席的“反法西斯代表大会”。^⑦毛号召建立以延安为中

在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第 542 页中是如此表述的，但在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的第 390 页中则说是“一致”。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第 542 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的第 390 页。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第 542 页。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362 页。

此段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的第 390 页；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第 542 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362 页；王明：《中共 50 年和毛泽东的背叛》，1981 年东柏林版第 49 - 65 页；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1973 年莫斯科版第 213 - 215 页；王明之子对莫斯科汉学家康斯坦丁·谢非列夫的谈话，谢向作者的转述。

^⑥ 1941 年 11 月 7 日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357 页。

^⑦ 此段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的第 390 页及下页。

心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没有迹象表明，这项倡议是与共产国际商定的。如果未经商定，这一定会被莫斯科视为中国同志的一种不可允许的独断专行。

显然，在 1941 年，中共领导继续贯彻其既定路线——对日本部队采取防御战略，保卫共产党的边区。此时，他们并没有考虑莫斯科对日本进犯苏联的担心进一步加大了，因为当时苏军在军事上失利、日本取得了军事成功，并加紧派军队至满洲。1942 年 2 月底，共产国际的一项决议不指名地批评了中共，说它首要关注的是对国民党的斗争，而不是在军事上针对日本，从而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这是“民族主义”的表现。^①

据苏联材料称，1941 年至 1942 年，中共部队对日战斗的活动不断减少，而这据说是来自毛泽东提出的所谓策略考虑：“较好的是，我们节省力量，打垮国民党，取得政权，并借助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力量，从日本占领者手中解放中国……”。^②

在这个时期，在新疆，莫斯科和延安之间有过一次配合，但也许又是一次分歧。迹象表明，为阻止迄今为止亲苏的新疆督办盛世才使新疆脱离苏联影响和投靠重庆国民党政府，1942 年夏，开始秘密做颠覆盛世才的准备。但是，以谋杀盛的胞弟盛世骐开始的政变失败了。88 名涉嫌人员后来被处决，其中有毛泽东之弟毛泽民。不顾苏联对盛世才的威胁，蒋介石于 1942 年夏宣布新疆回归国民党政府管辖。年末，盛驱逐了苏联顾问和军事人员。最后一批苏联部队于 1943 年 10 月撤离新疆。估计，盛世才改换门庭是因为 1942 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失利，他认为以后将

^① 1942 年 2 月 27 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决议，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的第 393 页及下页。

^② 引自弗拉基米洛夫、亚桑采夫：《毛泽东政治传记摘编》，1973 年东柏林版第 65 页。（没有注明日期）

难以从苏联获得更多的援助。^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资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冲突的扩大是因为曾在莫斯科留学并成为共产党人的盛世才胞弟，反对其兄长“反苏反共的阴谋活动”（这显然是指转而投靠重庆），此时，盛世才派人杀害了其胞弟。^② 鉴于盛世才想利用这一谋杀事件反对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这些中共党员试图通过苏联返回。莫斯科曾表示赞同，但盛世才阻止他们出境。^③ 苏联驻乌鲁木齐的军事顾问没有努力给被捕的中共党员提供帮助，没有向延安通报这些中共党员处于绝境的消息。据称，莫斯科利用这一事件讨好重庆，试图让国民党相信，苏联在 1934 年至 1941 年期间一直劝说盛世才效忠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接受了苏联的友好表示，但同时决定封锁莫斯科在新疆的活动，并开始在盛世才的帮助下把新疆控制到国民党政府的手中。就这样，自 1943 年春新疆变成了“反共堡垒”。自那以后，新疆作为莫斯科和中共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联系走廊，被严重受阻。^④

盛世才称，1937 年他曾有意加入中共，中共领导对此也原则上同意，但斯大林阻止他加入中共，并委婉地施加压力，动员他加入苏共。如果这是属实，这就是莫斯科与中共在新疆方面竟

① 此段参阅 Allen S. Whiting and General Sheng Shi - ts'ai: < Sinkiang: Pawn or Pivot >. East Lansing, Mich. 1958; O. Edmund Clubb: < China & Russia. The 'Great Game' >. New York/London 1971 p. 323 - 329; Han - jung Ziemann: 《新疆 东突厥斯坦 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1917 - 1945》, 1984 年波鸿版第 218 页及下页和全书；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的第 400 页。

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在西方的参考文献中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参见 Whiting/Sheng Shi - ts'ai: < Sinkiang: Pawn or Pivot >. East Lansing, Mich. 1958, p. 85 f. ; Clubb: < China & Russia > York/London 1971 p. 323.

同上。

此段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的第 394 - 399 页的有关各处，第 401 页。

争的一个早期的例子。^①

1942年5月苏联国防部请求中共领导，在日本进攻苏联的情况下，派部队到南满，策应苏军对日作战。延安命令彭德怀和聂荣臻研究相应的可能性。^②

根据弗拉索夫从延安发至莫斯科的电报，季米特洛夫于6月中致函毛泽东，劝中共领导“采取一切措施来尽量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加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在军事上比中共强，因此必须由它来领导。季米特洛夫指责中共在重庆的代表，首先是周恩来，说他们因考虑不周的行为给蒋介石以机会，在国民党中制造反共的气氛。他要求毛给其在重庆的代表下指示，要他们严格执行旨在改善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的政策。^③

据弗拉索夫材料称，毛在1943年夏秋对他承认，毛和过去一样不准备对日作战，除非苏日间爆发战争，但这也只能是“小的军事行动”，因为他要节省自己的实力。莫斯科所有关于“以某种方式阻挠日本发动对苏战争”的请求都毫无结果。^④但毛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共产党管辖区的封锁，盛世才归顺重庆后延安—新疆的供应线被切断了。延安不得不首先动用其部队应付这种危险。对日本军队展开强劲攻势几乎等于自杀。在这方面，毛的基本考虑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战斗首先应由得到加强的重庆军队来承担。比重庆部队差的红军应加以节省和保持，以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投入即将爆发的反对国

^① Whiting/Sheng Shi - ts'ai: < Sinkiang: Pawn or Pivot > . East Lansing, Mich. 1958, p.201, 205 f.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的第 395 页。

^③ 1942年6月15日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信，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的第 396 页。

此段参阅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年》，1976年东柏林版第 63、66、69、111、117页。

民党的最后的革命斗争。^①

至于中共是否在此考虑下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反对国民党？这一点却得不到证实。然而，蒋介石以及弗拉索夫的《日记》却提出了这一看法。蒋介石称^②，延安在 1943 年和 1944 年向日本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进军和作战计划，共产党人试图以此引诱日本军队深入到中国的西南部分，从而使他们自己不受国民党有关军队的干扰，把他们的陕西控制区向西南地区扩展。蒋还说，共产党人甚至准备与日本人合作，围攻国民党政府在四川和贵州的主要根据地。这后一点是不可能的。弗拉索夫更加含糊地说，他确信，他在 1945 年夏得知，“长久以来”日本驻南京司令部与共产党领导之间通过毛泽东的一个代理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③

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中共领导对此表示欢迎，并松了一口气，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共“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决议赋予的义务”下解放出来。^④ 政治局的一项决议说，党曾从共产国际获得许多帮助。尽管如此，党长久以来已有能力“独立地确定自己的政治路线……”。^⑤ 毛说，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例子。^⑥ 从现在开始，各国共产党将更加

此段参阅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 p.240 f.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 年波恩版第 139 页。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 年》，1976 年东柏林版第 750-752 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的决议，1943 年 5 月 27 日《解放日报》，引自库库什金：《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1943）》，收于《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 年，第 377 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没有注明日期，引自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 p.247 f.

⑥ 此处和下句阅毛泽东 1943 年 5 月 26 日报告，见《解放日报》1943 年 5 月 28 日，引自 Schram: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 - tung > , New York/London 1969, p.422；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的第 403 页及下页。

“民族化”；许久以来，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走上这条道路。

这些讲话中包含的自信心是一目了然的。据说，在毛宣布共产国际解散决议的政治局会议上，洋溢着一种“近乎节日的气氛”；毛自己也毫不掩饰其“胜利的喜悦”。^①对他来说，共产国际的解散明确无误地意味着，他在党内领导集团中的“国际主义”反对者再也不能利用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指示向他发起攻击了。另一方面，他将继续依附于苏联，并希望比过去从莫斯科（以及华盛顿）获得更多的这样的支持，阻止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前攻打中共。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战胜希特勒已可预见，从长远观点看，莫斯科将重新在中国和东亚起较强的作用。^②

同过去一样，莫斯科努力按要求帮助中国同志。1943年7月，当国民党大举由南向共产党“特区”进犯时，苏联按照延安的请求，对蒋介石进行了干预，明确提出：苏联的军事援助只是为了抗日，而不是为了用于同中共打内战的。^③

1943年6月8日共产国际解散。后来，在1945年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并不很令人信服地）讲到共产国际对中国有“极大功劳”，并恭维莫斯科说，自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就是“总司令”，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共，都听它的。^④

^①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年》，1976年东柏林版第 181-183页。

此段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的第 401-406页；C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247-249。

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的第 410页；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年》，1976年东柏林版第 200-205页。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的第 424页。

第十节 中共外交政策的开始： 战争结束时与美国的调情

在同国民党争斗和战胜日本方面，中共领导不仅谋求苏联的帮助，而且也对华盛顿展开积极的活动。可以说，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他自己的外交政策。

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延安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框架内利用美国的某些努力，这种努力在 1944 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其原因就在于：日本发动春季攻势造成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之后，共产党人期望华盛顿因此而对较高级别的军事合作感兴趣，——犹如在希腊发生的那样：英国开始从支持希腊流亡政府转而支持希腊游击队。机会比较有利的是，7 月底，尽管蒋介石最初表示反对，第一个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来到延安，一个月后又来了第二个观察组，他们同中共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和朱德进行了谈话。考察组的任务是了解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并研究以何种方法促使他们加强作战的努力。美国的访问开始了延安与华盛顿之间的内容丰富的调情。^①

鉴于这种新的情况，中共中央于 1944 年 8 月 18 日给所有与外国进行联系的干部发出了一个指示。指示中说，像“迪克西使

此段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的第 417 页；杨奎松：《苏联因素与中共 40 年代对美政策》，载于《中国历史》第 1 期（1992 年春），第 21 页；Sheng: < America's Lost Chance >, p. 152；芭芭拉·图赫曼：《沙与风 - 美国和中国 1911 - 1945》，斯图加特，1973 年，第 487 页；Baghy: <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 p. 112 ff.；Hunt: < The Genesis…… > p. 154 f.——1936 年以来中共努力通过外国来访，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的有利形象，关于这些可见的和有成效的努力可参阅同上第 151 页及下页。

团”这样的来访不能当作普通事情来对待，而应视为“我们的统一战线在国际领域的展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①这也意味着“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实际接触的开始”。尽管如此，新的外交还具有“半独立性”，因为国民党政府被中国人（包括中共）和同盟国视为中央政府，国民党也不承认中共的独立外交。然而，“国际统战”政策，如同以前 8 年中的“国内统战”政策一样，将有助于中共的进一步加强，并增强革命胜利的前景。在这方面，应把“国内统战”的策略原则（与次要敌人结成策略的和暂时的同盟，以反对主要敌人——作者注）运用到“国际统战”中。迄今为止与美国的合作可逐步过渡到“对敌斗争中的合作和援助”。——这里既指日本（它在新闻用语中是惟一的敌人），也指国民党（出于可理解的原因，该指示也谨慎地暗示它）。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也可能在文化上，以后甚至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合作。在迎接迪克西使团的欢迎会上，毛问使团成员，国务院是否能在延安建立领事馆。^②

如 8 月 18 日指示所反映的那样，中共领导对迪克西使团寄予很大的希望。文件强调这是共产党中国的外交的开始，并期望“同盟国”（首先是指美国）在共产党统治区建立“外交机构”，为反对日本的共同斗争向这个地区派遣部队，以“武器、弹药、物资、药品，以及在技术方面”向红军提供帮助。中共将允许这些国家在该地区建立新闻代表处，向那里派遣牧师和传教士，进

^① 1944 年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2 年北京出版，第 14 卷第 314 - 318 页。本段中的有关引文见第 314 页及下页。——也可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的第 417 页，以及不很准确的俄语译文，见《远东问题》1972 内地 1 期第 185 - 187 页。——该指示发至各中央局，并转达到“解放区”各党委，同上，第 185 页。

^② 1944 年 7 月 26 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见：Joseph W. Escherick: <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 . New York 1974, p. 290.

行宗教活动，为此，将归还教堂和其他建筑。欢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提供医药器材和金钱的救济，欢迎国际投资和技术合作。

上述指示还包含了一些策略性提示，为赢得同情和达到既定目标应如何对待美国的来访者。举一个实例：

凡我所能而且愿意使外人知道和参加的事，可由我主动的有计划的加以布置，即使是我们的要求，我们也可使其自动的先向我们提出，例如军火援助，国民党天天向他们噪舌，要这样那样，我们则暂不提起，反而引起他们的尊敬，向我们先提，……。有关国家机密及党内秘密者应拒绝答复和供给，其不便答复者应避而不谈，或设法推开。^②

在延安与美国人进行谈话的共产党人，把国民党说成是腐败的、独裁的、在军事上也是无能的。毛泽东说，蒋介石“原则上是一个罪犯”，并问道，华盛顿是否真的要继续承认和支持不为人民所拥护的、无用的国民党政府？^③

中共领导人表示愿成为对日斗争中的优秀的中国伙伴，恳请迪克西使团的成员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要求美国支持抗日，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帮助重建中国。朱德总司令还建议，让他的一部分部队由美国来指挥。毛声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互符合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我们必须合作，并必须得到美国的

参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卷，1992 年北京出版，第 316 页及下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卷，第 317 页及下页。

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见：Joseph W. Esherick: < Lost Chance in China > . p.301 f.

援助”。^①毛以谨慎的语句劝说华盛顿向“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抗日力量提供武器，并致力于在中国登陆。^②毛还让人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依附于莫斯科，现在和战后都很难从自身有困难的苏联得到援助。^③

在延安与美国人进行谈话的中国人力图让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实际上不存在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这同样也适用于莫斯科在延安的苏联联络员（美国成员之一约翰·谢伟思结识了弗拉索夫和阿洛夫等三人）。^④他们向美国人自我介绍时只用了中文名字，并不真实地说，他们发出的所有消息都是通过重庆，并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中国共产党人还抱怨说，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少地知道苏联“想干什么”。就这样，美国人错误地认为：自 1942 年 11 月苏联飞机没有再来过延安，苏联联络员几乎不会中文，不是中国通，也没有被中国领导视为重要的人物。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否认“与苏联政府有任何关系”（这从形式上说是对的，因为与莫斯科的联系是在党的层次上）。但是，说莫斯科和延安曾商定，共同欺骗华盛顿，隐瞒中苏共产党人之间的真实合作情况，这一点并不能得到证实。

^① 1944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引自：Joseph W. Esherick: < Lost Chance in China > . p.307。

^② 1944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引自：Joseph W. Esherick: < Lost Chance in China > . p.301, 304。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的第 418 页，以及 417 页及下页；图赫曼：《沙与风 - 美国和中国 1911 - 1945》，斯图加特，1973 年，第 486 页及下页，第 495 页；Tucker: < Pattern in the Dust.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 - 1950) > . New York 1983, p.44; Reardon - Anderson: < Ya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36 - 50; Bagby: <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 . p. 104 - 122。

关于苏联联络员的情况详见本章第六节。

此段参阅 1945 年 3 月 23 日约翰·谢伟思的报告，见 Esherick: < Lost Chance in China > , p.350 - 353。参阅尤·弗拉索夫：《关于父亲的故事》，载于《远东问题》1990 年第 6 期第 125 页；弗拉索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1976 年东柏林版第 253 页。

苏联在延安的联系小组负责人彼得·弗拉索夫，对迪克西使团的访问作了讽刺性的描述：

美国人不同意给国民解放战争赋予革命的性质，但这却没有引起毛的反感。重要的是要借助他们的帮助集聚力量，排挤老蒋。为此，人们以重庆制度的腐败和必然垮台来吓唬白宫，并从经济角度说明这一制度的不可靠性。毛就像一个商人，努力证明他的商品是最好的。^①

为使美国客人得到一个良好的印象，中共领导所作的努力是有成效的。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为延安的经历所欢欣鼓舞。他们在发回到华盛顿的报告中称赞共产党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突出他们的抗日军事成绩，以及领导人的能干和正直。而这些品质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少见的。观察家们建议，以较好的武器支持共产党人。他们的报告在部分美国公众舆论和政府中引起了对延安政权的一定的同情。而国民党则以极大的不信任看待这些报告。^②

美国来访者告诉中国领导人，在华盛顿，有人考虑在建立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政府方面提供帮助。共产党领导由此得到了鼓舞，并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国驻华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发起攻势。周恩来在 1944 年 9 月给史迪威的一封信中，批评国民党对日持“失败主义”突出共产党的军事成绩，指责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1973 年莫斯科版第 421 页及下页。——与其他能得到的有关资料联系起来看，弗拉基米洛夫的评论是可信的。这也适用于他对当时中共领导与美国关系的大部分评论。见同上第 306 - 478 页的有关段落。

^② 此段参阅 Tien-fong Cheng: < A History of Sino - Russian Relations > . Washington, D. C. 1957, p. 252; Henry Wei: < China and Soviet Russia > . New York 1956, p. 170; 图赫曼：《沙与风 - 美国和中国 1911 - 1945》，斯图加特，1973 年，第 485 - 488 页。

施加压力，这在目前有可能扩大为内战。最后，周恩来请求至少把援助中国的弹药和物资的一半提供给共产党。^①

同时，中共领导向史迪威保证，他们的军队愿意在他的指挥下，而不是在蒋介石指定的某个司令的指挥下作战。——这一提议，早在 1942 年周恩来就已向史迪威提出。^② 彭德怀于 10 月宣称，如果美军决定在上海与山东之间登陆，他们将会得到 100 万正规军和至少相同数量的民兵的帮助。^③ 11 月，周恩来邀请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访问延安。同一时期，一位美国记者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谈话后得出的印象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外交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将尽一切努力，以赢得美国的友谊。^④

1944 年 11 月 7 日，第一位华盛顿高级代表赫尔利来到延安。据说，他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促使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并在美国的援助下战胜日本。他向共产党领导提出一个 5 点计划，其中包括一项延安不可能接受的要求：所有武装力量由国民党政府领导。共产党领导向好心但天真的赫尔利提出了一个包含建立联合政府的 5 点反建议，一项供一起签名的文件草案。延安完全知道，文件中的一些内容蒋介石是不会接受的。正如毛泽东高兴地在内部报告中所说，让赫尔利一起签名，从而诱使美国人（原用语为“盟国”）中计，他们因此而不得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他

周恩来给斯蒂威尔的信，它是根据 1944 年 9 月 22 日的中央会议写的，见《周恩来年谱》第一卷第 583 页。

^② Chin - tung Liang: < 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 1942 - 1944 > : The Full Story, Asia in the Modern World Series, No.12, St. John's University 1972, p.235。

彭德怀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怀特的谈话，见 Theodore H. White: <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 New York, 1979, p.189。——显然，彭提出军队数量有些夸大。毛泽东在 1944 年 12 月 11 日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说，正规拥有的兵力为 65 万，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储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8，案卷 10，第 9 页。

^④ Theodore H. White, in < Life >, 18.12.1944. 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的第 419 页。

们努力让人们承诺谁也不愿做的事。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曾以为赫尔利是非常有经验和判断能力的，岂能被共产党所欺骗；但情况却非如此。国民党政府拒绝了赫尔利转交的 5 点计划。它提出了一个 3 点计划的建议，其中包含了把所有共产党部队置于重庆政府之下的要求。毛与赫尔利的委托人谈话时，驳斥了这个计划，并以粗野的咒骂回赠了蒋介石。12 月 8 日，周恩来威胁赫尔利，说延安将公布有赫尔利一起签字的 5 点协定草案。当时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的赫尔利终于感到受骗了，并愤怒地咒骂不在场的周“混账”。赫尔利的调停尝试失败了。^①11 月中，罗斯福向蒋介石表示，希望在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能实行军事合作，并称这也是苏联领导的愿望。^②12 月初，毛再次向一位美国军官表示了对美军登陆的兴趣，提出在此情况下可以得到的军事支持，并保证共产党军队将“无限制和无条件地由美国将军指挥”。^③

1944 年 10 月初，美国方面曾首次向延安提出军事合作的建议，并联系到美国部队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共产党领导参与了计划的制订。^④12 月下半月，在赫尔利大使不知道的情况下，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和 OSS（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中国局向共产党领导表示，要提供武器和技术帮助，以用于在日本后方进行破坏活动（由美国技术人员与共产党部队共同合作）。另一项建议是：美国空降部队投入山东沿海，共产党部队给予支

此段参阅 Bagby: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 p.157 - 163;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51 - 57;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1976 年东柏林版第 474 - 476 页，特别是第 474 页。

此段参阅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的第 417 页及下页；图赫曼：《沙与风 - 美国和中国 1911 - 1945》，斯图加特，1973 年，第 486 及下页，第 495 页；Tucker: <Pattern in the Dust >, p.44。

^③ 1944 年 12 月 10 日毛泽东与 Barret 谈话，见：FRUS 1944, vol.VI.China, Washington, D.C.1967, p.731 转引自 Seng: <America's Lost Chance >, p.154。

^④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61。

持，直至美国部队从海上登陆。魏德迈在作出上述提议时没有顾及赫尔利要求的、在与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时应遵循的先决条件，即必须与重庆取得政治上的一致。^①

共产党领导高兴地接受了美国的建议。他们知道如何估价美军投入其战区将带来的好处，他们将获得武器和弹药。他们也认识到在赫尔利与魏德迈和 OSS 之间缺乏协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可供利用的可能性。为充分利用这种机会，他们不惜承担风险，采取了行动。1945 年 1 月 9 日延安在一份发给魏德迈的电报中建议，罗斯福似应在华盛顿接待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中国的一个一流的政党的领袖”。周还请求，将这份电报只发给魏德迈，而不给赫尔利看，因为他不相信赫尔利会对此严守秘密。在第二天发出的第二份电报中，周还向魏德迈提出证据，说明国民党领导就“出卖美国在华利益”在与日本进行交易。^②

看来，魏德迈没有理会周的要求，并把电报转给了赫尔利。此外，当赫尔利于 1 月 13 日从蒋介石那里得知，魏德迈背着他与延安商谈军事合作，而“大发雷霆”。自被任命为大使时就已开始的，他对共产党的反感大大增加了。他在 1945 年 1 月 14 日给华盛顿的抗议中说，共产党人之所以在与国民党合作方面持如此难以接受的态度，是因为人们答应给他们以武器援助，从而使延安认为他们的重要谈判目的已经达到，并赢得了自信心。通过魏德迈的建议，共产党人得到了他们所要的一切：承认、物质支援和破坏国民党政府。赫尔利向罗斯福建议，必要时可一起接见

^① 同上，第 61 - 63 页；Bagby: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p.163 - 165, 168 f. . 182.

^② 此段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p.63 f.; Bagby: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p.165.—— 另参阅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1976 年东柏林版第 497 - 499 页。

蒋和毛，条件是他们双方先实现统一。^①

华盛顿认为赫尔利正确，并表扬了他。对毛和周访问的建议显然没有回答。两位向延安提出合作建议的军官被调动了职务。魏德迈被迫向其参谋部指示，给第三者的援助需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这同样也适用于谈判。^②

共产党领导绕过赫尔利，利用白宫的企图失败了。显然，毛泽东在考虑，他是否应把对美国以及对国民党的外交努力冻结一段时期。莫斯科在延安的联络员彼得·弗拉索夫此时观察到，中共领导已看出，“与美国谈判获得成果的机会逐步消失”。^③ 1946年1月底，毛宣布，准备应赫尔利的要求，在中断了6周之后派周恩来赴重庆参加谈判。2月中，谈判无结果告终。^④

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促使共产党领导自1944年底重新考虑其对美关系。其一是，1944年底苏联代表对中共与美国之间不断发展的密切关系表示了莫斯科的忧虑。其次是，由于在长江以南取得的军事成果，以及日益呈现出来的东欧苏维埃化，重新加强了中共领导的革命雄心。因此，毛泽东于1944年12月宣布了他的决心，在战争期间就要在中国取得政权。^⑤

从此，延安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得更加自信。1944年底，共

此段参阅 Bagby: <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p.164 - 166;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64; Tucker: < Pattern in the Dust > . p.44 f. ; Theodore H. White: <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 . New York . 1979, p.190; Furiya: < Chiang Kaishek > . p.64。

② Bagby: <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p.166;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64。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1976 年东柏林版第 497 页。

④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65; Bagby: <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p.166 ;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1976 年东柏林版第 497 页及下页，509 页。

⑤ 此段参阅杨奎松:《苏联因素与中共 40 年代对美政策》，载于《中国历史》第 1 期(1992 年春)，第 21 页;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66。

产党领导在内部讨论与美军合作问题时放弃了过去的观点，提出了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新条件：美国部队“必须服从中国的政策法令”等，要求美国向共产党提供武器，装备 20 个旅。^① 一个月后，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条路线。他拒绝了赫尔利派一位美军军官来担任共产党军队司令的建议，说这意味着红军受外国人指挥，并使它成为殖民地部队。^② 另一方面，延安此时向重庆的美国人提出所谓国民党与日本秘密协调的证据，并徒劳地提出 2 千万美元的援助要求。2 月中，赫尔利和魏德迈离开重庆去华盛顿。^③ 在他们不在期间，共产党人既没有被美国使馆，也没有被美军司令部所接见。

看来，延安日益看到继续乞求美国援助已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是，2 月初斯大林向毛泽东通报了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并指出，苏联在战胜德国之后将把其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东亚。实际上，自 1944 年 6 月西方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转变已开始显露。^④ 此外，上面已提到的 1944 年底共产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取得的战果在新的一年里又得到了扩大。这两点似乎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的自信心，并估计美国 and 国民党将“同我们实行政治妥协”。出于上述因素，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立场被进一步强调起来，这明显地反映在 1945 年 3 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要求划清苏联为一方与美、英等西方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根本区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与苏联结成联盟视为头等优先

① 《周恩来年谱》第 1 卷，第 594 页。

② 1945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的电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三卷，1986 年北京，第 789 页，援助 Sheng: < America's Lost Change > . P.154。

此处和下句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66。

此处和下句参阅 1945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引自 Sheng: < America's Lost Chance > . p.155。

考虑的对外政策问题。^①显然，在这个时期，党领导逐步地停止与华盛顿的调情，而主张开展武装斗争。^②

3月，中共领导已看到继续以原来的方式与美国周旋已无多大希望。3月中，彼得·弗拉索夫观察到，“自中共领导感到他们将不可能从美国得到武器之后，与美国结盟的意图显然被打破”。在延安，“前一段时期曾出现的乐观情绪低落了”。虽然谈判的大门还开着，但同时又要让美国人知道：共产党中国不是孤立的，它还有一个苏联的盟友。^③

但是，当时情况并不是很明朗。因为毛泽东并没有顾及上述原因，而原则上继续本着“统一战线”的策略精神，对外执行其对美友好的路线。^④他在上述中央会议上说，中共必须聪明地、谨慎地力图与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妥协。^⑤在这同一时间，毛向一位美国外交官宣传说，中国和美国可“在经济上互补”，而不互相竞争；美国不仅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惟一完全有能力参与的国家”。^⑥

关于军事合作问题也重新拿到桌面上来讨论了。3月底，共产党新闻社宣称，延安的300万正规军和民兵会一下子被装备起来，占领部分沿海，直至美国人登陆；“盟国的丰富资源与我们

^①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次会议上的讲话，引自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and the CCP'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in: *Chinese Historians*, No.1, Vol.V (Spring 1992), P.21

此段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66 f., 69。

此段参阅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1976 年东柏林版第 561 页及下页。

^④ Reardon - Anderson 也是这么认为的，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64

^⑤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次会议上的讲话，引自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and the CCP'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in: *Chinese Historians*, No.1, Vol.V (Spring 1992), P.21

^⑥ 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引自：Joseph W. Esherick: <Lost Chance in China> . p.373。

无限的人力优势相结合就意味着胜利”。^① 4月1日，毛对上述美国外交官称，中共将继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方法”与华盛顿合作，不管是否能得到一枪一弹。^② 中共将继续寻求“与美国的友好和理解”，因为这对中国战后时期的建设也是需要的。毛再次提出曾提过的意愿，如果美军在中国登陆，它可以指望得到红军的坚定不移的支持。4月1日对美的这一友好表示也是已知的最后一次。

随后的一天，赫尔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今后将只支持国民党，而与“各武装政党（明显是指共产党）以及在中国统一道路上起障碍作用的军阀保持距离。”^③ 延安彻底失败了，并认为美国的援助永远无望了。^④ 中共领导在内部评估时，认为赫尔利的声明是“对中国以及外国共产党立场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打击”。毛在很小的范围内对“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特别是对共产党执行的新路线”感到很愤慨。共产党领导最初想发表一个尖锐的公开的反声明，但后来没有这么做。在其公开报刊的最初反应是宣称，他们将给“我们的盟友……以各种可能的帮助，只要他们希望，并在抗日的前提下”。^⑤

毛泽东在3月和4月初精心安排与美国的谈判显然有这样一原因，即当时苏联是否或何时能参与对日战争还不明朗。延安

^①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0日，引自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p.88。

此处和以下两句参阅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 1945年4月1日谈话，均引自：Joseph W. Esherick: <Lost Chance in China> . p.383。

^③ Bagby: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p.176;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86; Seng: <America's Lost Chance> . p.156。—— 赫尔利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在报纸上发表的标题是“U.S.Bans Arms Aid to Reds in China”，见：Bagby: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p.156。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年》，1976年东柏林版第583页及下页。

^⑤ 《新华日报》1945年4月5日，引自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86。

估价，只有当苏联参战了，中共才能开始进行对国民党的内战，并希望得到苏联军队的支持。只要这一点不明朗，人们是不能冒犯华盛顿和重庆的。^① 4月5日，苏联发出了它将朝着延安希望的方向发展的信号。它提前根据“情况已发生变化”的条款，宣布废除1941年4月13日缔结的苏日中立条约，并含蓄地指责日本在此期间与德国结盟，支持德国对苏作战，并同时与美、英作战，而它们是苏联的盟国。^② 据斯大林驻延安联系人的记载，这使延安“兴高采烈”。^③ 据说，毛泽东“激动”了一整天；人们为苏联和斯大林唱颂歌；从一般的党员直至最高领导干部自然地认为，苏联不仅将粉碎在满洲的日本军队，将其武器交给中共部队，而且要为中国同志解放内蒙；毛泽东估计，苏联将占领大片土地，从而将使现在的特区变成一个广大的地区。在延安，人们希望苏联很快加入抗日战争，并开始做广泛的准备，以便在军事上与苏军合作，收回满洲。^④

显然，共产党人避免在公众舆论中发表对形势的这种估计。直至5月中，他们在报刊上一直对盟国表示忍让，甚至友好。当罗斯福在苏日条约废除后的一个星期去世时，延安对此表示极大的同情。中共领导对罗斯福的接班人杜鲁门表示：他们对他“期望很多”，并“信任”他。这可能表明，延安在苏日中立条约宣布废除后出现的欢欣鼓舞热潮很快又转向了冷静，甚至怀疑莫斯

同上，第74页。

马佐罗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日关系 1941-1945》，收于《苏联-日本：纪念苏日建交50周年（1925-1975）》，1978年莫斯科出版，第62页；Wei：<China and Soviet Russia>，p.174。

此处即以下4句参阅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年》，1976年东柏林版第591页及下页。——约翰·谢伟思在1945年3月14日的报告中说，中共对苏联的合作意愿只作了谨慎的评价，见Esherick：<Lost Chance in China>，p.345-350。

此处和下句参阅毛泽东批转的1945年4月12日中共晋察冀分局的指示，引自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的第422页。

科是否真的准备动用苏军支持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此外，莫斯科在 5 月 8 日德国投降后没有立即向东京宣战。另一个促使延安继续与盟国谈判的重要因素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一直希望能向长江三角洲和华南沿海推进，并在那里与期望中的登陆美军进行合作。^①

5 月底，钟摆摆向了另一边。共产党领导看到，他们与国民党军队冲向沿海的竞赛失败了。此外，延安得到消息说，东京向华盛顿伸出了和平触角。共产党领导害怕出现这种情况：日本军队将向登陆的美军投降，美军接管了有关地区，但最终又把它交给了国民党，必要时还在军事上支持他们与共产党打仗。此时，延安完全以另一种观点来看待焦急等待的美军登陆，把它视为“美帝国主义”的一种干预。^②

新观点反映在 6 月 1 日的一篇报纸文章中。^③ 文章说，在此期间美国和英国的“亲法西斯分子”“以他们在殖民地战争方面的考虑”给亚洲的民族解放战争蒙上了阴影。“某些同盟国人士的可恶态度”使人想起 1918 年的可悲历史——指十月革命后协约国对西伯利亚的干预。当 6 月初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逮捕了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说他与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一起从事了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这使共产党领导更加相信其对美国的判断。^④

此段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 Ya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86 - 90, 及资料来源的提示。——Michael M. Sheng 从 4 月 9 日后 10 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的含有批评华盛顿南美政策的文章中得出结论，说延安当时已改变了其对美政策，但是他没有作令人信服的论证；见 Seng: < America's Lost Chance > p.156 f.。

② 此段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 Ya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87 - 94 的有关段落，特别是 1945 年 6 月 6 日迪克西使团的报告，同上第 94 页。

此处和以下两句参阅《新华日报》1945 年 6 月 1 日引自 Reardon - Anderson: < Ya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92。

④ 参阅 Escherick: < Lost Chance in China > p. XII - XXIII; John S. Service, The Amerasia Paper: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 - China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7, Berkeley, CA 1971.

这一转变也反映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至6月11日）的后期。毛泽东在5月底的一次总结发言中预言：华盛顿将过渡到一项遏制苏联、反对共产主义、在东亚建立绝对霸权、以及把中国改变为“美国的半殖民地”的政策上去。与此政策相类似的情况是，希腊政府借助英国的帮助镇压希腊共产党的起义；这种情况如在中国发生，那将更为严重。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国际的“革命”与“反动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斗争将燃烧起来，人们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强调应作好准备，迎接抗战结束后的战斗。中共与美国在抗战期间的那种合作将很快结束，接替它的将是一个“强硬抨击”的新阶段。^①

毛泽东在这段时期的讲话不仅谈到要作好战斗准备的问题，而且也谈到对苏联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忧虑，这种紧张关系在德国投降后已日益显露并不断增强。这种紧张关系的升级有可能削弱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增大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可能性。毛在党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还试图让其听众放心，他指出，斯大林曾谈到欧洲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当英国、美国和中国态度消极时，莫斯科则积极主动。人们应当相信苏联的强大。在最后一星期的代表大会期间，毛显然又重新倾向于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不难看出，毛担心蒋介石立即发动军事进攻，以迫使人们作出打内战的决定。^②

看来，6月中，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结束后，延安又确定朝着与国民党和美国破裂的方向发展。共产党领导公开号召反击

此段参阅 1945 年 5 月 31 日毛泽东的总结发言，引自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and the CCP'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in: *Chinese Historians*, No. 1, Vol. V (Spring 1992), P. 22。另参阅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第 677 页。

^② 此段参阅毛泽东 1945 年 5 月 30 日的总结报告 引自 Odd Arne Westad: *<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 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 . New York 1993, p. 72 f. ; 以及同上第 73 - 75 页。

“反动派”并宣称将不参加 7 月 7 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这次会议是国民党计划于 11 月 12 日召开的“国民大会”的前期会议。与重庆会议相平行，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① 这次会议也是于 11 月 12 日召开，——显然是作为与重庆议会相对抗的另一个议会。这种发展趋势在 2 月底已初见端倪，这与美国以及苏联的意图是相违背的。当时共产党领导宣布要成立中华全国工会联合会，要求建立“中国解放区的统一管理中心”，以打破“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统治”。^② 遵循同样的路线，在 4 月底和 5 月初，努力积极成立“解放区妇女组织”和“解放区青年组织”。^③ 斯大林在延安的联系人在 2 月份就认为，这些努力是毛泽东“发动内战”的号召，因为毛已不指望从华盛顿和莫斯科得到真正的支持。^④ 5 月中，毛认为最紧迫不过的是建立另一个政府（向内战迈出的一步），他当时欲称其为“解放区统一委员会”或“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统一委员会”。——这是一个在党领导中曾展开争论的方案。^⑤

在苏联与国民党中国开始在莫斯科就缔结联盟条约进行谈判的前夕，延安加强了反美宣传。自 1941 年 12 月美国介入远东战争以来，共产党领导第一次直接求助于美国人民，并威胁“赫尔利等帝国主义者”，如继续反对中国人民，将遭到教训。^⑥ 毛公开咒骂赫尔利是帝国主义者，并称美国政府如继续追随赫尔利的

此段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95。

同上，第 75 页；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第 637 页及下页，第 669 页。

同上，第 669 页。

④ 同上，第 535 - 538 页。

同上，第 669 - 671 页。

⑥ 1945 年 6 月 25 日《解放日报》，引自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96。

政策，将“陷入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①不久，毛对中国访问者说了类似的尖锐的话：“我能用几支生了锈的猎枪同日本人战斗，我也同样能同美国人斗。”^②

中国共产党人与华盛顿之间持续了 11 个月的调情结束了。但延安并没有完全中断这种关系，而是小心翼翼地等待和观察美国对苏联和对国民党态度的进一步发展。

第十一节 小结

斯大林从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就是一项通过共产国际的、以意识形态为掩饰的、实际服务于苏联利益的政策。而毛泽东随着他在党领导中的地位加强，日益坚持他自己的、独立于莫斯科的、首先是以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为目标的政策。

除了比莫斯科还要“左”的李立三以外，1922 至 1935 年期间的中共领导基本上是共产国际操纵下的苏联政策的驯服工具。1927 年，莫斯科奉行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结盟的战略失败了。接着，被莫斯科赞许的武装起义政策也以失败而告终。

毛泽东和朱德 1928 年在湘赣边区实行的、从农村开始推进革命的战略，既得不到共产国际，也得不到驻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赞同。当时，莫斯科与上海有所不同，那里曾得出了类似毛、朱的结论，但却对他们的活动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独立于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当 1930 年，李立三领导下的党领导也表现出不顺从的态度，违背莫斯科的意愿，进行城市武装起义的

^① 1945 年 7 月 10 日和 12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1991 年北京版第 1110 - 1116 页。

引自 Stuart Schram：< Mao Tse - tung >，Penguin Books，Harmondsworth/Baltimore/Ringwood 1966，P.232。此段另参阅 Seng：< America's Lost Chance >，p.157。

准备，并再次遭到失败，此时，斯大林肆无忌惮地对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领导组成进行了干预，并建立了一个新的顺从莫斯科的领导班子。

自 1935 年初开始，毛泽东在党领导中的地位逐步上升，这也开创了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新时期。与毛的意志相适应，中共开始向较强的独立性过渡。这一过渡在开始时比较顺利，因为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两年之久。但斯大林在承认毛是党的领袖方面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增大了对相互关系的冷漠。当 1938 年夏莫斯科确认了毛是党的领袖，以及毛在 1941 年 10 月最终把王明和其他党内亲苏力量排除后，毛在通往无可争议的领袖道路上排除了最后的障碍。但在此之前，毛在没有得到斯大林的赞同的情况下，已开始努力谋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自那时起，中共内部流行这样一个口号：在考虑中国政策时，对莫斯科“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一般说来，毛对莫斯科确定的路线均表示拥护。这基本上是合乎实际的，如果它涉及的是国际政策。但是，当共产国际的路线关系到中国国内的战略问题时，他不断予以抗拒，即使在斯大林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斯大林为推动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进行积极的抗日合作，曾施加过压力。同样，当莫斯科为干扰日本进军苏联的计划、不顾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安危、要求中共在中苏边界地区向日本人展开军事进攻时，毛泽东也拒绝顺从。

毛泽东当时就已认识到，苏联战时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把国民党和中共的军事力量集合起来，用于把日本牵制在中国，阻止它袭击苏联。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利益是：保存自己的力量，以便投入战后夺取政权的最后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态度之所以变得更加倔强，也是因为斯大林拒绝向他们提供武器，而却慷慨地装备军事上强得多的国民党政府。斯大林对中国共产

党人提供武器的要求，不是直截了当的拒绝，就是提出为苏联安全服务的条件，而延安在自己的领土安全将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是不会接受这些条件的。尽管莫斯科一再提醒重庆，苏联提供的武器不能用于打中国共产党人，但这很少能起到安慰的作用。

中共领导之所以遭苏联拒绝后又试图从美国获得援助，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处于弱势，而 1944 年夏似乎出现了这样的机会。争取美国援助的努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华盛顿为援助提出的条件是：共产党人必须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并在军事上受其领导。这些条件遭到中共领导的拒绝。延安试图在策略上与华盛顿接近，显然没有同莫斯科协调一致，它显示出中共独立外交的开始，并清楚地表明 1944—1945 年中国共产党人摆脱莫斯科的约束已发展到何等程度。

第二章 1945 - 1948 年 莫斯科的双重对华政策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 苏联、美国、国民党和中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在中国可观察到一场复杂的外交角逐，其主角是苏联、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都试图取得尽可能强大的地位，以便在战后建立新秩序方面占据有利的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他们相互猜疑、窥视，并试图相互利用。这场角逐一直延续到战后，中国的两个竞争对手不惜使用了暴力。直至 1949 - 1950 年苏联与共产党中国结成了联盟，以及在朝鲜战争中形成了泾渭分明的阵营之后，这场角逐才告一段落。

即使到这一时期，人们在观察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时，仍然绝对有必要，不仅对他们的双边关系，而且要联系上述四角关系的前前后后加以分析。如不这样，就很难理解双边关系的发展。

一般说来，关于美国和国民党政策的追述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在这方面有最重要的文献和许多历史见证人的证词。这些资料来源也使人对美国和国民党这两个主角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有较清楚的认识。但是在观察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发展方面，由于资料来源缺乏，迄今为止也只能获得有限的了解。如前所述，由于人

们在最近几年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材料，以及历史见证人的报告，这种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

在战争结束之际和战后初期，华盛顿以及莫斯科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统一，是在国民党领导下、共产党人作为一个小伙伴加入的统一。^① 1945年2月11日，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取得一致意见：承认外蒙和满洲划归苏联势力范围，作为对重庆在这方面作出妥协的回报，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合法的中国政府，而中共的利益却未予以考虑。在日本投降后的头几个月里，可以看出，美国和苏联的对华政策有其不确定性。这首先是因为自1945年春开始，对欧洲未来的不同设想给苏美关系蒙上了阴影，并出现了后来的冷战的前奏。虽然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人们都已预见到，美国和苏联之间将展开一场世界性的政治对抗，但在1945年双方都努力以和平手段来划分利益范围。人们都在探索，双方在不使用武力进行挑衅的情况下，还能走多远。

在此之前，美国感兴趣的是苏联能很快参加对日作战，以及承认和支持国民党政府。作为回报，华盛顿准备按照雅尔塔协议，对国民党施加影响，让国民党政府承认苏联是外蒙的实际上的保护者以及苏联对满洲重要战略地区的控制。特别是1944年6月美国开辟了欧洲战场之后，它努力使中国加强对日作战，以减少在对日战线方面的压力。在这方面，它首先寄希望于它大力支持的老盟友国民党，并决定不让自己的部队介入中国的内战。^②

与过去一样，避免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爆发内战，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从这一利益出发，人们也希望两党在军事上共同

华盛顿的有关考虑，参见：John Hansen Feaver: <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 - 1950: The Policy of Restrained Intervention > .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Microfilm International, Ann Arbor, Michigan 1983, p.54 f.

此段和下段，参阅 Warren F. Kimball (Ed.): < Churchill & Roosevelt >, Vol. I, p.502, Vol. II p.213, 393 f. . 608 f. . Vol. III, p.237; Tien - fong Cheng: < A History > . p.252;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 . p.122f.

抗日。此外，华盛顿也不愿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即一方面不得不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同时又因此陷入与莫斯科发生冲突的境地。反过来，这两个动机也适用于苏联的态度。^①另一方面，罗斯福不想看到苏联在战后中国赢得强大影响，成为未来的劲敌。按他的设想，东亚太平洋地区应成为美中势力范围，苏联在此地区应受到限制，它虽然与美国、中国和英国一起构成一个国家集团，但这个国家集团中的中国和英国却隶属于美国。与此相关，在 1942 年春罗斯福对莫洛托夫谈到了关于保障战后和平的“四个警察”。^②

从苏联追逐的目标方面来观察，苏联的对华政策就是：在东亚（如同在中东欧一样），建立一个安全带，缓冲带。它首先是针对日本，但也用于对付美国和将变得强大的中国。为此，斯大林要创造条件，向东亚和太平洋扩展苏联的势力，这同时也应为增强其全球地缘政治地位作出贡献。从斯大林的行动和计划看，他基本上继承了沙皇的政策。为了弥补俄国因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失败而蒙受的损失，斯大林要把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并入苏联。他要在日本、朝鲜半岛和满洲站住脚，在新疆保持一定的影响，确保对外蒙古的保护人地位，以及阻止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存在。^③

从原则上看，苏联领导当时容忍这一状况：美国在原则上把中国视为其势力范围。1944 年 8 月，莫洛托夫甚至对罗斯福驻中国私人代表赫尔利表示过这样的希望：在中国，美国可“担任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领导角色”^④。1945 年底，莫斯科仍一直按

参阅 Murray: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p.122 - 127 他也认为 推动中国内战双方进行合作，符合美国和苏联的利益。

② Kimball (Ed.):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 Vol.II, p.608.

③ 参阅 Garthoff: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 p.70.

④ <The China White Paper> . P.72.

这样一个脚本行事：“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部分的是日本人，那么，现在中国的主人是美国。”^① 蒋介石则力图“利用苏联和美国，特别是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加强国民党政府。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在雅尔塔达成一种默契：外蒙和满洲是苏联的利益范围，而长城以南的其他中国地区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含意下，为美国的利益区。但后来，在满洲问题上，苏联领导丝毫不相信美国，认为：“美国将提出要求，不仅向华北，而且向满洲推进。对苏联来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已经把边境上的日本邻国摆脱了，我们不能让满洲变成另一个列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场所。”^②

另一方面，斯大林尽力避免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以至战争，这也包括中国的内战。如果发生内战，苏联将受到道义上的压力，而不得不偏袒中共。当时，华盛顿以及莫斯科都把蒋介石视为中国的强人，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人似乎是无足轻重的。斯大林经常注重和寄希望于军事实力。他知道，中共面对的是 450 万训练有素的、装备现代化的军队，而中共最多只有 100 万士兵，而且训练和装备都很差。^③ 苏联领导与美国相一致，都努力促使国民党和中共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合作。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又把中共看做是一个有用的工具，通过它把苏维埃政权复制到中国，首先是满洲。从这些利益形势出发，苏联的两面派手法也是符合逻辑的。

蒋介石怀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和基本立场。他以极大的不信任感看待共产党，认为它们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他像兔子凝视着

此段参阅 1945 年 12 月 29 日副外长洛佐夫斯基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作的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86，案卷 146，第 20-21，24 页（原件复印件）

^② 同上，第 24-25 页。

列多夫斯基：《美国的中国政策和苏联外交 1942-1945》，1985 年莫斯科版，第 121 页及下页。

蛇一样，死盯着他的国内主要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人，并感到苏联是中共的后台老板和盟友。他首先寄希望于美国，把它视为其在中国掌握政权的最重要的外国保证人，但他也不放弃利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不信任，以谋得自己的好处。^①

显然，蒋介石对中共的不信任远比对苏联的不信任更深。他试图与苏联作利益上的调整，并不断对苏施加压力，促使它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他对苏联较快地转入对日作战感兴趣，因为他担心抗日战争将旷日持久地拖下去。关于战后秩序，他希望战后能按“历史疆界”重建国家，收复“失去的区域”。这包括在边缘地区的新疆、外蒙和满洲获得完全的主权，以及阻止美国所偏爱的“门户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此外，蒋介石也具有这样的思想，他必须为二战后与中共进行最后斗争作好准备。其他一切，包括抗击日本的入侵，都必须服从这一思想。就此而言，他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重大区别，他们都力图在抗日战争中保全自己的军事力量，待日本战败后，进行决定性的较量。

中国共产党人和过去一样，优先考虑的是将革命推向胜利，在与国民党的争斗中赢得政权。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共偏向苏联。但从武器供应方面看，中共除向其苏联同志求援外，在 1944—1945 年也不惜向华盛顿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并试图通过与美国的密切合作来孤立蒋介石。从处理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关系方面来看，正如 1946 年初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② 所说，中共试图按古典战略家的方法行事：“以夷制夷”。

中共也力争按“历史疆界”重建中国。 1936 年夏，毛说：

^①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 p.129.——从 1945 年 12 月 29 日副外长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作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莫斯科也知道这一事实；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86，案卷 146，第 20—21，24 页（原件复印件）

^② 1945 年 1 月 3 日中共中央指示，引自杨奎松：《苏联因素……》第 25 页。

即时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这就是说，东北是必须收复的。”^①约在同一时间，毛强调：“人民革命在中国胜利后，外蒙古共和国将在自己意愿的基础上自动地变成中华联邦的一部分。”^②

总体说来，斯大林在延安的代表所作的断言是对的：“毛始终在其整个政策中考虑谋求苏联的援助。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期，更是指望得到苏联最终将给予的支持。”^③但是，中共领导不得不认识到，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重庆签订了同盟条约，苏联为确保其在满洲的特权，必须给国民党以回报，从而“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④

从战争结束时双方追求的目标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三个方面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双方都拒绝美苏商定的势力范围划分，拒绝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成立一个中国的联合政府。

第二节 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同盟条约 莫斯科谋求沙皇的特权

许多情况表明，中共领导随着与美国关系的日益恶化，重新加强了对苏联的重视。1945年5月中，毛泽东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强调：苏联是中国共产党惟一的和真正的朋友，是世界革命典范和“司令部”；虽然延安至今未能从莫斯科得到援助，这

^①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引自 Edgar Snow: < Red Star >, p.96。

^② 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没有注明日期，但应在1936年6月至10月之间，来源同上。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1942-1945年》第469页。

^④ 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55页。

是由于战争形势决定的，随着苏美紧张关系的加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延安将“肯定会得到国际的援助”；中共有可能在战后，特别是在向满洲进军的情况下，从莫斯科得到物资和技术上的支持，并借助苏联的援助展开对国民党的斗争，在满洲建立起一个坚固的中国革命根据地。^①

当时，延安的友好表示并没有在莫斯科得到较多的赞同。6月初，重庆透露出消息说，斯大林再次向美国保证，他将与美国人一起促使中国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之下。7月中，莫斯科的新闻媒体的消息也表明：苏美在战争中结成的同盟，在中国问题上正继续有效地运转。这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恼怒。莫斯科的消息说，斯大林与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关于中苏条约的谈判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并表明“相互间的广泛理解”。^②（这种说法并不确切！）

而真正使中国共产党人感到震惊的是1945年8月14日。^③在这一天，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经过三周的谈判，签订了一个有效期为30年的友好同盟条约。双方承担义务，在对日作战中相互提供援助，不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没有另一方的同意不与日本签订停战或和平条约。莫斯科在条约中含蓄地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缔约双方承诺“不干涉另一方的内部事务”（第5条款），保证相互提供“各种可能的战后时期的经济援助”（第6条款）。在互换的备忘录中，莫斯科承诺，“向中国提供道义支持，以及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质资源的帮助，而一切援助均提供给作为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此外，苏联政府还答应：它将

此段参与1945年5月24日，5月31日和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讲话，引自杨奎松：《苏联因素……》第32页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1942-1945年》，第673页。

^② 此段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p.96 - 97。
有关细节见本节的后一部分。

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以此承认国民党政府对满洲的统治；苏联将不干涉新疆的内政。中国方面则有义务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如果在日本投降后经公民投票，证实了其独立的愿望。^①

与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中苏条约一起，还签订了 3 个为期 30 年的协定。^② 协定规定：中苏共管满洲铁路，共用旅顺海军基地，苏联承担对港口的保卫，苏联无偿租用大连的一半港口设备，大连成为各国都可进入的自由港。在其他一些协定中还规定了苏联军队和国民政府在满洲的合作的细节，并达成协议：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应交由国民政府管辖。^③ 斯大林在此之前还承诺，苏军在日本投降后，最迟 3 个月撤出满洲。^④

1、1945 年 2 月 11 日的雅尔塔协定 (I)

如前所述，1945 年 2 月 11 日美、苏、英在雅尔塔已原则上就外蒙现状的继续维持和缔结友好同盟条约等作了安排，并达成

^①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和备忘录；中文文本见“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958 年台北版第 505 - 510 页；俄文文本见《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96 - 198 页，205 页及下页。此外，参阅 Clubb: < China & Russia >, p.344 - 347; Theodore H.White: <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 New York 1979, p.238。

^② 1945 年 8 月 14 日协定的中文文本见“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958 年台北版第 512 - 522 页；俄文文本见《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98 - 205 页。

中文文本见“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第 523 及下页；俄文文本见《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第 204 页及下页。

^④ 1945 年 7 月 11 日斯大林与宋子文的谈话记录见“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第 523 页。

了秘密协议（即后来所谓的雅尔塔协议）。^① 在此之前罗斯福就已说过，亲美的中国国民政府应与莫斯科商妥，以防止苏联在战争结束后插手中国。^② 在 2 月 11 日的秘密协议中，为使苏联同意在德国投降后最晚不超过 3 个月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得不付出这样的代价：原则上同意重新确立俄国于 1905 年因俄日战争失败而失去的在满洲的特权，这首先是指苏联租用旅顺口和共同管辖中国长春铁路（以下简称 CCE，中长铁路）^③ 此外还包括确认苏联是外蒙的实际保护国。罗斯福是以牺牲中国来讨好斯大林的，为的是减少美国在战争后期的损失。^④ 罗斯福对斯大林提出的直言不讳的要求也是这样回应的：如果无利可图的话，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⑤ 显然，在雅尔塔作出这些妥协，是因为当时人们估计德国投降后对日作战最少还要持续 18 个月。^⑥

此外，斯大林利用了有利的心理状态，即在共同对日作战时期把他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联系在一起的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斯大林在论述牟取满洲特权的必要性时，提到日本 40 年来对俄国所作的公正的行为。因此在雅尔塔协定的最后文本中有一段提到了未来苏联在满洲的特权：“苏联应当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 1904 年被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

1945 年 2 月 11 日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签字的《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议》，见：FRUS, Diplomatic Papers: <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Jalta >, p.984.——关于协议的讨论是于 1945 年 2 月 10 日在雅尔塔举行的，历时仅几小时；参阅美国的记录（含斯大林的草案和哈里曼的修改建议），见：同上，第 894 - 897 页。

芭芭拉·图赫曼：《沙与风—美国和中国 1911 - 1945》，1973 年斯图加特版第 365 页。

中国长春铁路就是指连接起来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图赫曼：《沙与风—美国和中国 1911 - 1945》，第 526 页。

同上。

^⑥ 1946 年 3 月 5 日丘吉尔讲话，见 Henry Wei: < China and Soviet Russia >, p.175。

2、回顾：俄罗斯在满洲的特权

斯大林在这里提到了俄国在 1904 - 1905 年日俄战争中的失败。那次战争是因双方争夺在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影响而爆发的。通过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俄罗斯被迫把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的租借地区转租给日本，把与中国共同经营的哈尔滨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移交给日本，只是对中国东部的从满洲里通向海参崴的铁路（以下称 OCE，中东铁路）的权益留给了俄国。^①

就这样，俄国在中国的绝大部分特权丧失了。那些特权是沙皇于 1896 年和 1898 年乘中国在 1894 - 1895 年对日战争后处于虚弱之际而牟得的。为针对日本，俄中于 1896 年 5 月 22 日签订了俄中秘密同盟条约，它规定，中国同意建造一条由俄国边境穿越满洲直至海参崴的铁路（中东铁路）。它完全由俄罗斯向法国贷款兴建。这就使俄罗斯缩短了至海参崴的联系线，并比建造一条在俄罗斯领土上通往海参崴的铁路节约 3500 万卢布。此外，还商定^②，中国可以在 36 年后赎买这条铁路，或 80 年后（即至 1976 年）无偿归还中国。1898 年沙皇还通过施压和行贿使中国皇太后同意把辽东半岛租借给俄国，^④ 由此，俄国获得了太平洋上第一个不冻的军港旅顺口，以及建造另一条铁路线（南满铁路）的许可，从而把旅顺与中东铁路接通。约在同一时间，俄国又让中国承诺，进一步排除其他外国在满洲的活动。

^① 此段和下段参阅 Tien - fong Cheng: < A History of Sino - Russian Relations >, p.51 - 52; Aitchin K.Wu: < China and Soviet Union >, p.73 - 89 ; 戈特夫里德 - 卡尔·金德曼：《在工业时代世界政治中的远东》，见：1970 年德国袖珍本出版社出版的《20 世纪世界历史》第 6 卷，第 84 - 99 页。

^② 《俄中关系 1698 - 1916 年——文件汇编》，1958 年莫斯科版第 73 页及下页。——关于中东铁路的条约于 1896 年 8 月 27 日签字，文本见：同上，第 74 - 77 页。

同上，第 77 页。

见 1898 年 3 月 15 日中俄协定，同上，第 78 - 80 页。

这样，满洲被扩建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就被确定下来。1906年至1910年的沙俄外长伊兹沃尔斯基把满洲影响区描述为俄国的“重要殖民地”。^① 不管对协议有什么其他解释，当时的俄国官员在铁路地区是实际上的惟一主宰。1899年俄国和英国相互承诺尊重双方各自在满洲和在华中的势力范围。当1945年斯大林要求重新确立已失去的势力范围时，他已较清楚地表明，他是沿着俄罗斯帝国的足迹在行进。罗斯福对此表示了支持。这也就从根本上背叛了美国自1899年在中国所表现的反殖民主义的传统。当时，华盛顿要求各大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即：给所有国家在华以同等的经商机会，给中国政府以独自的征收关税的权利等。然而，在1945年美国感兴趣的是苏联尽快参与太平洋战争，而这一利益是如此之大，从而使罗斯福把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抛到了脑后。

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地复述俄罗斯在满洲的特权所经历的复杂历史，但它可以下面的提示性词句作一简要的说明。1905年俄日在一项秘密协定中瓜分了满洲，北部归俄罗斯势力范围，南部归日本势力范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曾向中国提出无偿归还中东铁路，但不久又撤回了这一提议。^② 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其中提出：莫斯科放弃帝俄在华的特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并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中国同意赎买中东铁路的请求。^③ 在附加协议中，人们还同

金德曼：《在工业时代世界政治中的远东》，见：1970年出版的《20世纪世界历史》第6卷，第134页。

详见迪特·海茵茨希：《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载于《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第1卷，1978年巴登-巴登版第25-27页，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③ 协定文本见：《苏中关系1917-1957年一文件汇编》，1959年莫斯科版第32-85页。

意，在赎回前，铁路由双方共同管理。^①

自 1928 年起，与中国共产党人试图瓦解国民党有关，中苏关系日益紧张。1928 年夏国民党军队占领北平后，南京政府统治全国的自我意识不断加强。这两个因素导致 1929 年出现了收回中东铁路的努力，或者说，至少要把法律上的铁路共管和实际上苏联独管权拿到自己的手里。此时已与国民党政府捆绑在一起的满洲统治者张学良下令关闭苏联驻沈阳的总领馆和苏联驻满洲的商务代表处，没收中东铁路的电务系统，驱逐包括局长在内的若干苏联铁路工作人员出境，无数其他人员被捕。对此，莫斯科派军队进入满洲，并造成中国军队的大量伤亡。在苏联军队的军事优势和国际外交压力下，中国政府被迫让步。1929 年 12 月签署了一个中苏备忘录，重新恢复以前的状态。^②

1931 年 9 月开始，日本军队在几个月内占领了满洲。1932 年 2 月，在满洲变为日本傀儡国满洲国后，东京日益对苏联在中东铁路地区的地位施加压力。苏联的设备被没收，与外西伯利亚铁路的联系被中断，大批苏联人员被捕，许多人被长期关押，个别人甚至被处死。莫斯科屈从于日本的压力，于 1935 年 3 月以 1.4 亿日元把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这个价格与莫斯科原先提出的 6.25 亿日元相比要小得多。1905 年旅顺口、大连和南满铁路都不得不交给了日本，从此，随着中东铁路丢失，苏联失去了在满洲的最后据点。^③

同上，第 90-92 页。

^② 1929 年 12 月 22 日备忘录见：《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一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45-147 页。——此段参阅 Tien-fong Cheng: < A History…… >, p.149-159; Wu: < China and Soviet Union > . p.198-221。

此段参阅 Henry Wei: < China and Soviet Russia > . p.103-111; 金德曼：《在工业时代世界政治中的远东》，载于：1970 年出版的《20 世纪世界历史》第 6 卷，第 295-309 页。

3、1945 年 2 月 11 日的雅尔塔协定（II）

在回顾上述一段历史之后，我们再回到 1945 年 2 月 11 日的雅尔塔协定上来。实际上，中国没有代表出席雅尔塔会议。当时，蒋介石的地位是虚弱的，他对美国和苏联能否帮助他反对共产党人也持怀疑态度。但是，罗斯福考虑到他的中国同盟者，他始终认为在协定中应加上这样一句话，即：关于外蒙、东北港口和中长铁路问题所达成的协议“需要得到蒋介石大元帅的同意”。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姿态。与此相矛盾的是在协定中权威性地和无可置疑地写道，人们已达成协议：苏联的要求“在战胜日本后将毫无疑问地付诸实现”。此外，中国在拟议的中苏谈判中的地位，将被协定中的两个条款所削弱。协定中说，“苏联的优先权利应得到保护”，以及美国总统将采取措施，促使蒋介石同意在旅顺口、大连、中长铁路和外蒙问题上的安排。罗斯福和丘吉尔无论是事先或是在谈判期间，均未就协定与蒋介石进行过磋商，外长艾登对此也曾表示了疑虑。^①

斯大林也同样认为，没有必要让其中国同志及时了解整个进展情况。^② 毛泽东在后来很不高兴地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作出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③ 当时，斯大林“在物质上和道义上，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

此段参阅：Warren F. Kimball (ed.): <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 vol. III, p.527 石殷红(音):《从雅尔塔协定到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于《近现代国际关系》，1986 年，12 月，第 61-70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把该协定称之为“肮脏的交易”，它是背着多年的战斗盟友中国缔结的，并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作为代价。见林军：《中苏关系 1689-1989》，1989 年哈尔滨出版，第 142 页。

许岩(音)：《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香港，1993 年，第 3 页。——据称，许曾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和军事档案馆查阅文件。

此处和下句参阅毛泽东 1956 年 9 月与南斯拉夫大使的谈话，引自《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 年北京版第 253 页及下页。

支持蒋介石”。

对 2 月 11 日协定的保密甚至到如此程度，以致罗斯福在一段时间里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否认协定的存在。3 月中，当蒋介石通过他驻华盛顿大使得知，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远东的建议”时，^① 他几乎很难相信，并自问“中国真的在雅尔塔被出卖了”。^② 罗斯福在他去世（4 月 12 日）前几天，对缔结该协定曾表示后悔，并力求作一些补救，——显然，他事后认为，没有中国政府的参与，而牺牲中国的主权是不正派的。^③ 5 月 9 日，新总统杜鲁门指示赫尔利，他应正式地和秘密地向中国总统通报协定的内容。5 月 15 日赫尔利向蒋介石作了通报。^④ 6 月 15 日蒋介石得到了协定的全文。^⑤ 1946 年 2 月 11 日，协定签订一年之后，三个签字国政府公布了该协定。协定内容的公布，特别是鉴于苏联插手外蒙古，在中国的公众舆论界掀起了广泛的愤怒浪潮。^⑥ 而在此一个月前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这对愤怒浪潮的兴起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斯大林恪守在 2 月 11 日协定中承诺的义务：德国投降后

^① 1945 年 3 月 12 日陶明维（音）给蒋介石的电报，引自 Liang Chin - tung: < The Sino - Soviet Treaty > . in: < Paul K.T.Si (Ed.) : <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oviet War 1937 - 1945 > . N. Y. 1977, p. 374.

蒋介石日记，1945 年 3 月 15 日，引自 Keiji Furuya: < Chiang Kai - shek, His Life and Times > . Abridged English Edition by Chun - ming Chang, New York 1981, p. 822. ——有其他作者认为，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办公厅在签字的当天就得到了协定的全文。例如，见：林军：《中苏关系 1689 - 1989》，哈尔滨 1989 年，第 144 页，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此段参阅 Henry Wei: < China and Soviet Russia > , p. 174 页及下页。

< The China White Paper > , P. 116; 1945 年 5 月 22 日蒋介石给宋子文的电报，引自 Liang Chin - tung: < The Sino - Soviet Treaty > , p. 75.

同上。

^⑥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 - 1991》，1993 年武汉版第 447 页；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 p. 229. ——Garver 把协定公布日期误写成 1 月，这是援引自 Sergei Goncharov, John W. Lewis, Xue Litai: <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 . Stanford, Cal. 1993 p. 3.

(1945年5月8—9日)最晚不超过3个月参与同盟国的对日作战。8月8日斯大林向东京宣战。第二天苏联军队进军满洲，^①而在此之前莫斯科并没有通知延安的中国同志。^②8月10日日本提出投降书，同盟国，包括莫斯科，于第二天接受了投降书。但苏联红军对此并不理睬，继续向前挺进。当8月23日至24日苏联宣布停火时，它进驻满洲的军队已达30万人，总指挥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③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通过与苏联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含蓄地承认了雅尔塔会议强加于它的协议。华盛顿和重庆都希望通过这一条约的签订使中共最终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支持的不是他们，而是国民政府。在此痛苦的认识下，中共将不得不与国民党妥协，并加入由国民党主导的联合。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确信莫斯科在整个进程中的作用。他在1945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确认：

中国共产党人不相信，斯大林已同意或会同同意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确信，苏联是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国民政府的。这种看法直到苏联与中国签订了支持国民政府的条约才开始改变。当

^① 自1918年苏联军队称“工农红军”，习惯简称“红军”，1946年2月改称“苏联军队”。自1927年中共的武装力量也称“红军”，直至1946年改称“解放军”。为避免把苏联红军与中共红军混淆，在本书中，一般把苏联武装力量成为“苏联军队”。参阅《苏联大百科全书》，1973年莫斯科出版的第3版第13卷第327页；同上，1976年第24卷第22页；Raymond L. Garthoff: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in Manchuria, 1945-46> . in: Raymond L. Garthoff (Ed.):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 New York, 1966, p.77; Whitso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 p.633-635 and passim.

^② Tai Wan-chin: <The Conclusion of the 1945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Josef Stalin's Negotiating Style and Skill> in: Tai Wan-chin (Ed): <The 1945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谈判》，1955年台北版第132页，注31，及资料来源提示。

此段参阅 O. Edmund Clubb: <China & Russia> . New York 1971, p.349.

中国共产党人确信苏联并不支持他们时，如果国民政府又能现实地提出大度的政治解决办法，中国共产党人就有可能与国民政府达成和解。^①

对事态的这个看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和其他因素一起促使蒋介石于 7 月初向苏联提出请求，以帮助他占领满洲。为此，他不得不同意让苏联军队利用满洲的铁路。蒋介石宁愿让苏联军队，也不让中共部队占领满洲。

4、关于同盟条约的谈判

关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是在莫斯科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即：6 月 30 日至 7 月 13 日；8 月 7 日至 8 月 14 日。^② 中方谈判代表团由总理（确切地说是行政院长）宋子文领导，他在第一轮谈判时并以兼外长的职务出现。中方成员还有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他多年生活在苏联，能说流利的俄语。^③ 在第二轮谈判时，宋由刚任命的外长王世杰陪同。苏联代表团以斯大林为首，作为助手参加的有：外长莫洛托夫和大使彼得罗夫。会谈期间，宋子文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保持着紧

^① < The China White Paper > . August 1949, p.99.

^② 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的苏联记录可以查阅了，确切地说，见于安德列·M·列多夫斯基的未公开的手稿：《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苏中条约的谈判 1945 年 6 - 8 月》。本作者在这里主要依据的是这些材料，并通称为“苏联记录”。——中方的谈话记录已被 John W. Garver 所利用，确切地说，他援用的基础是《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3 卷，第 2 册，台北 1981 年，第 572 - 651 页；见：Garver: < Chinese Soviet Relations > , p.214 - 228. 中方记录的有关段落也被 Chin - tung Liang 所援引，并根据已公布的蒋介石私人档案材料，间接地叙述了谈判的其他部分；见：Liang Chin - tung: < The Sino - Soviet Treaty > , p.377 - 388. B.J.Murray 也部分地援引了中方记录，它出自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外交部档案咨询处）；见：Murray: < West-em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 p.127 - 145, passim. K. Furuya 在其 < Chang Kai - shek > 书中的第 28 - 38 页还摘引了蒋经国的笔记。

详见第二章第五节。

密的联系，哈里曼则不断向杜鲁门总统报告进展情况。^①7月初，杜鲁门告诉哈里曼：美国不愿“作为雅尔塔协议的解释者”出现。中国代表团于6月30日来到莫斯科机场，受到莫洛托夫、彼得罗夫和其他重要部长的热烈欢迎——比毛泽东1949年12月抵达莫斯科时要友好得多。^②下午，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接见了代表团。宋向斯大林递交了蒋介石的委任书，其中表示希望谈判能为“友好、紧密和长期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宋援引了孙中山的遗嘱，并希望苏联与中国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关系”。按苏联记录记载斯大林回答说：“从前沙皇俄国政府力图瓜分中国。现在，在俄国掌权的是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新人。我认为，双方能相互理解，达成一致。”^③按中方记录，斯大林作了如下的表述：“在俄国，现在是新人掌权。从前，俄国与日本结盟，以瓜分中国。现在我们要与中国结盟，以遏制日本。”^④显然，谈话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⑤

在7月2日第一次实质性谈话中，斯大林提出了他最关心的、也是作为谈判基础的话题：雅尔塔协定。他问道，宋是否知

此段参阅杜鲁门：《回忆录》，1955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一卷第302-437页。——此段参阅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214。

关于毛泽东遭到的冷遇参阅第四章第二节。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全宗45，目录1，案卷322，第3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的未公开的手稿：《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苏中条约的谈判 1945年6-8月》，第3页。

④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p.128 （中方记录引自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

此段参阅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214 f.;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p.128。

道三国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已达成的协定。^① 宋说，知道，美国向他的政府通报了协定的内容。他准备就协定的各点进行讨论。^②

如上所述，国民党政府的目标是，重建中国对新疆、外蒙和满洲的完整主权。然而，宋在谈判开始前就已经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作为中国主要盟友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美国，已在 2 月 11 日的协定上签了字，而它的结果，如已提到的那样，将可能导致外蒙的丢失，满洲主权受到重大的限制。

谈判中最激烈的争论是关于外蒙的法律地位。虽然外蒙在 1911 年中国革命之后在法律上取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于 1921 年变成了苏联的被保护国。这个问题曾是签订 1924 年 5 月 31 日苏中协定的主要障碍。虽然在最后终于签订的协定中莫斯科承认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但那里的实际状况直至 1945 年并未改变。^③

7 月 2 日，宋首先提出了这个棘手的蒙古问题，他提起蒋介石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的谈话：“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

蒋经国后来称，斯大林在 6 月 2 日“以粗暴的表情和难看的姿态把一叠纸扔向了宋院长”，问他是否知道这个，并补充道：宋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但要在这一经罗斯福签字的文件的基础之上。见蒋经国：《负重之源》（音），1960 年台北版第 63 页，引自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 215 页。——蒋经国的这一陈述显然是一种虚构，因为无论在中国的或苏联的记录中都没有相应的提示。另参阅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p. 128;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3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苏中条约的谈判 1945 年 6 - 8 月》第 5 页。为什么了解中方记录的 Garver 要援引蒋的这一真实性值得怀疑的陈述，这是不可理解的。参阅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 215。Goncharov, Lewis and Xue 也援引了 Garver 的陈述，但显然没有进行考核。见 Goncharov/ Lewis/ Xue : < Uncertain Partner…… > . p

^② 此段参阅苏联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3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苏中条约的谈判 1945 年 6 - 8 月》，第 5 页。

此段详见海茵茨希：《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 1923 - 1927》，载于《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第 1 卷第 33 页及下页，第 36、39 页。

蒋介石说，现在不可能解决外蒙古问题。……我们认为必须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我们根本不准备提出这个问题。’^① 在莫斯科谈判之前，蒋介石曾向彼得罗夫指出，莫斯科在 1924 年 5 月 31 日的中苏协定中已承认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② 蒋接着说，但中国准备保证外蒙的高度自治。此外，如果中国在蒙古问题上给莫斯科以特许权，那么，伦敦就会在西藏要求类似的特许权。

7 月 2 日，斯大林反驳了宋，并坚定地指出，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的“独立”。对此，他提出了许多理由。他从日本侵略性的角度提出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利益。即使日本战败了，但它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一样，经过 15 年至 17 年重新再起。苏联必须有权用自己的军队保卫外蒙古领土。这既对蒙古，也对中国有利。斯大林强词夺理地说：“我们强大了，中国也会强大。”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希望属于中国，而力求“自主生存和民族独立”。斯大林厚颜无耻地、不无威胁地提出这样的论证：“放弃外蒙古，这对中国更有利。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外蒙古将会成为联合所有蒙古人的一个因素，这对中国也是不利的。”^③

斯大林接着说明了苏联在缔结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协定的动机。他说，在涉及旅顺口、中长铁路、南库页岛和外蒙古等方面，苏联首先考虑的是，必须加强它反对日本战略地位，以便同中国一起打败日本。不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或是旅顺口，或

苏联记录，出处同上，第 4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苏中条约的谈判 1945 年 6-8 月》第 5 页及下页。

^② 此段参阅 1945 年 6 月 26 日蒋介石与彼得罗夫的谈话，引自 C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216。——关于 1921 年协定签订后外蒙的实际状况参阅海茵茨希：《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 1923 - 1927》第 39 页。

苏联记录，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4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苏中条约的谈判 1945 年 6-8 月》，第 6 页及下页。

是中长铁路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而不是为苏联谋取某种利益。第二，必须向厌战的苏联人民说明理由，为什么要进攻日本。^①

中方从一开始就在蒙古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在这方面，蒋介石感到罗斯福和杜鲁门的解释对其有利。雅尔塔协定中的表述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这意味着中国在法律上保持宗主权。^② 谈判一度在蒙古问题上陷入破裂的危险。按中国人的历史认识，外蒙古和内蒙古自 13 世纪元朝就成为中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蒋介石不得不担心，放弃外蒙将在中国舆论界引起对他作为中华民族自觉的卓越代表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此外，外蒙的战略地位在双方考虑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斯大林显然担心，如果外蒙属于中国，那么日本、美国和将来强大起来的中国就可以从外蒙威胁西伯利亚大铁路。而蒋介石则担心，如果苏联占领了外蒙，它就可以从那里发动对北平的迅速进攻。^③

7 月 2 日，宋坚定地表述了中国的立场。他说，斯大林没有理解中国关于蒙古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宣布“它放弃其部分领土”。它现在不提这个问题，“不去惊动酣睡的狗”。如果中国政府放弃过去曾被苏联承认为中国组成部分的外蒙，那么，它“在人民中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斯大林曾说过，他希望中国形势稳定。这最好是不给中国增加困难。为避免出现困

苏联记录，出处同上，第 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7 页。

^② 1945 年 3 月罗斯福把这一点告诉了魏道明（音）大使，杜鲁门于 7 月 8 日通过哈里曼大使“私人地”和“秘密地”通报了宋子文。7 月 4 日杜鲁门对哈里曼作了这样的解释，维持现状意味着“中国在法律上仍保持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实际上并不行使”。见 1945 年 3 月 12 日魏道明给蒋介石的电报，引自 Liang Chin-tung: < The Sino-Soviet Treaty > . p.374 杜鲁门：《回忆录》，1955 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一卷第 304 页；Garver: <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 , p.215 f.

参阅 Garver: <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 . p.215 f.

难“我们现在不提外蒙古问题”。^①

在 7 月 7 日举行的续会上，双方继续在这一问题上争吵，并都援引 2 月 11 日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蒙古问题的惟一一句话：“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②但双方对维持现状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宋从法律上进行解释，即：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③从 1924 年 5 月 31 日中苏条约的角度看，宋是有理的。而斯大林从实际状况来理解，并认为，人们必须把它“理解为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④这时，宋声明，他的政府不反对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外蒙古，并以此来回答苏方。宋接着恳请斯大林“只要了解一点就够了，如果一个中国政府只要承认外蒙古独立，没有不垮台的”。斯大林无动于衷地反击道，苏联政府承认了芬兰的独立，却并没有垮台。^⑤宋反驳了这一对比。接着，斯大林威胁说，如果中国坚持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将什么也谈不成”。宋再次请求考虑甚至中国舆论界中最自由主义的代表都不会支持中国政府放弃外蒙古。甚至共产党人也将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政府。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经过近一个小时后无结果地结束了。

这时，蒋介石为打破僵局作了一个不寻常的尝试。他指示他的儿子在第二天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谈话。蒋经国向彼得罗夫宣称，他作为其父的“非正式代表”本着相互理解的精神，来说明

苏联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5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7 页及下页。

② 协定文本中是斜体字。

③ 1945 年 7 月 7 日苏联记录，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20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28 页。——参阅 Garver 对会议的综述，见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218. f.

此段阅俄罗斯档案，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21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29 页。

此段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22、24、25、2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30、32 及下页、35 页。

已经变得复杂的形势。他担心，谈判会进入死胡同。彼得罗夫作为了解中国的人应当明白，蒋介石考虑到中国的舆论，不可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彼得罗夫强硬地坚持，外蒙古“实际上是独立的国家”，接受苏联提出的声明意味着“只是承认事物的实际状况”。蒋经国说，如果没有蒙古问题，一切都会很好，因为宋子文原则上已同意苏联关于条约和协定的草案。彼得罗夫无动于衷地回答说，如果中国代表团不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谈判将很难走出死胡同”。^①

这里可能涉及蒋经国后来所说的与斯大林进行的谈话（没有注明日期）^② 如果这一说法是事实，可以认为，蒋经国提高谈话对手的身份为的是提高他自己的身价。但是，蒋经国重述的谈话内容与彼得罗夫的笔记内容是不同的。蒋经国说，斯大林直言不讳地向他指出，中国是提出请求的一方：“但是你们必须明白，今天是你需要我的援助，而我并不需要你们的。”他需要外蒙古是出于军事和战略的原因。如果一支军队从外蒙古出发进攻苏联，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那么，我们就完了”。斯大林指出，潜在的进攻者可能是日本、中国和美国。斯大林以严肃的表情说，只要他得不到蒙古，他将永不满意。不管蒋经国与斯大林的

彼得罗夫关于 1945 年 7 月 8 日与蒋经国谈话的笔记，复印件（没有文件号）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 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36 页及下页。

此段参阅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1974 年，第 67-70 页，引自 Keiji Furuya: < Chiang Kai - shek, His Life and Times >, p. XXX - XXXII. 另见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 217; Liang Chin - tung: < The Sino - Soviet Treaty > p. 380. Garver 依据的是蒋经国公布的记录。Liang 援引的是蒋经国：《负重之源》，台北，1960 年，第 67 页。——列多夫斯基曾可以进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查阅斯大林谈话记录，他找到了蒋经国与彼得罗夫的谈话记录，但没有找到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话记录。可以设想，如果这份记录存在的话，有可能因新闻检查而继续被关闭，因为斯大林关于外蒙主权问题的谈话太赤裸裸了。——从 1945 年底至 1946 年初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话来看，可以证明，蒋经国的陈述是不准确的。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六节。

谈话是否确有其事，但蒋经国陈述的斯大林的申辩与斯大林在外蒙问题上的真实打算是非常接近的。

在 7 月 9 日的会议上，蒙古问题出现了突破。这显然是由于斯大林的不妥协的态度，以及美国不愿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干预。蒋介石认识到这一点后改变了想法。他下决心在蒙古问题上作出让步，只要斯大林在满洲、新疆和中国共产党人问题上能满足他的愿望。宋在会议上宣读了包含这些愿望的蒋介石电报。这导致了以下结果。^① 第一，苏联必须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准备与苏联一起利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并使大连成为自由港 20 年。但是旅顺口和大连应由中国实行行政管理，“因为只有在此条件下才能保证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样，中长铁路 20 年共同利用，利润平均分配，但行政管理权归中国。第二，在新疆，苏联应帮助中国平息那里的起义（原文：“平息动乱”），并恢复交通和贸易。第三，莫斯科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国民党政府，而且把给予中国的援助全部提供给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的电报接着称，既然外蒙古问题已成为中苏谈判中的障碍，“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世界持久和平的利益”，中国政府准备在击败日本和上述三个条件满足后（原文为：“上述三项达到目的之后”）；同意蒙古独立”。但在此之前那里应进行公民投票。蒋在结束其电报时郑重提出，中国政府希望“苏联能够理解中国作出的巨大牺牲，并且理解中国为保障和平和中苏两国持久合作作出牺牲的诚意”。

此段和下段援引的蒋介石电报内容依据的是苏联 1945 年 7 月 9 日会议记录复印件中包含的电文，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30-31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40-42 页。——这显然是蒋于 1945 年 7 月 6 日给宋子文的电报。参阅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1995 年，第 487 页。——Garver 在叙述该会议时没有谈到蒋的电报，见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 p.220 f.

如果蒋介石希望斯大林能对中国在蒙古问题上的承诺表示高兴和感谢，那他就错了。斯大林首先抨击了宋在此之前所讲的一段话，宋说，他在 1933 年曾不顾日本的压力拒绝承认满洲的独立。斯大林不高兴地问道，宋是否把满洲和蒙古相提并论？宋否认，而莫洛托夫回击说，实际上已相提并论了。接着，斯大林重复了他对雅尔塔协定中“维持现状”这一概念的解释。宋也回应了他的理解。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说，实际上 24 年来，中国的这种主权已不复存在。斯大林希望中国立即宣布放弃外蒙，而不是战败日本之后，并认为公民投票不会给中国带来好处。^①

斯大林在蒙古问题上作出了这种冷淡的反应之后，转入蒋介石提出的 3 个条件。他首先谈了第三个条件，它涉及莫斯科与中共的关系。由于这对本书的主题有重要的意义，故需逐字逐句援引。斯大林说：

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也不打算这样做。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在中国领土上还有第二个政府，那么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大家知道，从前我们只援助蒋介石政府。今后也将如此。如果今后需要援助中国，那么这种援助只能给予蒋介石政府。^②

显然，为了赢得中国方面的信任，相信其表白的真诚性，斯

此段参阅 1945 年 7 月 9 日会议的苏联记录，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31-34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42-45 页。

^② 1945 年 7 月 9 日会议的苏联记录，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32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43 页。——参阅中国记录中基本相同的文本内容，引自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 p.221 f.

大林告诉宋子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孙佛），国民党高级干部，在秘密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提供重要情报。^①

当宋子文在谈话过程中问及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时，引出了下面的对话：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做些什么。看来是希望苏联不要把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而把一切援助直接交给蒋介石政府。

宋答，正是这样。

斯大林同志说，他同意这一点。他又问，中国政府是否希望苏开始解除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武装。^②

宋说，这种要求是不现实的。他指出，中国政府力求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

斯大林同志指出，如能找到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那就好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很好的爱国者，他们卓有成效地同日本人作战。

宋说，中央政府力图把军队合并，在全国建立统一的政权。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中国必须只有一个军队和一个政府。^③

这段话在列多夫斯基和 Carver 的援引的苏联和中国的记录中都没有。它见于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p.130。Murray 的依据的是他引自共和国外交部档案（台北，外交部档案咨询处）的中国记录。

在这段话之后，中国记录用括号作了一个注：（斯大林笑了）。见 C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 p.221。

③ 1945 年 7 月 9 日会议的苏联记录，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38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48 页。——Carver 援引中国记录在内容上基本相同。但在末尾还有两句话，这在苏联记录中是没有的。接着宋说，他的政府准备吸收共产党人加入拟议中的战时内阁和军事委员会；但人们不允许他们反对政府。斯大林支吾其词地回答说，当前的形势确实没有给人一良好的印象。见：C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221。

斯大林的这一表示是与 2 月 11 日雅尔塔协定相一致的。协定在最后一段规定，苏联有义务支持由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中国及其武装力量，以便使中国从日本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斯大林说，苏联迄今为止没有在物质上支持过中共。这基本上符合实际。至于他宣布将来也不打算这样做，这并非很认真，至少将不包括满洲地区。看来，斯大林在谈判过程中就已考虑到要在这方面撕毁 8 月 14 日的中苏条约。下面援引的这段对话，清楚地表明苏联今后将奉行两面派的对华政策。

针对蒋介石提出的第二个关于新疆的要求，斯大林问，他是否应派遣军队。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提出苏联应制止从苏联边界向新疆的武器走私。按苏联的记录，斯大林对这种走私是否存在表示了怀疑，并对中国的要求没有作出直接的反应。^①按中国的记录，斯大林宣称，准备制止走私。^②

斯大林明确表示，他不同意蒋介石关于满洲的要求。虽然他宣称，将放弃 1898 年 4 月 25 日条约划定的中立区（即旅顺口附近的地区）的俄国特权。但是，关于旅顺口本身，他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港内的行政管理必须归苏联。从雅尔塔协议的角度看，这个要求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协议在总体上规定恢复俄罗斯在 1904 年以前所拥有的权利，并具体达成协议，重新把“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租借给苏联”。关于中长铁路，斯大林说，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两条铁路现在就归中国所有。……这些铁路是俄国人用俄国资金修建的”。宋指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况且，苏联已把铁路卖给了日本人。斯大林尖刻地回答说，蒋介石的电报给人以印象，似乎承蒙中国的恩赐，苏联才能使用这条铁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3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47 页及下页。

②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 p.220.

路。他坚持共同所有。^①

7月9日，双方在蒙古问题上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但成了一个原则性的一致意见：剩下的主要是承认的程序和时间问题。宋对此向莫洛托夫作了如下表述：“我们现在……已就事情的实质取得一致，剩下的只是形式问题。”^②

这项一致意见为解决条约谈判中的一切艰难问题扫清了道路。接着，在双方交换了条约和协定草案之后，于7月10日开始了宋与莫洛托夫之间的会晤，7月12日谈判正式结束。11日，斯大林宣布，同意中国在战胜日本和公民投票后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但宋必须作出让步，在有关的共同声明的开头必须说明蒙古人民已多次表明了他们的独立愿望。^③余下的争吵围绕着外蒙的边界问题，中长铁路的所有权问题，苏联军队在沿铁路线的驻扎问题，苏联用铁路运输部队问题，苏联要求在大连也驻扎其军队问题等。围绕着苏联在大连和中长铁路地区的“优越权利”方面展开了争吵，对雅尔塔协定中使用的“苏联的优越权利”这个概念方面也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困难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精辟的、只有11个句子组成的雅尔塔协定，它具有很大注释可能性。^④

7月13日，会谈中断，因为斯大林必须离开莫斯科，去参加波茨坦会议（7月17日至8月1日）。蒋介石曾试图让杜鲁门

此段参阅 1945年7月9日会议的苏联记录，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32-33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43 页。

② 1945年7月10日会议的苏联记录，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同上，第 41 页 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52 页。

③ 1945年7月11日会议的苏联记录，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同上，第 55 页 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66 页。

④ 此段参阅 1945年7月10日莫洛托夫与宋子文谈话的苏联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同上，第 39-53 页 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49-53 页；1945年7月11日和12日会议的苏联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同上，第 54-64、66-69 页 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64-78 页。

在会议期间按中国的意思对斯大林施压，但失败了，因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明确表示，苏联进入太平洋战争的日期取决于中苏谈判的圆满结束，而杜鲁门感兴趣的是苏联尽快参战。相反，杜鲁门敦促蒋介石与斯大林“继续你的努力，以达成全面的谅解”^①。随后，宋辞去了外交部长职务，由王世杰接替。宋特别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比蒋介石还强硬，他显然担心，放弃蒙古将有损于他的荣誉。美国驻重庆大使赫尔利从背后攻击中国人，他向其苏联同事彼得罗夫通报了杜鲁门对蒋介石施压的情况，并建议苏联方面通过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劝蒋介石召回宋子文这个“大反对派”，如果他因其“虚荣心”而阻碍谈判的话。彼得罗夫拒绝了，他指出，这将造成一起重大丑闻。蒋介石于 8 月 6 日派宋作为会谈领导人回莫斯科，尽管宋也请求解除这一职务。^②

当 8 月 7 日第二轮中苏谈判在莫斯科开始时，美国对苏联的兴趣发生了变化。7 月 16 日一颗原子弹首次在新墨西哥沙漠中试验成功。这件事和 8 月 6 日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促使对日战争有可能更早地结束，这也使美国对苏联参战的兴趣降到了零。^③然而，斯大林感兴趣的是使苏联在战争结束前出现在满洲。因此，他匆忙地于 8 月 9 日让红军进军满洲。这同时也促使中国方面增强了尽快缔结条约的兴趣，当 8 月 10 日东京接受盟军关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时，情况更是如此。杜鲁门放弃了在莫

杜鲁门 1945 年 7 月 23 日给赫尔利的电报，引自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vol. II, p. 1241。

此段参阅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vol. II, p. 476 杜鲁门《回忆录》，1955 年斯图加特的文版，第一卷，第 301-307 页；1945 年 7 月 27 日赫尔利与彼得罗夫谈话的苏联记录，复印件，AVP RF（俄罗斯·…·档案馆）（未注明卷宗号）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82-84 页；Garver: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p. 222-224。

此段参阅 Alexander: <The Strange Connection>, p. 33。——然而，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试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似乎在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后仍然对苏联尽快参战感兴趣。参阅杜鲁门《回忆录》，1956 年斯图加特的文版，第二卷，第 437 页。

斯科谈判中的克制态度，并于 8 月 8 日要求斯大林不要逼迫中国给予更多的租借地，主要是指，不要把大连纳入苏联军事区。^①

8 月 10 日的会议^②表明，蒙古问题依然是最引起感情冲动的争论焦点。这可从以下的记录摘抄中看出：

宋说，中国代表团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上以及旅顺口等问题上是作了很多让步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就不必再讲了，因为对中国来说，蒙古早就已经丢掉了。

宋说，外蒙古占中国领土七分之一。

斯大林同志对此指出，外蒙是块沙漠。^③

按中国的记录，斯大林为加强最后一句话还作了补充：“广东省的一小块土地的价值要高出它二十倍。”^④

此外，杜鲁门对斯大林的压力和中国对尽快缔结条约而增强的兴趣，促使苏中双方在旅顺口和大连问题上相互作出妥协。斯大林承认中国在新疆的不受限制的主权，斯大林说：“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在那里可以做一切想要做的事。苏联不想干涉新疆省的内政。”^⑤这对中国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承诺，因为苏联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对这一边疆地区举行过大规模的干预，并

同上，第 224 页及下页。——并参阅 Warren I. Cohen: <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 . New York /London/Sidney/Toronto, p.181.

^② 苏联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83 - 91 页 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95 - 103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同上，第 84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96 页。

参阅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 p.140 (中国记录 摘引自“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

此段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87、89 页 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99 - 101 页。

在 1943 年、1944 年对新疆所属的阿尔泰和伊犁地区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人的起义给予了军事支持。^① 为满足中国的要求，斯大林说，苏联军队最晚在三个月内撤出满洲。在会议结束时，尚未达成一致的是：关于旅顺口和大连的行政管辖和使用的细节，中长铁路的行政管辖，以及中国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在边界（苏联的意见），或重新确定边界（中国的意见）。

宋显然担心，如果不明确作出划定，那么，1911 年以前属外蒙，而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划归新疆的阿尔泰地区的一部分，会被苏方视为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② 斯大林也许是真的，也许是故意猜疑中方别有他图。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寻找借口”，以划界要求收回已作出的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诺“，就应当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讲清楚”。^③ 此外，他还试图施加压力，重新提出他原先的关于立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要求，并提及所谓“蒙古人”存有吞并内蒙的意图。他说，必须对他们提出警告，并为此而建议不要提出改变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的要求。

在 8 月 10 日的会议上，重新谈到双方对中共的关系。当时，斯大林对国民党在满洲向共产党人发动进攻提出警告。在谈到关于满洲和新疆问题的苏联声明草案时，中方要求删去其中一句关于全国统一和民主化的词句，因为这是一个中国的内部事务。此时，斯大林说：如果今后国民党军队将进攻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政府未必能得到我们的支持，因为提供这样的支持将是困难的”。苏联不想干涉，但如果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旦发生冲

^① 详情参阅 Han - jung Ziemann: 《新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1917 - 1945 》，德国波鸿 1984 年版，第 246 - 252 页。

关于阿尔泰地区参阅 Carver: < Chinese Soviet Relations >, p.226.

此段参阅 1945 年 8 月 10 日会议的苏联记录，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89 - 90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102 页。

突“，苏联要在道义上支持国民政府将非常困难”。^①

斯大林还是同意删去这段有争议的话。但他指出，苏方已作出很多让步，“看来中国共产党将要骂苏联政府同意接受有关支持国民政府的上述条款”。这是指声明草案中的这一条款，其中说，苏联政府有义务向中国提供道义的、军事的和其他物质支持，“这些支持和援助将全部提供给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②宋回答说：国民政府是真心诚意地想同共产党合作，也不愿意打内战；说国民政府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那是不正确的；是共产党的军队首先发动进攻，挑起了冲突。宋说，共产党人不大愿意这个条约和协定得到签订。斯大林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十分可悲了。^③

8月12日代表团会谈结束。斯大林没有出席最后的结束会议。会议留下了六个还有争议的问题：旅顺口和大连的民事管理、旅顺口的混合军事委员会、大连港的建筑和设备的所有权、中长铁路的管理、经中长铁路运输的苏联物资的海关检查、以及大连港口指挥官的法律地位。莫洛托夫要求把旅顺口和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划归苏联；宋只愿意给苏方以顾问和咨询权。莫洛托夫坚持在旅顺口混合军事委员会中占据优势地位，并由苏联担任主席；宋要求委员会的组成实行对等，并由中方担任主席。莫洛托夫坚持大连港所有建筑和设备归苏联所有；宋认为应属中国，但准备将其中一部分租赁给苏联。莫洛托夫认为，组成中长铁路的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同上，第87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100页。

^② 参见1945年8月14日的换文，载于《Treaties Between the Republic》，p.508 f.；《苏中关系1917-1957年一文件汇编》，1959年莫斯科版，第205页及下页。——原先计划的声明后于1945年8月14日以换文形式出现。

此段参阅1945年8月10会议的苏联记录，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2，第88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99页。

两条铁路的理事长必须是苏联人，他的代表可以是中国人；宋提出，两条铁路中的一条可以按莫洛托夫的意见安排，但另一条则反过来，由中国人担任局长，苏联人担任副局长。莫洛托夫坚持，在苏联与旅大之间的运输的苏联物资不应纳税，也不受海关人员的检查；宋只同意后一项。苏方认为大连港的主任应是苏联人；中方认为应是中国人。^①

8月12日与莫洛托夫的会谈没有涉及蒙古问题，但在中方出现了一个戏剧性发展。蒋介石在同一天致中国代表团的电报中坚持，必须先确定边界，然后承认其独立。宋和王都认为苏方不可能作出让步，为尽快签字，他们最后没有理会蒋的指示。^②

在8月13日至14日午夜开始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宋宣称，蒋同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现有的边界内”的独立。这样，谈判中最大的绊脚石，“蒙古障碍”终于被清除了。^③

在中长铁路方面，大家统一到斯大林的一个妥协建议上：理事会按对等原则组成，中国的理事长将有两票，而铁路局长则由苏联公民担任。关于海关检查，以和解方式解决，只有军用品不受检查。在大连资产所有权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意见大连港归中国所有，但部分设施无偿租给苏联。宋也同意了莫洛托夫提出的中国不把设施租予第三国的建议，但请求不把这一点写入书面文件。斯大林表示同意，但补充说，希望中国政府“不会欺骗自己的盟国”，不会违反口头协议。宋说，如果这样，将是犯罪。

在大连港的主管问题上达成的妥协是：港口主任由大连市长

^① 1945年8月12日莫洛托夫与宋子文会谈的苏方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7，案卷507，第108-113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104-106页。

^② 详见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225.

此处和以下三段参阅1945年8月13日会议的苏联记录，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2，第93-97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106-110页。

征得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局长同意后任命苏联公民担任，他的副手应是中国人。在旅顺口的军事管理方面双方一致同意，在军事委员会中苏方在人数上占有多数，主席也由苏方担任。而民事管理是中国人的事，但必须照顾苏联的利益。民事行政机构的领导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指挥当局的同意。

会议以一场关于进军满洲的苏军财政问题的争吵而结束。斯大林估计战争结束时驻军将达 100 万，并要求中方承担苏军的给养。宋提出不同意见，说中国在八年战争之后，国家已被摧毁，政府连自己的军队都不能供养。美国支付其军队的费用，并按租借法案给中国提供帮助。斯大林回答说，美国是个非常富有的国家。莫洛托夫威胁说，这样，军队就不得不从居民那里弄到给养，这将意味着更糟。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商定将就财政问题准备几个方案，以便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方案。

关于“战利品”，即日本在满洲的投资的所有权问题，会谈没有涉及。^① 杜鲁门从哈里曼那里得知，斯大林在 8 月 7 日再次进行谈判时谈到满洲的“战利品”问题，并提出苏联要占用部分日本财产，但在宋子文追问下，这个问题被回避了。哈里曼提醒杜鲁门说，如果苏联像在德国那样来解释“战利品”，他们就可能“全部撤除满洲的某些工业……”。哈里曼的判断是对的：没有澄清的法律状况后来被苏联军队所利用，他们拆卸了绝大部分满洲工业设备，并运往苏联。^②

此段参阅杜鲁门：《回忆录》，1955 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第一卷第 436 页及下页；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228. — 在苏联记录中关于“战利品”话题，只有以下一段对话：“宋子文提出了把将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军用物资全部移交中国的问题。斯大林说，满洲的军用物资问题可以讨论。”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79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第 94 页。虽然这个问题实际上后来没有再谈，但哈里曼提到的斯大林的简短表述是真实的。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在 8 月 14 日签署全部条约和文件的那一天，宋与莫洛托夫举行了最后一次会晤，并签订了一个秘密备忘录。^① 其中，以下述行文规定了苏联军事人员的行为受特别法庭审理的可能性：“俄罗斯军事法庭和军事官员拥有对其武装部队全体人员的所有审判权。”^② 备忘录之所以要保密，很可能是因为蒋介石担心它的公开将会引起中国公众舆论的强烈抗议。此外，也许还考虑到美国和英国的干预，他们在 1943 年已放弃了所有治外法权。^③

5、谈判结果

如果把双方谈判的最初立场与谈判结果相比较，人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旅顺口的管理方面，斯大林没有实现其全部由苏联掌管的要求；同样，蒋介石也没有实现其完全由中国管理的愿望。结果是“共同利用”：中国负责民事管理，但苏联对此有一定的影响；苏联负责军事管理，但中国有较大的参与。中国以此绕过了“租借”这个对它来说是蔑视性的用语，而原先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的是把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租借”给苏联。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大连的方面。在所有权问题上，这个方面的要求得到了完全的贯彻。在中长铁路问题上，蒋介石原先要求完全由中国管理，但结果是实行共同经营和盈利均分。在往来于旅大与苏联之间的苏联物资是否需经海关检查的问题上，也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如果斯大林固执以雅尔塔协定为法律依据，在满洲方面

^①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Victor Hoo Collection, Box 7, 14 August 1945, < Meeting between Dr. Soong and Mr. Molotov > ,引自 Elleman; <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 , p.81。

^②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V. Soong Collection, Schedule A, Box 25, 14 August 1945, < Treaty of Alliance > ,引自 Elleman; <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 , p.81. 从用词“俄罗斯”，而不是“苏联”来看，此句可能出自中方提出的草案。最终文本迄今未见。

^③ Elleman; <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 . p.75。

坚持要求恢复俄国 1904 年前的权利，在大连和中长铁路方面坚持应保证“苏联的优越权利”，那么，斯大林有可能实现其最大限度的要求。

从以上所作的小结中可以看出，那种偶尔出现于文献中的、认为斯大林所有愿望都得到了满足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① 蒋介石也只是在表示准备接受斯大林在蒙古问题上的要求之后，才有可能说服斯大林作出上述妥协。在经过艰苦抵抗之后，当他从杜鲁门那里得不到援助时，他认识到，只有放弃外蒙古，才能在其他有争议的领域获得有利地位。但他坚持，不是立即，而是在战胜日本之后，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但这只不过是很小的成果。至于承认独立要取决于公民投票这一协定，也同样不是重大成果。蒋介石知道，公民投票的结果肯定是亲苏的。

据蒙古政府委员会关于 1945 年 10 月 20 日公民投票的执行记录称，百分之百的参加者赞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没有一张反对票。^② 这一闹剧的结果是在苏联通过宣传、压力和作假等方式的干涉下产生的。记录也表明，公民投票并不是秘密的；每张票都必须写上姓名，如果是文盲，则要在票上按手印。^③ 据一位苏联谍报人员的报告称，有些蒙古人认为，公民投票是在莫斯科倡议下进行的，“其目的是随后占领蒙古，并将它并入苏联”。^④ 然而，可以认为，由于对中国统治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即使实行自由表决，多数居民也会赞成“独立”，即宁愿成为苏

例如 Zubok 和 Pleshakov 认为斯大林利用了进军满洲、控制新疆北部和中共作为王牌，以“获得他所希望得到的所有特权”。见 Zubok/Pleshakov: <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 p.56。

^② 此处和下句参阅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民投票结果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P.18，案卷 235，第 129-133 页。

同上，第 124-127 页。

鲁疆宁：《雅尔塔会议与二战前夕和二战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律地位的形成问题》载于《远东问题》1995 年第 6 期第 59 页。——鲁疆宁依据的是未公开的俄罗斯档案文件。

联保护国也不愿回归中国。就这样，1946年1月5日，中国在公民投票之后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①

斯大林对这样的谈判结果应感到满意。苏联以很小的代价，即参与对日作战仅10天，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它对外蒙的实际统治，以及重新赢得当年沙皇在满洲的大部分特权。因此，苏联大大改善了它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重新获得中长铁路的权利，这意味着缩短了苏联欧洲部分与苏联远东地区的铁路联系。通过对旅顺和大连不冻港的利用，苏联海军舰队和商业船队获得了进入太平洋和世界海域的更有利条件。莫洛托夫的报告在描写斯大林在战争结束后的胜利喜悦时说，在其别墅里，斯大林面对墙上的挂图畅谈苏联在东方的收获，他说：“千岛群岛现在是我们的，萨哈林岛完全是我们的，看，这多好！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斯大林用烟斗指向中国——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 蒙古，一切都已正常……”

而国民政府，鉴于其软弱的国际地位，总体上对这项条约也不是不满意的。它被莫斯科承认为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被称为苏联援助的单独接受者，这就排除了令人担忧的对中共的支持。在满洲问题方面，重新获得了领土主权。在1927年至1928年夺得政权后直至1931年，它只是名义上拥有主权，而从那以后满洲完全不受其控制。莫斯科在30年代和40年代不断插手新疆之后，承认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并承担了不干涉的义务。而蒋介石必须吞下的苦果是在法律上确认外蒙的独立。聊以自慰的是这一事实：外蒙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实际上已被苏联所统治。让蒋介石感到不舒服的还有确认苏联在满洲的特权，但鉴于上述在其他领域的获利，这也可视为能够承受的损失。蒋介石在这方面的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P.18，案卷235，第126页。

② Feliks Cuev, *Sto sorok besed s Molotovym*, Moskau 1991, S.14.

出发点是：苏联军队将按条约将满洲的政权交给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人，因为斯大林不愿拿在雅尔塔获得的好处去冒险。^①

国民党的报纸，如《中央日报》，把这一条约的签订作为一项巨大的胜利而加以庆贺，说它是“改变整个人类历史的划时代文件”。对此，人们是不会感到意外的。^② 其他新闻报刊同样充满了赞扬，只是偶尔见到对放弃外蒙的批评。^③ 北京燕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在一份给蒋介石的秘密报告中批评说，放弃外蒙古和给苏联以满洲的特权是为与苏联建立反日同盟而付出的过高的代价。^④ 他解释说，因地理上的邻近，这两个地区对中国的“稳定”（意指安全）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他建议作为对应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拥有特权而带来的威胁，应尽快把首都从南京迁往北平。在签约三天之后，宋子文向杜鲁门表述了这样的看法：只有在中国强大之时，斯大林才会遵守该条约。^⑤ 显然，许多老国民党人对条约是不满意的，但他们在舆论面前保持了沉默。^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最高国民国防会议不顾这类批评意见，于8月24日一致批准了该项条约。蒋介石在条约签订后对赫

此段参阅 Irye: < The Cold War > . . . p.122; Cohen: < America's Response > , p.181 f.——宋子文曾对哈里曼表示，他对谈判结果是满意的。此段参阅 1945年8月14日哈里曼给杜鲁门的报告，见：FRUS.1945.Vol.VII, p.972.引自 Bagby: <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 . . . p.216, 263 (Note 44)。

此段参阅 Andrei M. Ledovskij : < The World Reaction to the Soviet - Chinese Treaty > , in: Tai Wan - chin (Ed): < The 1945 Sino - 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 . Taipei 1995, p.153 ff. . . passim。

同上；C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 p.229。

这份 1945年9月10日的报告被重新发表于 Brian Joseph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Soviet -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 - 1950 > . Ph.D. Dissertation,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nn Arbor, Mich.1995, p.141 - 144。

^⑤ 1945年8月18日宋子文致蒋介石的电报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6。

^⑥ 此段参阅 Wei: < China and Soviet Russia > , p.184; Cheng: < A History > , p.274。

尔利大使说他“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①在这几天里，外长王世杰对赫尔利，以及蒋夫人对杜鲁门都表示了类似的意思。王世杰在其日记中满意地写道，由他在莫斯科签署的条约将极大地限制中共的活动余地。^②国防部长何应钦高兴地说，“这个条约将使共产党人感到极大的失望”。^③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书籍中也承认，国民党代表团在条约的谈判中表现是勇敢的。^④

第三节 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同盟条约： 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背叛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8月14日条约的签署犹如遭到一次休克性的袭击。在第二天得知条约签署后，他们在外国谈话者面前显得“被伤害和被弄糊涂了”显得有些“惊慌失措和混乱无章”他们感到被蒋介石出卖了。^⑤在2月11日雅尔塔协定的会谈期间以及在中苏条约谈判期间，斯大林既没有与中共领导协商，也没有向他们通报情况。^⑥当时周恩来对美国观察团团长说，中共正等

此段参阅 <The China White Paper> . p.120 f.

②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 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 New York 1993, p.94.

同上。

例如参阅石元华（音）：《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1994年，第625页。

详见 Wesley M. Bagby: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Americ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World War II> . London/Toronto 1992. p.217;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 p.182.

⑥ 许岿（音）：《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香港，1993年版第3页（许曾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军队档案馆参阅）；1949年8月15日美国观察团团长 Yeaton 给威德迈关于同周恩来谈话的报告，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引自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 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 New York 1993.P.80.; Reardong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72; 刘志青（音）：《试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载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1988年第2期第73页。

待国民党军队在数日内的进攻。^① 1945 年底 斯大林在谈到这一条约时也证实，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不认可这一文件。^②

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在欧洲战争结束时认为，美苏对峙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的主要矛盾。^③ 他们以为，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是派生或隶属于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对峙。但当他们得知雅尔塔协定的签订时，他们不得不惊讶地看到，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不仅有对峙的一面，也有合作和妥协的一面。在中苏条约签订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陷入了混乱。他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大使是对的，这位大使确信，条约不容怀疑地表明苏联是支持蒋介石的。^④ 他们对莫斯科在满洲牟取特权也感到震惊。^⑤ 在此前不久，他们还确信，苏联将不会为进军满洲而要求“租借地和特权”，因为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成为过去。^⑥

8 月 8 日苏联向日本宣战。第二天，苏联军队就进军中国，

周恩来与 1945 年 8 月 15 日对 Yeaton 的讲话，引自 Odd Arne Westad: <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 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 New York 1993. P.80.——据一位苏联作者称，周恩来在 70 年代说，这个条约给蒋介石“以这样的信任，他有权力发动反共的内战”。但在其指出的材料来源（1973 年 10 月 27 日的《纽约时报》）并未找到周恩来的类似说法，在 1973 年 10 月 29 日（《纽约时报》）刊登的周恩来答记者问中也没有找到。参阅巴扎诺夫：《中国和外部世界》，莫斯科，1990 年，第 36、345 页和注 20。

^② 1945 年 12 月 30 日斯大林与蒋经国的谈话，引自苏联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1，第 102 页（原件复印件）参阅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1945 年 12 月—1946 年 1 月蒋介石儿子在莫斯科的秘密访问》，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6 年第 4 期，第 112 页。

此段参阅 Chen Jian: <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 - American Confrontation >, New York 1994, p.17.——参阅杨奎松：《苏联因素与 40 年代中共对美政策》，载于《中国历史》1992 年第 1 期，第 23 页，但看法有些出入。

^④ 1945 年 9 月 6 日赫利尔，引自 Bagby: <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 p.217。

^⑤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p.262, 及有关注释。

^⑥ 约翰·谢伟思 1945 年 3 月 14 日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的笔记，见于 Joseph W. Esherick (Ed.): < Lost Chance in China…… >, New York 1974, p.345, 349 f.——此段还参阅 Westad: < Cold War…… >, p.80。

但没有事先通知延安的同志们。^① 苏军向两个方向挺进，即通过北满向哈尔滨方向，以及向热河和察哈尔省方向挺进。8月10日日本发出投降请求，第二天盟军及莫斯科接受投降请求，但苏军不顾这一切继续向前挺进。在8月23日至24日苏方宣布停火后，莫斯科已在满洲驻扎了总共30万人的军队。^②

中共领导对苏联进军感到欣喜万分。他们把它看做是与国民党作最后斗争的开始信号，而在这场斗争中苏联将站在他们一边。8月9日致斯大林的祝贺电报中称，“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与苏军配合。^③ 中共领导在第二天给其下属组织的指示中断言，鉴于这一“伟大历史突变”，中共将能迅速扩大解放区，以及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④ 内战迫近。^⑤

8月10日和11日，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向各地区的部队发布命令，解除日本和中国敌伪部队的武装，占领大城市，向满洲和内蒙进发，控制全中国的重要铁路线。主要目标是控制华北和华中。为占领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山海关、唐山、济南和青岛等城市，部队进军开始。在向满洲推进的部队还计划与在那里战斗的苏军进行军事配合。^⑥

许岩（音）：《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第3页。

此段参阅 Clubb: < China & Russia…… > . p.349.

引自 Westad: < Cold War…… > , p.78.

④ 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15页及下页。

194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电报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页。

⑥ 此段参阅 1945年8月10日和11日1-7号命令，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17-225页。——参阅：《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9页；《周恩来年谱》，第一卷第613页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04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取东北……》，见《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60页；Reardon - Anderson: < Ya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00; < History of the Sino - Japanese War > . p.547 f. ; 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电报，引自周 / 褚：《共产国际……》，第430页；Westad: < Cold War…… > . p.78 f. ; Sheng: < Response…… > , p.181; Sheng: < Maoist Dualism…… > , p.199 - 204. ——关于进军满洲的详情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看来，中共与苏联共同抗击日本的梦终于实现了，这是中共早在 1935 年就梦寐以求的，它在一项决议中表示：“苏联已准备向野蛮的日本人发动攻击。这就给中国革命……和苏联的反侵略斗争赋予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共同的基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最强大的援助者。”

日本投降后，共产党人最初的欣喜受到了打击，日本司令官遵循来自重庆的、并为美国所支持的指示，全部向国民党军队投降。蒋介石指示共产党部队原地待命。华盛顿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并协助他把国民党部队运往日战区。延安掀起反美言论。除少数例外，共产党部队没有拿下什么较大的城市或交通枢纽。^②

8 月 14 日的条约和随后的苏联态度，最终破灭了共产党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及它对苏联进行有利干涉的期望。斯大林在 8 月 16 日发给延安的电报中称，苏联与美国已取得谅解。在苏联的压力下，华盛顿将不让蒋介石发动内战，并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重庆进行谈判。作为对这一承诺的回报，苏联不得不保证，它将把苏联占领的地区全部交给国民党。^③

斯大林在 8 月 20 日和 22 日的电报中劝中国共产党人在此时刻不要开始革命。他告诉中共领导，他们“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这是斯

^① 1935 年 12 月 17 - 25 日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引自 Garve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 in: TCQ, 113, 1988, p.41。

^②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 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 . New York 1993, p.81 f. ;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00.

此段参阅 Westad: <Cold War……> . p.80。

大林应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请求而提出的一个要求。^①莫斯科和华盛顿愿保证毛在重庆的安全。苏联不能支持共产党部队为粉碎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而展开的进攻计划，并劝他们首先采取和平态度，以积蓄力量。^②

显然，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对此表示惊讶和拒绝：“人民为了翻身斗争，民族就会灭亡？”^③有一点是清楚的，在秘密会议上同志们被告知，苏联的“具体政策”是“不可理解的”^④，人们只能观望。

此时，中共领导与莫斯科的关系降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最低点。各种情况表明，8月14日条约的签订和苏联随后的和谈建议，在中共领导成员中被看做是对中国革命的背叛。斯大林说，1945年底中国共产党人曾请求莫斯科给他们出主意。^⑤于是他就提出赴重庆谈判的建议，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预料到这一建议，这一建议在他们那里引起了“很大恐慌”。

斯大林的这一判断在50年代和60年代毛泽东所作的明确评论中得到了证实。毛泽东在10年后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指

^①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 p.263。

关于这两份电报参阅《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3页；《周恩来年谱》第一卷第615页许岩（音）：《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香港，1993年版第103页；师哲：《在历史伟人身边》第415页；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1942-1945年》，1973年莫斯科版第645-647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第399页；Sheng: < Maoist Dualism…… > . p.204 f.——电报文本至今没有见到。据说，在中国档案中没有这些电报，它们属于1947年党中央撤出延安是被销毁的文件；见许岩（音）：《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1993年香港版第103页。这两份电报在苏联档案中也未出现。

李海文：《毛泽东与斯大林交往》，第12页及下页。——如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档案文件所常见的那样，这位女作者也没有说明文件的出处。她是在党的档案馆工作的。

此段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03。

^⑤ 1945年12月30日斯大林与蒋经国的谈话，引自苏联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1，第102页（原件复印件）；参阅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1945年12月-1946年1月蒋介石儿子在莫斯科的秘密访问》，见《近代史与现代史》1996年第4期，第111页。

责斯大林，说他在战争结束后：

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他继续更多地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而不是相信共产党的力量。1945年他坚持主张同蒋介石分子讲和，坚持同国民党维持统一战线，坚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罗斯共产党（布）的名义发来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发来的）密电，密电中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①

两年后，毛泽东再次对尤金清楚地说明了1945年8月的形势，并指责斯大林：

斯大林在最紧要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②

毛在谈话中把当时的斯大林态度和中共领导的反应列入斯大

^① 1956年3月31日毛同尤金的谈话，苏方谈话记录，见《远东问题》（莫斯科）1994年第5期，第105页。

^②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中方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16页及下页。——并参阅余湛、张光友：《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见《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1990年，第20页及下页。

林时期两党关系中的三大严重问题之一。其他两个问题涉及莫斯科对王明的支持，以及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毛与斯大林谈判时斯大林的傲慢态度。^①

1962 年毛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恼怒地说：

他们（指苏联——作者）根本不让中国革命。那是 1945 年，当时斯大林给中国革命设置了障碍，并宣布不得发动内战，我们应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国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听从，革命胜利了。^②

1948 年斯大林供认，他在战争结束后曾劝中共领导不要进行革命，并承认（这位顽固的专制者作自我批评实属罕见），他对当时中国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于 1948 年 2 月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说：

例如，我们在战后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同他们商谈中国的形势。我们向他们坦率地声称，我们认为在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寻找与蒋介石共处的模式，参加他的政府，并解散他们自己的军队。中国同志表示同意苏联的这个看法，然而他们回去了，却完全另行其事。他们集聚武装力量，组织自己的军队，而现在，如人们所看到的，他们在打击蒋介石的军队。我们承认，在中国问题上我们错了。情况证明，

^①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中方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4 年第 1 期，第 17 页。

毛泽东在 1962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69 年，第 432 页。德文本见：《毛泽东文稿、书信、文件和讲话——德文加工和中文原件》，1982 年慕尼黑 / 维也纳出版，第 5 卷第 121 页。

中国同志是对的，而不是苏联。^①

参加这次会谈的米洛梵·吉拉斯也证实了斯大林这段谈话的主要内容：

对日战争结束时，我们曾要求中国同志就如何寻找与蒋介石达成临时协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实际上，当他们回去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集聚力量，并进行出击。事实表明，他们对了，而我们错了。^②

可以说，中共领导在 1945 年 8 月是咬紧牙关顺从斯大林的建议的。^③ 他们很清楚，如果不顺从莫斯科的要求，他们将会得罪以致失去在与国民党争斗中的惟一有潜力的盟友。此外，他们当时感到，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可能强大到赢得内战的最后胜利。显然，鉴于斯大林 8 月 20 日和 22 日的电报，在党的领导中进行了一场讨论，内战是否会伤害苏联，是否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④ 党领导立即得出结论，并毫不迟疑地改变了他们的战略。其中，主要是放弃占领大城市。在 8 月 20 日确认的夺取上

^① 1948 年 2 月 8 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讲话，见：伏拉季米尔·德蒂捷尔：《铁托传记》，1953 年柏林版第 314 页。这里不清楚的是，斯大林所说的在莫斯科与他进行讨论的中国同志，究竟指的是谁。这里所说的中国同志可能是指刘少奇和高岗。据苏联材料称，他们曾于 1945 年在苏联与苏联领导人会晤。见：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 1945—1970》简介，1971 年莫斯科版第 28 页。

米洛梵·吉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1962 年法兰克福版第 230 页及下页。此处和以下两段还参阅：多那尔德·扎科雷亚：《中苏冲突 1956—1961》，1964 年慕尼黑版第 23 页及下页；梅里克塞托夫：《40 年代……》，见《在变化的世界中的苏联和中国：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谈苏中关系的历史和前景》，1989 年莫斯科版第 28—30 页；师哲：《陪同毛主席……》第 7 页。

参阅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中文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4 年第 1 期第 17 页。

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39 页。

海的计划，在第二天就放弃了。^①就在接到 8 月 22 日电报的同一
天，中央委员会发布一项指示，其中说：

（一）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
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
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
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
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
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农村，
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部队准
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

（二）……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军在和
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
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三）在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布
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②

弗拉基米洛夫（即孙平——译者注）的“日记”在关键性
的 8 月 14 日至 22 日里，居然没有谈及中苏条约、斯大林的电报
和中共领导的反应，这是令人瞩目的。^③“日记”只是在 8 月 26

^① 1945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电报，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9
页；Sheng: < Maoist Dualism……> . p.302 f.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1945 年 8 月 22 日的指示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5 卷，1991 年北京版第 243 页及下页。——并参阅周 / 褚：《共产国际……》第 433 页
该指示的内容综述；毛泽东在 1945 年 8 月 23 日政治局扩大会上的讲话，见：《毛泽
东年谱》第三卷第 10 页；1945 年 8 月 26 日党内通信，见：《毛泽东选集》1961 年英
文版第四卷第 47-50 页，以及 1945 年 8 月 29 日中央委员会指示，见：《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第 15 卷第 257 页及下页。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 年》，1976 年东柏林德文版第 746-
753 页。——在 1945 年 8 月 16 日记载的是：延安有人认为，“苏联在确定战场时只愿
章下满洲，而忘记了中共的利益……”，同上，第 749 页。

日有这样的记载：莫斯科让延安明白其意图，即苏联将遵守与重庆签订的条约，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以避免陷入一场与美国的冲突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这对毛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①“日记”之所以没有提及这段戏剧性的事件，一种可能是，斯大林与毛就此事的联络没有经过弗拉基米洛夫，另一种可能则是，苏联新闻检查部门把有关的记载删去了。

中国领导在党内讨论时不得不逆来顺受。面对广大党员的惊讶和迷惑不解，他们又不得不试图为苏联的政策进行辩护，并美化新的形势。在中央有关指示中称，苏联真诚地支持中国革命，并允许中国共产党走自己的路，只要不直接损害苏联对条约承担的义务。某个地方党领导做了这样的解释：苏联与中国签订友好条约是为了巩固远东的和平。^②这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日本。但苏联因承担了条约义务而不能同时直接地援助中国共产党人。^③

毛泽东自己也不得不在广大党员面前掩饰其对莫斯科的愤怒，并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苏联的解释。他在8月底与同志们谈话时解释说，苏联“受维护国际和平和遵守中苏条约必要性的约束，不能任意支持我们”。类似在欧洲，苏联在那里只能插手保加利亚，而不能插手希腊，因为希腊属于英国势力范围，苏联不能在中国过多地承担义务，因为这里受美国的监护。“如果苏联援助我们，美国将肯定支持蒋介石，这将损害国际和平，并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同上，第 756-758 页。

此处参阅 1945 年 8 月 30 日中共华北局书记处的文件 引自 Garver: < Chinese Soviet Relations……> . p.263

参阅杨奎松：《苏联因素与中共 40 年代对美政策》载于《中国历史》1992 年春第 1 期第 23 页及下页；Westad: < Cold War……> . p.82。

④ 1945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与几位同志的谈话，引自杨奎松：《苏联因素与中共 40 年代对美政策》，见《中国历史》1992 年春第 1 期第 23 页。

同一天，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宣称，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现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我们的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①同一时间，他在党内说：“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②不久，他就其准备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之事对重庆的共产党人解释说，这是苏联的一项建议，要与国民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③这样一个政府“不完全符合苏联的理想，但比爆发一场激烈的内战要好”。

毛是否真地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斯大林的辩解，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至少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已经结束了，这也是他的期望，只不过它来得快了一些。

就在中苏同盟条约缔结的第二天，即 8 月 15 日，中共停止了对美国 and 国民党的敌对宣传，重新发出了友好的声音。^④延安命令其部队与美军合作。8 月底，中共中央在官方公告中表示同意 8 月 14 日的条约（关于蒙古的条款除外），并把他评价为“我国历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的条约”。^⑤无疑，作出这样的评价，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很大的克制能力。

以上三句参见 1945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10 页。

^② 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23 页。

此处与下一句参阅 1945 年 8 月 29 日毛泽东在重庆的讲话，引自 Westad: < Cold War…… >, p.80 f. 参阅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1973 年莫斯科版第 645 - 647 页。对此材料，前面一提出保留意见。从整个历史联系来看，这里提出的看法显然是不可信的。此处可参阅 Carver: < Chinese Soviet Relations…… >, p.263; 杨奎松：《苏联因素与中共 40 年代对美政策》第 23 和 25 页。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03。

^⑤ 《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 27 日引自鲍里索夫：《苏联和满洲的革命根据地（1945 - 1949）》，1977 年莫斯科版第 91 页；《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 29 日，引自刘石清（音）：《试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见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1988 年第 2 期第 73 页。

在斯大林的敦促下，毛泽东于 8 月 24 日接受了蒋介石发出的三次邀请，并于 8 月 28 日与美国大使赫尔利一起来到了重庆。^①

赫尔利曾预言，一旦苏联与重庆签订条约，共产党人将被说服与国民党谈判。现在他感到他的预言被证实了。他高兴地与国民党将军张治中一起飞往延安，去接毛泽东。^② 赫尔利曾约请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罗夫与他一同前往，但彼得罗夫拒绝了这一邀请。这可能是为了保全共产党领导的面子，以及为了不要对外界突出这是美苏的一个合谋。^③ 赫尔利在启程前曾要求苏联保证其人身安全，并得到了这一保证。^④

毛泽东在一次访问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时，向彼得罗夫大使宣称，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长期合作，但抱怨蒋介石试图维持其“一党专政”，并削弱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彼得罗夫对两个内战对手准备认真谈判表示满意，并强调维护和平以及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好处。^⑤

10 月 10 日重庆谈判中断。双方都宣称，他们均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并使达成的决议付诸实施。^⑥ 毛曾正式承诺，共产党的军队将减至 16-20 个师，但如他秘密地对彼得罗夫大使所说，他决定将通过增加师的人数来对付

参阅 Westad: < Cold War…… >, p.81 杨奎松:《苏联因素与中共 40 年代对美政策》第 23 页; Garver: < Chinese Soviet Relations…… >, p.263 (Garver 把毛到达的日期误说成是 8 月 27 日); Furuya: < Chiang Kai - shek…… > p.851。

^② < The China White Paper > August 1949, p.99; Bagby: <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 p.217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 年》，1976 年东柏林版第 759 页。

^③ 列多夫斯基:《1942-1952 年在中国做外交工作》，见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3 年第 6 期第 116 页及下页。

^④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 年》，1976 年东柏林版第 759 页。

此段参阅卡皮察:《在不同的纬线上》，见《今日亚非》1995 年第 5 卷第 13 页及下页。

^⑥ < The China White Paper > p.109。

这项协议，从而保全他的部队。^① 中心问题是，谁任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省主席，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政治权力问题未能达成一致。^② 毛于 10 月 11 日飞回延安。

在延安，主要是来自朱德方面，批评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太软弱。^③ 谈判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佯攻阴谋，是一种烟幕，在其影响下，共产党部队（在莫斯科允诺下）进军满洲^④ 的可能性变得很小了，至少没有得到确认。

1945 年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牺牲了中国同志的革命希望。他获得了两方面的利益。一方面获得了华盛顿和伦敦的承诺，保持和重新获得在外蒙和满洲的俄罗斯传统特权。另一方面他安抚了美国，并促使它在东亚地区与之合作。两个西方大国在中国的伙伴以及斯大林不得不与之合作的中国对手，均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国民政府。

第四节 莫斯科在满洲的两面派做法

中国共产党人很可能在 1945 年 8 月并不知道，斯大林在与国民政府签订 8 月 14 日条约时有意撇开了一点，即满洲问题。斯大林不仅要在那里恢复沙皇时期的特权，这在法律上已通过 2 月 11 日的雅尔塔协定和 8 月 14 日的条约获得成功；他还要长期保持这些特权，并把满洲建成一个面对尚存的、将为美国所控制

^① 1945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与彼得罗夫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0，案卷 248，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1945 年 12 月—1946 年 1 月蒋介石儿子在莫斯科的秘密访问》，见《近代史与现代史》1996 年第 4 期，第 110 页（注 21）。

^② < The China White Paper > p. 109.

^③ Reardon - Anderson :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 114, 144.

这是 Reardon - Anderson 的看法。见同上，第 114 也及下页。

的国民党中国的缓冲区，一个面对将重新强大起来的日本的前沿地带。如果满洲被中国兄弟党所控制，这一目标就最有可能实现。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斯大林自苏联军队进军满洲时起就决定，帮助他认为比较可靠的伙伴中共掌握那里的政权。^①

1、法律义务与政治目标之间的两难处境

为达到此目的，斯大林不得不采取两面派手法。对外，他不得不给人以印象，似乎他是按 8 月 14 日条约规定的条件行事的，苏联承认国民政府为惟一的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拥有对满洲的充分主权。^② 8 月 14 日签订的一项关于战争中在满洲合作的协定，原则上规定，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满洲地区将移交给国民政府。^③ 但关于军事权限，协定没有作明确规定。协定中有一处（第 1 款）称：在作战地区，苏联军队司令拥有“最高权力和责任”。然后（第 5 款）规定，国民政府在满洲的非直接战区部分，接管在“民事管理（俄文文本），又称“管理公务（中文文本）”方面的全部权力。按中文文本，“管理公务”包括军事权力，但按俄文文本则不包括。这种俄文表述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有目的的，而中方却未曾察觉，这一点现在仍不得而知。但显然，苏联军队利用了这种不清楚的法律形势，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取得那里的政权。苏联军队还依据这一条款认为法律上宣布停火是 8 月

这是 1995 年 3 月 23 日苏联外交官列多夫斯基对作者这么说的。列多夫斯基从 1942 至 1949 年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另见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1945 年 12 月—1946 年 1 月蒋介石儿子在莫斯科的秘密访问》，见《近代史与现代史》1996 年第 4 期，第 102 页。

参阅 1945 年 8 月 14 日同盟条约的俄文和中文文本，以及同日的互换照会，见：《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96—198、205 页及下页；“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958 年台北版第 505—509 页。

俄文文本见：《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04 页及下页。

23 日至 24 日，因此他们不顾日本实际已宣布停火，而继续进军。

如此复杂的游戏导致了许多混乱，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不仅发生在苏联指挥官那里，也发生在中国红军的指挥员方面。苏联方面有时出于策略考虑，为做给重庆和华盛顿看，而临时改变做法。而这并不都能为中国同志，特别是军队，所理解。因此，共产党在满洲取得政权是经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的，本节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论述。

如前所述，苏联于 8 月 8 日进入远东战场。在没有向中共通报的情况下，苏联军队向两个方向进发。主力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将军指挥下，通过北满沿着中东铁路，向哈尔滨方向进军。与此同时，苏联和蒙古的部队向热河和察哈尔省进发。虽然日本于 8 月 10 日至 11 日宣布投降，苏联军队却继续向前挺进。到 8 月 23 日至 24 日宣布停火时，苏联军队已达 30 万人。他们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命令下，于 8 月底控制了满洲和毗邻的热河和察哈尔省的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线。

在苏联军队进入满洲的第一个星期，莫斯科对那里共产党人的态度并不确定。既有支持的例子，也有不支持的例子。9 月中，苏联军队与延安商定，它将暗地里帮助共产党部队在满洲立住脚。但在 11 月它改变了政策。自那以后的 4 个月里，它支持国民党部队接管满洲的要地，并把中国同志从那里挤走。1946 年 3 月中，当苏联军队最后撤离时，斯大林鼓励中共领导展开攻势，并帮助共产党部队进入北满的撤离区。在苏联占领满洲的整个时期，即到 1946 年 5 月 3 日为止，苏联军队把当年日本军械库的武器和弹药提供给了中共部队。

为什么苏联在满洲的政策出现了曲折的变化，这将在本节作进一步的探讨，这里仅指出一点：1945 年 8 月 14 日与重庆签订的条约，以及美军在军事上支持国民党，这两点是苏联的主要顾

虑，它在苏联决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战争结束时，鉴于苏联在东亚的势力薄弱，斯大林首先倾向于承认中国在总体上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而把他的特殊利益首先集中于外蒙和满洲。如前所述，^①他致力于通过雅尔塔协定使美、英，以及通过同盟条约使中国，确认苏联在外蒙已存在的实际监护国地位。通过同样的办法，至少是部分地实现其把满洲变为苏联利益范围的愿望。在这方面，军事占领是一张重要的王牌。尽管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他方面出现了显著的不和，但当时双方默默地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阻止国民政府在满洲取得政权和把满洲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对斯大林来说，满洲牌具有多种用途。他通过 8 月 14 日的条约在满洲获得了军事和经济的特权，并以此进入中国的大门。通过对旅顺军港的使用，使苏联有可能加强其在东亚的安全政治地位，既可防御也可进攻的地位，从而也获得一个对抗美国强大的太平洋舰队的平衡力量。通过部分拥有满洲铁路和相关的土地与企业，以及在大连的特权，苏联就更加便于增强其影响，并为今后控制满洲经济获得有利的地位。苏联在满洲的军事存在也被斯大林作为一张与华盛顿和西方国家进行争斗的中国牌而加以使用：用苏联从满洲撤军换取美国从华北的撤出。这也就是斯大林在确定其对中共的满洲政策时所遵循的主导原则。斯大林内心最担忧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导致他的一个明确的决定：一定要避免使苏联军队和中共部队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②

大战结束后，东北在中国共产党战略考虑中具有一个关键性的地位。他们计划占领东北，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此处参阅 Steven I. Levine: < Soviet - American Rivalry in Manchuria and the Cold War > . in Chuen - tu Hsueh: < Dimensio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 New York/ Washington/London 1977, p.15 f. ; Westad: < Cold War ... > , p.120.

通过它在地理上建立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系，并从那里获得援助。就此，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我们没有基地。但如果我们有了东北，那我们就有了基地。”^①早在 1945 年的 4 月、5 月，毛泽东就计划从各战区集中 15 万至 20 万人的部队投入东北“配合苏联收复东北”。^②

在 8 月 14 日中苏条约签订前的这段时间里，苏联军队是否与隶属延安的共产党部队在东北进行过军事合作，这一点未能得到证实。但是，6 月初莫斯科曾计划动用共产党领导的、在 1940 年至 1941 年从东北被赶到苏联的“抗日联军”残部。这支部队在 1942 年 8 月重新整编为“国际八十八旅”，由曾在苏联培训的周保中领导。如当时所说，这支部队在将来满洲“大事变”时将担任苏联军队与中共部队的联络任务。自 1944 年起，中共部队就试图从南面向热河和辽东推进，但这一企图因日本的抵抗而失败。1945 年 6 月周保中被任命为苏联远东司令部的顾问，并经常参加有关会议。7 月中旬，约 250 名来自中国的共产党军官被派到西伯利亚受专门的训练，并准备在苏联向满洲进军时接受特别任务。不过，周不太乐意接受苏联的指挥。8 月，他和一个小部队与苏联军队一起进入满洲并驻扎在与苏联毗邻的北部边界。^③

在 8 月 9 日苏联军队进军满洲后，延安总部司令紧接着就向许多部队下达了命令，命令他们进军华北，并与苏联军队进行军

引自杨奎松：《中国共产党东北战略演变与苏联》，见《中共党史研究》1990 年增刊，第 60 页。该引文没有注明日期。

② 同上，该引文没有注明日期。

③ 这段参阅周 / 褚：《共产国际……》第 397 页及下页，401 页，426 页及下页；鲍里索夫：《苏联和满洲的革命根据地（1945 - 1949）》，1977 年莫斯科版第 71 页；列多夫斯基：《苏联、美国与中国的国民革命》，1979 年莫斯科版第 109 页；朱列夫：《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中共武装力量（20 - 40 年代）》，1983 年莫斯科版第 266 页及下页；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p.105, 120 f.

事配合。^① 该命令是与接着发布的 6 个命令一起在报刊上公布的，这种做法也部分地是为了迷惑公众舆论。正如中共中央此时发给有关部队的秘密指示所说，这只是为了“对外宣传”，“为了尽可能早地在国内外取得一个公开的出击地位”。^② 至于在这种表述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人们只能作各种猜测。很可能，这是延安想以此在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条约谈判的最后阶段对莫斯科施加影响，对苏联领导施加道义上的压力。也可能是：只有一支部队真地向满洲进发，而其他部队实际上则开往满洲以外的察哈尔、热河与河北等省地区，以便在那里迎接苏联军队，而不立即谈论占领满洲的计划。实际上，中共部队于 8 月 17 日与苏联军队一起进入察哈尔，到达张家口附近。但苏联军队拒绝与中共部队一起占领张家口，并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占领这座城市。^③

斯大林曾对持怀疑态度的哈里曼说，迄今为止苏联军队在满洲没有与中国共产党部队接触。这句话从形式上看是对的，因为张家口实际上是处于满洲以外的地区。^④

8 月 14 日以后，莫斯科给延安发去的几份电报带来的是坏消息：莫斯科因与重庆签订的同盟条约以及与华盛顿达成的协议，不能支持中国内战，并不得不把苏军占领的满洲地区移交给国民党。^⑤ 此后不久，中共领导顺从了这一新的形势，并作出相当谨慎的反应。8 月 20 日中共军事领导虽然为进军东北组建了 5 个军团，但鉴于不明朗的形势，却让他们在热河，即满洲的边

^① 1945 年 8 月 11 日命令第二号，1945 年 8 月 12 日（《解放日报》），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1 年北京版第 15 卷第 219 页。在 1945 年 8 月 11 日命令第六号中也提到与苏联军队进行配合的内容，见 1945 年 8 月 1 日（《解放日报》），引自同上第 223 页。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0 页。

同上；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04 页；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05, 107.

此处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 年波恩版第 168 页。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界，聚集待命。^①

从 8 月底的内部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的不确定性。他们派遣 1000 名行政干部去满洲，他们当时设想，虽然在形式上承认国民党在满洲的统治权，但实际上将通过共产党干部来实行控制。内部指示中说，是否能向那里派遣部队，“现在还不能肯定”，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为慎重行事，准备进军满洲的部队应化名为“东北军”、“自愿军”，准备从山西、察哈尔、河北和山东向满洲方向进发。热河以及察哈尔原属满洲国地区，但不在 8 月 14 日中苏条约的范围之内。内部指示还说，如果有可能，部队应继续进军，如不可能，则在热河建立强大的根据地。当时，在热河和察哈尔还没有国民党的部队。在山东、河北、山西和绥远，共产党人占据着军事上的优势。^②

在 8 月中旬斯大林电报的影响下，中共领导开始比较谨慎。8 月底，在中共中央的一项指示中说：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 8 月 14 日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给国民政府；苏联军队必不肯与进入那里的中共党组织和部队进行正式接洽或给予帮助；只要共产党的活动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采取放任的态度，并给予共产党人以同情；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中共部队就可进入东三省，并与他们进行非正式接洽；但不要声张，不要在报纸上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苏联军队作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他们给予帮助，不要使他们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在苏联军队三个月内全部撤出时，还会有很好的机会占领满洲以及热河和察哈尔。^③

显然，在 8 月底 9 月初这个时期，苏联军队第一次逐步向中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0 页。

^② 此段参阅中共中央 1945 年 8 月 29 日指示，引自同上第 61 页。1945 年 8 月 29 日的指示刊印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1991 年北京版第 257-258 页。

^③ 1945 年 8 月 29 日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刊印在同上第 257 页及下页。

共发出信号，表示愿意在东北，包括满洲进行合作。他们把内蒙和热河的许多地方交给了共产党部队。共同攻打了山海关，占领了“通往满洲的大门”。9月中，共产党部队接受了大量的日本武器和军需品。在苏联的容忍和帮助下，共产党部队通过察哈尔和热河，沿着长春铁路进入满洲。苏联军队还帮助中国同志在满洲的许多地区建立地方管理机构。^①

9月11日党领导决定，从山东抽调2.5万至3万人“不事声张”地、分散地经海道进入满洲，不用八路军番号，而用“东北义勇军”或其他地方军的名义。届时，先不占领大城市，而是进驻乡村、小城市及苏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苏军在满洲建立秩序。即使对苏军，也不用八路军和党的名义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涉。^②

在1945年8月14日条约签订后的头几个星期，在满洲和苏占区邻近地区，苏军对中共的政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并在实践中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显然，莫斯科并没有对苏联部队下达过总的和有约束性的、要帮助中国同志在那里立住脚的命令。因而，各个指挥官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中共部队在多数情况下得到了帮助，但也有遭到拒绝的。显然，在苏联指挥官与中共进行合作的许多地方，起作用的主要是军事考虑或地方指挥官个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心。因此，各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在大连，苏联当局不允许当地的共产党人公开在城市活动，他们宁愿与尚存的满洲国机构合作。与中共的关系坏到这种程度，以致中共党员对苏联当局也隐瞒其党员的身份。在整个苏军

此段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07 f. ; West-ad: <Cold War……> p.83。

此段参阅 194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给山东分局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74页。

占领期间，苏军成员对老百姓的野蛮行为在东北居民中造成深刻印象，这是影响苏联形象的一个严重问题。抢劫、谋杀、强奸妇女和打架斗殴，经常发生。八路军在沈阳的卫戍部队向苏军司令部政治部提出指责，并要求整顿纪律。特别使共产党人伤心的是他们队伍中的一位高级军官被一名进行抢劫的苏联士兵开枪打死。反苏的，同时也是针对中共的（把它视为苏联走狗的）种族情绪，在满洲持续了很长时间。

9月初，在沈阳发生了苏联指挥官柯夫顿·斯坦克维奇与共产党卫戍司令曾克林的摩擦。曾耍了一个花招，避开了苏联指挥官的阻挡，开进了城市。当他准备接受城市管理机关，并希望与苏联方面紧密合作时，柯夫顿·斯坦克维奇考虑到莫斯科的指示和苏联对8月14日条约的义务，要求曾撤出城市。曾拒绝了，也没有向党领导汇报。^①

在移交政权问题上，苏军对重庆的态度在头几个月是犹豫不定，以致拒绝。他们不允许国民党部队进入满洲，直到11月初，国民党部队才强行进入。

2、双重战略的商定：延安的秘密会晤与后果

自8月中旬以来，莫斯科对中国同志的态度是：一般友好，有时冷淡，个别情况下则是拒绝。9月中，一项共同的战略取代了上述态度。

9月14日德米特里耶·贝鲁诺索夫中校作为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乘坐一架苏联军用飞机来到延安，与中共领导协调未来在满洲的行动。这涉及苏联政府对中共总部的一次正式访问。曾克林也在这架飞机上，是他请求贝鲁诺索夫带他一起去延安的，因为他本人与苏军的关系紧张，而需要与党领导商谈。当时，毛泽

此段参阅 Westad: < Cold War……> . . . p.84。

东在重庆进行谈判，贝鲁诺索夫的主要谈话对手是朱德和刘少奇。^①

此次谈话过程在迄今为止的报道中并无详细记载，但在总体上有所反映。贝鲁诺索夫转交了马林诺夫斯基的通知（可能是书面的），通知说，在苏军撤退之前既不允许国民党部队，也不允许中共部队进入满洲；未经苏联允许而进入的国民党部队已被解除武装；在苏军撤退之前，八路军不应公开进军满洲；共产党部队应从已占领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长春）撤出，以及从以其他方式停留于苏占区的地区撤出；苏军不久将撤离，此后，“中国部队如何进入满洲 应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据中国方面根据中共档案文件所作的描述，贝鲁诺索夫与党的领导人还进行了非正式谈话。^②显然，紧接着贝鲁诺索夫报告后，刘少奇召集了政治局紧急会议，随后又与贝鲁诺索夫进行了上述的非正式谈话。在政治局会议上人们一致认为，不能对苏联

此段和下段参阅《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1919-1949）》，1991年北京版第587页；《刘少奇年谱》第一卷第490页，黄政主编：《刘少奇一生》，1995年北京版第218页及下页；《朱德传》，1993年北京版第547页，许岩（音）：《苏联出兵……》，第109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10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2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07页；周/褚：《共产国际……》，第438页及下页，毕先天（音）：《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见《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62页；Westad: < Cold War…… >, p.84。——作者从陪同贝鲁诺索夫去延安的翻译 V. 谢季赫梅诺夫那里了解到贝鲁诺索夫的真名。不知为什么在中共中央文件中贝鲁诺索夫的名字被记载为魏斯别夫，在中国的参考文献中又被译成贝鲁诺索夫。——此处另参阅，第199页。在《回忆与怀念》和周/褚的《共产国际……》中，以及谢季赫梅诺夫的回忆，都把飞抵延安的日期记载为9月15日，而所有其他被引用的文献都把它记载为9月14日。——作者感谢他的俄罗斯同行康斯坦丁·谢维列夫。经过他的介绍，作者于1995年4月29日和7月19日与谢季赫梅诺夫进行了谈话，这里和以下引用的就是谢季赫梅诺夫对提问的答复。——此处和以下段落还参阅曾克林的报告，载于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1992年北京版第226-237页。曾虽然向政治局作了报告，但他当时并不了解与贝鲁诺索夫的谈话，同上第234页。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07页。

的愿望置之不理，但也应坚持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已从山东派往东北的部队可不撤回。在热河和察哈尔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那里的八路军也不应撤出。但考虑到莫斯科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在东北的部队不宜用八路军名义，而以其他名称进行活动。关于沈阳、大连和长春，则可采取双重战略“公开撤，秘密又去”。绝大部分的部队留在沈阳，小部分撤回农村。此后还决定，建立中共东北局，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和伍修权组成，彭真任领导。^①

看来，在“非正式会谈”中刘少奇首先向贝鲁诺索夫通报了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贝鲁诺索夫对中国同志作了让步，他不再坚持中共部队应立即从苏占区撤离；但共产党干部应服从苏联的命令，并按要求撤离。^② 朱德表示，同意令共产党部队从较大的城市，如长春、沈阳、大连、平泉撤出。^③ 应朱德的请求，苏联方面准备把过去属于满洲的整个热河省和辽宁西部交给八路军，因为那里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就已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④

人们还一致同意，中共可秘密派遣部队进入满洲，但只能在大城市以外。进入满洲的部队不以八路军名义，而必须改变称号，如“地方保安队”。^⑤ 贝鲁诺索夫保证将给予化名的共产党部队以帮助，并希望延安派代表去满洲，以便就地商谈和协调苏军与共产党部队的行动。^⑥

此段参阅《刘少奇年谱》，第一卷第 490 页及下页；黄政（主编）：《刘少奇一生》，1995 年北京版第 219 页及下页。——在 1945 年 9 月 15 日致马林诺夫斯基的信中，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恳请他同意让八路军仍留在热河和辽宁，《刘少奇年谱》第一卷第 491 页。

Westad: < Cold War…… > , p.84.

周/褚的《共产国际……》第 439 页。

同上。

同上。

⑥ 许岩（音）：《苏联出兵……》，第 109 页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07 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2 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199 页。

贝鲁诺索夫劝告中国同志应注意：

在满洲（中国文献中称东北）只能做，不能说。无论如何在满洲不要提“自治区”（这是中共的民事和军事组织的化名），不要说不允许国民党派部队进满洲，因为这将给美国和重庆以口实，并使苏联处于困难的境地。^①

这是中国有关著作中的陈述。贝鲁诺索夫的翻译谢季赫梅诺夫却认为，贝鲁诺索夫在延安没有进行会谈，而只是向中共领导人递交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信，该信是斯大林交代他写的。谢季赫梅诺夫的陈述是：马林诺夫斯基在信中劝告中共领导将其部队从城市撤出，而转移到农村去。此建议的理由是：美国情报部门把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报上报了华盛顿，其中提到苏联向中共部队提供日本武器装备和允许在城市军事驻扎等，这激起了华盛顿的强烈指责。莫洛托夫在电话中对马林诺夫斯基说：“所谓的共产党部队要把我们推进一场与美国的冲突。”而这正是斯大林所要避免的。据谢季赫梅诺夫称，因此斯大林认为，应采取一项谨慎的、“巧妙避开困难的政策”以避免继续造成苏联在满洲支持中共的印象。马林诺夫斯基在信中劝中共把部队撤到农村，这是因为他相信美国的情报机构只存在于城市。^②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5 页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3 页。——该引文既没有注明日期，也没有其他出处的说明。如作者所作，只能从上下文来判断其时间和关系。

^② 此段援引的是谢季赫梅诺夫对作者的讲述。——曾克林认为，这两个苏联军官是受莫洛托夫的委托派往延安的。见曾克林、星火：《革命回忆录》第 7 卷，1983 年沈阳版第 20-32 页。作者在他的俄罗斯同行康斯坦丁·谢维列夫的启示下，曾于 1995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电话与贝鲁诺索夫取得联系，并试图劝说他谈谈当时的情况，但失败了。贝鲁诺索夫不写回忆录，并决定把他的秘密带进坟墓。谈话以他的一个断然信念而结束：人们必须沉默。

把中国出版物与谢季赫梅诺夫的陈述相比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对苏联领导来说，首要的是让八路军从苏联占领的城市消失，以照顾与美国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避免形成苏军与中共部队合作的印象。对于八路军驻扎在农村，苏联领导是不反对的。

刘少奇请求贝鲁诺索夫在返回时带上政治局委员彭真和陈云，他们应到沈阳建立中共东北局，并协调苏军和中共的行动。^① 9月17日，^② 有6位或7位中国共产党人登上了这架飞机，其中有东北局的彭真、陈云和伍修权。^③ 飞机在山海关出现了危险的迫降，并有几位因此负伤。他们在第二天乘火车去了沈阳。在随后的日子里，约四分之一的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到满洲。^④ 其中有重要领导人高岗、林彪和李富春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能进入中共档案馆的作者，对贝鲁诺索夫的“正式”和“非正式”谈话作了这样的解释：苏联占领满洲后，斯大林一方面公开宣称，苏联军队在满洲没有与共产党接触，也不准备这样做，并希望国民党尽快派人来接收防区，以及签订一项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条约。但另一方面他秘密地指示苏联军队，暗中支持共产党力量在满洲获得迅速的扩大，并协调他们与中共的行动。“出于外交原因”，苏联在形式上严格拒绝中共部队进军满洲，但暗中则支持中共占领东北的努力。这无

Westad: < Cold War…… >, p.845. 此段还参阅黄政（主编）：《刘少奇一生》，1995年北京版第266页；《朱德传》第547页及下页。

据《刘少奇年谱》第一卷第491页记载，该飞机是于9月15日飞回的。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199页及下页；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月》，见《中共党史风云录》，1990年北京版的349页；谢季赫梅诺夫对作者的讲述。

此段参阅《朱德传》，第584页；Reardon - Anderson: < Yen 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20 f.; 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 - 1948 > . p.108 f.

疑增强了中共领导占领东北的决心。^①

如前所述，在当初的实践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是不统一的，有好，有坏。为什么又出现了有利于同中共合作的路线变化？现在也很难确定。一位苏联军界的历史见证人认为，斯大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计划把满洲交给中国共产党人，而是当中国共产党人在那里出现后，他才决定帮助他们。^② 另一位历史见证人，他当时在中国任外交官，则认为：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力求把满洲变成一个在中共统治下的缓冲区，因为他相信，共产党人比国民党更有利于他把满洲建立成苏联的保护区。^③ 看来，第二种解释是可信的。

贝鲁诺索夫与中共领导人在延安的会晤起到了一个引发的作用，导致莫斯科与延安最后在满洲问题方面达成一项有效的共同战略。今天，在新的资料的基础上，人们可以对这一过程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复述。

就迄今为止所掌握的材料来看，9月15日中共政治局在贝鲁诺索夫的“非正式的”允诺的基础上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并把原定的华南10万人部队和2万名干部转而挺进东北。在那次会议上，朱德说：“中央应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40万至60万人的部队。”中央委员会的结论是：“东北必须由我们的力量占领，热河、察哈尔必须完全由我们控制。”现在是“千载一时之机”。如果我们控制了热河、察哈尔和冀东并在东北沿海有数万驻军，就有可能阻止蒋介石进入东北。“如果我们占领东北并由此挺进华北和华中，这将改变我们党的地位。”这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07页及下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2页。

1995年4月16日和7月19日谢季赫梅诺夫对作者的讲述。

③ 1995年3月23日安德烈·列多夫斯基对作者的讲述。

是“决定性的一环”。^①

9月16日，后贝加尔湖军区负责满洲地区的苏联和蒙古司令部进一步超越了在延安达成的协议，它通知中共领导，“八路军主力应毫不迟疑地向北运动”，以便接收苏军在内蒙和满洲占领的地区。目标是“确保北方和内蒙地区，并从而能更好地保持与外蒙和苏联的联系”。莫斯科可以向中共部队提供武器援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共部队可以撤到外蒙，而不要转向南方。应“不再让敌人切断双方之间的联系”。苏联驻重庆大使也“私下”告诉中共领导：要“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即：通往满洲的陆地通道——作者）防蒋进攻”；中国共产党人应力争东北。^②

早些时候，在西方曾有一种推测，认为苏联代表在延安谈判时拒绝八路军开进满洲，而表示愿意支持“满洲人民运动”，他们以为这一运动将持分裂主义态度，至少将比延安更亲苏一些。^③现在看来，这一假设已被驳倒。关于苏联为了分裂的目的而要起用周保中、张学思（张学良之弟）或李立三等人的猜测，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④

9月17日，朱德和刘少奇向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实行“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他们的具体建议是：竭尽全力占领东北，控制热河和察哈尔；不仅要出兵东北，而且也要调动10万至15万人的兵力去冀东和热河；新四军主力也要从长江以南开赴东北。^⑤

此段参阅1945年9月14日政治局会议记录，引自《朱德传》1993年版第547页及下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2页。

同上，并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07页。

例如，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p.119。

同上，第120 - 122页。

此段参阅《朱德传》1993年版第548页，参阅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3页。

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赞成后，党领导于 9 月 19 日电告中央各局：“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驻扎在长江以南的部队向北出动，新四军调 8 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向冀东及东北出动。调动一切力量控制东北及热、察和冀东。^①

在围绕该决议而展开的讨论中，朱德强调进军东北的优先地位，以及为此而忍受在南方撤退的必要性。他说：“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失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苏北、皖中、长江流域，准备做交换条件，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②

一位能进入中共档案馆的中国历史学家对 1945 年 9 月 14 日至 19 日发生的戏剧性决定过程作了如下的描述：“不难看出，当时苏联放弃了外交约束和形式上严格禁止中共武装力量进入东北的要求，而完全鼓励中共占领整个东北。这就在根本上推动了中共中央作出占领东北这一重大决定。”^③正如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所说，争夺东北的斗争不仅是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争斗，而且是“世界斗争”的一部分。^④

看来，中共中央 9 月 19 日的决议顺利执行。共产党在满洲的兵力显著增加。但具体数字并不完全一致。一位能进入中国档案管的作者称，10 月初驻扎在“整个满洲”的部队为 8 万人。^⑤到年底兵力增加到 28 万人。^⑥另一个材料却称，至 11 月底共产

① 同上，《朱德传》1993 年版第 548 页。

② 1945 年 9 月 19 日政治局会议记录，引自《朱德传》，第 548 页。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3 页。

④ 1945 年 11 月 19 和 20 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引自杨奎松：《苏联因素……》第 24 页。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09 页。

⑥ 《朱德传》第 548 页。

党部队达 20 万人，到 12 月超过了 30 万。^① 出现这种差异可能是，至少部分是因为对“满洲”与“东北”这个地理概念的不同理解。它的狭义理解是指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它的广义理解则还包括热河、察哈尔与河北北部。

在满洲建立了“人民自治军”（与莫斯科商定的化名）司令部，林彪为司令员，彭真为政委。接着又建立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地方“联合政府”。^②

9 月底，莫斯科与延安达成的新路线导致苏军日益容忍共产党在满洲控制行政管理权，并允许在苏军中作战的中国支队并入共产党的正规军。10 月初，在哈尔滨出现了和谐的合作。但许多情况表明，苏联的政策并非总是持续不变的。9 月中，大多数前日本军火库的苏联指挥官拒绝向共产党部队提供武器。^③ 9 月底，沈阳苏军司令官对驻那里的中共东北局态度“冷淡和疏远”，像对待“不速之客”一样。中共的一些地方干部对苏联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但党的中央领导没有随声附和，至少是没有公开附和。^④

苏军之所以有不同的态度，原因是很清楚的。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一方面公开承担义务，要把满洲的管辖权移交给国民党，但另一方面又秘密地与中国共产党人达成了协议。这种矛盾关系导致了难以平衡的困境。9 月中，考虑到对重庆承担的义务，不断要求共产党部队撤离沈阳和其他大城市，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

^① Garthoff: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p.72;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第 280 页》; 鲍里索夫:《苏联与满洲的革命根据地(1945-1949)》, 1977 年莫斯科版第 139 页。

^② 《朱德传 第 548 页》。

^③ 斯托尔贝克:《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 1945-1953》, 关于冷战背景下苏中结盟的产生历史的研究,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第 1 部分, 第 78 页(注 36), 83 页(注 63、64、65)。

此段参阅 Garthoff: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p.72; Westad: <Cold War……> p.83-87, 89 分 121; 斯托尔贝克:《斯大林……》第 2 卷第 82-86 页。

部队在大城市的出现不同于在农村的出现，因为在大城市难以保密。另一方面，为遵循与延安达成的协议，要为共产党在满洲掌权创造条件。^①

9月30日，载有5万士兵以及坦克和飞机的美国舰队在华北登陆，莫斯科对此的反应显得有些举止失措。美国武装力量控制了山东与河北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并与国民党部队一起占领了天津、北平与河北东部的其他重要地点。10月底，30万驻扎在满洲的苏联军队面对11万驻在中国其他地区美国军队。与此同时，美国空军把5.6万人的两支国民党部队从华中运往华北。按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外长伯恩斯的设想，美军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国防部显然认为莫斯科要把满洲和华北变为由苏联控制的独立国家，因此建议在军事上支持蒋介石占领这块领土。此时，莫斯科与华盛顿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相互猜疑，担心对方要全部或部分地控制中国。^②

10月1日苏联驻重庆大使突然通知国民党政府，苏联将立即开始从满洲撤退，于12月1日撤退完毕，^③苏联并要求国民党军队的代表到重庆来商谈撤退方式。中共领导也被告知了这一撤退日期。^④按8月14日斯大林和宋子文达成的协议，苏联的撤退应在日本投降后3周内开始，并“在打败日本后的3个月内”完成。现在，这一日期已经临近。^⑤

看来，当时斯大林的考虑是，美军的登陆可能是对苏联在满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3页。

此段参阅 William Pace Head：〈America's China Sojourn . Ph.D. Dissertation〉，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80,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Ann Arbor, Michigan 1983, p.239; Westad: 〈Cold War……〉. p.103 f. . 113 - 117, 121;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10 - 112。

此段参阅 Westad: 〈Cold War……〉 . p.95。

④ 《从延安到北京》，1993年北京版第34页。

参阅1945年8月14日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见：〈Treaties Between the Republic〉 . p.523。

洲的军事存在的一种反应。因此他感到了一种压力。为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他开始向国民党表明，他是恪守条约的，并宣布最晚在 12 月 1 日撤离满洲。实际上，苏军撤离日期推迟了 4 次。前两次推迟曾取得了国民党政府的同意，最后订为 1946 年 4 月底。^①但最后一名苏联士兵离开满洲实际上是在 5 月 3 日。^②

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军队进军华北，斯大林感到必须加快行动，以便在苏军撤离满洲后能形成一个有利于苏联的形势。当苏军看到现在必须很快离开满洲时，他们想尽一切努力，秘密地帮助中国同志把国民党抵制在满洲以外，并接管那里的政权。斯大林希望以这种方式形成一个对苏友好的缓冲国。10 月初，斯大林敦促延安派 25 万至 30 万人的部队进入山海关和沈阳附近地区，目的就是封锁满洲的大门。与此同时，苏联军队向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 30 万支枪、100 挺机枪和 15 门大炮，这些武器显然来自日本武器库。苏军总司令还向中共传达了斯大林的称赞：中共是“勇敢的和成熟的”，并得到斯大林的“高度信任”。与此同时，苏军领导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意图，他们将不考虑条约义务，要把整个满洲交给中共，并要求它迅速接管有关省和城市的政权。他们鼓励中国同志把主力部队（至少 50 万人）开到满洲，因为“满洲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这三个方面是指与北朝鲜、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接壤——作者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洲，即可进取全中国”。^③

此处和下句参阅 < History of the Sin. - Japanese War (1937 - 1945) > . p.559; Clubb : < China & Russia > . p.353, 356 f.

此段参阅 Westad: < Cold War..... > , p.121;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6 页。

同上，第 412 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43 页。——关于苏联的这一建议既没有注明资料来源，也没有注明日期，但看来是可信的。该作者能进入中共档案馆。从上下文看，这一建议可能是在 10 月初和 11 月中提出的。此段还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08 页及下页，第 412 页。

延安领导显然对这一迅速的变化没有准备。9月底，他们在进军部署中还强调“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然后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①当时在整个东北只有8万人的共产党部队，而且装备很差。此时，在苏联建议的影响下，他们考虑10月底以前派5万至8万人赴东北，11月初再增派10万人。但他们认为立即按苏联的要求派30万人到东北是不可能的。据另一份材料称，毛泽东在10月中旬曾下令，让80%的现有部队开赴满洲和东北其他地区。^②

10月1日蒋介石通知苏联方面，他打算派13个师赴满洲，它们将由美国海军运输舰运送，并在美国人员陪同下在大连登陆。这时，对莫斯科的压力加大了。10月6日，斯大林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理由是：按8月14日条约，大连不能被作为军港来使用。^③

对条约的这种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关于大连的协定是：大连应成为“对各国的商业和船只都开放的自由港”。^④但当时苏联的这一理由是一种拖延的托词。同样，苏联也拒绝了重庆希望用苏联船只来运送国民党部队的请求。^⑤月中，蒋介石通知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他不得不为运输问题而求助于华盛顿，并

① 194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引自同上第409页。

② Furuya, <Chiang Kai-shek>, p. 857.——此段还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09页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3页。

此段参阅 Clubb: <China & Russia> . p.349 f.; Westad: <Cold War> . p.95.

④ 1945年8月14日关于大连的协定，见《苏中关系 1917-1957年——文件汇编》，1959年莫斯科版，第203页。

列多夫斯基：《1942-1952年在中国做外交工作》，见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3年第6期第127页。

再次请求苏联允许在大连和旅顺登陆，^①显然这是徒劳的。

与 10 月 1 日初期的态度不同，莫斯科现在对重庆的逼迫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0 月下半月，苏联军事警察搜查了国民党驻长春办事处，暂时拘留了办事处的成员，查封了国民党军队在满洲的司令部，并中断了谈判。^②苏军把满洲的港口城市营口和葫芦岛的城市防交给了中共部队。苏军还允许共产党部队驻扎到长春飞机场附近，以便阻止国民党人员的登陆。^③总体上，苏军鼓励中国同志更加坚定夺取满洲的决心。他们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④中共满洲地方领导得到的印象是，“如果顽固进攻，苏将协同打击”，并为接管政权作准备。^⑤

10 月 13 日，国民党部队满洲军区总司令熊式辉将军在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的陪同下到达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谈判苏联部队的撤离问题。随后，他提出了一个计划：国民党的两支部队从河北，一从海上经大连，一从陆路经山海关赴满洲。马林诺夫斯基对大连登陆没有表态，但拒绝空运国民党部队赴长春，拒绝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苏联撤离结束前进入满洲。10 月 21 日他再次拒绝在大连登陆，但使人理解到，他并不反对国民党政府以替代方式把计划中的登陆改在葫芦岛和营口。蒋介石勉强地接收了，并宣布 3 日后，10 月 29 日开始登陆。10 月 27 日一支先头部队在葫芦岛与中共部队交了火。11 月 2 日国民党部队在营口的登陆也受

^① 1945 年 10 月 23 日彼得罗夫与蒋介石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0，p.248，案卷 7，引自列多夫斯基：《1942—1952 年在中国做外交工作》见《近代史与现代史》1993 年第 6 期第 127 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6 页。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4 页。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1 页。

^④ 1945 年 10 月 25 日通知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1 页。

^⑤ 1945 年 10 月 25 日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1 页。

到阻止。据当时美国的了解，在这两起事件中，中国共产党人得到苏军的密切配合。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指责作出了虚伪的反应，说它不愿介入中国的内部争斗。^①

在整个 10 月里，莫斯科对重庆和华盛顿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它试图把苏军撤离与美国人从华北撤离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外长伯恩斯向杜鲁门总统建议，把美军的撤离作为苏军撤离的对等条件向斯大林提出，但这没有被接受。^②

10 月底 11 月初，斯大林的态度又转向同国民党合作。从种种迹象来看，对此起到中心作用的是他担心出现与美国的对抗。能进入中共档案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特别强调这一点，并根据资料指出：苏联鼓励中共与国民党对抗，但它“不断警告”不要在有美军的地方作战。这就是说，无论如何不要把美国人拖进这场战争。^③

此时，这一危险也确实显得日益迫近，并变得现实。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日益积极地在营口和葫芦岛强行登陆。斯大林让步了，并让马林诺夫斯基于 10 月 29 日在长春通知熊式辉将军，莫斯科将允许国民党部队在满洲沿海登陆。不久，马林诺夫斯基在一次私人聚会时向熊式辉将军保证，苏联政府不愿让中共的活动干扰莫斯科与重庆之间的良好关系。^④

显然，当蒋介石下令经山海关强行登陆时，这种与美国的对

此段参阅 Clubb: <China & Russia> p.352; Westad: <Cold War> . p.95 f. 112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4 页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1 页及下页, 416 页;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23.

② Westad: <Cold War> . p.115 f.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2 页及下页, 416 页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5 页。

此段参阅 251 Westad: <Cold War> . p.121 f.

抗将更有可能成为一场军事冲突。在 10 月 27 日，因共产党部队的抵抗，国民党一支先头部队在葫芦岛登陆的企图失败了。此时，国民党总司令部下令装备精良的国民党第 13 军，由美国船只运往河北东北部，于 10 月 30 日在秦皇岛登陆。在营口登陆失败后，国民党又增派了另一批部队赴营口。秦皇岛位于山海关以南 100 公里，山海关是满洲的门户，是长城到达太平洋之处。此外，国民党部队还沿着天津至沈阳的铁路线向满洲边界运动。^①

在进军过程中，国民党部队得到了美军的支持，但它不介入战斗。^②延安领导认为，国民党每个团约配有 20 名美国军官。^③在这个地区，共产党部队约有 10 万人，但疲惫不堪，部分部队装备很差；国民党军队约有 8 万人。11 月 3 日争夺战略重地山海关的战斗开始，这同时也是争夺满洲的军事行动。11 月 16 日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军事顾问的支持下占领山海关。^④

苏联愿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之所以持续下来，这也许与当时发生的、并导致美国插手的一个事件相联系。11 月 12 日，当苏军开始撤离长春时，共产党部队跟进，一名共产党人接管了市长的职务，共产党部队包围了国民党总司令部，并停水、停电。^⑤由于苏联至 11 月 20 日将从哈尔滨以南的所有地区撤离，因此，

此段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 年波恩版第 169 页；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p.117 f., 123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2 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4 页；<Military Campaigns in China>, p.101, 104; Dupuy: <The Military History……> p.71.——杨奎松所说的登陆日期有误。

^②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p.117.

^③ 1945 年 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电报，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5 页。

此段参阅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 p.58; <military Campaigns in China> . p.101 f. Dupuy: <The Military History……> . p.71; Westad: <Cold War> , p.125;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4 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6 页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 年波恩版第 172 页及下页。

此段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23 f.

人们担心在这些地区将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为此，蒋介石向莫斯科提出了抗议，指责它违反了条约中关于把满洲移交给国民政府的规定，并决定于 11 月 17 日把国民党军队的总司令部从长春迁至刚刚占领的山海关。11 月 15 日蒋把此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与此同时，他向杜鲁门总统诉说，控告苏联阻挠国民政府接管满洲和支持共产党部队占领满洲的企图，指责苏联的拖延态度危害中国的统一和远东的和平。蒋请求杜鲁门采取共同行动。杜鲁门表示赞同。11 月 17 日，熊式辉将军乘飞机离开长春，以示抗议。^①

莫斯科立即作出反应。莫斯科担心因此而丢脸和加剧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并特别担心会对莫斯科外长会议（12 月 16 日至 26 日）产生影响。同一天，彼得罗夫大使向国民政府保证，苏军满洲部队总司令部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人以任何帮助。不顾毛泽东关于“尽可能久地推迟”国民党部队进驻的请求，苏联大使再次重申 11 月 13 日的提议：中国政府军可以立即进驻长春和沈阳，并将得到苏联军方的支持。11 月 27 日公布了一项协定，双方承担义务，顺利移交满洲的政权。莫斯科还宣称，它准备让中共部队撤出长春和沈阳，并允许国民党部队通过空中走廊进驻那里。与此相对应，重庆决定将其代表迁回长春。11 月 19 日苏军已下令中共部队撤离城市。^②

11 月中，蒋介石与彼得罗夫进行秘密谈话时，他请求苏联推迟撤军的日期，以便在共产党部队紧逼的情况下，保证有序地把管理权移交给国民党部队。这个建议正合斯大林之意，从而也

此段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 年波恩版第 172 页及下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5 页；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 124.

^②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3 页；Westad: < Cold War > , p. 123;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 124 f.

对缓和莫斯科与重庆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斯大林一直企图把苏军在满洲的存在当作一个砝码来使用，以便换取美军从华北撤出。此外，斯大林还希望通过他对重庆的这种假的合作姿态来安抚美国。11月30日，马林诺夫斯基与蒋经国达成一致意见，把1946年1月3日定为苏军撤离的新日期。^①

鉴于从满洲撤离的日期已经临近，苏联试图尽可能地捞取好处。做法之一，就是进一步拆卸工业设备，作为“战利品”而运走。另一做法是，马林诺夫斯基的经济顾问米谢尔·斯拉特考夫斯基于11月20日开始对重庆派驻长春的代表施加压力，试图把所有的日本企业和80%的满洲重工业企业转变为中苏联合经营的企业。他答应，如果中方同意合营，这将会使政治问题得到比较容易的解决。^②

推迟撤军日期并未引起震动，因为延安的党领导于10月6日曾指示东北局，立即与苏联商谈，促使莫斯科把苏军撤出满洲的日期推迟一至一个半月，以便争取时间把增调的中共部队转移到满洲，并同时能从张家口，绥远方面得到支援。^③显然，中共向苏联提出推迟撤军请求是与苏联9月中旬的通知相联系的。苏联领导曾于9月中旬通知中共，苏联军队将按8月14日条约的规定，最晚在11月底撤离满洲。^④但中共的请求来得太晚了。正如以上所述，苏联驻重庆大使已经于10月1日宣布撤军最晚不超过12月1日。由于内战的双方都请求推迟撤军日期，而且

^① 此段参阅 Westad: < Cold War >, p.122; Clubb: < China & Russia > . p.353。

^② 此段参阅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与中国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1977年莫斯科版第162-164页；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 p.49, 51; Westad: < Cold War >, p.124; Clubb: < China & Russia >, p.356；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17页及下页。

^③ 1945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17页及下页。

^④ Westad: < Cold War > . p.88。

各方都认为这样对自己有利，这就使苏联处于一个非常舒适的境地。

在 10 月底，延安认为“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阻止国民党部队登陆。但这只有在苏军的帮助下才能成功。当时，中共领导恳请苏联方面：“一、推迟撤军日期；二、在 11 月和 12 月阻止蒋军开进满洲；三、允许我方立即接管政府职权和由人民选举自治政府。”如赢得至 11 月的时间，就可以调去 6 万人的正规军和 2 万名干部。此时，共产党部队开始大规模地占领大小城市，接管行政管理和卫戍地。^①

1945 年 11 月中至 1946 年 2、3 月间，斯大林似乎考虑到与美国缓和关系，准备与国民党政府讲和，按条约规定把满洲交给国民党政府，并把中国同志作为牺牲品送上与蒋介石进行新合作的祭坛。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被空运到长春和哈尔滨。12 月初，在苏联批准下两个师的政府军在沈阳着陆。11 月 24 日，彼得罗夫甚至就前几个月苏联在满洲的行为向王世杰道歉。^②

莫斯科满洲政策的改变也开始对苏联的中共政策产生消极影响。11 月初，苏军不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在满洲发行自己的货币。在吉林市，苏军阻止共产党人接管电报局。在长春，月初时苏军司令官还默许共产党人接管城市，但到月中他禁止城市的各组织（大部分为共产党人所控制）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几乎同时，沈阳的司令官命令中国东北局的领导人彭真一周内把东北局迁出城市；今后共产党部队不得再驻扎在飞机场和铁路沿线附近。彭真在与苏联司令部谈话回来后愤怒地说：“一个共产党的军队动用坦克，来驱赶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过！这

^① 此段参阅 1945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0 页及下页；同上第 411 页。

Westad: < Cold War > . p.123 f. ; Garthoff: <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 p.73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2 页。

种行为能接受吗？”^①

类似沈阳的这种命令在满洲其他城市的中共干部也接到了。中共部队受到威胁，如果他们不从铁路线附近撤离，他们将被解除武装。苏联司令官指示中共军官，不得阻挠国民党军队的进军。在多数情况下，共产党部队不得不撤退到满洲东部山上或森林里。在哈尔滨，苏军解除了所有共产党人的省长、市长和警察局长的职务。苏联的新政策实际上在整个东北导致共产党人离开了领导岗位。后来，高岗对苏联大使证实，彭真当时曾把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看做是“苏军方面的背叛”。^②

对中共的另一个沉重打击是军事上的，中共部队在与越过山海关通道的国民党部队展开了战斗，但失败了。延安领导不甘心山海关的陷落。他们不顾无望的形势，11月20日命令林彪展开攻击。延安的基本设想是，只要坚持半个月，就能在这期间增派10万人的部队进入东北，如能再坚持两个月则可再增加9万人，这样，就能阻止国民党的进入。更加使他们失望的是苏军给中共东北局的通知：苏军将把整个长春铁路沿线地区移交给国民党，凡苏军占领的地方都不允许进行战斗，共产党部队后撤50公里。莫斯科还提醒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利益必须服从“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并要求他们服从苏联的安排。后来，中共部队实际上把安全地带缩小为20公里。^③

延安顺从了这一不可避免的事态。中央委员会在内部通报中说：国民党抓住8月14日条约；“当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

^① Westad: < Cold War > . p.125 f.

1951年8月4日费德林给斯大林的关于尤金大使与高岗在沈阳谈话的密码电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3，案卷4，P.1，没有编页码。——此段还参阅 Westad: < Cold War > , p.121 - 123, 125 - 127; Garthoff: <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 . p.73。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14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4、66页；Westad: < Cold War > . p.125。

国与苏联的斗争”，它也反映在蒋介石与中共的斗争之中；苏联在华盛顿和重庆的压力下改变了政策；莫斯科担心美国，苏联不得不按照条约从满洲撤离，并把政权移交给国民党；中共必须“尊重苏联的外交政策”并只能做“不伤害苏联外交的事”例如，在苏军准备撤退期间，撤销行政机关；在今后的斗争中，党不能指望苏联的帮助，而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给苏联在与国民党谈判时造成许多困难，苏军的地方指挥官还是会最终帮助中共在满洲建立他们的政权。中共中央命令他们在满洲的党组织和部队服从苏联的指示，并退出城市。地方党员干部和军官服从了来自延安的指示。他们不违抗苏联指挥官的命令，但经常试图回避他们，偶尔也出现争执。^①

考虑到苏联曾指示，不要对长春铁路地区的移交进行抵制，延安顺从地作出决定：“彼方（指苏联——作者注）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独自占领满洲是不可能的。党领导指示东北局，首先占领铁路区以外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然后才是铁路本身。党领导希望，能保住辽宁的西海岸以及锦州和葫芦岛，以便能阻止国民党军队向沈阳方向推进。^②

但这一希望未能实现。国民党部队既占领了西海岸，并进一步向东北方向推进。苏军告诉中国同志，他们在葫芦岛、锦州和沈阳以南地区不可能提供帮助，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撤离。11月22日国民党军队占领葫芦岛，三天后占领了离沈阳200公里的锦州。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12月初，他们

^① 此段参阅中共中央1945年11月19、23和28日给东北局的指示，引自 West-ad: < Cold War >, p.126; Sheng: < Response: Mao an Stalin >, p.182 f., 及有关资料来源的出处。

^② 此段参阅1945年11月19和20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14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6页。

继续进军，1946 年 1 月 26 日到达沈阳。^①

苏军只是因对外需要才与中共保持距离，但凡是不易被察觉的地方，他们就继续与中共合作。例如，苏联支持（当然是暗地里）由中国共产党人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他们从大连、旅顺和朝鲜向共产党部队提供武器，并提供一部电台，以便他们保持与苏联武装力量的无线电联系。他们最终还同意中国同志，不必从辽宁北部的交通线撤出，以便阻止国民党部队的推进。^②

12 月初，苏军第二次推迟撤军日期，推迟到 2 月 1 日。这也是根据蒋介石的请求而推迟的，蒋希望以此来安排好满洲的移交事宜。^③

在这段时间里，国民政府在苏军的帮助下在许多大城市，如长春、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以及在南满站稳了脚跟。它控制了几乎整个辽宁，并在其统治的地区建立一系列的地方政府。在他们接管的城市中，苏军还继续保障了那里的秩序和安全。在这段时期，共产党部队也不再阻止国民党部队的进军。共产党人基本上从城市撤退到了后方，但是，苏军把一些重要的工业区，如辽阳、鞍山和本溪交给了共产党人。此外，苏联还向中国同志发出信号，要他们做好准备，在苏军最终撤离时，“大量接收”。^④

1945 年 12 月 27 日，在美国乔治·马歇尔的斡旋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开始谈判，杜鲁门总统希望双方首先能达成停

^① 此段参阅 Dupuy:《The Military History……》, p.71.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5 页。

同上，第 414 页及下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6 页。关于苏军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旅顺、大连的合作，参阅夏震度（音）：《苏联红军进驻 10 年》见：《中共党史资料》第 43 期（1992）第 131 页及下一页。

此处参阅 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 p.51; Clubb: < China & Russia > . p.353。

此段参阅 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 p.51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16 页；Reardon - Anderson: < Ya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24 f。

火，并最终在国民代表会议下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一点蒋和毛已原则接受。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对马歇尔的使命抱有一定的期望，希望被视为死敌的赫尔利大使被召回，并指望会谈能导致停火，从而结束国民党部队在满洲的进军。1946年初，莫斯科秘密地向延安建议，应把满洲问题排除在谈判之外，并应在所有涉及满洲的问题与苏联领导进行磋商。通过这种方式，将使苏联更加有可能参与今后的谈判。这里再次表明，苏联优先考虑的是保持它在这个地区的特殊利益，而同时又力求避免与华盛顿发生公开的冲突。周恩来，中共在重庆谈判的领导人，顺从了莫斯科的这个劝说。他向马歇尔建议，先搁置满洲问题，并承认国民政府接管满洲的权利。^①

显然，延安曾担心，把满洲排除在和平谈判之外，可能促使国民党会进一步提出要求，把热河和察哈尔也排除在外，进而占领这两个省，并切断共产党部队与苏联、外蒙和满洲的联系。因此，中共领导敦促莫斯科就满洲问题参加与延安、重庆和华盛顿的三方会谈，但莫斯科未予理会。实际上，重庆要求把热河和察哈尔排除在停火之外，并依据8月14日条约，要求把所有苏联占领的地区移交给国民政府。^②但实际上，条约涉及的只是“东北三省”，也就是对满洲这个地理概念所作的狭义解释。^③后来，重庆在美国的压力下屈服了，并放弃了占领热河和察哈尔各城市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7页；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and the CCP'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in: < Chinese Historians > . No. I, Vol. V (Spring 1992), p.25 - 27; Funaya: < Chiang Kai - shek > . p.862 - 865; < The China White Paper, p.140 - 143, 622 - 626; Westad: < Cold War > . p.143 f. . 155; Pepper: < The KMT - CCP Conflict > . p.729; 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 . p.125;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29 f . 134.——关于重庆和谈，可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五节。

^②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33。

参见“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958年台北版第521页及下页，俄文文本见《苏中关系1917-1957年——文件汇编》，1959年莫斯科版第204页。

的意图。^①

1月10日，在马歇尔斡旋下，签订了停火协定，禁止在长江以北的任何军事运动，但不包括满洲，在那里允许国民党部队“为重建中国主权的”而进驻。^②延安在苏联的压力下同意关于满洲的这一安排。此时，斯大林认为有必要，至少是对外，要完成8月14日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但他又担心美国对满洲的介入。1月，莫斯科警告中国同志，在满洲“无论如何不要作战”否则将产生“把美国部队引进满洲的极大危险”。^③

毛向东北部队的司令员们解释说，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将导致失败；人们必须与重庆政府作些妥协。此外，毛命令司令员们，把他们的部队驻扎在将撤离的苏军附近，以便悄悄地进入苏联撤离的地区。他们应尽一切努力，把中共的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协调起来。^④

当时，延安在一项指示中说，国内外的总形势不允许孤立地在满洲进行长久的内战，国民党必须承认中共的“一定的合法地位”，这是共同进行改革与和平建设的前提。党内一切反对在东北与国民党进行和平合作的观点都应消除。如果向国民党进攻，中共将遭到毁灭性的反击。^⑤从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来看，“一定的合法地位”指的是，如：解散国民党军队的东北总司令部，代之以有各党派和群众团体参加的行政管理委员会。此外，国民党应承认由共产党自行管理的部队——八路军，承认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7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16页；Reardon-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p.133。

同上。

参阅194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引自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8页；Reardon-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p.133

参阅 Westad: <Cold War>, p.147 f.，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⑤ 194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引自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8页。

（绝大部分在共产党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以及实行“民主选举”并把派往东北的部队限制在 10 至 15 万人。^①

最后宣布的苏军撤离日期 2 月 1 日过去了，但苏联军队没有离开满洲。莫斯科说，原因在于恶劣的天气，新的日期定为 3 月 1 日。这一情况在中国的公众舆论中引起了愤怒，并在许多城市导致了大学生的示威游行。2 月底，马林诺夫斯基指挥部宣称，大部分的苏联部队已经离开满洲，其余部分也将很快撤出。^②

1946 年 2 月，苏联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允许苏联在满洲扩大其经济影响，而华盛顿对此进行了谴责。此时，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信号，说明美国在“开放政策”的借口下要插足满洲。此时，斯大林认为有必要在满洲重新采取强硬政策，并加强中共作为苏联代表的地位，以使用此种方式阻止美国扩大其影响。在此前不久，斯大林曾警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不要容忍美国在中国，首先是指在满洲的军事存在。^③

可能是在 2 月底，苏联领导让中国同志知道：如果华盛顿以“门户开放政策”为由派部队到满洲，莫斯科将作出强硬的反应；但对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冲突，苏联官方仍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延安应派更多的部队进入满洲。3 月初，苏军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他们将从抚顺、沈阳和吉林撤离，而不把这些城市交给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在那里自由行动。苏军推迟从南满撤离后，共产党人得以接管了许多南满的城市和工业区。与此同时，

^① 1946 年 1 月 21 日中共中央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以及 1946 年 2 月 16 日《新华日报》，两者均引自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8 页。

^② Clubb: < China & Russia > p.356 f.

此段参阅 1949 年 12 月 30 日斯大林与蒋经国的谈话，苏联记录，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1945 年 12 月—1946 年 1 月蒋介石儿子在莫斯科的秘密访问》，见《近代史与现代史》1996 年第 4 期第 118 页及下页；Westad: < Cold War >, p.118 f., 135; 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 p.239;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 年波恩版第 173 页；Furuya: < Chiang Kai-shek >, p.869.

中共在苏联影响下，拒绝了美国在哈尔滨建立领事馆和其他组织机构的要求。^①

在 2 月底至 3 月初的这段时间里，中共领导在满洲问题上没有一致的路线。周恩来对马歇尔的无偏袒的努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作为在重庆的谈判领导人，感到大学生抗议的压力，并公开说，苏联从东北撤军是越早越好。他看到，中共在中国的可信性也取决于：中国舆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中共是始终不渝地反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干涉。苏军撤离的一再推迟，苏联掠夺满洲的工业设备，以及莫斯科施加压力争夺在满洲更多的特权，使得周在 2 月底说出了这样怨恨的话：“这些年来，太过分了！”他对马歇尔所说的话也表示认可。马歇尔说，国民党有理由“占领长春铁路和苏联撤离的地区，以便创造交换条件，同时解决政治问题和商讨部队进驻问题”。^②

在延安，有人不赞同周恩来的态度。叶剑英在此之前就曾声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不需要外国的调停。博古坚决捍卫苏联的满洲政策；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赞扬苏联对“人民力量”的支持。共产党的新闻媒体为苏联的行为进行辩护。这导致中共在中国公众中降低了支持率，并给国民党党内的反共力量以口实。特务头子戴笠是这股力量的核心，他们反对与共产党进行任何谈判。^③

从内部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研究了停火协定后，认为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30 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9 页；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and the CCP'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in: <Chinese Historians> No.1, Vol.V (Spring 1992), p.26, 28 f；赫尔姆·汉德齐克：《苏联撤军的政治条件》，见《三个事件研究：亚洲 1925、1946、和 1948》，1986 年艾本豪尔版，第 130 页。

此段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39 - 141；1946 年 3 月 11 日中共中央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引自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9 页 Westad: <Cold War> . p.156。

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38 - 141.

有必要放弃对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城市的占领，并把它们让给国民党部队，但正如周恩来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其先决条件是“国民党必须与我们认真地谈判，并承认我们在东北的地位”。^①这就是说，无论如何不承认国民党有权占领整个长春铁路和所有苏军撤离的地区。共产党人必须努力控制东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南满铁路的南部一线。这两段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在苏军撤离时交给了中共，其他部分也将陆续移交。“因此，除抚顺和本溪外我们不交出其他地区。”^②

3、把满洲交给中共

当苏军真的要撤离时，这就等于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争夺满洲的最后战斗开始了。

3月份，形势日趋紧张。当正式宣布的新的撤军日期3月1日又过去了，而苏军依然没有最终撤离时，重庆于3月6日指责苏联违反条约，并要求它立即撤退其部队。第二天，苏联出人意料地离开了沈阳，这座城市为国民党部队所占领。3天后，美国国务院对苏联继续占领满洲和分裂伊朗提出抗议。3月11日，莫斯科作出反应，宣布撤军已经开始，3月22日又宣称，撤军将到4月底结束。显然，促使苏联最终撤军的并不是中国日益加强的抗议，更起作用的则是西方对苏联扩张主义的谴责。人们认为，苏联军队在满洲以及在伊朗的滞留等就是苏联扩张主义的表现。3月初，丘吉尔在其著名的关于铁幕的演说中号召建立反对苏联的英美联盟。通过白宫的保证，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地位得到加强，美国在此期间已把他们与苏联的冲突看做是全球性的冲

^① 194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指示，引自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and the CCP'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in: <Chinese Historians > No.1, Vol.V (Spring 1992), p.27.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9页。

^② 同上。

突，国民党在以后与苏联的各个争执中将得到支持。3月11日，乔治·马歇尔返回华盛顿，这似乎表明，关于政治解决的重庆谈判已进入死点。华盛顿透露，他们准备运输更多的国民党部队去满洲。此时，蒋介石似乎已下决心以军事手段来解决满洲问题。在此期间，满洲的零星战斗不断增加，行进中的国民党部队时而遭到共产党人的阻击。^①

3月中，延安决定，争夺满洲的武装斗争立即开始。除了苏联撤军已日益临近这个因素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对这一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华盛顿虽然继续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持国民党，但它却逐渐地减少其在华北的驻军。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延安的多数中共领导人，反对与马歇尔和国民党的谈判。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应在东北的战场上，而不是在重庆的外交大厅里寻求解决。他们的态度也得到东北前线司令员，如林彪和张学思（音）的支持。不清楚的是，毛泽东在这场讨论中的立场，他在1945秋曾因赴重庆谈判而受到延安一部分领导人的批评。^②

显然，来自莫斯科的建议对作出最后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③3月15日中共领导得知，苏联将最终从满洲开始撤军。与此同时，苏联敦促中国同志展开攻势。莫斯科批评中国同志对美国太客气，并鼓励他们在所有苏军撤离地区，包括沈阳和四平“自由地和大规模地开火”并无条件地在长春和哈尔滨以西巩固

参阅 Garthoff: <The Soviet Interventions……>, p.76; Westad: <Cold War > p.152, 157, 159;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1957年波恩版第191-194页;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78 f.;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46, 149, 152; 《刘少奇年谱》第二卷第20-24页。

^② 同上, 第114、142、144页及下页、150页。

关于苏联建议和中共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杨奎松作了说明，见：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and the CCP'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in: <Chinese Historians > No.1, Vol.V (Spring 1992) p.27

其地位。^①

3月15日，中共领导在—项指示中明确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和周围地区撤离。国民党与中共军队之间的争夺已在东北开始。”它要求各地“作好军事准备”。中共领导同时还批准在苏军撤离的当天，对辽宁与吉林交接处的铁路重要枢纽四平展开攻击。3月15日至16日，四平攻克。东北局接到命令，立即与苏军联系，以便使“我们的部队进入中东路全线（包括哈尔滨），永久占领这个地区，不让国民党进驻—兵—卒”。3月17日中共领导确信，东北大部已在共产党手中。它决定，派部队进入中长铁路以北的苏军撤离地区。这样，中共成功地占领了沈阳以南的那些城市和铁路线。^②

直到3月20日，周恩来在重庆还—直试图与马歇尔和国民党政府达成某种妥协，但这种努力已日益被其他领导人所抛弃。显然，他在回延安的5天里，因过于迁就而受到批评和约束。3月25日，他返回重庆后，坚定地执行在延安确定的强硬路线。在后—段时期，他力图阻挠政治解决。^③鉴于来自东北的消息，重庆准备妥协的气氛也消失了。3月11日马歇尔返回美国后，他的代表吉勒姆中将，作为—个坚定的反共人士，不努力让国民党领导克制。于是，在—个星期之后，重庆谈判停止了。4月中，中共发言人公开确信，东北的控制问题将以武力来决定。^④

此段参阅 Westad: < Cold War >, p.156; Yang Kuisong: < The Soviet Factor > . p.27, 以及关于中共档案文件的注释。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69页及下页；Reardon - Anderson: < Ya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48 - 150, 152.——有一位当时驻扎在满洲的共产党军官称，在3月15至20日期间，他和他的同志们还不断被告知，和平还有望。但到3月21日党领导电告，和平已破灭。见 Reardon - Anderson: < Ya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51。

^③ 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 p.79 f.——据—位美国在延安的观察家称，周恩来对来自党领导的批评感到恼火。见：FRUS.1946.Vol.XI The Far East: China, p.596, 742, 引自 Reardon - Anderson: < Ya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53。

同上，第152 - 154页。

自赫尔利被召回和马歇尔出任以来，中共的报界对美国的态度是温和的。但现在它的声音重新强硬起来。4月18日马歇尔返回重庆，一篇文章为此提出警告说，如果华盛顿重新采用赫尔利的反苏和反共的政策，这不仅会导致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而且会威胁世界的和平。^①

中国共产党人已不再对美国的调停感兴趣，而感到自己已强大到能够在战场上寻求问题的解决。这首先表现在四平的战斗上，它是共产党控制的最南边的城市。在那里，由林彪指挥的东北部队改变了他们迄今为止的、避免与优势敌人进行较大军事战斗的策略。当4月1日国民党部队试图向长春突破时，在四平遭到了共产党部队的猛烈抵抗，直到5月19日才得以突破。在这场自1937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战役中，共产党人遭到了严重失败。曾帮助中共占领四平的苏联部队，在保卫这个城市时却撤退了。据说，他们对中国同志的军事能力表示不满，并认为他们应“自己关照自己”。据说马林诺夫斯基曾向莫斯科建议不要再给中共以支持。而彭真却不得不成为四平失利的替罪羊。他于1946年夏被解除了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林彪接替了他。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苏联不可能给许多援助，“因为他们现在感到无力与美国抗衡”，苏军在向北撤离时，在哈尔滨以南的松花江畔停留了下来。这是东北各地区激烈战斗的开始。尽管当时双方都想尽可能地把军事冲突限制在东北境内，但人们可以把四平的争夺战看成是内战的第一个战役。^②

从3月中到5月3日，即至最终撤离，苏军力图尽可能多地撤出的地区留给共产党部队。相反，它却很少为国民党军队接

同上，第154页及下页。

同上，第99页及下页；Westad: < Cold War >, p.159, 165; Garthoff: < The Soviet Interventions…… >. p.77;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53 - 156。

管这些地区作出努力，但长春等属于少数的例外。^① 自原定 2 月 1 日撤军日期到期后，国民党政府就要求莫斯科提出撤军计划方案，但莫斯科有意拖到 4 月初才提出。此后，苏军还在许多情况下不向国民党通报其部队的调动情况，而往往在几天前就通知了共产党的部队，以便他们赶在国民党部队之前到达撤离区。^② 4 月下旬，共产党部队占领了北部的许多重要城市，在中部占领了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在苏联撤军结束时，东北大部分地区被中共所控制。此时，国民党主要控制了北京至长春铁路沿线的辽西走廊和沈阳及其周围地区。^③

显然，斯大林继续低估共产党的军事打击力量，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军事能力。因此，他当时认为争取实现这样一种分治方案是值得的，即：东、北满由共产党控制，成为一个缓冲国；而南满则继续由国民政府控制。随后，则是华北由共产党控制；华中和华南继续由国民党统治。^④ 这一方案使人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多次提出的对莫斯科的指责，认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试图制造一个分裂的中国。

苏军还利用撤离前的时间，拆卸满洲工业中的有价值的设备，估计约值 9 亿美元，并作为“战利品”运往苏联。^⑤

Westad: < Cold War > . p.162。

^② 见《蒋介石日记》，1946 年 3 月 13 日引自 Furuya: 《蒋介石：生涯和时代》，张春明编写的英文节录版，1981 年纽约版第 874 页及下页；Pepper: < The KMT - CCP Conflict > . p.732 ; 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 . p.149。

此段参阅 Garthoff: < The Soviet Interventions…… > . p.76 f.; 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 . p.80 f. 83;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48 f.; Westad: < Cold War > . p.162 汉德齐克:《苏联撤军的政治条件》见《三个事件研究: 亚洲 1925、1946、和 1948》，SWP - 第 136 页。

持这种观点的有 Garthoff, 见: Garthoff: < The Soviet Interventions…… > , p.77。

关于苏联“战利品”的细节，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 年波恩版第 196 - 199 页; Clubb: < China & Russia > . p.353 - 357; Westad: < Cold War > . p.100- 104; Furuya: 《蒋介石生涯和时代》第 870 - 873 页; Garthoff: < The Soviet Interventions…… > . p.74。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攻势，占领了长春和吉林。在东北停火状态结束后，国民党部队成功地在年底前接管了几乎所有东北城市。1947年初，已于1946年7月改称为“人民解放军”的共产党部队发动了攻势，至1948年底占领了整个东北。^①

综上所述，尽管莫斯科在满洲的态度，开始时犹豫不决，后来又不断变化，但可以认为，苏联的满洲政策对共产党的获胜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斯大林力求对满洲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自1945年8月以来，苏军的存在保证了苏联对这个地区的影响。随后，斯大林希望通过暗地里的帮助，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并从而使它成为苏联在满洲的某种形式的代表。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苏联故意拖延撤军，一直拖延到中共把大批军队和行政干部派遣到了满洲，从而在苏联的支持或容忍下把革命从农村扩展到了城市。苏联在满洲的这种隐蔽性的干预阻止了国民党迅速接管政权，并为中共提供了“占领中国的跳板”。^②

另一个对中共赢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向中共部队提供了日本的武器和弹药，以及后来对共产党占领区提供经济、技术和药品的援助。^③援助总数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巨大的。据苏联材料称，仅在初期阶段给中共两个方面军提供的就有：3,700门大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万挺机枪，以及各种仓库和松花江上的军舰。^④显然，绝大部分的武器是来自日本的军火

同上，第77页及下页。

^② Lloyd E. Eastman: *<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 Stanford, CA 1984, p.223 f. 引自 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 p.239。

关于援助情况参阅鲍里索夫：《苏联与满洲的革命根据地（1945-1949）》，1977年莫斯科版第181-204页。

同上，第185页。另参阅斯托尔贝克：《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 1945-1953》，关于冷战背景下苏中结盟的产生历史的研究，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第1部分第82-84页，及有关数字和资料来源的提示。

库，但也有一些是无偿提供的苏联和捷克造武器。^①武器的提供，特别是外国武器的提供，是严格保密的。1949年1月傅作义投降后，林彪部队开进北平时，所有苏联武器都被换成美国武器，如毛泽东讽刺地说，这是为了显示“蒋介石是如何以美国技术来装备人民解放军的”。^②

有利于中共控制满洲的，还有苏联自1946年底为恢复铁路运行而提供的援助，以及与苏联进行的商品交换。1947年至1949年期间，商品交换总额从4.13亿卢布提高到9.16亿卢布。而苏联与国民党控制的满洲地区的贸易却少得多，例如1948年苏联出口总额仅为3600万卢布。^③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实际上债权和债务是相抵的。如前所述，苏联在占领满洲后把大批工业设备拆运到了苏联。满洲作为全中国发达的工业区，其工业生产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据一个美国调查委员会的测算，被拆卸的设备价值达9亿美元，而因拆卸造成的破坏则高达这个数字的10倍。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公众舆论面前尽量缩小被盗窃物资的价值，^④但人们可以确信，苏联的掠夺使中共领导感到有一种难言之苦。特别是在评价50年代苏联对华援助方面，北京完全可以开出这样一份债权和债务相

^① 1949年1月31日和2月6日或7日毛泽东与莫洛托夫的谈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9，第2、86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97、100页。

^② 1949年2月5日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9，第37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97页。此段还参阅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239 f.

此段参阅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与中国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1977年莫斯科版第169-183页；斯托尔贝克：《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1945-1953》，博士论文，第1部分第132-135页，及有关数字和资料来源的提示。

例如李立三认为，满洲的战利品与苏联在（欧洲）战争中的报失相比，其价值是不大的。见：Garthoff: <The Soviet Interventions……>，p.74。

抵的账单。^①

第五节 中国从和平转向内战：四个中心人物的表演

在本书的上一节，我们探讨了东北的战后发展。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全中国的发展上来，即探讨一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1949 年苏联与共产党中国结盟的这段时期里，中国的总体发展情况。中心问题是：在四方的战略框架中，莫斯科对中共的态度演变。

194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与蒋介石进行了六周的谈判之后回到了延安。^② 接下来的四周标志着谈判的失败，因为人们在有争议问题上，在共产党的地方管理机构的继续存在和共产党部队并入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赫尔利大使感到，这也是他的使命的失败，但他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务院对其政策的反对态度。11 月 26 日，他辞去了他的职务。^③

此时，中共领导的态度也日益明朗，尽管他们对莫斯科 11 月份在满洲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感到失望，^④ 但他们不得不表示顺从莫斯科的压力。他们感到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形成的压力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想贸然与苏联发生冲突。他们以自我克制的方式来照顾苏联的利益。他们解释说，蒋介石要求苏联在他与中共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莫斯科也同时要求国民党在

此段参阅 Clubb: < China & Russia >, p.355 f.; 斯托尔贝克:《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 1945 - 1953》, 博士论文, 第 1 部分第 105 - 111 页, 及有关数字和资料来源的提示。

有关会谈情况,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此段参阅: < The China White Paper >, August 1949, p.105 - 112; Bagby: <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 p.218。

^④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苏联与美国的争斗中保持中立。因此，中共必须向苏联领导表明，他们与重庆的斗争与苏联无关。^①

此外，中共领导也努力争取美国在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保持中立。11月初，当时毛泽东摆脱了日常政治工作，他甚至考虑，按长期推行的“统一战线”策略，重新打美国牌，以便在华盛顿与重庆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当美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在华北的军事合作日益紧密时，特别是在11月20日山海关被占领之后，刘少奇和其他几位最高领导人看到，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并不一定能带来某方面的援助。如前所述，到11月底，可能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中共领导又认为，“缓和与美国的当前紧张关系”是有意义的。中共领导命令地方司令员，避免与美国部队发生意外事件，减少“美国挑衅”的可能性。与国民党斗争的成果取决于人们是否能把美国人排除到军事冲突之外。^②

简单说来，莫斯科和延安的状况是：苏联领导认为美国是主要敌人，并首先担心美国对满洲和华北干预的升级。因此，它努力通过对国民党的守约来安抚华盛顿，并同时想以此来阻止重庆与华盛顿结成军事同盟。在履行1945年8月14日条约方面，莫斯科不愿受到中国同志的干扰。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应避免的主要危险是美军支持下的国民党大规模进攻。人们只能指望从苏联获得援助，但不能声张。面对现实的政治状况，莫斯科和延安都感到，阻止华盛顿与重庆的结盟是他们的共同目的。

如前所述，华盛顿在讨论美国的今后中国政策时，受到了苏联对外政策所引起的干扰。当时，苏联在欧洲推行中东欧国家的

此段参阅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引自 Westad: < Cold War > , p.129。

此段参阅1945年11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和王若飞的电报；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的指示；两个文件均引自 Westad: < Cold War > , p.128 f。

苏维埃化，在东北亚要求在日本建立苏联占领区。在日本投降后，苏军还继续向满洲推进达数周之久，这已使美国感到恼怒。随着美国对苏联的中国政策日益感到怀疑，美国在中国的登陆部队也日益帮助国民党，并协助国民党部队解除日本的武装。杜鲁门总统企图以此种方式建立一个对美友好的、抵制苏联扩张的中国。这也是他的前任罗斯福在战争期间所梦想的。华盛顿对莫斯科的不信任还由于下述因素而不断加强：莫斯科一再推迟从满洲撤军的日期，并利用一直推迟到 1946 年 4 月底的这段时间，大肆撤走满洲的工业设施，与此同时，也为中共部队占领北满提供了可能。^①

1945 年 12 月，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比较清楚的轮廓。在 12 月 15 日的一项关于中国的声明中，杜鲁门总统强调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批评中共保持独立军队，宣布美军将继续驻扎在中国，并宣称其意图是为结束内战作出贡献。12 月 27 日在赫尔利大使被召回后，任命乔治·马歇尔为大使衔的总统“特别代表”，这也是为实现这一意图服务的。马歇尔的出发点是：如果延安不向重庆作出让步，他将把国民党部队运往北方；如果蒋介石不愿作出妥协，美国也将不再理睬他。^②

延安对明显偏袒国民党的赫尔利的离职以及杜鲁门的声明表示欢迎。尽管人们认为美国原则上仍将继续站在国民党一边，但他们把赫尔利的离职和杜鲁门的声明看做是华盛顿对蒋介石军事支持的结束，以及美军很快撤离中国的标志。中共领导无论是在官方的声明中或是在共产党人与美国人的个人接触中都使用了友好的声调。此时，美国在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得到的印象是，如果马歇尔将军能考虑他们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将“投入美国的怀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① 此段参阅图赫曼：《沙与风—美国和中国 1911—1945》，1973 年斯图加特版，第 537 页及下页；Westad：< Cold War >，p.131—133。

抱”。^① 显然，对美的友好姿态仅是出于策略原因，因为在中共内部依然认为：杜鲁门的对华声明同过去一样是其“扶蒋、防苏、压共”政策的表现。^②

12月27日，共产党代表团再次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它是在马歇尔主持下进行的。显然，中共领导希望结束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并通过中共参加联合政府取得合法地位，进而最终在和平竞赛中赢得胜利。蒋介石同过去一样主要想把共产党部队置于他的总指挥之下。11月底，莫斯科建议中共领导采取建设性态度。此外，斯大林还让中国同志知道，他要再次与他们紧密合作，并阻止美国部队进入满洲。^③

12月底，美、苏、英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希望苏联和美国的武装力量尽快撤离中国。此外，三国还主张结束内战，并希望看到一个在广泛吸收其他“民主力量”参加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之下的“统一的和民主的中国”（这里对“民主力量”的性质未下定义）显然，国民政府对外长会议的结果表示欢迎，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对此持怀疑态度。王担心，如同上次雅尔塔会议一样，三大国是在牺牲中国政府这一点上取得一致的。外长会议的结果受到延安的欢迎，并推动了乐观主义的重新出现。^④

1945年底1946年初，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与斯大林进行了两次谈话。从谈话中可以粗略地看出，苏联与国民党中国之间的

^① 1945年12月20日耶顿给魏德迈的信，引自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28.

^②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17页及下页。此段还参阅 Westad: < Cold War > . p.137 f.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418页；Westad: < Cold War > , p.137 f.——关于重开谈判可参阅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④ 此段参阅 Clubb: < China & Russia > , p.354 f.; Westad: < Cold War > , p.134 f. 141 f.;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p.160 - 168.

关系具有什么样的质量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中日战争结束后莫斯科与国民党领导之间的一次高级别的会晤。最近，有关会晤记录向研究界公布了。^① 有材料证明，蒋介石和蒋经国在论述这次谈话时并没有总是说出真话。下面将详细探讨这次谈话，并特别阐述这次谈话中反映出来的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

蒋经国是由其父派往莫斯科的，首先是为了使斯大林相信国民政府的不可改变的友好情意，并请求斯大林在控制中国共产党方面提供帮助，以及探测为获得苏联在满洲的合作应付出什么代价。在蒋介石为其子指点工作的书面训令中，蒋介石让其子首先向斯大林表示感谢，感谢苏联为战胜日本所作出的贡献。接着，让他敦促苏联军队按期撤出满洲，并请求斯大林支持中、苏、美的经济合作，但美国和其他外国应不谋求对满洲开发的参与。在满洲的中苏合营企业中，他希望能保证中方的多数控制权。据说，蒋经国还告诉斯大林，在抗日斗争的 20 年中，其父按孙中山的政治哲学统治了中国。因此，他并不害怕中共。他准备在两个前提下吸收共产党人加入联合政府：中共既不要破坏中国的统一，也不要危害国民党对中国的领导。他希望斯大林支持在他执政下的中国统一，以及劝说共产党人不要以武力向他的统治进行挑战。^②

这里指的是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苏联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页码第 98-121，123-140）公布于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1945 年 12 月 - 1946 年 1 月蒋介石儿子在莫斯科的秘密访问》，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6 年第 4 期（以下简称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作者得到一份原件的复印件。但迄今为止还得不到中国的记录，尽管蒋经国多次提到这次谈话。此处参阅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p.171（及中国资料来源的提示），以及 Furuya: < Chiang Kai - shek……>, P.869. 为什么中国记录不能得到，有关的推测请参阅下一节。

此段参阅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p.169 - 171, 此处根据“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外交部档案咨询处”，台北）的档案材料复述了蒋介石给蒋经国的指示。此外，也参阅 Westad: < Cold War >, p.140 f.

当时 36 岁的蒋经国是其父在苏联事务方面的一个比较亲近的，很可能是最亲近的参谋。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苏联问题专家，因为他从 1925 年至 1937 年在苏联生活，在那里学会了流利的俄语，并与一位俄国女人结了婚。他在苏联使用的名字是：尼古拉伊·伏拉季米尔洛维奇·埃利萨罗夫，这是对列宁的姐姐安娜·伊利齐娜·埃利萨罗娃的一种崇敬的表示。他在 1927 年结束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后曾被苏联当局禁止回中国，甚至禁止与中国通信。1936 年西安事变后，斯大林决定支持蒋介石为中国领导人。此时，蒋经国才被允许回中国。回国后，他效忠于蒋介石。在战争期间，他多次向苏联驻重庆的外交官表达他父亲愿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愿望，并与他的妻子一起力图与苏联外交官结成朋友，但他们因害怕情报机关的怀疑而与他保持距离。^① 战争结束时，蒋经国有机会熟悉苏联外交政策的实际。他于 1945 年夏参与了在莫斯科进行的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并在 10 月至 12 月作为其父的特使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就苏联从满洲撤军问题进行了谈判。^②

蒋介石肯定愿意亲自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以便同他讨论满洲的未来和中国的形势。但斯大林显然不敢邀请他，因为他要考虑毛泽东的感受，斯大林曾因 1945 年 8 月 14 日同盟条约所承担的义务而不愿在莫斯科接待毛泽东。这就是斯大林愿意接待蒋经国作为其父的“私人代表”的背景。这里不清楚的是，是斯大

^① 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第 104 页。——列多夫斯基当时在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担任外交官的工作。

此段参阅 Boorman/Howard: <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 Vol.1, P.305 - 309 ; Valentin Zajcev: < Ljubimaja

据苏联情报机关的档案材料称，蒋经国曾秘密告发了一位苏联公民是“托洛斯基分子”和“人民的叛徒”，同上，第 44 页。但这并不一定象 Zajcev 所说，这可证明蒋经国离开苏联时是一个“虔诚的布尔什维克”。很可能是，蒋经国在他自己被密告为托洛斯基分子后，他密告别人是为了在当时严酷的政治迫害时代表示自己对于苏联政权的忠诚，以便不要在最后时刻影响他的离境。

林自己发出的邀请，还是他对蒋介石提出的愿望作出的反应。据蒋介石称，这是突如其来的。可以认为，动议是来自蒋介石。有助于说明这一点的是，斯大林在会晤一开始就问客人，蒋介石想说些什么。蒋经国是于 12 月 25 日飞往莫斯科的。^①

1945 年 12 月 29 日，苏联副外长洛佐夫斯基按斯大林的要求，为准备第二天与蒋经国谈话，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外长的形势分析报告。^②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苏联关注的利益和观点。洛佐夫斯基认为，蒋经国对其父是“百分之百”的忠诚。但他“作为原联共（布）党员”也想在蒋介石和苏联领导之间玩弄把戏，把自己打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为了达到他父亲拟定的目的，他甚至可以批评他父亲。实际上，他是一个“中间派”，因此不能与“顽强的讨价还价者”宋子文相提并论。他未必受命要与苏联领导缔结什么协议，而仅是为了来谈谈，“为蒋介石亲自来访做准备”。^③

洛佐夫斯基在报告中提出，蒋经国将就满洲的政治形势、满洲日本企业的利用、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满洲开发、将整个满洲移交给国民政府的地方和军事行政当局等问题举行谈判。他显然受命要在谈判开始或结束之时安抚苏联政府，使其对美国在中国的作用问题上放心。据说，蒋介石并不想给美国优于苏联的任何优先权。报告说，很可能蒋介石已就苏联问题向美国作了类似的声明。有一点是清楚的：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又想利用美国。尤其是想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来巩固国民政府。

洛佐夫斯基设计了以下一幅场景，双方可能提出的问题是：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第 103 页；同上，第 109 页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 年波恩版第 173 页。

② 这份报告在最近已经得到，它出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89，案卷 146，页码第 20-26）。作者得到了一份原件复印件。该报告发表在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第 105-108 页。

此处和以下 3 段参阅该报告，同上。

蒋经国将努力争取“我们用强力或以道义的影响迫使共产党军队放弃占领满洲和华北的斗争”。他将请求苏军暂缓撤出。“中国人知道，我们从满洲运走了大批设备。”他们将请求归还那些设备，这将作为能与苏联共同经营那些日本企业的条件。他们甚至考虑到，如果苏联拒绝归还，他们将以从美国进口这些设备来相威胁，这将意味着美国资本向满洲的渗透。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争取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满洲的开发方面。蒋可能请求苏联对新疆起义者施加一定的影响，以及关心一下蒙古人民共和国与内蒙的关系，不要让外蒙对内蒙的事务进行任何干预。洛佐夫斯基设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苏中关于大连协议的不同解释问题。洛佐夫斯基以此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违反了条约，对大连港实行了完全的控制（对旅顺口也是如此）。旅顺港完全关闭，中国和外国船只要进入大连港，也需经苏联当局许可。^①

洛佐夫斯基建议斯大林，敦促蒋经国尽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因为出现了重庆有拖延的迹象，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利用苏美之间可能出现的纠葛，回避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他还进一步建议，保卫中长铁路的苏联部队应在 2-3 年内继续留在那里执勤，因为否则铁路将受到破坏，列车将遭到抢劫。人们还必须向蒋经国说明，苏联将不会容忍美国将其影响扩展到满洲。为阻止外国资本进入满洲，莫斯科必须在满洲开展积极的经济活动。为此建议，应共同经营原日本的企业，其中包括大连大型修船厂。

12 月 30 日和 1 月 3 日，蒋经国与斯大林会谈了两次，各一个半小时。参加会谈的还有莫洛托夫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以及一位作为翻译参加的外交部官员。在第一次会晤开始

这一点也为列多夫斯基所承认，见同上，第 107 页注 14。

时，蒋经国递交他父亲的一封信，^① 蒋介石在信中向斯大林表示了敬意，并对他本人因战争而未能早日拜访而感到遗憾。他对苏联抱有友好的感情，并愿意就双边关系中的所有问题进行讨论。

下面就根据苏联记录，简要复述一下这两次谈话中对本书主题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

12月30日，蒋经国在谈话进入实质部分时强调，他父亲认为战后中苏关系更加紧密。如果蒋介石和斯大林之间成为“个人朋友”和“完全的相互了解”的话，这种关系必将得到加强。接着，蒋经国转入他父亲最感忧虑的问题：与中共的关系。他几乎以一半的谈话时间用于敦促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以求使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可以共处。他保证，国民党“不打算消灭中国共产党”，并甚至认为，两党的“政治路线之间没有矛盾”。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存有消灭国民党的意图。^②

斯大林援引莫斯科外长会议公报称，中国应“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行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国民政府，必须停止内战。蒋强调，共产党人可以参加政府，但共产党地区必须“服从中央”。在重庆，蒋介石和毛泽东达成一致意见：共产党人必须缩小其军队，只保存16-20个师。当然，军队也必须服从“统一指挥”。蒋以此重新提出导致10月11日重庆谈判失败的要求。蒋还提醒斯大林，他曾对宋子文说过，“在保留国民党领导权的条件下实行中国统一”，但要有“广泛的民主力

^① Murray 在其博士论文中根据“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外交部档案咨询处，台北）的档案文件，复述了该信的内容。见：Brian Joseph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Soviet -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 - 1950 > Ph.D. Dissertation,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nn Arbor, Mich. 1995, P. 169.

^② 这段参阅 1945年12月30日谈话的苏联记录，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第109页及下页。

量参加’。^①

斯大林显然察觉到，蒋想让苏联进行调停。斯大林支吾其词地回答说：因与中国共产党人意见分歧，苏联已从延安撤回了它的 3 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不隶属于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已不存在”；莫斯科做中间人非常难，因为它不愿向别人提出以后将遭到拒绝的劝告；再说，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要求苏联提供建议。^②

蒋不断要求斯大林对延安施加压力，说“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听从他的建议。斯大林茫然地回答说，他不知道共产党人有什么计划，也不知道重庆谈判为什么失败了。他不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产生困难的原因，可能是领袖之间互不信任，可能是朱德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欺骗他们。斯大林说，当中国共产党人希望转移到满洲时，苏联指挥部没有让他们进入。他说，苏联政府不满意他们的行为。自 8 月以来，共产党人不再向莫斯科征询建议。蒋幼稚地问，如果延安征求建议，斯大林将如何处之。斯大林含糊地回答说，他将根据他对蒋经国谈话的精神给予建议。斯大林不断重复说，共产党人不愿向他征求建议，直到蒋经国放弃了他的紧逼，但蒋尖锐地指出，一些人认为，站在背后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的是苏联。斯大林干巴巴地回答说：他们的看法不正确。^③

蒋向斯大林宣称，应该回到 1923 年至 1924 年孙中山在世时候的苏中关系的精神上来，并提起“黄埔军校”，以此暗示苏联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④ 斯大林回答说，现在合作的前提甚至更

① 同上，第 110 页及下页。

② 同上，第 111 页。

③ 同上，第 111 - 114 页。

④ 关于 20 年代的军事援助，参阅迪特·海茵茨希：《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 1923 - 1927》，载于《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1978 年巴登 - 巴登版第 1 卷第 99 页及下页。

好。“苏联准备建立最紧密的关系。”蒋以其父的名义宣称：“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参加旨在反对苏联的事”。斯大林也对应地作了同样的声明。他还借机对美、英进行了指责，说美国和英国的侦察机关散布传闻，说苏联同英美很快要发生战争，这显然是为了吓唬苏联和中国。蒋以其父的名义保证，在未来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事先同苏联磋商，同苏联达成协议以共同的观点行事。斯大林指责中国，到目前为止，中国代表在国际会议上反对苏联。蒋经国回答说，以后中国将同苏联站在一起，共同行事。^①

接着，蒋经国转向中心议题：满洲。蒋首先以其父的名义感谢苏军指挥部在“恢复满洲政权机关”方面所给予的帮助。^②蒋经国向斯大林保证，满洲将永远不会成为反对苏联的基地。中国准备使边境地区非军事化。他父亲建议，在满洲经济方面“实行开放政策，但苏联在经济中保留主导作用”。斯大林谦虚地表示，满洲的主人应当是中国，苏联在满洲不追求主导地位。蒋经国回答说，中国政府想给苏联提供这种地位。斯大林默然接受，并表示感谢。斯大林同意蒋的建议，表示苏联将购买满洲的货物，并给予满洲以“可能的经济援助”。^③

此时，蒋经国提出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他说，苏军指挥部把满洲的所有企业都看做是战利品。斯大林回答说，遵照战争规律，只有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那些企业才算作战利品。蒋经国说，他父亲建议不要把这些企业宣布为战利品，但鉴于苏联在对日作战中遭受了损失，以及为了中苏友谊，中国愿把占总数一半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第 114-116 页。

列多夫斯基认为，巴甫洛夫的译和记录有误，因为在满洲苏联军队只是在口头上帮助国民党，而实际上支持共产党人；见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第 116 页注 28。列多夫斯基的这一判断有误，因为 11 月中苏联改变了政策路线，至少把较大的城市交给了国民党；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第 116 页及下页。

的企业交给苏联。斯大林反驳说，苏联在波兰也是这样做的，只没收了德国的企业，并把大约一半的设备留给了波兰人。但斯大林答应考虑蒋介石的建议，“不让中国感到有任何屈辱”。蒋经国建议，不要像日本时期那样，只建立一家合营公司，而是建立几个独立的合营公司，以避免造成一种搬用日本模式的印象。斯大林表示同意。斯大林问，中国政府是否还会要求苏联军队再次推迟撤军期限。蒋经国否认说，把撤军推迟到 2 月 1 日是中国政府要苏军延迟撤出的最后一次请求。接着，蒋经国请求斯大林调停国民政府与新疆北部起义者之间的冲突。斯大林原则上答应。^①

蒋经国接着把话题转向中美关系。他说，他父亲对中、苏、美之间的“合作”和“联盟”感兴趣；同蒋介石谈过话的美国代表，没有一次对苏联有过不好的评价，特别是马歇尔还对斯大林表示完全的信任。斯大林表示赞同。蒋经国说，“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中国更靠近苏联”；中国期待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它不会失去政治上的独立性。斯大林表示同意。蒋经国解释说，美军进驻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华北，是为了解除日本人的武装，随后他们将撤离那里。斯大林说，苏联不希望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区”，不能让美国、英国和其他外国军队进入满洲。蒋经国保证，美军不会进入满洲，美军一旦完成任务就将撤离中国。^②

斯大林指责美国对日本人不够坚决，没有俘虏日本军队，没有逮捕日本将领。美国人现在就像上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待德国军官和将领一样，对待日本的军官和将领。当蒋经国回应说，中国人民将永远也忘不了日本人，斯大林蛊惑人心地插话说，中国人民很好，但应该有好的领导者。蒋经国对此未予理睬。斯大林

同上，第 117 页及下页。

同上，第 118 页及下页。

试图寻找苏中针对美国的共同点，他指出，中国和苏联知道日本和德国的占领意味着什么，从而也懂得必须把日本置于不能再战的条件之下，而“美国人不懂得这一点”。^①

蒋经国宣称，他已经谈完了他要说的所有问题。莫洛托夫询问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蒋经国说，中国政府将在二月初迁回南京时宣布承认。

在 1946 年 1 月 3 日第二次同样范围的会谈开始时，斯大林向蒋经国通报说，苏联军人坚持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宣布为战利品，并认为中国方面不愿这样做使苏联军人感到委屈，因为他们曾作出了流血牺牲。但斯大林接着说，这些战利品企业将按照平等原则由苏中双方联合经营。他没有理会蒋的反对意见，但认为可以研究蒋的建议，将一些重工业企业划给中国。^②

蒋经国阿谀奉承地请求斯大林，陈述其对国民政府近期实行的政策的意见，声称其父希望斯大林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疑虑和不同意见。斯大林谦虚地表示，因为他对中国发生的事不全都清楚，不知谁做的不对，所以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他不掌握事实，岂能提出什么建议，他只有问题，例如：为什么国民政府或美国拖延解除日本人的武装，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不能达成一致。他说，“毛泽东是一个独特的人和独特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农村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对此不理解。斯大林重复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就是“对中国国民政府友好和支持的政策”。斯大林认为中国实行对美友好政策是正确的，因为蒋介石期待美国的援助，而“苏联不能给中国大的援助”。蒋经国回答说，解除日本武装的困难在于国民党军队驻在华南。重庆未能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是因为双方领导人互不信任。中国

同上，第 120 页。

② 同上，第 121 页及下页。

人民表达了对达成协议的关心，因为内战是可怕的东西。斯大林表示同意地说，苏联知道什么是内战。

随后，蒋经国询问斯大林对中国民主化的形式有什么考虑。斯大林支吾地回答说，在苏联没有敌对的阶级，所以在苏联可以存在一党制。斯大林问，在中国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党派？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向蒋经国解释，在苏联存在一种有效运行的两院制。蒋经国问，斯大林是否认为南斯拉夫和波兰存在的形式也适用于中国。斯大林支吾地回答说，南斯拉夫和波兰同法国一样，是两院制。斯大林试图使蒋经国相信，在西方民主与东欧（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存在的政治制度之间没有原则性区别。蒋经国问，斯大林如何评价国共两党现在的力量对比。斯大林回答说，因为中国还没有进行选举，所以很难估计人民会怎么想。很可能，国民党应获得多数，但到底多少，他不知道。他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可能共存。两党可以像苏联同美国和英国资本家一样和睦相处。^①

当蒋经国问，斯大林对国民党的印象如何，斯大林指责说，在满洲还有人散发国民党签发的传单，号召杀死俄国人。国民党有两付面孔；一付是公开的，另一付是秘密的。在满洲进行秘密活动的国民党员号召把苏军驱逐出满洲。蒋经国回答说，他父亲已下令解散在满洲从事反苏宣传的国民党组织，并逮捕其成员。斯大林反驳说，但国民党没有正式同这些组织划清界限。斯大林问，中共是否真的比国民党强大，毛泽东叫嚷他有 150 万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他有 60 万。蒋经国回答说，这个数字显然是夸大了的。斯大林认为，国民党将作为民族的自由的政党存在。“那些认为共产党要吃掉国民党的人是错误的。国民党是一个比共产

同上，第 123 页及下页。

党更广泛和更有影响的党。’^①

蒋经国把话题转入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斯大林以教训的口吻说，中国要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必须有自己的工业，而不能只醉心于贸易。中国有资源和热爱劳动的人民。它应开采石油。为加快工业建设，需要外国贷款，但它的使用不能单由贷款者来决定。从外国进口商品是必要的，但不能允许强加任何条件。外国列强当然反对建设中国自己的工业。^②

蒋经国问斯大林对门户开放政策怎么看。斯大林回答说，外国曾希望苏联开放，但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了。但中国作为一个弱国，形式上必须同意门户开放政策，这是通常要求半殖民地国家实行的政策。但中国晚些时候必须关闭门户，以便建立自己的工业。斯大林说，华盛顿要求苏联政府在满洲采取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回答美国人说，它不是满洲的主人，这个问题应当去问中国。针对蒋经国的提问，斯大林说，苏联没有要求中国开放门户，而是声明，如果中国同意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苏联将不反对。蒋经国声称，他认为除苏联外，没有人希望中国复兴。斯大林说，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发展工业并同中国通商，购买中国的大豆、稻米、棉花、某些原料，一些钨矿等。为此，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某些车床、机器和给予专家援助。斯大林对蒋提出的在苏联为中国培训中长铁路专业人员的问题，也作了原则上肯定的回答。他也宣称，同意中国派经济代表团来苏联。蒋经国问，是否有可能派苏联专家去新疆。斯大林说，自盛世才开始逮捕苏联专家后，苏联政府已把他们从新疆召回。如果好好对待苏联专家，还可以把他们派回去。^③

在会谈的最后，斯大林宣布，他有一封信要转交给蒋介石。

① 同上，第 125 页。

② 同上，第 126 页。

③ 同上，第 125 - 128 页。

他在这封由三小段组成的信中，希望两国关系将按照苏中条约发展，强调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结果对远东以及对中国和苏联的巨大意义。^①

从这两次会谈中可以看出，蒋经国在斯大林面前，就像学生在老师面前那样，不自信，拘谨，有时还有些卑躬屈膝。他多次征询建议，并请求对国民党的政策提出批评。斯大林基本上没有这样做，只是在蒋的请求下进行了一次类似批评的表述。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蒋经国有一种处于绝望的心态。但这也并不奇怪，8年前，他作为一名普通的联共（布）党员生活在苏联，并经历了斯大林作为无限权力的独裁者所导致的充满恐惧的令人恼火的恐怖浪潮。

洛佐夫斯基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认为，蒋经国可能提出一些涉及两国关系的棘手问题，但蒋经国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却保持了沉默。例如，苏联在满洲的战利品问题。虽然蒋经国谈到了“战利品企业”的问题，但没有像洛佐夫斯基所预见的那样，要求归还那些合营企业中已被苏联运走的设备。就像 1945 年夏谈判联盟条约时那样，战利品企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与其父的指示相反，蒋经国也没有提出在未来合营企业中应拥有多数控制的要求。据洛佐夫斯基估计，蒋经国将在大连（和旅顺）问题上指责莫斯科违背条约的态度，但实际上他没有谈及。相反，斯大林在满洲违反条约，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上，却表现得相当粗鲁和无理，他指责国民党以反苏的态度对待苏联军队。而蒋经国对此的反应却是软弱无力和防御性的。

事实上，苏军是在国民党施加了巨大压力后，于 11 月中才把某些满洲城市交给国民党。使人感到奇怪的是，蒋经国却对苏军指挥部帮助国民党“恢复政权机关”表示感谢，而且与洛佐夫

同上，第 129 页。此处转载了此信的全文。

斯基的预言相反，一字未提要把整个满洲置于国民政府之下的必要性。此外，洛佐夫斯基关于蒋介石要请求暂缓撤军的预言也不准确，但蒋经国也没有像其父所希望地那样强调按期撤军。斯大林应感到特别满意的是，蒋经国在没有逼迫的情况下自己允诺，中国将帮助苏联在满洲建立“主导地位”。同样，蒋经国还保证，他的政府将不允许美国部队进军满洲。诚然，这是在斯大林以粗鲁的方式提出这一要求后，蒋经国才予以允诺的。

事实证明洛佐夫斯基的这一预言是正确的，即：蒋介石将催促斯大林说服中共对国民政府采取和平的态度。这一问题被蒋经国作为首要问题提出，并在其谈话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这表明，这个问题是国民党领导的心头之患，想急于解决。但斯大林则对此表示，他似乎对中国共产党人根本没有影响，与他们也没有联系。这全然是虚假的。当然，斯大林所说的这一点是事实：莫斯科已从延安召回了他们的联络员，但这也只是发生在 1945 年的 11 月。^① 然而，中共领导继续通过无线电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并与苏联驻重庆的大使馆有着密切的接触。1945 年 8 月，中共领导曾顺从苏联的愿望，与蒋介石进行了谈判，而没有与国民党进行最后的斗争。而且在此之后，即在蒋经国与斯大林进行第二次谈话之时，斯大林还向中国同志提出了多项的咨询建议^② 如前所述，在马歇尔斡旋下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之时，斯大林向中共领导建议把满洲地区排除出停火谈判之外，而共产党领导顺应了这一意见。^③

引人注目的是，蒋经国和斯大林都没有批评美国。斯大林只是提到：美国不同于中国和苏联，它没有经历过被敌人的占领，因此它不懂得被占领意味着什么。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居然欢

有关情况参阅本书第一章第六节。

参阅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权东北……》，第 67 页。

同上。

迎“中国对美国的友好政策”。放弃使用“美国牌”是为了表明对美国的敬重。当时，斯大林和蒋经国都不愿伤害美国。因此，可以认为，蒋经国事后所提出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后来说，斯大林曾试图唆使他反对华盛顿。据蒋经国的陈述，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人必须明白，美国人一直把你们当作争取他们自己利益的工具。只要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出卖你们。”^①在苏联记录中，没有这样的话。显然，这段话是蒋经国后来想出来的，是在内战公开爆发后，为了促使华盛顿采取反对苏联的立场。此外，在会谈中，斯大林和蒋经国都没有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严厉的批评。

显然，蒋介石后来所说的话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说，斯大林曾希望与他会见。^②蒋介石还说，为了不引起美国方面的误解，他拒绝了斯大林对他本人的邀请，这也就是斯大林后来邀请他儿子去莫斯科的原由。但蒋介石的这些说法在苏联文件中都得不到证实，不仅在谈话记录中，在斯大林让蒋经国转交给其父的信中，也都无法得到证实。^③关于斯大林对蒋介石的邀请，至少应在后一封信中有所提及。

1946年1月4日斯大林给蒋介石的信与蒋介石给斯大林的信相比，前者是中性的、客套的、谨慎的，而12月30日蒋介石由其子转交的那封信是热情的，中国大元帅在信中向苏联独裁者表示敬意，并向苏联保证中国将以友谊相待。而斯大林纯粹是出于政治利益考虑，只是通过发信的方式，向国民党中国表示一种友好的、但却保持一定距离的、考虑合作的态度。相反，蒋介石却希望与苏联和美国建立尽可能紧密的关系，以便能从他们那里获

^① Furiya: < Chiang Kai - shek . His Life and Times > . New York 1981 , p.868. 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② 此段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年波恩版第173页。

信件文本见：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第129页。

得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以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此外，蒋经国对斯大林卑躬屈膝的态度并没有促使斯大林提高对国民党中国的敬重。列多夫斯基认为，年轻的蒋经国不如宋子文那样善于讨价还价。这一评价看来是正确的。此外，派其子去见斯大林似乎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鉴于蒋经国在莫斯科扮演了一个软弱的角色，这很可能是中方谈话记录至今未公开的原因。

如前所述，1946年1月初，延安与莫斯科之间出现了分歧。中共领导与国民党政府一样，不同意单独由美国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调停，而希望苏联和英国都参加。中共中央在一项内部指示中说，只有这样才能“以夷制夷”，才能保证中国的独立。这种对中国古典战略的新用，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典范。指示还说，“如果中国为一个列强所控制”，“中国将不存在”。因此，英国也应参与调停使命。^①

斯大林拒绝了中共希望苏联参加调停的要求。斯大林敦促延安接受美国作为单独的调停人。此外，中共还应“学习法国的经验”。莫斯科反复强调他们在8月提出的建议，要中共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莫斯科的建议还说，中共应尽一切努力，把满洲排除到调停过程的范围之外。苏联领导关注的是，一切涉及满洲的军事事务都应与其磋商。莫斯科的建议表明了两点：一是莫斯科最感兴趣的始终是保持它在满洲的特权；一是它要避免与美国在中国发生公开的冲突。^②

1946年初，苏联的对华政策显示出矛盾。一方面，莫斯科敦促中共领导参加由美国主持的国共联合谈判。另一方面，在1月份又以骇人听闻的消息影响延安，说美国计划“把中国变成未

^① 1946年1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引自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p. 25.

^② 同上

来反苏的战场”，并要求中国同志使这一计划破灭。^①虽然苏联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但是为了优先关注满洲的特权，苏联自 3 月中开始最终决定要加强中国在满洲的权力地位。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现实：苏联军队最终将撤离满洲。人们估计，美国至少为了保住它在中国的影响，将大力支持国民政府。这样，在中和国民党之间的争斗将具有苏联和美国的“代理人战争”的性质。但另一方面，鉴于美国还没有决定进行偏袒国民党的军事干预，苏联因此也不认为应立即公开地支持共产党一方。当时，在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似乎达成一种默契，不把中国变成进一步公开竞争的战场。^②

当 1946 年 1 月 10 日停火协定在重庆签字之时，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民党占据了会议的一半席位，共产党与其他组织一起分得了另一半的席位。1 月 31 日就联合政府达成了一致意见。^③

中共内部文件显示，党领导把重庆谈判结果看成是一项政治和军事的成果，一项“很大胜利”，^④“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⑤这一结果是在莫斯科会议的决议的基础上形成的。目前，必须从武装斗争转变到议会斗争的方式。中共领导开始相信，“苏联不会助我内战，但可助我与国民党获得妥协”。^⑥当时，中共中央命令各部队，严格遵守停战协定，违者将受到处分。^⑦

^① 1946 年 1 月 28 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引自同上第 26 页。

参阅 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 . p.239。

此段参阅 Furuya: < Chiang Kai - shek. His Life and Times > . New York 1981, p.362 - 364; Pepper . The KMT - CCP Conflict, p.729 f. ; Westad: < Cold War > . p143 f. ;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35。

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22 页。

同上，第 422 页。

^⑥ 同上，第 419 页。

^⑦ 1946 年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关于停战的指示，引自同上，第 420 页。此段还参阅 Westad: < Cold War > , p147 , 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从各方面情况看，中共领导准备妥协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莫斯科的建议。苏联驻重庆大使同样把谈判结果视为“重大胜利”，他还建议中国同志准备学习法国经验，并致力于争取群众的工作。^①这对中共来说，意味着放弃武装斗争，走议会道路。事实上，中共领导在当时的一段时间里接受了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说：“民主革命的胜利可能不需要再经过内战。”^②

会谈结果至少可以在联合政府建立之前给共产党占领区提供了生存保障。当时，中共领导致力于政治协商会议，试图利用它以和平的方式在全国扩大其政治影响，与此同时，他们尽力避免卷入一场反对国民党的内战。但中共领导告诫全党：“在武装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③

周恩来在 2 月的重庆谈判中甚至走得如此之远，同意把共产党部队撤出华南，以及将驻扎在华北和东北的部队编入国军，这曾是 1945 年秋毛泽东所坚决拒绝的。在 1 月底 2 月初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就这条路线作出了决定，并根据决议发出指示：“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直接领导。”^④这一决议后来不断在党内遭到批评。^⑤

很难说，这个决议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有迹象表明，这

①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22 页。

② 同上，第 423 页。

③ 1946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引自同上，第 420 页。

1946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指示，引自同上，第 424 页。

⑤ 此段参阅 <The China White Paper>，p.140 - 143, 622 - 626; Furuya: <Chiang Kai-shek……>，p.864 f.; Westad: <Cold War>，p.155;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p.27.

只是被视为一种代价，为换取一个有利的政治协定。此外，延安可能希望，尽管国军在形式上是一体化，但党的纪律将保证共产党部队继续拥有独立性。蒋介石不相信这个决议。他对乔治·马歇尔说，要求共产党人将其部队编入国军是如此之难，犹如“与虎谋皮”。^①

在重庆关于整编军队的谈判开始时，延安显然再次对整编表示怀疑。一位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参加者说，马歇尔提出的整军方案有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共武装力量的控制，并通过经济影响左右中国政治。在中共领导中，人们说，军队统一后，蒋介石对共产党部队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共产党也要比对其同盟者还要不客气。这就促使中共不得不决定，要利用一切可能，逃脱被消灭的命运。^②

虽然军队整编协定于 2 月 25 日在要求和平的意愿下签字了。但在延安，人们已决定暗地里破坏它。3 月初，大部分共产党部队得到命令将其编制缩小三分之一。但内部通知，这只是为了影响公众舆论，是为了“精兵简政”，提高军队的质量。^③

总体说来，在 2 月过程中，中共领导开始对美国的调停使命已不再抱很多希望。它在内部表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不可改变的目标就是，“支持蒋政权与中国共产党人争斗，将苏联的军”。^④人们必须面对这一政策。为此，应在中国动员群众，并与苏联一起做共同的努力。

此外，出于策略考虑，中国共产党人也不放弃与华盛顿进行

此段参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 年波恩版第 189 页；Westad: < Cold War > . p.155。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26 页及下页；Yang Kuisong: < The Soviet Factor…… > . p.26 f。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27 页。

此段参阅 1946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给中共东北局的指示，引自 Yang Kuisong: < The Soviet Factor…… > . p.27。

接触，争取好感。他们显然注意到，美国一定会继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并在外表上保持中立。毛泽东向马歇尔允诺，要继续合作。2月1日，周恩来对马歇尔说，毛一直希望能访问华盛顿。中共虽然与苏联有着众所周知的联系，但它却保持着很大的灵活性。周恩来对马歇尔说：“当然，我们要向一边倾斜；但倾斜多少，取决于你们。”周努力把未来的共产党中国描绘成一个实行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似乎并不像亲美那样亲苏。^①

显然，斯大林决定从满洲撤军，但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持续占领的强烈抗议，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安抚美、英，阻止敌对联盟的形成。在此期间，西方日益怀疑苏联推行扩张主义。3月6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横穿欧洲的铁幕的演说，并要求建立反对苏联的英美联盟。对多数西方观察家来说，苏联军队驻在满洲和伊朗就是莫斯科扩张野心的标志。^②

如上所述，1946年3月，莫斯科结束了摇摆不定的满洲政策，在撤军的同时，坚定地支持中共。对中共领导来说，这是一个信号，现在他们不必再担心武装斗争会给苏联带来伤害。此外，自1945年8月20日和22日斯大林来电后，阻止中共开展武装革命的第二个因素，即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似乎也不复存在了，或者说已大大减弱了。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演说作出了强硬的反应。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苏联领导已不再认为东西方的尖锐对峙将一定会导致一次新的世界大战。4月1日共产党部队为争夺南满城市四平向国民党部队发起了进攻，这场激烈战斗是

此段参阅 Tucker: < Patterns in the Dust >, p45 f., 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蒋介石 1946年2月2日的日记引自 Furuya: < Chiang Kai - shek > . p.865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 p.135。

此段参阅 Levine: < Anvil of Victory >, p.78 f。

第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共领导决定在战场上寻找问题的解决。^①

1946年4月，毛泽东把这一新观点写入一份内部文件，并在领导层中传阅。他在文件中说，由于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可以避免。现在有可能迫使西方大国作出妥协，但这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做了艰巨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此外，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人民并不需要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毛泽东为中国得出的结论是：对待反动势力，“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②

正在撤离的苏军与中共进行合作的结果，在5月3日最后一名苏联士兵越过中苏边界时，使得绝大部分的满洲地区为共产党人所控制，而国民党军队在5月份只夺回了满洲的几个城区。当马歇尔促成的、不包括满洲的停火协定于1946年6月30日期满时，中共领导重新开始了内战。就在这一天，延安的党领导通知周恩来，从现在开始“边打边谈”。^③之所以要实行这种“既要打，也要谈”的策略，这也是因为在党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毛的进攻观点，许多人认为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形势上仍占据着优势，而共产党人在满洲和热河、山东和湖北等省的失利也加强了这种看法。^④

无疑，此时的内战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之所以迅速加强，这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当苏联和美国过去曾

此段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39页，以及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版第1185页。

^③ 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指示，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37页。

同上，第440页及下页。

想阻止内战，而现在要撤离中国时，内战的双方都开始不受限制地投入战斗。

1946年7月，美国进一步减少它在中国的军事存在，从初期的2.5万人，减少到年底的1.2万人。美军的日益减少，以及美国未能对满洲的国民党进行有效约束，这对延安来说，意味着“与美的交往”已无价值。6月底，中共领导在其宣传中不再对美国有所顾忌，他们开始全面攻击“美国反动集团的武装干涉及其所谓的‘对华援助’”，并声称，美国帝国主义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危险，因为前者披着“更文明”和“更合法”的外衣。7月底，共产党部队在北平南部袭击了美国的车队，打死了若干士兵。马歇尔把这一事件看做是对延安与华盛顿关系的蓄意破坏，是中共“最终告别”迄今为止的对美态度。当8月中他第一次受到共产党方面的人身攻击之时，他认为他的使命已经到了尽头：“情况就是如此。一切已经过去。我们在中国的事情已告结束。”^①

此时，延安对莫斯科的态度也比较谨慎。6月底，中共领导派中央委员罗荣桓去莫斯科治病，他得到的指示是：不要向斯大林提任何要求。^②与此相关，中共领导提出的口号是：在东北“主要”靠自力更生，在关内“完全”靠自力更生。这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是延安继续顾及莫斯科与国民党及美国的关系？或者是中共继续推行自1936年由毛泽东制定的不要完全依附于莫斯科的路线？这在今天也是很难判断的。^③

看来，鉴于美国在减少驻军的同时，却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

^① 此段参阅 Reardon - Anderson: <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 p.158 f.; Garthoff: <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 , p.77。

^② 此段参阅 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给罗荣桓的电报，引自杨奎松：《苏联因素……》第29页。

此处参阅 Clubb: < China & Russia >, p.357

军事和财政援助，中共领导在 1946 年秋不再认为美国会脱身于中国的内战。9 月，中国领导公开宣称：人们曾期望美国能援助中国，并协助建立由各社会力量的代表组成联合政府。现在，当这种期望破灭后，人们不能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持怀疑态度了。^①毛泽东试图把这种观点赋予理论基础，他把它概括为“中间地带理论”。^②按这一理论的分析，美帝国主义首先致力于把“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这些国家是处于美国和苏联中间的“极其辽阔的地带”。美帝国主义在没有控制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一理论的提出也进一步表明，毛泽东比过去更加不愿把中共的政策纳入苏美协调体系，不愿过多地顾及莫斯科对华盛顿的政策。对他来说，优先考虑的是反对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斗争。11 月，毛泽东完全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他在小范围的谈话中说：“蒋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③

1946 年 10 月以后，在中共，在内战问题上，已不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胜不胜”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他明确告诉全党，国民党能用于作战的部队约有 100 个旅，其中 25 个旅已在过去的 3 个月中被消灭。如果在今后一段时期里再消灭 25 个旅，就足以停止其进攻，如果再消灭 25 个旅，“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蒋介石的 70 至 80 个旅，即在一年内把他在美国人援助下七八年的积蓄消灭

^① 1946 年 9 月 12 日《解放日报》引自杨奎松：《苏联因素...》，第 28 页。

^② 1946 年 8 月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93 页。

^③ 1946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谈话，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438 页，以及 442 页及下页。

掉，这就能达到两党的平衡，然后就超过他。^①

11月，鉴于冷战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美苏关系更加不会有妥协的发展。人们不得不进一步考虑美国将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毛泽东预言，与华盛顿的“麻烦”将是长期的。如果美国放弃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那么，“三年或者五年就能解决问题”。否则，就有可能使战争延续10到15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会出来要求国共谈判，中共也不能拒绝。^②

自10月停火失效后至该年年底，国民党军队曾占领了几乎所有满洲的城市。1947年初，已改称为“人民解放军”的共产党部队又打回到满洲和华北。在2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讨论了是否有可能停火的问题。^③但5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驱赶国民党部队。年中，国民党军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部队。在1948年9月至11月期间的最后一次较量中，中国共产党人控制了整个东北。这同时也是中国内战的转折点。此时，林彪的东北军开始向南挺进。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4月20日至21日，解放军越过长江，4月24日占领南京，5月16日至17日占领上海，6月2日占领青岛。^④

这里的问题是：苏联在中国同志胜利进军方面究竟提供了多

^①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05-1210页；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谈话，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44页及第443页及下页。

同上，第444页。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也曾作过类似的表述，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02页。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44页。

此段参阅 FRUS 1947, Vol. V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1972, 引自 Alexander: <The Strange Connection>, p.72, 75 (N.7); FRUS 1948, Vol. V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1973, 引自 Alexander: <The Strange Connection>, p.78, 87 (N.1); FRUS 1949, Vol.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264, 269;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p.305, 307; Garthoff: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p.77-80; Clubb: <China & Russia>, p.357-360; M.I. Sladkovs; 齐赫文斯基：1949年斯大林同毛泽东的信函交往》，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4年第4-5期第133页。

少物质援助。当 1947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国民党攻势的压力下被迫撤离延安时，莫斯科曾想提供飞机，把中共领导撤退到苏联或满洲，但这一建议没有被接受。^① 已经提过的还有：苏联在占领满洲时向共产党部队移交了武器，以及在建设方面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但这是作为对拆运大批满洲工业设备的补偿。除此以外，中共从 1945 至 1949 年似乎既没有在经济上，也没有在军事上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第六节 中共战略性地转向苏联

各种迹象表明，1947 年秋，中共领导已开始把未来共产党中国的对外政策，战略性地定位于苏联方向。^② 如较新的资料表明，这一发展趋势是明显的，而中共领导不时地向华盛顿和伦敦表示友好，那只能是一种半心半意的策略手段。

然而，斯大林却始终坚持雅尔塔协定和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只与国民政府保持官方的关系。这两个协定保证了他在满洲拥有实质性的影响，而这一点是其对华政策中最受关注的。只有在满洲，即在华盛顿和重庆认可的苏联势力范围内，他才允许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一定的、礼节性的接触。也就是说，只在东北中共掌握了政权的地方。在其他地方，斯大林则不顾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始终与中国同志保持着距离，至少在公众舆论上造成的印象是如此。

中共谋求与莫斯科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是有多种理由的。

杨奎松：《苏联因素……》，第 29 页。

^② 参阅 He Di: <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44 - 1949 > . p.45.——Hunt 认为中共积极谋求与莫斯科紧密合作是在 1948 年夏才开始的。见：Hunt : < The Genesis > . p.178。

1947 年秋，鉴于军事上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斗争的最终目标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临近，这就是：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由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他们宣称：“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① 此时，他们感到需尽快确定未来外交政策的方向。他们之所以要把建立与苏联的战略联盟放在优先地位，有其三个基本考虑。其一是与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其二是从政治利益的估计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英将放弃他们在中国的第一伙伴国民党，将不实行偏袒国民党的武装干涉。因此，除苏联外，也看不出还能有其他具有深远国际影响的安全伙伴。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考虑是：苏联是中共领导在建设未来共产党国家方面，惟一能指望得到援助的国家。^② 这些考虑为当时公开爆发的冷战所加强。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鲁门总统致函国会，号召对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展开斗争，并保证向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提供美国的帮助，以反对国内外（共产党）敌人。（这就是所谓的杜鲁门主义。）6 月 5 日，国务卿马歇尔宣布了一项援助欧洲的经济计划，其目标也同样是针对苏联的霸权势力。9 月底，苏联作出了反应，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共产国际的一个比较松散的后续组织。日丹诺夫在成立大会上宣告，国际政治力量已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的”阵营，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的”阵营。（这就是所谓的“阵营理论”。）^③

^① 1947 年 10 月 10 日人民解放军宣言，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35 页。

此段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忆》，第一卷第 36 页；杨奎松：《苏联因素……》第 32 页。

此段参阅汉斯·瓦斯姆德：《世界政治大纲——日期与发展趋势（1945 至今）》，1982 年慕尼黑版第 34—38 页；京特·诺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1959 年科隆版第 169—177 页。

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上，没有中共的代表。这一事实也可算是一个例子，说明莫斯科与中国同志保持明显的距离。除了隶属苏联统治的东欧集团国家的共产党以外，即除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外，只有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据说，毛泽东同意成立情报局，并对日丹诺夫的关于“阵营理论”的声明也表示欢迎。^① 可以认为，中共领导曾希望参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1949年7月刘少奇曾问斯大林，中共是否可以加入情报局。斯大林以一种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拒绝了。^②

“阵营理论”宣告后，中共领导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认为，实行停火的思想，在中国已纯属幻想。此外，莫斯科和华盛顿同时确认世界已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形成了一种压力，迫使它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地采取偏向苏联、反对美国的立场。在这方面，这样一种推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即：认为冷战将使美国日益困在欧洲，并日益不能有更多的能力，来对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如果说在1946年3月，毛泽东之所以还感到比较安全，不至于会遭到美国的侵害，那是因为他估计莫斯科与华盛顿将实行妥协。而此时，他感到在莫斯科和华盛顿面前有力量，这完全出于相反的原因，这是因为苏美对抗加剧，莫斯科对华盛顿的态度变得富有进攻性，而美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出兵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美国害怕苏联也出兵”。^③ 正是出于这种强大的感觉，中共领导此时才公开地宣告他们的战略目标：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46页。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一部分，第79页及下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此段还参阅德热拉斯：《铁托传》，1953年柏林版第285页。

此句和以下两句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45页。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① 所有调停的企图都被视为外国的干涉，而加以拒绝。^② 这也适用于来自莫斯科的调停企图。另一方面，也有迹象表明，毛泽东直到 1949 年一直没有完全排除美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至少是实行封锁的可能性。^③

偏向苏联的战略决定作出之后，中国领导开始比过去更加清楚地宣扬新中国与苏联的合作，并批评在国民党左翼和“民主同盟”等“第三势力”中广为传播的观点，即中国应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中立的观点。^④

习惯于从权势范畴考虑问题的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军事成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人注目的是，苏联新闻媒体自 1947 年 12 月起日益增多地以一种极其积极的声音，报道中国的革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词句，如：“所有真正爱国的人士都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⑤

几乎在同一时间，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的 3 个月，毛泽东称赞这一事件标志着“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起来”。他同时把共产党中国也归属于这个以“苏联为首”的阵营。他认为，世界反帝阵营的力量已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开始。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将走向灭亡，而社会主义将走向胜利。毛泽东同时宣告，中国的内战已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开始

^① 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35 - 1240 页。

^② 1947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的指示 援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445 页。

此段参阅杨奎松：《苏联因素……》，第 28 页及下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444 - 446 页。

^④ He Di: <The Evolution>, p.45; 1950 年 1 月 27 日刘少奇与（真理报）记者捷塞特季娜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11，第 22 - 23 页。

^⑤ 1947 年 12 月 1 日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转载于 1947 年 12 月 7 日《人民日报》，引自《苏联与中国革命》，第 555 页。

“从防御转向进攻”。人民解放军已走上胜利的道路，而国民党正在走向毁灭。^①

这篇在中国广为传播的文章也同时是发给苏联的一个重要信息。这份文件被译成了俄文，并以电报形式传给了斯大林。^② 这等于向他传递了一个信号：他对中国同志获胜的怀疑是错误的。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指出：1947年，“连续获得胜利时，斯大林仍坚持主张同蒋介石媾和，因为他不相信中国革命力量”。^③ 此外，毛的文章还向莫斯科表明，中共准备与苏联结成同盟。最后，人们还可以从这篇文章中看出，中共领导希望莫斯科尽快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往来。

1948年，斯大林与铁托决裂后，在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出现了新的麻烦。当时，莫斯科怀疑自信的毛泽东会发展成为中国的铁托，担心中国会走上一条独立于苏联的道路。9月，中国领导得知，斯大林不能忘记中国同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民族主义”的表现，而这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行路线很相似。在同一时期，西方舆论界也出现了这样的议论，说苏联存在着上述的担心。华盛顿希望这是有根据的。1948年9月，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务院计划署有一份分析报告，其中就包含了关于“亚洲铁托主义”的说词。在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中也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毛似乎是“第二个铁托”，他对苏联所作的友好表

^① 194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引自《毛泽东记》，1971年东京版，第10卷第97-115页，特别是第97页及下页，114-116页。这篇文章的内容也反映在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会议的报告中。另参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3-1263页。

彼得·库弗斯：《一位跟上时代的英雄——关于一个被禁的俄罗斯毛版本和中苏对话》载于卡尔·海因茨等（编著）：《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1993年汉堡版第232页。

^③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尤金大使的谈话，俄方的谈话记录，见：《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第105页。

示，只不过是一种烟幕，以避免在困难的过渡时期遇到麻烦。^①

1948年7月，即苏南决裂后的一个月，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促使中共领导明确表示要站在苏联的一边。^②在早些时候的一项内部指示中，中共领导称苏联是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热爱和平与民主阵线的主要力量和领导者，中国人民只有“与苏联结成兄弟联盟”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③

11月初，在十月革命31周年之际，毛泽东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撰写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它追随的也是同一个目的，即在南斯拉夫事件的背景下，避免出现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忠于苏联的怀疑。^④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第三条道路”主张与苏联合作：

“三十年的历史还不足以证明吗？所有既不赞同帝国主义、也不赞同苏联的人，都是彻底虚伪的，并彻底破产了。同样，一切试图走‘中间路线’、‘中间道路’的人即企图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路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的人民革命路线之间的人，也是彻底虚伪的和彻底破产了。”^⑤

此段参阅《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69年北京版第432页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1987年北京版第7页；Mc Glothlen：<Controlling the Waves>，p.136 f.；南斯拉夫副外长 Alois Bebler 对一为西方外交官的谈话，引自 Barker：<The British Between the Superpowers>，p.172。

^② 中共中央1948年7月10日的决议，引自《苏联与中国革命》，第560页。

^③ 1948年8月4日中共中央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指示，引自 Yang Kuisong：<The Soviet Factor……>，p.29。关于南斯拉夫冲突对中共政策的影响，参阅王金（音）：《略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苏“一边倒”》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110页及下页。

参阅《苏联与中国革命》，第561页及下页。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载于《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引自《毛泽东记》，1971年东京版第10卷，第186页。该文发表于1948年11月1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第21期，其中包含了以上引用的段落（大意）。但这一段在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被删除了，这显然是因为中国领导此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要走独立于苏联的自己道路。参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6-1359页。

在此几天前，刘少奇发表了一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其中也包含了同一倾向性的观点：

“今天，世界被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苏联是世界进步力量的堡垒……。如果人们不愿站在帝国主义阵营一边，帮助美国帝国主义……，就必须站在苏联……，帮助……。不站在这一边，又不站在那一边，实行中立这是不可能的。”^①

后来，刘少奇说，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教育党员”。他要给党员提供论据，批驳那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大学生和工人。据说，当时在北平和天津的大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苏联红军留在旅顺？”“为什么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②刘少奇说，他的文章发挥了作用，几个月后，这些问题没有再被提出。刘还说，毛的文章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而写的。当时，民主联盟向共产党建议，走一条中间的道路，他们斥责向苏联俯首。^③

1949年3月中，共产党电台发出了类似1948年11月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声音，但语气要强烈得多：“中国人民不得不把战争煽动者的头子，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视为他们的死敌；不得不把世界反帝阵线的领袖，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始终视为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948年1月1日引自《刘少奇记》，1967东京版第244页及下页。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1949年6月27日的一份报告称，该文章被“摘要”刊登于《真理报》上，参阅FRUS 1949, Vol.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400。但在《真理报》上没有找到。

这些问题直到1949年年底还在中国被提出。一份在上海出版的刊物当时称，拆运机器是为了不让这些工厂落入国民党之手。参阅1949年12月28日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的一位翻译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的一位官员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43，卷宗13，案卷302，第15页。

^③ 1950年1月27日刘少奇与《真理报》记者捷塞特季娜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卷宗11，第22-23页；参阅《科瓦廖夫，II》，第88页。

他们的战友。’^①

1948年11月初毛泽东和刘少奇发表的文章受到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密切关注，并认真对待。司徒雷登大使在一份给华盛顿的报告中作出了评论，并确信：中共“已几乎被迫把中国的国家利益附属于苏联的国家利益”。^②

但是，斯大林还继续对中共持怀疑态度。1948年12月他向刚从中国返回的联系人伊万·科瓦廖夫详细询问，中国同志在苏南冲突中究竟站在哪一边。^③

第七节 莫斯科的谨慎态度：

毛泽东会见斯大林的要求落空

与上述情况发生的同时，另一情况也引人注目，它反映了中国领导与苏联结成紧密联盟的兴趣日益增大。这就是毛泽东谋求与斯大林会晤。这个愿望的产生，首先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中国内战将很快取得胜利和苏联与西方的冷战日益加剧，而主要是出自中共感到其地位的虚弱。

举行高峰会晤的要求，最早是在1947年年初由中方向苏联提出的。当时，中共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战斗中还暂时处于不利的军事地位，党的领导机关甚至在3月被赶出了延安大本营。鉴于这种不利的军事形势，毛泽东要与斯大林会晤，同他商议内战的战略和策略。但他首先想请求苏联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

^① 1949年3月18日陕北电台，引自 FRUS 1949, Vol.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 192f.

^② 1949年3月22日司徒雷登大使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见通信第192页及下页。自1949年3月起，杜鲁门办公室不在指望出现“铁托式的中国”。见：McClothlen : < Controlling the Waves > . p.138 f. . 158.

《科瓦廖夫， II》，第86页。

物资。斯大林于 6 月中曾表示同意毛访苏，但必须是秘密的。他提出，可派飞机到哈尔滨接毛。但两周后，他通知毛说，如果他离开中国将对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产生不利的影晌。此后，他建议“暂时推迟”访问。^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无线电联络是通过安德列·阿洛夫（化名为：杰列宾）来进行的。他当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派在中共领导那里的医生，也是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工人员。^②

1948 年 7 月中曾被预定为访问的日期。但 4 月底，毛向斯大林表示，他希望早点出访，最晚在 6 月中，并提议由部队护送，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那里去莫斯科。他希望在莫斯科与苏联党的领导人商讨“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问题”，并“请求指示”。此外，他还想访问“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以便在那里了解关于人民阵线等问题。除了技术人员外，他还有意带任弼时和陈云前往。如果斯大林对此不同意，那他就单独前往。几天后，斯大林告知：毛愿意带谁去，都可以。但到 5 月中，斯大林重新建议毛将其旅行“推迟一些”时候。鉴于国民党部队开始进攻华北地区，而那里是毛的旅行所要经过的地方。人们担心，毛此时外出会对“事情的进程”产生不利的影晌，并可能危及他的安全。毛在同一天回答说，“鉴于现在的形势”把旅行“推迟一段时间”是必要的。他需要作一些休养，然后可乘飞机前往。^③

可以设想，斯大林提出推迟访问的另一个原因是，要回避详

^① 1947 年 6 月 15 日和 7 月 1 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 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98 页；列多夫斯基：《毛，I》，第 1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15 页；Shi Zhe/Chen Jian：《With Mao and Stalin》，Cap.6, p.5. 关于阿洛夫本人的情况，详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

^③ 1948 年 4 月 26 日和 5 月 10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1948 年 4 月 29 日和 5 月 10 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98 页。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0 页。师哲报告称，中共领导与 1948 年 4 月中在毛的建议下作出决定，毛应访问苏联，但斯大林在 5 月要求推迟访问。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66 页及下页，第 372、374 页 师哲：《陪同毛主席...》，第 6 页。

细讨论毛在春天提出的援助请求。科瓦廖夫声称，斯大林曾给他看了毛的有关电报，并表示原则上准备援助。^①

1948年7月初，毛泽东再次提出出访问题。他告诉斯大林，他的健康已明显改善。“我决定，近期去您那里。”他准备带20名随行人员，并希望在7月25日左右派两架苏联飞机来接他们。但他也可以乘船或从陆路乘车前往。如果是这样，他将在月中前往北方。7月中，斯大林请求把旅行推迟到11月底，因为“鉴于即将开始准备粮食收割”，苏联领导同志将赴农村，并在那里逗留到11月。当天，毛泽东在一封异乎寻常的简短电报中，表示同意把访问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②

毛泽东看出了斯大林的解释破绽。当阿洛夫把斯大林的电报读给他听之后，他讽刺地问道，难道在苏联人们把秋收看得如此之重要，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都要参加？毛也向另一位苏联的谈话人提出了这个不需要回答的反问。阿洛夫注意到，毛对斯大林的这一决定是不满意的，虽然他“按中国的方式”保持和气地说：“真难看透他真正的心思。”阿洛夫得到的印象是，毛这次以为他会按确定的日期出访，并焦急地等待斯大林的电报。毛曾预计，最坏的情况是斯大林不派飞机或轮船来接他。他已收拾好箱子，买了皮鞋，做好了大衣。毛的私人警卫汪东兴也证实，毛已做好了旅行的准备。阿洛夫说，任弼时也没有料想到访问会再次被推迟。^③

8月底，毛对阿洛夫强调说，1947年他还不那么急于访问苏

^① 《科瓦廖夫，II》，第77页。

^② 1948年7月4日和14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1948年7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98页及下页。

阿洛夫关于毛的反应的报告，见1948年7月14日他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39，案卷31，第40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99页；《汪东兴日记》第151页。汪东兴把斯大林的邀请的日期错记为1948年4月，同上。

联。但 1948 年形势发生了变化。他想尽快去莫斯科，以便讨论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联合各革命运动、与东方的民主党派和团体建立关系、以及反对美国 and 蒋介石的战略等问题。他还希望讨论重建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和采矿业、交通业，以及关于请求援助和相当于 3000 万美元的贷款等问题。最后，他还想与苏联领导协调涉及与英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路线。阿洛夫概括说，毛强调“我们必须达成一致意见，使我们的政治路线与苏联完全一致”。^①

1948 年 9 月底，毛泽东要求按他最后提出的日期访问莫斯科，即 10 月底、11 月初。他说，他有“许多问题”预定要同苏联党的领导集体和“最高领导人”商谈。他甚至有些阿谀奉承地两次提到，需要从莫斯科得到“指示”。^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要谈的首先是苏联对未来中国的援助问题。10 月中，他确认可按上述日期进行访问。但到 11 月中，他请求因健康问题和军事活动操劳而把旅行推迟到 12 月底。12 月底，他最后通知斯大林，他计划在讨论 1949 年战略任务和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会议之后访问苏联，并在 1949 年春的二中全会之前返回中国。^③

此段参阅 1948 年 8 月 28 日阿洛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39，案卷 31，第 40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99 页及下页。

^② 在俄文文本中用的是“ukazanija”一词，中文的原文是“指示”。

^③ 1948 年 9 月 28 日、10 月 16 日、11 月 21 日和 12 月 30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0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时间的回顾》，上卷，第 36 页及下页。

第三章 转折的 1949 年： 走向结盟的道路

第一节 莫斯科的重新思考：中共胜券在握？

1948 年底，莫斯科开始改变看法。10 月底，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整个东北。它在林彪指挥下顺利地和有力地向南挺进。11 月中，共产党部队开始攻击北平郊区。^①

在此之前，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共是否有能力在军事上控制全中国。^②但此时，他不得不认识到，他错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已即将实现，逐步建立共产党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但中共领导也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即将结束。正如 1947 年秋就已表明的那样，中共领导指望与莫斯科建立战略同盟。^③据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联络员伊万·科瓦廖夫称，“当中共即将胜利的前景已最终明朗时，两位领导人于 1948 年底终于取得共识，有必要举行一次会晤，以调整相互的关系。”^④

参阅 < Military Campaigns in China: 1924 - 1950 > . Taipei 1966, p.165 f.

^② 1955 年 1 月周恩来对已任命的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说：“苏联对我们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也持保留态度。”，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4 页及下页。

详见以上的第二章第六节。

^④ 伊·瓦·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2 年第 1-3 期，第 86 页。——参阅 Chen Jian: < China's Road > . p.9.

但斯大林一直犹豫，在莫斯科接待毛泽东是否适宜。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告诉毛泽东：

关于您访问莫斯科事，鉴于以上情况，我们遗憾地认为，您应将行期再推迟一段时间，因为在此情况下您访问莫斯科，敌人将会污蔑中国共产党，似乎它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于莫斯科的，这对中共和苏联都没有好处。^①

四天后，莫斯科的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旅行计划。斯大林解释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来访未必合适，因为他当时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到访即使是秘密的，也不可能瞒过公众舆论。他从中国出发的消息将肯定会传扬出去。他的出访无疑会被西方说成是到莫斯科向苏联共产党领取指示，毛将被说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将有损于中共的声誉，而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会乘机反对中国共产党。也许，不久即可成立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政府。届时，毛泽东就不需要隐秘身份，而作为政府首脑正式访问一个邻国。这样，情况就完全相反，这将提高这个政府的声誉和权威，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为了不拖延对“已成熟问题”的讨论，可以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像通常一样，政治局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②

同一天，斯大林向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其中有如下内容：我们仍坚持您暂缓访问莫斯科，因为目前您必须留在中国。

^①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的电报，引自齐赫文斯基：《约·维·斯大林通信》第134页，援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

此段参阅阿·米高扬就他1949年1-2月中国之行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年1-2月）》见《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1页。

如果您愿意，我们可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见您，并就您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①

看来，“我们仍坚持……”这一措词可能是指，毛泽东不顾苏联 1 月 10 日的电报，在最后一封迄今未公布的电报中仍坚持他的访问计划。

斯大林在电报中向毛泽东提出的推迟访问的理由，仍是一种托辞，如同 1947 年以来提出的所有理由一样。这与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的理由相比虽有所不同，但即使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理由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斯大林并不很关心中国同志的国际声誉。他实际上担心毛正式访问莫斯科会进一步加剧苏联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当时，鉴于东欧和中国的形势，这种关系业已紧张。华盛顿很可能指责苏联违反雅尔塔协定，因为协定规定斯大林有义务承认国民党政府。这样一来，莫斯科将承担风险，美国和英国方面将认为他们可以不再受雅尔塔协定的约束，进而收回对苏联兼并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承诺，以及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属于苏联利益范围的承诺。

此外，斯大林力图避免因毛访问莫斯科而在世界舆论面前承担说谎的恶名，因为苏联已正式宣称，它在中国内战问题上持中立的立场。此外，斯大林也没有邀请蒋介石访问莫斯科。当时，

^① 1949 年 1 月 14 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0，第 113 页，引自齐赫文斯基：《约·维·斯大林通信》第 138 页。该电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0 页中也被引用了。在那里，显然是出于威信原因，电文作了更改：“我们坚持……”被改为斯大林“同意……”。电文的最后一句的表述在总统档案馆的另一档案材料中，“您感兴趣的问题”改为“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1，第 72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对苏联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第一部分，第 3 页。薄一波提出这样一个断言（鉴于斯大林的两个电报，此断言不大可信）：当时，毛泽东的访问是因为交通问题以及必须指挥两个战役而没有成行。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37 页。

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已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保持着外交关系，如果斯大林接待国民党政府的内战对手毛泽东，这肯定将有损苏联的国际信誉。这对西方宣传来说犹如火上加油，将促使它展开宣传运动，说莫斯科在指挥一场共产主义的世界阴谋活动。

有一个旁证可以说明毛泽东始终没有完全明白斯大林拒绝访问的理由，即共产党政府实际上还没有建立。1949年11月中，周恩来在同罗申大使为毛访问莫斯科作准备的一次谈话中说，毛认为，12月21日斯大林诞辰之际“全世界的苏联朋友代表团”将出席庆典，因此他的访问就可具有“完全的公开性”。^①这可能说明，毛虽然知道斯大林对其正式访问莫斯科持保留态度，但他并不明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政府以后，这种保留才不复存在。^②

斯大林出于上述原因始终拒绝毛访问莫斯科，但鉴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而出现了新的情况时，斯大林认为继续简单地阻止访问，不如建议派一位苏联高级领导人去中国更为合适，以便与中国同志商谈国内形势和两个共产党之间的未来关系。

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他在1月17日给斯大林发去了一封电报，其中说：

“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似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直达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
“假如你们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③

^① 1949年11月10日周恩来与罗申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卷宗07，目录22，案卷220，第53页。

详情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③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39页。并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0页。

斯大林派政治局委员阿·米高扬赴华。他经石家庄于 1949 年 1 月 31 日到达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至 2 月 7 日。^①

第二节 对中共的羞辱： 苏联大使跟随国民党政府去广州

当米高扬在西柏坡进行会谈之际，莫斯科与中共的关系意外地受到了损害。

1949 年 2 月初，苏联大使罗申作为惟一的一位在南京任命的外交使团团团长，顺应国民党政府对外国代表机构的要求，迁往国民党于 2 月 5 日起定为政府新驻地的广州。^② 1 月中旬，苏联外交部就已得到了准备迁往广州的消息。^③ 罗申在南京只留下了苏联外交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小组，作为大使馆的一个分部，以及苏联其他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一直坚持到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④ 罗申离开后，苏联所有驻南京的代表机构均由谢巴耶夫领导，他的头衔是大使馆参赞，实际上他属于苏联国家全部和军事情报部。^⑤ 谢巴耶夫同时还是负责处理苏联在共产党占领区一切事务的非正式代办。

然而，西方大使馆却一直留在原地，直至 4 月共产党占领南京。一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高级官员认为：苏联的这一行动加强

关于米高扬访问的详情，参阅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② 1949 年 2 月 5 日参赞 Clark 从广州发给 Acheson 的电报，见：FRUS（美国国务院 1949，Vol. VIII，p. 107；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II，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3 期第 95 页及下页。

^③ 1949 年 1 月 15 日费德林关于同陈廷（音）参赞的谈话笔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卷宗 07，目录 22，案卷 220。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3 期第 95 页。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42 页。

了国民政府；莫斯科担心共产党中国出现独立于苏联的发展。^①

可以认为，苏联的这种公然讨好国民党的、甚至使西方的行为也相形见绌的对华政策，使中共领导感到非常奇怪。他们不得不认为被莫斯科的同志愚弄了。他们事先没有从斯大林那里得到关于罗申迁移的通知。^② 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当时也听到传闻，说毛泽东对罗申的行为感到恼怒。^③

可以认为，毛泽东曾希望出现相反的局面，即：西方大使馆撤离南京，而苏联大使却留了下来。1949年2月毛泽东对米高扬说的一段话可能是有针对性的。他说，帝国主义者在新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必须等待，让“我们的真正的朋友”能早一点进来。^④ 1949年5月底毛让人告诉斯大林，美国和其他国家大使馆留在南京，并不有利于中共。“如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最终从中国撤回，我们将会很高兴。”^⑤ 毛可能以此来表达，他对苏联大使返回南京的兴趣。不久，斯大林回复毛泽东，其中称：“我们认为，目前不宜示威性地显示苏联与民主中国的友好。”^⑥ 6月，中共领导在内部表示了这样的观点：各外国政府都不应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关系。^⑦

^① 1949年克拉克给艾奇逊的信件，见：FRUS 1949, Vol. VIII, P.107。

这是当时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于1949年3月24日向本书作者所说的；当时苏联大使馆南京分部的领导人也说了同样的话，见：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41页。

^③ 1949年2月3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信件，见：FRUS 1949, Vol. VIII, P.104。

详见下面的第三章第四节。

^⑤ 1949年5月23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转引自齐赫文斯基：《秘密外交行动：1949年6月周恩来与美国人的非正式谈判》，见《远东问题》，1994年第3期第136页。

^⑥ 1949年5月26日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电报，同上。可惜，齐赫文斯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仅仅出示了这一句有深刻含义的话。此段另参阅〈The China White Paper〉，p.307。

^⑦ 1949年6月3日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党委的电报，引自《中共中央在香山》，第433页。

促使斯大林决定让罗申去广州的原因，未能从文件中找到。可以推测，这与斯大林一再推迟毛访问莫斯科的原因是相同的。如上所述^①，这涉及斯大林要向美国和国民党显示他对条约的忠诚，以便不给华盛顿以借口，动摇其在雅尔塔协定中已向苏联作出的扩大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承诺，以及避免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之间发生公开冲突。周恩来在回顾斯大林当时的动机时，也表示了类似的判断。他同已任命为中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刘晓谈到罗申的行为时说：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协定所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的利益。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总的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时期。^②

1949年初，当周恩来在西柏坡问及苏联大使迁往广州的原因时，米高扬作了与政治家不相符的、傲慢自大的回答。他在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报告说：

我声明，这是合法的，因为迄今为止在中国只存在一个政府，我们的大使就是委任在那里的，他随同中国政府迁移至广州，这是当然的。与此同时，他在南京留下了使馆的一部分。从根本上看，这丝毫不会有损于我们的共同事业，而相反，将支持我们的事业。^③

看来，这几句话导致了毛泽东后来所作的评语：米高扬在访

参阅以上第三章第一节。

^② 1955年1月底周恩来与刘晓大使的谈话。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4页及下页。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年1—2月）II》，见《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96页。

问西柏坡时，架子就很大。^①一位当时在苏联大使馆南京分部工作的外交官认为，米高扬给周恩来的回答是难以令人信服的。^②人们也看不出，对“共同事业”的好处究竟在哪里。

然而，就是这位外交官在 1949 年 5 月中，曾按指示就罗申的迁移问题向周恩来在南京的代表黄华作了类似米高扬在 2 月所作的解释：罗申是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是在该政府建议所有大使馆都这么做之后。苏联政府的这一行为符合公认的国际规则。按国际规则，一国的大使必须驻在他委任的政府所在地。^③

如果这种回答来自一位华盛顿的代表，那么，中国共产党人肯定不会感到惊讶。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做法却完全相反，他就其留驻南京向国务院提出的理由是意味深长的，也是中共领导希望能从苏联同志那里获得的再好不过的理由：“我们若随着这个完全失去公众支持的政党迁往广州，这就会破坏我们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④形势就是这么奇怪而微妙。

当 1949 年 7 月刘少奇问斯大林问到罗申为什么迁往广州时，回答有所不同，但这肯定不能令刘少奇信服。斯大林说：我们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⑤然而，这里有一点可能是真的：莫斯科指示罗申迁往广州的一个次要原因是，他可以在那里与打入国民党政府的苏联情报人员保持联系，以便及时了解国民党的意图和他们与美国的关系。^⑥

^①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对尤金大使的谈话；中方谈话记录，见《当代文献》1994 年第 1 期第 16 页。

此处和下段参阅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41 页。

同上，第 13 页；1995 年 3 月 27 日列多夫斯基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④ 1949 年 4 月 12 日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信件，见：FRUS 1949, Vol. VIII, p.678, 以及 Rea/Brewer: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 p.316。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8 页。

^⑥ 1993 年 5 月师哲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今天，从已经引证的苏联驻南京外交官的材料中，可以较清楚地说明罗申迁移的动机。而米高扬当时的说法只是反映了“苏联政府的官方解释”，一种“纯粹形式主义的解释”（拉丁文：sugubo formal'naja versija）。实际上，苏联政府不得不看到中国非常复杂的形势，它是在尖锐化的国际形势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斯大林应给予中国以全部的同情，但他又担心深深陷入中国的内战。他首先担心的是，被其批判为“激进主义的”毛泽东行为可能挑起美国对中国直接的和广泛的军事干预，甚至组织国际干预，如同 20 年代西方列强和日本对苏联实行的那样。这将使苏联陷入困难的境地。在满洲，美国和国民党对苏联的态度是温和的，因为按雅尔塔协定和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中苏条约，满洲被承认为苏联的“特别利益区域”。^①

如同列多夫斯基接着所说的那样，莫斯科在满洲以外地区的态度是非常谨慎小心的。因为在那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可能导致使苏联非常尴尬的反应：美国实行干预，联合国提出问题，甚至 8 月 14 日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和与此相联系的关于满洲的协定有可能被废除。因此，斯大林不愿给国民党政府以理由，认为苏联将中断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建立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斯大林认为有必要，密切关注中国的事态发展，而不能走得太远。出于这种策略考虑，他决定，让罗申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当时莫斯科以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将这样行动。斯大林认为，其他大使留在南京不至于严重伤害该国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但如果苏联大使拒绝迁往广州，那将进一步加深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政策的不信任。此外，莫斯科感到国民党大肆进行的宣传，说苏联在向中国进行“革命输出”，这已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感到愤怒。对此，莫斯科要表明：苏联并不愿介

^① 1995 年 3 月 27 日列多夫斯基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入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的权力之争，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并继续与其保持官方的关系。^①

当时苏联驻北平总领事的陈述也证明了其中的一个重要之点：在罗申迁往广州时，莫斯科并不以为其他大使馆会留驻南京。此外，对莫斯科来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政府，而中共仅是游击运动。^②

至于周恩来对刘晓所说的另一个原因：斯大林担心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支持可能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一点至今没有得到证实，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在这方面，斯大林的言论是矛盾的。1949年2月至3月科瓦廖夫报告，中共军事情报部门和其他消息来源说，美国与日本及国民党计划（甚至使用原子弹）袭击华北和东北，以及西伯利亚，以便最终向乌拉尔进军。^③对此，斯大林在其复电中首先肯定地说：“对帝国主义者来说，一场战争并不是有利的。他们已陷入一场危机，他们并不准备发动一场战争。他们害怕原子弹，我们不怕……。现在看来，美国对进攻的准备是不足的，不如我们对防御的准备。”但下一句又显然有些怀疑：“如果是从正常的、客观的人的角度进行分析，那情况就是如此。但历史上有不正常的人。美国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患有幻觉症。我们应时刻准备进行防御战。”^④

当时，福里斯特尔主张：美国为了防御共产主义蔓延，应具有进行全球战争，包括使用原子武器的能力。但他并不相信苏联会发动公开的侵略。^⑤

1949年7月，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拒绝了中共领导提

① 1995年3月27日列多夫斯基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② 1995年3月24日齐赫文斯基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③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载于《远东问题》，1991年第6期，第87页及下页。

④ Leffler: <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 . p.222 - 224。

出的在海上和空中进行军事保护的请求，理由是：这将意味着与美国海军和空军发生冲突，并为他们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提供口实。如果苏联领导人这样做，人民将不会理解，“并赶走我们。由于忽视他们的贫困及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作的努力。由于轻率……”^①

从以上援引的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虽然排除了美国会发动挑衅性的进攻，但他担心，当华盛顿感到有必要对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侵略行动作出回答时，世界战争就有可能爆发。从这一视角来看，斯大林对刘少奇所作的表述，以及周恩来对刘晓所作的判断，是可信的。

除了罗申迁往广州，除了苏联在形式上仍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以及苏联代表机构停止在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地区（满洲除外）进行公开活动这些事实以外，个别的代表机构却与共产党的有关部门保持着秘密的关系，并向他们提供咨询意见，包括物质上的支持。^②

第三节 1949年初的莫斯科和中共： 协调对国民党的政策

从最新获得的 1949 年中旬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来往电报中可以看出，他们多么紧密地协调其对国民党的政策，其意图就是迷惑南京政府。许多不同的计划被提出，它涉及如下一些问题：莫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1年第6期，第88页。据了解，科瓦廖夫始终认同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但在这里却指出，斯大林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惟独他对俄罗斯人民的评论带有一些煽动性的味道；同上。

参阅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14、16-18、19页及下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六节。

斯科应如何对 1949 年 1 月 8 日国民党政府的调停请求作出反应，苏联应如何与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国共双方之间进行调停。意见的分歧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这种不同点实际上自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就不断地反映在苏联和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之中。

国民党提出调停请求后不久，斯大林就向毛泽东通报了国民党照会的内容，以及苏联的回信和中共致国民党信函的草案。斯大林并表示，如毛不同意这两个草案，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①

斯大林关于苏联回复南京的信函草案称：

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赞成中国停战和建立和平。但在同意进行调停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鉴此，苏联希望能让中国共产党一方了解中国政府的和平行动，并征求它同意苏联调解。^②

斯大林接着表示，如中共不同意这样答复，可提出其他答复建议。斯大林还提出，如国民党征询毛的意见，毛可作如下答复：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实现和平，因为不是它，而是南京政府发动了内战，南京政府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不能参加谈判。

斯大林 1949 年 1 月 11 日致毛泽东的俄文电文引自齐赫文斯基：《约·维·斯大林通信》第 133 - 135 页，以及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 - 2 月）》I 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2 期第 102 页及下页。（不完全的）中文电文见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见《新中国外交风云》，1991 年北京版第 19 页。此外可参阅 1949 年 3 月 8 日谢巴耶夫 s 'ibaev，留守南京的苏联参赞）给苏联外长的信；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P. 103，案卷 18，第 10 - 17 页。

^② 此段和下段参阅 1949 年 1 月 10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报，引自齐赫文斯基：《约·维·斯大林通信》第 134 页，以及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 - 2 月）》I，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2 期第 103 页。

中国共产党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国共产党特别认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舰队亲自参加反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战的国家不能居中调停，因为这样的国家在消除中国内战问题上不可能中立和客观。

斯大林还向毛泽东解释了与此答复相联系的意图：“从以上所述可看出，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草案旨在阻挠和谈。”^① 斯大林接着说：没有外国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调停，国民党不会和谈。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会和谈。所以我们预料，国民党将拒绝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和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同意和谈，因而不能指责它想打内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将成为破坏和谈的罪魁。这样，国民党和美国的和谈伎俩将被揭穿，而你们可以继续进行所向无敌的解放战争。

毛建议斯大林对南京作如下的答复：

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向愿意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根据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苏联政府认为不能同意参与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②

毛就其建议解释说：如果苏联原则上宣布准备调停，这可能使国民党和西方列强得出印象：调停是应该的。但现在需要的是

此处和下段参阅 1949 年 1 月 11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电报，引自齐赫文斯基：《约·维·斯大林通信》，第 134 页及下页，以及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I 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2 期第 103 页。

此处和下段参阅毛泽东 1949 年 1 月 11 日（中文版本）或 12 与 13 日（俄文版本）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文版本见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载于《新中国外交风云》，1990 年北京版第 20 页；俄文版本见齐赫文斯基：《约·维·斯大林通信》，第 135 页及下页；以及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I 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2 期第 103 页。电报的不同日期可能是莫斯科与北京的时差所至。

国民党无条件投降。因此，苏联如能接受此建议，那将是对中共的“极大援助”。

从以上援引的和另外 3 封电报^① 中可以看出，双方一致主张阻挠和谈。至于苏联或中共声称的和平意愿，那都是一种花招，以迷惑世界舆论，掩饰中共领导逼“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毛）以及“进行所向无敌的解放战争”（斯大林）的决定。毛比斯大林更直截了当，认为没有必要“再走一次弯路”。他对胜利更具有信心，并指出了有利的战争形势，预见于当年夏天就可渡过长江和攻克南京。

看来，在毛提出的、苏联答复国民党的简短草案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人民的自决权。这可能是要斯大林明白，他应把对国民党行动的决定权交给中共。自 1945 年 8 月以来，毛不断顶撞斯大林试图使内战双方和解的做法。可以认为，毛此时也是要剥夺莫斯科再次在华盛顿和南京面前充当和平天使的可能性。

最初，斯大林却有此想法，因为他要避免因内战而使其陷入不得不倒向中国同志一方的局面。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引发美国袒护国民党的干预，导致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这对他来说是最糟糕的状况。斯大林建议采取迂回的行动，宣布愿意和谈，但带有无法满足的条件，以便把和谈失败的责任推向国民党。这里显示出，他与毛泽东相比，他是一个更为狡猾的策略家。

最后，双方取得一致。毛被斯大林的策略建议所说服，并于 1 月 14 日电告斯大林，他已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八条不可能满足的条件。^② 同一天，斯大林告诉毛泽东，苏联给南京的答复将

^① 1949 年 1 月 14 日和 15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电报，以及 194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 引自齐赫文斯基：《约·维·斯大林通信》第 136-139 页。

^② 参阅美国国务院档案 FRUS 1949, Vol. VIII, p.41 f.;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335-339 页。

“按照你们的建议精神作出”。^① 斯大林于 1 月 15 日以这样的判断结束了意见分歧：“我们之间关于南京和平建议问题的观点已经取得了一致，中国共产党已开始了‘和平’运动。……这表明，可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②

电报交往的结果是一个妥协。毛听从了斯大林的劝告，放弃了直接拒绝和谈的做法。斯大林屈服于毛的逼迫，正式地和无条件地拒绝参与调停使命。有两位俄罗斯作者认为，斯大林曾打算逼毛接受苏联的调停使命，^③ 这种推测不能从援引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往来电报中得到支持。相反，不得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是正确的，他们对斯大林的复函草案的解释是：斯大林可能对美国的干涉还是有些担忧，内心仍有赞成国共和谈之意，甚至愿意充当调解角色，只不过不便公开说出。^④

此外，来往电报还显示，与 1945 年 8 月不同，斯大林在 1949 年初试图避免给人以印象，他要按共产国际的方式来管教中共领导。这可以从他的一封电报中看出，电报说：“我们请你们将我们的建议确实当作建议加以研究，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没有什么义务问题。你们可以相信，拒绝我们的建议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是你们的朋友。”^⑤

这里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准备把正在胜利道路上前进的毛泽东看做是他的几乎平等的伙伴。他明白，他不能像对待东欧卫星国领导人那样来对待毛泽东。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换为东欧领导人，斯大林将实行不同的做法。

引自齐赫文斯基：《约·维·斯大林通信》第 138 页。

^② 同上，第 139 页。

见伏拉基斯拉夫·朱波克、康斯坦丁·普里沙柯夫：《克里姆林宫内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剑桥，伦敦，1996 年，第 57 页。

^④ 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见《新中国外交风云》，1990 年北京版第 19 页。类似的解释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第 447 页。

^⑤ 齐赫文斯基：《约·维·斯大林通信》，第 138 页。

在斯大林与毛泽东就可能实施的策略取得一致意见之前，罗申大使不得不玩弄捉迷藏的游戏。他装病，以躲避国民政府 1 月 8 日请求调停的照会递交，以及后来由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建议的有关四国代表的会晤。^①

1 月 17 日莫斯科按毛建议的精神答复了南京。^② 在此前四天，美国政府在确信苏联不会参与调停的情况下，向国民党政府表示，美国拒绝承担调停人的角色。^③ 美国国务院之所以认为莫斯科将对南京的建议作出否定的反应，其依据是对中共“八条”的分析和苏联及其他共产党媒体发表的消息。^④

米高扬以美国态度为理由，告诫中共领导，应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交换严格保守秘密。他在 2 月初访问西柏坡时提出了这一警告，并对毛表示，他怀疑美国的拒绝是由于华盛顿通过“中共周围的饶舌者”得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秘密商定。米高扬以此清楚地指出中共领导中有漏洞。毛坚决顶回。他强调，英美显然在此之前就确信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调停活动。与莫斯科的通讯往来只有中共领导中很小范围的人，以及译员师哲和苏联联络员阿洛夫知道。毛接着指出，对这些人的可靠性是丝毫不容怀疑的。米高扬表示，毛的回答不能令其信服。毛当时再次强调，秘密是不会由“中共周围的人”泄露出去的。^⑤

这是列多夫斯基的报道，他当时是苏联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见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年1-2月）》II，见《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94页及下页。

^② 《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 - 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09 页。

美国政府外交备忘录文本，见于 FRUS 1949, Vol. VIII, p.41 f. ; 见同上，第 38 页及下页，第 47 页及下页。

同上，第 25、38 页及下页。

^⑤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4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年1-2月）》II，见《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95页。

第四节 第一次最高层的秘密会见： 米高扬在西柏坡（1949年2月）

1949年1月底，斯大林派其最亲信的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去西柏坡，执行一项与中共领导进行会谈的秘密使命。这就是两党领导集团的第一次最高级别的会晤。^①这是一种替代方式，以取代毛自1947年就计划进行的、却因斯大林提出种种理由而被一再推迟的、对莫斯科的访问。^②这次会晤反映了莫斯科日益增长的对加强与中国同志合作的兴趣。当然，这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无敌的进军而引起的，它将很快使共产党赢得内战的胜利。赫鲁晓夫回忆说，当时斯大林要给中国共产党人以直接的援助，并通过米高扬的访问了解他们缺什么。^③

直至不久前，对西柏坡会谈的研究基本上只能以两位历史见证人的陈述为依据。他们就是：师哲和科瓦廖夫。^④显然，两人都未能查阅当时的档案文件，而只是凭借其记忆。当1995年一部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关于米高扬之行的档案材料为依据的出版物出版后，可以看出，师哲和科瓦廖夫的报告是多么的单

据苏联出版物称，刘少奇和高岗曾在此之前“于1945年”率“满洲各人民民主地区”代表团赴苏联与苏联领导会晤。但缺少有关细节和资料来源。这次旅行也没有被其他来源所证实。见：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0）简介》，1971年莫斯科版第28页。——这里很可能是误把1949年夏由刘和高率领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说成是1945年。有关1949年的访问参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一节。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2年第11-12期，第72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72-388页；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载于《远东问题》，1991年第6期，第85页及下页。

薄和不可靠。^① 以下的论述主要依据这个出版物，但它也没有利用总统档案馆的全部资料，对引用文件的性质也没有作出清楚的说明。因此，作为补充，也引证了师哲和科瓦廖夫的回忆以及某些中国的出版物。

米高扬于 1 月 26 日化名为安德列耶夫从莫斯科出发，经沈阳，于 1 月 30 日到达石家庄（河北省）。从那里由毛泽东的警卫汪东兴和翻译师哲陪同乘汽车前往西柏坡，当时的中共领导所在地。^② 陪同他前往中国的有伊万·科瓦廖夫和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翻译叶夫根尼·科瓦廖夫。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与书记处成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进行了一周之久的会谈。2 月 7 日米高扬返回莫斯科。陪伴米高扬的是伊万·科瓦廖夫，他的身份是新任命的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联络员。^③

一位苏联历史学家说，米高扬之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弄清中

^① A·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2 期第 100-111 页（以下简称：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同上，1995 年第 3 期第 94-105 页（以下简称：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列多夫斯基的文章在描述西柏坡会谈时并没有完全指出，他依据的是致斯大林的电报，或是其他文件，如：谈话记录。此外，他引证的只是他可使用的文件中的一小部分，总共约 70 多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372 页；《汪东兴日记》第 153 页；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4 页。——师哲和汪东兴一致指出，只有他们两人去石家庄接米高扬。而米高扬，很可能是为了提高他在莫斯科的形象，说他受到“朱德总司令”和“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以及翻译师哲的迎接。

^③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4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372-375, 388 页；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1 年第 6 期，第 85 页及下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1 页；（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448 页；《周恩来年谱 1898-1949》1990 年北京版第 810 页。另参阅 Chen Jia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p.6 f. 及其他资料来源。关于科瓦廖夫的活动见本书第三章第五节。——师哲认为，因叶夫根尼·科瓦廖夫的中文不好，他一人承担了翻译工作。米高扬对此很生气，并威胁说要揍他一顿。见师哲：《陪同毛主席》第 6 页。——据师哲说，米高扬于 1 月 31 日到达西柏坡。这不准确，因为米高扬根据档案文件说，他与毛的第一次谈话是在 1 月 30 日进行的。见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6 页。

共领导对苏南冲突的态度，^①但这一点至少在上面提到的 3 个主要资料中得不到验证。此外，中共领导在此之前就已公开表示了亲苏联的立场。米高扬只有一次提到，毛强调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外长西米奇民族主义的批评，对他来说是极其宝贵的。^②但是米高扬在其观察中试图寻找根据，以表明中共将按铁托方式走自主的、独立于苏联的道路，这也是可信的。

按中方的陈述，米高扬在 1 月 30 日第一次会晤时宣称，斯大林感到很高兴，中共能在过去两三年里通过许多胜利的战役解放了半个中国，并预祝中共尽快取得最终胜利。米高扬重复了斯大林过去已经使用过的反对毛访苏的理由，^③他说：鉴于当前中国的形势，毛不应离开其指挥岗位，在中国这段旅程还要经过非解放区，因此隐藏着安全的风险。米高扬说：他是代表斯大林来中国，听取中国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意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十分关心，他回去后将向斯大林报告，一切都由斯大林决定。然后，他报告了苏联的形势和国际形势。^④据米高扬称，毛在第一次谈话时向他详细介绍了下一步的军事计划。^⑤

在 2 月 7 日以前的这段时间里，米高扬与中国领导人谈话，

梅里克塞托夫：《40 年代……》，收于《在变化的世界中的苏联和中国：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谈苏中关系的历史和前景》，1989 年莫斯科版，第 32 页及下页。——梅里克塞托夫甚至认为，这曾是“主要原因之一”。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9 页。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七节和第三章第一节。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374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0 页及下页；《周恩来传》第 742 页及下页。——师哲错误地把第一次会晤说成是 1 月 31 日。另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6 页。

详见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6 页及下页。

有时与全体书记处成员，有时与其中的几个或一个成员谈话。^①当全体书记处成员参加时，主要由毛泽东发言。周恩来和任弼时偶尔插几句话，做些解释。师哲把毛泽东与米高扬之间的谈话气氛描述为“有时有某些窘迫和不和谐”，只是在告别时双方才都感到“轻松愉快”。师哲在解释这次气氛不和谐的原因时说：当毛谈到在中国除青年团外还需建立如学生联合会等组织时，米高扬表示反对毛的这一主张。这引起了毛的不高兴。米高扬当即对其干预表示道歉，他声明他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如果说米高扬在此情况下确实说了这样的话，那显然是出于礼貌，因为根据俄罗斯档案材料的记载，米高扬多次地、有时是很坚定地表达了他的，即斯大林的意见。^②

科瓦廖夫的报告称，会谈期间出现了“尖锐的局面或意见分歧”。但他只提到了惟一的一个具体的例子，这在俄罗斯档案材料中得到了证实：毛提出希望把外蒙古合并到中国。^④

1、因苏联大使迁往广州而引起的不和

在会谈开始时就出现了第一次的不和。2月1日，周恩来问米高扬，为什么苏联大使与所有使团团团长不同，单独随国民党政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109页；以及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95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90年北京版第743页；《周恩来传》第743页 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5页（没有文件出处）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95页及下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1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86页及下页。

^②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75、385页；同样见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记——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问题》，师哲访谈录，载于《人物》1993年第2期，第93页 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5页（没有文件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0页及下页。

详见下一节。

^④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1年第6期，第86页。

府迁往广州。^①周以此提出了一个尴尬的话题，因为罗申这项没有与中共领导协调的行为，使中国共产党人感到非常惊讶。更值得注意的是米高扬的无动于衷的反应。他以简短的回答进行辩解，这种回答有损于他的国家领导人风度，其辩解内容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②

2月3日也出现了不愉快的局面。米高扬指责中共领导的保密工作有漏洞，没有使斯大林与毛泽东通过电报进行的意见交换得到足够的保密，从而使美国得知莫斯科与西柏坡之间商定的、对付调停使命的策略。毛作了激烈的争辩，但米高扬并不以为然。^③

米高扬于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17页的关于他中国之行的报告，详细叙说了会谈中的争论之点（真实的和所谓的）^④当时，正是苏中展开公开论战之际，苏联领导集团增大了对过去历史的兴趣。这显然就是要米高扬写这份关于当时西柏坡会谈纪要的原因。在1960年9月22日的报告中，米高扬提出了会谈中的七个问题，建议党的领导注意。

2、围绕中共革命战略的争论

米高扬在其第一点中认为，在关于中国未来战略中涉及城市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毛说，“要使我们完全有能力从政治上、经济上掌握中国，还需要1-2年时间”。他的意思是说，在此之前，战争不会结束。目前，他们还不想占领大城市，如上海。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由农民组成的，缺少受过培训的、能有效管理

关于罗申迁往广州的情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②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95页及下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95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606，第1-17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100-110页（以下简称：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报告）。

工业的干部。此外，上海靠从外地的原料和燃料来维持生产。因此，现在攻占上海，可能出现工业停产，工人失业。只有当这样的干部培训出来了，才可考虑夺取像上海和南京这样的城市。米高扬说，毛为了说明中共在处理大城市方面的经验不足，还指出，在过去的 20 年里没有一个大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只是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中共才占领了第一个城市哈尔滨。^①

据米高扬的报告称，其他中共领导人也强调在大城市方面缺乏经验和明确的政策。^②正因如此，在取得一些城市的政权后，共产党政府“把没收的商业公司交给了工人，他们自己分了公司的商品，出售这些商品，并拆除了房屋”。^③米高扬报告说，他在西柏坡对此方案表示了反对，并按照在莫斯科时给他的指示说，占领大城市越早越好。占领上海会大大削弱蒋介石的力量，给共产党人提高无产阶级基础。^④

米高扬的这段陈述被现时公开的苏联档案文件所反驳。按档案文件看，毛向米高扬宣称，共产党部队“已作好准备，在短暂休整后将以武力夺取这些城市（指南京和上海——作者注）”。^⑤根据我们已掌握的当代文件来看，显然没有发生像米高扬在 1960 年 9 月 22 日报告中所说的那种争论。

在中国的出版物中证实，毛曾告诉米高扬，人们将不需要很多时间，就可渡江，可以攻克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在这之

此段参阅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见于：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第 105 页；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69 页，引自同上第 102 页。

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92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2 页

同上。

^④ 此段和下段参阅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见于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5 页

^⑤ 1949 年 1 月 30 日毛对米高扬谈话，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6 页。

后，将不会遇到很大的抵抗。^① 据师哲估计，米高扬在 1960 年是有意向苏联领导歪曲事实。在内战初期，解放军力图占领农村地区，这是对的，因为他们当时的力量还不足以进军大城市。但是，1948 和 1949 年他们已开始全力占领城市。在米高扬到达西柏坡之前，已占领了沈阳、北平和天津，并在与国民党政府和谈的外衣下为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和上海作准备。米高扬为了在莫斯科取得成绩卓越的声誉，他要在苏联党的领导集团中造成一种印象：毛是在他，米高扬的影响下，才改变了政策。^②

这个假设是可信的。即使知名的历史见证人，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的陈述也不能证实米高扬关于毛在西柏坡反对很快占领大城市的说法。赫鲁晓夫回忆说，当解放军挺进到上海边境，而几个星期都不准备进入大城市时，苏联领导感到很不理解。当时斯大林通过电报询问：为什么不拿下上海？毛泽东的回答是：“那里有 600 万居民。如果我们拿下（这个城市——作者注）必须供养他们。而人们拿什么来供养他们？”当时斯大林在其亲信中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不愿帮助上海工人，不愿担负命运赋予的历史责任。”^③ 但赫鲁晓夫的论断涉及的并不是 2 月初米高扬与毛的谈话，而是 4 月和 5 月的上海战役。

米高扬可能在他从西柏坡返回后向斯大林作口头汇报时给斯大林以这样的一种印象：毛对很快占领大城市有些顾虑。据赫鲁晓夫回忆称，斯大林在米高扬返回后曾在小范围内谈到中国问题，当时他曾惊讶地问道：“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具有

此段和下段参阅《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448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 375 页。

师哲 1996 年 3 月 16 日与作者的谈话。

③ 《赫鲁晓夫回忆》，见《历史问题》1992 年第 11—12 期，第 73 页。

一些特别的、农民的观点，如：他害怕工人，他的军队远离城市。”^①这段话使人回忆起，斯大林在此之前就怀疑毛泽东首先关心的是农村的革命，而回避城市。1946年初，他惊讶地对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说，毛泽东是一个“独特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农村活动，而避开城市。^②米高扬很可能是为了讨好斯大林，以他的倾向性报告来证实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先入之见。早在40年代，把毛泽东说成是“农民革命家”的老调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西方国家的首都就已传开。此外，米高扬1960年作此报告时，正值苏联对毛主义的批评日益增强之际。可以设想，米高扬要以此报告为苏联的这种宣传做贡献，于是，他把这个老调重新包装和抛出。

1949年2月斯大林通过米高扬向中共领导提出建议，其中指出：有必要加强对城市中的工人、青年和妇女的关心，以及加快有关干部的培训。斯大林建议，“不要禁止罢工，否则中共会失去工人的信任”。米高扬向斯大林报告说，“这个忠告使毛泽东和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感到很惊讶”^③。米高扬又说，但总体说来，斯大林的建议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毛和政治局委员们一致赞同。毛表示要“听从”这些忠告。米高扬在向斯大林报告时使用了共产国际的习惯用语：“执行”，而不是“听从”或“考虑”这些忠告。^④

如果讨论确实像米高扬所说的那样，那么斯大林关于在中国应允许罢工的建议使中国同志感到“很惊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同志一定知道，苏联领导从粉碎喀琅施塔得暴动开

同上。——赫鲁晓夫错误地把米高扬访问的时间移到了战争时期。

^②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1945年12月—1946年1月蒋介石儿子在莫斯科的秘密访问》，见《近代史与现代史》1996年第4期，第121页。

^③ 1949年2月5日米高扬致斯大林的电报，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102页。

同上。

始，一贯对苏联的罢工运动进行血的镇压。但是，什么动机促使斯大林提出这样的忠告，仍是一个谜。

米高扬指责中国共产党人忽视城市无产阶级，并由此引出第二点批评。米高扬的报告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米高扬批评说，毛泽东对共产党队伍中无产阶级成分的重要性没有赋予必要的重视，相比之下，他更多地注重农民。这种立场源于过去时期，那时共产党和军队在山区活动，远离工人集中的地区。时代变了，而对工人阶级的态度却依然故我。^①

米高扬在报告中说，毛在谈话中“满意地”指出，共产党在农村享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在那里无人可与之竞争。在城市的工人中，国民党的势力要比共产党大，尽管中共在大学生中有很大影响。例如，在上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共产党举行公开活动的时期，只有五分之二工人站在共产党一边，而其余的工人同情国民党。米高扬对毛的下述论断表示惊讶：中国的农民“比所有美国工人、比许多英国工人的觉悟都要高”。显然这个命题的争论曾是 1927 年毛进入井冈山后出现的一场原则争论，它曾严重影响了莫斯科与中共党内以毛为首的一派的关系。

可以设想，米高扬夸大他在西柏坡的观察，并有意加剧双方的分歧，目的是为了在意识形态方面贬低毛主义，为当时正在启动的反华宣传做贡献。

3、关于政府组建的不同方案

米高扬在 1960 年报告中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是组建政府问题，这对评价斯大林当时的对华政策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当时，斯大林借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之际，敦促毛尽快建立政府。有关这

^① 此段和下段参阅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5 页。

方面的情况，米高扬的报告是可信的。米高扬在报告中说：“遵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我劝毛泽东不要拖延建立革命政府，要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革命政府，这是有好处的。比如在攻占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新的革命政府的建立。这样做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在这之后共产党人就不必再像游击队那样，而是以一个政府的身份出面活动。这也有利于进一步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①

米高扬应当补充说，如果这样，苏联就有可能结束其两面派的游戏，从而与新建立的共产党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公开向新政府提供援助。^②但是，没有证据说明，米高扬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说，不清楚。斯大林在另一个场合就敦促毛尽快建立政府的理由作了一个补充说明。他指出，蒋介石和美国想在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上抢夺主动权，他们表示要吸收其他党派的代表加入他们的政府，这样，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基础就会得到扩大。^③这显然是说，毛应当通过建立自己的联合政府，而抢先采取行动。

米高扬说，在西柏坡，毛不同意斯大林关于尽快建立政府的建议。他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对他来说，没有政府，活动更有利。如果建立政府，那就要联合，那么就要对其他党派负责，这就会带来麻烦。现在，革命委员会虽然同其他党保持联系，但不受其他党约束。这样做有助于肃清国内反革命分子。毛坚持不能在攻克南京（预计在4月份）之后立即建立政府，而是

^① 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报告，见于：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105页，以及列多夫斯基：《中共中央代表团1949年6-8月在莫斯科的秘密使命》未公开的手稿第8页。

^② 当时作为苏联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安德列·列多夫斯基也是这么论证的，见同上。

列多夫斯基：《中共中央代表团1949年6-8月在莫斯科的秘密使命》，未公开的手稿第7页。——这里缺少有关电报的日期和资料来源。

要到 6 月或 7 月再建立。在这个问题上，米高扬未能改变毛的主张。^①

当 1949 年夏刘少奇逗留于莫斯科时，谈到毛考虑于 1950 年 1 月 1 日成立政府，斯大林再次提出加快的意见，但这次提出的理由是，“敌人”可能利用“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干涉。^② 政府最终于 1949 年 9 月 30 日成立。

似乎，上述情况可以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来加以说明：西柏坡的会谈虽然在成立政府的时间上出现了分歧，但斯大林和毛泽东同样都认为，组建后的中国政府必须是联合政府。但是，这一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说：“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时，将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之先例，除中共外，所有其他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将大大加强中国革命。”^③

斯大林在 1948 年 4 月 20 日的复电中提出异议说：“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想，中国的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的中间阶层，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将长期生存。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争取它们，与之合作，共同反对中国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从而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领导地位。也可能，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人物将被吸收参加人民民主政府，使政府本身成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这个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国民党代理人。”^④

此段参阅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见于：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5 页及下页，以及列多夫斯基：《中共中央代表团 1949 年 6-8 月在莫斯科的秘密使命》，未公开的手稿第 8 页及下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9 页。

^③ 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致苏共领导的电报，见：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2 页。

^④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2 页。

当米高扬在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援引了斯大林 1948 年 4 月 20 日的电报时，却没有提及电报的另一段话。斯大林在那段话里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联合政府问题。他说：“人们必须看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之后，至少在胜利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政府就其政策来看，将是一个革命民主的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政府，至于这个时期将持续多久，现在还很难说。”斯大林接着说，这首先意味着不实行全国国有化，不废除土地私有制，也不没收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商业和工业资产，不没收大地主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生活的中小地主的资产。这方面的改革必须等待一段时期之后才能实行。此外，斯大林还纠正中国同志说：“你们应知道，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其他属于人民阵线的政党。”^①

斯大林以此向毛建议，采用人民民主模式。在斯大林看来，这种模式已在东欧卫星国经受了考验。就当时德国苏占区共产党人掌权的实际来看，乌布利希（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译者注）作了精辟的表述：“它必须具有民主的外观，但我们必须掌握一切。”^②

米高扬在 1960 年 9 月 22 日的报告中断言，毛在斯大林当时的建议基础上改变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使建立联合政府的思想成为西柏坡会谈的出发点。^③ 这似乎表明，毛泽东在此期间接受了斯大林建议的方案。

但某些中国的资料却给人以相反的印象：是斯大林反对建立

^① 1948 年 4 月 20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1，第 28-29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中共中央代表团 1949 年 6-8 月在莫斯科的秘密使命》未公开的手稿第 8 页。

^② 沃尔夫冈·列昂哈德：《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科隆/柏林 1961 年，第 365 页。

^③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1，第 102、105 页。——另参阅《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449 页。

联合政府，而毛泽东则主张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①毛曾对米高扬说，这种政府形式虽然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从其性质与宗旨来看，这个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并将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②这些材料甚至还认为，毛在阐述中国形势时，重点谈了联合政府问题，因为这是斯大林最为关切的。在政府组成上，斯大林对“与美国有密切联系的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府存有疑虑。^③

以上援引的 1947 和 1948 年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表明，米高扬的说法似乎更切合实际。如果确实如此，中国的有关说法则只能是为了造成这样的印象：9 月 30 日成为现实的联合政府方案，是由毛泽东最早提出的，是不顾斯大林的反对而贯彻实施的，——而不是相反。

有关米高扬访问的苏联档案被列多夫斯基公开后（即使是不完全的），北京的官方历史学家们陷入了进行辩护的压力。虽然他们转登了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给苏共领导的报告^④但他们指出，在中国档案中没有米高扬援引的 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⑤此外，他们认为，米高扬援引的这种所谓观点不符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主张。作为证明，他们只提出了毛泽东于 1947 年的惟一一次表述。在毛泽东起草的 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说：联合各被压迫阶级，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以及“组织民

^①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449 页。

同上；《周恩来年谱 1898 - 1949》1990 年北京版第 811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1 页 师哲：《在历史伟人身边》第 376 页。所有材料都未注明资料来源。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1 页。

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 年 1-2 月）》见《党的文献》，1996 年第 1 期，第 90-96 页。

此处和以下整个段落参阅同上第 91 页的 [注]。

主联合政府”。^① 党的官方注释还说，从毛泽东这段时间先后发表的声明来看，米高扬的陈述是与史实不符的。

师哲同样认为米高扬篡改了毛泽东的意见，断章取义地援引了毛泽东 1947 年 11 月 30 日的电报。^② 中共中央当时的所有文件以及毛有关的谈话都表述了这样一种意愿：争取“与各民主党派结成同盟”。师哲说，米高扬是想讨好斯大林，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为此，他力求让斯大林得出这样的印象：毛最终屈从于苏联的观点。

北京的论述似乎并不特别令人信服。如果说有争议的毛泽东 11 月 30 日的电报真的在中国档案中找不到，但这并不能证明它的不存在。因为 1947 年春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中共领导不得不撤离了延安，当时，大部分文件被销毁了。^③ 此外，惟一被党史学家援引的毛泽东 1947 年 10 月 10 日的表态，是为公众舆论而发表的。因此，它的主要目的是按“统一战线”的精神争取盟友，以便共同反对主要敌人国民党，而丝毫不能先验地表明，毛泽东在党的内部是如何考虑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最后一点：米高扬从斯大林和毛泽东往来电报中援引的几段话，其含义是很明确的和有说服力的。

4、旅顺口和中长铁路

特别棘手的是毛泽东在 2 月 4 日提出的问题，它涉及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苏中条约，涉及关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两个蒙古问题。这些构成了米高扬 1960 年报告中的第四个方面问题。

毛泽东声称，中国舆论关心中共对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 年版第 1235 页。

此处和下段为 1996 年 3 月 16 日和 4 月 7 日师哲对作者的陈述。

^③ 徐焰：《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香港，1993 年第 103 页。

态度，其中也包括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条约。在废除“卖国条约”方面，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问中共领导人，如何理解“卖国条约”，它指的是什么条约。中共领导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应仔细对待。中共并不要求废除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因为其中也存在中共坚持的、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条约。毛说，他把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中苏条约也视为这样的条约。^①

米高扬在给斯大林的关于 2 月 4 日会谈的电报中说，他问毛：在与其他党的代表谈话时，是如何解释这一条约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毛笑着回答说，签订这个条约的不是他，而是蒋介石。毛泽东又说：“我向他们解释，苏联到旅顺来是为了保护中国免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因为中国很弱，没有苏联援助就不能保卫自己。”针对中共为什么反对美国而赞成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这个问题，毛泽东回答说，美帝国主义留在中国是为了压迫中国，而苏联留在旅顺是为了以其武装力量来保卫中国，防范日本法西斯。等到中国强大到有能力保卫自己，“苏联就不再需要旅顺这个军事基地了”。毛接着说，国民党立法院的一位女议员曾说，如果共产党人能够成功，并重新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这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毛说，这位女士不懂得政治。毛在 2 月 4 日还说，中国共产党人不隐讳他们的亲苏倾向。他们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之际曾强调：中国必须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之中，“对我们来说，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②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对苏联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的开始）第一部分，未公开的手稿，第 10 页。——列多夫斯基没有说明资料来源。从上下文看，他显然依据的是米高扬给斯大林的关于 2 月 4 日会谈的电报。

米高扬致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62-63 页，作者根据原件复印件转述，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对苏联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第一部分，未公开的手稿，第 11 页。——列多夫斯基没有注明电报的日期。

米高扬在 1960 年 9 月 22 日向苏共领导的报告中简化了这段谈话，并作了一点改动。毛泽东说，有一位“女资产阶级政治家”就旅顺问题向他表示，如果一个革命政府掌握了政权，苏联就不再有理由在旅顺保持其海军基地了。毛与这种观点保持了距离。他认为，即使共产党人在苏联，以及在中国掌握政权，这也并不排除允许在旅顺保留苏联的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压迫中国，而苏联在旅顺是为了支持中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支持这一基地的继续存在。只有当中国强大到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苏联也就不再需要这个基地了。^①

据称，在米高扬启程赴西柏坡之前，苏联领导曾决定，如果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将废除 1945 年 8 月 14 日关于旅顺的协定，苏联军队将从辽东半岛撤出。^②

1945 年中国被迫接受苏联在防卫旅顺口方面拥有单独的军事控制权。当 1945 年 6 月至 8 月间进行条约谈判时，宋子文领导下的中国代表团虽然没有对签订旅顺协定表示反对，却声明只同意共同使用作为海军基地的旅顺口。但是中国代表团在谈判初期曾提出要求：对旅顺和大连港口的行政必须由中国人来掌管。初期，斯大林也坚持旅顺和大连必须由苏联来实行监督。最后，双方在一个复杂的共同管理的形式上取得了一致。^③

斯大林在 1949 年曾认为，不能与一个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继续保留这样一个不平等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因为这与共产

^①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1，第 106 页。

^② 当时苏联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安德列·列多夫斯基就是这样说的，见：列多夫斯基：《毛泽东……》第一部分 第 11 页。

^③ 7 月 9 日、8 月 12 日和 8 月 13 日谈判的苏联记录，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2，第 30-33，93-97 页；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06，目录 7，p.36，案卷 507，第 108-113；两者均引自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苏中条约的谈判 1945 年 6-8 月》第 40-44、104-110 页。——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党兄弟国家的团结是不相容的。但是，他在处理与东欧卫星国的关系时，却没有遵循这一思想。他之所以对中国持不同的做法，很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是在没有苏联的帮助下取得政权的。这种独立的取得和这个国家的大小与作用，使得他不可能考虑按东欧的方式实行卫星化。此外，斯大林期望中共取得政权后将改变中苏关系的性质和整个远东的形势，使之向有利于莫斯科方向发展。^① 这一点也许是促使斯大林作出上述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苏联军队长期驻扎在辽东半岛，也就没有特别的必要了。

当斯大林从米高扬那里得知，毛在 2 月 4 日谈话时提到旅顺问题，他在第二天指示米高扬对中共领导就苏联的立场作如下解释：“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情况将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军队因此从日本撤走，苏联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走自己的军队。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从旅顺地区撤出是适宜的，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愿望。”^②

据此，米高扬于 2 月 5 日或 6 日向中共领导声明：苏联方面把这一条约看做是“不平等的”；这个条约的签订是为了对付国民党与日本和美国联合反对苏联和中国解放运动的阴谋，这个条约已给解放运动带来了“众所周知的好处”；但现在的形势随着共产党人取得政权而根本改变；与此相联系，苏联政府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了和约，将宣布此条约无效，并从旅顺撤走苏联军队，“但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苏联政府也准备这样做”。米高扬接着说，而苏联方面认为中长铁路的协定并“不是

此段和下段参阅列多夫斯基：《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对苏联的访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第一部分，未公开的手稿，第 12 页。

此段参阅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6 页。

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大部分是用俄罗斯的资金建造的。可能在条约中“平等原则没有被充分地运用”。莫斯科准备“与中国同志以兄弟的方式”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①

米高扬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他把这一条约评价为不平等的，这对毛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来说，“是如此的意外，以致使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但“他们立即表示：现在从辽东撤出苏联武装力量和放弃旅顺基地，还不是时候，因为我们这样做将只能有利于美国”。毛声称，撤出辽东问题应保密；只有当中国的政治反动派被粉碎，当人民已经动员起来对外国资本进行清算斗争时，以及在苏联援助下国家已经“整理好”时，才能重新考虑这个条约。毛说，中国人民因这一条约而感谢苏联。当中国变得强大了，那时苏联军队将撤出中国，并按苏波条约那样签订一个苏中互助条约。^②

米高扬在 1960 年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说，当时毛泽东在旅顺问题上坚持他的意见。看来，他“有某种策略考虑”，但是没有说出来。^③

毛对米高扬补充说，在决定中长铁路的财产归属方面，看来有些小的意见分歧，这些可就地解决。例如，国民党没收了一部分铁路企业，而人民解放军在这之后把它又归还了铁路。有人

^① 1949 年 2 月 6 日米高扬致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78-79 页，作者根据原件复印件转述，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对苏联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第一部分，未公开的手稿，第 12 页及下页。——另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0 页及下页。

^② 1949 年 2 月 6 日米高扬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78-79 页，作者根据原件复印件转述，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对苏联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的开始》第一部分，未公开的手稿，第 13 页；并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1 页。

^③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6 页。

说，国民党是根据苏中条约拿走这些企业的，而解放军把这些企业归还铁路是违反条约的。毛建议高岗与伊万·科瓦廖夫研究这些问题，并向两党领导报告。^①

5、在新疆问题上的一致

米高扬在 1960 年报告中的第 5 点中提出，毛泽东怀疑苏联在新疆另有意图。毛在西柏坡会谈时提到，在伊犁地区有一个不受乌鲁木齐控制的独立运动，还说那里有一个共产党。早在 1945 年他（毛）就听说这个地区的地方起义分子拥有苏制的大炮、坦克和飞机。米高扬立即对隐藏在这一暗示中的指责做了反驳。他保证说，苏联在新疆既不支持独立运动，也没有任何领土要求；苏联在任何时候都把新疆看做是中国的组成部分。^②

6、围绕外蒙问题的争吵

米高扬在 1960 年报告中的第 5 点里谈到在西柏坡会谈中具有爆炸性的一个问题：外蒙古。这是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条约谈判时争论最激烈的、并多次使谈判险些失败的问题。作为雅尔塔协定的后果，国民政府最终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并不得不承认 1924 年以来的现状，即外蒙在表面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是受苏联保护的领土。^③

据米高扬称，毛泽东在西柏坡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他问

米高扬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78 - 79 页，作者根据原件复印件转述，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对苏联的访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第一部分，第 13 页并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1 页。

^②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6 页。

关于蒙古问题的历史和它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道，苏联如何看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米高扬当然知道这个问题的爆炸性，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莫斯科不赞成这种统一，因为这将导致中国失去很大一块领土。此时，毛被迫摊牌。他认为，两个蒙古应当统一，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米高扬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取得独立，并难以自愿放弃独立。如果它有朝一日与内蒙统一，那可能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蒙古。任弼时以人口差别进行反击：在内蒙生活着 300 万人，而在外蒙只有 100 万人。^①

当时，米高扬请斯大林给予指示，并得到如下的电报：

外蒙古领导人主张中国所有蒙古人居住区同外蒙古联合起来，联合在独立的统一蒙古国的旗帜下。苏联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意味着一系列地区将脱离中国，虽然这个计划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即使所有蒙古人地区联合成一个自治体，我们也不认为外蒙古会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同意在中国国家的版图内实行自治。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②

毛泽东在了解了这一电报的内容之后说，他会考虑这个电报的意思，并称：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会维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

^① 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107页。——历史见证人科瓦廖夫和师哲的关于蒙古争执的报告是不可信的。科瓦廖夫回忆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尖锐分歧，但他错误地认为，毛泽东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而借国民党左翼之口提出了他的愿望。显然，科瓦廖夫把西柏坡的情况与刘少奇访苏的情况搞混了。刘当时确实引证中共党外力量的要求，希望收回蒙古。师哲却否认毛对米高扬谈起蒙古问题。参见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1年第6期，第86页；师哲谈话，见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记——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 载于《人物》1993年第2期，第93页。

^② 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107页。

线，也不会提出关于蒙古统一问题。^①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于 1949 年夏通过刘少奇在莫斯科再次谈起这个问题。显然，这次比较谨慎，如同旅顺口一样，即伪装为“民主党派的几位人士，以及大学生和工人”提出的问题。但刘少奇最后表示，中共领导准备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②

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斯大林的虚伪，他自命为外蒙独立的守卫者，而实际上，这种独立是表面的，是完全依附于苏联的一种掩饰。斯大林的厚颜无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同时还装扮成中国利益的保卫者，他声称，他将阻止外蒙吞并内蒙的倾向。毛泽东虽然退缩了，但他察觉到了斯大林的不诚实性，并因此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

令人惊讶的是，中共领导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了蒙古问题。1936 年毛泽东曾确信，中国革命胜利后，外蒙将“自动地成为中国联邦的一部分”。^③值得注意的是，毛的退却与当年宋子文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前所述，宋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条约谈判中为外蒙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尽管最终是徒劳的。可对比的是，1945 年和 1949 年中国人的谈判策略，人们为了在其他方面获得苏联的承诺，而放弃了外蒙古。1949 年主要涉及的是苏联承诺对新中国的慷慨援助。

7、对未来共产党政府的承认

米高扬在 1960 年报告中谈到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涉及别国对未来革命政府的承认。实际上，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并没有什么争论。当时，毛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外国立即承认新政

同上。

^② 参阅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日期不详，大约在 1936 年的 6 月至 10 月间，引自埃德加·斯诺：< Red Star Over China > . . . New York, 1961 . . . p.96。

府，苏联则率先承认；二是，不必力争对新政府的立即承认，如果外国表示愿意承认新中国，可推迟大约一年后再建立外交关系。毛显然倾向于第二种方案，认为它的好处在于，可以从容地处理中国国内的一切外国人及有关事务，而用不着考虑外国政府的抗议。显然，米高扬并没有提出苏联自己的设想，因为他表示同意毛提出的行动计划。其他资料也表明，斯大林当时曾劝中国共产党人不要急于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主张发展与它们的经济关系。^①

2月1日，米高扬和周恩来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周同样阐述了这两个方案，并倾向于第二个方案，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实行第二种方案，与苏联的关系是在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建立，或是一年以后与其他国家一起建立。^②

8、王明事件

在西柏坡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问题。据米高扬的报告称：毛在头两天的会谈时还介绍了中共的历史，谈到他过去在党内蒙受的迫害；他甚至夸大地说，他被开除出党，被逮捕，并几乎丢掉性命，有人企图杀害他。会谈中，他还提及与李立三的争论，特别详细地谈到曾起过坏作用的王明及同他之间的争论。如前所述，王明在1941年10月被毛泽东逐出政治舞台以前，是苏联路线在中共领导中的代表人物。^③毛指责王的活动导致了党的被粉碎，军队被击溃。显然，毛这里暗示的是王明1938年保卫武汉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六节。——此段还参阅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107页。

米高扬发自西柏坡的、未注明日期的报告，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9，第20-21页，引自列多夫斯基：《中共代表团1949年6-8月对莫斯科的访问》见《远东问题》1996年第4期，第83页，注10。

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九节。

的错误战略。^①毛以外交辞令的方式避免在这方面直接指责斯大林和苏联的对华政策，然而却很清楚地指出，王是“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毛在米高扬面前竟然以一贯主张党内宽容的面貌出现。但鉴于在“整风运动”时期由康生实施的血腥清洗运动，这一主张宽容的说法似乎缺乏说服力。毛对米高扬说，过去“宗派主义分子”的做法是消灭党的领导干部，正是他，结束了迫害党的干部的做法。他赞成在党内要耐心宽容，不应由于意见分歧就把人逐出中央委员会。正因如此，王明留在了中央委员会，并受到中央委员会的善待，“虽然他实际上什么工作也不做”。^②

米高扬在西柏坡回避就王明问题表态，虽然毛试图探察他的态度。米高扬在1960年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看来毛“是想探察我们对王明的态度，我们是否想依靠他或听取他的意见”。显然，在离开莫斯科之前，苏联领导就已经商定，米高扬不同王明见面。据米高扬称，王明也没有要求和他会见，也从未出席他与毛的会谈。双方都力求在这个棘手的王明问题上谨慎从事，避免给双方的关系加上新的负担，尽管毛表示他没有忘记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③

9、阿谀奉承

毛泽东不断向米高扬表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党相比，经验不足，因此他请莫斯科给予“指示和领导”。毛贬低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作用，多次称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再三强调，他遵循亲苏路线。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毛还说，请注意，中国共产党人犯过“许多错误”，与俄国

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参阅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104页及下页。

同上。

相比，不算什么。毛说，他自己作为党的领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不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因此，他禁止各地把他的名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并提。为此，他同其最亲密的同志进行过争论。但是，如前所述^①，毛自 1937 年、1938 年就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促使或至少是容忍人们在“整风运动”期间搞对他的个人崇拜，并在七大新通过的党章中称颂“毛泽东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②

米高扬在 1960 年的报告中却佯称，这是“东方表示谦虚的一种手法”，但不符合“毛泽东对自己的实际评价和他的自我认识”。在西柏坡，米高扬作为一个亚美尼亚人对东方的阿谀奉承并不陌生，他也非常礼貌地回应毛泽东，并对他大加赞扬。米高扬说：毛的话只能证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真的是很差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他们怎么能在 20 年的内战中取得如此之胜利；中共不是机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在考虑中国的特点和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加以运用的。米高扬甚至承认，中国革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总结中国的经验“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宝贵的理论价值”。很可能，毛之所以不炫耀自己，正是为了引出米高扬的这种反应。^③

10、中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据中国资料称，毛就人民解放军的打击力量向米高扬作了乐观的表述，认为很快将渡过长江和向南推进，当时提出的口号是

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② 1945 年 6 月 11 日通过的中共党章总纲，引自《中国共产党党章》，华东新华书店出版，1949 年第 4 版。此段还参阅 1960 年 9 月 22 日米高扬报告，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7-109 页。

同上，第 108 页及下页。

“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①毛接着说，胜利后要建立有“民主”力量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政权将掌握在中共的手中。在国家经济重建方面，要借鉴俄罗斯和苏联在 1917 年十月革命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验。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比 1917 年到 1918 年的俄国要快些，因为不必担心外国的干涉。在建设新国家方面，可以借鉴苏联的有益经验。^②

在谈到新中国未来经济政策时，特别是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时，刘少奇谈到党内的极端思潮，而他主张实行一条谨慎的路线。米高扬对此表示赞同。刘赞成查抄“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但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企业的国有化问题可在一两年后再提出。米高扬也建议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谨慎的政策，先不谈企业的国有化。比较好的做法是，现在密切关注他们，等共产党人的政权巩固了，再提他们的未来问题。刘少奇表示完全赞同。^③

刘少奇接着说，重要的问题是，小商品生产者将向合作化方向发展，或是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列宁曾说，小市民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源泉。“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加强经济中的计划原则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完成的。“我们也将面对列宁当时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但人们要在 10 年至 15 年后才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发起总攻，才会开始实行工商企业的国有化。至于农业，只有到了它能在工业基础上进行发展的时候，才能考虑实行

^①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449 页。以及《周恩来年谱 1898 - 1949》1990 年北京版第 811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75 页。

同上，第 375 - 378 页 师哲：《陪同毛主席访苏》载于《人物》1988 年第 5 期，第 6 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1 页。

^③ 1949 年 2 月 3 日刘少奇与米高扬的谈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41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 - 2 月）》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3 期第 102 页。

社会主义化。刘说，关于未来的政策，在党内存在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分子以特权，向资本主义投降。他们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说，重新建立半封建和资产阶级的制度。另一种倾向则要求以“左的、冒险的方式”，匆匆忙忙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两种倾向都将有损于工农联盟。人们必须对这些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①

米高扬在报告中说，与此相联系，刘请求苏联提出建议。^②斯大林和米高扬是否对此作出了反应，现在还不得而知。

毛泽东也赞成在初期实行一种周到的、自由的经济政策。毛说，中国共产党已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但没有给他们以急需的日用品。如果不能使工业发展，从而向农民供应这些物品，共产党人将失去领导地位。虽然人们通过工会维护工人的利益，通过国家对商业的干预，为工人和城市居民降低了粮、油和日用品的价格，以及在农村引导人们加入生产和消费合作社，保护贫困农民。但是，人们也必须给私人企业以发展的机会。在中国允许自由竞争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只要中国在经济上还很虚弱和落后，人们就必须利用私人资本，就不能草率从事。虽然革命前的俄国已达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苏联花了 12 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过渡。在中国，鉴于经济的落后性，这一过渡时期也将是很长的。^③

^① 同上，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42-43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3 期第 102 页及下页。

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46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3 期第 103 页。

此段参阅 1949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94-95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3 期第 103 页及下页。

关于经济问题的会谈占用了许多个小时。米高扬在其最后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绘出了一幅综合的图画。他概括说，他的中国会谈伙伴们，在涉及一般政治和党的问题、农民和一般国民经济问题等方面，是很内行的。但在企业经济方面，他们的知识就不够丰富，对工业、运输业、银行业只有一些很模糊的设想。他们对被没收的资产没有数字，不知道在中国有哪些最重要的外国公司，也不知道它们是属于哪个国家的。他们也不拥有外国银行在中国活动的情报。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属于“官僚资本”，应予以国有化。“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具有一般方针的性质，没有具体化，甚至对被解放地区应控制什么也没有具体的计划。他们驻扎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与实际相隔离”。从会谈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什么应作为国家经济基础（大银行、大工业等）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没有具体的计划。^①

米高扬对中国领导人经济判断能力的这种批评意见，是否在西柏坡就已向其会谈伙伴表示了出来，这至今还未能得到证实。如果是，这似乎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印象，如前所援引，毛泽东在 1956 年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说，米高扬确实表现得很骄傲自大。

关于未来的共产党中国的民族政策，米高扬建议毛泽东实行一条较有约束性的路线：“应允许少数民族自治，但不是独立”。关于这段谈话，米高扬在其致斯大林的报告中说，毛对此建议感到高兴，“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不打算给任何人以独立，不管他是谁”。^②

此段参阅米高扬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94-95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3 期第 104 页。

^② 1949 年 2 月 4 日米高扬关于同毛泽东的谈话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54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3 期第 103 页。

11、中共的外交政策

中国出版物补充了米高扬 1960 年报告的最后一点，它涉及对共产党政府的承认问题。从这些材料看，毛泽东关于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政策谈得比较谨慎。关于新中国的未来外交关系谈得也不像米高扬所说的那样明确。毛说，中国的屋子太脏了，“垃圾、尘土、跳蚤、臭虫”什么都有。解放后必须认真打扫这所屋子，然后再请客人进来。毛清楚地暗示苏联：“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如果苏联准备帮助新中国，这将更好。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帝国主义分子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是不受欢迎的。急于解放香港、澳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相反，可以利用这两地“发展与海外的关系和促进进出口”。西藏问题需要慢慢解决。解决“台湾问题”更需要时间，因为这个岛屿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庇护之下。^①

据师哲认为，毛只不过把美国看做是一个潜在的敌人。毛说，至目前为止，帝国主义者还没有严重干预内战。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只是通过提供大量军火来支持国民党政府。其他帝国主义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保全自己，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因此我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胜利后，这些国家必须放弃他们的特权，并偿还他们的债务。^②

引人注意的是，米高扬在西柏坡极力主张对美国实行一种特别谨慎的安抚政策。在讨论如何对待外国在华资本时，他受斯大林委托，向中国领导人建议，把日本、法国，如可能，也包括英国的资产收归国有。但对美国资产则采取一种小心的政策，“以

^①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79—381 页；《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448 页。——另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382 页。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82 页。

便使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利益将受到新的执政者的照顾”。^① 据师哲称，毛在最后一次会晤时再次谈到外国朋友的话题，这次是非常含蓄、隐蔽。他说，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有“真朋友和假朋友”。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对他们我们要警惕”。师哲说，米高扬似乎对这一席话感到有些不安，似乎不明所以，但也没有表态。^②

12、苏联的经济援助

在西柏坡会谈中，关于苏联向共产党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也涉及军事援助问题。周恩来在 2 月 1 日与米高扬会见时（朱德也在场），就提出关于提供反坦克武器的请求，他同时还提到，人民解放军只有 150 门反坦克炮和一些轻型坦克，虽然在徐州缴获了 70 辆坦克，但大部分难以开动，并缺少燃料。他们请求苏联提供制造弹药的 TNT、技术人员和生产武器的设备。希望苏联能派顾问来华，以便在军队组织、军事教育和后方建设（包括军事工业）等方面提供帮助。^③

米高扬说，原则上同意在建设军事工业及派遣顾问方面提供支持。关于供应防空和反坦克武器问题，他不能表态，他将向莫斯科报告。^④

2 月 4 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与米高扬就苏联

此段参阅俄罗斯档案文件，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69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3 期第 102 页。

^②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85 页。

参阅俄罗斯档案文件，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29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3 期第 99 页。

同上。

援助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其间，毛礼貌地、含蓄地提出了他的请求。另一方面，他也让人明白，他的国家即使没有苏联的援助也能过得去。

毛首先肯定，苏联已经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大的援助，而且还在继续这样做，对此中共很感激。当中共向苏联请求支持时，它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知道局部利益必需服从整体利益。如果苏联什么也不给，这也不会伤害谁。在此之前（可能是 1947 年以前），当东北部队政委罗荣桓去莫斯科时^①，毛曾告诉罗，不要把形势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将无法生存，自己已无任何办法了，但还是很希望能在满洲得到苏联的相应支持。自 1947 年以来，林彪曾多次请求苏联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给予帮助。他曾指示高岗，从苏联得到的任何东西都必须付钱。此外，也要设法从国民党占领区弄到一些紧缺物资。中国同志不得不精打细算地来使用苏联的援助。没有这些援助，是很难取得今天这样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依靠自力更生。可以认为，占总援助四分之一的军事援助曾起了非常的、实质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需要苏联共产党的各方面援助。”^②

在此之前，刘少奇对米高扬谈了他的基本观点。他强调，建立工业基础“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是不可想象的”。对中国来说这种帮助必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按中国的设想，援助可采取以下形式：1、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经验；2、提供相应的参考资料和派遣顾问和技术专家到各经济部门；3、转让资本。中共领导认为，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和中国必须相互提

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年1-2月）》，见《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105页（注12）。

此段参阅俄罗斯档案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9，第58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年1-2月）》，见《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97页。

供帮助。如果中国不犯错误，它可以借助苏联的帮助较快地到达社会主义。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不可能重建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中共领导非常愿意事先知道，从苏联能得到多大规模的援助，以便可以考虑他们的国民经济计划。^①

关于具体的援助安排问题，毛泽东让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进行商谈。他本人只是在米高扬访问行将结束时才介入，那涉及贷款和支付方式问题。

关于东北，中国人有特别具体的期望，即要把那里建设为“国家防御能力的锻造场”（任弼时），在那里将能制造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装备。他们设想苏联的援助将以如下具体形式出现：苏中共同经营经济联合体、苏联提供贷款和给苏联以某些特权。他们需要苏联提供援助，以便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等地的钨、锰、钼、铝等矿藏。据称，日本人当年就出口 1 吨的钨。如果苏联对那里的矿藏感兴趣，可考虑共同开采，或给苏联以特别开采权。^②

1949 年 1 月初，为建设计划中的长江以北的铁路，毛泽东曾请求斯大林在贷款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物资。^③ 在西柏坡，任弼时曾建议建设一条经蒙古的连接苏中的铁路。^④ 毛却提出一条经新疆的路线。后来在莫斯科讨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赞成经蒙古的方案，因为这条线路比较短，造价便宜。

中方多次谈到向中国派遣顾问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需要

此段参阅 1949 年 2 月 3 日刘少奇与米高扬的谈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44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 年 1-2 月）》，见《远东问题》1995 年第 3 期第 97 页及下页。

此段参阅任弼时和朱德 1949 年 2 月 2 日与米高扬的谈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3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9 页。

^③ 1949 年 1 月 8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7，第 1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8 页。

此段和下段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6 页及下页。

两位顾问（意指“顾问组长”），一位是经济顾问，一位是财政顾问。周还提到“党的顾问”（显然是指伊万·科瓦廖夫）认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共领导要与苏共中央保持直接的联络，因为这些问题需由莫斯科作出决定。与此相联系，毛泽东建议派王稼祥出任未来的驻莫斯科大使。米高扬没有提出异议。^①

任弼时请米高扬派“不少于 500”名专家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他强调，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任用了日本技术人员。^②

米高扬向斯大林报告说，2月6日毛泽东请求提供 3 亿美元的有息贷款，以供应所需原材料和机器，其中包括用以发行中国货币的白银以及石油、原料、设备和 3000 辆卡车等。毛说，“3 亿，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给这个数目，是少一些或是多一些。但即使你们不给，我们也不会感到受伤害。我们不要求提供无偿的援助，因为这是中国对苏联的一种剥削。我们请求提供付息的、将来中国能偿还的贷款。这一点对中国工人来说是重要的。他们应知道，苏联的贷款是必须偿还的。”^③毛请求自 1949 年开始，分 3 次以同样的数目在 3 年内支付。毛没有提利率和偿还期。关于武器供应，毛说，迄今为止是无偿的，但苏联工人为生产这些付出了劳动，理应偿还。关于贷款偿还，他说：“我们不太清楚，应用什么来偿还。”^④中共中央曾提交了

此段参阅 1949 年 2 月 4 日毛泽东、周恩来与米高扬的谈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 案卷 39，第 57-58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7 页及下页。

此段参阅 1949 年 2 月 2 日任弼时与米高扬的谈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3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9 页。

米高扬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84-85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对苏联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第一部分，未公开的手稿，第 17 页；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0 页。——列多夫斯基没有注明这份电报的日期。

米高扬给斯大林的电报，同上。

一份所需机器和物资的清单，但这份清单目前没有见到。人们也不知道相应的贷款数目。电报说，如果贷款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决定，人们将派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以便签订一个协议。毛还希望莫斯科能接待中国的一个专家小组，以便他们在那里学习银行业务。^①

毛提出的这 3 亿美元的贷款数目，相当于他半年前提出的十倍。1948 年 8 月底，在要求与斯大林会晤并提出会谈题目时，他曾提到这一题目，说中国的工业建设需要苏联的援助，需要 3000 万美元的白银。^②

在会晤的最后一天，毛再次提到苏联援助，特别是贷款问题。“苏联向我们提供支持和援助，我们感到很高兴。但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外部援助上，那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为了缩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需要经济援助，并相信这种援助只能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即指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作者注）获得。“我们需要 3 亿美元的贷款，3 年，1 年 1 亿，有息的。在贷款范围内，我们希望得到设备、石油和其他商品，以及为稳定货币需要的白银。”^③

一部看来是严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称（同样没有说明资料来源），周恩来向米高扬提出 4 亿美元的贷款请求，米高扬表示可给 3 亿。^④ 据科瓦廖夫称，毛泽东一直担心斯大林会拒绝

此段参阅米高扬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84—85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第一部分，未公开的手稿，第 17 页；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0 页。——列多夫斯基没有注明这份电报的日期。

② 1948 年 8 月 28 日阿洛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1，第 41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99 页。

③ 1949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95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3 页及下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1 页。

贷款，因为毛知道苏联当时的经济困难。^①

从以上陈述中可以看出，米高扬曾同意周关于派专家的请求，^②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文献中根本不提中国请求经济援助的问题。一位理应知情的中国历史见证人几乎以一种可笑的方式贬低经济援助的请求，他说，任弼时与米高扬谈到“在恢复生产所需某些设备，以及可能从苏方得到哪些帮助”时，提出最需要的是提供新闻纸、药品和布匹。^③显然，党史文献的检查官力求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当时的共产党中国像一个乞求者。奇怪的是，米高扬在 1960 年的报告中也没有谈论援助问题。而相反，科瓦廖夫却认为，会谈的一个中心就是苏联在重建和发展中国经济方面的支持问题。^④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苏联档案材料，我们还不能肯定米高扬曾作出贷款的允诺。他只是向中国同志说，他将把中国同志的具体愿望向莫斯科报告。毛泽东请求加快解决过去要求提供的援助物资。此外，米高扬报告说，中共领导打算“不久”派一个专门代表团赴莫斯科，讨论苏联的下一步经济和军事援助及贷款问题，以及在事态迅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问题。^⑤

当时，从各种迹象来看，斯大林还没有倾向于给中国同志以贷款。当 1949 年 4 月毛泽东再次向莫斯科提出贷款请求时，他得到的是一种拖延性的回答。斯大林告诉毛泽东：以货换货是没有问题的，^⑥这不需要最高苏维埃的批准；但贷款问题不能由政

伊·瓦·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2 年第 1-3 期第 88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1 页，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86 页。

^④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1 年第 6 期，第 86 页。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4 页及下页。

^⑥ 此段和下三段参阅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2 年第 1-3 期第 87 页。

府自己决定，因为这归最高苏维埃负责；它在批准前，还必须由申请国提出一个书面文件。当然，这只是一种廉价的托辞，毛泽东肯定已看穿。直到 1949 年夏，刘少奇率团访问莫斯科时，即第二次高峰会谈时，一项贷款协定才得以签订。^①

米高扬说，在 2 月 7 日与毛泽东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时，毛泽东表示对会谈感到满意，并对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怀表示热诚的感谢”。鉴于 1945 年 8 月斯大林要中共领导立即放弃革命这一令人不满的建议，^② 毛泽东的上述称赞似乎让人感到并非出自内心。米高扬称，他回到莫斯科后，得到斯大林和政治局的认可，认为他圆满地完成了使命。^③

13、米高扬访问的结果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之间的第一次高峰会晤是在双方小心翼翼的试探下进行的。双方的分歧很明显，但都以礼貌的策略避免激烈争论的发生。例如，在蒙古问题上，毛泽东假装没有注意到苏联论据的不真诚性，并实际上收回了要求。同样，米高扬也是如此，他似乎也没有看出毛泽东在自我评价方面的虚假谦虚，而以类似的不真诚的恭维话相对应。双方的交谈根本不是开诚布公的。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第一次会晤是否真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减少或解除相互间的成见。正如毛泽东后来对苏联大使尤金所说，他感到米高扬在西柏坡的表现是不友好的。毛说，米高扬当时“架子就很大”。^④

西柏坡的会谈使人看到，双方之间存在着许多意见不一致的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9 页及下页。

^④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中国的谈话记录见：《当代文献》，1994 年第 1 期第 16 页；另参阅余湛、张光友：《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见《新中国外交风云》，1990 年北京版第 21 页。

问题。例如，在蒙古问题上，米高扬明确表示，莫斯科不准备作任何让步。斯大林最后坚持，必须保持现状，这就是说，虚构一个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它实际上是一个苏联的保护国。毛虽然很快让步了，但仅是对外。这一点可以从他后来对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谈话中看出，他在 1954 年向他们重新提出了关于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在中国的中长铁路问题上也是如此，米高扬表明了坚定的态度：这个条约不能先验地看做是不平等的，但必要时作适当修改也是可能的。米高扬主张尽快建立政府，因为这样可以透过承认新政府，尽快结束其在中国的两面派地位。毛泽东显然反对尽快建立政府，因为他担心这将带来与那些讨厌的合作伙伴之间的麻烦，而这种担心却大于尽快与苏联建立官方关系的兴趣。鉴于米高扬的傲慢态度，苏联大使罗申迁往广州也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明显的伤口。同样，王明问题也是如此，米高扬对此根本未发言，更不用说认错了。

当然，在一些领域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旅顺口问题上，斯大林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使毛感到有些意外。在中国没有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斯大林承认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是不平等的，声称将取消这个不平等的条约。他甚至表示，苏军可立即从旅顺地区撤出。同样，苏联将放弃对新疆的领土要求。此外，双方一致认为，新的中国应推行温和的民族政策，新政府将是一个联合政府。米高扬和毛泽东都赞成，中国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后在经济上将谨慎从事，并不急于推行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尽管米高扬对中国在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中的经营能力表示怀疑，但他在斯大林面前还是对中共关于国民经济的判断能力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双方也一致认为，中共必须对美国奉行谨慎的政策。最后，米高扬甚至向毛表示赞同中国革命的“自己道路”，他谨慎地表示，这对其他亚洲革命运动具有理论价值。

关于苏联对新中国的未来援助问题，是中国领导最为关心的

问题。米高扬在某些方面作出了承诺，在另一些方面则表示要把中国的希望上报，但不表示拒绝。米高扬原则上宣布，苏联将在建设军备工业和派遣专家方面提供支持。但对中国关于提供武器的请求，他反应谨慎，仅答应将转告莫斯科。关于中共希望提供 3 亿美元贷款问题，他同样只答应转告。

米高扬建议中国同志向莫斯科提出一个具体的希望援助的物资清单。中国领导立即表示，将派一个专门代表团赴莫斯科，在那里商谈下一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问题和贷款事宜。这就是 1949 年 6 月底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访苏的背景，那次访问同样是一次秘密举行的高峰会晤。

第五节 伊万·科瓦廖夫：斯大林派在毛泽东身边的人

如前所述，1949 年 1 月 31 日与米高扬一起到西柏坡的有伊万·科瓦廖夫。形式上，他是“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①实际上，他是斯大林在毛泽东身边的代表，他的任务是向斯大林“报告中共领导和整个中国的情况，以及建立毛与斯大林之间的联系”。^②鉴于他与斯大林的关系，他被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人视为最高层人物。例如，当

^① 《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109 页，注 18。

^②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1 年第 6 期，第 85 页。——在 1991 年以前，西方研究者不知道科瓦廖夫的使命，只是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一段话提到了此人。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把战争年代的一位人民委员和铁路工程师任命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斯大林把他看做是他信任的人，此人积极主动地报告中共领导集团中的反苏潮流。赫鲁晓夫没有想起他的名字，赫鲁晓夫指的是科瓦廖夫。但赫鲁晓夫错误地把他说成是被任命的第一任大使，而第一任大使是罗申。这个错误又被回忆录的出版者进一步扩大了，他们错误地把赫鲁晓夫所说的“第一任大使”科瓦廖夫与第二任驻北京大使潘友新相混淆了。见赫鲁晓夫回忆录：〈The last Testament〉，London 1974，p.242 f.

时苏联驻北平的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在一次谈话中说：“他是头！”^① 师哲认为科瓦廖夫从未担任过这样重要的角色，^② 但这一点被近年来公布的苏联档案所反驳。

当时，所有涉及中国的政策大事都是经过斯大林办公室的。^③ 这个时期，斯大林第一次派一名正式的苏共代表到中国的党中央去，这也是标志之一，它说明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兴趣已经变得很大，这也与人民解放军不可阻挡地向南挺进相关。在整个 1949 年，科瓦廖夫忠于职守。在此其间，他直接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中共领导政治情况的分析性报告。显然，大部分的信息来自高岗，高岗也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交他自己的补充报告。^④ 在华期间，他在中国人的眼里是狡猾的、有组织能力的、有威信的、爱虚荣的、爱喝酒的人。^⑤

在此之前，科瓦廖夫就曾在交通部门担任过地方和军队的高级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任交通部长。1945 年，他负责组织把对日作战的红军部队运往远东。1948 年 5 月，毛泽东请求斯大林派遣一个专家小组到中国，帮助中共在其满洲控制区恢复大城市的经济建设和修理铁路。6 月初，科瓦廖夫作为 300 个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组成的专家组组长来到中国。为了掩饰其真正的使命，他以“苏联部长会议驻长春铁路的代表”这一公

齐赫文斯基 1992 年 9 月 15 日与作者的谈话。

^② 师哲：《高岗曾建议将东北划归苏联吗？》见《炎黄春秋》1993 年第 4 期，第 84 页及下页。

这一点为两位历史见证人所证实。科瓦廖夫称，在中国事务方面，斯大林“掌管着一切”。师哲说，一切涉及中国的问题，“都是由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解决”见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1 年第 6 期，第 84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8 页。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1 年第 6 期，第 85 页、90 页及下页、92 页及下页（注 11）；<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 . London 1974, P.243.

^⑤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 11-14 页；以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苏联见证人与作者的谈话。

开身份出现，而长春铁路则为中苏共同所有。苏联专家不仅在满洲修复了 1500 公里的铁路，而且还在其他经济部门的建设方面提供了帮助。科瓦廖夫与中国同事一起，制定了一个重建 3000 公里长的长江以北的华北铁路网计划。毛泽东就科瓦廖夫的工作向斯大林表示了称赞。1948 年 12 月，科瓦廖夫回国后曾当面向斯大林作了汇报。^①

在 1949 年 1 月底科瓦廖夫重新来到中国之前，毛已建立了与斯大林的单独电报联系。自科瓦廖夫回来后，根据斯大林的愿望，毛与斯大林的联系只通过科瓦廖夫来进行。根据指示，他的电报都直接发给“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②当时，科瓦廖夫使用的是毛泽东的苏联医生阿洛夫的发报机，阿属于苏联军事情报机关。^③据师哲称，阿洛夫于 1949 年中回国时把属于苏军的发报机带走了。在此之前，科瓦廖夫竭力想把电台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但因阿洛夫的反对，未能得逞。^④看来，师哲的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科瓦廖夫作为斯大林在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或阿洛夫本人是不敢给科瓦廖夫设置障碍的。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1 年第 6 期，第 84 页及下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0 页；1949 年 1 月 8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0，目录 1，案卷 37，第 1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8 页；列多夫斯基：《中共中央代表团 1949 年 6-8 月在莫斯科的秘密使命》，未公开发表的手稿第 61 页及下页。

^②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见：《远东问题》，1991 年第 6 期，第 85 页。——联系渠道何时开始改变的，不清楚，但 1 月中还有一次直接的联系，5 月则已改为通过科瓦廖夫。此处参阅齐赫文斯基：《1949 年斯大林同毛泽东的信函交往》见《近代史与现代史》1994 年第 4-5 期第 133-139 页；齐赫文斯基：《秘密外交行动：1949 年 6 月周恩来与美国人的非正式谈判》，见《远东问题》，1994 年第 3 期第 134-136 页。

此处参阅 1949 年 5 月 18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1，第 59-61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15、390 页；尤·弗拉基米洛夫：《关于父亲的故事》载于《远东问题》1990 年第 6 期第 128 页。关于阿洛夫间本书第一章第六节。

师哲谈话，见：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记——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载于《人物》1993 年第 2 期，第 95 页。

可以肯定，科瓦廖夫至少到 11 月初已拥有与莫斯科进行联系的直接线路。^①

3 月，科瓦廖夫同中共领导一起由西柏坡迁往北平，住在西山离毛泽东驻地不远的一座房子里。据他自己说，他几乎每周都在那里与毛泽东见面。在那年的春夏之际，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成为政治局经济委员会的成员。6 月，他随同刘少奇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并参加了代表团与斯大林的谈话。^②秋天，他率领第一个赴华的苏联专家组回到中国。由于他拥有与莫斯科的直接联系，^③他继续以斯大林私人代表的姿态出现，并认为没有必要与罗申大使协调一致。罗申大使在莫斯科指责了他。斯大林派了一个调查组到中国，其结果是科瓦廖夫后来被召回国。按毛的意愿，科瓦廖夫于 12 月陪同毛赴莫斯科。直到同盟条约谈判开始，他与费德林一起是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联络员。^④

在毛泽东赴苏前夕，科瓦廖夫开始起草一份给斯大林的分析报告，对中共领导的情况进行了批评。这份报告是他在火车上完成的，并于 12 月 24 日上报斯大林。为了取得信任，斯大林于 1950 年 1 月底把这份报告交给了毛泽东。他同时还交出了科瓦廖夫从中国发给斯大林的一份类似的绝密电报和高岗给斯大林个人的信息材料。在毛泽东面前，斯大林与科瓦廖夫保持了距离，

^① 1949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给王稼祥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131 页。

^②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 8 节。

这一点可以从 1949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给王稼祥的电报得到证实 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131 页。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一部分，见：《远东问题》，1991 年第 6 期，第 85 页；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见：《远东问题》，1992 年第 1-3 期，第 89 页及下页；1949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135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2 页及下页 李越然：《外交舞台……》第 4、6-10 页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5 页（注 19）。——关于科瓦廖夫在毛泽东访苏期间的活动，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四节，第四章第七节。

并批评科瓦廖夫的武断和政治上的无能。^①

这意味着科瓦廖夫的中国生涯结束了。1月22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开始谈判时，他已不再参与了。他自己说，那是因为他患了“迟迟不愈的咽喉症”。^②1950年2月初，周恩来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提出，希望与科瓦廖夫会见，以商谈派苏联专家问题。此时，苏方根本没有提及他生病的事，而对会见要求的答复是：“关于专家问题将由外交部来商谈。”^③早在三星期之前，阿尔希波夫已被任命为“总顾问”，并作为科瓦廖夫的接班人已开始工作。^④无疑，科瓦廖夫被斯大林作为苏中友谊祭坛上的贡品而牺牲了。

第六节 中共对西方的政策和苏联的作用： 一种战略关系的开始

当中共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形势日益明显时，斯大林对中国推行的秘密外交在1949年显著地加强了。这首先涉及的是满洲。在那里，中共在苏联的压力下反对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反对在那里建立领事馆。斯大林的目标是，把西方大国从这个地区赶出去。在他看来，这个地区是苏联独家的势力范围。苏联的外交部门，以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为依据，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力图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不惜公开地与共产党控制的地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七节。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见：《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90页。

^③ 1950年2月3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46页。

^④ 1950年2月22日米高扬与王稼祥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案卷8，第26页。

方政府进行交往。

但是，在满洲以外地区，莫斯科在对外方面与新的执政者保持着明显的冷淡态度。这首先表现在与共产党当局的外交交往方面。从官方来说，苏联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外交代表机构都关了门，不再进行活动。他们的外交人员虽然留守在那里，但他们与新的当局只保持非官方的接触。例如，在北平，苏联总领事馆根据莫斯科外交部的指示于 1949 年 2 月 16 日停止了“一切官方活动”。^① 但总领事馆及其代表“在共产党领导人的倡议和外交部的同意下，以非正式的方式与个别中共代表”，如：叶剑英、聂荣臻、罗瑞卿、朱德，进行了“完全是友谊性质”的谈话。

莫斯科就是以这种方式保持其两面派的做法，因为它害怕与共产党当局的官方合作会被美、英看做是对雅尔塔协定的违反，是苏联违背了关于承认国民党中国的承诺。莫斯科担心，这种违约可能给华盛顿提供借口，从原定协议退了下來，宣布已允诺的其他义务（苏联在蒙古和满洲的特权和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吞并）无效。此外，莫斯科还担心，这会引起对中国内战的大规模的、偏袒国民党的军事干预，这将使莫斯科处于艰难的境地。

但是苏联方面尽量不流露这种想法。斯大林甚至让人觉得，他并不反对共产党中国与西方国家很快建立外交关系，他鼓励中共领导与西方国家建立经济关系，接受经济援助。

毛泽东意识到了苏联因美国而遇到的麻烦处境，并试图利用它，但这只是在与苏结成战略联盟的大原则框架之内。1949 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一次内部谈话中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可以用两只对峙的老虎来比喻，一只白老虎，一只红老虎。^② 中国共

此处和下句参阅苏联驻南京总领事馆 1949 年领事工作报告；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案卷 20，第 6 页。

此段和下段参阅徐焰：《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1993 年香港版，第 130 页。

产党为了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利用了这个活动空间。

莫斯科与中共领导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联系都是通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党的渠道来进行的。^①如前所述，科瓦廖夫作为中间人担负了这个层次的实际联络任务，最初在西柏坡，3月以后在北平。各种迹象表明，科瓦廖夫与苏联驻中国的外交官之间不存在，或者说几乎不存在协调一致。党的领导机关与外交机构之间的协调是在莫斯科进行的，重大问题则由斯大林与外交部最高领导人进行协调。^②

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另一条联系渠道是通过苏联驻中国的代表与共产党干部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例如与东北的高岗的联系，他有时背着中国最高领导人向斯大林通报情况。罗申大使迁往广州后，留在南京的苏联外交官与当地的共产党机关之间也保持着联系，也属于这一类的联系。这些联系均由隶属于苏联情报部门的大使馆参赞 P. A. 谢巴耶夫领导，他同时也是苏联驻中共占领区的非正式代办。^③一个特殊的联系渠道是 1949 年 5 月初至 9 月中苏联大使馆一秘列多夫斯基与黄华之间的多次会面，黄华是 4 月份被周恩来派往南京的。^④

现在我们还不能较全面地描绘出秘密外交的过程。但从近期披露的苏联和中国档案材料以及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和谈话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方面。

有材料表明自 1948 年夏以来，中共领导比过去更加积极地表明他们对苏联兄弟党的友好情意。如前面已提到的：自 11

^① 1949 年 2 月 4 日周恩来与米高扬谈话时确定了这一点，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57 页 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7 页。

^② 1995 年 3 月 27 日列多夫斯基与作者的谈话。关于科瓦廖夫的使命，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五节。

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未公开的手稿，第 42 页。

有关会见情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九节。

月初开始，多次向苏联作友好表白，并反对“第三条道路”。^①另一个证明是，1948年11月起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在沈阳的代表机构，采取了强硬态度。根据中共档案馆的材料所提供的信息和科瓦廖夫公布的材料，可以看出苏联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从而也就结束了迄今为止西方对此所作的揣测。^②可以认为，中共的僵硬态度是在苏联压力下，至少是考虑到苏联利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在沈阳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这与斯大林把满洲看做是苏联利益范围的思想直接相关。

如前所述，在1944年、1945年期间，中共就已开始表示愿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③1948年夏，共产党统治的“华北解放区”再次发出信号，愿意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11月1日解放军进驻沈阳后，共产党的行政管理机构曾向那里的美国、英国和法国领事馆提供了外交保护。新的共产党市长曾拜访了美国总领事，并表示对建立包括文化交往在内的合作关系感兴趣。市长的行动是根据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指示进行的。^④指示中说，三国领事馆应受到部队和警察的保护，对他们不应实行人身和室内检查。指示中还说，应向苏联外交人员请教，但他们的意见应仅作参考，一切外交事务在行动前应向中央报告。^⑤

市长的迎合态度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如前所述，莫斯科把满洲视为苏联独家的势力范围和安全的的前沿地带。莫斯科要把西方

见本书第二章第六节。

^② 参阅 Goldstein: <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 P.132, 137; Tucker: < Patterns ... > P.15 f.

详见本书第一章第十节。

^④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见《周恩来年谱》（1989 - 1990）1990年版第794页。

^⑤ 此段参阅 Chen Jian: < The Ward Case and the Emergence of Sino - 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48 - 1950 > in: <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 30, July 1993, P.151; Yang Kuisong: < The Soviet Factor ... > P.30;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载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05页。

外交官从那里赶出去，而中国同志却要同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看来，中共领导放弃了这条路线。毛泽东要求陈云和其他东北局的领导就他们最初的对西方迎合的态度做自我批评。中共领导批准了东北局关于不承认美、英、法领事馆合法地位和把领事们从沈阳挤走的计划。毛指示中共东北局，转告苏联方面，中共将在所有涉及苏联在东北和全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上，“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① 11月中，沈阳当局停止了对美国总领事馆的电力供应，切断了电话联系。在此之前，美国领事奥古斯·华德拒绝交出他的无线电发报机。当局没收了机器，软禁了领事馆公职人员，中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开始了所谓“沈阳折磨”。1949年6月领事馆人员被指控为间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历史学家的新近调查表明，那是没有根据的。^② 华德和其他四位官员于10月被捕。他们被单独监禁，只得到面包和水，并受到殴打。11月底，他们被判处一年徒刑。1949年12月11日华德和领事馆人员一起离开了中国。^③

中国的档案材料显示，沈阳的共产党当局是遵循苏联的建议，才对美国总领事馆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例如，11月16日苏联驻沈阳的总领事马里宁在电话中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提出，应立即派人没收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并说

1948年11月17日毛泽东给高岗的电报，引自同上第108页及下页。

石殷红（音）：《社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从敌视到战争的历史回顾》博士论文，北京大学，1987年，第62页及下页，72-74页，引自Chen Jian: <The Ward Case……>, p.164.——杨奎松则认为，中共领导确信美国人从事了间谍活动。见杨奎松：《苏联因素……》，第31页。

此段参阅194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引自《周恩来年谱1989-1949》；1990年版第796页；1948年11月11日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引自杨奎松：《华德事件……》，第106页；1948年11月16日高岗给毛泽东的电报，引自杨奎松：《苏联因素……》第30页及下页；1948年11月17日毛泽东给东北局的电报，引自同上；1948年11月1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的电报，引自Chen Jian Jian: <The Ward Case……>. P.156, 153-156; FRUS 1949, vol.VIII, p.1044-1050; Mc Glothien, *Controlling the Waves*, p.148-152。

“这是关系到苏联的很大的事情”。当高岗允诺后，马里宁表示很高兴，并认为，一旦这些领事馆不再能完成其职责，它们只好滚出东北。^①

伊万·科瓦廖夫在 1948 年 6 月至 12 月间曾作为苏联顾问的领导人在满洲工作。他证实，“华德事件”是在苏联干预下发生的。科瓦廖夫说，中国同志曾向他征询意见，他在没有得到莫斯科回话的情况下提出建议：对美国领事馆进行“封锁和禁止其工作人员外出”；对其他国家的领事馆则限制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自由；如果领事馆的无线电发报站继续工作，则予以没收。据称，毛特别对没收电台问题有疑虑，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要强行进入领事馆的领域。为此，毛再次向斯大林发报，征询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斯大林事后对科瓦廖夫的态度表示了赞同。但他的赞同是掩盖在这样的表述之下：科瓦廖夫没有建议中国人像对待战时敌方参谋部那样，对待领事馆的官员。科瓦廖夫后来说，这正符合他的想法。但他之所以放弃了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他已得到这样的印象，中国人不愿与美国人争吵，而宁愿让苏联与之争吵。^②

“华德事件”的过程表明，中共领导对事件的处理基本上符合苏联的建议。他们也贯彻了科瓦廖夫关于三个领事馆区别对待的建议：他们对英国和法国驻沈阳领事的限制不如对美国领事的限制那样严厉。毛泽东告诉周恩来，对英、法要比对美国“态度稍微温和一些”，对他们的领事馆的围困在一段时间之后也应减弱。周恩来将这一指示向沈阳的东北局作了转达。区别对待符合中共中央的指示，该指示称，在沈阳采取的措施，“并不等于永

此段参阅杨奎松：《华德事件……》，第 107 页。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见：《远东问题》，1992 年第 1—3 期，第 83 页及下页。——科瓦廖夫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是通过高岗进行的，见同上。

远不与这些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国家毫无区别”。^① 延安的指示还说，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也许可以在美、英、法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周恩来还明确告诉东北局，“挤走”政策不能主动地运用到东北以外的其他地区。显然，中共还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拒绝了英、法驻沈阳外交官的另一请求，即重新建立他们与驻香港和南京代表机构的无线电联系。^②

随着“华德事件”的发展，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出现了日益高涨的反美宣传。1949年3月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向他的部长报告说：“中国共产党日益呈现出反美的情绪。”^③ 3月中，共产党的电台以好战的语气说：“中国人民不得不把战争挑衅者的首领，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看做是他们的死敌；不得不始终把世界反帝战线的领袖，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看做是他们的战友。”^④ 司徒雷登根据对广播以及对1948年11月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讲话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领导“把‘卫星国’的外交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⑤

由于中共领导得到的印象是，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卷入了间谍活动，他们由此而得出的一个总的看法是：西方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试图破坏中国的革命。这也导致1949年1月中央作出了一

参阅 1948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引自杨奎松：《苏联因素……》第31页。

此段参阅杨奎松：《华德事件……》，第107-109页；杨奎松：《苏联因素……》第30页及下页；1948年11月18和2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文件批注，引自杨奎松：《华德事件……》，第109页；1948年11月23日周恩来给东北局的电报，引自同上和杨奎松：《苏联因素……》第31页。

^③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大使给美国外交部长的电报，见：FRUS 1949, Vol. VIII, P. 174。

^④ 1949年3月18日陕北电台，引自同上第192页及下页。

^⑤ 1949年3月22日司徒雷登大使给美国外交部长的电报，见：同上第192页及下页。

个决定，党不应急于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①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共与外国关系的指示。其中确定，党不承认外国派在中国的外交官的法律地位，因为中国尚未与任何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外国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只能受到一般外国侨民的待遇。采取这种态度可以使党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但在实践上，则应分别情况分别处理。原则性应与灵活性相结合。^②

毛泽东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把这一新的外交原则概括为三句话：1、“另起炉灶”，这就是说，不承认国民党时期所委派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法律地位，不承认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接管对外贸易的控制；2、“打扫干净，再请客”，这就是说，要清除各种表现形式的帝国主义在华影响，然后才考虑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3、“一边倒”，这就是说，要与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结成联盟，但不放弃国家的独立。^③

不仅是头两句话，早在1月19日的指示前已有所反映。就是“一边倒”的口号，在此之前也已付诸实践。这一指示还指出，对待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这就是指其他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应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和

^① 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引自杨奎松：《苏联因素……》第31页。此段还参阅1948年11月24日中共东北局的报告和194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② 1949年1月19日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所起草，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1992年北京版第44-49页；《周恩来传》第742页。

此段参阅《当代中国外交》，1990年北京版第3-5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4页及下页。Qiang Zhai: < The Dragon, The Lion &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 - 1958 >, Kent, Ohio, London 1194, P.25, 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领事馆。但是共产党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此，和他们之间亦只是非正式的外交来往。^① 在另外一个文件中还说，对待来自苏联的外交官和其他公民应与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样，以免“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反动派以口实”。^②

从这些表述中，人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中国领导似乎在处理与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关系方面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看来，这与顾及西方国家的态度有关。但在实践中，这种“平等对待”只是装样子。

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就是：1949年5月初，实际上的外长黄华与留守南京的苏联外交官安德烈·列多夫斯基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黄是4月底受周恩来的派遣来到南京的，以便在那里与外国大使馆进行接触，并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建立了联系。他实际上被苏方视为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5月4日，黄第一次拜访了列多夫斯基，并受到友好的接待。在两年前，两人曾在北平见过面，当时列多夫斯基是苏联驻北平的总领事。^③

自那次会晤后，苏联大使馆南京分馆与中共的南京机构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这在中国和外国舆论面前是不公开的。这种“非官方性质”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49年10月1日莫斯科与北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止。9月22日列多夫斯基与黄华举行了第二次会晤。会晤中，黄华向列多夫斯基通报了他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会谈。列多夫斯基先通过密码电报简要地向莫斯科外交部汇报了这次谈话，后又通过外交信使送交了详细的报告。他

^① 1949年1月19日《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1992年北京版第45页。

杨奎松：《苏联因素……》第31页及下页，没有注明出处，但看来是来自档案材料。

详见下段和本书第三章第九节。

从莫斯科得到的指示只是涉及黄华向他（即向苏联使馆）提出的几个具体问题。苏联外交部没有就他应与黄华谈什么问题和如何谈作出事先的规定。据列多夫斯基称，鉴于他在中国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在莫斯科赢得了信任。^①

在 1949 年 5 月 4 日第一次南京会晤时，黄华秘密地告诉列多夫斯基，在形式上，共产党当局将按照同一规定，像对待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一样，来对待苏联驻南京的代表，即如同对待外国侨民一样。但事实上，他们将与苏联外交官会晤，向他们提供各项帮助，并向他们征询建议。黄华请列多夫斯基不要因为对苏联代表“在外表上”同其他外国人一样而感到受委屈，事实上南京当局将对他们持“友好的关注”。^②

列多夫斯基向黄华通报了苏联驻南京大使馆的活动，大使和大多数成员迁往广州的麻烦和动机，^③ 以及苏联外交官与其他大使馆的接触和外国代表的情绪等。^④

黄华说话是兑现的。当他从列多夫斯基那里得知，苏联代表处由于信使联系的中断，而出现货币短缺的问题时，黄华派人送去“一口袋的中国货币”。送钱的使者不要求开收据，并宣称，如需要更多的钱，可以再通知他们。黄华提出并希望很快回答的问题有：苏维埃俄国在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前曾给予这些国家什么样的权利，以及这些问题在东欧共产党国家是如何解决的。对新中国当局来说，这是第一次遇到的问题，而苏联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⑤ 此后，黄华曾利用多次机会向列多夫斯基征询建议。例如，5 月中，黄华向列多夫斯基谈到美国大使馆的一个请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未公开的手稿第 8、12-92 页；黄华：《南京解放》第 24 页；列多夫斯基与作者的谈话。

②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12 页及下页第 14、16 页。

③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④ 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13 页。

此段参阅 1949 年 5 月 4 日黄华与列多夫斯基的谈话，见同上，第 15、17 页。

求，即要求修理一架停泊在南京机场的被损坏的美国飞机。黄华曾打算口头通知美国大使馆：新政府对国民党时期发生的飞机被损，以及将来由于国民党的空袭而导致受损不承担任何责任；新政府只有在大使馆提出继续使用飞机的详细报告后，才会予以批准。黄华问，在类似情况下，苏联政府将如何处置。列多夫斯基建议谨慎行事。说这种问题是敏感的，也是难以答复的。在十月革命后的年代里，苏维埃政权在解决这些外交上复杂的、与外国代表机构相对峙的问题时，采取了很克制和平稳的态度。他们曾力求避免使与西方列强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沉重。^①

同一时期，黄华向列多夫斯基征询关于处理“紫石英号”事件的意见。当时，黄华特别在国际法方面感到没有把握。4月20日，当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与共产党部队出现了相互炮击，双方都指责对方先开火。中共在公众舆论中把这一事件加以渲染，并认定这是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一个新例证。虽然毛泽东在内部说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人们却利用它来“教育人民”。^②5月5日，周恩来指示南京市委，应以前线司令部的名义与“紫石英号”的舰长直接谈判，如南京英国使馆有人参与，只承认他们以个人资格参加商谈。^③

黄华向列多夫斯基通报了英国政府的反应。英国政府不承认中国的新政权，但它指示其驻中国的代表机构要与共产党官方建立实际的接触，以便进行关于事件的谈判。英国政府还大量增派武装力量，以保卫香港。黄华指出，这种态度是英国不干涉内政的政策继续，但它同时也表明伦敦不容许人民解放军进军香

^① 1949年5月15日黄华与列多夫斯基的谈话，同上，第28页。

^② 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给人民解放军总前委的电报，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第43页，引自 Qiang Zhai: < The Dragon, The Lion, & The Eagle >, Kent/Ohio & London/England 1994, p.14。

同上，第14页及下页。

港。黄华没有谈他与英国驻南京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就“紫石英号”问题的谈话情况。这位外交官提交了一封英国大使的信，信中请求南京当局允许和提供帮助，把“紫石英号”迁移到香港，以便进行修理。不久，黄华安排了人民解放军的有关炮兵部队的司令员与英国舰长之间的会谈，中方的目的是让英国人承认他们先开了火，并对事件的发生表示道歉。如果英国人这样做了，“紫石英号”就将被允许离开中国海域。^①

在谈话中，列多夫斯基根据他与英、美外交官的谈话，对美、英对华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评述。他认为在近几年里，华盛顿与伦敦之间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日益增大。这首先是由于在中日战争期间，英国被美国挤出了中国。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失败了，英国要趁机进行报复。^②

黄华请列多夫斯基根据苏联处理类似外交先例的实践，对“紫石英号”事件发表评论，特别感兴趣的是关于谈判的主持、程序以及会谈文件的制订等问题的意见。黄想知道，苏联将会如何用文件的形式让英方承担责任和赔偿，如何在法律上评价英国舰长在协议书上的签字。黄还问，如果英国拒绝承认错误和道歉，莫斯科认为应如何处置。列多夫斯基显然在提具体建议方面比较谨慎，他根据苏联的谈判实践，建议在英国拒绝的情况下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③

列多夫斯基向黄华提出了在南京外交使团中热烈讨论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在进军上海或占领全中国后将建立政府。黄避开了这个问题，但告知说，人们正在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全会，这一问题将在会上进行讨论。此外，黄华说，

^① 1945年5月10日黄华与列多夫斯基的谈话见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22页及下页。

^② 1949年5月10日列多夫斯基与黄华的谈话，同上，第22页。

^③ 1949年月10日黄华与列多夫斯基的谈话，同上，第23页。

共产党部队将在 5 至 6 个月内占领全中国。列多夫斯基问，共产党人是否已掌握一种方法，以解决上海这种特大城市的“极其困难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黄华说，上海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正等待总攻的命令。这个城市的形势很复杂，它缺少粮食和燃料。当地的商人担心他们的财产，他们试图收买负责城防的国民党将军汤恩伯，促使他无抵抗地将城市交给共产党部队。在这方面，这些商人还受到美英总领事馆的支持，因为这也符合美英等国在上海有资产的“商业和工业界”的利益。列多夫斯基还询问美英在上海的军事实力，黄华回答说，所有外国军舰都已离开了上海码头，停泊到了上海以外的停泊场。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内部说，4 月 26 日美英船只撤离到吴淞口以外，这“于我有利”。^①

列多夫斯基问及已被解放的地区的经济形势，黄华回答说，大城市的经济形势特别困难，这与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实行的封锁有很大关系。因此，中共希望尽快能通过天津、上海和其他已占领的港口与苏联建立贸易关系。人们期望，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以后，大吨位的苏联船只能来上海港。共产党当局已与苏联驻天津的商务代表处建立了联系，向他们提交了一份希望从苏联进口的货物清单，以及建议进行交换的货物清单。但北平的代表与苏联驻天津商务官员的会谈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因为苏联驻中国的商务总代表指示其驻天津的同事，不要急于签订协定，应等待他的进一步决定。^②

列多夫斯基对此反应谨慎：没有莫斯科的指示，商务代表是不能就这样的问题作出决定的。列多夫斯基还谨慎地问，外国将对苏联船只进入上海港作何反应？黄华认为，这不会引起什么国

^① 1949 年 4 月 28 日毛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总前委的电报，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490 页。此处还参阅 1949 年 5 月 10 日列多夫斯基与黄华的谈话，见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23 页及下页。

^② 1949 年 5 月 10 日列多夫斯基与黄华的谈话，同上，第 25 页。

际麻烦，因为共产党当局已通过天津与英国等外国公司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关系在上海解放后将会进一步发展。因此，苏联商务机构可按这种先例行事。^①

据列多夫斯基称，在与黄华谈话时，他没有对天津商务谈判未取得较大进展的指责作详细的评论。这实际上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当时莫斯科把与中共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限制在满洲地区，并只同满洲的地方当局进行有关的谈判，这是因为根据雅尔塔协定和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条约，满洲事实上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和雅尔塔协定参加国不得不尊重这一点。因此，苏联在满洲采取的一些外交步骤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蒋介石和美国也不会采取重大的反苏措施。^②但是，列多夫斯基认为，如果苏联的有关机构在满洲以外地区与共产党当局签订协定，这种协定就会具有严重的政治色彩，并意味着莫斯科与举行武装斗争以推翻中国合法政府的中共，建立“公开的和直接的联系”。这就有可能成为美英（雅尔塔协定参加国）对中共和苏联采取重大行动的理由和借口。这些行动有可能鼓励蒋介石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呼吁对中国进行直接的和广泛的军事干预，而许多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国民党党员也将致力于这种干预。因此，苏联领导在满洲以外的地区，在与中共的接触方面，不得不奉行谨慎的策略路线。^③

列多夫斯基在其分析文章的最后说，在共产党人夺得了政权的地方，苏联的外交、领事馆和其他官方代表机构都形式上停止了活动。但其成员仍留守原地，并根据指示，“原则上”在不以苏联官员身份出现的情况下，继续他们原有的工作。因此，驻北平和天津的总领事馆于 2 月 16 日人民解放军进入的前夕，结束

① 1949 年 5 月 10 日列多夫斯基与黄华的谈话，同上，第 25 页及下页。

② 同上，第 26 页。

③ 同上，第 26 页及下页。

了他们的官方活动。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指示，大门前的牌子也被拆除。上海总领事馆和大使馆南京分馆也是如此。然而，满洲地区的苏联代表机构则是例外。在哈尔滨、大连和其他没有被国民党部队占领的地方，苏联代表机构继续他们的公务，并与共产党当局保持正式的关系。斯大林通过这些行动表明，满洲被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①

“华德事件，的发展促使中共领导 特别是毛泽东本人 责成地方党组织和行政管理部門，在未获得中央领导同意的情况下，不得采取任何重大的外交步骤。^② 中共领导就是以这种方式保证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对外交的控制。人们因此可以认为，自 1948 年底和 1949 年初以后，共产党地方机构在处理外国事务方面受到严格的控制。无疑，那时所发生的许多问题，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执行中央政策的表现。例如，1949 年 7 月初所发生的事件：一个年青的美国领事无辜地在上海被逮捕、殴打，以及在监狱里遭到人格的侮辱。^③

实际上，共产党的各级机构是按照 1 月 19 日的指示行事的。华盛顿的所有抗议都无结果。在北平、南京以及香港负责外事的共产党机关都对这些抗议不予回答或予以拒绝，但也未采取任何相应的外交行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特别是华德的被捕，在美国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1949 年秋，华盛顿就制裁问题进行讨论，从军事干预直到经济封锁，但各项制裁建议最终都未被采纳。在 10 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项声明，称美国将继续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不承认共产党政权，因为它蔑视国际义务。11 月中，杜鲁门总统表示赞成沿中国海实行煤炭禁运，甚至包括击沉运输船只，但这被

同上，第 17 页及下页。

此处参阅 Chen Jian: <The Ward Case> . p.158.

③ Mc Clothlen: <Controlling the Waves> . p.148 f.

国务卿艾奇逊所劝阻。11月中，艾奇逊声称，只要不释放在沈阳关押的美国人，华盛顿就不能考虑在外交上承认北京。^①

但中共并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中断与这些国家的一切联系，或完全排除与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在个别情况下，例如在北平和天津，他们还允许西方记者与共产党外交官保持接触。在南京，黄华受周恩来的委托，非正式地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试探性的谈话。^② 斯大林不反对共产党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经济关系，相反表示完全支持。在战争结束前，他就对美国政治家说过，战后美国应在帮助中国站立起来方面起最大的作用。美国是惟一拥有足够资本和人员的国家，而苏联将不得不致力于自己的重建。^③ 40年代下半叶，斯大林不断鼓励毛泽东与美国进行对话，以及寻求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发展同他们的贸易。^④ 显然，斯大林是想以此种方式减少经济虚弱的苏联对共产党中国的援助，增加美国的经济负担。1949年初，苏联驻中国大使对一位印度外交官说，美国人想向中国投入多少钱，就投入多少钱，但这只能削弱他们自己。^⑤ 相反，美国外交界则推测：“苏联经济遭受的重大破坏，将严重影响它在卫星国的活动。”^⑥

同上，第151页；Tucker: <Pattern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New York 1983, p.14-16; Chen Jian: <The Ward Case> p.161-163, 165 f. passim.

此段参阅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p.31 f. 关于黄华与司徒雷登的谈话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九节。

③ 1944年6月1日斯大林与哈里曼和霍普金斯的谈话，引自哈里曼、阿贝尔：《秘密使命，作为罗斯福特使访丘吉尔和斯大林（1941-1946）》，1979年斯图加特版，第368页。

参阅巴扎诺夫：《苏中关系：过去和现在的教训》，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杂志，1989年第2期第8页，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④ ⑤ 1949年1月初印度驻东京使团团长对美国外交官休斯顿的谈话，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949, Vol. VIII, P.24.

⑥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 (Kohl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7.6.1949, 见：同上，第398页。

在 1949 年全年，苏联一直在推行这样一条路线，让中国同志在谋求商业和经济援助方面，首先去找西方。如前所述，当 4 月份中共领导人在莫斯科就贷款问题提出请求时，斯大林态度审慎，并要求中共领导人先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一份“由国家代表签署的文件”，作为援助的申请。^① 同一时期，斯大林建议中共领导，不要拒绝“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和同他们进行贸易”^②。相反，应积极地同“香港和其他外国资本家”做买卖。^③ 当 1949 年夏刘少奇访问莫斯科之际，斯大林对他说，实行“同帝国主义国家”做买卖的路线是正确的。^④ 在同一场合，斯大林终于答应给中国以巨额的贷款，这是毛泽东自 1948 年 8 月以来多次提出的请求。^⑤ 斯大林同意给 3 亿美元的商品贷款，并派遣 220 名苏联专家去中国。^⑥ 在上一年，莫斯科已派遣了几百名苏联专家去满洲，主要在铁路地区工作，但那主要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利益，为维护俄国和苏联在这个地区的传统利益。

但是，对于中共领导试图与西方国家建立政治和外交关系的

^① 1949 年 4 月斯大林的电报，见：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见：《远东问题》，1992 年第 1-3 期，第 87 页；没有注明具体日期。

^② 1949 年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引自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第 82 页；没有注明具体日期。

^③ 1949 年 3 月 15 日斯大林给满洲经济部长陈云的信，引自同上第 81 页。

^④ 1949 年 7 月 11 日斯大林与刘少奇的谈话，引自同上第 82 页。这次谈话的日期曾错误地记为 7 月 27 日，后被冈察洛夫所纠正，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69。

^⑤ 1948 年 8 月毛泽东请求给予 3 千万美元的贷款，1949 年 1 月提出 3 亿美元的贷款请求。见 1948 年 8 月 28 日阿洛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1，第 40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99 页；1949 年 2 月 6 日毛与米高扬的谈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84-85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对苏联的访问……》I，第 17 页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 第 100 页。有关此段内容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七节，第三章第四节，以及第三章第八节。

^⑥ 此段和下段参阅本书第三长第八节；1949 年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和王稼祥的电报，引自《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8 页；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一部分第 84 页及下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7 页及下页，415 页。

努力，斯大林的态度却有所不同，他建议中共领导持谨慎态度。这显然是因为斯大林怀疑中国同志可能背着，与西方达成某些协议。^① 1949年4月，斯大林建议毛泽东^②，只有当西方国家正式放弃了“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才与他们建立这样的关系。斯大林很清楚，这在近期内是不可能出现的。7月，斯大林再次向中共领导建议，不要急于谋求西方大国的外交承认。^③

科瓦廖夫说，在这方面，中共领导的任何一项行动都会在苏联引起“敏锐的反应”。鉴于冷战处于高峰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科瓦廖夫所说的行动，似乎指的就是黄华与美国大使进行接触这一类的行动。1949年3月至6月间，中共领导通过黄华与留守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对话。看来，谈话的目的就是干扰国民政府与华盛顿的关系。^④ 持怀疑态度的科瓦廖夫曾建议不要进行这样的接触。出于同样的策略原因，中共领导还与美国 and 英国进行了其他一些接触，但显然没有通知莫斯科。在同一时期，使苏联方面感到惊讶的还有：中共领导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把美国海军赶出青岛港。科瓦廖夫感到中共对美国的这种照顾“确实过于体谅”了。显然，莫斯科对中国同志的这种态度感到恼怒。^⑤

但中共领导基本上还是按照斯大林的建议行事的。1949年春夏，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华盛顿和伦敦发出了信号，表示了

^①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② 1949年4月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的摘要载于：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第82页（但没有注明具体日期）；另参阅1949年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摘要见同上。

^③ 1949年7月11日斯大林与刘少奇的谈话，引自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第82页；1949年12月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同上。

有关接触的情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九节。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第84页及下页。

对贸易、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兴趣。^①但是，毛泽东对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不感兴趣，因为他认为“帝国主义者”至少不会很快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而这是建交的前提。^②4月底，中共领导在给其军事单位的指示中说，如果美英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可以考虑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③在同一时期，毛泽东提出，外交关系的建立取决于这些国家“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④。6月中，他对建交条件又作了类似的表述。^⑤与此同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向黄华表述了美方的意见：只要共产党人没有建立“全国政府”，没有承担其国际义务（指承认大使馆和领事馆人员的外交法律地位），美国就不可能予以外交承认。^⑥由此可见，打破僵局的前景是比较暗淡的。

这里，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中共领导的这种态度，是鉴于斯大林的建议，或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这个问题至今仍然难以回答。陈兼基于对中国档案材料的利用，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华德事件上采取强硬的态度是为了在广大中国居民中制造反美的气氛。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斯大林表示，共产党人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并希望与苏联建立战略合作，因为他们把苏联看做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看做是“新中国惟一能指望从那里获得战略援助的大

有关具体动议，参阅 Tucker: < Patterns…… >, p.47 f.; 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435 页。

② 同上。

③ 1949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给总前委的电报，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489 页及下页。

④ 1949 年 4 月 30 日有毛泽东起草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61 页。

⑤ 1949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讲话，同上第 1466 页。

⑥ 1949 年 6 月 6 日司徒雷登与黄华的谈话，见：1949 年 6 月 8 日司徒雷登给国务卿的报告，引自 Rea/Brewer: <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 p.325 f.

国”。^①

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中共领导是在得知斯大林，更确切地说，得知科瓦廖夫希望如此做之后，才决定在华德事件上采取强硬态度的。同样，这一点也很可能适用于斯大林的明白无误的愿望：中共领导先不要急于与西方大国建立外交关系。看来，陈兼的观点是可信的。

但是，有一点也不能忽视，中共领导在建交问题上摇摆不定的。他们考虑，应在什么条件下谋求与美国建交，才不至于冒犯苏联。至少有一个情况可以证明，中共领导曾向美国方面表示了他们对建交的兴趣。这就是 7 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通过陈铭枢向司徒雷登大使传递的信息。^② 在这里，中共领导没有像往常那样，在谈及建交问题时提出斯大林所要求的条件，而是第一次对建交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并把建交作为华盛顿所要求的停止反美宣传的先决条件。从有关情况来分析，中共领导的这一行动很可能没有与莫斯科进行协商。

在国务卿艾奇逊看来，“华德事件使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成为不可能”。^③ 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以及笔者在前面所提出的考虑是符合实际的，那么，可以认为，华盛顿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局势缓和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被阻挠了。总体说来，鉴于中共力求建立与莫斯科的紧密合作，因此他们只能顺从莫斯科的意愿。^④ 同样有说服力的是陈兼的这一结论：“华德事件”开始了

^① Chen Jian: <The Ward Case> . p.169 以及同上第 159、165、169 页。

^② FRUS 1949, Vol. VIII . P.776.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九节。

^③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 Norton, N. Y. 1969, p.340 ,引自 Chen Jian: <The Ward Case> . p.149。

由于不了解杨奎松和陈兼所掌握的情况以及科瓦廖夫所提供的材料， Michael M. Sheng 错误地把中共的新政策说成是“自我孤立的政策”，见：Sheng: <Maoist Dualism> , p.371. 但这里不是要指责他，因为当时这些文章还没有发表。但不可理解的是他从未提及过“苏联的自我孤立政策”。

共产党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战略关系”。^①诚然，本章节提到的其他一些与“华德事件”无关的论证，也表明上述观点是正确的。

第七节 斯大林谋求两个分治的中国？

人们可以肯定地认为，1949年初莫斯科与中共结成战略伙伴的方向已经被确定下来。当然，这也是可以想象的，斯大林更愿意与一个分裂的中国打交道。^②杜鲁门甚至确信，苏联宁愿面对一个分裂的、衰弱的邻居，而不愿面对一个在共产党有力领导下的中国。^③从安全政策上来看，对莫斯科最具有吸引力的设想是：在苏联与亲美的、位于中国南方的国民党中国之间，存在一个位于中国北方的、依附于苏联的共产党缓冲国家，而这个缓冲国又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苏联巨大影响下的原传统势力范围满洲，另一部分是从长城到长江的华北地区。而两个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使莫斯科处于有利的地位。与此相比，一个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对莫斯科来说，并不具有更多的吸引力，事实已多次表明，毛泽东对莫斯科并不顺从。

另一个问题是：斯大林是否有可能试图唆使中共，把这一方案付诸实施。这意味着，劝说中共，不要越过长江，打到南方

^① Chen Jian: <The Ward Case> .p.160.

^② 1949年春，莫斯科从希望出发，认为中共不可能统治整个中国。苏联大使罗申就作过这样的表述。他当时对广东的一位美国外交官说，如果共产党人最终取得政权，她将犹如“骑一匹老虎”，将面对许多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华盛顿不必过于担忧。历史将表明，没有人能控制分裂成许多权力集团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一样，缺少这种能力。1949年3月31日罗申对美国大使馆参赞克拉克的谈话，FRUS, Vol.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217 f.

^③ Trucker: <Patterns> . p.16.

去。这个问题，原则上被否定。斯大林在 1945 年 8 月 的确曾劝说中共放弃内战，毛泽东因此指责他背叛中国革命。但是，很难设想，在四年后，当毛泽东已决定占领全中国，而向南的胜利进军已势不可挡的时刻，斯大林会再次如此行事。显然，这样行事将带来与新中国决裂的危险。

这是从政治利益的分析得出的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说：斯大林曾劝说他们不要越过长江，那么，对上述那种假设的继续研究似乎已是多余的了。但今天，这个问题在研究界，也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界，仍然是有争议的。

1949 年春，毛就说过：“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的胜利半信半疑。他们试图说服我们，停止在这里，把长江作为与蒋的分界线，建立‘南北朝’。”^①

1957 年，毛说得更清楚了一些：

直到 1949 年，我们眼看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并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②

毛没有声称，这个建议是来自莫斯科。他也没说，这些“人”是何时和在什么情况下向他提出这种建议的。但是，从上述引文的最后部分可以看出，他说的那个“人”，指的就是斯大林。因为，从一位历史见证人的报告来看，斯大林在 1949 年 12

^① 《中共党史大事年报说明》，北京，1983 年，引自：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306, Note 25.

^② 1957 年 4 月 11 日的谈话，引自：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 1957 年的一次亲切讲话》见：《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2 日。

月 16 日在莫斯科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及其随行人员时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①早在 1949 年 7 月，斯大林也曾向刘少奇说过类似的话。^②

1955 年 1 月，周恩来对即将出任苏联大使的刘晓就其未来的任务作指示时说：

“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③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作者称，米高扬在 1949 年初受斯大林委托访问西柏坡时，就曾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建议：停止在长江边，把中国南部留给蒋介石。^④但另外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者，以及西方几个历史学家则认为，这个建议并不一定是米高扬，而可能是斯大林，更确切地说，是苏联领导提出的。^⑤人们认为，苏联采取上述态度，有其不同的动机^⑥：斯大林对解放军的打击力量信任不足；他对统一领导下的强大中国不感兴趣；他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5 页。

同上，第 414 页。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 4 页及下页。

认为是米高扬传来这一建议的作者有：聂荣臻、瞿星（音），引自冈察洛夫转引自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 91 页注 4。以及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 p.42 f. 306 (Note 28)。

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447 页；向青：《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解放军过江之我见》，载于：《党的文献》，1989 年第 6 期；廖盖隆以及陈广详（音），引自 Chen Jia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 p.5. 在这方面，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印证，如郭沫若对毛泽东渡江后的一首诗所作的评论。见：《红旗》，1964 年第 1 期，引自 John Gittings: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 p.153. 另参阅 Stuart Schram: <Mao Tse-tung> .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Baltimore/Ringwood 1966, p.245; John Gittings: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 A Commentary and Extracts from the Recent Polemics 1963 - 1967, London/New York/Toronto 1968, p.13 f. ; Gordon H.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 p.28。

^⑥ 此处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 p.42。

担心解放军的进一步胜利进军会导致美国的军事干预，并因此而把苏联卷入一场同美国的战争。

这个有争议的说法涉及到米高扬这个人物，如果说他是这一建议的转达者，那么，这一点却无法从一些历史见证人的陈述中得到证实。毛和周在谈到此问题时，都没有提及米高扬。人们曾向科瓦廖夫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而科瓦廖夫说，他记不起米高扬曾转达了这个建议。^① 师哲否认斯大林曾要这样，甚至说，米高扬在西柏坡明确表示，祝愿“彻底解放全中国”。^② 引人注目的是，师哲和科瓦廖夫参加了与米高扬的谈话，尽管他们在其他事情上激烈地相互攻击，但在这一问题上却持同一看法。米高扬自己在关于西柏坡会谈的报告中，也一字未提这一问题。^③ 人们甚至可以从米高扬的报告得出相反的结论：米高扬曾敦促毛尽快“比如攻占南京或上海”，建立新的革命政府。这无疑是以越过长江为前提的。此外，从迄今为止已引用的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的有关文件中，也找不到任何提示，能支持这一有争议的、苏联劝阻渡江的论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作者，依据北京党中央档案馆的文件及对历史见证人的询问，提出这样的看法：无论是毛或是其他中共政治局委员都没有说过，相关的这一建议是米高扬提出的。^④

鉴于毛说，苏联领导曾劝阻他过长江，这就引出这样的看法：毛自己反驳了自己。1956年3月和1958年7月他与苏联大

①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一部分第86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1、374页。

③ 此段和下段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100-110页，特别是105页。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94-105页。

如：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见：《新中共外交风云》，1990年北京版第15-2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作者也作了明确的表态，如周文琪：《关于斯大林》第9页及下页。

使尤金谈话时，列出了一个很长的罪行单子，指出了自 20 年代以来斯大林在对华政策上所犯的错误。^① 这个单子也包含了对斯大林 1945 年不让中国同志革命的指责。毛也批评了米高扬，说他在西柏坡时架子很大。但是，他一字未提斯大林或米高扬曾劝阻他渡长江。

一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历史学家，简明扼要地断定：所有说苏联曾劝阻渡江的中国人，他们能引证的都只是毛泽东，而没有其他任何人。尽管他努力在党的档案中寻找，但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旁证材料。^②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和知己也只是根据他与毛的谈话，确信斯大林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将其进军停止在长江以北，而让国民党控制中国的南部。^③ 同样，毛的警卫汪东兴也是如此，他声称，毛于 1949 年 12 月在莫斯科时对他说，斯大林受雅尔塔协定的影响，曾坚持要人民解放军不忙打过江，而先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④

另一方面，有材料说，斯大林在 1949 年 4 月是支持毛泽东渡过长江的。在当时他发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他说他赞成一个“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⑤ 当然，这封电报并不能作为确凿的证据，以说明毛对斯大林的指控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人们不能确定，这封电报是在渡江（4 月 20 日）前，或是在渡江后发出的。另一方面，1949 年 1 月至 4 月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来往电报，也不能很好地证明斯大林在渡江问题上进行过

此处和下段参阅 1956 年 3 月 31 日和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见：《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103-109 页，以及《党的文献》1994 年第 1 期，第 16-20 页。

王淇 1993 年 5 月 23 日与作者的谈话。

李志绥：《我是毛的私人医生》，1994 年比利时—格拉德巴赫版第 138 页。

^④ 《汪东兴日记》第 167 页。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第 82 页。没有注明电报的确切日期。

劝阻，因为在已部分或全文公开的电报中^①，只有毛的一封电报涉及这一案情。在 1949 年 1 月中，即在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前的两周，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他“就在夏天”越过长江的计划。^②毛要求斯大林，如他对执行这样的计划不赞成，尽管说出。而斯大林在其答复中没有提出异议。^③就已公布的电报来看，他在随后的一封电报中也没有提及这个计划。然而，齐赫文斯基的下述观点并不符合实际，他认为，他所公布的 1 月 10 日至 15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往来电报，驳斥了美国著作中所代表的观点，即：苏联曾劝阻中共过长江，并对国民党的分治表示理解。^④正确的说法只能是：在齐赫文斯基公布的电报中，斯大林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

看来，符合实际的论点是：国民党谋求以长江为界，实行中国分治。据师哲说，南北朝的建议是 1949 年北平谈判时由国民党的代表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是，阻止解放军渡江和以江为界，分裂中国。毛拒绝了，并宣称，解放军无论如何也要渡江。^⑤

很可能，师哲暗示的是毛泽东 4 月 8 日与张治中的谈话。张当时是受李宗仁委托来北平的国民党代表团团长，他向毛表示了“在长江边停止流血”的希望。他希望“国共双方约束自己的部队”

参阅齐赫文斯基：《秘密外交行动……》载于《远东问题》，1994 年第 3 期第 133—138 页；齐赫文斯基：《1949 年斯大林同毛泽东的信函交往》，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4 年第 4—5 期第 133—139 页；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见：《新中外交风云》，1990 年北京版第 19 页及下页。

^② 1949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引自齐赫文斯基：《1949 年斯大林同毛泽东的信函交往》，见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4 年第 4—5 期第 136 页。在此之前，毛泽东已发表文章，并向苏联领导通报了渡江的决定。如：1949 年新年献词，写于 1948 年 12 月 30 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72—1380 页。

齐赫文斯基：《1949 年斯大林同毛泽东的信函交往》，见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4 年第 4—5 期第 136—138 页。

同上，第 132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70 页及下页。

“划江而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建议其政府支持李宗仁说服中共划江分治的企图。^①毛拒绝了张的建议，并指出：革命不能停止，但两个代表团可以就解放军渡江的日期达成协议。^②

在解放军渡江的前夕，在国民党内部确有这样的传说，希望斯大林阻止中国共产党人渡江。当时，张治中在4月与共产党领导进行北平谈判时，也说了这样的话：“如果共产党已经决定继续打下去，那不是因为他们与苏联的关系。苏联只是向他们建议，把部队的进军停止在长江边。”^③1949年4月初，直至1949年担任国民党总书记的吴铁城在广州向一位美国外交官说，他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苏联将阻止中国共产党人渡江，如果他们确实能控制中共。因为莫斯科不愿承担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的风险，此时，西方国家正通过缔结北大西洋公约结成联盟。共产党中国在东南亚的出人意料的行动，很可能会引发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冲突。^④

初看起来，莫斯科曾劝阻渡江的论点得到了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的陈述所支持。这位历史学家说，苏联大使罗申曾不顾在毛泽东压力下莫斯科已所作出的、不充当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调停人的声明，与刚刚任命的李宗仁总统就苏联担任调停的条件，达成了一项协议。这实际上是对李宗仁的“划江而治”和建立“南北朝”的图谋的支持。但是，这里并不能排除，罗申大使的行为是莫斯科路线的一种偏离。此外，即使上述罗申大使的行动为确凿的材料所证实，但由此而能得出要建立“南北朝”的结

黄华：《南京解放》，第23页。

此段参阅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载于《中共党史资料》，1993年第48期，第148-155页，特别是第151页。

张治中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浣波的谈话，引自周文琪：《关于斯大林》，第9页，没有注明日期和资料来源。

④ 1949年4月2日吴铁城与克拉克的谈话，FRUS 1949, Vol. VIII, p.222 f.

论，似乎有些牵强附会。^①

在 4 月渡江前，斯大林曾给毛泽东一封“长电”。从已公布的电报内容来看，它也不能为这一有争议的论点提供支持的证据。斯大林在电报中谈到了“渡江后的军事措施”。他警告中共应注意帝国主义“为保护一些岛屿和亚洲”而可能采取的进攻性措施。这可能导致封锁，甚至武装冲突。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向南进军后，英美军队登陆的危险将变得很大。斯大林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急于，而要做好进军至邻国边界的准备。这里丝毫看不出，斯大林试图在这份电报中，阻止中国同志越过长江。相反，这份已公开的材料却给人以印象：斯大林把过长江看做是考虑下一步的前提。^②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出于理性的安全政治考虑，斯大林曾对中国的一分为二感兴趣。但认为他曾要求中共领导参与实现这一方案，以及不要越过长江，这种论点却是不可信的。首先，这种论点得不到可靠材料的证实。其次，毛泽东之所以确信斯大林要以长江来分裂中国，这并不是基于苏联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是毛对苏联意见或对某些至今未公开的苏联行为的理解。这里，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罗申大使与国民政府的秘密谈话，那次谈话的主题是以长江为界的停火可能性，因而至少意味着国家的暂时分治，而中共领导后来得知了有关的谈话内容。

此段参阅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载于《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75 页。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② 此段参阅《苏联与中国革命》，1994 年北京版第 568 页。对电报的类似解释还可以从王永向（音）那里找到。见：《报刊文摘》1997 年 4 月 10 日，第 3 页。王甚至把以上引用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说成是“不可靠的”。

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44.

第八节 第二次最高层秘密会晤： 刘少奇在莫斯科（1949年夏）

1949年7月26日，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

1、来由和目的

如前所述 毛泽东自 1947年就要求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高峰会晤，但一再被推迟。一月底，斯大林派米高扬来华，执行秘密使命。在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举行了会晤，这可算是第一次高峰会晤。^②借这次机会，中共领导向米高扬提出了以贷款为基础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请求，以及缔结相应条约的意图。此外，中共领导还提出“一段时间后”派一个特别代表团赴莫斯科，以便讨论一些其他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二中全会以后，以及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后，人们开始讨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当时，中共领导日益迫切地希望与苏共领导举行一次新的高峰会谈，以协调下一步的行动，以及缔结关于苏联援助的具体协定。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全国的胜利即将到来。此时，这种愿望就更加迫切了。毛泽东曾想亲自率团前往。4月底，他请科瓦廖夫就其访问日期向斯大林询问。科瓦廖夫认为，毛泽东当时很不安，因为他担心他的声望，并害怕与斯大林会见。斯大林的回答是：“您不要急于来莫斯科。联系到南方的复杂形势，以及中国基本上还没有政府，您不能离开中国和放弃对事情的指挥，否则，将给革命

①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一节。

②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事业带来一定风险。’^①

此外，斯大林在电报中也就建立未来的中国政府问题提出了建议。据科瓦廖夫称，毛泽东读了这封电报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振臂高呼：“斯大林万岁！”据科瓦廖夫推测，毛之所以如此高兴，是因为他从电报中看出，莫斯科现在承认他是中国革命的领袖。

科瓦廖夫的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实际，人们对此是有疑义的。毛泽东的这种反应也可能是一种反义的讽刺。毛想让莫斯科确定一个访问莫斯科的日期，而斯大林却以一种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一再加以拒绝。这次，斯大林又拒绝了，而且以一种教师爷的口吻指出，毛不能离开中国。这必然对毛泽东是一大伤害，似乎毛自己没有能力判断，何时能离开，何时不能。斯大林这次拒绝的原因与过去拒绝在莫斯科接待毛的真正原因是一样的，对此在本章第一节中已作了详细论述。^②

在刘少奇启程访苏的几个月之后，周恩来与尤金大使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证实了毛自己想率团访苏。但显然出于保全面子的原因，周恩来回避了斯大林拒绝毛泽东的这一事实，而却把斯大林提出的理由说成是符合实际的，符合中国领导自己的考虑。他说，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刚迁入北平，政府还没有建立，人们面临一大堆工作，没有毛是很难完成的，“因此，留在了北平”。^③看来，关于派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访苏的决定，早在5月份就作出

此段和下段参阅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第88页。两封电报都没有注明日期。

^② 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③ 1949年11月10日周恩来与尤金大使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案卷220，第52页。

了。斯大林对此也表示同意。^①显然，中共领导派以刘为首的代表团访苏是为了使苏联同志更加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它对世界革命的意义，希望苏联比过去更坚定地站在中共掌权的新中国一边，保证在外交上承认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苏也是为毛泽东的首次正式访问作准备，并请求苏联给新中国以“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也包括争取从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政治和道义支持。^②

使中共领导感到不安的，不仅是年初苏联大使作为惟一的一位使团团团长从南京迁往了广州，而且还有这样的事实：在共产党部队攻占了南京后，莫斯科还与国民党政府就共同的航空公司协定的延长问题进行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作者把苏联当时对国民党和中共的态度说成是一种“‘走钢丝’政策”。刘少奇的访问也是为了要在这些问题上予以澄清。^③

关于经济和技术的援助，周恩来在 1949 年 2 月初就已提出 4 亿美元贷款的要求。米高扬表示可给 3 亿。^④据苏联档案文件称，是毛泽东提出了 3 亿的请求，而米高扬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⑤中共领导还向米高扬提出了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具体要求，如；派遣苏联专家。米高扬表示可以得到部分的满足。^⑥4 月，

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37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5 页；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见《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76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2 页。

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5 页；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第 75 页及下页。

参阅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第 75 页及下页。另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2 页。关于罗申大使的态度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1 页。关于米高扬的访问，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⑤ 1949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95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4 页。

^⑥ 同上，第 77-100，103-105 页。

毛泽东再次向斯大林询问贷款问题，得到的答复是“等一等”。^①5月初，毛泽东再次请求斯大林派遣经济建设的苏联专家。^②毛泽东解释说：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我们能够完成。但解决第二个任务，即经济建设——这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我们在这方面“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刘少奇率团访苏是秘密进行的。它是如此的秘密，以至西方的研究界到80年代末才得知此事。^③如周恩来所说，那次行动是在“东北高岗代表团”的外衣下进行的。^④周恩来的这一解释是以7月31日《真理报》的一则报道为依据的。这则报道说，“以高岗为首的满洲人民民主行政机关”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商谈贸易问题；满洲与苏联之间签订了一个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⑤代表团于7月30日回国。对此，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认为缔结该协定意味着违反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起草了一份反驳的答复照会。但后来决定暂不予回答，等候中方的催问。^⑦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第87页。

^② 1949年5月3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96页。

参阅 Chen Jia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p.3.——然而，直到1996年，当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关于刘访问的部分文件公开后，才得到可靠的资料。见：列多夫斯基：《中共代表团1949年6-8月对莫斯科的访问》，载于《远东问题》1996年第4期第66-83页（简称：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以及列多夫斯基：《中共代表团1949年6-8月对莫斯科的访问》，载于《远东问题》1996年第5期第84-94页（简称：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本作者感谢安德烈·列多夫斯基，从他那里获得了部分档案文件的原件复印件，这些文件是其未发表的手稿中的一部分。

^④ 1949年11月10日周恩来与罗申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案卷220，第52页。

^⑤ 1949年7月31日《真理报》第3版。

^⑥ 代外长叶超给苏联大使馆代办瓦斯科夫的照会，1949年8月6日递交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a，案卷198，第13-14页。

^⑦ 1949年8月25日答复照会草稿及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附函，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a，案卷198，第11-12，16-21，23-26页。在此附函上有维辛斯基1949年8月29日的亲笔批注：“不予答复，直至再次询问”。

代表团的伪装在它到达莫斯科后不久就出现了问题，因刘少奇提出请求：他的代表团要了解和学习苏联国家机关的组织情况和工作情况。斯大林担心这会导致泄密。他认为，如果把国家机关牵扯进来，就难以保证中国代表团的秘密性质，难以掩饰其真正的作用，而斯大林对代表团的秘密性质是很重视的。因此他建议代表团“合法化”：“如果对你们是合适的，我们将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新闻，说高岗同志领导下的贸易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这样，你们就有广阔的可能性，参观一切……。”中方表示同意。如前所述，7月31日《真理报》发表了消息。四天前，“满洲人民政府”选举高岗为政府主席，^①这很可能是与刘少奇代表团“合法化”的必要性有关。^②

在形式上，苏联外长与中国代表团访问没有关系。外长维辛斯基不属于政治局，他显然没有参加代表团与斯大林进行的工作会谈，但他受斯大林委托，单独安排了一次与代表团的会见，应代表团的请求，介绍外交部的结构和工作情况。保密工作是如此的严格，除了维辛斯基外，外交部没有人知道代表团的来访，主管中国事务的远东司以及苏联驻南京的大使馆也都不知道此事。会谈的译员只有师哲。^③

中共领导在代表团出发前是否曾要求进行公开访问，这一点还不得而知，但看来，中共领导是愿意进行公开访问的。^④同样不得而知的是：毛泽东是否曾试图说服莫斯科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建立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如果是，可以断定，斯大林

参阅 Mackeras / Chan: < Modern China > p.437.

^② 这里描述的讨论是在 6月27日会议上进行的。详见下一节。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列多夫斯基：《中共中央代表团 1949年6-8月在莫斯科的秘密使命》，未公开发表的手稿，第16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当时是苏联驻南京大使馆的一等秘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份公开出版物指出，斯大林要求对访问实行严格保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4页。

坚持的立场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成立后，才有可能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国家级别的正式关系。这一立场也同样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5 月 13 日就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关系向黄华所表述的立场。^①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于 6 月 21 日乘火车离开北平，经沈阳到大连，从那里乘苏联军用飞机，飞越北朝鲜上空到达伯力，然后一站又一站地飞越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在那里从 6 月 26 日停留到 8 月 14 日。^② 代表团回程乘坐的是火车。它于 8 月 25 日到达沈阳，8 月 28 日继续动身，于 8 月 29 日或 30 日到达北平。代表团的成员有高岗和徐介藩（他们是在沈阳加入的），以及王稼祥、邓力群、戈宝权、黄维文（音）吴振英和翻译师哲。同行的还有伊万·科瓦廖夫和一位苏联大使馆的官员。高岗因与刘少奇发生分歧，已于 7 月 30 日返回东北。^③ 邓力群于 8 月中从莫斯科飞往伊宁，以便在那里与苏联总领事合作，为人民解放军占领新疆做准备。^④ 王稼祥在代表团回国时，作为两党领导之间的联络员留在了莫斯科，^⑤ 后于 10

参见本章第九节。

代表团的行程日期是根据以下资料来源得出的：（刘少奇年谱），第二卷第 217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2 页；《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39、460 页；（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542 页；《苏联与中国革命》第 570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37 页。师哲原认为代表团是于 7 月 2 日从北平出发的，并于“第六天”到达莫斯科。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6 页及下页。这一说法为朱原石（音）：《刘少奇……》所接受。但后来师哲作了更正，说 6 月 21 日启程，6 月 28 日到达（这个日期又不准确）；见 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Shi Zhe's Memoirs >, p.26. 在 Hunt: < The Genesis >, p.180. 中也有一个不准确的到达日期（7 月 10 日）。冈察罗夫等曾依据师哲回忆录的原说法，错误地把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日期说成 7 月 9 日，见：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6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37 页；《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5 页。关于高岗提前返回的情况，详见本章下一节。

^④ 《苏联与中国革命》，1994 年北京版第 572 页；《中共中央在香山》，1993 年北京版第 460 页。

同上。

月 20 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的第一任大使。^①

刘少奇当时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代表团的第二个重要成员是高岗，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成员。他当时常被称为“未加冕的满洲国王”^②。据一位俄罗斯作者称^③，在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时，他还不是满洲政府的主席。如前所述，这个政府是在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的一个月才成立的。王稼祥在 20 年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中央委员。^④ 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是陪同人员。

下面关于刘少奇莫斯科使命的过程叙述和成果评论，依据的是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的有关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近期发表的材料和师哲、科瓦廖夫等历史见证人的陈述，而他们依据的是各自的笔记。科瓦廖夫承认，当时在核对 7 月 27 日会谈笔记时就发现，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听的是同样的，但记下的却有所不同。”^⑤ 实际上，两位历史见证人已发表的材料在许多地方是有出入的，而总的说来，科瓦廖夫的陈述显得更可信些。^⑥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2、396 页；师哲：《陪同毛主席访苏》见《人物》，1988 年第 5 期，第 7 页；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载于《人物》1993 年第 2 期第 91 页；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第 76、80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4 页；《毛泽东文稿》第 1 卷第 81 页。

沃尔夫冈·巴尔特克：《中国党领导人的传记和分析（1922-1988）》，1990 年慕尼黑版第 44 页。

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68 页。

④ 巴尔特克：《中国党领导人的传记和分析（1922-1988）》，1990 年慕尼黑版第 216 页及下页；Klein/Clark：< Biographic Dictionary >，Vol. 2.，p. 896-898。此外，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5-397 页，第 425 页及下页。

⑤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第二部分，第 78 页。

⑥ 在科瓦廖夫的回忆录发表后，师哲在一篇论战性的，但缺少说服力的文章中诋毁科瓦廖夫的可信性。他甚至称，科瓦廖夫只是参加了第一次会谈，而且是斯大林在开始时把他叫进来，让他报告旅行的情况，后来又让他出去了。正如斯大林办公室的来访者名单所显示，师哲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参见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记——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载于《人物》1993 年第 2 期，见第 91 页；《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载于《历史档案》1996 年第 5-6 期，见第 56 页及下页。

鉴于资料来源的不足，不可能对刘少奇的出访作出十分完整无误的追述。甚至，刘少奇同斯大林究竟进行了几次工作会谈，也不是没有疑问的。师哲在一个地方说是“四到五次”，在另一个地方说有六次，每次持续四至五个小时，但他只对其中的两次记有日期。^①另一位能进入中共档案馆的中国作者说，共进行了五次。^②按日期能确定的会晤有四次：6月27日、7月11日、7月27日以及8月5日。^③有据可查的是，斯大林共有两次在其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接见了刘少奇：6月27日和8月5日。^④我们只得到了被称之为第一次会议的记录，而其他三次会议只能按师哲和科瓦廖夫的陈述加以追述。许多情况表明，只有那四次可以从日期上得以确定的会晤，才应算作是与斯大林进行的工作会议。这样，人们就可以解释在其他中国材料中出现的不同说法，即有些其他的会见实际上涉及的只是在舆论报道中提到的、代表团应斯大林邀请而参加的接见或宴会。在7月15至26日之间，刘少奇还与外长维辛斯基，以及国家银行、国家计委、财政部、外贸部、化工部和莫斯科市苏维埃等单位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⑤此外，他还参观了大企业，以了解企业管理和那里的党和工会组织的职能，还参观了集体农庄、大学、博物馆和展览会等。

6月26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被安置在苏共中央的一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7-425页。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12页。

③ 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1-7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18-23页，27页；《科瓦廖夫，I》，第88页；《科瓦廖夫，II》，第78、82页；《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第56-58页。

同上。在8月5日那天，刘少奇由王稼祥和师哲（卡尔斯基）陪同，来到斯大林办公室，但这没有从其他材料来源得到证实；苏方的出席人是：斯大林、贝利亚、布尔加宁、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科瓦廖夫。同上，第57页及下页。

此段和下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20-423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7页；《中共中央在香山》第448页。

个招待所里，那是沙皇时期的一个豪华别墅。^①显然，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会谈气氛，毛泽东在代表团到达后不久，发表了一项迄今为止最坚定的公开声明，表述愿与苏联结成联盟。^②不久，斯大林对这一步给予了回报，在《真理报》上转载了这一声明。

师哲回忆说，在代表团稍事休息后，斯大林邀请代表团成员参加在其孔策沃的别墅举行的欢迎宴会，历时4个小时。参加宴会的还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席间虽是随便交谈，但也涉及某些重大的实质性的政治问题。^③

2、第一次会议：苏联援助问题

6月27日，代表团到达后的第二天，斯大林于晚上23点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会见了代表团，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④除斯大林外，参加会谈的还有莫洛托夫（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米高扬（外贸部长），以及伊万·科瓦廖夫。中方参加人为：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及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7页。

^② 详见下一节。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8页。不清楚的是这次宴会是何时举行的，谈了哪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另一部中国出版物中谈到这次宴会时，说它是在7月10日举行的。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18页。师哲在晚些时候撰写的回忆录中说，斯大林为取悦于中国客人，提出3亿美元贷款的建议；见师哲/陈健（音）：《陪同毛访斯大林》第27页。但据后来查证，这一建议是斯大林在6月27日正式工作会谈时提出的。此处和下段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7页，这里提到7月28日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的接见。这一陈述同样也出现在《中共中央在香山》，第442页。

标明为“绝密”的苏方谈话记录，收藏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1-7页。这是科瓦廖夫做的记录，后按斯大林指示作了修改。文件中的着重线以及共12点的序号，均为斯大林所加。文件上有“给莫洛托夫同志本人阅”的批语。现在，这一记录已公开，见：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68-70页；同上，第67页。但师哲和科瓦廖夫均未谈到此次会谈。在冈察洛夫/列维斯/薛的著作中也没有提及此次会谈。参阅《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1，第56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17页，但它按北平时间被注明为6月28日。

翻译师哲。^①开始时，斯大林询问了毛泽东的健康。刘少奇表示感谢，并向斯大林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信中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援助”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见代表团。^②

接着，会谈进入实质部分。但按科瓦廖夫的记录，在实质会谈中，几乎只是斯大林在发言。他的谈话似乎是在回答中方的请求。不清楚的是，中方的请求是否在会谈前就已提出，例如，以一封迄今尚未公开的要求清单的形式提出了，或者刘在会谈前已经作了陈述。可以认为，如果中方的请求是在会谈过程中作了陈述，那么，科瓦廖夫应作记录。但在科瓦廖夫的记录中，刘没有提请求或问题，而只是谈到几个决定。

从内容上看，这次谈话几乎完全是涉及苏联对共产党中国的未来援助的：商品贷款、派遣苏联专家和军事援助。此外，也谈到新疆的形势。

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已作出的一项决定作为实质会谈的开始。斯大林说，联共（布）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 3 亿美元贷款。同时，他指出，两党之间签订这样一个协定是历史上的首次。这笔贷款的年息为 1 厘，将以机器设备、各种原材料和其他商品形式向中国提供，每年平均 6000 万美元，5 年贷完。中国将在贷款全部贷完后 10 年内偿清。斯大林接着说，毛泽东在打给他的电报中表示，此贷款的年息 1 厘是低了，应当提高。斯大林对此解释说，苏联向“西边的民主国家”^③ 贷款年息为 2 厘，

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I》，第 68 页。在斯大林办公室的来访者名单中没有记载师哲的名字，见：《克里姆林官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I，第 56 页。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I》，第 68 页。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术语，无疑，指的是东欧的苏联卫星国，它在共产党的语言习惯中通常被称之为“人民民主国家”。在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I》，第 19 页中作了改写，此语在相应的段落里被称之为“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从种种迹象来看，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斯大林要在“西边的民主国家”和“东边的民主国家”之间作出区分。

而向中国贷款只取 1 厘，这是因为中国同西边的民主国家情况不同，中国在打仗，破坏还在继续，因此它需要更多援助，条件应更优惠，而西边的民主国家已无战事，它们的经济也已巩固。接着，斯大林笑着说：“如果你们坚持利息要高一些，那是你们的事。我们也可以接受更高的利息。”^①

关于贷款协定的签订，斯大林说，可以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由联共（布）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签署；第二个方案是由苏联政府代表和现有东北人民政府代表签署，待全国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成立后，再由苏中两国政府间通过条约形成协定。^②

由于考虑到苏联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方案必须以秘密的方式来实行。如果实行第二个方案，则可考虑公开，因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东北的共产党政府，而且鉴于雅尔塔协定和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条约，东北被西方大国视为苏联的利益范围。如前所述，即使国民党政府对协定的签订提出抗议，那也是徒劳的。

列多夫斯基说，人们决定采用“东北方案”^③，但该协定在苏联和中国的文件中有时被称为贷款协定，有时被称为贸易协定。从形式上看，协定是按第二方案签订的。但从中国的报告看，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会谈后，成立了一个贷款协定起草委员会。^④ 其成员有：米高扬和科瓦廖夫，以及刘少奇、王稼祥和高岗。7 月 25 日，刘少奇通知斯大林，“贸易协定”已经拟就，希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I》，第 68 页。

同上。斯大林在这段直至“现有东北人民政府”为止的行文旁边，划了两道着重线。见原件复印件。

列多夫斯基：《毛泽东， I》，第 18 页。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师哲：《陪同毛泽东和斯大林， II》，第 79 页。

望“在与您亲自会面时，能得以支持”。^①约两天后，该文本经北平的中共领导审核后提交了苏方。^②斯大林建议高岗作为东北政府的代表签署这个协定，但这被刘少奇所拒绝。^③7月30日，协定由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④后来，斯大林确认，这个协定是在党的层次上缔结的。^⑤7月31日，苏联报刊报道了苏联与满洲缔结了“商品交换协定”，^⑥但在内部，这个协定被称为“苏中贸易协定”。^⑦

在1949年6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接着谈到了苏联专家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此之前与斯大林书信来往中就已提出的、并在米高扬年初访问西柏坡时再次谈到的问题。斯大林说：“专家，我们是要派的。我们已经准备在近期派出你们请派的第一批专家。但我们需要商定专家的待遇问题。我们认为，工资，也许还有膳食供给（如果你们向本国专家实行膳食供给的话），均应按你们本国优秀专家的最高标准发给，既不能低于但也不能高于这个最高标准。鉴于我们专家工资标准高，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通过苏联政府给他们以补贴。”^⑧

斯大林说，如果个别苏联专家表现不好，请随时告知。俗话说：哪家没有丑儿。好人当中也会有不好的。表现不好，会有损苏维埃国家的荣誉。因此，“我们将采取各种措施说服教育，必

① 1949年7月25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8，第168页。

② 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的电报，引自《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38页。贸易协定的文本至今没有公开。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4页。

④ 《中共中央在香山》第455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1页。

⑤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谈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35页。

⑥ 1949年7月31日《真理报》第3版。

⑦ 1949年7月25日刘少奇给米高扬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8，第16页。

⑧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68页。

要时给予处分。我们决不允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表现高傲，决不允许他们瞧不起中国人民”。刘少奇回答说，中国现在就有些同帝国主义活动无关的外国专家在工作，他们的工资都比中国专家的工资高得多。对此，斯大林说，苏维埃国家有它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办”。^①

关于向上海派专家，斯大林说，“我们已经挑选 15 名专家，可根据你们的要求随时派去”。中国方面应当考虑，在大城市，尤其在上海，有许多中国的专家和熟练工人，他们能够提供很多帮助，不会小于而是会大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必须吸收他们积极参加工作。^②

斯大林接着宣称，他们准备帮助在上海附近水域排雷，可以派专家去，也可派扫雷艇去。出于不可告人的原因，他建议通过东北来实施。譬如说，“可以卖给东北人民政府几艘扫雷艇，在大连、旅顺或海参崴培训中国海员学习排雷”，斯大林笑着说，“而东北人民政府，然后可以把这些扫雷艇‘卖给’中央政府”。

此时，斯大林又把谈话转入新疆问题。斯大林说：“不宜推迟占领新疆，因为推迟将招致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会鼓动穆斯林，其中包括印度穆斯林积极活动，继续进行反共内战。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因为新疆拥有中国迫切需要的储量丰富的石油，并盛产棉花。”斯大林还指出，汉人在新疆人口中的比例较小，并建议占领新疆后把汉人比例提高到 30%。这有利于对该地区的“全面开发”也是加强保卫中国边疆的需要。“总之，为了巩固中国国防，所有边界地区均应迁去汉人”。

接着，斯大林谈到国民党将军马步芳，他当时统治着毗邻的

同上，第 68 页。

② 同上，第 69 页。

青海省，从那里可以封锁通往新疆的通道。斯大林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他说，马和骑兵团是很容易打垮的。“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给你们 40 架歼击机，它们可以帮助你们很快粉碎和消灭这股骑兵”。

斯大林接着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海军。但看来你们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几艘舰艇。中国应当有自己的海军。“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海军。譬如，现在我们可以打捞沉没的商船和军舰，帮助你们修复它们。至于你们提出加强青岛防御的要求，在中共成立全国政府后，我们可以派我们的分舰队去青岛访问”。看来，斯大林是针对中共的请求才对青岛问题作出反应的。似乎中共希望苏联在保卫青岛港方面能站在他们一边，以抵抗在附近游弋的强大的美国海军舰队可能发动的进攻。如这种推测是符合实际的，那么，刘少奇对舰队访问的允诺应当感到很满意了。^①

接着，刘少奇感谢斯大林，感谢苏联“正在以史无前例极其优惠的条件向中国一切生活与工作领域提供的巨大援助”。他同时指出，中共中央正在起草下发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要求为苏联专家创造不使他们任何人感到委屈的工作条件。斯大林回答说：“我们方面也在起草类似指示，发给苏联专家，要求他们也别委屈了中国专家。”^②

斯大林还宣称，为满足中方的请求，同意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并立即着手。他允诺帮助中国人建设飞机修配厂。“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最现代^③的歼击机，捷克造的或俄国造的，任由你们选择”，你们可以用来培训自己的航空干部。中国代表团希望苏联“政治局听取”中方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斯大林对此要求

① 同上，第 69 页及下页。

② 同上，第 70 页。

③ 斯大林在记录中“最现代”一词上打了个问号，并划掉“最”字。

表示同意。

斯大林保证说，“我们准备在研究国家机构、工业以及你们所希望了解的一切方面给你们以全面的帮助”，但为此要求“给你们一个合法身份”。接着，就是以上曾提到的建议：在报上发表一条消息，把中国客人叫做以高岗为首的东北贸易代表团。

在记录的最后，科瓦廖夫注明：中国同志希望，“待他们同毛泽东同志商量后给予答复”。

3、“一边倒”毛泽东对苏联的明确表白

四天后，即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纪念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①他表述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论证最详细的、对苏联态度的公开声明。毛热情地主张实行“一边倒”纲领：倒向苏联和以它为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发表这篇文章的时机很难说是一种巧合，很可能是有意的选择。显然，毛发表这篇包含着向莫斯科表示忠诚，并要求两国结成紧密联盟等内容的文章，肯定会对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晤产生积极的影响，营造良好的气氛。当然，这里也包含着这样一个意图，促使斯大林准备给未来共产党中国以更多的支持，包括重要的物质支持。

自1948年年初以来，毛泽东已表示对以苏联为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拥护，并在同年11月否定了中国必须奉行在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的“中间路线”和走“第三条路”的设想。^②1949年4月，毛与张治中谈话时，再次表示了他反对在华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载于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引自《毛泽东记》东京版第10卷第291-307页。此文略经修改的版本载于《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468-1482页。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六节。

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实行中立的方案。张治中当时作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团的团长逗留于北平，他认为美国和苏联对中国同样重要，要求在两个大国之间实行等距离的政策，并主张“争取英国和美国的援助”。毛对此表示反对，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产生了两个大的集团：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垄断的、侵略性的集团，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集团。他最后说：“我们只能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中去，我们不能到以美国为首的集团中去。……第三条路是没有的。……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们在国际上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一边，真正的援助也只能从苏联方面获得。”^①

毛对张提到，他正在写一篇文章，其中将对有些人主张的“第三条路”的观点进行批驳。谈话记录的出版者认为，这篇文章指的就是 1949 年 7 月 1 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② 当时，毛是否确实向张暗示了这篇正在准备中的具有很大敏感性的文章，或者这里涉及的只是毛在“准备”会谈纪要时为显示连续性和坚定性而加入的一个虚构的过程。但无论如何，7 月 1 日的文章包含了对张等所主张的“第三条路”的尖锐批判。在此之前，是 6 月 22 日毛向华盛顿发出的严重抗议。^③ 他看来有意发出信号，要加剧与美国的冲突。

在 7 月 1 日的文章中，毛明确指出：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训给我们的，深知

^① 1949 年 4 月 8 日与张治中的谈话记录，见：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载于《中共党史资料》，北京 1993 年第 48 期，第 152 页及下页。据谈话记录的编者称，俞是张治中的秘书，该记录的依据是张治中生前所作的笔记。

同上，第 153、155 页。

^③ He Di: < The Evolution…… >, p.39. 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仅中国，而且全世界都无例外地倒向社会主义，如果他们不倒向帝国主义。中立是虚伪的，第三道路是没有的……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并不是要对中国人民援助。……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

方面去找。^①

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显然追求三个主要目标。其一，他要对中国未来同盟者施加影响，如对：国民党左翼和“民主同盟”，他们（如张治中）主张在苏联阵营和西方大国之间实行中立的立场。^② 其次，他特别要使斯大林相信，他是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的，排除铁托主义的不可信任性。科瓦廖夫证实，毛当时极力谋求消除斯大林的不信任。^③ 最后，毛要使苏联领导承担起对中国援助的义务。

最后一个目标，他是能够达到的，不管斯大林对这篇文章是否感到特别满意。几天后，《真理报》刊登了这篇文章。^④ 无疑，苏联领导已看到这篇文章。首先，苏联领导在经过几个月的犹豫不决之后，现在在公开舆论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兄弟党打成了一片，并同时跳出了与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阴影。其次，他们通过刊登这篇文章，表明他们准备向共产党中国提供毛所要求的援助。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因素外，显然还有另外两个派生的动机。^⑤ 其一是，迹象表明，毛当时日益并非常担心，美国会站在国民党一边，军事介入中国的内战，至少是全面封锁中国的港口。为此，毛要通过与苏联结成公开的联盟，以对付这种形

^①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引自《毛泽东记》，东京版第10卷第296-298页及下页；德文文本是根据1960年北京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的，德文版第四卷第442-444页。在1960年北京版的第1473-1493页，没有上述引文中斜体字的那一段。德文版中也相应地缺少那一段。

^② 参阅《科瓦廖夫，II》，第88页。
同上，第86页。

^④ 1949年7月6日《真理报》第3版。

关于附加的动机，本作者依据的还有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提供的信息，他曾广泛查阅了中共档案馆的未公开的文件。他不愿公开他的姓名。

势。^① 6 月中，毛曾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提到后一种担心。^② 7 月中，邓小平指出了封锁与“一边倒”的因果关系，并援引了毛的论点：“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③ 值得注意的是，邓在引用毛的讲话时，强调了第二个原则：在内部政策中，必须“自力更生”，这就是说，更主要的是着眼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④ 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意图，并不是完全地把自己交给苏联。

在预感到的威胁与“一边倒”口号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应提及一件神秘的事情。据说，大约在 1949 年 2、3 月间，中共军事情报人员从蒋介石总司令部获得一份情报，说美国计划发动一场“亚洲变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它计划对东北、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目标进行核打击，接着与日本和国民党中国一起，出动 300 万部队，在华北和东北的港口登陆，然后向乌拉尔方向挺进。^⑤ 由于这则难以置信的意图信息得不到任何其他方面的证实，人们不排除，这则情报是中共领导伪造的，为的是促使斯大林增强其对军事合作的决心。^⑥

作出“一边倒”政策决定的第二个附加因素显然在于：毛担心如果不较明确地与美国划清界线，这就有可能加强中国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包括已在“统一战线”之内的），并在美国的援助

^① He Di 也有这样的看法，见：He Di: < The Evolution…… >, p.45 f.

^② 1949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讲话，见《毛泽东选集》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465 页。

^③ 1949 年 7 月 19 日邓小平的信，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1994 年北京版第 134 页。

同上。

据说，科瓦廖夫从后来的驻苏大使、当时的中共军事情报人员刘晓那里得到了这一情报。见：《科瓦廖夫，I》，第 87 页。

^⑥ 同上，第 88 页。师哲否认有这件事。见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记——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些问题》，师哲访谈录，见：《人物》1993 年第 2 期，第 92 页。

下最终导致推翻共产党政权。^①

“一边倒”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意味着中共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谈论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这一话题，而且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即中国革命实际上已取得胜利的时刻。刘少奇在 1949 年 12 月底与苏联驻北平的临时代办谈话时，也指出了这一事实。在此之前，毛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应依靠外国援助，而应依靠自己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总是强调后一种立场。1949 年 12 月，邓颖超为即将在北平举行的亚洲妇女大会准备了一份演讲稿，其中引用了毛泽东 7 月 1 日文章中的一段话，即关于苏联的援助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不可缺少性。刘少奇把演讲稿中的这一段引文删去了。这似乎表明，有些领导人对毛的“一边倒”政策持有一定的保留。^②

这种保留，至少在刘少奇的其他讲话中也可以找到。1949 年 12 月，刘与一位苏联女士进行了谈话，他再次说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苏联还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官方关系，并在时事评论中偏向于它，这使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很受委屈。刘指责说：

去年我们开始更多地宣传与苏联的友好。为什么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像现在这样强调国际主义呢？这是因为直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也就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苏联没有宣传^③中国（这里当然指的是共产党中国——作者注），直到 10 月 1 日以后，苏联才开始广

这种担心也可以从毛泽东 1949 年 6 月 15 日的公开讲话中看出。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65 页。

此段参阅 1949 年 12 月 25 日刘少奇与谢巴耶夫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10，第 27 页。

“宣传”一词在共产党的语言习惯中，具有正面和积极的意思。

泛发表关于中国的消息和材料，而美国的报纸在 10 月 1 日以前就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问题，为什么苏联不写中国……。在中国，人们知道很多关于苏联的事，远比苏联人知道中国的要多得多……。在与苏联同志谈话时，人们感到他们很少理解中国的问题。……对苏联人民和党内同志来说，共产党的胜利是出乎意料的。^①

当时，美国方面正确理解了毛泽东的“一边倒”文章。司徒雷登大使断言，这篇文章“会使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更进一步。但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几乎也没有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民主国家具有更大的敌意”。^②

引人注目的是，司徒雷登在作出上述判断后三天，即 7 月 9 日，他得到了经“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陈铭枢传递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的一封口信，信中试图淡化“一边倒”文章所宣告的倒向苏联一边的影响，说这篇文章是为本党所写的，不应从单纯的政治观点来看。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毛在 6 月 20 日强调与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的演讲^③，以及 7 月 7 日对美友好的声音。由于在后一篇讲话中，谈及建立外交关系时没有提先决条件，这显然不同于苏联的建议，因此人们可以认为，这篇讲话没有同苏联进行过协商。^④

^① 1950 年 1 月 27 日刘少奇与（真理报）记者蔡塞特季娜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案卷 11，第 23-24 页。

^② 1949 年 7 月 6 日司徒雷登给国务卿的信，见：Rea/Brewer: <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 . p.335 f.

这里指的是毛于 1949 年 6 月 15 日的讲话，它发表在 1949 年 6 月 20 日的《新华社的英文电讯》上。这篇讲话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63-1467 页。毛提到的那段话见第 1466 页。另参阅 FRUS 1949, Vol. VIII, p.392, 775 (note 82)。

此段参阅 FRUS 1949, Vol. VIII, p.774-776. 关于 1949 年 7 月 11 日陈铭枢的新，详见本书第三张第九节。

显然，毛、周和叶的信是试图减弱毛 7 月 1 日的文章给华盛顿留下的不良印象，目的是不要刺激美国更加支持国民党，不想完全杜绝与美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可能性。司徒雷登大使也作出类似的推测，他在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说，这封信“表达了一种天真的愿望：虽然中国与西方的政治关系破裂了，但双方仍可以建立经济上的联系”。^①“一边倒”文章发表后，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偶尔地作一些努力，以免同美国的关系完全破裂。^②

4、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

斯大林在 6 月 27 日的会议上宣称，他们准备在“三四天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中国代表团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报告。^③据师哲说，写一个书面报告的想法是王稼祥提出的。这样可以帮助苏联主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问题，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使问题谈得更有系统。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不会重复也不会遗漏。鉴于在国内已有充分准备，报告很快就拟订出来了。^④

刘通过电报征得了毛的同意。^⑤刘于 7 月 4 日将由他签署的共分四个部分的报告，连同一封信，送交“联共（布）中央，约

^① 1949 年 7 月 13 日司徒雷等给艾奇逊的电报，见：FRUS 1949, Vol. VIII, p. 782 f.

见：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 - 1950 >. New York 1983.

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70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8 页。

^⑤ 《刘少奇年谱》第二卷第 217 页；《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43 页。

·维·斯大林同志”。^① 斯大林在报告的某些地方划了着重线和写了批语，有些是在文本上用斜体字写的，有些是在页边空白处用顺序号码标注的。^② 报告的内容在中国的文献中也有所反映。看来，师哲曾看到过中文的原件。^③

报告的头两部分讲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目前形势和前景，使用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目前形势”和“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对外关系问题”。第四部分谈的是双边问题（“苏中关系问题”）。

“中国革命目前形势”

刘在这一部分主要想让斯大林相信，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即将实现。报告是以这样的一句话为开始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目前已基本胜利，不久即将取得彻底胜利。”5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国土的30%，在解放的领土上居住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7%，即27500万人口”。在三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

俄文的信引自作者保存的原件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32页。被斯大林办公室标为“绝密”的这份18页的俄文文本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33-50页。它后来被解密了。见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71-82页（那里档案编号是不准确所）。作者有两页斯大林亲笔批注的报告文本复印件。这份报告由S.P. 安德烈耶夫翻译，俄文文字显得有些粗糙和不流畅，这可能是因为时间仓促所至，据说是在当天之内译出的。见报告最后一页的原件复印件（作者存有）；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50页。冈察罗夫、勒维斯和薛未拥有上述报告的俄文文本，他们认为报告“显然没有保存下来”，他们只好依据师哲的不完全的追述。见：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 Mao and Korean War> Stanford, Cal.1993, p.64-66。

以下引用的报告内容，有些是原文，有些是间接的转述。在报告俄译本中的着重线，都出自斯大林之手。斯大林所作的着重线和批语，在几个不同的资料来源（两个原件页，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中，标注并不完全一致。只有在列多夫斯基：《刘少奇……》中，表明了总统档案馆的文件页码号。

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8-403页 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载于《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7-79页；《中共中央在香山》，第444页。似乎，这两个出版物是根据师哲的陈述而写的。

国民党军 559 万人。目前，国民党军队只剩下 150 万人，人民解放军已拥 390 万人。“空军 7,500 人，海军 7,700 人”。^①

报告认为，1949 年至 1950 年的冬天，中国的中心地区就可解放。台湾、新疆和西藏在 1950 年内即可解放。“西藏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而非军事行动去解决”。人们想尽快解放新疆，但有一个清除通向新疆路上之敌的问题，另一个困难就是缺少必要交通工具，在甘肃与新疆之间有一个无食物和无饮水的沙漠地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无可置疑的了。”但“要取得彻底胜利”，尚需时日。^②

从报告的下一段行文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干涉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是武装干涉，还是实行封锁。报告说，中共领导“没有放弃对帝国主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的警惕”，并完全同意联共（布）的有关指示，这些指示进一步加强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很有可能的是，帝国主义派出 10 万、20 万军队来占领中国的三、四个港口，或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对此，人们已作了某些准备。由于没有海军和空军，因此也就没有海防。帝国主义袭击“是会给我们造成困难，带来损失，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会失败”。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将奋起反击帝国主义，并把干涉者的军队赶出去。^③

在这段简练有力的话之后，以一种自我安慰的乐观主义的表述结束了关于干涉问题的论述，报告说：“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搞得对，有可能帝国主义不敢对中国直接进行武装干涉。我们需要注意不给帝国主义以武装干涉的借口。”但是，“较大的可能是帝国主义将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政策”。他们甚至已经开始

斯大林在此处作了疑问的批注：“1）有驾驶员吗？有水兵吗？”——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71 页。

同上，第 71 页及下页。

同上，第 72 页。

推行这种政策，这会造成某些困难，尤其是在航运和对外贸易方面。

在这部分的结尾，报告人强调了“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民主力量，尤其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但是报告撰写人也对莫斯科显示了强烈的自信心（这并非第一次^①）突出了他们自己的革命经验的价值，某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向，并指出了“中国道路”的模式特征：“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搞土地革命”；“在农村地区”进行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在城市进行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并把它同武装部队的行动结合起来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经验。报告最后概括说，所有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能是有益的”。

“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

接着，刘少奇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共领导建立新中国政权结构的计划，首先是建立政府。此外，他还向斯大林解释了什么样的居民阶层将吸收到新的领导结构之中，以及这一方案是如何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精神制订的。

在这一部分的开头说，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结束战争，肃清国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学会建设与管理国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于今年8月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②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是由民主政党、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总计23个团体共同筹备的。在134个筹备委员中只有43名共产党员。48名“无条件拥护我们的进步人士”，其中有15人是秘密共产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② 斯大林在此段和下段的旁边划了一条竖线。见：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73页。

党员；以及 43 名中间分子，其中有 12 人属于右翼。这就保证了筹备委员会及其 21 人主席团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筹备委员会决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团体共 45 个，代表 510 人。在这些代表中，共产党人占多数。^①

“我们认为，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大众所熟悉的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最恰当的组织形式。因此，我们打算把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常设机构使其存在下去，而地方上凡有需要则设立地方政治协商会议。”人们准备制订一个共同政治纲领，由各党派和群众团体共同遵守。报告接着是对未来政府和各部、委设置的具体描述。斯大林在这里划了一些着重线，写了一些旁注，这说明他对此特别感兴趣。“政治协商会议将选举产生中央政府，^②毛泽东同志拟任中央政府主席，^③周恩来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不担任政府职务。”^④

接着，报告谈到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报告说，“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⑤报告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它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⑥报告接着说，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同列宁在 1905 - 1907 年革命时所说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共同点，共同点在于，这一专政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它的基础是工农联盟。^⑦但是，中国的人民

^① 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73 页。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师哲在复述报告的这两段话时隐瞒了共产党人在建立政治协商会议中的统治地位。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0 页。

^② 斯大林在此作了旁注：“②）也设立省政府吗？”

斯大林在此作了旁注：“③）这是什么：实际上的总统？”

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73 页及下页。

斯大林在此作了旁注：“④）何谓‘官僚资本’？”

^⑤ 斯大林在此作了旁注：“是的”。

^⑦ 在师哲的陈述中有些差别，他先提到“工农联盟”，后又说“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0 页。

民主专政却包括那些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这就是不同之处。^① 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是因为我们在革命时期和革命胜利后一个很长时期，都需要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② 这也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所决定的。这完全符合斯大林同志 1926 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当时指出：未来中国的革命政权将“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③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按其形式来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形式。它接近苏维埃制，但它不同于苏维埃形式^④ 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⑤ 报告还指出：

有人说：“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或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立即成为基本矛盾，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就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样论述问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如该政权要用主要火力去打击资产阶级，……这种行动就会使当前还能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而投向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推行这种政策，当前就是危险的冒险主

斯大林在此作了旁注：“5)是 的！”

斯大林在此作了旁注：“是的！”

此段和下段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I》，第 74 页。

在中文原件中称“苏维埃制”，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1 页。

斯大林在此段的旁边划了一条竖线，并批注：“是的！”。见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32 页，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I》，第 74 页，但这里没有提到竖线。

义政策。^① 今年二月，安德烈耶夫同志^② 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对于中共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站到自己一边的政策表述赞同，稍后联共（布）中央也曾指示我们必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③

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客观上是存在的，而且会逐步加剧。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适当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捍卫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与此同时，还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并克服中国的落后。”^④ 从现在起直至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需要采取许多措施，也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认为，这可能需要 10 至 15 年时间。”

由于中国落后，交通不发达，从前存在过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和封建割据等情况，中国尚未形成统一的经济体系。“因此，我们目前不得不给予地方政府相当广泛的自治权，以提高地方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⑤ 我们认为，实行过分集中的体制是不正确的、有害的。^⑥

在此处，报告还写道：“我们的上述观点是否正确，请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布）中央给予指教。”

接着，报告对中国的“民主党派”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报告说，大部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已抵达北平。这类民主党

斯大林在此作了旁注：“是的！”。

这是米高扬的化名，这里是指 1949 年 2 月初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此段和以下 3 段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75 页。

斯大林在这一句话的旁边划了一条竖线，并批注：“签订集体合同，可以排除罢工。”

斯大林对这一段作了旁注：“（7）将设立省级地方政府吗？”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34 页。但在列多夫斯基的引文中缺少斯大林的注 6）。

⑥ 斯大林注：“是的！”

派共有“十多个”，总人数不超过三万人。其中，民盟有两万人。这个组织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有比较大的影响。^①接着，报告又对这些党派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国民党残余和帝国主义代理人都千方百计地企图打入这些民主党派，来为自己谋取合法地位。对此，我们已向各民主党派提出了警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于土地改革勉强地同意中共的意见，而在对苏关系问题上，其中有些人明显地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所有民主党派在正式场合都表示接受共产党制定的纲领，都正式声明它们拥护中共作为领导力量。^②除了帝国主义代理人，蒋介石国民党以外，中国没有最终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中国暂时还没有西欧各国那样的反动资产阶级政党。^③

报告在第二部分的结尾说：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即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人民群众团体，都将发挥其重大作用。“今年二月，我们得到联共（布）中央关于加强工人、职员、青年和妇女工作的指示。我们同意这个指示”。当前，正在所有城市开展此项工作。但是由于这项工作长期中断，目前需要重新培养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现在，每个团体都有各自的干部学校，学员少则数百，多则达数千。但是，现在还不可能很快开展此项工作。“我们希望能派几位有经验的苏联同志来华，帮助我们开展这一工作”。

显然，斯大林原则上对刘的中国情况分析是同意的，正如他

^①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75页及下页。

^② 原词是“主要领导者”。

斯大林旁注：“8）和买办集团？”

对报告的前两部分所表现的那样。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许多赞同的批语中得到证实。但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的兴趣主要在毛的国家职务上（“实际上的总统？”）同样也在是否建立省级政府这样的问题上。他考虑的是这些政府与北平中央政府的关系，在满洲将会怎样，以及高岗是否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关于报告中谈到的联合政府的方案，毛于年初在西柏坡与米高扬谈话时就已作了论述。中共领导再次强调这是接受了斯大林在 1948 年就已提出的设想，并第二次摒弃了实际上是毛的一党制的方案，即他在 1947 年 11 月 30 日曾向斯大林提出的方案。刘还试图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联合政府的方案是毛泽东的思想，也是斯大林所认可的方案。^① 斯大林完全赞同中国的计划，即：先不要去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而应通过与西方国家的争论去约束他们。

“对外关系问题”

报告的第三部分主要谈中共领导对西方国家的态度问题。这里可以看出有某些不确定性。

报告说，中共领导完全同意联共（布）中央最近关于对外政策、外贸和贷款等各项指示。当前，帝国主义者在其支持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彻底失败之后，转而采取下列方法来继续反对中国革命：1、继续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可能的力量反对中国革命；2、采取一切措施打入革命阵营内部，瓦解危害中国革命；3、千方百计破坏中国革命同苏联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② 4、施用各种办法表示愿意同中共接近，同时竭力想

^① 关于联合政府这一方案的争论，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在俄文文本中“破坏”一词用的是“provocirovat”，挑衅和挑拨的意思，这一词后来在共产党干部中比较宽泛的被使用。

诱使中共走上亲帝国主义国家之路。^①

中共领导清楚地表示，他们决不允许这种阴谋得逞。他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打了招呼，并发动人民提高警惕。报告接着说：

我们认为，当前和今后，在自己的对外政策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下述原则：

1 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实现中国人民的彻底独立；

2 在国际事务中，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反对新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3 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②

4 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发展中国同外国，尤其是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关系。^③

报告还提到，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的最新资料。因此报告只能援引 1936 年的日本资料记载。据此记载，美、英、法、德、意、比利时在华投资总额 18.28 亿美元。其中，英国投资占 10 亿美元，美国 2.2 亿美元，德国和意大利 2.1 亿美元，铁路贷款和政治性贷款 5 亿美元，对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投资 4.5 亿美元，对进出口贸易投资 3.8 亿美元，对采矿和其他工业部门投资 3.6 亿美元。然而，日本失败以后，

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I》，第 77 页。

^② 斯大林注：“是的”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3-44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36 页，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I》，第 77 页及下页。

日、德、意三国在华投资均被没收。^① 英、法、比利时在华投资受到一些损失，而美国在华投资则略有增加。“当前，外国在华拥有下述一些企业以及银行、保险公司、进出口贸易处、海运船只、码头和仓库。”^② 报告接着说：

我们在进行某些必要限制的同时，总的来说，目前还是允许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企业继续经营。^③ 然而，某些帝国主义分子已经把它们在华的有效资本抽走，或者持消极等待态度。何时采取何种方法解决帝国主义者在华投资问题：是没收，还是用其他办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尚未作出决定。现在，我们正忙于作战和其他工作，暂未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准备解决这个问题。^④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有他们自己的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出版过去办的外国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停止外国记者的活动。这一决定在地方上已在执行。鉴于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控制着几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项目，中共中央批准了我们上海同志关于暂时停止执行上述决定的建议，但今后我们仍然准备贯彻这项

斯大林在“没收”一词上划了一个圈，在页旁划了两道垂直线，并批注：“10）被谁没收了？”。见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37 页，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78 页。在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78 页中，没有注明斯大林在“没收”一词上的划圈和页旁的垂直线。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4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37 页，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78 页。在这方面，师哲认为，各国在华投资企业经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甚重要。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2 页。

^③ 斯大林页边旁注：“11）有哪些限制？”

^④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4—45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37 页，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78 页。

决定。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办的学校和医院，只要他们遵守我们的法律，我们国家仍然允许他们继续开办下去。但我们不允许他们在华再开办新的学校和医院。将来我们有条件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我们将予以接收，自行管理。^①

我们准许外国宗教团体继续活动，条件是它们必须遵守我们的法律。与此同时，我们进行反宗教宣传。教会教堂占有的土地，我们予以没收，在征得教徒同意后进行分配。^② 其他外国机构和团体占用的土地，我们也予以没收分配。^③

我们不承认外国在华外交人员，而把他们作为外国侨民看待。由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种政策，人民才懂得：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此外，我们还可以免去许多麻烦，因为民主党派成员不敢再同帝国主义国家外交人员保持联系，不敢再同他们会面，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不敢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会面了。^④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外交人员到处向我们提出种种要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5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38 页，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78 页及下页。

② 斯大林在页边划两道垂直线，并批注：“12) 是的！”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5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38 页，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79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5-46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38 页及下页，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79 页。

求，总想同我们拉关系，以取得我们对他们事实上的承认。我们当前对外国人采取的这种政策，是历史上任何人都不会采取的。^①然而，由于我们采取此种政策，外国侨民也感到诸多不便，于是大批申请准予他们离开中国。同时，我们也感到有些麻烦。^②

在已解放了的中国领土上，大约有 12 万外国侨民。其中，仅在上海就有 6.5 万余人。东北地区有 5.4 万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是苏联侨民，其次是日本人，人数居第二位。^③

新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同外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帝国主义国家将无视我们，或者向我们提出一些会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以此换取他们对我们的承认。^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政策？^⑤我们当然不会同意接受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但我们是否需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争取这些国家对我们的承认，以便

斯大林在此处的页边划了两条垂直线。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5-46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第 39 页；部分是参阅报告原件第 14 页的复印件，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1》，第 79 页。

此段是按报告原件第 14 页的复印件转述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6 页；以及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79 页，但那里没有指出斯大林的着重线。

在这里斯大林批注：“P”（=“Pravil'no”，“正确”）报告原件 14 页的复印件。在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79 页，没有标明这一评语。

^⑤ 斯大林在这里批注：“13）区别对待”，并在正文上方用斜体字写道：“谁不承认这个，在对华贸易上就不给他提供任何方便。美国的危机将迫使它珍惜对华贸易。为此，也要利用中国商人。”斯大林并在这段话的旁边划了垂直线，并批注“正确”。报告原件第 14 页的复印件，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79 页。

我们为自己取得合法地位来进行国际活动？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等一等，不急于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①而先打扫干净自己阵线内部，以防麻烦。^②新中国政府成立以后，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无视我们，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否较快地承认新中国政府？^③如果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新中国政府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准备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届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先于这些国家承认我们。^④

我们打算重新审查国民党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每个条约和每项协定。对此，我们将遵循下述原则：我们准备承认并继续执行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条约，例如联合国章程、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凡有损于中国人民利益、有害于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条约，我们都准备一律予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某些条约经过适当修改后，我们准备予以承认。^⑤

斯大林批注：“14）是的！最好不要急”。此外他在旁边写了“正确”。见：报告原件第 14 页的复印件。在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80 页，没有标明“正确”的旁注。

② 斯大林旁注：“是的！”

斯大林旁注：“15）能够！”

斯大林旁注：“是的！”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6-4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39 页及下页；部分是参阅报告原件第 14 页的复印件，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79 页及下页，但这里没有标明所有的着重线和最后提到的旁注“是的！”。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0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80 页。从“我们准备”开始到本段的结尾，斯大林在旁边划了两条竖线，并批注：“是的！”报告第三部分的这一段和下一段在师哲的回忆录中也作了扼要的陈述，内容基本一致。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2 页及下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2 页，以及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一文中也作了类似的陈述。

……在国际政策方面，毫无疑问，我们将同苏联保持一致，就此我们已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① 某些无党派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但是，毛泽东同志回答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向苏联一边倒，因为我们如果不同苏联站在一起去反对帝国主义阵线，而企图走中间道路，那是错误的。经过这番解释之后，所有民主党派都同中共一起签署并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②

我们希望，在各种对外政策问题上，都能得到联共（布）和约·维·斯大林同志的指教。^③

在第三部分中，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多次以“是的”来表示他的同意，而没有一次表示不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把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列为新中国将予以承认和继续执行的条约之一。关于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作进一步论述。^④ 值得注意的还有：与论述国内问题相比，刘在论述对外关系问题时更多地表现出学生对老师的态度，他在其间不断地问，中国领导应该怎样办，并在谈完所有问题之后请求联共（布）和斯大林给予“指教”。而相反，在第一和第二部分只有一处问道，斯大林和联

斯大林注：“16) 是的！”

^② 此段和下段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47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40页及下页，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80页。上述声明于1949年4月3日发表。声明刊登在1949年4月10日《真理报》第4版。

斯大林注：“是的！”。见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80页。在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40页中，没有标明上述评语。

见下面的第四部分：“苏中关系问题”。

共（布）是否认为中国的观点正确，而没有一处“请指教”。这里可以看出，毛的自信心，对内战胜利的信心，以及不容莫斯科介入内政问题的决心。

“苏中关系问题”

报告的第四部分，即最后一部分，是最棘手的部分。

刘首先强调苏中友好关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苏中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对我们两国与全世界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尤其对于中国的独立及其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完全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中共一定会不惜任何力量去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①

接着，刘谈及毛与米高扬在年初西柏坡时已经谈到的几个敏感问题：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和旅顺口的地位问题，以及外蒙古独立问题。^②在报告的上一个部分，刘已经提到，1945年8月14日条约被列为中共准备“承认并继续执行”的条约之一，因为它们“有利于中国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与民主”。在这句引号内的话的下面，斯大林划了着重线。^③

在报告的第四部分中说：“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过去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好处。新中国政府将接受这一条约，这对中苏两国人民，尤其对中国人民将是一个更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接受这个条约。”

^① 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80页。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47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40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80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48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13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41、74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80页。

斯大林在此处做了旁注：“正确”。但在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80页中，没有标明上述评语。

刘少奇对条约的这一评价与当初 1945 年 8 月中共领导在得知条约签订时的感受是不一致的。当时他们的反应是惊慌失措，并感到自己被莫斯科出卖给了蒋介石。^①诚然，中共领导在 1949 年 2 月与米高扬在西柏坡会谈时已宣称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属于“爱国主义的”条约，中共准备遵守。^②中国的这一态度只能从以下意图来解释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即中国首先要表示善意，以便扩大基础，实现其主要目标：在与国民党和美国的对抗中以及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获得苏联的援助。

引人注目的是，与前一部分所作的表述相矛盾，刘少奇并不准备简单地保留条约规定的现状。他在报告中接着说，在建立两国外交关系时，需要“研究一下这个条约”。总的说来，可以“有下述三种处理方案”：^③

1、新中国政府声明，它完全接受这个条约并继续使其生效，不做任何修改；

2 参照原有条约文本，由两个政府代表重新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做某些文字性和内容上的修改；

3 两国政府代表换文，说明本条约暂时保持原样不变，但他们准备于适当时候重新予以审议。

上述三个方案，哪种好？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另参阅迪·海因兹希：《斯大林在 1945 年背叛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见：《亚洲》第 56 期，1995 年 7 月，第 9 页。

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 10 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此处和以下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8 页 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 14 页 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1 页。这三个方案的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第 12 页有相同的反映，但师哲没有提到这三个方案 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3 页，以及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第 79 页。

斯大林在此段的旁边手写了批注：“17）待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①”

在论述了解决条约问题的三种方案后，刘少奇开始接触棘手问题：“某些民主党派人士和一些学生、工人，提出了苏军驻扎旅顺口、外蒙古独立和苏联从东北搬走机器设备等问题。”斯大林对这一说法，特别是最后一部分感到很不舒服。在这一段的上面用铅笔写到：“我们从东北搬走的只是日本的部分资产，远非全部。^② 报告接着写道：^③

我们对这些人做了如下解释：

当我们还不能靠自己力量保卫自己的边防时，如果我们不同意在旅顺驻扎苏军，就是帮助了帝国主义。

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④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既然按民族自决原则要求独立，我们则应承认蒙古的独立。^⑤然而，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同中国合并，我们将对此表示欢迎。只有蒙古人民有权解决这个问题。^⑥

关于苏联从东北搬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8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 14 页，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74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81 页。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8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2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81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9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2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81 页。下面引用的涉及棘手问题的报告内容，在中国的有关文献资料中，都没有复述，甚至没有提及，只有师哲简要地提到旅顺驻军问题和蒙古独立问题。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3 页。

“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称谓在俄文文本中用的是其缩写 MHP。

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9 页，也作了这样的陈述。

^⑥ 斯大林注：“18）是的”。斯大林在这句话的旁边划了两道垂直线。见：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81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2 页。

些机器设备原本是属于日本人的，苏联作为战利品将它们搬走是用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出于不让这些机器设备落到中国反对派政党手中用以反对中国人民的考虑。苏联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这样解释是否对？

斯大林对这样的解释可能是满意的。他表示了赞同，他在关于蒙古那段话的旁边划了着重线，并写了“是的”字样。他在最后一句问话的旁边注了一个“P”字，即“正确”。^① 斯大林对于把搬走的机器说成是“战利品”这一点，也显然是没有异议的，他在这句话的下面未加评论地划了着重线。^② 但中国方面关于搬走东北工业设备的解释，是否表达了他们的真实看法，这是令人怀疑的。

此外，有爱国感的中国人不断向共产党人询问，苏联军队为什么要驻扎在旅顺口，为什么要从东北搬走机器，这也是事实。^③ 被共产党视为可以联合的“民主党派”的代表，对共产党人施加压力，要求与莫斯科谈判，归还“战利品”，从而使中共处于尴尬局面，这也是事实。中共领导在向人们解释搬运的理由时，也曾使用了刘在其报告中所说的论据。例如，1949年底上海出版的一个出版物就解释说，搬运是为了不让这些工厂设备落入国民党之手。^④ 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还说，可以告诉“民主

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42页。但在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81页，却没有标明这一评语。

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42页。但在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81页，却没有标明着重线。

参阅1950年1月27日刘少奇与记者捷塞特季娜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100，目录43，案卷11，第22-23页，引自《科瓦廖夫，II》，第88页。

^④ 1949年12月28日，一位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的官员得知了这一情况，见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43，案卷13，卷宗302，第15页。

人士”，那是为着防止美帝国主义利用，在民主政权下，估计是可能商还的。^①

中共领导遇到的另一个尴尬局面是关于蒙古问题，因为1946年初国民党割让外蒙时，曾引起中国舆论界的强烈抗议。如上所述，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对米高扬直言不讳地表示了他对内外蒙统一并加入中国的兴趣，并因此遭到米高扬和斯大林的反对。^②毛最后作了让步，并声称中国共产党人不会维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也不会提出关于蒙古统一的问题。但这并不能阻止刘在其7月4日的报告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重新强调中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到中国的兴趣。但他借用斯大林在2月的表述，加了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这必须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自己来决定。当然，刘知道，在现实的情况下乌兰巴托是不会作出亲中国的决定的，因此他的论点也就是承认现状。

在旅顺口问题上，毛在1949年2月已向米高扬表述了他的看法，^③刘在他的报告中只是在巧妙的包装下重提了这个敏感的问题，但他不是作为自己的问题，而是借用第三者（民主人士、学生、工人）之口而提出的。他以这种方式表明，北平的党领导感到在这方面仍然有问题，而且还没有解决。在搬走东北工业设备的问题方面，报告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醒斯大林，苏联是靠牺牲中国而发财的，因此他有义务援助新中国。引人注目的是，刘的报告没有提中长铁路的问题。很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从1月22日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米高扬在西柏坡时声称，苏联方面认为，与旅顺口协

^① 1949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引自周、褚：《共产国际……》，第459页。电报最后说，究竟应如何回答，请与苏方一商。

此段和下段参阅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的报告，见：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107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定相反，中长铁路的协定不是不平等的，而是对等原则没有被充分注意。^① 自那以后，斯大林不断在电报中问科瓦廖夫，中国同志是否真的认为中长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②

刘在其 7 月 4 日的报告中表示希望建立苏中间的邮电通讯、铁路和航空联系，合办苏中联营航空公司。报告并问道：“这需怎样解决？”^③

报告接着提出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关系以及同它们开展贸易的问题？”斯大林在此段的旁边划了两道竖线，并批注：“同他们直接谈判解决。”在文本的上方，斯大林写道：“我们将帮助。”^④，并划了着重线。

在紧接着的一段中，刘提出了一个紧迫的征求咨询和帮助的请求。“我们长期在农村地区打游击战，因此对于外部事务很不熟悉。目前，我们行将管理这样一个大国，搞经济建设，又要进行外交活动。还有许多东西都需要我们学习。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以指教与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极需这种指教和帮助。除了派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苏联教师来中国帮助我们讲课，而中国则向苏联派来学习考察团。此外，我们还想派大学生来苏联学习。”^⑤

米高扬给斯大林的电报（未注明日期），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0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6 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② 《科瓦廖夫 II》，第 86 页。

^③ 斯大林在此处的旁边划了两条竖线，并批注：“19 可以 我们帮助解决。”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9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2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81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9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3 页。在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81 页，没有标明着重线和准备帮助的注。

斯大林在这段的最后部分，即谈到派专家、教师和学习考察团的这一部分，在旁边划了竖线，并批注：“20）可以。”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49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3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81 页及下页。

接着，刘转入未来的两党关系问题。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共声明愿毫无保留地隶属于莫斯科。报告说：“联共（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司令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国际利益，因此，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议，^① 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未参加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如果中共和联共（布）在某些问题上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观点后，将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议。^② 我们认为，在两党间必须建立尽可能更加密切的关系，互派相当的政治负责人，共同解决我们两党关心的问题，并增进我们两党间的相互了解^③。^④

接着，刘谈到自 1947 年以来不断被推迟的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现在他不能秘密前来莫斯科访问。他只好等待苏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才能公开来莫斯科访问。我们希望就毛泽东来莫斯科的时间谈一谈，怎样办更好？”^⑤

接着，在单独的一段中写道：“请就上述所有问题给予指示。”显然，这里说的所有问题指的是双边问题。

在报告的最后，刘谈到 3 亿美元的贷款问题，这是斯大林在两个代表团 6 月 27 日会晤时承诺的。刘宣称，“完全同意”斯大

斯大林的旁注：“21) 不要!”。见 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4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82 页。在曾经援引的、涉及该报告的中国文献资料中，没有提及这段中共愿隶属的声明。

^② 斯大林的旁注：“不要!”。

斯大林在此段的旁边加了着重线，并批注：“22) 是的!”。

此段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0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4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82 页。

斯大林在此处批注：“23) 好！1949 年底 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 45，目录 1 案卷 328，第 50 页 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4 页 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第 82 页。

林提出的贷款条件，并感谢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①

与报告的前两部分（即涉及国内政治部分）不同，刘在第三、四部分（涉及对外和双边关系部分）请求莫斯科给予“指示”。人们可以把这一不同点视为一种标志，说明中共领导原则上不愿让斯大林介入中国的内政。但另一方面，报告的最后一句（这显然涵盖整个报告）表示了中方的谦虚态度：“我们希望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毫不客气地经常给予指示，并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提出批评。”^②刘少奇以“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签署了这份报告。

刘少奇的态度显得有些谦卑，这很可能是来自中国人的谦虚礼俗。在中文原件中，在刘请求指示的地方都写为“请给予指示”^③。人们也还可以对刘的态度作一个补充的解释：如前所述，刘当时访苏的主要目的是向莫斯科求援，这就使他面临一个乞求的被动形势。尽管考虑到这些因素，但人们还是不得不感到惊讶：刘居然走得那么远，提出中共在与苏共发生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也准备服从苏联兄弟党的决议。这肯定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这明显是走得太远了。斯大林合乎逻辑地对此表示了坚决的拒绝。这是在整个报告中惟一的一次拒绝。

很难认为，中国的顺从表示是认真的。过去，中共领导经常感到共产国际的约束所带来的麻烦，现在他们岂能再愿回到受约

^① 斯大林旁注：“还有白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0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4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82 页。这里说的白银，是指中方在西柏坡与米高扬会谈时已经提出的、贷款中还应包含提供白银的要求，用于德定中国的货币。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0 页，引自原件的复印件；并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1》，第 82 页。

例如，在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 1949 年 12 月 21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也使用了这种用语。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8 页。据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外交官贾丕才说，当毛向斯大林要求指示时，也使用“请指示”这种表述。见贾丕才：《在不同的纬线上外交家札记》，1996 年莫斯科版，转引自察恰诺夫发表在《亚洲与非洲问题》1997 年第 5 期上的文章，见该期第 62 页。

束的状态。可以认为，刘作出这一表示是因为他估计到斯大林会拒绝，并从而证实，由共产国际下达约束性指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此外，刘很可能还想达到第二个目的：通过向莫斯科表示忠诚，以打消流传甚广的、毛是中国铁托的疑虑。至于斯大林的反应，即使中国的顺从表示会使他感到很高兴，但他也只能向中国同志强调自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和刘少奇在后来的两个场合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①

可以认为，刘的态度使斯大林感到高兴，但也使他感到困惑。这已表现在 7 月 11 日讨论刘的报告之时。当时，刘再次口头提出请求指示，斯大林当即指出，两党是平等的。^②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三年后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之中。当周谈到与亚洲共产党的关系时，请求斯大林给予“指示”，斯大林显然有些精神紧张，不再是克制，而是反问道：“是指示，还是建议？”周的回答在西方人听起来有些诡辩。他说，在斯大林看来可能是建议，但在中国看来则是指示。尽管斯大林强调苏联建议的非约束性，但周坚持认为：中国人把它看做是“指示，而且是重要的指示”，尽管人们不能盲目地去执行。斯大林此时同样认为应谦虚一些，他说，苏联方面对中国理解很少，因此要“谨防发指示”。周仍顽固坚持，并再次请斯大林给予指示。斯大林顺从了，并提出了他称之为的“建议”。^③

上述刘、周与斯大林的两次对话反映出不同文化间的现象，它也涉及两位表现特别客气甚至献媚的老派中国人，与一位不了

详见本节的下一部分。

详见下一节。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次讨论是在 7 月 30 的宴会上。

^① 1952 年 9 月 19 日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99 页。这段对话转载于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周恩来 1952 年 8-9 月的会谈》见：《近现代史》1997 年第 2 期第 85 页。

解中国礼俗的、已俄罗斯化的格鲁吉亚人之间的误解。此外，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在中国，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为了表示特别有礼貌，有时在向一位并非上级的人士征询好的建议时，也会使用“指教”、“指示”这类的用语。

如果斯大林提出“是指示，还是建议？”的反问，不仅是出于诧异，而是出于神经过敏，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回想起了共产国际时代，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各国共产党下达有约束性的指令（在中文中也称之为“指示”）^①，如他所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对这些指令是很少赞扬的，有时却是不执行的。如前所述，斯大林当时强调，自共产国际解散后，每一个党都是独立的。但对战后出现的东欧卫星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来说，这仅是谎言。如果斯大林有这样的联想，那么，他很可能把周恩来请求“指示”理解为是对“过去共产国际美好时期”的一种辛辣的影射。

5、刘少奇提出的各项请求

第二天，7月6日，刘少奇致函斯大林，他在信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请求。^② 信分为8点，涉及了非常宽泛而有互不关联的题目，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中国人想了解苏维埃国家机构的愿望，建立培养中国干部的苏联学校，以及派苏联教师去中国等问题。在信中占有一定位置的还有：关于建立苏联与中

^① 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第333页注1。在中共党内，如中央委员会下达的指令也称为“指示”（见同上第347页，注2）。

^② 信是写给：“联共（布）中央、约·维·斯大林同志”。它是由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用中文签署的。如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一样，这封信也是由P.安德烈耶夫翻译的。俄文本的原件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351-355页。感谢列多夫斯基，他把这份文件的几乎全部原件复印件提供给了作者；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45-49页。这份文件后来又全部发表于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84-88页。但在那里，日期被错误地标明为6月6日。到目前为止，只有师哲提到了这封信，并用了两句话概括了信的内容。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3页及下页。

国之间的交通联系，请求帮助建设中国海军，解放新疆，解决东北经济问题，发展未来的文化关系等。

信的第一点与刘的 7 月 4 日报告相衔接，刘说他们在报告中已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请求给予指示。关于贷款和派专家问题，斯大林已给了指示。这是指斯大林在 6 月 27 日会见时向中国代表团所作的答复。^①

7 月 6 日的信接着说，在启程前，毛泽东曾请刘就国际局势的估计与分析、战争的危險以及苏联同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向斯大林请教，以便中共用以指导对国际局势的估计。^②

在信的第二点中，刘请求让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了解一些重要的领域。^③ 在国家机构方面，刘主要想了解各级政府结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武装部队、人民法庭、公安机关、财经机关的组织。他们还希望了解文化、教育机关以及外交部的结构。在经济政策和管理方面，中国人首先希望了解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协调发展，国家预算、地方预算、工厂、机关、学校、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概算，国有企业、地方企业、工厂、机关、学校的副业与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银行、合作社、海关、对外贸易部的组织与作用，税收体系的职能和交通运输的结构等。他们还请求了

斯大林在这段的旁边打了一个十字，并划了一条竖线；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1 页，列多夫斯基根据原件复印件作了复述，见：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5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4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1 页，引自原件复印件，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5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4 页及下页。

^③ 斯大林在这句话和下一句话的旁边划了一条竖线。见同上，第 85 页。

解文化组织、党、群众、青年和工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等。^①

刘请求与下列机关的“负责同志”进行座谈：苏联部长会议，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教育部和其他文化组织，外交部、国家计划委员会、银行、国内和对外贸易部、财政部、工会中央理事会、共青团中央等。他还请求会见联共（布）中央组织部和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的同事。最后，他还请求让代表团参观企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与那里的领导人、党组织书记和工会主席进行谈话。^②

在信的第三点，他请苏联政府“设立一所专门学校，例如像过去曾经有过的中国劳动者大学，为新中国培养所需要的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的干部”。开始，这所学校可先培训近千名大学生。该校可设立下列各系：工业系、贸易系、银行业务系、法律系、教育系等。学习时间可以是一年、两年和三年。授课可以通过翻译来进行。目前由苏联各类学校代为培养中国学生的做法照旧不变。^③

刘还希望向苏联派出“各种负责干部”，例如来参观学习三四个月。他们可以参观那些感兴趣的项目，可以听些讲演，举行一些讲座，这将增进他们在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知识。同样还希望苏联能派出各种学科的教员来中国，在培养干部方面提供帮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2 - 53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第 45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5 页及下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2 - 53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第 46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6 页。

从此段的开头到设立的各系为止，斯大林在旁边划了竖线。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3 页，引自原件复印件，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7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6 页。

助。^①

在信的第四点，主要谈了建立苏联与中国之间的交通联系问题。中方希望会谈和解决以下一些问题：“建立苏中间的邮电通讯、海运联系、空中联系”，建立由苏联经哈尔滨、沈阳到大连、由沈阳到北平和由北平经乌兰巴托到苏联的空中航线，成立苏中联营航空公司，帮助中国建立飞机修理厂和培养空军干部等问题。^②

在信的下一点中，简要地提出了在培养海军干部方面的援助请求，以及在扫雷、打捞沉船和建立海岸防务方面的援助请求。^③

在第六点中，提出了帮助解放新疆的问题。信中说，毛泽东已打来电报，表示同意尽快攻占新疆，要求向莫斯科询问“苏联方面空军支援与空运部队”的问题。刘希望能得到有关新疆局势的材料，并具体解决空军支援问题。^④

第七点谈的全部是东北问题。刘请求在 1949 至 1950 年的冬天，东北将向苏联出口 80 万至 100 万吨的粮食，以换取苏联的机器设备。他建议“在大连和东北建立统一货币，以促进大连与东北之间的经济往来，减少中国的外汇负担，更好地恢复大连的工业”。他提出关于开放大连向香港和日本出口煤炭、盐等问题，并询问：如果上海、天津遭到封锁，可否利用大连从事对中国的进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可否允许美、英商船进出大连港？最

斯大林在本段的第一句的旁边划了一条竖线。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3—54 页，引自原件复印件，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7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6 页。

着重线是斯大林所加。斯大林还从此段的开头至“乌兰巴托”一词的旁边划了一条竖线，在余下的几段处划了 4 个十字。此段和下面两段是根据原件复印件复述的，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7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7 页。

斯大林在这段的旁边划了 4 个十字，同上。

着重线为斯大林所划。在此段的旁边还划了一条竖线和两个十字。同上。

后，刘提出了利用鸭绿江水电站的电力问题。为建设该发电站，中方投资 7500 万日元，朝鲜投资 5000 万日元。东北当局请求将其发电量的一半供给东北，并请求苏联帮助解决这一问题。^①

最后的第八点谈的是中苏间文化联系问题。它被称为是密切两国人民友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刘希望“同苏联负责同志”商谈有关通讯社、电影、苏中文化协会的工作，互派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团参观访问，在中国培养掌握俄语和在苏联培养掌握汉语的干部，翻译政治、科学和文化著作，在中国建立俄文图书馆、开设书店，销售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和书籍。^②

刘在信的最后请求对所有上述问题给予指示，或派专人讨论这些问题。信以“致布尔什维克敬礼！”的套话结束。^③

与处理 7 月 4 日的报告不同，斯大林没有对该信的内容亲笔注明同意，或拒绝，或作出评论。但他对某些段落用着重线和符号加以突出，这表明他认为刘在信中提出的 these 问题是特别重要的（或者是很棘手的），特别是关于军事和经济合作问题。

刘少奇在 7 月 4 日的报告和 7 月 6 日的信中提出问题连同其他题目，在 7 月 11 日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与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讨论。部分问题还在 7 月 27 日的会议上继续进行了讨论。

着重线为斯大林所划。从此段的开头到“更好地恢复大连的工业”，斯大林在旁边划了一条竖线，在关于出口粮食的一句处划了一个十字，在开放大连港口以出口煤炭等处，以及在美、英商船利用港口之处也划了两个十字，在鸭绿江水电站处划了 4 个十字。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4-55 页，引自原件复印件，以及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8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7 页。

斯大林在此段的旁边划了一条竖线和一个十字。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5 页，按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8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7 页。

按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9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8 页。

6、关于刘少奇的报告和各项请求的讨论：7月11日的会议

会议是于22点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室以政治局扩大会的形式举行的。据我们所知，参加会议的苏方人员除斯大林外还有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政治局候补委员什维尔尼克，以及伊万·科瓦廖夫。由于会谈可能涉及军事问题，另有几位高级将领参加了会议，其中有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瓦希里·索科洛夫斯基。^①

据师哲称，气氛是严肃的，友好的。在苏方，几乎只有斯大林一人发言。他称赞7月4日的中国报告清晰明了，他本人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对报告本身都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问题。^②

刘谦虚地说，报告只涉及一些基本情况，但不完整。他希望斯大林同志给予指示。斯大林抗议说，他什么时候给过指示？两个党是兄弟党，没有上下等级之分，他怎么能下指示呢？^③

据师哲称，斯大林在会谈开始后不久，立即转入了报告的具体各点。我们不知道，斯大林对阐述中国当时形势的第一部分是否发表了意见。如果是，那肯定是表示赞同，因为他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没有作出有不同意见的批注。在讨论关于建立政府的第二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4页；《中共中央在香山》第447页。至今未能看到会议的记录。下面对会议的综述主要依据的是师哲的陈述和科瓦廖夫个人占有的档案文件，以及中国出版物中刊登的有关作者提供的中共档案材料摘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2页及下页。据师哲称，7月11日会议是第三次会谈，而科瓦廖夫错误地把它说成是第一次会谈。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8页；《科瓦廖夫》，第88页。从已知的各种情况来看，7月11日会议是第二次会议。《刘少奇年谱》第二卷第218页也说明了这一点。这里还可以指出的是，列多夫斯基根据苏联档案确认：在6月27日第一次会议后预订于7月11日召开第二次会议。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6页；Shi Zhe / Chen Jian: <With Mao and Stalin> . P.34.

刘杰成（音）：《毛泽东与斯大林》，1993年北京版第543页。刘援引的材料中有些部分是逐字逐句从文件中摘录下来的，但他没有注明出处。

部分时，斯大林明确表示赞同。这并不出人意外，因为他通过在刘的报告上所作的许多旁注，已经表示了赞同。在 7 月 11 日的会议上，斯大林明确表示赞同中共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加入政府的政策，并认为这不同于东欧和德国的情况。在那里，资产阶级的代表与希特勒合作；后来还随同德国占领军一起撤离。这不同于中国资产阶级对日本的情况。总的看来，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后来又受到中美通商与航海条约的损害。因此他们对美国和蒋介石持反对态度。中共利用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对他们采取“长期合作的政策”，把他们吸引到反帝阵营一边，这是正确的。^①

斯大林说，人们还必须给民族资产阶级提供有利的条件，例如关税保护。虽然劳资间存在着客观的矛盾，但为了避免使它破坏资产阶级与中共的长期合作，有必要让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以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并要说服资本家照顾工人利益。斯大林表示同意刘在报告中使用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以表明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的性质。^②

据师哲称，斯大林在另一次会议上^③谈到组建联合政府的问题，并指出担心的一点。他说，吸收其他党参加政府有可能导致国家机密难以保证，甚至会出卖给“敌人”。因此，斯大林劝说中国同志在普选中赢得多数，然后组织一党政府。他建议 1954 年举行选举，并通过新宪法，以代替即将实行的“共同纲领”。这部宪法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符合现存的社会关系。为对付“敌人”的指责，举行选举和通过新宪法也都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指责说，共产党是靠军事手段取得政权的，是不合法的。宪法必须包含这样的内容：全民的选举权；企业主和富农的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4 页及下页。

② 同上，第 405 页。

③ 是指紧接着的 7 月 27 日的会议。

私有财产权；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进行活动的权利等。^①

现在还不能证实，斯大林是否对 7 月 4 日报告的第三部分，即关于对外政策部分，作了详细的评论。但我们知道，他在两点上回答了刘在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他建议不要把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不要急于没收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资产，而应通过严格的劳动立法控制它们。其次，他按其在 7 月 4 日报告上所作的旁注精神，建议先与帝国主义国家做生意，然后再与它们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你们不必担心能否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更不必担心他们将如何对待你们。你们有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良好表现。它们已经开始经济危机。我想，这会加快对你们的承认。但是现在必须与它们做生意。”^②如前所述，斯大林在刘的书面报告中的有关部分已作了旁注，共产党政府不必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但对那些不承认中国的国家，不应给予贸易的方便。^③

在这里，斯大林显然没有说明为什么他建议中共领导不要很快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如前所述，斯大林显然要避免让新中国有可能通过直接接触，推行一种三角政策，而不是在国际上受苏联所左右。斯大林以怀疑的眼光观察中国领导的有关举止，而科瓦廖夫使他更敏感了，可以说是过于敏感化了。当他得到印象，中国同志不再遵循他的建议时，这引起了他的“尖锐的反应”。^④科瓦廖夫在 1949 年 12 月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指责说，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5 页及下页；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P.36 f.

^② 科瓦廖夫根据笔记所作的陈述，见《科瓦廖夫，II》，第 82 页及下页。这段引文的日期被错误地标成了 7 月 27 日。这个错误被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三人所纠正。见：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Korean War > . Stanford, Cal.1993, p.69.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5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3 页。

^④ 《科瓦廖夫，II》，第 82 页。

中共领导“幻想”将很快会被那些仍然支持蒋介石的西方国家所承认，尽管斯大林曾向他们提出建议，只有当这些国家放弃支持国民党时，才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①

对于刘在报告中提出的，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是否能在新中国成立后尽快予以承认的问题，斯大林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他按7月4日报告上的旁注强调说，苏联将很快予以承认。至于其他国家，这需同他们直接谈，但苏联可给予帮助。^②

从斯大林在刘7月4日报告上手写的旁注可以看出，他对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如同对前面两个部分一样，总体上是赞同的。但是，对第四即最后一部分，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部分包含了几个棘手的问题，其中有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问题，旅顺、大连问题，以及蒙古问题。

按中国的陈述，斯大林在7月11日的会议上说，苏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他已就此与毛泽东交换过意见。当时，苏联因与国民党打交道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政策。^③刘在7月4日报告中提出的三种解决建议似乎根本没有必要。^④斯大林说，此事等毛泽东来莫斯科再解决。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立即承认，毛泽东即可马上来莫斯科，如不便来，苏联可派代表团去中国。^⑤

不清楚的是，在涉及1945年条约方面，毛与斯大林进行了什么样的意见交换。可以肯定的是，1949年初米高扬在与斯大

同上，第82页及下页；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69. 关于科瓦廖夫的报告，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七节。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3页。

同上；师哲也几乎持同样的看法，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1994年北京版第551页。

⑤ 此段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3页（这里没有标明出处，但显然依据的是档案材料）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5页。科瓦廖夫对这个问题保持了沉默。

林商定后在西柏坡会谈时称旅顺口协议是不平等的，但这只是指旅顺口协议，而不是友好同盟条约本身。^① 与此相比，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会议上的表态说明他向中国人作了让步。

据中国的材料称，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的会议上说，苏联军队是作为“自由力量”驻扎在旅顺的，为的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既保护苏联，也同时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只要对日和约未签字，美国不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将在那里驻军，为了抵制美蒋的进攻。如中国共产党愿意苏联撤军，苏军就马上撤出。大连和满洲可以在行政管理上统一。大连是自由港，在新政府和外交关系建立以前，中苏可以共同利用它。^②

据科瓦廖夫说，在克里姆林宫，意见几乎一致，斯大林曾“以试探的方式”谈到苏军继续驻扎旅顺的问题，他说：“我们政府的意见是，在美国部队撤出日本后，苏联可考虑从旅顺撤军。但是，如中共认为立即从旅顺撤军是必要的，苏联也准备立即从那里撤出其部队，以便在政治上对中共有利。”^③ 从现有的材料看，刘少奇没有对斯大林的表态作出回答。这显然不同于半年前中共领导在西柏坡与米高扬会谈时的态度。当时，米高扬受斯大林的委托，声称旅顺协议是不平等的，一旦对日和约签字，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将废除这一协定和撤出军队，或者，如中共愿意，苏联就马上撤军。当时，中共领导急忙向米高扬保证，他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78-79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0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6 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3 页（没有表明资料来源，但这里显然依据的是档案材料）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5 页。另参阅师哲在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一书中的陈述，见该书第 92 页及下页。

^③ 见：《科瓦廖夫，II》第 86 页。

此段和下两段参阅 1949 年 2 月 6 日斯大林给米高扬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78-79 页，按原件复印件复迷，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 12 页及下页；此段还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P. 67 f.

们对立即撤军不感兴趣，因为这将有利于美国。7月11日斯大林向中方再次提出了类似西柏坡时提出的建议。但有一点是不同的，7月11日斯大林没有把旅顺协议定性为是不平等的，也没有表示有可能宣布它无效。

如果刘确实对此保持了沉默，那么，为什么？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主要以科瓦廖夫发表的材料为依据，认为斯大林把旅顺的海军基地视为“他与美国对抗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安全部分，也是对付日本的一个支撑点”。因此，斯大林提出撤军并不是认真的，而是一种试探。如果刘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就会被斯大林看做是不可靠的人，而斯大林“就会同样地对待他们”。鉴于这种分析，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认为，刘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保持了沉默，尽管中共领导对立即撤军是感兴趣的。^①但冈察洛夫三人的这种分析并不能令人信服。

下面的推测看来是更可信些：即使苏联有上述战略利益的考虑，斯大林提出立即撤军的建议也不一定会导致风险，因为斯大林可能已经估计到，立即撤军并不符合中国人的心意，鉴于他们始终担心美国的干预，从而会拒绝立即撤军。中共领导在西柏坡曾当即拒绝了这样的建议，已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一旦对日和约缔结，美国部队从日本撤出，旅顺口的战略地位也就消失。然而，刘为什么没有像在西柏坡时那样当即拒绝这个建议，而却保持了沉默，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不可理解的是，科瓦廖夫怎么会作出这种解释。他曾参加了西柏坡米高扬会谈，应当知道中共领导当时是自发地和坚决地反对苏联军队立即撤出。为什么科瓦廖夫会认为中共领导对苏联尽快撤军感兴趣，这很可能是科瓦廖夫对中国领导人的根深蒂固的

^①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68, 311 (Note 124),另参阅科瓦廖夫未发表的回忆录和《科瓦廖夫，II》，第86页。

不信任在起作用。科瓦廖夫甚至怀疑中国领导人，为了获得他们渴望的苏联援助，而不惜说谎。

诚然，刘对斯大林立即撤军的建议保持沉默很可能是因为他 在 7 月 4 日的报告中已经间接地表示反对立即撤军。他在报告中说，当我们还不能靠自己力量保卫自己的沿海时，如果我们不同意在旅顺驻扎苏军，就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这句话是作为针对“某些民主党派人士”关于苏联驻军旅顺的提问而给予的回答。^①

刘在其报告中还提出了另一个棘手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问题。现在还不清楚的是，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是否对这个问题说了些什么。如果他说了些什么，那很可能是对刘在报告中的解释表示赞同。刘在报告中说，中国应当承认外蒙的独立，只有那里的蒙古人民自己有权决定是否与中国合并。斯大林在报告的批注中已对此表示了赞同。至于最敏感的中长铁路问题，刘在报告中明智地回避了。很难认为，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会谈时会主动提及此事。

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的会议上针对刘在报告中提及的两党关系问题表明了立场。刘在报告中说中共准备“执行联共（布）的决议”，因为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司令部”。斯大林说：“中共代表团在其报告中声明，中共将服从联共（布）的决议。这在我们看来是奇特的。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不允许的。两个党必须对它们自己的人民负责，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协商，相互帮助，并在出现困难时紧密团结，这才是正确的。今天的政治局会议有你们参加，这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8 页，援助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2 页。

是我们两党之间的一种联系形式。这也是应该的。’^①

师哲对斯大林的这段话做了类似的陈述：各国共产党都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密切关系，但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②

在斯大林以这种方式对刘的 7 月 4 日报告发表了意见后，刘提出了在 7 月 6 日信中的第一点里已部分提到的问题：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阻止它和进行和平重建的可能性，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前景。对第一个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乐观的。他认为在近期内爆发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各国人民都不要战争，美国也没有准备好。至于和平能持续多久，是 15 年或 20 年，这很难预见。人们必须利用这个时期进行经济重建。“如果我们确实很强大了，战争就有可能避免。”当然，也有战争狂人。如一位美国将军竟然轻信苏联军队在阿拉斯加登陆的谣言，跳楼自杀了。对这类既不对自己也不对人民负责的疯子，要保持警惕。如果能争取到 20 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新的战争可能性就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尽管如此，人们必须做好准备。^③ 斯大林对中国客人所谈的战争与和平的思想，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想起列宁所说的“喘息”理论，即苏联在进行一次新的世界革命之前需要有一个“喘息”时期。

刘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形势。^④这显然与刘的提问相关，刘问及中共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和工人党

科瓦廖夫的笔记，见：《科瓦廖夫，II》，第 78 页。科瓦廖夫虽然没有注明斯大林说这段话的日期，但可以认为，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会议上谈到了刘的报告，并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6 页。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6 页及下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3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6 页。

情报局。^① 情报局是斯大林于 1947 年 9 月底作为 1943 年解散了的共产国际后继组织而成立的，为的是控制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并向全世界共产党进行苏联的宣传。自 1948 年 6 月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后，属于这个组织的有：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等。^②

据科瓦廖夫的笔记称，斯大林对刘的回答是，中共的加入“虽然是可行的，但根本没有必要”。新中国与东欧各国不同。其一是，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不是如此。其次，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同法西斯合作，并随它一起撤退，因此无产阶级有理由没收他们的企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中国，资产阶级没有投降日本，也没有同美国人和蒋介石合作。因此没有理由去反对他们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甚至存在着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鉴于这些很大的差别，中共目前加入情报局是不合适的。^③

斯大林接着说，鉴于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相类似，人们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这比中共加入情报局“更有必要和合乎时宜”，但这或许还为时过早。鉴于苏联既地处欧洲，也地处亚洲；它将参加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④

^① 《科瓦廖夫，II》，第 79 页。科瓦廖夫没有标明刘的提问和斯大林的回答的具体日期，而只是说“1949 年 7 月”。参见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232 f. 这里可以找到文本的英文译文。

^②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产生和任务的新认识，参阅吉潘斯基：《共产国际在行动中（1947—1948 年）——档案文献》，载于《近现代史》，1996 年第 1 期第 149—170 页以及 1996 年第 2 期第 157—172 页，这是根据迄今为止未公开的档案文件而写成的。关于情报局的成立情况参阅本书第二章第六节。

^③ 《科瓦廖夫，II》，第 79 页。师哲对斯大林的这段谈话只作了简短的描述，但大意相同。据他称，斯大林还说，在情报局里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任何党都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与其他党。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3 页及下页。

此段和下段参阅《科瓦廖夫，II》，第 79 页及下页。师哲没有提及斯大林的这一爆发谈话，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3 页。另参阅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第 90 页。

7月11日斯大林对中共加入情报局问题所作的回答，显得有些装模作样，学究气，也难以令人信服。斯大林的谈话也自相矛盾，他先把东欧国家的性质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后来又说这些国家“实际上”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国家，而最后又认为，在那里“实际上”存在无产阶级专政。

与此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1949年5月，不知是回答斯大林的提问，还是出于主动，他向斯大林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建立“东方情报局”为时尚早。在东方的12个国家中，中共只与5个国家的共产党有联系。这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暹罗（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朝鲜。与其他党，甚至与日本和印度共产党，都没有经常的联系。因此，较好的做法是先建立联系，了解情况，然后再建立“东方情报局”。目前，比较合适的是建立相互的无线电联系，以便就现实的一些具体问题交换看法。^①

这样一种推测是比较可信的：在中共加入情报局问题上，斯大林考虑的并不是他在7月11日对刘所说的理由，真正的原因之一是他不要共产党中国介入欧洲的政策。他已决定，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首先成为苏联控制欧洲共产主义的工具。在这方面，中国以它的独立性倾向和准级大国地位很容易成为一种干扰因素。其次，对斯大林有吸引力的是，中国以它的革命经验可以成为莫斯科在亚洲推广社会主义的帮手，而这又不至于把苏联推向与西方大国的直接对峙。这可能也就是他想成立莫斯科拥有发言权的“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的考虑。^②

斯大林指出苏联处于欧亚两洲的特点，表明莫斯科将在未来

^① 1949年5月18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电报（通过苏联总参谋部军事情报部送交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59-60页。

^② 参阅冈察洛夫等人的有些不一致的解释，见：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71-73。

的亚洲共产党情报局中拥有席位和发言权，而与此同时中国却被排除在欧洲情报局之外。这段谈话一定使中国客人产生一种复杂的感受。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刘少奇是否对斯大林的建议作出了回答。但中共领导可能对斯大林的这段话作这样的解释：斯大林已向他们打开了绿灯，允许他们在亚洲发展他们独特的革命战略。这一战略的轮廓就如刘少奇在 1949 年 12 月亚洲各国工会北京会议上所描绘的那样，其中心点是在亚洲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①

从科瓦廖夫提供的材料和所加注释来看，斯大林在论述“中共与情报局”这一题目时，也相关地提出了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示范作用，这为的是安抚一下中共领导，使他们不至于因被排除在情报局以外而感到懊恼。斯大林说，中共应理解它的重要地位和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现在有 4.75 亿人口的中国，接着再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或许还有日本要参加进来。那里的人民都在看着中国。“亚洲各国人民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在注视着你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党能有如此广阔的前景。中共有无数学生。^②

师哲称，斯大林接着向刘少奇承认了他在对中共政策中的错误。^③当刘少奇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发展情况时，斯大林问刘：“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干扰过或妨碍过你们？”师哲注释说，斯大林在这里指的是他在 1945 年 8 月的行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② 科瓦廖夫未发表的回忆录，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71 f.

下面一段交换意见的对话，师哲没有注明日期，但他指出这段对话是在斯大林论述了中共加入欧洲情报局问题之后进行的。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3 页及下页。

为，当时他曾敦促毛泽东赴重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①刘少奇回答说没有，但承认毛泽东当时没有打算去重庆，周恩来作为谈判代表就足够了。然而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好的。据师哲称，斯大林接着反驳说，去重庆对毛泽东来说曾是很危险的，他可能被杀害。他接着又问：中共是否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②中受了损失，苏联是否没有妨碍你们？刘再次反驳说：在和平运动中，美国和蒋介石受到了孤立，中共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没有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③

斯大林对此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指责你们。你们中国同志太讲礼貌，总是责备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无论如何都应当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向你们提出错误的建议。不过，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和改正的。”^④

师哲补充说，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中国代表团没有准备批评斯大林，从而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师哲认为，斯大林做自我批评是认真的。他主动作自我批评，表明了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并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爱

师哲的这一注释在他原来版本的回忆录中是没有的，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4 页。这是在加工后的版本中新增的，见 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P.82. 关于 1945 年 8 月的有关情况，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这是指马歇尔使命。

此段和以下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4 页；师哲：《陪同……》第 7 页及下页，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II >, 第 82 页及下页；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载于《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77 页，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2 页。科瓦廖夫没有提到这一插曲，在他的档案中也找不到有关的提示。见《科瓦廖夫，II》，第 90 页。

引自师哲回忆录的增订稿，见 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第 39 页，有关师哲的评论可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4 页。

戴。代表团立即把这一意外情况向北平作了报告。^①

在 7 月 11 日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新疆的局势。在 6 月 27 日的会晤时，斯大林曾敦促尽快占领新疆，因为那里存在着英国干涉的危险。刘表示同意，但也提出了后勤和其他方面的困难。斯大林当时答应投入 40 架歼击机，以对付马步芳的部队。^② 刘在 7 月 4 日的报告中再次提出后勤方面的问题。刘在 7 月 6 日信中请求苏联给予空中支援。在 7 月 11 日，斯大林第二次提出外国干涉的警告：据情报部门材料，美国和英国正在新疆煽动民族动乱，以便制造借口，扩大他们在那里的存在。^③ 斯大林再次允诺在尽快占领西北省份方面提供援助。

7 月 11 日，斯大林对刘在 7 月 6 日报告中提出的其他援助要求也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宣称，准备在旅顺口建立一所海军学校。^④ 此外，他还答应在建设沿海防务和建设由乌兰巴托至张家口的铁路方面提供援助。现在不知道的是，斯大林是否在那次会议上还允诺刘在报告中提出的其他请求，例如：培养空军干部，帮助东北的经济发展，在上海和天津被封锁的情况下开放大连以帮助中国的进出口，以及发展两国间的多方面的文化关系。

在 7 月 11 日的会议上，中方还提出了一个请求，但遭到斯大林的拒绝，这就是请求苏联在占领台湾时给予空中保护。1949 年 6 月毛泽东曾指示有关司令员，在夏季和秋季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便在冬季占领台湾。毛想以此来阻止国民党从台湾来封锁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5 页；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第 39 页。

^② 冈察洛夫等三人因没有掌握 6 月 27 日会议的苏联记录，而只是引用科瓦廖夫的笔记，从而错误地把斯大林的这一承诺说成是在 7 月 11 日作出的。科瓦廖夫在这里说是“40 至 50 架飞机”。见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312 (Note 136)。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7 页；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70，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④ 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8 页。

中国沿海，轰炸中国的城市，如：上海、南京、福州和厦门。此外，他此时仍然担心美国会军事干预，他深信，只要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没有被共产党所掌握，这种可能性就不可排除。^②

毛在刘启程去莫斯科之前曾多次通过电报请求斯大林给予海上和空中的支持。但 7 月 11 日刘少奇再次提出这一请求时，斯大林拒绝了。他说，战争给苏联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从西部边界到伏尔加河到处是一片废墟。用苏联军队支持进攻台湾，将意味着同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将为他们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提供借口。“如果我们领导人这样做，俄罗斯人民将不理解我们。不仅如此，他们会把我们赶下台。因为对他们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受的痛苦和艰辛不重视 因为太轻率。”^③

斯大林害怕苏联人民会反对的说法显然是虚伪的，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担心会出现反对派。甚至他的忠实追随者科瓦廖夫也说，这是蛊惑人心的说法。^④但他所说的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心是真实的。在战后的年代里，苏联领导经常担心卷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对这样严重的前景十分恐惧，赫鲁晓夫知道他的虚弱，他“决不做那些能引发与美国打仗的事”。^⑤斯大林不会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愿而使苏联冒这样的危险。

显然，刘没有表示反对。斯大林建议这个问题在预计 7 月 27 日召开的下一次会议上再讨论，并邀请几位军事领导人与

参阅 Chen Jian: <China's Road>, P.89。

此段参阅 He Di: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 - 1950> ; in: <Chinese Historians> , Vol.5, no.1, Spring 1992, P.1 - 3。

③ 《科瓦廖夫，I》，第 88 页；科瓦廖夫个人收藏的档案及其所发表的回忆录，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69。

④ 《科瓦廖夫，I》，第 88 页。

⑤ <Khrushchev Remembers.The Glasnost Tapes> , Boston 1990, P.100 f.

会。^①

这一情节犹如国家机密一样，在中国文献中没有被提及，似乎它根本不存在。师哲甚至否认在莫斯科讨论过这样的事，说这是科瓦廖夫臆造出来的。^②

对师哲的这种态度，理论上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他的记忆力衰退了。但鉴于这件事如此重要，这种解释看来可能性不大。更可信的可能是第二种解释：他是有意识地对此事保持沉默，因为这属于官方党史研究中的禁区。它之所以成为禁区，是因为这对北京来说至今乃是一件感到丢脸的事，毛泽东一再向莫斯科提出请求，但却毫无结果。此外，特别考虑到 1958 年与赫鲁晓夫关于军事合作的争论，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试图把毛泽东描绘成坚决捍卫中国主权、拒绝在中国领土上有任何形式的外国驻军的领导人。这种乞求苏联在占领台湾方面提供护航的行为，显然与这种形象是不吻合的。

但在师哲的回忆录中有一处可以认为是台湾话题的一种间接证实。^③ 师哲在描述 7 月 11 日会议时提到，在 5 月和 6 月国民党空军曾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造成了巨大损失。为对付这种攻击，毛曾电请斯大林指令苏联空军给予支持。于是从旅顺派来了两个飞行中队。此后，国民党飞机再也没有出现在上海的上空。关于占领台湾的计划与台湾出动飞机轰炸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之间的关系，在上面已经作了论述。

苏联空军已进入上海的这一说法，现在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斯大林似乎不大可能这样做，如前所述，因为他担心与国

^① 《科瓦廖夫，1》，第 88 页。

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第 92 页。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这个题目。参阅师哲：《陪同毛主席……》，第 7-11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7-424 页。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5 页及下页。

民党的军事冲突会发展为与美国的严重对抗，甚至会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斯大林因惧怕与美国发生严重对抗而拒绝介入对台湾的占领，而在上海事件上却愿意采取军事插手呢？

在 7 月 11 日会议结束时，斯大林请中国客人看电影。^①

7、情况介绍和参观访问

在 6 月 27 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曾表示希望了解苏联国家机关的组织和工作的方式方法。如前所述，他并想以此来公开他的访问，即使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他在 7 月 6 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开了一个很长的单子，说明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和问题。^②

相关的访问计划是由科瓦廖夫安排的，基本上在 7 月 15 日至 26 日完成。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外贸部、化工部、国家银行、轴承厂、量具厂和汽车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大学、列宁图书馆、历史博物馆，以及许多工业展览会。在工厂中，中国人了解了关于生产、管理、培训，以及党和工会的作用等问题。此外，科瓦廖夫还给代表团安排了与许多苏联专家的会见，以便同他们就有关问题进行询问与回答。此外，应刘的请求，米高扬谈了国内市场上的商业网问题，外贸组织问题，以及苏联与中国及满洲的合作和贸易问题等。^③ 刘在 7 月 4 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了解“外交部结构

同上，第 408 页。

详见本节的上一部分。

194 年 7 月 22 日刘少奇给米高扬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8，第 166 页。此段参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第一卷，第 37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9 - 423 页。

和外交斗争”。^①为此，他于7月30日会见了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话。高岗没有参加，可能他此时已乘火车回中国了。参加会见的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刘请维辛斯基谈了关于外交部机构，工作方式和方法，干部政策，苏联驻外代表机构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法，“外交舞台上斗争”的基本原则，以及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外交工作的建议。^②

维辛斯基向刘少奇解释了苏联外交部同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部在组织结构上的不同点。苏联外交部实行的是一长制：部长的指令对所有工作人员都具有约束性，都必须执行。某些外交政策性问题的则由部长提交政府审批。党组织不干预外交部的工作，不具有监督职能，它只管党的政治教育工作，解决党的各种组织问题。外交部党组织受联共（布）莫斯科市委领导，而外交部领导人组成的党组则受联共（布）中央领导。外交部有1500名各种人员，其中大约90%是联共（布）党员。在苏联驻外机构，都没有党组织，而只有工会组织。他也没有听说，在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莫斯科的使馆里有党的组织。维辛斯基还回答了刘关于驻外代表机构的职能与活动方式问题，关于外交干部的培养、他们是否必须是党员以及使用“老专家”的情况等。维辛斯基说：在苏维埃政权年代，“彻底更新”了外交部中央机关和驻外机构的人员成分，但今天也不拒绝使用“非党的老专家”，如国际法专家、顾问、律师等。只要人们给他们提供创造性劳动的条件，这

^①1949年7月6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1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46页，根据原件复印件复述。

^②维辛斯基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500，第172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58页；同上第53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90页。

些人就“不会成为新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消极旁观者”。^①

刘少奇问：在国际关系方面，他能向毛泽东转达“苏联的什么建议和希望”？维辛斯基回答说：重要国际问题之一是对日媾和。新中国的政府应注意，这个问题应力求通过外长理事会，而不是像美、英两国所提议的那样，通过 11 国或 12 国会议来准备。^② 维辛斯基提醒“中国民主人士”要特别警惕“美国统治集团”利用形势来达到其“帝国主义目的”的图谋。在国际事务中，需要有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外交是“军事战略的亲姊妹”。人们必须不断“利用敌人阵营中的矛盾”。这就是斯大林的外交。^③

谈话结束时，刘表示：毛泽东很希望在适当情况下访问苏联，亲自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接着，他邀请维辛斯基访华。维辛斯基对邀请表示感谢。刘又问：可否派“一个民主人士小组”到苏联来接受外交培训，或者方便的话，向中国派出苏联专家就地培养干部。维辛斯基回答说，这原则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个问题需要经“双方最高一级”商定。刘表示理解，并宣称将给“斯大林同志本人”写一封相关的信。在谈话中发现，中方缺少国际关系问题方面的参考书。维辛斯基答应赠送给他们几本在莫斯科新出版的《外交辞典》。^④

维辛斯基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500，第 167—170 页。根据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54—56 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91 页及下页。

外长理事会是根据波茨坦外长会议的决议成立的。

维辛斯基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500，第 170—171 页。根据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56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92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500，第 171—172 页。根据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57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92 页。

8、军事合作计划：7月27日会议

另一次标明了准确日期的会议是于7月27日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举行的，地点是克里姆林宫。关于参加者，我们只知道有：斯大林，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军队领导人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伊万·科瓦廖夫和师哲。可以认为，还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①

如斯大林在7月11日所建议^②的那样，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进攻台湾的军事支持问题，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讨论此问题。我们不知道讨论的过程，但知道它的结果：斯大林坚持他的断然拒绝的态度。刘最后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并说：他授权收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台湾和香港^③问题的请求，这件事就此结束。^④

刘的态度表明，在台湾问题上他已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进行了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但是，这里有一点使人不明白。7月25日，也就是会议的两天前，毛泽东给刘少奇发了一份电报，刘把这份电报转交给了斯大林，请斯大林“过目，并给予指示”。在这份电报中说：

欧洲与世界其他几个大洲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向前发展，美、英两国也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援助（即除我们已请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向我们出售飞机以外，还可能需请苏联向我

^① 《科瓦廖夫，I》，第8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第一卷，第37页；《中共中央在香山》第454页。师哲没有提到7月27日举行的会议。

^② 见：《科瓦廖夫，I》，第88页。

^③ 这里是否提到香港，并不清楚。

^④ 《科瓦廖夫，I》，第88页；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70。

们派苏联空军^①、海军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作战)来夺取台湾,这样做会否危害美苏关系?^②

这里使人不解的是,毛泽东在 7 月 18 日已收到了刘少奇关于 7 月 11 日会议情况的报告,在那天的会议上斯大林已拒绝为进攻台湾提供军事支持。很难设想,刘没有把这么重要的、有争执的情况报告给毛。同样使人惊讶的是:如果毛已知道了斯大林的拒绝意见,那么,他还要在 7 月 25 日给刘的电报中不受干扰地再次提出这一请求,并请刘“将此(就是说电报的整个内容——作者注)报告给斯大林同志,请他权衡一下我们的计划,可否付诸实施?”^③

在这件事上,人们也可以看出毛的顽强性及其肆无忌惮的态度。当他明明知道斯大林害怕因此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而他却假装担忧地询问,苏联为占领台湾给予军事援助是否会危害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

显然,毛在 7 月 26 日指示刘,如果斯大林不顾 7 月 25 日的电报在 7 月 27 日的会议上仍表示拒绝,就不要再坚持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刘应在 7 月 27 日会议上与斯大林集中讨论附加方案,这就是中共领导在 7 月 10 日在朱德建议下制订的内部方案:派 300 至 400 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 100 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准备于 1950 年夏,掩护渡

在我们现有的电报俄文文本中,用的是“航空”这个中性的词。但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显然指的是“空军”。

^② 我们掌握的电报只是给斯大林的俄文译本,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137-140 页,这里的引文在第 140 页,根据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52 页;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II》,第 90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140 页,据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52 页;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 II》,第 90 页。

海，夺取台湾。^①

材料证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 7 月 26 日作出决定，成立“空军领导机关”，派第四野战军参谋长、拟任命为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等赴苏联，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② 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刘少奇，为准备在一年左右建立中国空军战斗部队，以及购买苏联飞机和聘请苏联教官等事宜，请刘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谈。^③ 如果斯大林原则同意，将派刘亚楼率小型代表团去莫斯科。^④

在 7 月 25 日的电报中，毛已向斯大林提出了他的具体要求：

在上海，自遭到封锁时起，严重困难在加剧。然而，为了打破这种封锁，就必须夺取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拿不下的。我们希望您能同斯大林同志交换意见，商量一下苏联能否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帮助，即在莫斯科于半年至一年内培训 1000 名飞行员和 300 名机场勤务技术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 100—200 架歼击机、40—80 架轰炸机，用于夺取台湾的作战。在建设海军方面，我们也请苏联给我们以帮助。预计到明年下半年，即我军进攻台湾时，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将全部被我们占领。^⑤

^① 1949 年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引自《毛泽东年谱》，1993 年北京版，第三卷第 529 页；以及《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47 页。

^②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529 页。

此段和下段参阅 1949 年 7 月 26 日中共中央给刘少奇的电报，引自《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4 页。

同上。

^⑤ 1949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139 页，据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51 页；参阅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9 页及下页。

受毛委托，刘在 7 月 27 日会议上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文件，请求苏联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国防工业实现现代化，但没有提台湾问题。根据前一天北平的指示，刘还提出，希望苏联能为建设中国的空军卖给中国飞机，在莫斯科培养飞行员和技术人员，以及派专家去中国。这显然是以毛 7 月 25 日电报中的具体任务为依据的。刘请斯大林同意派刘亚楼率团来莫斯科。很可能，刘还请求供应高射炮。斯大林当即答应了刘的请求。^①

9、因高岗引起的不快

据科瓦廖夫称，在 7 月 27 日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之后，刘少奇和高岗之间出现了激烈的争吵。这是与高岗的亲苏倾向密切相联系的。从各种迹象来看，由于高岗同科瓦廖夫之间有着充分的信任关系，高岗已得知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是暂不从东北撤兵。为支持斯大林的立场，高岗在 7 月 27 日会议上不仅主张苏军继续留驻东北，而且建议增加在大连的苏联部队，以及把苏联海军部署到青岛，从而保证东北免受美国的攻击，使之成为向南进军和最终打垮国民党部队的可靠基地。^②

与此相联系，高岗说：如果东北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美国就不敢进攻东北。斯大林当即察觉，高岗是在没有得到北平授权的情况下说这番话的。斯大林与高岗保持了距离。刘对高岗的表现很气愤，并在会后指责高是叛徒。在此之后，斯大林试图使刘与高和解，并向毛说了一些高岗的好话。刘则向毛建议，鉴于高的背叛行为拟提前把高从莫斯科召回。毛接受了刘的这一建议。7 月 30 日高岗飞回东北。在此之前，高要求向苏方

此段参阅《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4 页。这里说，“斯大林当即表示支持”。
另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73 f., 以及资料来源的提示。
有关详细情况和资料来源见本节的下一部分。

秘密汇报某些中共领导人的反苏行为，并在晚些时候作了汇报。^①

因为这是一桩确实存在的轰动事件，所以有必要就此事，并与其他相关的和影响 1949 年斯大林与毛的关系的事一起做进一步的阐述。

高岗自 1945 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 1949 年实际上占据了所有东北党政最高领导的职务，成为当时满洲没有加冕的国王。^② 从各方面情况看，他对苏联和斯大林特别有好感，他们对高也是如此。在 1948 年下半年，斯大林与高岗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当时作为苏联专家组组长的科瓦廖夫建立的。据推测，这种联系在当时和在以后一段时期里一直保持着。^③ 至于说斯大林想利用高岗的亲善把东北变成苏联的卫星国，这实属虚构。历史见证人科瓦廖夫最近提供的材料多少有助于弄清斯大林、毛泽东和高岗之间的若明若暗的关系。

据说，在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特别欣赏高岗，并把他特殊化。^④ 关于上面已提到的、在 7 月 27 日苏中领导人共同参加的会议上出现的轰动事件，当时在场的科瓦廖夫作了如下详细的报道：

高岗建议“宣布东北为苏联的第 17 个加盟共和国”。高岗接着说，这样可以保证东北免受美国的攻击，可以把它变成可靠的根据地，来支持继续向南进军和最后打垮国民党。出于同样的考

此段叙述的情况和有关资料来源见下一段。

^② 此段参阅斯托尔贝克：《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 1945 - 1953》，关于冷战背景下苏中结盟的产生历史的研究，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第 1 部分第 136 页及下页；Boormann / Howar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 Vol. II, P. 234 f；Bartk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 P. 44。

参阅美国外交官 1949 年 8 月的报告等，见：FRUS 1949, Vol. IX, P. 957, 959f., 962 f., 引自斯托尔贝克：《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 1945 - 1953》，第 1 部分，第 133 页及下页，第 134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4 页。

虑，高岗建议把苏联舰队部署到青岛，加强大连的苏军。科瓦廖夫说，在座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只有刘少奇显得非常生气。^①

一位显然能接触中共档案的作者提供了一个略有不同的说法：当斯大林问中国客人，苏联海军能否去青岛访问，高岗抢先回答说，不仅能去访问，而且可以到山东半岛驻军。刘少奇没有作声，实际上是对高岗意见的否定。^②

斯大林立即与高岗保持距离，他把高岗比作张作霖，张是当年在共产党人眼里的最反动的满洲独裁者。会议结束后，刘指责高背叛，高则同刘顶撞起来。刘立即电告毛，要求马上召回高岗，因为他卖国。高向科瓦廖夫提出，他想秘密汇报中共领导内部情况，毛的许多同伙都有右的托洛茨基倾向。他还想报告关于中共某些领导人对联共（布）的“不真诚和反苏行为”。科瓦廖夫立即把高的谈话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承认，他当时对高岗插话的批评是过于严厉了。但他又强调说，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做，中国领导人就会错误地理解形势。斯大林禁止科瓦廖夫听取高岗的汇报，因为科瓦廖夫还必须回到中国继续工作，因此不能卷入中国领导人的内部纠纷。斯大林还说，不能让高岗马上回国，必须让他在莫斯科再停留几天。据科瓦廖夫称，斯大林后来让别人听取了高岗的汇报。^③

当时师哲是斯大林与中国代表团谈话的翻译，但他在回忆录中只字未提关于东北问题的讨论。^④ 当谈到科瓦廖夫的上述陈述

^①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1》，第 89 页。因为当时还存在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所以当时的苏联有 16 个苏维埃共和国。科瓦廖夫在另外一个地方说，高岗向斯大林倡议，东北实行自治，或与中国实行联邦的关系。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并接着说，高岗想要成为第二个张作霖。（不知这话是认真的，还是一个玩笑）但仍不得而知的是，这段对话是发生在何时、何地？参见：列多夫斯基：《高岗事件》，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内部材料，1990 年莫斯科，第 30 页。

^② 刘少奇回国后批评了高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4 页。

^③ 《科瓦廖夫，1》，第 89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7—419 页。

时，师哲说，他记不起有这样一件事。^① 由于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如果真的发生了，他是不可能忘记的。那么，这只能有一种解释：科瓦廖夫说的不是事实。在另一地方，师哲坚持这一说法，并补充说，高岗对苏联拆运东北的工业设备是不满意的。^② 高岗要向斯大林提起此事，但被刘少奇阻止了。师哲反问道，对苏联行为方式持批评态度的高岗，怎么会建议把东北变成第 17 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呢？另一方面，人们不仅要问师哲，高岗的所谓对拆运设备的态度又怎么能与他亲苏的基本态度相一致呢？而他的亲苏态度是研究界一般所公认的。

如同在其他一些地方所证实的那样，科瓦廖夫的证词是令人怀疑的，但师哲证词的可信性也不能估计过高。完全不可信的是，师哲为了证明科瓦廖夫的声音是不真实的，他竟然说科瓦廖夫根本不能证明 7 月 27 日发生了那件所谓轰动的事件，因为科瓦廖夫只是在刘与斯大林会谈时的头半个小时在场，而那时谈论的是其他问题。^③

当然这也是不可想象的：高岗会擅自提出像吞并东北这样重大的建议，而事先居然不同毛泽东、北平的党领导或代表团团长刘少奇进行商量。看来，最可信的是来源于苏联资料的另一个说法：高岗在会上只是说了这样一个想法，如果东北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党和美国就不敢进攻东北。^④ 至于青岛问题，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 7 月 27 日的会议上，斯大林向刘少奇建议，

这是师哲于 1992 年 2 月对历史学家朱瑞真说的。作者感谢朱先生提供的这一情况。另参阅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第 90 页。

此处和下两句，见同上。

师哲：《高岗曾建议将东北划归苏联吗？》见《炎黄春秋》，1993 年第 4 期，第 85 页。但斯大林办公室的来访者名单却表明，科瓦廖夫参加了 7 月 29 日和 8 月 5 日与代表团的会见。见（克里姆林官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载于《历史档案》1996 年第 5-6 期第 56 页及下页。

这是作者从朱瑞真那里得到的信息。朱于 1956 年“从一份苏联原始资料”中获得了这一消息。

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可派一个中型舰队到青岛去访问。^①刘少奇对此建议避而未答。但高岗此时却在斯大林建议的启发下作了插话。高岗可能通过与科瓦廖夫的紧密关系得知斯大林有意要苏联尽可能长时间地留驻东北。在此情况下，高岗为迎合斯大林的愿望，建议加强大连的苏联驻军。正因如此，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毛顺从了刘提前召回高岗的要求。高于 7 月 30 日在沮丧的情绪和无一代表团成员的送行下返回中国。在孔策沃别墅为高岗举行的告别招待会上，斯大林试图使刘与高和解，劝说他们为相互的友谊干杯，刘考虑到斯大林的愿望而不太情愿地这样做了。在高岗启程后不久，斯大林对刘说：他那天对高岗说得过重了，并请刘不要把他的意见转告毛。科瓦廖夫认为，毛考虑了斯大林的请求，保护了高岗，并让他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了很高的职务。^②

师哲否认高岗是因与刘发生争执和在刘的推动下被召回的，说高岗提前回国似乎是他自己在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就决定的，因为他在东北有紧急事务，不能离开太久。^③但这一说法是不大令人信服的。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与高岗和东北有关的新的使人恼火的事。1949 年 9 月，一位中国自由民主派人士（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成员）从东北访问回来，向毛泽东抱怨说：在东北看到无数的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而很难看到毛泽东的画像。据说，挂像的来由是：1948 年底一批苏联电影工作者访问沈阳，他们对看不到斯大林的画像提出了意见。随后，高岗下令

详见本节的上一部分。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1》，第 89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上卷，第 37 页；《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3 页。

参阅师哲谈话，见：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第 90 页。

立即绘制，并在东北各大城市悬挂斯大林大元帅的画像。为此，毛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高岗受到刘少奇和周恩来指责，说他把东北交给苏联，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在会议的最后，展开了对“高岗路线”的批判，并决定在全国摘掉斯大林的画像。斯大林之所以站到了毛的一边，这因为他不愿为了高岗而损害与中国党的关系。斯大林在给科瓦廖夫的一封电报中说，在画像问题上，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是对的：“这是如此起码的知识，我感到很惊讶，在这样的问题上居然会出现差错……，一般说来，在中国，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挂得越少越好。”^①斯大林也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同意毛、刘、周的路线，批判高岗的行为。政治局会议后科瓦廖夫找毛谈话，并达成了一个妥协意见：斯大林的画像应继续悬挂在：苏联军事机关，苏联居民密集的地区，中长铁路苏联专家的工作地点，中苏合营单位，中苏友好协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委员会等地。^②

当1949年12月初毛乘火车去莫斯科时，他在沈阳作了短暂停留。他愤怒地发现，政治局9月决议根本没有被执行：在所有大建筑物上都悬挂着斯大林身穿大元帅军服的画像，而没有毛泽东的画像。毛命令将高岗和林彪为斯大林70寿辰准备的一车厢礼品从他的列车上卸下来，把礼品的各一半分别送回高岗和林彪的住处，并告诉他们，他将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送礼，而东北毕竟属于中国。

1950年初，斯大林把他的密友高岗赤裸裸地交给了毛泽东，

^① 1949年10月11日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电报，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I》，第3页，没有表明档案号。

此段和以下两段参阅《科瓦廖夫，I》第89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I》，第2-6页。当时，列多夫斯基是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一等秘书。科瓦廖夫关于高岗与莫斯科的秘密联系及斯大林对高岗的出卖的报告，基本上被赫鲁晓夫和薄一波的回忆录证实。见《科瓦廖夫，I》，第92页及下页（注11）。这件事，师哲没有提及，参阅师哲：《陪同毛主席……》，第11页。

为的是以此种方式赢得毛的信任。斯大林在莫斯科把科瓦廖夫给他的报告和用密码发来的电报都交给了毛泽东。在这些文件中，科瓦廖夫严厉批评了中共领导的行为，而他的情报却大部分来自高岗的告密。斯大林还把他直接从高岗那里获得的类似内容的文件夹交给了毛。如果说迄今为止斯大林想通过与高岗的秘密接触获得关于北京领导人的情报，建立与东北的特殊关系，甚至要以高代替毛，那么，这个卷宗的交出，说明斯大林现在已放弃了这种想法，他完全站到了毛及其追随者的一边。^①

科瓦廖夫认为，斯大林的出卖决定了高岗以后的命运。毛只是考虑到斯大林及其与高岗的紧密关系，一直等到斯大林去世后才对高进行清算。列多夫斯基也认为，高的被清除主要是因为他效忠于苏联，并认为，毛在斯大林去世之前未敢“清除”苏联在东北的影响，而后来清除高岗及其他东北领导人，其目的也正是清除苏联在东北的影响。^②

迄今为止对高岗事件的专题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高岗与苏联和斯大林的联系并不是他倒台的主要原因。一个更重要的，看起来关键作用的原因是在党内诽谤刘少奇和周恩来，并试图替代刘少奇成为毛的指定继承人。1953年、1954年高岗与饶漱石一起遭到严厉的批评。1954年8月17日高岗服毒自杀。^③

从新获得的苏联档案文件中可以断定，事情还不仅仅涉及高刘之争。文件包含了高岗及其对手向尤金大使的陈述。其中，1951年高、刘关于农业政策的争论起了重要的作用。刘少奇支

^① 关于这段描述的事件和有关的资料来源见本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十一节。

^② 《科瓦廖夫，I》，第91页；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I》，第2-6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23-26页。列多夫斯基于1950年至1952年是苏联驻沈阳的总领事，他在那里与高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此段参阅 Frederick C. Teiwes: <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 . Armonk, N.Y. 1990.

持那些有可能“发展为富农”的共产党人，而高岗则极力支持中农的发展。毛袒护高，而党领导没有对此作出决定。1954年2月，刘少奇和周恩来指责高岗否定党在白区的工作及刘的作用。他们还说：高称赞军队在“解放区”的斗争，目的是突出他自己的活动；高甚至把军队干部称为是“自己的干部”，并通过宣传这种观点，要把军队置于党之上。他们还说：高批评刘少奇，纯粹出于向上爬的考虑；高以为，打倒了刘，他就能占据刘的位置。^①

10、关于“老大哥和小兄弟”的辩论

7月30日，斯大林在他的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楼楼上举行了欢送高岗的招待会^②，其间，出现了一场关于两党之间的威望问题的紧张讨论。毛的夫人江青当时在苏联疗养，她也应邀出席了这次招待会。在她为斯大林的健康祝酒之后，斯大林向在座的中国人献殷勤。他称赞中国客人的年青外观，并热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 and 青年时期，现已经过“烈火中的锻炼”变成了成熟的党。“我们两个兄弟之间的友好和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说他并不是要奉承中国客人，但他却要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他们学习。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西欧人由于骄傲，落后了。“世界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

此段参阅1951年8月初高岗与尤金在沈阳的谈话，见1951年8月4日费德林给斯大林（菲利波夫）的电报（绝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3，卷宗1，案卷4，第9-10页；1954年2月3日尤金给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电报（绝密），同上，第13-17页。

^② 这个招待会可能就是师哲说的7月27日的宴会，它实际上是在7月30日举行的。见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312 (Note 132)。

国和东亚。^①

斯大林接着说：中国和苏联应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多承担些责任，而且要实行分工合作。他建议，中国应更多地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帮助民族民主运动，苏联则更多地关心欧洲和西方。苏联在东方不能起到像中国那样的作用，犹如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苏联也许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问题方面知道得多一些，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方面值得苏联学习，以及中国人的勤劳也值得学习。^②

斯大林还进一步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符合逻辑的发展。接着，斯大林请在场的人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干杯。刘少奇令人惊讶地反驳主人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不管怎么劝说，刘就是拒不接受敬酒。^③

以上陈述基本上依据的是师哲的材料。科瓦廖夫对斯大林这段谈话也做了类似的报道，只是在某些地方语气有所不同。据他称，斯大林提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健康干杯。他还说，他讲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就，讲“苏联人民、欧洲人民应当向你们学习”，这绝对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恭维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西欧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由于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第 410 页及下页；师哲：《陪同毛主席……》，第 10 页。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2 页；师哲：《陪同毛主席……》，第 10 页；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见《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76 页及下页。

^③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4 页；师哲：《陪同毛主席……》，第 10 页 以及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第 77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3 页。

骄傲，使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已在发挥重大作用，当然你们不要骄傲。同时，落在你们肩上的责任也增大了。“你们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应尽的义务。”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方面，也许苏联人比中国共产党人强一些。但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方面，“你们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关于“老大哥与小兄弟”的争论，科瓦廖夫没有提及。^①

关于两党平等关系和欧、亚合作分工的说法，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的会议上已经讲过。当然，关于中共的发展将超过苏共“老大哥”的说法，纯属虚伪。他想的只不过是要给中国同志穿上一件制服狂暴者的紧身衣，犹如对付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一样。就连至死都效忠于斯大林的科瓦廖夫也承认，斯大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他要大家都服从，不仅南斯拉夫，而且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②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他在中国不具有统治手段，中共是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之下，出乎他预料之外地很快将取得内战的胜利。他也知道，毛泽东极力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并雄心勃勃地要把中国发展成为对亚洲都适用的中国革命模式。^③ 因此，斯大林转而向中国人献媚，并同时以此把他们引入尴尬的局面。

1957 年毛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会面时，毛对赫鲁晓夫等人说：“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 II》，第 78 页。

同上。

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猫鼠党。”后来，毛在评论这一谈话时说，苏方也承认了这一点。^①

刘少奇似乎看穿了斯大林，并不认为他的恭维话是真实的。如前所述，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理由不信任他。另一方面，迹象表明，刘和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对斯大林展示的谦虚感到很惊讶。据师哲称，在7月11日会议上，当斯大林承认他对中共犯有错误时^②，给人留下了积极的印象。无论如何，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有利的，这是斯大林自己承认的。如果有朝一日需要的话，他们可以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对付他。当然，刘坚持充当“小兄弟”的表态也不完全是真实的。鉴于即将赢得内战的胜利，中共领导的自我意识已大大增强。此外，刘坚持谦虚态度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要减少斯大林对毛要走铁托道路的疑虑。另外，也可能是他意识到作为乞求援助的角色所面临的形势。

11、最后一次会议和告别

最后一次会议是于8月5日在斯大林办公室举行的。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尔加宁、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科瓦廖夫、刘少奇、王稼祥和师哲。^③斯大林再次谈到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并特别关心专家在中国的生活条件。^④然后，他就转入中国发展战略的话题。他强调经济建设的优先地位，强调发展经济必须踏踏实实、稳步前进，不能试图超越阶段，而应循序渐

^①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中文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16页。

详见本节上一部分。

^③ 《克里姆林官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见《历史档案》1996年第5-6期第57页及下页。师哲称，这次会议是于“8月中”在小范围内举行的，时间比前几次短。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5页；以及 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P.42. 科瓦廖夫没有提及这次会议。

详见本节的下一部分。

进，否则会把国民经济搞乱。当 1958 年中苏关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进行争论时，似乎可以看到这些忠告的阴影。斯大林还指出，经济建设不仅会牵涉到物力资源，而且也涉及到现代技术、有教养的技术干部和熟练的工人。在中国必须利用和发挥旧社会留下来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如造船业、机车车辆制造业并使之现代化。此外，也要建立新的工业如航空、汽车、大型机器制造业。斯大林还建议借鉴苏联成功的榜样，聘雇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技术人员。^①

斯大林说，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是走在了前面，但蒙受的苦难和牺牲也较大：内战、外来的武装干涉、封锁、反法西斯战争等。走在前面，遇到这些困难也是难免的。鉴于形势的变化，苏联今后将承担更多的义务，特别是在国际义务方面。但这是令人高兴和令人鼓舞的。愿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取得完全的胜利，以便能与苏联一起分担这些义务。^②

在会谈中，斯大林主动谈到年初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这样做，这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刘对此保持了沉默。2 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周恩来曾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米高扬的回答更真实，但也更伤人：苏联的行为是“合乎法律的”，因为在中国只存在一个政府。苏联大使是被任命驻那里的大使，当然要随他迁往广州。^③

在离开莫斯科前夕，刘少奇应邀出席在斯大林居住的孔策沃别墅举行的告别招待会。斯大林亲自领刘观看包括花园在内的整个别墅。在接着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问，准备何时宣布成立中

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6 页及下页。

参阅同上，第 417 页及下页。这后半句话“以便能……”是师哲在加工时增加的，见 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 P.43。

这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6 页；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 P.43.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6 页。关于米高扬的回答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央政府。刘少奇说，可能是 1950 年 1 月 1 日。斯大林敦促要快一些。国民党已经瘫痪，时间已经成熟。必须注意到敌人可能利用“无政府状态”进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你们必须防止这样一种毒辣的计划。”师哲说，斯大林的这一提示引起代表团的注意，并立即向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师哲给人以印象，似乎是在斯大林这一干预的影响下，作出了于 10 月 1 日建立政府的决定。^①

估计，斯大林的提示出于两个动机。其一是他要尽快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合法的关系，这只有在成立政府之后。其二是他要利用这个机会使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以至加强对西方大国的不信任。

据师哲称，莫斯科的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② 斯大林对刘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斯大林总是根据中方的要求和愿望进行商谈。从未有过误会和不愉快。但事实上，在苏联能否为进攻台湾给予支持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明显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分歧。鉴于这种情况，怎么能说从未有过不愉快。有据可查的是，刘少奇对斯大林的态度是非常的客气的，虽然不能说是卑躬屈膝。人们可以回想起刘向斯大林所作的表示：“我准备完成您给予的任何任务。”^③

师哲有点责备地提到，在莫斯科会谈中反映出斯大林对中国的国情、风俗习惯以及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并不熟悉，他谈及的多是二十年代中国北伐时的事。不过他根据苏联的经验对中国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8 页及下页；Shi Zhe / Chen Jian: <With Mao and Stalin>, P.43 f. ；在师哲的再加工版本中，对斯大林的干预作了如此的陈述。这里的引文就是来源于那里。

此句和下两句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8 页。

^③ 1949 年 8 月 2 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4，第 1-2 页。

建设提出的建议是很有实际意义的。^①

8月初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毛要他回北平，^②王稼祥将继续留在莫斯科，以便与即将到莫斯科的刘亚楼和张学思一起参加关于建立航校和海校的谈判。此后王将于8月中下旬回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他自己希望于8月10日离开莫斯科。^③

在8月14日回国的当天，刘少奇给苏联领导发去了一封感谢信，以动人的语言感谢他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受到的“非常热情的接待和重视”，认为访问的任务得到了圆满的完成，“首先，中国将很快获得贷款和苏联专家的帮助”。在8月21日到达边界满洲里车站时，刘再次向斯大林发去了感谢电。^④

12、军事援助

在军事方面，苏联承诺支持共产党中国占领新疆，提供苏联军用飞机，以及在东北建立航校和在旅顺建立海校。苏联还宣布帮助中国建设沿海防卫，扫除上海水域的水雷。人们还就帮助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军工工业的现代化、出售高射炮和弹药以及向中国派遣教官和参谋等达成了协议。中共领导于1949年2月在西柏坡已向米高扬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⑤米高扬原则上答应在组织军备工业和派遣顾问方面提供支持。

6月27日斯大林敦促刘少奇尽快占领新疆并答应提供40架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5页及下页。

^② 1949年7月31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见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载于《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9页。

^③ 1949年8月2日刘少奇通过科瓦廖夫转交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4，第1-2页。

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第80页；《中共中央在香山》第461页。

^⑤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4，第1-2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9，第29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99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苏联飞机。7月6日刘受毛的委托，请求苏联空中支援，并宣称很快占领新疆。不久，斯大林再次允诺给予这方面的援助。^①

7月25日，毛泽东通知斯大林，他准备派刘少奇代表团的成员邓力群去新疆，以建立与北平的无线电联系。毛计划秋天拿下兰州，冬天拿下乌鲁木齐。这项行动的总负责人彭德怀问，是否可向苏联购买1000—2000辆卡车，以运送部队。毛反问彭，冬天能否开始向新疆进军，届时苏联的车辆可否通过伊犁和库利亚地区提供。毛并称，一旦得到彭的答复后，将立即转告斯大林。几天后，毛电告刘少奇，他从彭德怀处得知，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②从中国的材料来看，向新疆的进军基本上是按毛泽东对斯大林所说的计划进行的。进军的准备工作由彭德怀负责。实际上的进军时间比预定的略有提前。邓力群于8月14日按毛的指示秘密来到新疆，在苏联的帮助下负责那里的情报工作。与原计划相比，新疆于1949年年底被占领（原计划为1950年）。中苏在占领新疆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也表明他们在那里具有共同的战略，即：消除那里的西方影响。在刘少奇赴莫斯科前不久，毛泽东曾对科瓦廖夫说，如果出现一场“与帝国主义者的新战争”，他认为新疆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省，因为它将成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直接的联系走廊。^③

在另一个中国出版物中可以看到类似的陈述。据这个出版物

详见本节的上一部分。

^② 此段参阅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138页，根据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50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88页及下页；1949年毛泽东给刘少奇、王稼祥的电报，引自《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541页。

^③ 此段参阅《中共中央在香山》第460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7页及下页；见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70, 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说，斯大林向刘少奇建议，人民解放军应加速向新疆进军，以便阻止在那里出现一个由美国策划的“伊斯兰共和国”。如美国的这一计划得逞，这将给中国和苏联都带来不利。他还建议，中国应派干部到伊犁、塔城和阿山，与那里的起义者合作，牵制和削弱国民党部队。斯大林还保证在这方面给予援助。刘少奇把此消息报告北平后，中共领导作出决定，改变原定 1950 年春进军新疆的计划，决定立即派部队向西挺进，到冬季占领迪化。邓力群 8 月中从莫斯科飞往伊宁，在苏联总领事馆的协助下开展工作。为加速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苏联派出 40 架运输机空运解放军部队。^①

1 月，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感谢，感谢苏联空军的一个航空团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运送了 1 万名部队。^②不清楚的是，这里指的是否就是计划投入新疆的 40 架飞机。

中国希望在占领台湾时能从苏联得到海上和空中的支持。如前所述，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和 27 日的会议上拒绝了这一请求。在此之前，他同意供应苏联军用飞机，在莫斯科培训中国飞行员，以及派有关顾问到中国去。在 7 月 11 日的会议上，他承诺帮助在旅顺口建立海军学校和加强沿海的防务。7 月 27 日他宣布准备帮助人民解放军实现现代化和发展中国的国防工业。苏联还同意，在东北帮助建立一所空军学校。^③

7 月底，毛泽东和朱德在北平与刘亚楼一起研究与苏联商谈建立空军的问题。^④8 月 1 日刘亚楼和海军副司令张学思赴莫斯科，并与王稼祥一起同苏方商谈建立海校和航校的具体事宜。刘

此段参阅《苏联与中国革命》，第 572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8 页。详见第四章第十六节。

^③ 1949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王稼祥的电报，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541 页。

^④ 《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5 页；《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529 页。

亚楼于 8 月 11 日抵达莫斯科，两天后与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就建立中国空军问题进行了第一次会谈。^①

国民党空军空袭了长江沿江城市后，中共中央指示中国代表团敦促苏方提前供应已承诺的高射炮。它同时宣布同意在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合作下建立防空区。中央委员会还同时通知高岗，苏联提供的 360 门大炮即将运往东北。高岗和伍修权负责接收。苏联帮助建设海防是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会议上承诺的。苏联还建议派摄影人员到中国帮助拍摄人民解放军进军的前线纪录片。毛对此表示同意。在与刘少奇代表团会谈的基础上，苏联部长会议于 9 月 19 日决定，向中国共产党人提供 334 架飞机和包括 360 门高射炮在内的大炮，总价值为 1.66 亿卢布（2,650 万美元）1949 年 11 月 4 日和 12 月 19 日，以及 1950 年 1 月 7 日 部长会议又陆续作出若干个关于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的决定。^②

在现有的出版物中找不到证明，说明苏联的军事援助（全部或部分）是无偿提供的。显然，中方必须按世界市场价格支付这一切。器械和弹药的供应通过贷款支付，派遣顾问和专家的费用则向苏联有关单位支付损失费，并同时承担这些人员的生活费和工资。1950 年 2 月中，双方就 1950 年军事物资供应的支付方式达成了协议，自 1 月 1 日起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不再通过贷款

此段参阅 1949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王稼祥的电报，1949 年 7 月 31 日周恩来给刘少奇和王稼祥的电报。两封电报引自《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5 页；同上，第 459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士兵》第 407 页及下页。

此段参阅中共中央 1949 年 6 月 8 日和 8 月 11 日给刘少奇和王稼祥的电报，以及 1949 年 8 月 11 日给高岗的电报引自《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8 页及下页 以及《周恩来年谱》第一卷第 836 页；1949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138-139 页，根据原件复印件复述 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50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 89 页 库利克：《建立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952 年》（根据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载于《远东问题》1994 年第 6 期，第 75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8 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7，第 2 页。

途径支付，而通过 1950 年的易货供应来支付。^①

在提供军事援助方面，斯大林考虑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只能在东北地区公开实行。他认为，根据 1945 年 2 月 11 日的雅尔塔协定和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条约，他在东北有相当大的自由活动权利。也正因如此，他要把用于上海海域的扫雷艇在形式上卖给东北人民政府，然后由它转让给中央政府。这有点使“中央政府”难堪，似乎它还不存在。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要让扫雷艇的船员到东北港口或海参崴去接受培训，而不是在上海。他也不愿在共产党政府成立前派海军舰队到青岛去访问。^②

斯大林拒绝了中国人参观核装置的要求。^③他只给中国客人看了一个原子弹试验的电影。而这只是准备进行试验的前期纪录片，苏联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是在 1949 年 8 月 29 日。此时，中国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师哲推测，斯大林让看这部电影是为了向中国同志显示苏联的军事强大，使他们感到会得到苏联原子保护伞的庇护。影片给中国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估计苏联在发展新武器方面已实现了新的突破。^④

13、秘密情报工作方面的合作

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中苏双方在秘密情报工作的合作问题上达成了一项协议。在刘少奇和高岗启程赴莫斯科之前，他们曾向科瓦廖夫表示，他们对制订一个有关“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的统一行动计划”感兴趣。他们对此解释说：苏联情报机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案卷 237，第 125 页。

^② 此段参阅斯大林在 1949 年 6 月 27 日会议上的讲话，详见本节上一部分。

科瓦廖夫未发表的回忆录，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71。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第 409 页及下页；Thomas B. Cochran, Robert S. Norris, Oleg A. Bukharin: < Making the Russian Bomb. From Stalin to Yeltsin > . Boulder/San Francisco/Oxford 1995, P.49。

关在中国的华人工作人员，有些是中共推荐的，有些是苏联方面自己招募的。其中，许多人不受党的监督，已经腐败了，有的甚至在为美国和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高岗举例说，中共情报机关在东北发现和查抄了 300 台无线电发报机，其中 40 台本应为苏联使用的，但实际上在为国民党和美国的利益服务。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苏联情报机关与中共情报机关之间缺少联系。现在应该结束这种不受控制的状况。科瓦廖夫于 7 月 7 日把这一消息报告了斯大林。^①

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说：形势要求双方情报机关的努力应协调一致。苏联方面准备立即开始。“让我们像一个统一战线那样行动！”^② 据苏联历史见证人的报告称，在实行新的合作过程中，斯大林向中共领导公开了苏联在共产国际时期在中国建立的间谍网，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示信任的姿态。^③ 这导致数百名忠于莫斯科的中共党员被杀害和被监禁。但这在中国听到的却是非常和善的解释：所有“出于国际主义思想”而曾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过的中共党员，现在都不得不向他们的党组织公开他们的活动。他们受到了宽大的处理。^④ 可以认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曾受命刺探中共内部情况向莫斯科报告。

1950 年初，在毛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与刘少奇达成的关于情报工作的合作协议得到了批准。^⑤ 但人们可以肯定地认为，苏联特务依然继续以一定的规模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未发表的回忆录，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74, 233 f. (Doc.8)。

^② 科瓦廖夫的档案文件；科瓦廖夫未发表的回忆录；两者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74。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 Zubok / Pleshakov: <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 . P.61, 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此段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74, 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十二节。

14、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双方在经济、贸易、技术、管理、科学和文化领域达成了合作的协议。但有关的谈判和达成的协议，现在并不完全知晓。

最重要的协定是 3 亿美元的贷款协定，年息 1 厘，5 年贷完，在全部贷完后 10 年之内偿还。^① 这个协议于 6 月 30 日签字，它对外界来说是苏联与满洲之间签订的换货协定。苏联报刊的报道是：满洲以大豆、植物油、玉米、大米等，交换苏联的工业设备、汽车、石油产品、原料、药品和其他商品。^②

由于协定的文本至今没有公布和缺少其他有关信息，现在还无法确定，这种陈述是否准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协定只确定了商品结构，而没有确定数量。由于缺乏经济基础设施、缺乏原材料和专家，中方一时无法提出与贷款相联系的全部货单。他们建议把计划成立的中苏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科瓦廖夫首先陪同最重要的苏联专家来华，然后与中方一起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③

11 月底，中国领导请求苏方提供苏联的计划数据，以作为统计基础，制订供货清单。^④ 苏联外交部向政治局建议，向中国同志提供《关于 1949 年预计计划完成情况和 1950 年计划指标》的材料。12 月中，中方仍然难以向苏方提出他们对苏联货物的

详见本节的 6 月 27 日会议。

^② 《真理报》，1949 年 7 月 31 日第 3 版。

此段参阅 1949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的电报，引自《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541 页。

^④ 1949 年 11 月 26 日斯捷缅科和葛罗米柯给马林科夫的报告；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007，目录 22A，卷宗 13，案卷 198，第 34-35 页。

需求清单。^①

不清楚的是，7月30日的协议在后几个月的实际执行情况。8月初，刘少奇向米高扬提出了一个供货要求：中共中央请求，……在东北与苏联之间的商品交换中赊购30辆“胜利”牌轿车，10辆“莫斯科人”牌轿车，以及20辆大轿车。刘要求按美元报价。这些车辆是供苏联专家使用的。^②

在讨论将来的贸易方式时，斯大林建议不要按资本主义国家间的通常模式，即用现金或贷款来支付供应的商品，因为外汇问题将带来许多困难，因而建议优先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当然，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价格合理。由于中国主要提供的是农产品和原材料，而这些产品的世界价格比工业品的要低得多，因此这对中国是不利的。苏方表示将考虑中国的这一实际情况。师哲在这段陈述之后补充说，苏联后来并没有遵守这一承诺，而是利用他们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的经验，在贸易中占了中国的许多便宜。这导致了50年代的紧张关系。早在1950年初，在经济协定的谈判中就出现了关于世界市场价格的争执。^③

人们从现有材料中还看不清楚：刘少奇在莫斯科提出的许多要求中，哪些被吸收到了协议之中（除了派遣专家以外），以及这个协议的实际执行情况。^④我们知道的只是个别的苏联承诺和决议。斯大林7月11日宣称，他准备对建设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提供支持。11月5日部长会议有一个决议，同意提供

^①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谈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13页。

^② 1949年8月5日刘少奇给米高扬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500，第3-4页。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设备》，第409页；Shi Z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II > . P.79 - 81; 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载于《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9页。详见第四章第二十一节（贸易协定）。

本节的下一部分将进一步探讨此问题。

价值 3, 330 万卢布 (630 万美元) 的铁轨和附件, 这可能就是上述承诺的结果。^① 斯大林 7 月 27 日对专家代表团说, 斯大林准备帮助中国建立民用航空事业、航空工业和商船队。他还表示愿意满足中国关于建立中苏间的邮政、电讯、铁路和航空联系, 以及成立中苏合营的航空公司。^② 同样, 斯大林也答应了中国的请求: 通过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接待中国代表团和大学生来访等帮助中国发展行政管理、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工作。

在培养干部方面, 刘少奇建议“为培养国家各方面管理工作所需的干部”, 应建立一所有苏联教师执教的大学, 可先培训近千名大学生。^③ 最初, 人们想把这所学校建立在莫斯科。按毛泽东的设想, 中国学生在苏联教授帮助下学习和了解苏联体制及其与资本主义体制的不同点。后来, 人们又讨论过把这所学校设立在阿拉木图。最后, 一致的意见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把这所大学建立在北京。不清楚的是: 在苏联和满洲之间在经济技术的紧密合作方面达成了什么协议。同样不清楚的是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在科学、文化领域里达成了什么样的紧密合作与交流的协议。^④

斯大林同刘少奇在科学、文化合作方面达成的协议, 带来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 苏联的一个文化和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于 9 月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来到北京。代表团由 43 位知名人士组成, 由著名的作家、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和

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952 年》(根据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 载于《远东问题》1994 年第 6 期, 第 75 页。

^② 斯大林的这些承诺见于他在刘少奇 7 月 4 日报告上所作的批注。详见上一节关于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部分。

^③ 1949 年 7 月 6 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 45, 目录 1, 案卷 328, 第 53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7 页。

此段参阅 1949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的电报; 1949 年 8 月 7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王稼祥的电报; 两者引自《毛泽东年谱》, 第三卷第 538、541 页及下页; 同上, 第 541 页。另参阅 1949 年 7 月 6 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 45, 目录 1, 案卷 328, 第 54-55 页, 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8 页。

他的副手西蒙诺夫率领。10月初，他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在充满激情的讲话中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称之为20世纪的两次最伟大的革命。他也未忘记指出这两个国家人口潜力的不同。他说，已解放了的5亿中国人同已解放了的2亿苏联人相结合，使世界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

毛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并指出在1945年以前没有得到苏联的援助。他说，须知，中国共产党人的八年抗日战争是在毫无外援、完全依靠自立更生的情况下坚持下来的。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在同一段话里两次说到“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力更生”），即使是内战的胜利，中国人民也是以此而取得的。他接着说，今天，中国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有一个好邻居，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几个星期之后，类似的、具有双重含义的话由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吴晗在莫斯科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了：苏联“没有用大炮和机关枪”武装中国共产党人，而是给他们以列宁主义以及“最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全世界劳动者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②人们从毛和吴的讲话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混合的表露，既有对苏联的含蓄的批评，又有对自己取得成功的骄傲。^③

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建议代表团成员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以便了解战斗的实况。看来，西蒙诺夫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将他的见闻写成一部小说。后来，中国的安全头目李克农在向苏联大使介绍国民党和美国在华特务活动的情况时说，当时有20多个嫌疑分子跟踪苏联文化和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他下令逮捕了这些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设备》第426—428页。

^② 1949年11月11日《真理报》。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28页及下页。

此段和下段，同上。

嫌疑分子。^①

15、刘少奇回国和第一个苏联专家小组

从刘少奇回到北京后给斯大林的感谢信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对派遣专家是多么的重视。刘少奇在信中谈及援助计划时，惟一提及的是派遣专家与 3 亿美元贷款这两项。^②

从专家问题的提出到双方达成有关协议经历了一个过程，其简要情况是：早在 1949 年 2 月西柏坡会谈时，中共领导就多次表示希望苏联能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发展经济建设。当时，刘少奇提出了援助的三种形式，并把“派遣顾问和技术专家到各个经济部门”列为第二位。任弼时提出，派“不少于 500”名专家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此外，东北的工业开发也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周恩来还提出了派军事顾问的问题。在此之后，毛泽东与斯大林还就顾问问题有过书信的交往。^③

当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 6 月 27 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谈了贷款问题之后，就谈到了这一题目。他原则答应并宣称，“近期内”即可派出第一批专家。但他接着说，需事先就费用问题谈妥，他要求按中国最优秀专家的标准发给苏联顾问生活必需品。鉴于苏联专家的工资高，如果需要的话，苏方将给予补贴。此外，斯大林表示他个人很重视苏联专家在中国的良好表现。刘少奇在 7 月 4 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也简短地谈到了顾问问题，并一般地提出了派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请求。刘在 7 月 6 日的信中又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并请苏联在培养俄语干部方面提供帮

^① 1949 年 11 月 17 日李克农与罗申大使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2，案卷 220，第 70 页。

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第 80 页。

此段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29、37、57、58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7 页及下页，第 99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20 页。详见第三章第四节。

助。^①

8月初，毛泽东指示中国代表团，请苏联领导派“柯兄（指科瓦廖夫——作者注）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中国专家一起商定需苏联提供的必要商品。^②毛接着说：如斯大林同意，请“柯兄”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石油和军事等专家同来。同一时间，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他将于8月10日左右离开莫斯科，他希望科瓦廖夫以及一部分经挑选去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能与他同行。其余专家可与王稼祥同志一起走，预计最晚于8月底成行。^③不久，苏联部长会议作出了关于派往中国的专家工作指示。^④

在刘少奇最后一次与苏联领导会晤时，双方最终就派遣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时，斯大林提出了四个条件。其一，中国必须提供良好的住宿、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优厚的工资。其二，中国必须承担那些留在苏联的专家家属的生活费用，如果他们随同到中国，则应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其三，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视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定。最后，专家如违法则由苏联司法机关，而不是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在此之前，北平领导同意签订一个内容一般的“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

详见本节的上一部分。

此段和下段参阅1949年8月4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的电报，引自《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541页。

此段参阅1949年8月2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4，第2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58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刘少奇，II》，第93页。

^④ 1949年8月9日《关于派往中国的专家的工作指示》；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卷221，第2页。

的协定^①，并指示刘少奇，在回到东北时与高岗和李富春商定落实专家工作的计划。后来，在 1950 年 2 月谈判时，双方在专家工资问题上出现了争执。^②

按达成的协议，苏联先派“二百余名专家”来华。^③最后是 220 名，其中第一批于 8 月 14 日由科瓦廖夫带领与刘少奇一起乘火车前往中国。^④他们于 8 月 25 日到达沈阳车站时，受到了群众的热烈的欢迎。刘少奇亲自关照他们的安置。两天后，在他们下榻的宾馆里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会，高岗、科瓦廖夫和刘少奇在会上发了言。8 月 28 日，刘少奇向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人报告了他对莫斯科的访问。他强调，主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的经济和实现中国现代化。为此，必须学习如何做生意，管理财政，冶炼钢铁。苏联专家的到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中国人必须自己努力。刘少奇结束报告时说，大部分的专家留在东北，只有 30 到 40 名专家将继续前往北平。^⑤

^① 1950 年 2 月 21 日王稼祥对葛罗米柯提起过经纬这一标题的协定，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24 页。协定文本至今没有见到。一个月后，王稼祥说，这里说的是一个协议，当未变成形式上的协定；1950 年 3 月 22 日王稼祥与葛罗米柯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50 页。

^②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P.561 f., 其中援引了有关的档案文件。此段还参阅 1949 年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给刘少奇和王稼祥的电报，引自《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8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25 页。

^③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541 页。看来这一说法是以档案材料为依据的。此外 师哲也谈到 200 余名专家的问题 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25 页。

此处和下句参阅 1949 年 8 月 26 日刘少奇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引自《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63 页。这是第一份载有确切同行专家数字的文件。其他材料提到的数字都摇摆 在 80 到 250 名之间，见下一个注释。

^⑤ 此段参阅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见《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79 页及下页；《科瓦廖夫 1》，第 84 页及下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25 页 李越然：《外交舞台……》第 4—13 页。李越然当时担任科瓦廖夫和苏联专家组的翻译。师哲和科瓦廖夫所说的同行的苏联专家数目是不相符的，师哲说是 80 余名，科瓦廖夫说是 250 名。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25 页；《科瓦廖夫 1》，第 85 页。同样不准确的是师哲先前说的数字，派遣 150 名，其中 96 名随同科瓦廖夫启程 见师哲：《陪同毛主席……》第 11 页。

从 1948 年 6 月起，苏联就开始应毛泽东的请求向东北派遣专家。因此，科瓦廖夫说苏联在中国帮助发展的人已达 600 人。这实际上包括当初派往东北修复铁路和桥梁的专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据科瓦廖夫称，由于当时苏联对中长铁路享有部分所有权，派专家来修路是合法的行动，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很合适的伪装”，为的是让苏联专家能给东北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在各个领域提供建设帮助。从各种迹象看，在随后的那几年，同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约为 350 至 800 人。例如，1952 年 3 月约有 332 名顾问和教师以及 471 名技术专家在中国工作，1953 年周恩来又向莫洛托夫提出，在 277 名已派到中国的专家之外，再增派 172 名。^①

随刘少奇一同前往中国的专家都是高级经济和管理干部，以及高级工程师。鉴于中国的较低发展水平，他们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他们不久又陆续地返回了苏联，并由较低一级的专家来代替。当时，在科瓦廖夫和东北铁道兵黄副司令员之间曾发生了一次争执，科瓦廖夫以粗暴的口吻指责黄有“反苏情绪”。黄愤怒地进行了反驳。据称，这一事件后来被和平地处理了。^②

8 月 30 日，刘少奇回到北平，并向中共领导人作了访苏情况报告。^③ 9 月 3 日，刘少奇向高级干部报告了他在莫斯科会谈的情况。刘少奇在报告中热情地称颂了中苏友谊，并由此开始了直到 50 年代末的持续不断的“要学习苏联！”的内部宣传运动。刘强调，现在党的最重要任务就是重建经济。为此，我们需要苏联专家的帮助。苏中友谊是“具有决定性的条件”。中国同志必

^①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II》，第 76 页，依据的是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管文件。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25 页及下页 李越然：《外交舞台……》，第 10 页及下页。

^③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425 页；《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65 页。

须与苏联专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具体关系的一部分。这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搞好。中国必须在各方面向苏联学习，在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技术上，在法律、财政、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都要向苏联学习。特别使中国同志感动的是刘少奇报告中关于斯大林自我批评的部分。^①

8月底，30名苏联高级别的专家在科瓦廖夫和师哲的陪同下，从沈阳来到北平，在火车站受到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杨尚昆和其他领导人的欢迎。人们为苏联专家的生活作了精心的安排，有专门食堂，供应俄罗斯的饮食。到达北平后不久，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他们在中南海，连同苏联专列的乘务员一起，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9月底，中国高级领导人到顾问团总部拜访了苏联专家。科瓦廖夫在其讲话中强调，“由斯大林派来的”专家将作出“无私的援助”，这对中国革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讲话使上述说法具有一定的限制性，他说：苏联的援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互援助的具体表现。中国强大了，这也意味着是对苏联的一种支持和加强。^②

在11月7日苏联专家为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的招待会上，毛泽东在其讲话中表示，中方并不准备盲目遵循苏联的所有建议。毛说，苏联顾问刚到，还不了解中国。因此，他们应与中国同志商量，以便更好地了解一切。^③

科瓦廖夫在12月6日陪毛来莫斯科以前是苏联专家组组长。他被中国人称为“总顾问”。他的中方谈判对手是主管经济、财

^① 此段参阅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见《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80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26 页。

^② 此段参阅李越然：《外交舞台……》第 14-20 页；《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65 页。

^③ 此段参阅李越然：《外交舞台……》第 15 页。

政和重工业的高级领导干部，主要是陈云（政治局委员、4个副总理之一、中央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长）、彭真（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政法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中央委员、中央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财经委员会委员），除薄一波以外，其他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都是东北的党、政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当中只有陈云过去有过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他曾在1935年至1937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任苏联与新疆的联络员。^①

16、刘少奇出访结果

刘少奇对其出访的结果在总体上应是满意的。这是因为他感到苏联已较紧密地与新中国联系在一起了，它已成为惟一能提供安全的伙伴和援助国。鉴于中国在内战中即将取得胜利，斯大林也比较放心地在对华政策方面改换共产党的马鞍。虽然他公开宣布更换同盟者还需要等到新政府成立之后，但此时中共已实际上成为他的中国联盟伙伴。

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就中共领导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战略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样，对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也取得了共识。斯大林还表示，他将承认中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具有平等权利的伙伴。虽然他反对中共加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但他给予中共在亚洲的优先地位。^②刘少奇在莫斯科获得了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这是毛泽东在半年前在西柏坡向米高扬提出的请求和希望达到的数字。此外，斯大林还答应给予广泛的援助，包括民用和军事方面的援助。

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也在若干问题上没有取得一

^① 此段参阅同上第22页 克莱因 / 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人物传记辞典》纽约 / 伦敦出版 第1卷第150页。

致意见。斯大林拒绝了在占领台湾时提供苏联空军的支持。刘少奇使人明白，中共要把蒙古问题暂时搁置起来。关于苏联在东北的特权这一敏感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旅顺口和大连问题方面，斯大林作了善意表示，但并没有保证立即废除苏联的特权。关于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坚持了强硬的路线，这次仍然是最棘手的问题，因此没有拿到桌面上来讨论。关于缔结新条约的问题也悬而未决。双方很清楚，这后一个问题将作为一项最困难的议题留待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将要举行的会谈中去解决。

除了遗留下这些问题外，双方在相互接近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如果说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实现了第一次最高层的接触，那么，刘少奇在莫斯科的会谈确定了双方走向结盟的发展方向。一位中国历史学家说得对，随着刘少奇的莫斯科之行，苏联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①

第九节 中国对美国和英国的策略试探和苏联的角色

作者认为，中共领导在 1947 年期间就基本决定在取得政权后要力争与苏联实行战略合作。但这并不等于作者没有必要去考察那些不同的推测和有关的情况。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在较早时期就曾预测，苏联与共产党中国之间将结成战略伙伴关系。1948 年 9 月美国国务院制订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的自然资源是贫瘠的，人口增长是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的，经济发展前景很小。由此得出的结论

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见《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80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95 页。

是：既没有经济上的，也没有战略上的理由，去保护大陆中国免受苏联的统治。在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些猜测，说中国可能走独立于苏联的道路。在 1949 年 1 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出现了“亚洲铁托主义”的说法。这份报告对艾奇逊的对华政策起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政策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稳定和独立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通过灵活的政策阻止它成为“苏联的附庸”。但是当共产党人在 3 月已日益明显地将取得内战的胜利时，华盛顿方面出现了这样的设想：中国将在 20 年至 30 年内与苏联结成联盟。由此，美国必须在尚未进行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动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如：一定规模的贸易，充分利用北平与莫斯科之间及“斯大林分子和其他人”之间的裂痕。出于这种思想，艾奇逊同意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的请求，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接触。^①

如果说，上述倒向苏联的基本观点是人们从中共的战略决定上得出的，那么，共产党领导与美英在 1949 年春夏期间的接触则应被看成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与此相关的试探是在不同层次上由不同的人来进行的，他们表示愿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工业国家进行商业、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在这些人当中有：北平市长叶剑英，工业和商业部长姚依林，上海市长陈毅，以及共产党在香港代表乔冠华。^②下面要详细探讨的将是这样一些最引起猜测的接触：与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的接触，与美国驻北平的总领事的接触，以及与美国政府的接触。

关于这些接触的历史意义在西方国家曾一度展开了热烈的争

^① 详见：Mc Clothen: < Controlling the Waves > . P.135 - 143. 关于本节论述的这个题目，还可以从法索尔德：《失去的机会？1949 年美国对华政策》一文中谈到可信的、来源可靠的陈述，见：《现代史季刊》1983 年第 2 期，第 242 - 271 页。

^② 参阅 Tucker: < Pattern in the Dust.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 - 1950 > . P.48。

论，并导致这样一种假说：华盛顿曾失去了一次使共产党中国与美国和西方世界联系到一起的机会（“失去机会”学派）。^①但这一派的观点后来遭到了驳斥。

如前所述，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中共应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采取一种慎重行事的政策。斯大林不愿因中国同志的不慎重态度而陷入与美国的严重冲突。但是在东北这个被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承认为苏联势力范围的领域里，斯大林却敦促中共领导对西方实行强硬的路线。而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他劝中共领导对西方采取温和的态度。他建议建立经济接触，但他表示反对与西方国家很快建立外交关系，因为他怀疑毛泽东可能会发展成中国的铁托。

下面就具体地陈述和分析有关与司徒雷登、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和英国政府的接触过程。其中将特别要考察一下苏联所扮演的角色，这里将援引过去未公开的苏联档案文件和历史见证人的陈述。

1、黄华与司徒雷登和安德列·列多夫斯基的接触

关于 5 月 13 日至 7 月 25 日之间，司徒雷登和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与周恩来的委托人黄华的会谈，我们获得了司徒雷登给国

^① 关于“失去机会”学派，参阅 Goldste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120 f.; Sheng: < America's Lost Chance > , P.135 f.; Warren I. Cohen: < Introduction : Was there a "Lost Chance" in China? > , in: < Diplomatic History > , Vol.21, No.1, Winter 1997, P.71-75. 在此期间，多数史学家认为不存在“丢失了的机会”。持此种观点的特别是陈兼，见：Chen Jian: < The Myth of America's "Lost Chance" in China: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the Light of New Evidence > , 同上，第 77-86 页。持类似观点的作者还有：W. Garver: < Little Chance > , 同上，第 87-94 页；Michael Sheng: < 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The CCP-Moscow Relations before 1949 > , 见：同上，第 95-104 页；Odd Arne Westad: < Losses, Chances, and Myth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ino-Soviet Military Alliance, 1945-1950 > , 同上，第 105-115 页。

务院的报告和黄华的回忆录，两者反映的情况大体上是一致的。^①过去，最大的未知因素是苏联在其间扮演了什么角色。1994年首次出现了有关的第一批踪迹，1949年5月底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电报摘要公布了。电报向斯大林报告了科瓦廖夫与毛泽东的谈话，毛介绍了司徒雷登与黄华的接触的情况。从斯大林的回电中可以看出，到当时为止，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这方面没有进行协商，至少没有紧密协商。至于5月底以后，毛与斯大林是否就司徒雷登与黄华的谈话进一步交换过意见，这一点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②

不久前得知，在黄华与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会谈的整个期间，黄华与当时苏联驻南京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列多夫斯基进行了无数次会晤。会晤时，黄华详细地介绍了他与司徒雷登的会谈情况。在列多夫斯基担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时，黄华就同他结识了。1949年5月4日黄华第一次在南京拜访了列多夫斯基，那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拜访。^③

显然，促使中共方面愿意与司徒雷登接触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是，司徒雷登在“华德事件”^④的背景下通过上海的一位中间人传递了一个信息：华盛顿打算放弃对国民党友好的政策，希望中共停止反美宣传，并能以此修复友好关系。中共领导对这一友好表示是重视的。4月底南京解放后，有几个解放军战士进入

见：FRUS 1949, Vol. XIII, P. 741-802, *passim*；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见：《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1990年版第23-32页。

此段参阅1949年5月23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31，第66-69页及全文，引自齐赫文斯基：《秘密外交行动：1949年6月周恩来与美国人的非正式谈判》，载于《远东问题》，1994年第3期，第135页及下页；1949年5月26日斯大林（通过科瓦廖夫）给毛泽东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131，第73-75页及全文，引自同上，第136页。

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未公开的手稿，第12页及下页，第19-71页及全文。关于第一次会面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六节。

④ 关于“华德事件”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六节。

司徒雷登官邸，周恩来对此作出反应，对司徒雷登表示关心。4月28日毛泽东在一份内部通报中指出，如果美国和英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考虑与华盛顿和伦敦建立外交关系^①

3月10日，司徒雷登请求艾奇逊允许他同共产党领导接触，以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司徒雷登在电报中说：“我荣幸地请求，让我作为代表同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探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些问题，希望这样能够有助于双方的进一步理解……”^②

尽管司徒雷登希望华盛顿能尽快给予答复，但他一直等到4月6日才得到回音。艾奇逊以谨慎方式同意了他的建议。他授权司徒雷登与中共领导进行讨论。但会晤及其内容绝对保密。会谈情况的报告直接送艾奇逊本人。国务院有权决定是否将此事公开。^③

4月24日，共产党部队进入南京。第二天，司徒雷登给北平的周恩来发去了电报，请求在南京进行关于中美关系的会谈。^④显然，司徒雷登没有向艾奇逊报告这一行动。^⑤

周恩来自己没有来南京，但他任命黄华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处长。^⑥黄以这种身份处理对外事务，并可与司徒雷登接触。苏方把担任这一职务的黄华看做是实际上的副外长，也就是周恩来的副手。^⑦

① 参阅 Yang Kuisong: < The Soviet Factor > . P.32。

② FRUS 1949, Vol. VIII, P.173 f. . 176 f。
同上，第 230 页及下页。

④ 1949 年 5 月 10 日黄华与列多夫斯基谈话，见：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19 页。

在已公开的美国国务院文件中找不到这一时期的有关信息。参阅 FRUS 1949, Vol. VIII P.171 - 278, 723 - 742。

⑥ 此处和下句参阅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第 24 页。

⑦ 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8 页。

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英文名字：Philip Fugh）是黄华在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的同学，当时司徒雷登是教务长。5月初，傅泾波非正式地与黄华接触。5月7日黄华接待了傅泾波。据黄华称，傅首先代表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司徒雷登违背国民党的希望，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他希望能与黄华会面，并说“中美商约”可以修改，现在是“美对华政策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将比换个新人来做要更好些”。黄华回答说，会见的事需要考虑。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创痛极深。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实际，美国必须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①

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艾奇逊的报告中首先描述了黄华与傅泾波第一次会晤前的经过。报告说，傅泾波先给黄华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并留下了姓名。黄华第二天回了电话，并表示他去拜访傅不太方便，建议傅到他那里去。黄“热情地”接待了傅，并问起“老校长”。在此次和以后的几次场合下，黄都避免使用司徒雷登的官方头衔，并宣称他们如同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大使一样，也不承认司徒雷登是大使，因为他们都是在国民党政府那里被委任的。他两次强调，是美国在此期间提出倡议，要与人民民主政府建立外交关系。黄还攻击美国的外交政策，指责他们支持国民党以及他们对内战应负的责任。正因如此，中国才把美国视为“敌人”。中国人民创建的“新民主主义”不同于英美式的老民主主义。在谈到4月25日共产党士兵闯入司徒雷登卧室的事件时，

此段参阅 1949年5月11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信，见：Rea / Brewer: <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 P.322 f.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第25页及下页。

黄华递交了一封周恩来的信，信中说他对这一意外事件感到很难过。^①

据司徒雷登称，傅泾波建议黄华拜访他的“老校长”，黄表示同意，但要等一等。这次谈话是在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里的黄华办公室进行的，历时一个小时，黄对大部分谈话进行了争辩。但黄对傅的态度“很友好”，并把傅一直送到大门口，答应可给他打电话。^②

5月10日，即黄与傅会面后的第三天，黄华会见了列多夫斯基，在列多夫斯基的住所谈话中，黄介绍了他与傅泾波的接触。司徒雷登曾于4月25日打电报给周恩来，要求他来南京会晤，但没有得到回答，但司徒雷登明白，黄华到南京是与他的电报有一定关系的。^③

据列多夫斯基的记载，黄华告诉他，傅泾波的来访是受司徒雷登之托，转达他想会见黄华的意愿，以便商谈关于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并说，美国已经改变了它的对华政策。这方面的证明有：美国政府已经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他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党赴广州，而是留在了南京，等待人民解放军的进驻和新政权的创立。这对其他国家的代表机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纷纷效仿。华盛顿准备重新审议与国民党签订的1947年条约。司徒雷登要通过黄华向新的中国当局保证，承认美国在过去推行的对华政策中的错误，准备在他的余生尽一切可能致力于发展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向中国人民补偿因过去的错误而造成的损害。^④

据黄华对列多夫斯基称，他反驳说，华盛顿从罗斯福的政策

^① 1949年5月11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信，FRUS 1949, Vol. VIII, P.741 f。

^② 1949年5月11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信，同上，第742页。

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19页。

同上，第19页及下页。

上后退了，采取了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在近三年里，美国帮助国民党反对中国的民主力量。这一帮助是导致今日内战的主要原因。没有美国的积极支持，蒋介石就不敢进行战争冒险。新的中国当局没有理由相信司徒雷登的声明是真诚的，因为没有事实能表明美国的政策已经改变。关于同司徒雷登会晤的问题，他将考虑，以后给予答复。^①

黄华问列多夫斯基如何看待傅泾波访问的意义，列多夫斯基回答说，鉴于国民党的最终失败即将来临，美国为了确定其下一步的对华战略和策略，美国人要试探中共领导对美国的态度。美国战略和策略的制订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在美国的统治圈子里围绕中国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美国与西欧国家，特别是美国与英国的矛盾正在加剧。据苏联大使馆得到的情报，美国人特别对莫斯科与中共的关系感兴趣。^②

把关于 5 月 7 日黄华同傅泾波谈话的三个报告相比较，可以看出，黄华的文章与列多夫斯基转述的内容在许多重要方面是一致的。但黄华显然在列多夫斯基面前回避了这一事实：他在燕京大学学习时就与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很熟悉。这显然是为了避免形成他与司徒雷登个人很亲近的印象。相应的是列多夫斯基的纪要中没有黄华在文章中涉及的这一判断：傅泾波请求黄华给予关照，并与“老校长”一起完成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同样，列多夫斯基的纪要中也没有黄华提出的这一要求：美国必须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显然，黄华没有向列多夫斯基谈及一些情况，而这些却能表明会谈的良好气氛，以及与华盛顿取得谅解的可能性。

在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报告中缺少这样一些情况，如：司

同上，第 20 页。

② 同上，第 20 页及下页。

徒雷登向黄华承认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以及他认为对国民党的援助已经停止了，美中商约可以修改，现在是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时候了。鉴于这几点在黄华的文章和列多夫斯基的纪要中都提到了，可见傅泾波确实提出了这些。那么，为什么这些内容没有被写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报告？这要么是：傅泾波没有被委托说这些话，因此他向司徒雷登汇报时没有提及；要么，司徒雷登向傅泾波作了这方面的委托，但他知道这有点越权，因此没有向华盛顿报告。但后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司徒雷登在后来 5 月 13 日与黄华进行谈话时作了类似的声明，而他在给艾奇逊报告中也没有提及。从艾奇逊 4 月 6 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司徒雷登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授权。在这份电报中艾奇逊授权司徒雷登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会晤，讨论司徒雷登在 3 月 10 日的电报中提出的题目。^①人们可以从严厉的角度来指责司徒雷登，他提出的会谈题目具有过多的幻想成分，缺少可靠的分析，但他也只不过是建议进行一种尝试，试图说服中国共产党人同意在中国维护“自由基础”，推行“建设性的友好的对外政策”。但这些都谈不上像傅泾波说的那样，承认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以及改变美国的政策，使之向共产党中国敞开大门。

从列多夫斯基的纪要中可以发现，列多夫斯基没有向黄华提出任何建议，也没有谈及中共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这很可能是因为列多夫斯基在没有得到莫斯科的具体指示的情况下，避免提出什么劝告。^②

在 5 月 10 日黄华与列多夫斯基会晤的同一天，北平领导为黄华与司徒雷登的会晤开了绿灯，目的是“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北平指示：在会面时，黄华应多听，少说自己的意见。如

^① FRUS 1949, Vol. VIII, P.173 - 177, 230 f.
参阅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19 页。

果要说，就要明确表示：如果美国考虑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华盛顿就必须中断与国民党的关系，停止对它的援助。指示认为，黄华对傅泾波所说“美国需要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说法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在希望美国的援助，似乎美国已经做了一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而只是应当做得更多一些。此外，黄华应表明，会谈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如果司徒雷登的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也应采取适当友善的态度，但不要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黄应告诉司徒雷登，他愿意与中共保持接触和修改商务条约，中共对此表示欢迎。^①

黄华通过傅泾波约司徒雷登于 5 月 13 日在其住处进行会晤，这第一次会晤持续了两个小时。^② 至 7 月 25 日，黄华与司徒雷登之间又举行了另外两次会晤，黄华与傅泾波之间进行了多次的会面。

在 5 月 13 日的第一次会晤时讨论的问题是具有原则意义的。看来，在 6 月 6 日的会晤中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仅仅是重复过去的谈话。6 月 28 日的第三次谈话主要涉及的是司徒雷登的北平旅行计划。在此期间，黄华与列多夫斯基进行了几次会晤。关于 5 月 13 日谈话的内容，基本上在黄华和司徒雷登的报告、黄华对列多夫斯基的陈述以及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得到了反映，但不是所有问题。

据黄华称，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并希望中国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并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并愿意把存放在上海的、原打算给蒋介石的援助物资，

^① 1949 年 5 月 10 日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委并转华东局的电报，引自《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499 页及下页。

^② 1949 年 5 月 14 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见：Rea / Brewer: <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 . P.324。

如粮食和棉花，交给人民解放军。黄表示了拒绝，并宣称：如果美国不愿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司徒雷登答应转告他的政府。黄华还提出，美国如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则应首先满足如下的先决条件：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撤退一切在华的武装力量，以及承认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司徒雷登接着对黄华保证，美国愿意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已不再支持蒋介石。^①

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所通报的情况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实际上把黄与傅的两次谈话^②一併作了介绍。他说，5月初黄与司徒雷登谈话涉及到三个方面：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美国从中国撤走武装力量，以及建立联合政府。司徒雷登在谈话中保证，美国已经“停止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司徒雷登接着说，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不走，这就表明了这一点。英、法和其他大使馆也以此为榜样。美国军队驻在上海是为了保护那里的2亿美元的美国财产。一旦解放军进入那里，美军即行从上海和青岛撤走。希望吸收“尽可能广泛的民主人士”参加未来的联合政府。在得到全体人民支持的联合政府建立后，华盛顿将承认这个政府，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③

毛泽东接着说，司徒雷登的讲话与麦克阿瑟的行为相矛盾，他不久前派了两个团驻扎在青岛，并加强了驻上海的海军。要么是司徒雷登说谎，要么是军方不听国务院的。司徒雷登说美国不再支持国民党了，这也是谎言。相反：支持还在继续。此外美国大使馆和其他代表机构留下，这并不符合中共的兴趣。“如果所

^①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第26页。

^② 同上，第26页及下页。

此段和下段参阅1949年5月23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电报，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31，第66-69页，引自齐赫文斯基：《秘密外交行动：1949年6月周恩来与美国人的非正式谈判》，载于《远东问题》，1994年第3期，第135页及下页。

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离开了中国 我们将很高兴。”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些情况，但并没有向他征询建议。在给毛的回电中，斯大林声称他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使司徒雷登的看法”，并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感谢提供的“信息”。^① 斯大林没有给予建议，更没有指示。

如前所述，我们不知道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这种意见交换是否在后来还在继续，是否就黄华与司徒雷登后来的几次接触又再次交换过意见。可以进入总统档案馆的谢·齐赫文斯基说，斯大林对当时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的接触非常关注，并提出劝告。^② 他并且说毛不断向斯大林详细报告这些接触的最新情况。但可惜，齐赫文斯基没有对他的上述看法作进一步的论述。到目前为止，惟一得到的资料来源是上面援引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往来电报，但从中可以看出的是，毛既没有不断地，也没有详细地向斯大林报告，而斯大林也没有向毛泽东提出劝告。^③

关于苏联对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的态度还有另一个线索，这就是科瓦廖夫的报告。他说，在派黄华去南京的4月中旬，周恩来显然是受毛泽东的委托两次问他，如何看待这样的接触。尽管科瓦廖夫表示，这没有任何意义，但中美会谈还是在继续。与此相联系，科瓦廖夫说，中国共产党人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他们既对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感兴趣，又想不会因此而损害“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科瓦廖夫对周恩来的表态和他的评论却反映了斯大林对中国同志与美国接触的矛盾心情。他一方面劝说他们，

^① 1949年5月26日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电报，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31，第66-69，73-75页引自齐赫文斯基：《秘密外交行动……》第135页及下页。

^② 参阅1994年4月齐赫文斯基与杨奎松的谈话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作的报告，见：杨奎松：《华德事件……》载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15页。

关于这两份电报，详见本节的上三段。

应出于策略考虑进行这样的接触，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这种接触会超出莫斯科的控制，导致不愿见到的中共领导与华盛顿的接近。^①

关于 5 月 13 日会谈，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报告与黄华的报告在陈述重点上有所不同。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说，他对黄华谈到了非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感到恐惧，因为它具有颠覆性干预和武装进军的含义。但这一点，在黄华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至于司徒雷登是否真的这么说了，或是他以这种陈述来讨好华盛顿，这暂不讨论。但司徒雷登的报告提到，黄华指出由于美国帮助国民党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其他错误导致了“中国人民的怨恨”。司徒雷登把他追求的目标描述为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和平和真正民主的政府”。他在报告中还说：“黄表示很关心美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承认共产党中国”。司徒雷登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基础，但应加上“承认国际惯例和尊重条约”。司徒雷登宣称，驻中国的美军，主要是驻上海的海军是为了在动乱时期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司徒雷登在他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黄显然从未听说过这种理由，但“他显然留下了深刻印象”。司徒雷登接着对黄华说，共产党人至今还没有政府。按常规，当一个政府受到人民的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遵守国际义务，它就会得到承认。“黄阐述了中国与外国建立商业和其他关系的需要。”^②

据列多夫斯基的报告称，黄华在两天后向他叙述了 5 月 13 日与司徒雷登会晤的情况，黄华说，司徒雷登通过傅泾波请他到住处吃午饭，他拒绝了，但同意在同一地点进行非正式会晤。傅泾波也参加了这次会谈。司徒雷登在会谈一开始宣称，他的意图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 II》，第 84 页及下页。

^② FRUS 1949, Vol. VIII, P. 745 f.; 1949 年 5 月 14 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见：Rea / Brewer; <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 P. 325 f. 另参阅 Yang Kuisong; < The Soviet Dactor…… > P. 32 f.; Tucker; < Patterns…… >, P. 47, 232 (Note 27)。

是与黄商谈当前和未来的中美关系。他扼要地重复了傅泾波在 5 月 7 日对黄的谈话：他留在南京是为了与新政权建立联系，并力求巩固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黄问司徒雷登是否知道不久前发表的中共领导关于处理与外国关系的原则声明。当司徒雷登承认还没有仔细研究这个文件时，黄阐明了声明的内容，特别谈到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问题：1、遵守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2、尊重主权和中国的领土完整；3、立即从中国撤除外国武装力量；4 立即中断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和立即停止对它的援助。司徒雷登宣称对这前三点表示同意。说除了在上海的少量海军士兵以外，美国已从中国撤出了它的部队，而上海的驻军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防止可能来自国民党方面的袭击。驻在青岛的舰队已经最终离开了那里。但司徒雷登回避了关于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①

在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没有上述关于驻上海的美国部队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防止国民党袭击的声明。人们也找不到黄华所说的、司徒雷登关于华盛顿已不再支持国民党的声明。鉴于在黄华的陈述中及毛泽东 5 月 25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都有这段话，由此可以认为，司徒雷登确实说了这段话。与傅泾波与黄华 5 月 7 日会谈的报告相类似，司徒雷登在这次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不提这段话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一讲话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显然，他有意要取悦于谈话对手，这也证明司徒雷登决心要与中共进行交易，并不惜冒独自行动的风险。

6 月 3 日，中共领导指示黄华，在下次会晤时明确向司徒雷登表示，中共早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它已经逃亡，任何国家的政府不应再与它发生关系，更

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28 页及下页。

不应与它讨论对日和约问题。^①

6月6日，黄华约请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在他的外事办公室进行第二次谈话。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我们有黄华和司徒雷登的两个版本，它们基本上是一致的。

据黄华称，司徒雷登首先提出即将回美国的问题。然后，他称，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已同意把台湾交给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缔结后交还给中国。黄华反驳说，台湾历来是中国领土，而且已经归还中国。中国领导决不允许国民党政府出卖台湾，或外国政府借口和约另生枝节。关于中美关系，黄华基本上重复了他过去已说过的话：如果华盛顿要与新中国建立关系，它首先要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并停止对它的援助。司徒雷登再次指出，外国使馆留在南京就表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并宣称如国民党政府再由广州他迁，美国使馆不会随往。但现在新的中国政府还没有建立，因此也无从承认。目前中国分裂为两部分，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今天美国政府谨慎从事，不能表明支持哪一方，故采取被动态度，等待民主政府的产生。如果它证明为中国人民所拥护，并愿意和有能力强承担国际义务时，问题就自然解决。关于美国的援助（指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作者注），已所剩不多，从现在起将不会有新的援助。^②

黄华反驳说，目前美国仍然在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因此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华盛顿必须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以证明它放弃了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据黄华个人的估计，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占领了广州后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发言人李涛将军已宣布，中国反对任何美国的援助。^③

黄华对会谈的后一部分做了如下的陈述：司徒雷登试图继续

见：《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514 页，以及《种植业在香山》，第 433 页。

参阅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第 28 页。

参阅同上，第 28 页及下页。

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辩护，但论据贫乏，自相矛盾。他引用了燕京大学的校训“为真理的自由而服务”，并把中国问题与世界和平联系起来。一句话：就是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希望他的努力能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世界和平的维护。他还说，如中美关系有第三者（指苏联——作者注）出来协助可能会有好处。对此，傅泾波补充说，中美关系获得解决，可以成为改善美苏关系的跳板。黄华说，无需第三者的帮助。司徒雷登强调，对中国来说更有意义的是通过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并声称，他个人希望中国的新政府能吸收尽可能多的民主人士参加。傅泾波问，新政府究竟是先工业化，还是先共产化。黄华拒绝回答，其理由是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①

司徒雷登在他给艾奇逊的报告一开头，就谈了他对 6 月 6 日两个小时会谈的总印象：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外国，特别是美国，放弃在共产党看来注定要灭亡的国民党政府。他们并在中国主权、外交自由决定等问题上特别敏感。他对黄华重申了：新的中国政府没有建立，承认也就无从谈起。如果它建立了，美国将首先要考查，它是否真的代表中国人民，以及是否愿意和能力履行“迄今被承认的国际义务”。美国不否定中国人民有权选择他们所希望的政府。如果这个政府认为它有义务“推翻别国的政府”，这就不再是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了。许多美国人担心中共支持的暴力世界革命主义。司徒雷登敦促黄解决“在被占领领土上”的美国领事馆问题（这显然是指沈阳的“华德事件”）但无结果。联系到中国的经济恢复，司徒雷登问：他能为相互关系做些什么。对此黄“很粗鲁地”回答说，中国要自己决定其命运，不容外人干涉。中共惟一要华盛顿做的就是停止对国

参阅同上，第 29 页。

民党政府的援助和中断与它的关系。司徒雷登作出了支吾其词的回答，说某些援助的提供已被美国所延缓，对那些正在进行的供应属于华盛顿无法施加影响的事务。^①

如果把司徒雷登、傅泾波与黄华之间的会谈归纳为几个基本要点，那么，就可发现一个不可逾越的分歧。黄要求华盛顿中断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并停止对其援助，这是共产党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可放弃的先决条件。司徒雷登拒绝这样做，他指出这一事实：至今还不存在一个可以建立外交关系的共产党政府。此外，鉴于中共的世界革命的信条，未来的这一政府不能保证它遵循国际法，以及放弃推翻外国政府的意图。司徒雷登小心翼翼地以经济援助来引诱，但被黄华坚决地拒绝了。

司徒雷登强调，7月6日的谈话是坦率的，“有时甚至超出了中国礼仪”。但黄华及其助手友好地接待了他，并通过各种细微的方式表达了他们个人的友好态度”。^②

不寻常的和令人有些迷惘的是关于6月8日黄华与傅泾波会谈的报告。

司徒雷登在第二天给华盛顿的报告称，在这次谈话中，黄第一次对美国“决定性的”经济支持表示有兴趣。黄说，在中国重建方面，他的党不奉行孤立政策，并特别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苏联不会提供所需的帮助，因为苏联的期望还没有得到满足。^③

黄华在他关于6月8日与傅泾波会谈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美国援助问题。但他却专门谈到6月8日会谈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司徒雷登希望在北京与周恩来会晤。据称，傅泾波表示，司徒雷登希望在他返华盛顿之际致力于改善美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在这方面他可能获得艾奇逊和马歇尔的支持。国务秘

FRUS 1949, Vol. VIII, P. 752 f.

② 同上，第 753 页。

同上，第 773 页。

书魏伯向司徒雷登表示，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以便获知中国领导的意见。这将加强他返美活动的力量。在北平会谈这个话题之后，傅泾波又以经济援助、贷款和贸易关系相引诱。黄礼貌地拒绝了。他指出，在美国至今尚未对断绝与国民党政府关系问题作出回答的情况下，他去北平的要求将不会得到答复；此外，由于交通尚未恢复，去北方的旅行会很不便。向北平作了汇报后，黄华得知，党中央认为通过非官方联系更好些。他们得知司徒雷登每年 6 月 24 日都要回燕京大学过生日，就通过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译者注）向司徒雷登发了一封日期为 6 月 16 日的邀请信，邀请他访问燕京大学。陆在信中写到，周恩来向他表示，如司徒雷登要来北平，他可望获得当局同意。司徒雷登对这种表述感到有些不太明白，并让傅泾波于 6 月 27 日问黄华，这是否意味着是中共的一个正式邀请。据一位能接触中共档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称，党领导对此很恼火。^① 黄在回忆录中说，在他得到周恩来明确指示后，告诉司徒雷登，同意他的燕京大学之行。他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②

几乎与此同时，司徒雷登从他的一位一直还在燕京大学的老同事那里得知，毛泽东也已知道司徒雷登有兴趣来北平。“我相信政府会赞同你的。”^③

在 6 月 11 日列多夫斯基与黄华会面时，他打听黄与司徒雷登会谈的最后情况，并说“莫斯科很关心这个问题”。黄华回答的中心是关于司徒雷登想与周恩来会晤。当黄华问司徒雷登他想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 P.33。

② 此段参阅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第 29 页及下页；参阅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 P.33。

③ Yuan Ming <The Failure of Conception: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9 - 50> .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it.):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A Joint Rez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laware 1989, P.144

与周恩来谈什么问题时，司徒雷登回答说，这要看谈话时提出了什么问题。黄说，如果他没有具体问题，那他要求党领导批准他的北平旅行就有些困难了。接着，司徒雷登提出了三个问题：对中共的经济援助，中美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分署（UNRRA）继续留驻上海。黄回答说，因为华盛顿继续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和向它提供经济及其他援助，他个人认为，讨论司徒雷登提出的这些问题是不适宜的。司徒雷登为继续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援助辩解说，这是因为现在还不存在另一个中国政府，而援助问题只是在完成已承担的义务。黄说，广州将很快占领，政府随后即将成立。^①

显然，黄华基本上无误地向列多夫斯基通报了他与司徒雷登和傅泾波 6 月 6 日和 8 日的会谈情况。但他没有对列多夫斯基提起 6 月 8 日曾向傅泾波表露的所谓对美国经济援助的兴趣。如前所述，这一点在黄华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及。这里有两种假设可用来解释这一现象。一种情况是，黄华确实对美方的支持表示了兴趣，但他出于某种考虑在回忆录中以及在同列多夫斯基谈话时没有提这一点。另一种可能性是：黄华没有表示过这种兴趣，而急于想同周恩来会晤的司徒雷登，为了争取与中国领导达成谅解能有一个尽可能有利的前景，他向华盛顿作了不实的报告。

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说明第一种假设是可信的。几天前，即 5 月 31 日，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周恩来口信”。^② 他的基本论据与黄华 6 月 8 日对傅泾波所说的是同样的：苏联不能向新

^① 1949 年 6 月 11 日列多夫斯基与黄的谈话。见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47 页。列多夫斯基在他的笔记中只提到黄与司徒雷登及傅泾波的 6 月 6 日会谈。但从内容上看，它既涉及黄与司徒雷登及傅泾波 6 月 6 日的会谈，也涉及黄与傅泾波人的 6 月 8 日会谈。

^② 详见下一节。

中国提供足够的援助，因此中国领导希望能从美国方面获得援助。这里涉及的可能是两个相互协调的倡议行动。鉴于这件事迄今为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历史文献中只字未提，这就可以理解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谈 6 月 8 日对傅泾波所说的那段话。至于黄为什么没有向列多夫斯基谈这件事，这是很容易解释的，黄华与司徒雷登之间的接触被斯大林和毛泽东宣布为“领导人的事”，它应通过科瓦廖夫，而不是列多夫斯基来沟通。与 6 月 8 日黄华的友好表示和“周恩来口信”相矛盾的是：周恩来 6 月间给司徒雷登的信（收信人在第二个月才收到）基本上是一封反美的信。^① 这一矛盾现象至今不能解释。

直到 6 月 30 日，也就是傅泾波第一次向黄华谈到北平旅行的三个星期之后，司徒雷登才向华盛顿报告了此事。报告说，傅泾波于“6月初”在司徒雷登不知道的情况下问黄华，司徒雷登是否有可能像过去一样，于 6 月 24 日他生日的那天访问燕京大学。6 月 18 日黄华通过傅泾波向司徒雷登探寻，他是否可以去北平旅行。6 月 21 日，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时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他，如果司徒雷登要访问燕京大学，他将在北平受到欢迎。^②

报告还说，司徒雷登感到这是“毛和周要与他谈话的含蓄的邀请”。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提出了困难，如乘火车旅行对一个“虚弱老人”的艰辛。黄说，乘火车用不了三天就可到达北平，人们还可以把火车旅行安排得舒适一些。如果司徒雷登要乘自己的飞机前往北平，黄华认为这也可能被批准。报告还说，从黄的让步和近乎紧迫的反应上可以估计，“毛、周和黄是非常希望我作这次旅行的，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司徒雷登还对国务院

详见下一节。

^② 此段参阅 1949 年 6 月 30 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信，FRUS 1949, Vol. VIII, P. 766。

宣称，他已作好旅行的准备，并同时指出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利与弊。在利的方面，他提到：“可能将加深相互理解，同时加强中国共产党内的自由和反苏的因素”。在弊的方面，他主要谈到这种可能性：他的旅行有可能在美国舆论界受到批评，并被其他国家驻南京的使团团团长看做是对协商一致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突破。这一旅行也将大大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本人的民族声誉，这将是朝着承认共产党政府方向迈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司徒雷登留在南京）。^①

黄华在回忆录中说，他在 6 月 28 日会晤时告诉司徒雷登，他与当局会晤的愿望是有可能实现的。司徒雷登获此消息后表现“极为高兴”。黄华证实，司徒雷登提到此时去北平将引起评论，他甚至将受到批评。他将向艾奇逊报告此事，由艾奇逊作决定。^②

当黄华向列多夫斯基和参赞谢巴耶夫介绍他 6 月 27 日与傅泾波和 28 日与司徒雷登的谈话时，他的描述与他在回忆录中所作的陈述大体相同。与回忆录有所不同的是黄华提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在给司徒雷登的邀请信中说，毛泽东在与他的一次谈话中“表示愿与司徒雷登会晤”。黄在 6 月 28 日告诉司徒雷登，如果他确实打算访问北平，“民主当局将不会对他的旅行提出反对意见”。司徒雷登再次强调了愿望，但又补充说，“鉴于当前的事态”，他不得不遗憾地放弃这一旅行计划，理由是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对其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司徒雷登认为此时作这样的旅行将是不合适的。因此，他要给毛泽东提交一封书面的信件，并请黄华与傅泾波一起

同上，第 766 页及下页。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第 30 页。

去北平，把它递交给毛泽东。黄拒绝了。^①

这样一个明确拒绝旅行的表述，不仅在司徒雷登的报告中没有，在黄华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被提及。同样没有提及的是所谓司徒雷登要向毛泽东递交信件的愿望。这些不同文本中存在的差异，现在还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不清楚的还有：黄华在 7 月 11 日再次同列多夫斯基会晤时虽然谈到司徒雷登准备回美国，但只字未提艾奇逊 7 月 1 日否定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② 两个星期后，黄告诉列多夫斯基，他从傅泾波那里得到的消息，“前一段时间”司徒雷登要去北平的建议是来自乔治·马歇尔。在司徒雷登向艾奇逊询问有关意见时，艾奇逊说，他认为这一旅行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将给正在举行的国会招来麻烦。^③

司徒雷登的态度有几处是令人注目的。司徒雷登在给艾奇逊的报告中说，傅泾波 6 月 8 日向黄华提出了去北平的打算，而司徒雷登自己事先对此并不知道。不管这是否符合实际，但从事情的重要性上来看，这是不寻常的。更为不寻常的是，司徒雷登在向艾奇逊报告 6 月 8 日会晤情况时，居然没有提这一重要问题。司徒雷登在 6 月 30 日的报告中使用了“6 月初”这一模糊的表述来说明黄傅会晤的日期，这显然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这一问题是在 6 月 8 日提出的，而他却没有及时地在报告中提及这一重要之事。他在 6 月 30 日的报告中也只字未提：傅泾波在 6 月 8 日提出北平之行的理由是司徒雷登要与周恩来会晤。

在北平之行这个问题上，司徒雷登在 6 月 30 日发往华盛顿的报告中给人一种前景乐观的感觉。看来，这大体上是有道理

^① 1949 年 7 月 1 日黄华与列多夫斯基和谢巴耶夫的谈话，见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52 页及下页。

^② 详见下一节。

^③ 此段参阅 1949 年 7 月 11 日和 25 日黄华与列多夫斯基的谈话，见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第 54 页及下页，67 页及下页。

的。黄华与列多夫斯基的谈话也证实了这一点，黄说：他于6月18日与傅泾波进行了会晤，在此期间，党领导决定，如果司徒雷登再次请求到北平来，可以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但司徒雷登在于6月16日从上海返回后，一直没有再提赴北平的请求。“黄华称，他认为司徒雷登去北平对中共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党领导可以详细地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其次，这一旅行“将可能使北平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使美国人得到印象，他们可以指望与新中国建立良好的实实在在的关系”。鉴于黄华对列多夫斯基的这一陈述是在黄傅会晤后的第二天进行的，可以认为司徒雷登6月30日报告中的那段话是可信的。他在报告中说：黄已于6月18日向傅发出了信号，共产党领导对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是感兴趣的。傅当时还告诉黄，司徒雷登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接触的努力在国务院被认定是“非常积极的”。^①

黄华同列多夫斯基的这段谈话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中共领导确实要同美国大使进行谈话。而在西方的研究界一直对此持怀疑态度。

但不可避免的是，这中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6月28日，黄华对司徒雷登缓和美中关系的北平之行表示感兴趣，而在此5天之前，中方却突然中断了由“周恩来口信”开始的同美国总领事的接触。迄今为止，对这一矛盾现象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也有一种解释说，因为中共领导估计司徒雷登将来北平，那么，同总领事的秘密接触就成为多余的了。

美国方面对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持怀疑态度，或者说抱有复杂的心情。驻北平的总领事克拉布建议司徒雷登只有在“绝对保证”能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的条件下才作这次旅行。如果得不

此段参阅 1949年6月19日黄华与列多夫斯基的谈话，同上，第49页及下页。

到这种保证和未能被他们接见，这将是“对美国声誉的一次严重损害”。^①

虽然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认为司徒雷登的报告比 5 月 31 日“周恩来口信”^②更有意义，但人们却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只是试图从这次旅行当中得到尽可能多的资本。在他的电报中列举的所有的不利方面，都是有道理的”。如果司徒雷登去北平，这只会遭到美国舆论界的强烈反应。除非，司徒雷登先飞沈阳，然后带上被共产党人关押的华德领事及其夫人再飞往北平，去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这样，美国不仅在亚洲将赢得很大的面子，而且将在美国的舆论中表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是正确的。然而，这种想法对中共领导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将毁坏会谈的可能性。^④

7 月 1 日国务院作出了决定：国务卿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访问北平”，而他提出的理由却是司徒雷登在 6 月 30 日报告中所提到的。在此之前，在最高层，即同总统讨论了这份报告。毛泽东在其著名的 6 月 30 日《一边倒》文章中所持的强烈反美立场，对艾奇逊的决定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当时在华盛顿还不知道有这篇文章。^⑤显然，否定这次旅行主要是因为害怕来自议会和舆论界的批评，艾奇逊自己还担心毛和周

^① 1949 年 7 月 11 日克鲁布给艾奇逊的信，见：FRUS 1949, Vol. VIII, P. 779. 显然，克拉布此时还不知道艾奇逊已于 7 月 1 日作出了不让司徒雷登去北平的决定。

关于外交步骤，详见下一节。

这是指 1949 年 6 月 30 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见：FRUS 1949, Vol. VIII, P. 766 f.

致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凯南的备忘录，起草人远东处约翰·戴维斯，1949 年 6 月 30 日，见：FRUS 1949, Vol. VIII, P. 768 f.

参阅 Yuan Ming: <The Failure of Conception: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9 - 50,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it.):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laware 1989, P. 144. 毛泽东的文章发表于 1949 年 7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1949 年 7 月 7 日的《群众》(香港)，参阅 [日] Minoru Takeuchi 编著：《毛泽东记》第 10 卷，1971 年东京版第 307 页。

引诱司徒雷登去北平是为了让他出丑。7月2日黄华通过傅泾波得知，艾奇逊否定了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据称，中共领导对此并不感到意外。^①

对上述事态的发展有一个比较谨慎的评估，认为司徒雷登确实真心想去北平，以缓和美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即使在国务院否定之后，他根据情报仍坚信，周恩来愿意在北平与他谈话和改善关系。^② 尽管司徒雷登在前几天对毛泽东7月1日《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的发表感到震惊，因为毛在这篇文章中首次如此明确地公开宣布与苏联单独结盟，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说周恩来愿意会谈和改善关系。^③

显然，北平对司徒雷登的访问并没有抱很大期望而只是想利用此机会试探美国的意图。周恩来在内部说，不管司徒雷登来不来北平，中国共产党“对美帝国主义分子不抱任何幻想，不幻想他们会改变其政策”。必须清楚地指出，司徒雷登不是受中共邀请来北平，而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因此美国人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例子用于宣传”。^④有提示说，中共领导怀疑司徒雷登想利用他与中共的接触，在苏联和中共之间打进一个楔子。^⑤ 据说同意司徒雷登北平之行也是出于策略打算，使国民党领导气馁。^⑥

① 此段参阅 FRUS 1949, Vol. VIII, P.769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第 31 页；McClothlen: <Controlling the Waves>, P.145。

② 1949 年 7 月 14 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见：FRUS 1949, Vol. VIII, P.784。

③ 1949 年 7 月 6 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见：Rea / Brewer: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335 f. 关于 7 月 1 日的文章，参阅第三章第八节。

④ 1949 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委的电报，引自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 P.33。

同上，但没有说明资料来源。

⑥ 黄华谈话引自 Garver; <Foreign Relations……> ,P.41 及资料来源的提示。

2、周恩来的“六月传话”

在这方面还有另一个情况。周恩来在 6 月也就是在司徒雷登的旅行计划被否决之前，曾通过上海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陈铭枢向司徒雷登捎去了一封口信（以下简称六月传话），但这封口信直到 7 月 9 日司徒雷登才收到。就此事来看，它是令人沮丧的。周严词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把它与苏联的积极态度作对比。他列举了美国一些小的优点，以及苏联在一些大的事务方面的优点。说司徒雷登就其职务来说是帝国主义的代表。美国努力设法减轻其危机，因此要大量出口。美国的胃患的是过饱症，中国是饥饿症。但中国的经济前景看好。中国在许多经济领域里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将会提高，出口的可能性也很好。“总之，我们不依赖于你们，而你们却依赖于我们。尽管如此，如果司徒雷登要来北平，他很可能将与一位具有负责职务的人士会晤。^①

周恩来关于美国依赖于中国经济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情况恰恰相反：1946 年至 1948 年，中国的一半出口是销往美国的，四分之一的进口来自美国。而美国的对华出口只占美国出口总额的 5% 弱，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只占其进口总额的 2%。^② 显然，周恩来的信息很差，否则就不会持这种错误的看法和出这种笑话。

周恩来六月传话明显地反映了中共领导的基本看法，它实际

^① FRUS 1949, Vol. VIII, P. 776 - 779. 周恩来的信是通过陈铭枢传给司徒雷登的，见 FRUS 1949, Vol. VIII, P. 774. 而当时的副国务卿鲁斯克的估计是不对的，他认为周的信是直接交给司徒雷登的。新近发表的关于艾奇逊对华政策的著作也有同样的不准确的推测，见：Mc Clothlen: < Controlling the Waves >, P. 145 f., 260 (Note. 260)。同样不准确的看法是，认为 6 月 19 日至 8 月 4 日没有收到司徒雷登的任何电报，见同上。但在这一时期，司徒雷登给国务院发送了许多电报，见 FRUS, 1949, Vol. VIII, P. 449 - 466, 795 - 809。

^② 1950 年 3 月艾奇逊在旧金山的演说，引自 McClothlen: < Controlling the Waves >. P. 159。

上排除了在政治上与华盛顿的接近，即使实行了北平的会见。华盛顿在 8 月中收到这封口信后，也得出了这样的看法。至少当时的国务院高级官员保尔·尼采所作的评语就表明了这当中的因果关系。尼采认为：“在某一点上，我们认为双方已经建立了联系……但是中国共产党又给切断了。他们回绝了所有的协商。”^①

8 月 2 日，司徒雷登在未能松动美中紧张关系的情况下回国了。一位驻广州的外交官作为临时代办接替了司徒雷登的事务。^②在国务院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之际，毛泽东在月中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文章中说：“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贺的。”^③

3、中共领导的“七月传话”

与这种为公众舆论所写的论战性文章不同，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在给司徒雷登的秘密传话中说出了不同的声音。它是通过陈铭枢传递的，没有注明日期。但从内容来判断，它是基于在 7 月 7 日和 8 日与陈的谈话。这一口信是惊人的友好，赞赏罗斯福、马歇尔和华莱士对中国的友谊，强调中共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很重要。传话人表示要在解释共产党立场方面给司徒雷登以帮助。他们还尽力降低毛泽东的《一边倒》文章的意义。^④传递的口信说，这篇文章是为本党所写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 6 月 20 日的讲话^⑤，他在这篇讲话中强调愿与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尼采与 Mc Clothlen 的谈话，引自 McClothlen: < Controlling the Waves >, P.161。

^② FRUS 1949, Vol. VIII, P.705。

^③ 1949 年 8 月 19 日《人民日报》，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96 - 149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72 - 1475 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⑤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63 - 1467 页。

毛、周、叶 7 月 7 日同陈的谈话充满对美友好的声音，并称只要共产党中国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共产党的宣传将会改变。^①

可以看出，这一传话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缓和毛泽东《一边倒》文章在华盛顿引起的可怕印象。至于说准备无条件建立外交关系，这不能看做是认真的，因为这既不符合斯大林的建议，也不符合中共领导关于这一问题所发表的声明。

如同对待同一时期由陈铭枢转交的周恩来“六月信件”一样，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司徒雷登也没有把“七月传话”立即转发给华盛顿，而只是宣称待他回去后再报告。^②可能是在“六月信件”不可妥协的印象下，司徒雷登对“七月传话”没有特别重视，并确信它只是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幼稚想法，不顾很坏的政治关系，而想谋求与西方发展经济关系。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这封代传的信在 5 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在 8 月 15 日左右，司徒雷登才上交给国务院。^③华盛顿对此有何评价，不得而知。

4、“周恩来口信”

大约同司徒雷登通过黄华与北平进行接触的同时，还有另外两个看不太清楚的试探活动在进行。这是由中共向华盛顿和伦敦发出的试探，其目的基本相同。

第一个活动涉及的是一个消息。据说，这是周恩来以秘密的方式传给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副武官戴维·布雷特的。这件事在参考文献中一般被称之为“周恩来口信”。这一口信是由一位不知名的、曾与周恩来及其秘书“张”谈过话的中间人，传给了澳大利亚人合众社记者迈克尔·基翁，他又于 1949 年 5 月 31 日传给

^① FRUS 1949, Vol. VIII, P.774-776。

此处和下句参阅 1949 年 7 月月 13 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见：FRUS 1949, Vol. VIII, P.782 f。

^③ FRUS 1949, Vol. VIII, P.771 (Note 78)。

了美国副武官巴雷特。据说，周恩来请求把它传给“美国最高权威人士”以及传给“英国人”。但这必须严格保密，也不能提及周恩来的名字，否则他将予以否认。^①

当驻北平的总领事克拉布通过基翁，建议那位中间人采用一个新的渠道传递信息时，这位中间人于6月23日通知说，共产党方面不愿以这种方式传递信息。此时，克拉布认为继续这种接触已没有意义。8月15日，“张”在一次秘密会晤时建议基翁尽快离开北平。否则，薄一波将在苏联的压力下逮捕他，并以间谍罪判处长期监禁。并称，在中共领导中的特别严酷的派系斗争中，周恩来很难赢得机会。周恩来最多也只能在毛泽东的同意下，把基翁羞辱性地驱逐出境。^②

“周恩来口信”主要陈述了中共领导内部的分裂情况。据说，在中共领导内部有一个以周恩来为首的“开明派”和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激进派”。毛泽东不介入这一争吵。激进派的人要求与苏联结成目前美英之间的那种联盟。开明派则主张争取从美国及英国那里获得援助，因为苏联不可能援助。美国对中国人民是有真实兴趣的，这就可能成为“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基础”。如果毛实行其私人资本的方案，中国将长期不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周恩来口信”还说，新中国与美国之间必须迅速建立事实上的工作关系。苏联的外交政策是“丧失理智”的，它以战争作为赌注。如果美国能帮助新中国，并与它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那么，中国就可能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进行调解，协助避免战争。^③

同上，第 357、373、397、497 页。关于“周恩来措施”参阅 Tucker: < Pat-terns……> . P.48, 174 f. 233 (Note.30)。

此段采用 1949 年 6 月 24 日克拉布给艾奇逊的电报，见：FRUS 1949, Vol. VIII, P.397 f.; 1949 年 8 月 18 日克拉布给艾奇逊的电报，见同上第 496 - 498 页。

此段参阅 1949 年 7 月 1 日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布）给国务院的电报，同上，第 357 - 360 页。

与此同时，英国也获得了类似的信息。1949年8月23日，外交大臣贝文在英国议会报告说，政府“在耽搁了一段时间后”通过第三者收到了“一位共产党高级权威人士”给英国政府的重要信息。外交部后来证实，信息发送人是周恩来。信息中说，在中共内部存在着两派冲突，一派“狂热支持苏联”，另一派主张与西方建立正常关系和发展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在联合国就不一定随苏联而投票。贝文不怀疑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并得出结论说，英国必须把一只脚留在中国大门之内，能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一消息是否如“周恩来，”所请求的那样，是通过美国转给贝文的。我们只是知道，美国国务院在6月中还认为，只要“中间人的名字和来源还没有揭示出来”，就不要把它转给伦敦。^①

美国对“周恩来口信”的反应是不统一的，但都比较谨慎。北平总领事克拉布认为在铁托倾向的背景下，中共领导中存在两个派别是有可能的。但他又指出，这一消息也可能是在党领导，甚至是在苏联批准下散布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么做的目的很可能是：“在照旧吃苏联政治面包的同时，又“用美国的经济蛋糕补其不足”。在后一种情况下，美国将在经济上或政治上付出相应的代价。^②

驻广州大使馆的参赞克拉克对这一消息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一行动更多的是出于策略的，而不是战略的考虑。如果华盛顿陷入这一诡计，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走出绝望的困境，等到它强大起来后再与美国较量，那将是十分不幸的。^③

此段参阅 Barker <The British……>，P.172，根据外交部文件；1949年6月14日代理国务秘书魏伯给克拉布的电报，见：FRUS 1949, Vol.VIII, P.385。

^② 1949年6月2日克拉布给艾奇逊的电报，见同上，第363页及下页。

^③ 1949年6月6日大使馆部长级参赞克拉克给艾奇逊的电报，见：同上，第370页。

并不使人感到惊讶的是，司徒雷登以极为肯定的态度接受了这一信息。他认定在中共内部存在着一种权力之争，一方是“完全亲苏的和反美的”刘少奇，另一方是周恩来，他的口信就是一种“呼救声”。他建议作这样的回答：强调美国对中国的传统援助愿望，但附加这样的条件，即符合国际惯例地对待美国领事馆人员，特别是沈阳领事馆人员，以及停止反美宣传。^①

在华盛顿，人们对“周恩来口信”的反应具有很大的保留。杜鲁门总统决定，回答要“特别谨慎，切勿对共产党人表现出任何态度软化的迹象，而要他们通过行动来证明其想法。”^② 国务院起草的答复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美国希望建立友好关系，但只要共产党中国不停止反美宣传和释放总领事华德及其班子和两名飞行员，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建立。国务院指示克拉布，回信不要用正式信笺，也不要签名，以防止这一接触被暴露的危险。^③

接触中断后，克拉布认为“周恩来口信”的政治部分是不真诚的，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一种试图让人同情的表现，目的是促使美国同它进行贸易和提供直接的援助。^④ 与此同时，美国驻莫斯科代办科勒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和美国的援助都感兴趣。但在他们谋求更为有效的美国援助之时，并不放弃他们的正统的共产主义信念。科勒建议，先不要给予帮助，一直等到莫斯科这样做了以后。一旦苏联的援助没有结果，这时就可以指望“毛及其同伙”打算走一条独立于苏联的道路。^⑤

直到今天，在西方研究界，这场与“周恩来口信”相联系的

① 1949年6月7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见同上，第372页及下页。

② Memorandum by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Webb)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June 16, 1949, 见：同上，第388页。

③ 1949年6月14日代理国务卿魏伯给克拉布的电报，见同上，第384页及下页。

④ 1949年6月17日克拉布给艾奇逊的电报，见：同上，第398页及下页。

⑤ 1949年6月27日科勒尔给艾奇逊的电报，见：同上，第399页及下页。

辩论还在激烈进行，中心议题：是否存在过“一次丢失了的中国机会”。

直到今天也还不能证实这一口信的真实性，即它是否真的来自周恩来，也就是说，这位未公开的中间人是否真的如所说的那样与周恩来会过面。有争议的是，人们是否可以认为在中共领导中存在着两个在对苏政策上有分歧的派别。另一个问题是：这一被描绘为“周恩来口信”的戏剧性攻势是否有可能是背着斯大林进行的。

本作者过去曾认为在中共内部存在着两个派别，但今天根据对新材料的研究则认为：在新中国应执行什么外交路线这一原则问题上，中共领导是一致的。如暂不考虑“周恩来口信”及同时给英国的“口信”，那就找不到其他迹象能说明有一个亲美的“周恩来派”和一个亲苏的“刘少奇派”。^①如前已专门谈到的那样，中共领导自1947年以来执行的是一条明确的、要与苏联结成战略联盟的路线。此外，周恩来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直至他去世，一直忠实于（虽不能说：屈从于）毛泽东，因此很难认为他敢于背着毛泽东采取这样会引起轰动的行动。

在这一假设下，可信的看法是：“周恩来口信”是毛泽东与其最重要的党领导人共同完成的一个策略性花招。显然，斯大林对此并不知情。一位能进入总统档案馆的苏联历史学家查阅了斯

① 参阅 Dieter Heinzig: <From the Middle of The Road to 'Yibian dao': Changes in CCP Foreign Policy in 1949, In: Notions et Perceptions du changement en Chine.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Volume XXXVI,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Paris 1994, P.59 - 72 这一观点在西方研究界也是常见的，如：Tucker: <Patterns……> . P.46 - 48, 以及 Dick Wilson: <Zhou Enlai, A Biography> . New York 1984, P.177 f.

作者询问过的所有中国历史学家都认为中共领导曾转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从这一意义上说“周恩来措施”是真实的。但他们也都一致认为那里所说的两个派别是不存在的。师哲也曾对作者说，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支持毛在演说中所谈的问题。作者感谢朱瑞真先生，是他向作者转告的师哲的意见。

见：本书第二章第六节。

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往来电报，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线索；他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所作的调查研究也没有结果。^① 这位历史学家当时曾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他强调，他本人和大使馆以及苏联外交部当时都不知道这一行动。^② 当时的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说，他当时对此一无所知。^③ 他认为，毛泽东“不断地、详细地”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共与美国人进行接触的最新结果，但这里所说的只是与“美国大使”，即司徒雷登在南京的接触。^④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莫斯科与中共领导之间没有就“周恩来口信”进行过协调，但中共的行动完全符合米高扬与毛泽东商定的路线。如前所述，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在 1949 年初访问西柏坡时与毛泽东达成了一致意见：要安抚美国，目的是防止美国对华进行军事干预。^⑤ 如前所述，这一口信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请求美国给予经济援助^⑥，而这一点也是斯大林多次提出的，他想以此来节约苏联微弱的经济资源。斯大林真实地敦促中国同志向这个方向努力。此外，信中引人注目的是，并没有向华盛顿提出要建立外交关系，而只是说建立“事实上的工作关系”，这同样符合斯大林向中共领导所建议的政策。^⑦

显然，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口信”对华盛顿进行试探，看它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发展贸易关系以及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建立

① 1995 年 3 月 27 日列多夫斯基与作者的谈话。

② 1995 年 3 月 27 日列多夫斯基与作者的谈话；1995 年 9 月齐赫文斯基与列多夫斯基的谈话。

③ 1992 年 9 月 15 日齐赫文斯基与作者的谈话和 1995 年 9 月齐赫文斯基与列多夫斯基的谈话。与此相关，在齐赫文斯基的中国回忆录中也找不到相关的线索，见：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1992 年莫斯科版，75-79 页。

④ 1994 年 4 月齐赫文斯基与杨奎松的谈话及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报告。见：杨奎松：《华德事件》，第 115 页。

参阅本节的开头部分和第三章第四节。

⑤ 见第三章第六节

⑦ 见同上。

所谓“事实上的工作关系”也正是为实行这种援助而服务的。与此相符合的是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如前所述，黄于 6 月 8 日，也就是在此的几天前，在同司徒雷登接触时也表达了对美国援助的强烈兴趣，并认为苏联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援助。^①

中共领导抛出了一个诱饵，试图让华盛顿相信存在着一个“周恩来开明派”它要求与莫斯科保持距离并力求奉行亲美的政策。毛这样做也是迎合当时在西方政府和公众舆论中广为流传的一种愿望性的想法：在中共内部有这样的派别，毛泽东有可能发展成“中国铁托”。而蒋介石却不断警告人们不要存此幻想。^②

齐赫文斯基今天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当时注意寻找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因此，他们很愿意相信“看来是中共情报部门散布出来的‘周恩来口信’这种说法”。^③如果齐赫文斯基这里说的是情报部门单独进行的试探，那这就不是一个可信的推测，因为中共高度集中的和纪律严明的外交政策是不会允许背着毛和周恩来实施这种诡计的。^④

鉴于党领导一直不能确定美国是否还会进行偏袒国民党的干预，或对中国港口实行封锁^⑤，因此可以认为，中共有可能采取这样的试探行动，以弄清是否真有这样的意图，并试图采取缓和

^① FRUS 1949, Vol. VIII, P.377 f.

^② 1949 年 7 月 4 日蒋介石与记者的谈话，见：FRUS 1949, Vol. VIII, P.413.

^③ 齐赫文斯基：《秘密外交行动：1949 年 6 月周恩来与美国人的非正式谈判》，载于《远东问题》，1950 年第 3 期第 137 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周恩来的历史文献中没有提及“周恩来措施”参阅如：《周恩来年谱》第一卷第 828 页。据陈健对作者说，从收藏在中共档案馆的周恩来工作日历中也找不到有关的线索。齐赫文斯基的推测可能是符合实际的，按其说法，这可能是中共情报部门所为，但很难相信那是背着周恩来进行的。

^④ 南京的历史见证人和当时的中共外交政策专家史应洪于 1995 年 2 月 10 日对作者作了这样的陈述。

^⑤ 这种不确定性，如在毛泽东 1949 年 6 月 15 日的公开演说中就可以看出。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65 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但能进入中共档案馆的中国历史学家曾根据在那里找到的文件向作者证实，这是“周恩来措施”的动因之一。

姿态，以安抚美国。当然，中共领导在总体上也想知道华盛顿对新中国持什么态度。

让周恩来作为假定的寄语人，这是因为他自战争时期作为中共在重庆的代表已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威信，他被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一种开明的、有文化的、愿意谈判的代表人物。与此相一致的看法是，此时正与苏联方面进行接触的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对这“最为棘手的问题”进行试探。^①

至于突然中断与巴雷特接触的原因，这个问题现在也只能作一些推测。美国总领事三个星期之后才给予答复，这可能促使中共领导得出结论，对方将不会上钩。但领事馆建议采用另外的联系渠道，这一情况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危及保密问题。中共领导为了不冒丢脸的危險，而要求此事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来进行。从“周恩来口信”本身也可看出它的保密性，因为这也涉及寄语人周恩来的安全问题。此外党领导也担心，如果“周恩来口信”被披露，鉴于它的内容与官方的激烈反美宣传相矛盾，这就可能使党领导在公众舆论中显得不可信任。这一点与中共内部指示是相符合的，周恩来6月底就司徒雷登大使计划中的北平之行指示说：必须明确，司徒雷登是自己要来北平，而不是中共领导邀请他来的，否则美国方面就会把它当作“一个宣传的例子”而加以利用。^②

此外，中共领导对新渠道会导致泄密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按克拉布的要求通过新的渠道进行接触将可能出现被莫斯科获悉的可能性。

这里须要指出的是：5月31日的“周恩来口信”和黄华6月8日给傅泾波的信发出的是类似的信号，但两者与“周恩来6月

科瓦廖夫就是这么认为的，见《科瓦廖夫，II》，第84页。

^② 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委的电报，引自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P.33。

信件”在内容上是矛盾的。前两者的出发点是向华盛顿提出合作的要求，而后者是要与美国保持距离。迄今为止还没有材料能解释这一矛盾。

5、7月1日转折点

1949年7月1日对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三角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在这一天，毛泽东在其《一边倒》文章中最为明确地宣告了自1947年以来已经开始的路线：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令人惊讶的巧合是：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不知道毛发表文章的情况下指示司徒雷登大使，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访问北平，不要与中共领导进行接触。在此之前，对共产党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来说，曾出现了要从长期对抗的道路上软化下来的迹象，这不仅在华盛顿方面有明显的表现，在中共领导方面也伸出了触角，如前所述，7月初曾给司徒雷登大使秘密地传过话。^①

自这时起，即自7月开始，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为，双方关系日益恶化。7月初，上海警察在大街上殴打和逮捕了年轻的美国副领事，并在监狱里以很糟糕的方式对待他。“他再也没有从这件事中恢复过来。”南京当局禁止司徒雷登外出旅行，直至8月初。从那以后，南京当局也不再愿意与美国外交官保持非官方的关系。10月底，华德领事同他的几个官员被捕。这些美国人在监狱里遭到了殴打、挨饿和受冻。艾奇逊指示北平的领事克拉布，与周恩来或其他高级干部就此进行会谈。但共产党方面拒绝与克拉布进行任何接触。在香港所作的努力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司徒雷登大使虽然对黄华谈了此问题，但仍然碰了壁。杜鲁门想施加压力，对中国沿海实行煤炭禁运，必要时进行沉船。

^① FRUS 1949, Vol. VIII, P.774-776。

艾奇逊及其参谋部劝阻了他。11月21日对华德和其他被捕人员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审讯，并被判处数月的监禁。最后于12月21日，华德和其他领事馆工作人员被驱逐出中国。^①

如前所述，苏联的压力在“华德事件”中是比较明显的，但在这次中国的反美强硬态度中，苏联没有起重要的作用。^②

把中共同美国的接触与中共同苏联的联系相比较，就可发现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别。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不断地，有时甚至每天都要通过电报进行磋商，而同华盛顿的交流只是通过中共干部同美国外交官之间为数不多的非正式会谈来实现的，它偶尔也通过第三者传递消息来加以补充。

在1949年下半年，华盛顿已习惯于把共产党中国同苏联之间出现的紧密和单独的联结看做是既成事实，即使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原驻华外交官的观点日益在美国政府中占了上风，认为美国应当耐心地等待，直到中国人对苏联感到厌烦了：“让中国从经验中得知，苏联是不会给予什么帮助的，苏联的友谊从来就是单方面的，中国从这种结合中失去的将比得到的要多得多，只要它是苏联的卫星国就不可能从美国得到援助。”^③

1949年12月底，杜鲁门、艾奇逊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亚洲政策原则的文件，它根据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的

此段参阅1949年6月8日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见：FRUS 1949, Vol. VIII, P.753; 1949年8月15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顾问琼斯给艾奇逊的电报，见：同上，第814页及下页；Mc Glothlen: < Controlling the Waves >, P.147-152; Chen Jian: < The Ward Case >, P.161 f. 官员“华德事件”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六节。

② 见同上。

③ 1949年9月5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琼斯给艾奇逊的电报，见：FRUS 1949, Vol. VIII, P.520. 此段还参阅法索尔德：《错过的机会？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载于《现代史季刊》，1983年第2期，第257-259页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显然，国务卿艾奇逊主要受南京代理大使约翰·琼斯以及上海总领事约翰·卡伯特的影响，同上第258页及下页。

经验而确认：只要在此期间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就将“继续承认中国国民政府”，“避免承认中国共产党当局”。大多数国家附和了这一政策。只有印度、巴基斯坦和英国等几个国家是例外。伦敦于 1950 年 1 月 6 日承认了北京。

自 1950 年 1 月中国当局强行占领了美国在北京的兵营之后，至 4 月，美国关闭了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外交机构。^②至此，美国争取同共产党中国对话的努力终于结束了。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使北京同华盛顿的关系降到了新的低点。“红色中国”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不仅在政府这个层次上展开，而且在两国的公众舆论中，在意识形态中导致了深刻的分离。

6、结论：不存在“一次失去了的中国机会”

对 1949 年中共同美国关系的分析表明，中国领导在 1949 年 5 月、6 月和 7 月在南京和北平对美国进行的试探是策略性的，只是为了安抚美国，使经济援助的大门敞开，以及进一步探明美国的意图。但中国领导并非要走“第三条道路”，更不是要转向亲美的方向。诚然，这一小心翼翼的试探不得 not 走向失败，因为这一努力被共产党方面的激烈反美宣传所抵消，被他们在处理美国外交官事件中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所打乱。

尽管当时双方都相互有所关注，但这些努力却被不可调和的价值观冲突所笼罩：一方面是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要求解放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民族主义”不能理解，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的”人权准则以及外交豁免权“华德事件”缺乏认识，他们对美国大国意识的蔑视也起了很大的伤害作用。与此相

① 此段参阅 Mc Glothlen: < Controlling the Waves > . P. 153.

② 同上,第 154 页。

联系，陈兼谈到了双方的“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①但这一估计并没有完全击中要害，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人期望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而这与中国的中心主义没有共同之处，它在价值观上也不同于美国的以“法治”等为主要内容的救世主义，而美国的这种价值观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是一致的。双方立场的不可调和性也特别清楚地反映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 7 月初给司徒雷登的秘密传话之中。^②寄语人向司徒雷登提出，一旦建立了外交关系，反美宣传即可停止。而华盛顿则认为，顺序应颠倒过来：先停止反美宣传和尊重国际法（在对待美国外交官等方面），然后才是建立外交关系。

不能说那是“一次失去了的机会”。相反，美国外交界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早在 1949 年 3 月就已决定，同苏联实行战略合作。但他们还认为：在经过一个中长时期之后，中苏合作将走向失败。

回过头来看，这里有两点被证明是惊人的：一是冷静沉着，杜鲁门总统班子对已出现的发展情况采取了暂时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二是预测的准确性，自 1949 年 3 月美国高层机构，如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总统也参加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所作出的有据可查的预测均认为，大约需要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华盛顿才能重新执行一项有效的和积极的对华政策。^③

参阅 Chen Jian: <The Ward Case>, P.167。

② FRUS 1949, Vol.VIII, P.776。

参阅法索尔德：《错过的机会？1949 年美国对华政策》，载于《现代史季刊》，1983 年第 2 期，第 243 页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Mc Glothlen: <Controlling the Waves>, P.138 f.，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第十节 建立外交关系：与苏联大使发生的问题

10月1日，毛泽东作为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天安门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步骤原定要在晚一些时候才实行，可能是1950年1月1日。8月中，斯大林建议刘少奇，不要错过时机，以防止“敌人”（显然是指美国）可能实行“恶魔计划”利用中国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预。很可能是斯大林提出的理由导致了政府的提前建立。^①

10月1日周恩来作为外交部长向苏联以及所有外国政府提出了建交的愿望。第二天，葛罗米柯副外长受苏联政府的委托通知周恩来：苏联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②正如周恩来在给葛罗米柯的感谢电中所说，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③

为此，斯大林曾做了安排，不让东欧卫星国在苏联之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代办曾就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向苏联领导征询意见，葛罗米柯建议斯大林：在给周恩来的照会发表后再给捷克（肯定的）答复。^④看来，斯大林接受了葛罗米柯的建议，从而使得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于10月3日才宣布承认北京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9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② 1949年10月2日葛罗米柯给周恩来的电报，《真理报》，1949年10月3日。

③ 1949年10月3日周恩来给葛罗米柯的电报，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A，案卷198，第5页；《人民日报》，1949年10月4日引自《苏中关系1917—1957年——文件汇编》1959年莫斯科版，第216页。

④ 1949年10月2日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A，案卷198，第1—2页。

政府。^①

10月2日，葛罗米柯发表了一项声明，称苏联政府同国民党中国的关系结束了。声明说，“阎锡山先生的政府”已经不再对这个国家拥有权力，而变成了一个“广东的省政府”。^②葛罗米柯还同时向斯大林提出建议，请求英国政府代为保护苏联在广东的财产。^③

显然，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给毛泽东发一封祝贺信，而在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他却以个人的名义给东德的总统发去了贺信。毛泽东向苏联大使罗申表示，他已注意到了这一冷落。^④罗申向莫斯科报告说，毛泽东“对此很在意”。在苏联报刊上，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被看做是战后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事件。由于没有得到斯大林的相应指示，科瓦廖夫没有出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举行的宴会。^⑤这对毛泽东来说，是又一次的伤害。

10月3日周恩来给葛罗米柯的感谢电没有在苏联报刊上发表，这也使北平感到不舒服。虽然葛罗米柯曾建议在10月4日中央各大报的头版全文发表这封电报，但斯大林仍作出了不发表的决定。^⑥代替它的是由塔斯社先发表一条简短的消息。^⑦接着

参阅 Wu: <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 P.330。

^② 《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1959年莫斯科版，第215页。

^③ 1949年10月3日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A，案卷198，第27-28页。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与罗申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案卷220，第50页。

^⑤ 《科瓦廖夫回忆录》，为发表的手稿，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313 f. (Note.3)。

^⑥ 1949年10月3日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A，案卷198，第1-2页。

^⑦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档案文件，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A，案卷198，第6-10页。

又补充了一条关于两个大使被任命的报导。塔斯社的消息最后出现在 10 月 5 日《真理报》的第二版上。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压低此事的重要意义。

斯大林的这种轻视态度明显地反映了他的不满，或者说他的一种矛盾心态。这也是他早就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任性和自负的不满，也是他对毛这样的领袖所统治的共产党中国所产生的矛盾心态。斯大林还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的轻视。当时，在《真理报》的第一版右边曾开辟了一个专栏，专门报导来自“兄弟国家”的消息。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个多月之后，这个新的、仅次于苏联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获得荣誉，第一次在这个专栏的末尾部分出现，而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却经常在那里被谈到。这一点，北京是不会没有注意到的。^①

关于新中国的国际承认问题，当时的美国政府表明，它将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而是要等待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相反，英国和印度却对承认新中国表示了较大的兴趣。^②

苏联在宣布承认新中国后，过渡性地任命曾担任过苏联驻北平总领事的谢尔盖伊·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北京的临时代办。他在 10 月 5 日出席了“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大会。刘少奇担任大会主席，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友协的成立被称之为伟大的事件。刘少奇是友协的第一任主席，宋庆龄后来接

此段参阅 1949 年 10 月 2 日至 11 月 25 日《真理报》。中国第一次在《真报》这一栏目的出现是 1949 年 11 月 23 日，而且是出现在一条含糊不清的关于出席“亚洲太平洋国家工会会议”和“亚洲国家妇女代表大会”的朝鲜代表到达北京的消息之中。

此段参阅 1949 年 10 月 4 日美国国务院声明，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 1979 - 注释年表》，1980 年东柏林版，第 50 页；Yuan Ming: < The Failure of Conception: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5 - 50 >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 <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laware 1989, P.145.

替了这一职位。^①

10月5日斯大林决定派尼古拉伊·罗申去北京担任第一任大使，这给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刚刚建立的外交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②当齐赫文斯基在中南海的党和政府所在地向周恩来征求对任命罗申大使的意见时，“他（周恩来）的脸上当即反映出对斯大林这一决定的失望情绪”。^③周请齐赫文斯基等一等，并走向附近的毛泽东办公室。一刻钟后，他回来了，并告诉齐赫文斯基，中国政府将同意这项任命。^④

中国领导确实有很多理由对这项任命表示不满。罗申此人是惟一顺从国民党政府的建议迁往广州的驻南京大使，并于1949年2月5日正式在广州上任，而此事显然没有同中共领导进行过协商。^⑤罗申作为苏联的代表一直留在广州，直至最后一天，即1949年9月30日。如果苏联方面通过更换大使来表示对中国革命变革的赞赏，那么，毛泽东肯定是乐意的。其次，中共领导不信任的另一个理由是，原名拉楚莫夫斯基的罗申长期以来为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格贝乌）工作。1943年至1948年，他作为少将军衔的武官在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工作。1948年，他被任命为苏联驻国民党中国的大使。再其次，罗申在苏联党内没有担任过什么高级职务，按中国的看法，担任如此重要的大使职务必须是党内的高级干部。^⑥

此段参阅1949年10月7日《真理报》；《刘少奇年谱》第二卷第228页及下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略》第一卷第一部分，1994年长春版，第60页及下页；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1992年莫斯科版，第85页及下页；《我们的朋友中国——手册》，1959年莫斯科版，第212页。

Wu: <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 . P.330.

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第86页。

④ 1995年3月24日齐赫文斯基与作者的谈话；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第86页。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⑥ 此段参阅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第87页；FRUS 1949, Vol.VIII, P.24；以及因为不愿透露姓名的俄罗斯历史见证人的陈述。

罗申到达北京时，毛泽东让周恩来欢迎他，而没有安排其他礼宾仪式，毛以此表示了他的反感。罗申在北京当大使期间，毛泽东一直没有理会他。毛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曾试图要求撤换，但是没有结果。外长维辛斯基作出反应说：“是苏共政治局，而不是毛泽东决定谁是驻北京大使的合适人选。”^①

10月16日，身着外交礼服的罗申在中南海政府所在地的大厅里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当时在场的有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外交部长周恩来。整个礼仪过程是按照齐赫文斯基向没有经验的中国外交部所建议的那样进行的。接着，进行了有周恩来和参赞齐赫文斯基参加的谈话，毛泽东在简短的讲话中赞扬了这一事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并很快派来了大使。他表示深信中苏友谊会不断发展和巩固，双方的合作将日益紧密，这将有利于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他举杯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并表示深信，“未来中苏之间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将被两国政府本着真诚友好的精神而得到解决”。^②毛还回忆他1945年在重庆同罗申的第一次会面。这具有多种的含义。当时，毛泽东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到那里去同蒋介石进行谈判的。^③罗申祝贺毛拿下了广东，并为他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而干杯。最后，举行了宴会，但由于技术原因而使人感到有些扫兴。^④

10月20日，毛泽东告诉斯大林，他决定派王稼祥去莫斯科

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第87页；列多夫斯基和科瓦寥夫的谈话，引自Goncharov/Lewis/Xue：<Uncertain Partners……>，p.314（Note.22）。

^② 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47，目录22，案卷202，第49页。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此段参阅1949年12月16日罗申的描述，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47，目录22，案卷220，第48-51页；毛泽东讲话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71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1页；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第87页及下页。

担任大使。王同时负责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关系，以及作为中共的代表负责同苏共的接触。^①显然，毛以此向斯大林发出信号，他已决定结束迄今为止的外交和党之间的双重轨道的联系。从各种迹象来看，他同时表明，共产党中国将努力像一个主权国家那样行事，而不再准备通过党的渠道按共产国际或情报局的方式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早在2月初毛泽东就已在西柏坡向米高扬表示了要派王稼祥当未来驻苏大使的意图。米高扬对此没有提出异议。^②

斯大林没有重视北京的这个信号，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而没有按毛的意图来做。引人注目的是，王稼祥到达莫斯科后扮演的是一个外交官，而不是党的代表。他把周恩来的信转交给了苏联外交部，然后由葛罗米柯与斯大林进行内部协调。^③此外，党这一层的接触，和以往一样仍继续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交往依然通过科瓦廖夫，或者直接进行。^④

王稼祥与罗申不同，他在党和国家中都具有很高的职位，他是中共中央委员和外交部副部长，因此他具备了担任双重职务的条件。10月底，王稼祥到达莫斯科，11月3日递交了任命大使的国书。王稼祥曾于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会说俄语。他与王明、博古和洛甫一起属于“28个布尔什维克”知名人士。他们于1930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领导下回到了中国，这些

^① 1995年10月2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81页。

^② 1949年2月4日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卷宗39，第57-58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97页及下页。

如见：1949年11月12日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A，案卷198，第29-31页。

^④ 1949年11月9日毛泽东给王稼祥的电报和1949年11月12日和2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131、135、148页。

忠于莫斯科的同志接替了当时由李立三领导的中共领导。^①

当毛泽东在西柏坡向米高扬宣布他将派王稼祥去莫斯科当大使的意图时，他以共产党的习惯用语补充说，王稼祥过去曾“与王明集团一起犯过一些错误”。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在 30 年代共产国际同中共的争论中，王是忠于莫斯科的。毛接着又说，但王在 1937 年 7 月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中国，这些指示与中共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并帮助党克服了错误。^②

11 月 7 日俄罗斯十月革命三十三周年之际，苏联大使馆在其东交民巷的大楼里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携夫人参加了招待会。^③正式的合作开始了，前景广阔，并具有善意。刘少奇作为友好协会的主席请罗申提供各种需要的信息材料，让最好的教授和专家就中国发展问题作报告。^④苏联外交部应周恩来的请求，宣布让那些准备派往国外工作的、而又缺乏相关知识的中国人到莫斯科来学习外交史和外交实践。^⑤

第十一节 毛泽东访苏前出现的麻烦

新的麻烦与 1949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工会代表会议”相关。如同上一次围绕沈阳

同上，第 81 页；Klein / Clark: < Biographic Dictionary >, Vol. II, P. 898; Chang kuo - t'ao: < The Rise II >, P. 592; <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 P. 357. 齐赫文斯基错误地认为，王稼祥当时属于政治局。见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第 87 页。

^② 此段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卷宗 39，第 57-58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97 页及下页。

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第 88 页。

^④ 1949 年 10 月 25 日刘少奇与罗申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2，案卷 220，第 16 页。

^⑤ 1949 年 11 月 12 日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2A，案卷 198，第 29-31 页。

“悬挂肖像”的争吵^①一样，斯大林这次也向中方作了让步，为的是在毛泽东来莫斯科会晤之前不要增加不必要的负担。这次代表会议是由苏联控制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召开的。世界工联是在 1945 年 10 月在巴黎成立，1920 年以来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红色工会国际”的后续组织。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包括苏联在内的 13 个亚洲国家的 117 名代表。^②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在北京召开这样一次工会代表会议，他们同样也反对召开由苏联控制的世界民主妇联的“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

1949 年 2 月，中国领导曾向这两个组织表明了他们的拒绝态度。但它们不顾中国的意见仍然决定于年底在北平召开这两个会议。刘少奇后来对中国的拒绝态度作了如下的解释：当时，北平还不在共产党人的手中，中国的工会和妇女运动还处在开始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举行非公开会议。公开会议将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分子加强对亚洲工会和妇女运动的镇压。此外，会议的所有决议都必须保密，因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要宣布对帝国主义分子，“亚洲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进行武装斗争。^③

科瓦廖夫在 1949 年 12 月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认为，刘少奇和李立三之所以要反对来自日本和印度等“英美集团”或与其结盟的国家的工会代表出席大会，为的是不愿刺激美国和英国。^④科瓦廖夫认为这是一种绥靖政策的表现，目的就是要取得伦敦和华盛顿的承认。但科瓦廖夫的这一判断无法从其他现有资料来源中得到证实。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参阅《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第 29 期，1949 年 11 月 29 日。

^③ 1949 年 12 月 25 日刘少奇与苏联大使馆代办谢巴耶夫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 案卷 10，第 18-19 页。

此处和下句参阅《科瓦廖夫，II》，第 83 页。

在北京的工会代表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富有战斗性的讲话。他在开幕词中把代表会议的主要目的说成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实现亚澳国家民族独立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必须是在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实行由“正规革命军”进行的“武装斗争”。他多次地，几乎是喋喋不休地建议具有类似中国条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应把中国所走的道路作为达到此目的的主要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整个报告的中心内容就是推荐武装斗争和“中国经验”。报告根本未提斯大林，苏联也只提到一次，这是在谈到站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斗争一边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和平与民主力量”时，苏联是作为这种力量之一而被提到的。^①

由苏联工会联合会书记列奥尼德·索罗伏耶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对刘少奇的报告持否定态度，并把它批判为“极左”。索罗伏耶夫还以其思想影响了一些其他的外国代表。他们表示反对刘少奇的建议，主要是反对“武装斗争”的思想。苏联的路线是：只能在那些正在努力摆脱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武装斗争。而在印度、缅甸和印尼这样一些已经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莫斯科则努力与这些国家的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在国际政治中把它们拉到苏联一边。^②

刘不接受亲苏派的批评。他认为，批评者虽然对欧洲的情况比较熟悉，但它们对亚洲国家的特点只有“微薄的印象”。只要在那里不摧毁帝国主义的势力，就谈不上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争取社会保障和“其他民主自由”的斗争。刘少奇说，批评者害怕承认武装斗争，是因为这将有损于他们在巴黎和其他国家的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建议亚洲的劳动者，向联合

见 1950 年 1 月 4 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演说文本。

② 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I》，第 7 页及下页。

国控诉他们的无权处境和生活艰难。^①

在索罗伏耶夫的影响下，出席会议的执委会委员建议刘少奇放弃发表他的演说。刘开始时不同意，但后来违背其信念地屈从了多数人的意见。^②

斯大林在两周前就通过科瓦廖夫得到了刘少奇的讲稿。斯大林曾向刘少奇提出建议，成立一个亚洲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但毛泽东一直忽视这一建议。科瓦廖夫对此感到很愤慨。他在向斯大林报送刘少奇讲稿时，在其附上的信件中评论说，刘少奇的讲稿是一个清楚的证据，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谋求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据科瓦廖夫称，斯大林同样也对这一演说不同意，并把它看做是一种“左倾”的表现。但斯大林为了不影他同毛泽东的关系，保留了他的态度。相反，他在 11 月 20 日由科瓦廖夫转告的电报中批评了索罗伏耶夫的态度，说他是“虚伪者”。斯大林说，索罗伏耶夫反对发表刘少奇的演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他（斯大林）却认为这一演说是“正确的和合乎时宜的”。斯大林指示索罗伏耶夫，立即同意发表这一演说，并把他的电报全文告诉毛泽东。索罗伏耶夫按命令做了，并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这时，毛泽东请求斯大林不要责怪索罗伏耶夫，说他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害。科瓦廖夫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中称，这件事证明了斯大林为确保毛泽东对他的忠诚，不惜牺牲一个忠实的同盟者，如同这年夏天在莫斯科牺牲高岗一样。^③

刘少奇后来说，同意发表他的演说，这在世界工联的干部和中国同志之间重新建立了“正常的实际的工作关系”。这篇演说

^① 1949 年 12 月 25 日刘少奇与苏联代办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10，第 19-21 页。

同上，第 19-20 页。

^③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II》，第 80、90 页及下页（注 3）；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I》，第 9 页；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 p.78。

被刊登在中国的报刊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杂志上，但在苏联的发表却推迟了一段时间。虽然刘少奇早就向苏联方面提供了讲稿的全文和译文，但莫斯科于 12 月底要求刘提供第二稿，即一份“经审核的”和“经认证的”译文。这篇演说直到 1950 年 1 月 4 日，即近乎两个月之后，才作为一种“友好的姿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间恰好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取得突破之时。^②

在工会代表会议行将结束时，又出现了新的争吵。刘少奇坚决反对由执行委员会起草的决议。他认为，这个决议是“没有牙齿的”，因为它没有号召亚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为此，刘少奇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中心是要求工会应开展这样的斗争：在已经存在民族解放军的国家，应加强它；在没有这种军队的国家，应创建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特别是总书记路易·赛扬表示确信：如果通过这样的决议，他们就只能立即收拾行李，离开巴黎，移居到莫斯科去，因为要继续留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作，那将是不再可能了。再者，人们也不能这样做：一方面让自己和平地待在巴黎、伦敦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城市里，而另一方面又号召印尼、缅甸等其他国家的人民开展武装斗争。^③

刘少奇说，中国同志最后被迫同意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但不是因为完全同意它，而是因为它没有包含“原则性的错误”。但他们认为，这个决议是一个不好的决议，是一个“不能

^① 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I》，第 9 页。

此段参阅 1949 年 12 月 25 日刘少奇与苏联代办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10，第 18-21 页；《科瓦廖夫，II》，第 80、90 页及下页（注 3）；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I》，第 9 页及下页；《真理报》，1950 年 1 月 4 日。

^③ 参阅 1949 年 12 月 25 日刘少奇与苏联代办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10，第 21-23 页。

给亚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决议”。^①

据刘少奇称，中国代表在会议结束时还同意了另一个他们原先并不赞成的决议：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他们之所以同意这个决议，是因为人们承认他们作为熟悉亚洲国家情况的人员而在这一机构中拥有领导的地位。人们还达成一致意见：这个局必须“绝对秘密地”工作，以便保护亚洲工会运动的干部不受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迫害。^②

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也出现了分歧。与执行委员会中的法国委员的意见不同，中国方面认为：亚洲的妇女工作与工会工作一样应秘密进行，否则将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破坏。他们反对执委会的要求：在决议中号召开展合法斗争，以争取禁用童工、保护妇女劳动、实现社会保障和免费受教育等。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幻想的和不现实的”要求，因为在亚洲，取消童工将注定要使上百万的儿童挨饿、受穷。为此，决议应号召妇女在亚洲国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支持人民解放军，参加各种形式的地下斗争。与此相联系，中国方面还批评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说它重复了世界工联的错误。它们都表现出“对亚洲国家的特殊条件的无知”，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③

中国代表邓颖超（周恩来夫人）的原讲话稿中有一段引自1949年7月1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的语录，它指出苏联援助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绝对必要性。刘少奇曾删掉了这一语录，以避免使亚洲妇女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而不去依靠自己的力量。出于这一理由，以及考虑到不要给人提供苏联和中国干涉其他亚洲国家的内政的口实，刘少奇还反对在决

① 同上，第2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23-26页。

议中提苏联和中国的革命胜利。但后来，有几位执委会委员说，中国妇女同志不愿承认“苏联在保障亚洲人民解放运动中的世界历史作用”。此时，刘少奇又重新同意在邓颖超的讲话中保留毛泽东的那段语录。^①

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成立“亚洲妇女联络局”，理由是：在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开展合法斗争是不可能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还没有能力成为亚洲国家地下妇女工作的领导中心。^②

参加这两次北京会议的欧洲代表给刘少奇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刘在会议后不久同苏联代办谈论会议情况时说，在巴黎以至在整个欧洲（这也包括了苏联），人民对亚洲国家的情况了解很差。^③此后不久，刘少奇还发表了类似的谈话，但更加坚定并直接指出苏联对中国的置之不理。^④很可能刘少奇1949年夏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得到的印象，对他提出这种批评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 同上，第26-27页。

同上，第28-29页。

同上，第23页并参阅第24、26和28页。

④ 1950年1月27日刘少奇同蔡特季娜的谈话，见库利克：《建立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年根据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载于《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82页。

第四章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莫斯科： 走向结盟的突破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盟是通过 1950 年 2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来实现的。这一历史性事件发生在 1949 年 12 月 16 日至 1950 年 2 月 17 日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末期。在访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那也是惟一的一次。那次旅行也同时是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旅行。

第一节 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起因、计划、启程

自 1947 年春以来，毛泽东就计划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但都因斯大林的缘故而多次推迟。^①据中国的材料称，斯大林在 1949 年 7 月对刘少奇说，毛泽东在新的中国政府成立后，即可来莫斯科，以解决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条约等问题。^②周恩来于 11 月在一次内部谈话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斯大林向刘表示，他很高兴“在任何时候，在莫斯科与毛泽东会面”。^③

详见本数第二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八节。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5 页；参阅第三章第八节（刘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

1949 年 11 月 10 日周恩来与罗申大使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2，卷宗 36，案卷 220，第 52 页。

11月5日，斯大林通过他在中国的联络员伊万·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他随时欢迎毛来访。^①毛泽东当时说，他想去莫斯科，以便在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寿辰之际“亲自祝贺生日”。鉴于同时有世界各国的苏联朋友和代表团出席，他的旅行就可以“具有完全公开的性质”。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②11月8日，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致电斯大林，再次表示他的旅行愿望。^③他在电报中请求斯大林决定他从北平出发的时间。^④显然，他也表示了12月初启程的愿望。他同时还请斯大林酌定，周恩来是否应随行，或等他到莫斯科后再定周是否去及何时去。^⑤

通过党的渠道在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后，毛又建议苏联方面在外交层次上安排其12月的旅行。11月10日周恩来受毛的委托与罗申大使进行了谈话，请求把毛关于莫斯科之行的设想转告斯大林。周在谈话开始时就指出，毛长期以来就梦想访问苏联。罗申问“毛泽东访问的性质”以及谁陪同前往。周回答说，毛除了想与斯大林建立“个人的友好接触”外，“他将当面谈谈中苏条约的

此处和以下两句参阅1949年11月10日周恩来与罗申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案卷220，第52-53页。但从周恩来的谈话中不能清楚地看出，是否是毛首先提出了去莫斯科的愿望，还是，科瓦廖夫首先说出了斯大林的邀请。据列多夫斯基称，他曾阅读了收藏在总统档案馆的科瓦廖夫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他认为倡议是毛泽东提出的。见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4页。

同上，第5页b，根据科瓦廖夫关于他与毛泽东在1949年11月5日的谈话记录。

可以认为，周恩来与罗申谈话时提到的1949年11月8日的电报涉及的就是1949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给王稼祥电报中所复述的内容。参阅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案卷220，第53页。《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131页。以下引用的文件来自《毛泽东文稿》，后来有了引文译文。

此段和下段参阅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给王稼祥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131页。

冈察罗夫、勒维斯和薛的印象是，毛只是建议周以后再回来。这就与他们书中所印载的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给王稼祥的电报内容有矛盾。电报的最后一句话翻译得不准确，缺了“再定”一词。见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p.83, 236 (Doc.13)。

问题”。当时周没有提其他的话题，他以这种方式向斯大林发出信号，条约问题在毛的议事日程中是放在第一位的。周接着说，没有一个政府成员将陪同毛前往莫斯科。但如果“毛泽东访问的结果制订出一个新的中苏条约”，那么，他，周恩来，可以很快乘飞机去莫斯科，签署这个条约。周还问，罗申大使是否陪同毛去莫斯科。罗申回答说，他将按莫斯科的指示行事。^①

11月12日毛感谢斯大林同意他的访问，并称，他将在12月的上旬动身。^② 他还同时请求让科瓦廖夫与他一同前往，说科瓦廖夫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因此不会因他的不在而影响工作。苏联外交部还向斯大林建议，也让罗申大使陪同。^③

关于毛提出的周恩来是否一同前往或以后再来的问题，以及关于周提出的如果要签订新的条约时他再来的建议，斯大林是如何反应的，这至今没有得到证实。看来，斯大林曾宣称，毛可以不带周来^④。11月12日，即毛感谢斯大林同意他旅行计划的同一天，王稼祥大使在苏联外交部有所歉意地提出，北平方面担心“在当前组织整个国家政权的时刻，两位重要领导人同时出访会影响工作”。^⑤ 当时的副外长葛罗米柯当天向斯大林建议，鉴于中方的疑虑，口头通知王稼祥，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将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出的任何决定”。至于斯大林是否接受了葛罗米柯的建议，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⑥

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2，案卷 220，第 53-54 页。

^② 此段和下段参阅 1949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135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1 页。

^③ 1949 年 11 月 26 日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2a，案卷 198，第 31 页。

冈察罗夫、列维斯和薛根据中国的材料得出这样的看法，见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84。

此段和下段参阅 1949 年 11 月 12 日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2a，案卷 198，第 29-31 页。

^⑥ 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84. , 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中方反复提周恩来是否应陪同前往的问题，这显然涉及的不仅是一个礼宾安排。周恩来说，如果签订一项新的条约，他就来莫斯科。这实际上是第二次发出信号，说明中国领导对缔结新条约的强烈兴趣。他不立即启程和他初期不在莫斯科，这显然是一种不断的警告，提醒斯大林不要忘记中国领导对缔结新条约的愿望。至于王稼祥提出的“组织整个国家政权”的理由，实际上既可用来解释周不同毛访苏，也可用来解释几星期之后再来的原因。显然中国方面在看出斯大林更愿让毛不带周来之后，想以此种方式来保全面子。

11月17日，即在周恩来与罗申大使谈话后的一个星期，中国的安全工作领导人李克农告诉罗申大使，美国在华间谍工作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破坏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他们甚至还“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把它定性为不平等的和帝国主义的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失去了辽东半岛^①以及东北的工业设备”。^②可以设想，李克农的这一谈话毛不会不知道，这是以间接方式向莫斯科暗示，应考虑废除这个“不平等的条约”。

在11月25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一致决定在毛出访期间刘少奇领导中央委员会朱德领导中央军事委员会。^③

关于毛泽东旅行计划的安排，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科瓦廖夫说，毛曾想在国外总共停留3个月。^④一个月用于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和缔结友好条约，以及访问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第二个月，他要用于访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打算到黑海疗养地休养。而毛泽东在莫斯科对罗申大使说，他

指旅顺和大连港——作者注。

^② 1949年11月17日李克农与罗申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2，卷宗36，案卷220，第68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二卷第14页。

此段和下三段参阅《科瓦廖夫，II》，第88页及下页。

曾想在苏联停留 3 个月，但是现在国内的工作很多，迫使他把逗留时间缩短为两个月。^① 师哲却说，毛在斯大林生日庆典结束后就去休养，周恩来将负责条约的谈判。^②

毛自己在回顾他莫斯科之行时说，“我们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③，以代替 1945 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老条约。1950 年 1 月陪同周恩来来到莫斯科的伍修权进一步强调，签订条约是主要目的。^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作者也强调，缔结上述条约是首要目的，毛要缔结一个反映两国新型关系的条约。^⑤ 此外，他还要向苏联请求援助，向斯大林祝贺生日。从毛在 11 月准备过程中向斯大林所作的陈述来看，以及从他在莫斯科期间对斯大林的态度来看，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莫斯科之行的最重要目的就是缔结一个新的条约。^⑥ 有关毛在莫斯科的活动和态度将在下面作进一步的描述。

当然，这两位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在他们第一次会晤时都有些什么想法、期望和感受，人们只能对此作一些推测。但是可以认为，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及与此相联系的对世界革命的信念来看，他们两人都认为，他们是相互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他们首先考虑的都是各自的民族利益，从而在过去的双边关系中曾出现过不少麻烦，而这

^① 1950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与罗申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10，第 3 页。

^② 师哲：《陪同毛主席……》，第 11 页。在此之后发表的回忆录中，师哲没有再提旅行计划的问题。

^③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与尤金大使的谈话，苏方的谈话记录载于：《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105 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36 页。

参阅魏实言音：《第一次访问苏联》见《毛泽东的足迹》第 302 页；师哲、陈兼：《陪同毛泽东与斯大林……》第 46 页。

^⑥ 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6 页。

一点将来也将继续如此。^① 科瓦廖夫说得对，两人互不信任是有理由的。^② 在缔结条约方面，人们可以想象得出，这与 1939 年 8 月 23 日“莫洛托夫 - 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时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的心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斯大林对当时两人内心打算作了如下的描写：“当然，一切都是一种游戏，看谁能骗过谁。我知道希特勒的打算。他想迷惑我，但实际上我要让他上当。”^③

长期以来，斯大林拒绝承认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偏爱王明。他在短期和长期计划中都把国民党视为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和他的首要合作伙伴，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所有的援助都给了国民党，而无视中共关于提供武器的请求。毛泽东也一再不去理睬斯大林提出的希望：与国民党紧密合作，对日本的占领展开军事攻势，以便把日本牵制在中国，阻止日本发动对苏联的进攻。此外，毛泽东也不去理会斯大林 1945 年 8 月提出的，放弃革命这种令人委曲的建议。斯大林连续几年拒绝在莫斯科接待毛，因为苏联要保持与国民党中国的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一直保持到 1949 年 9 月底。

斯大林以一种怀疑和敬佩相混合的心情看待毛在中国内战中所取得的胜利。这也是他面对没有苏联援助而取得政权的各国共产党的心情。他猜疑毛会发展成“中国的铁托”。后来，毛对此作了如下的表述：“解放战争初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

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方面的两重性，亨特有较确切的论述，见：Hunt: <The Genesis ... >, P.178。

② 《科瓦廖夫，II》，第 86 页。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128 页。

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① 斯大林的敬佩不仅是来自中共出人预料的迅速胜利，而且也是因为这个新出现的拥有 5 亿人口的共产党国家所具有的实际分量，它甚至比苏联的人口还多一倍。而斯大林的崇高威望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是世界大国苏联的领导人。

莫洛托夫是排在斯大林之后的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会谈对手，是毛最熟悉的人物之一。^② 当时，莫洛托夫是排在斯大林之后的负责中国问题的主要领导人。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苏中条约谈判时，他就已担任这样的角色。排在莫洛托夫之后的是米高扬和维辛斯基。^③ 几年后，毛回忆说，莫洛托夫对中方的态度“不比斯大林好”^④。莫洛托夫路线也就是斯大林路线。毛实际上不得不更多地同莫洛托夫打交道。毛说，莫洛托夫有时表现得像个商人，也就是说他在同我们讨价还价”。

科瓦廖夫认为，毛在与斯大林会晤前有些担心。因为毛知道苏联的经济困难形势，他担心斯大林会拒绝关于贷款的请求。正

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86 页。这段话在过去的几个选集版本中没有印载。这里还参阅 John K. Leung, Michael Y. M. Kao (Ed.): <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 1949-1976> . Vol. II, Armonk, N. Y./London, England 1992, P. 43 f. . . . 59-61.

^② Dmitri Volkogonov: <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 . . . New Rocklin, CA . . . o. j. P. 244

这从现有的档案材料中也可得到证实。莫洛托夫是斯大林之后主管中国问题的最高政治局委员，所有关系到中国问题的重要文件都要抄送给他及其他有关政治局委员。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卷宗 369，第 6 页；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43 页。赫鲁晓夫也证实，当时斯大林与莫洛托一起决定有关中国的基本原则问题；见《赫鲁晓夫回忆录》载于《历史问题》1992 年第 11-12 期，第 73 页。

此段和下段参阅 1957 年 10 月 29 日毛与尤金的谈话，尤金的记录见：《苏联大使尤金 1957 年 10 月 30 日发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 案卷 589，第 173-179 页，载于《原始材料》1996 年第 110-114 页。此处引文见第 112 页。

因如此，毛在启程去莫斯科前的一周，把科瓦廖夫叫去，向他描绘中国的严重经济形势。科瓦廖夫的这个看法显然是夸大了，而斯大林早在夏天就向刘少奇承诺了三亿美元的贷款。^①

毛泽东的旅行计划显然在联合政府中的非共产党伙伴那里遇到了阻力，如民主同盟和国民党左翼。理由是：按传统，“外国蛮人”总是拜访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但这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担心，这一旅行将可能导致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复杂化，以及减弱它们给予经济援助的意愿。^②

12月6日，毛从北平乘火车赴莫斯科。他只带了很少的随从人员，但都是他的亲信，其中没有一个是政治局委员（当时，包括毛共有12名政治局委员）。而斯大林则让三名政治局委员参加与毛的会谈。在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中只有陈伯达算是有些名望。他自1937年起是毛的政治秘书，在此期间得到了教授的头衔，是著名的毛的“笔杆子”之一。他自1945年起进入中央委员会，并担任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副院长。在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他是苏联报刊上惟一被提到名字的毛泽东陪同人员。毛的私人秘书是叶子龙，负责安全的是汪东兴，担任翻译的是师哲。此外，还有苏联驻北平大使罗申，几个低级别的中国人，以及应毛的要求作为随行人员的科瓦廖夫和当时苏联驻北平大使馆的中文翻译尼古拉伊·费德林。^③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II》，第88页。
同上。

^③ 此段参阅《汪东兴日记》，第154-156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2、434页；《科瓦廖夫，II》，第8页；《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135页；1949年2月17日《真理报》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第150页；彼得·库弗斯：《一位跟上时代的英雄》载于卡尔·海因茨等（编著）：《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1993年汉堡版第216-220页；Bartke: <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 P.10, 356 f.;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17，38页。汪东兴说其他中国陪同人员还有：滕代远（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司令员），以及政治级别较低的罗瑞卿、李加吉、陈秉承、沈剑心和田树彬。见《汪东兴日记》，第154-156页。

科瓦廖夫推测，毛之所以只让很少几个亲信陪同，而不带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是因为他不愿与斯大林谈话时有见证人。他认为这一点通过周恩来在出发前不久提出的一个请求得到了证实。周当时请求让费德林随同前往，以便为毛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谈话时当翻译。科瓦廖夫认为，毛主要担心他的威信有可能受损，他特别不愿在中国同志面前受损。此外，科瓦廖夫还得到这样的印象：毛还担心，他不能实现中共领导对莫斯科会谈所寄予的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期望。这一推测也许有些道理。但至少关于费德林的角色的推测是不对的，因为从记录来看，毛与斯大林的两次会谈都是师哲当翻译。^①

在到达莫斯科之前，整个旅行是秘密的。从北平至满洲里边界的这一段 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在毛的列车前后 都有一列载有 50 名士兵的警卫车。在铁路线的两旁都布置了岗哨。当列车停靠时，只允许当地的两名党政军领导人到列车上来探望毛。随行人员在中国境内不准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车上带有许多精选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这些都是由毛夫人江青和汪东兴筹集的给斯大林的礼物。其中有山东的大白菜、大葱和梨 潍坊的白萝卜、冬笋 著名的杭州龙井茶 高度数的茅台酒 上海的香烟、丝绸 江西景德镇的瓷器 以及湖南的刺绣等。高岗从沈阳上车护送 送至边境站满洲里。^② 在边境的苏联一方，中国客人受到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的迎接。每到一站，他们都受到苏联高级官员的欢迎。在新西伯利亚，维辛斯基外长还打电话来问候毛的健康和致以良好祝愿。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国驻莫斯科大使王稼祥登上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II》，第 88 页；科瓦廖夫为发表的手稿，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84;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 卷宗 329，第 17、38 页。此段还参阅巴扎诺夫：《中国和外部世界》，1990 年莫斯科版第 47 页。

^② 毛的随行警卫则说，毛拒绝了高岗护送至满洲里的愿望。见《汪东兴日记》，第 156 页。

了列车。毛在中国境内就感冒了，一路都感到不舒服。^①

第二节 在莫斯科的冷遇

12月16日中午时刻，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当时的北站），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上车问候，他们在礼宾上的身份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媒体把毛称之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并与中国媒体一样，在其随行人员中只提到“陈伯达教授”的名字。出席欢迎仪式的除了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外，还有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城区司令、苏联外交部的负责官员，以及东欧卫星国、北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使团团团长等。斯大林没有来，这符合当时的苏联惯例。外长维辛斯基也没有来。毛邀请前来欢迎的人们到车厢里就座，并品尝摆满一桌子的中国特产，但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以这不符合礼仪为由而断然拒绝了。考虑到毛患感冒和天气寒冷，他们宣布欢迎仪式从简，只请毛检阅一下仪仗队，如愿发表讲话，可以把发言稿交给新闻界。^②

即使是一位比毛更少注重威望的国家领导人，也会对这样一种欢迎仪式感到受委屈。科瓦廖夫确信，毛对这种冷淡迎接“明显地感到痛苦”，这是可以相信的。从《真理报》发表的一幅照片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及其苏联欢迎者在检阅仪仗队时表情冷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2页及下页；师哲：《陪同毛主席……》第11页及下页；师哲、陈兼：《陪同毛和斯大林……》，第46页及下页；1949年12月17日《真理报》；《汪东兴日记》第154-156页；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84 f 魏石岩(音)：《第一次……》，第302页。

② 参阅1949年12月17日《真理报》；1949年12月18日《人们日报》；《科瓦廖夫，II》，第89页；魏石岩(音)：《第一次……》，第302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3页；师哲：《陪同毛主席……》，第12页。

漠。在第一排的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与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 1945 年 6 月 30 日来苏联首都参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时受到的欢迎相比，毛泽东受到的欢迎远没有那次友好。当时的欢迎气氛被描写为“真诚的”。^① 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以礼仪为由拒绝了毛让他们上车厢的邀请，但他们上了毛的汽车，陪同他到达宾馆。^② 毛下榻在布利茨尼亚别墅，^③ 这是斯大林不在克里姆林宫时经常自己居住的一个别墅。^④ 它坐落在沃林茨科耶，在当时的城区之外，今日的库图佐夫斯基，从克里姆林宫出发经阿尔巴特大街，15 至 20 分钟就可到达。毛泽东、叶子龙和师哲住一层，陈伯达和汪东兴住二层，^⑤ 毛曾邀请科瓦廖夫夫妇同住这一别墅，但科瓦廖夫没有接受。^⑥

毛在他的书面发言（发表于第二天的苏联报刊上）中称，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和苏联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他把中国和苏联称之为“两大国”。他没有提及缔结一个新条约的必要性，以替代 1945 年 8 月 14 日与国

^① Garver: <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 , P.214;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 P.128; 《科瓦廖夫, II》,第 89 页;《真理报》1949 年 12 月 17 日。此处可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② 《科瓦廖夫, II》,第 89 页。

莫洛托夫是这么说的，见《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朱耶夫日记》。里帕立特·科巨扎德扬向作者也证实了莫洛托夫的这一看法。他在 1965 年至 1970 年期间作为苏共中央的中国问题顾问多次去过“布利茨尼亚”，并让 1949 年至 1950 年在别墅工作的服务人员带领他看了当年毛泽东住过的房间。但汪东兴以及师哲说的是莫斯科西南郊 27 公里的、有三层楼的、名叫“姐妹河”的别墅。见《汪东兴日记》，第 157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4 页。据科瓦廖夫称，这一别墅是在乌索沃；见《科瓦廖夫, II》，第 89 页。它同样在莫斯科西南方向，两点间直线距离约 25 公里。不可理解的是冈察罗夫、列维斯和薛一方面引用科瓦廖夫的说法（《科瓦廖夫, II》,第 89 页），即在乌索沃的别墅，而另一方面又说是在乌萨塞夫卡的别墅；见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316, Note 54。

^④ Dmitri Volkogonov: <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 , P.452。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4 页。汪东兴证实，毛、叶和师住在同一层。见《汪东兴日记》第 157 页。

^⑥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316, Note 54。

民党签订的条约。但他指出，苏联政府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无疑是一种暗示。^① 而中国媒体给人的印象是，毛似乎是在站台上发表了他的演说。^② 这是出于不了解真实过程，还是出于保全面子，仍是一个尚无结论的问题。

但就苏联媒体的报道情况来看，毛似乎可以表示满意。《真理报》把毛的到达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它的报道占据了头版约一半的版面。引人注目的是，毛被称之为“毛泽东先生”。同样，在 1950 年 1 月 20 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时，也是如此。^③

在参加斯大林 70 寿辰大典时，毛被称呼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④ 师哲感到惊讶的是，斯大林在 12 月 16 日会谈开始时称毛为“先生”，而按苏联的惯例，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习惯称“同志”，而只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朋友才称“先生”。此外放在桌上的名签和起草好的声明中苏联方面都把毛称为“先生”。最初，师哲不敢问斯大林。直到 1950 年 1 月 22 日会晤时，他才向斯大林说起此事。斯大林微笑着说，这是正确的，毛是同志，应该立即改称他为“同志”。^⑤ 在中国关于毛到达莫斯科的报道中，毛的头衔为“主席”，而斯大林被称之为“元帅”。这是 1945 年鉴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勋而授予斯大林的军衔，这也是自那以后被爱用的荣誉称呼。^⑥ 一位

① 1949 年 12 月 17 日《消息报》，引自《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16 页及下页。

② 1949 年 12 月 18 日《人民日报》。

③ 《真理报》，1949 年 12 月 17 日第一版以及 1950 年 1 月 21 日第一版。

④ 《真理报》，1949 年 12 月 22 日第三版。

此处参阅刘杰成（音）：《毛泽东与斯大林》，1993 年北京版，第 20、217 - 219 页。刘杰成（音）：《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1997 年北京版，第 204 页。刘没有说明资料来源。很可能是他采访了师哲。但在师哲的回忆录中没有这类的陈述；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第 433 - 467 页。在苏联的 1950 年 1 月 22 日会谈记录中也没有记载师哲和斯大林的这段对话。

⑥ 1949 年 12 月 18 日《人民日报》；1949 年 12 月 22 日《真理报》第 6 版。在关于斯大林 70 寿辰的报道中也使用了“元帅”这个称呼。

中国的作者推测，苏联的这种态度可能是因为在 1949 年 12 月斯大林还不承认毛是马克思主义者。^①但是从苏联的礼宾惯例来看，这种推测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在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代表交往时，只要他们是以国家官员的身份出现，也是使用“先生”这种称呼。^②情况表明，莫斯科在礼宾上是有严格区分的：一个外国共产党人是以党的职务出现，还是以国家职务出现，两种礼宾是有区别的。

第三节 斯大林的强硬表态：12月16日谈话

在毛泽东到达的当天 斯大林于 18 点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毛泽东，并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出席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 外交部长维辛斯基 毛的翻译师哲（俄文名字：卡尔斯基）以及斯大林的翻译尼古拉伊·费德林。^③后者属于外交部远东一司，负责中国事务，曾两次担任该处领导。^④

至不久前为止，人们在研究会谈进程时基本上只能依据两位翻译所发表的报告。在这方面，费德林只是对会谈的气氛和外表

刘杰成（音）：《毛泽东与斯大林》，第 39 页。

参阅 1949 年 10 月 9 日（真理报）关于葛罗米柯接待匈牙利大使的报道。见：1949 年 10 月 9 日第 4 版。在《真理报》上还可以发现其他的例子，如：1949 年 10 月 14 日第 1 版；1949 年 11 月 5 日第 4 版；1949 年 11 月 25 日第 4 版。

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她当时陪同其丈夫到了莫斯科）称，费德林能说一口“很标准”的中文，并对中国历史有较深的了解。见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第 185 页。

此段参阅 1949 年 12 月 17 日《真理报》；《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会见毛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9、17 页；《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见于《历史档案》1996 年第 5-6 期第 61 页；1949 年 12 月 14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7 页，以及魏石岩（音）：《第一次……》第 303 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2，案卷 220，第 1 页。

情况作了冗长的、辞藻华丽的、但有时显得幼稚的描绘，他根本不提会谈的政治内容，或仅仅作一些含糊的表述。^① 这种态度也许是由于他对斯大林、对苏联政权的忠诚，也许是因年迈而记忆力衰退的结果。^② 费德林的同行师哲，虽然不时地谈及一些政治内容，但一般注重于伟人轶事。^③ 其原因同样可能是出于他对毛和党的忠诚，或者是记忆的衰退，或者是党的新闻检查。^④ 此外，可以看出，这两位翻译在撰写他们的回忆录时，没有或几乎没有使用档案材料。这肯定是导致某些陈述不准确的原因之一。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师哲称，参加 12 月 16 日会谈的有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就是说，当时的 12 位委员）和维辛斯基外长。^⑤ 而费德林的印象是除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外，只有师哲和他本人参加了。^⑥ 实际上，他们两人说的都不对。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有两件关键性的文件解密了，资料查证得到了重大的改善。它们就是：费德林所作的苏联谈话记录（以

费德林：《夜间的会谈》，载于 1988 年 10 月 23 日《真理报》费德林：《斯大林和毛：莫斯科会谈》，载于《远东问题》，1989 年第 1 期第 149 - 164 页；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2 年第 98 - 113 页；以及 1992 年第 6 期第 83 - 95 页。例如，费德林用了整整一页描述一份给毛泽东的、涉及“一个重要问题”的电报是如何完成的，而只字不提它的内容。见同上 1992 年第 5 期第 104 页。

^② 1995 年 3 月，作者会见了当时已 82 岁并自称病得很重的费德林。

参阅师哲：《陪同毛主席……》，第 12 - 14 页；《陪同毛主席访苏》，载于《峰与谷 师哲回忆录》，1992 年北京版第 54 - 58 页；《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4 - 436 页。此外，师哲还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记者谈话。

^④ 1993 年 5 月，当时 87 岁的师哲与作者谈话时，已不再能或不愿回忆起 1949 年中苏关系中的一些重要的事情经过。他也不能很好地说俄语。他早些时候写的一本回忆录因新闻检查而未能出版。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4 页。

^⑥ 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第 151 页及下页。1995 年 5 月费德林与作者谈话时仍坚持这一说法。但这一说法却被在此期间得以查阅的由他当时所做的谈话记录所反驳。参阅下面的注释。

下简称：费德林记录^①，和关于会谈经过情况的报告，这是毛泽东在会谈结束时发给北平的报告（以下简称：毛的报告）^②。这两个文件证实，费德林和师哲迄今为止所发表的陈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整的，有些部分是错误的。^③从费德林回忆当时为斯大林和毛作翻译时的情景来看，斯大林给周围的人造成了多么大的恐惧。^④例如，当费德林在翻译毛泽东引用的一段中国典故，而不得不再三询问时，斯大林不信任地问道，你们的密谋还要持续多久。费德林在评论这一场面时说，斯大林的这一问话犹如一个闪电击中了他。他费了很大的劲，才从这一不信任中平静下来。自那以后，他始终感到断头台的铡刀老在他的头顶上晃动。

毛在发回到北平的电报中把会谈气氛说成是“情意恳切”^⑤。

约·维·斯大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1949年12月16日谈话记录（以下简称：斯大林与毛 1949年12月16日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9-17 页；英文译文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5-7；谈话摘要见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新的档案文件》，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7年第1期，第 25-32 页。在这份记录的最后有一个打字的注：“费德林同志的记录”。这是 1949年12月31日维辛斯基外长手写的。

^② 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以下简称：1949年12月18日毛给刘的电报）电报内容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7 页及下页；以及魏石崧（音）：《第一次访……》第 303 页。

在此期间，师哲与历史学家陈兼进行了谈话，对他已发表的回忆录做了补充。新文本是英文本，标题为 < With Mao and Stalin. Shi Zhe's Memoirs >。作者感谢陈兼，能有机会看到尚未发表的书稿，它在本书中援引为：< With Mao and Stalin. Shi Zhe's Memoirs > 关于 1949年12月16日的谈话还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85-88。这三位作者未拥有毛给刘的电报，供研究使用，他们提到了《苏联记录》，但没有详尽使用。他们正确地确认，毛在谈话中表明了他们的目标：以新的条约代替旧的条约，斯大林以雅尔塔协定为由立即驳回了这一想法。显然，冈察洛夫通过他在苏联外交部工作的便利条件查阅了档案，看到了这份记录，但只能有限的使用。

此处和下一段参阅费德林：《斯大林和毛：莫斯科会谈》，见《远东问题》，1989年第1期第 154 页及下页。

^⑤ 毛 1949年12月18日给刘的电报，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7 页。

但从下面谈到的理由可以认为，这种形容是不能轻易相信的。据师哲称，在最初进行一般的礼节性交谈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但接着就出现了一定的麻烦，因为斯大林用一句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打断了毛对过去长期受斯大林忽视的抱怨。^①但在费德林的记录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斯大林的这一表述。

在进入实质性会谈时，毛泽东声称，中国需要 3 到 5 年的和平时期，用来恢复经济。他问斯大林，国际和平将能持续多久。斯大林回答说，就中国而言，目前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已削弱到不能进行一场战争。美国尽管叫喊，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中国和苏联继续保持友好，和平可以维持 20 到 25 年，甚至更长时间。^②毛在他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确认斯大林的估计与中方一样，仗是很难打起来的。^③

接着，毛直截了当地转入棘手的问题，即与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关的问题。据毛自己后来所说，缔结一个新的条约是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④

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已谈到这个题目。刘在 1949 年 7 月 4 日给苏联党领导的报告中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一是继承旧约；二是重订新约；三是暂时维持条约的原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5 页。师哲报道的这一插曲不断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的文献不加考证地复述。参阅魏石岩（音）：《第一次访……》，第 303 页；陈敦德（音）：《铡刀与蒋介石 1949-1976》，1993 年北京版第 71 页及下页；刘杰成（音）：《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第 16 页及下页。据师哲称，斯大林在 5 个月前向刘少奇说了同样的话，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4 页。

^② 此段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9-10 页。

^③ 1949 年 12 月 18 日毛给刘的电报，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7 页。

^④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苏方的谈话记录，见：《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105 页。

以签订。^① 斯大林在莫斯科曾对刘少奇承认，条约是不平等的，他已和毛交换过意见。^② 当时苏联被迫这样做。斯大林请刘等待，等毛来莫斯科时再解决此事。

12月16日毛泽东谈到条约问题，他简要地说，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领导专门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③ 引人注目的是，毛在这个对他来说是中心的问题上却不采取推动的态度，而表现为非主动的等待。斯大林则抓住时机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需要搞清楚：应当宣布保留现有的条约呢，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现在立即修改。^④ 斯大林实际上重复了5个月前刘少奇提到的三种方案，只不过是把顺序做了改变。

斯大林清楚地表明，他主张第一种方案。他解释说，现行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条款，如：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口等问题。“这就是说，这个条约的缔结是经过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做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借口，他们会提出也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斯大林接着说，因此苏联领导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问题，也可采取同样的做法。“这就是说，可以形式上保留，但实际上根据中方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如果中国同志对这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28，第 48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 14 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此段和下段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3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5 页及下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10 页。

此句和下一句见同上。

种做法不满意，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①

在毛发回的报告中简要地，但准确地反映了斯大林谈话的要点：因雅尔塔协定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约，会牵涉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就有理由要拿千岛群岛。因此旅顺口为苏联租借 30 年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在实际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②

从斯大林提出旅顺口和中长铁路这一点来看，他在这里所说的“条约”，不仅是条约本身，而且指整个条约和附件，即包括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补充协定。

在以上援引的费德林记录中，在“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之处，斯大林说的是“关于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雅尔塔协定”，而费德林把它与 1949 年 8 月 14 日的中苏条约混淆了。因为中苏条约（确切地说，与它一起签订的三个协定）主要规定了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地区的占有关系，而不是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等问题。正如斯大林在此之前所确认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问题，连同所谓满洲问题，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雅尔塔协定的对象。^③

上述费德林记录中出现的混淆，是费德林自己造成的，因为他显然对事情的复杂性不很了解，而把雅尔塔“协定”与中苏

同上，第 10-11 页。

^② 1949 年 12 月 18 日毛给刘的电报，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7 页，魏石岩（音）：《第一次访……》，第 303 页。在毛的报告中没有提南萨哈拉和中长铁路。

这段参阅 < Agreement Regarding Entry of the Soviet Union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 > of 11.2.1945, in: < The Conferences of Malta and Yalta, 1945 > P.984;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华民国与苏联友好同盟条约》及在同一天签署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见：< Treaties between the Republic >, P.505-507 516-522（中英文本），《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96-203 页（俄文本）。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条约”弄混了。而这里也表明，毛泽东却正确地理解了斯大林的话，这从下面复述的毛泽东的回答中可以看出。

斯大林所说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不愿因改变涉及满洲的中苏条约规定，而拿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去冒险，这些领土是他在雅尔塔通过牺牲日本而取得的。因为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的有关协议而产生的，改变这个条约就可能被华盛顿和伦敦视为对雅尔塔协定的突破。美国和英国就可能有权宣布，他们也要求改变关于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协议。

斯大林认为要使这类问题不出现，其前提就是整个中苏条约在形式上保持不变，但在执行上可作一些调整。对此，苏方可以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秘密谈判。在实行实际撤军方面，斯大林也并不想立即实行。虽然在西柏坡会谈时，斯大林曾通过米高扬提出立即撤军的建议，但他从毛泽东的反应知道，中国方面对立即撤军并不感兴趣，因此他实际上也没有向中共领导作出立即撤军的承诺。从各方面情况看，苏共领导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前已作出决定，如果中共在中国取得胜利，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将废除旅顺口协定，并从辽东撤军。这一点，苏共领导已告诉了中共领导。斯大林在 7 月份也向刘少奇作了类似的声明。但现在的发展是，他考虑到雅尔塔协定，从而不再想公开宣布撤军以及在形式上修订条约。

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也不再像 5 个月前曾向刘少奇所表述过的那样，说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是不平等的。^① 在那年的年初，他也曾经通过米高扬向毛泽东说过，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② 在同一场合，斯大林还转告毛，苏联政府已决定：一旦同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3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5 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此段和以下两段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 II》，第 100 页；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第 106 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军队从日本撤走，苏联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走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从旅顺地区撤出是适宜的，那么苏联也准备这样做。在夏天，斯大林向刘少奇又重申了苏军将在美军撤出日本后撤离中国，并说，如中方认为必要，苏联也可马上撤军。^①刘当时显然没有说什么。但人们注意到，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时没有像米高扬在西柏坡时那样把旅顺口协议说成是不平等的，也没有提到废除的可能性。但如前所述，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立场的改变。

人们可能会设想，毛在 12 月 16 日会谈时会在这一点上反驳斯大林，因为他内心是想促成缔结一个新的条约。根据我们现有的两个文件来看，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在苏联的满洲特权方面，毛对斯大林的解释作了类似中共领导在西柏坡时对米高扬所作的回答。据费德林的记录，毛宣称，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中长铁路还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毛在发回的报告中简要地提到，他认为苏联军队撤得太早也不利。尽管两个资料来源有些不同，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毛不同意立即撤军。^②

当然，人们要问，毛的这些表示是否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这个问题需作具体的分析。当初在西柏坡会谈时，毛主张苏联军队留在东北，这很可能是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因为中国领导在 1949 年春担心美国会偏袒国民党而干预中国的内战。但是到年底，这种担心显然已大大减弱。^③至于中长铁路，情况就完全不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此段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 案卷 329，第 11 页；1949 年 12 月 8 日毛给刘的电报，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7 页。在魏石崑音：《第一次访... 》，第 303 页复述这份电报的内容时，没有提及毛的回答。

参阅 Chen Jian: < China's Road to Korean War > . New York 1994, P.89.

同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领导似乎一致认为，苏联领导有义务把铁路立即归还中国。^①显然，鉴于想与苏联结成战略联盟和迫切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毛泽东没有提出这一要求。但他后来，在 1950 年 1 月 22 日会谈时，要求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限和改变现有的法律地位。^②

在 12 月 16 日会谈时，毛为什么对斯大林拒绝缔结新约没有立即表述反对？这可能是因为毛没有预料到斯大林会一反当年春天和夏天两次高峰会谈时的比较好商量的态度，而采取了僵硬的拒绝签订新约的态度。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下，毛一时没有想好对付的战略。

接着，斯大林感到有必要对撤军问题做一些解释。据费德林的记录称，斯大林说：“撤军并不意味苏联不再援助中国，如果今后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苏联领导作为共产党人，把军队驻扎在别国领土上，特别是驻扎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感到有些难堪。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说，苏联军队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么英国军队为什么不可以驻扎在香港，美国军队为什么不可驻扎在东京？如果苏联根据双方同意从旅顺口撤退，那么我们在国际关系上将是赢家。苏军的撤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中的资本。大家将会看到，共产党人做到了蒋介石没有能够做到的事。”虽然条约赋予苏联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而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撤退军队。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苏联军队可以根据中国的需要留驻 2 年、5 年或 10 年。不要让人认为，我们打算从中国逃跑。我们可以把军队留在那里 20 年。^③

毛在发回的报告中简要地称，斯大林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1 页。

② 详见下面的第四章第十六节。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11-12 页。

兵不至于看上去像苏联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可以在撤退时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①

斯大林轻松地提出了立即撤军的建议，尽管他并不想这么做。他知道，面对这样的建议，中国领导将会像在西柏坡会谈时那样，提出一些理由表示反对。这样，他的这种慷慨的姿态就不会导致违背心愿的结果。斯大林说，在“友好国家”驻军使他感到特别难堪。鉴于当时苏联在“友好的”东欧卫星国驻有大量的军队，这种说法显然是虚伪的。毛肯定也知道东欧的真实情况。

接着的一场对话使气氛变得有些紧张了。当毛显然已从惊讶中恢复过来后，他对斯大林维持旧约的主张提出了保留意见，虽然是以间接方式提出的。他使用了过去与苏联打交道时使用过的方法：通过第三者的口提出批评意见。他说，照顾雅尔塔协定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毛在这里指的显然是包括补充协定在内的条约全部）是同已经被推翻的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②

毛的这段话在费德林的记录中没有找到。记录中却说，毛承认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并补充说：“怎样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就应当怎样做。这个问题应当进一步考虑。现在已经清楚，目前不应该修改条约，正像不应急于从旅顺口撤军那样。”^③显然，毛要以“共同事业”这一表述与斯大林的观点保持距离，而不直接反驳他。当他在1950年1月22日会谈时，为表明他不同意斯大林的看法，也使用了类似的表述：我们应当从考虑双方的利益出

^① 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7页。

同上。

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12页。

发，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有苏联的。^①

据毛的电报称，斯大林还说，现行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这段话使人感到，这就是斯大林对毛泽东暗示的缔结新约的愿望所作的一个答复。但斯大林的这段解释只见于毛泽东通过电报发回的报告。^②

虽然这两个文件资料反映的情况不尽一致，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新约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确实像费德林的记录所记载的那样，毛当时宣布同意暂不修改条约，那么，这表明毛作了很大的自我克制。但为什么毛又没有把这一段写在给刘的报告之中？这可能是因为他担心会被党内领导人指责为胆小怕事。另一方面，为什么费德林的记录没有提毛关于原条约已失去意义的表态。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答案。

从费德林的记录看，毛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否定了，但他又说：这个问题应由毛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按毛发回的报告，斯大林说：签个声明，周恩来（原文是“外长”）不必飞来。毛说：他需要考虑一下。^③毛以此使这个问题的讨论暂告一段落。

如果这两份文件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那么，可以认为，当毛再次提出要谈条约问题时，斯大林却故意没有听明白，并错误地认为毛谈的是“声明”问题，因此说周恩来没有必要为签个声明而来莫斯科。

在 12 月 18 日的电报中，毛主张周（原文是“总理”）应来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2 页。参阅本书第四章第十六节。

^② 1949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发给刘少奇的电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8 页；魏石岩（音）：《第一次访……》第 303 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12 页；1949 年 12 月 18 日毛给刘的电报，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8 页。

莫斯科，如果想签商务、贷款、航空等协定的话。至于条约问题如何解决，他请政治局讨论并提出意见。12月19日他提醒北京给予答复。接电后，政治局召开了会议，12月21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电复毛泽东：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去莫斯科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问题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①

12月18日毛发给刘的报告也证明，毛最感兴趣的是条约问题。如果不算开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几句话外，他认为需要向北京报告的就只是这个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在费德林的记录中只字未提毛泽东以间接方式表示的缔结新约的愿望。从毛给刘的电报来看，签新约的愿望尽管是间接提出的，但它是排在优先的地位，这一点看来是可信的。

在有关条约问题的讨论方面，毛12月18日给刘的电报也证明师哲的回忆录在许多点上是不可信的。师哲给人的印象是：在12月16日的会谈中似乎根本没有出现关于条约问题的讨论。当斯大林问毛对这次访问有什么期望，毛当时是要说条约问题，但他却用寓言式语言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②虽然师哲当时作了解释（形式和内容都要好的意思），但斯大林仍然没有理解这个暗示。

^① 1949年12月18日毛给刘的电报，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8页；1949年12月19日毛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193页；1949年12月21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8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6页。师哲回忆录中关于“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说法，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者大量引用。例如：陈敦德（音）：《毛泽东与蒋介石 1949-1976》，1993年版第72页；刘杰诚（音）：《毛泽东与斯大林》，第18页及下页。

关于周恩来是否来莫斯科的问题，师哲大体上证实了费德林的记录和毛在电报中的说法，师哲说：毛对斯大林说，他想叫周来莫斯科。斯大林反问，如果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周来。^① 12月16日这段谈话的真实性也被这样一个事实所肯定：毛泽东在出发前就问过斯大林，是否应带周恩来一起去，斯大林让毛自己决定。但看得出来，斯大林愿毛一个人先来。^② 当时，中方也已提出周恩来去与不去是与签订新约有着直接的关系。据师哲称，斯大林与毛在条约问题上还发生了另一个误会：毛力求让两个总理（即斯大林与周恩来）在条约上签字，而斯大林则愿与毛泽东一起来签约。^③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也很难肯定：毛的这种态度究竟是出于礼宾的考虑，还是为了担心条约可能产生问题，而便于推卸责任。^④ 如果斯大林确实要与毛一起签约，那么可以相信，斯大林会对毛让周来作为签字人的动议感到很恼怒。

12月16日关于条约问题的讨论结束后，会谈转入其他问题，其中有贷款和贸易问题，建立航空联系问题，军事援助问题以及处理外国在华资产问题。关于这部分会谈的详细情况，我们只能从会谈记录中去了解。毛的电报只是总的提到要签订商务、贷款和航空等协定，而在费德林和师哲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毛建议，在1949年夏斯大林与刘少奇达成的两党关于3亿美元贷款的协议^⑤之上，立即签订一个政府协定，因为这将在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6页。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7页。

此处和下一段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86 f.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中国引起很好的反应。^① 斯大林表示同意。

毛向斯大林提出，必需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②，尽管中国还提不出这个地区的贸易业务的详细计划。斯大林此时已经得到由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规定》的草案，^③ 但他在会谈时没有提及这个草案。

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毛之所以对新疆贸易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新疆与苏联的经济关系自 1942 年就中断了。新疆统治者盛世才自 1933 年实行亲苏政策，但于 1942 年倒向与国民党结盟。在他的压力下，苏联关闭了商务代表处，撤回了所有官员和技术人员，中断了官方接触。这实际上就是实行经济封锁，因为工业品的供应几乎全部是从苏联进口的，或是由中苏合营企业生产和提供的。它占毛皮、羊毛、棉花和丝绸生产的一半。此外，新疆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很困难。与此同时，在新疆出现了反华的动乱。国民党政府曾试图恢复莫斯科与新疆的经济关系，但苏联政府反应消极。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后，形势更加严峻，因为需要向 50 万士兵（包括投诚的国民党部队）供应吃和穿。本省自己只能满足需求的 30%，中央只能满足其 40%。地区辽阔和交通不便更加加重了形势的严重性。由于从南方到北方的运费高昂，粮价上涨了 10 倍。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价格在短期内上升 100 倍以上。^④

此处和下一段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12 页。

同上。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44 页。该草案文本至今未能得到。

此段参阅 1949 年 12 月 29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4，第 4-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 33-35 页；《彭德怀传》，1993 年北京版第 390 页。

斯大林在回答贸易问题时没有提及新疆的形势，而只是问中国需要苏联提供哪些设备，因为苏联没有备用的设备，所以工业订货单必须预先提出。毛表示编制清单有困难，“因为我们对工业的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但斯大林坚持要清单，说在苏联设备订货必须在一年前提出。接着，斯大林表示接受毛的请求，同意建立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中航线。此外，如同过去向刘少奇所允诺的，斯大林答应毛关于帮助建立海军的请求：苏联可以在旅顺培训中国海军干部和提供舰船。“你们派人来，我们提供舰船”。培训完毕的干部可以驾驶这些舰船回中国。^①

当毛请求在占领台湾时提供直接军事支持时，斯大林做了否定的反应。1949年夏，刘少奇在莫斯科时就曾向斯大林提出过这一问题。刘当时在其书面报告中曾预计，在1950年占领台湾，鉴于一部分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部队有可能投诚，占领时间也可能提前。^②7月底，毛泽东曾给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发去一份电报，并请刘把电报转送斯大林。毛在电报中说：为打破对上海的封锁，必需占领台湾，但这没有空军是不行的。他问斯大林，苏联是否可以帮助在莫斯科培训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地勤技术人员，以及供应100至200架歼击机和40至80架轰炸机，以便在占领台湾时使用。同时，毛还请求帮助建立中国海军。毛甚至走得如此之远，他想请求苏联派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占领台湾的战斗。毛最后假情假意地问斯大林，这样做会不会伤害苏美关系？^③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12-13页。

此段参阅1949年7月4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34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20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此段参阅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139-140页，按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51页及下页。

斯大林当时对刘少奇表示，在进攻台湾时苏联空军和海军不能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直接的支持。他指出，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美国的冲突，华盛顿可能利用它作为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借口。^①于是，毛撤回了他的请求。此外，斯大林同意向中国提供飞机和高射炮，派遣专家，以及帮助建立海军学校等。^②

12月16日，毛顽固地再次向斯大林请求，在进攻台湾时希望苏联能给予直接的军事支持。他当时提出：“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了海军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这就增加了军事占领台湾的困难。我们的某些将军们对此发表意见说，应当请求苏联帮助，苏联可以派来空军志愿人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占领台湾。”^③

斯大林回答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需考虑。他重复了曾向刘少奇说过的主要论点：“这里的主要问题是 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至于参谋部的工作人员和教官“苏联随时都可以派遣”。其余的问题我们要考虑。”这句话实际上是礼貌的拒绝。至此，毛不再坚持了。在回答斯大林关于中国是否有空降部队的问题时，毛说有一个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空降团。斯大林接着建议：“可以挑选一个空降连，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然后空降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台湾组织武装起义。”^④

此后，中国领导不断向斯大林报告他们关于台湾问题的打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科瓦廖夫 1》，第 88 页。师哲不能令人信服地否认了斯大林与刘少奇曾在莫斯科讨论过苏联在占领台湾时给予支持的问题。师哲对李海文的谈话，见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第 92 页。列多夫斯基称，斯大林回避了这个问题，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 21 页，但没有表明资料来源。

^② 《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4 页；《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541、458 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13-14 页。

^④ 同上，第 14 页。

算。1月中，毛泽东告诉斯大林，突破对上海的封锁以及占领台湾的计划将在三五天内制订出来。该计划将由刘亚楼将军带到莫斯科。毛请求斯大林派柯托夫、普鲁特科夫和阿夫塞维奇将军以及库兹明海军少将在刘亚楼的陪同下来华。他们作为军事顾问在北京工作；柯托夫可以大使馆武官身份出现。^①

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已接近中缅边界和中国—印度支那边界。因此，英国和美国都为共产党部队是否会越过边界这个问题而焦急不安。斯大林向毛建议，可以放出风来，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越过缅甸和印度支那的边界，“以此来吓唬帝国主义者”。^②

毛泽东说，有些国家，特别是英国，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现很积极。但我们认为，不应当急于让他们承认。应整顿好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然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谈判。斯大林表示同意，但又说你们也没有必要主动挑起同英国和美国的冲突。如果需要向英国施加压力，那么可以通过广东省和香港的冲突去进行。然后，为了解决这种冲突，毛泽东可以出来进行调停。“重要的是不要急于挑起冲突 要避免冲突。”^③

接着，斯大林询问中国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回答斯大林的问题时说，上海外国银行继续开门营业，对象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暂时还没有触动的外国企业。日本企业已经收归国有。海关已掌握在政府手里。斯大林劝告毛，必须重视海关，国家可以从那里获得巨大收入。关于外国在中国的影响，毛说，英国人在经济和商业领域，美国人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仍有影响。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中共领导已经取得完全的胜利。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关于外国企业中是否有政府的监督员或代理

^① 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与科瓦廖夫的谈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533，第73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47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14页。

同上，第14—15页。

人的问题，毛回答说，有。政府正在研究和监督开滦煤矿和上海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等外国企业。斯大林建议，必须派监督员，合法地进行工作。必须让外国人比中国人缴纳更多的税。^①

斯大林还对钨、钼和石油的开采掌握在谁手里表示关心。（回答：在政府手中）他还劝告说，必须发展矿物开采业，特别是石油开采。看来，斯大林的这种关心并不是无私的，这表现在后来敦促对战略原料的供应方面，其中包括钨。^②这同样也表现在后来共同开采新疆石油方面。^③斯大林力图显示他对中国情况的熟悉，他建议毛修建一条从兰州到成都的石油管道，然后通过水路把燃料运出去。毛泽东说，他们还没有决定，应当优先发展那些地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他们对世界形势的发展还不清楚。斯大林简捷地回答说，石油、煤炭、金属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不管今后是否有战争。斯大林又问，在中国南方可否种植橡胶？，毛说到目前为止还未成功。斯大林又问中国是否有气象业务部门。当毛回答还没有建立时，斯大林建议建立这样的部门。^④

在谈话的最后，斯大林要求得到毛的已译成俄文的著作清单。毛说他正在审阅他的著作，由于这些著作由各地出版社出版，有很多错误和歪曲。他计划于 1950 年春审阅完毕。他希望在这方面能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首先是帮助搞好俄文译文，其次是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提供帮助。斯大林答应帮助，并问是否需要有一个编辑。毛说需要，并希望派一位合适的同志，比如说派一位中央委员，来办这件事。斯大林说，如果需要，可以这样

同上，第 15-16 页。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十一节。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16-17 页。

做。^①

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对毛的这一行为的评论，他认为毛请斯大林审阅他的著作是施展“一种自我贬低”的伎俩，为的是使斯大林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毛愿按斯大林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不追求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赫鲁晓夫说，这与中国后来的历史表现是完全相矛盾的。^②

1950年3月底，毛泽东再次提出他的这一请求。他告诉斯大林，北京打算不久就开始出版他的著作。^③斯大林答应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去中国，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毛泽东请斯大林告诉他，这位同志何时能到达。斯大林派给毛泽东的既不是一位中央委员，也不是当时苏联意识形态的领导人马尔克·米丁，而是另一位著名的意识形态专家，帕维尔·尤金，他在1948年与南斯拉夫的争论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1950年7月至1951年10月停留于北京期间，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编辑工作。选集的头三卷的中文版于1951年至1953年编辑出版。俄文版于1952年至1953年在莫斯科发表。作为回报，毛泽东也让出版斯大林著作的中文版。1950年2月王稼祥大使得到

同上，第17页。师哲错误地把这一谈话说成是在1950年2月回国前的一次谈话。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设备》第459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载于《历史问题》1992年第11-12期，见第75页及下页。

此句和以下两句参阅1950年3月30日毛泽东通过罗申给斯大林的电报，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I》，第48页。

了苏联对这项计划的赞同。^①

毛对他当年请编辑的考虑作了另一种解释。1958年他对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不是他没有自信心，从而不得不请莫斯科帮助他审阅他的著作。不是的，他是要以这种方式请他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出，毛的这段话针对的是斯大林，他怀疑毛可能是一个中国的铁托。^②毛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这很难说。很可能是以上三种动机兼而有之。

师哲认为，12月16日的会谈是在沉重的气氛中结束的。对毛来说，关于条约讨论的结果是不幸的。在他看来，以新约代替旧约是一个原则问题，是对旧中国外交遗产的否定，是新中国外交的决定性组成部分。斯大林的拒绝态度在两人之间树起了一个心理障碍。科瓦廖夫确认，毛所期望的充满信任的谈话没有出现。从现有的各种材料来看，这种估计是可信的。尽管毛在他发给刘的电报中说，会谈时“情意恳切”^③，但这也不能推翻上述估计。毛这么说，很可能是他不愿向北京的同志承认与斯大林的会谈进展不顺利。^④

纵观12月16日的会谈，可以确认，关于条约问题的意见不

此段参阅彼得·库弗斯：《一位跟上时代的英雄》——关于一部被禁的俄文毛选版本和中苏对话，载于卡尔·海因茨等（编著）：《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汉堡，1993年，第238-303页及全文；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9页；1950年2月27日王稼祥给马林科夫的信，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卷宗3102，案卷9，第107页，关于尤金参阅《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0卷，1978年莫斯科版第364页；《哲学百科全书》，第5卷1970年莫斯科版第596页。

参阅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中方记录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16页及下页。尤金于1953年至1959年任驻中国大使。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7页。

此段参阅 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P.51. (在师哲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中没有这一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7页)；《科瓦廖夫，II》，第89页。

一致是会谈中出现的惟一的一个重大分歧。正如 7 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刘少奇所做的那样，他避免把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说成是不平等的。他也不愿意像米高扬 1949 年 2 月在西柏坡那样，把旅顺口的协定定性为是不平等的。他在 2 月和 7 月都宣称，只有在缔结了对日和约后才能废除这些条约和协定。他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已断然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他在这里指的是包括有关协定的整个条约，因为他明确指出，他要在形式上保留关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他同时提出，苏联军队实际上可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从那里撤出，中长铁路也可作实际上的修改。这一点，他也曾对米高扬和刘少奇说过。

类似的情况是，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曾拒绝了苏联撤军的建议。毛当时的拒绝可能也是真心的，因为他当时似乎担心美国会进行有利于国民党的军事干预。毛确信，只要苏联军队驻在那里，美国至少不会对东北进行干预。毛的这一判断显然是正确的。从费德林的记录看，使人不明白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宣称，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从其他资料来源看，以及从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谈话看，这不符合他的真实想法。毛在 12 月 16 日清楚地表明，他力求尽快废除旧条约，缔结新条约。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他要以此来结束中国的殖民地时代，并同时为废除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开创一个先例。

不能得到证明的还有：为什么斯大林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在 12 月 16 日会谈开始后根本不讨论立即废除或修改条约的问题。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可信的推测是：斯大林说的是实话，他担心华盛顿和伦敦会把这视为对雅尔塔协定的突破，并导致对雅尔塔协定中其他协议的废除，如：把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交还给苏联的协议。当然，在毛泽东小心翼翼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后，斯大林宣称，可以在大约两年后对整个条约作“相当大的修改”。

12月16日出现的重大分歧是：斯大林要暂不作任何修改地保留整个条约，但提出苏联军队可实际上撤离；而毛泽东则相反，他要立即废除旧条约，签订新条约，但对苏联军队立即撤出不感兴趣。

六年后，毛泽东在与苏联驻北京的大使谈话时，对斯大林12月16日的态度作了如下的描述：“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我就提出签订国家之间的条约的建议，但斯大林避而不答。”^①这不符合事实。斯大林完全没有回避，而是明确声称，他反对缔结新条约，主张暂时保留旧条约，甚至反对作任何修改。不过，他也考虑对条约的几个内容作实际上的改变。

第四节 “别墅中的困惑”：第一幕

12月18日，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拜访毛泽东，并与他一起吃晚饭。^②两天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起来看毛泽东，主要谈关于斯大林寿辰的庆典安排问题。^③这两次都没有谈毛泽东关注的问题。科瓦廖夫还提到布尔加宁的访问，称它是“简短的官场式谈话”。^④

费德林每天都来看毛泽东。^⑤科瓦廖夫也经常与毛保持接触。他观察到，毛“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当他向斯大林汇报时，斯大林回答说，现在来的客人很多（显然是指参加他生日

^①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苏方谈话记录，载于《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第105页。

^② 《汪东兴日记》第159页。

同上，第160页。

^④ 《科瓦廖夫，II》，第89页。

^⑤ 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第185页。

庆典的客人），不应突出毛一个人。^①

中国代表团送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有：斯大林的绣像，中文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和象牙雕刻等。它们都按斯大林的指示被展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的第一号展厅，那里装饰着五星红旗和毛泽东的题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②

毛泽东 12 月 19 日发出的斯大林 70 寿辰贺电很短，很一般，只有一句话：“主席先生！值阁下七十寿辰之际，我荣幸地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全世界的和平堡垒苏联在阁下领导下日益巩固和发展。”^③这与西方国家首脑，如艾德礼、戴高乐和阿里奥尔等的贺电几乎一样，都是一句话。但它完全不同于来自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贺电，它们至少长 6 倍，而且充满阿谀奉承的语言。也许，毛泽东是有意识地要与他们有所不同，以显示中国的独立性。此外，也许他想以此来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

毛泽东不愉快的原因明显地表露在 12 月 20 日他约科瓦廖夫来别墅的一次谈话之中。毛让科瓦廖夫把那次谈话记录由费德林翻译后交给斯大林。他请求于 12 月 23 日或 24 日与斯大林举行一次新的“正式会见”。毛泽东对会见时的谈话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讨论苏中条约，贷款、贸易和航空协定及其他问题（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等问题）。如果实行这个方案，必须让周恩来来莫斯科来，以便讨论和签署这些协定。在周启程来莫斯科期间，他本人可去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参观。第二个方案是：仍然讨论同样的题目，但不签订上述条约和协定。如果这样，周恩来就不必现在来，而是在以后需要签订有关协定时再来。显然，毛重新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II》第 89 页。

此段参阅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第 181 页。

③ 《真理报》，1949 年 12 月 24 日第一版。

把条约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的首位。^①

毛泽东还对科瓦廖夫说，他想会见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什维尔尼克。毛还希望科瓦廖夫和费德林能常来同他讨论一些问题。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他没有每天都去看毛泽东，正因他不愿按其要求经常同他讨论问题，这才使他提出这一指责。毛还希望在斯大林 70 寿辰庆典时，科瓦廖夫和费德林能在他的身边。

从 12 月 20 日与科瓦廖夫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自 12 月 16 日以后没有再约定一个新的日期与毛继续进行实质性会谈。这使毛泽东感到很不高兴。毛泽东要求能应邀与上述领导人会谈，这也同样表明毛感到受冷落。如前所述，他虽然与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会过面，但如科瓦廖夫所说，那只是短暂的、礼节性的会面。此外，苏联领导人只是到别墅来探望他，而毛泽东更注重的是应邀去他们那里进行访问。科瓦廖夫描绘毛当时的处境时说：他在 12 月 16 日与斯大林会谈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②

赫鲁晓夫也作了类似的描述。赫鲁晓夫自 1939 年起进入政治局，1949 年 12 月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作为新的中央书记和莫斯科区委书记与斯大林保持着紧密的接触，他“因此也经常参与有关中国的问题”。^③赫鲁晓夫说，在第一次会晤后“斯大林几天都没有与毛见面。他自己（即赫鲁晓夫——作者注）也没有与他会面，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到毛那里去”。显然这后一句话是不对的，但他在最后又证实，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按

此段和下段参阅 1949 年 12 月 20 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关于同毛泽东谈话的报告，见：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238 f. 以及《科瓦廖夫 II》，第 89 页及下页。（是报告的摘要，报告的日期也注错）

同上，第 89 页；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第 184 页。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及《历史问题》1992 年第 11-12 期，第 73 页；另参阅 <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 . P.240.

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毛泽东在 12 月 19 日给北京政治局的电报中对他的情况作了粉饰性的描述，他说：“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十八日电的回答。”^①

据科瓦廖夫后来回忆称，尽管他把 12 月 20 日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交给了斯大林，但在这之后，毛泽东的处境基本上仍没有变化：他实际上仍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态。为了报复，当罗申大使要求与他谈日本共产党问题时，毛泽东拒绝接见。^②

第五节 斯大林 70 寿辰和毛泽东的角色

12 月 21 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斯大林 70 寿辰庆典上，毛泽东受到了无可指责的很高的礼遇。斯大林在众多的有名望的人士面前突出了毛泽东，他让毛在主席台上挨着他的右边就座，在毛的右边是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③

此外，毛泽东也享受到这样的荣誉：作为第一位外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在简短的、由费德林翻译的贺词中，毛泽东表现谨慎。据苏联官方报道，他的贺词被“热烈的掌声”5 次所打断，并在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在他的贺词中只有一处使用了称颂的修饰语，相比之下是比较纯朴的。13 位外国党政领导人的贺词几乎都沉浸于阿谀奉承的言词之中，如：“智慧的、受人爱戴的

^① 1949 年 12 月 19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193 页。

^② 《科瓦廖夫，II》，第 90 页。

见 1949 年 12 月 22 日发表在《真理报》头版上的照片。与中国发表暗地照片相比较，可以发现，在《真理报》的照片上几个不重要的人被抹去了，其中包括站在毛后侧的师哲；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始页的第 3 张照片。另参阅《汪东兴日记》第 161 页。师哲错误地说，站在毛泽东右边的是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1 页。

斯大林同志（匈牙利）；我们敬爱的导师和领袖”和“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保加利亚）；伟大的天才（捷克斯洛伐克）；天才的导师和领袖（罗马尼亚）；智慧的领袖和导师（蒙古人民共和国）；天才的舵手”和“世界各国人民爱戴的领袖（乌布利希）。苏联国内代表的贺词就更为过分了。大多数的发言人都力求以更加形象的语句来称颂斯大林，例如：“高挂在世界之上的太阳（白俄罗斯共和国）；我们敬爱的父亲（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祖国的父亲（乌克兰）；人类伟大的天才（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庆典进行过程中斯大林多次同毛泽东说话。但据师哲称，无论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怎样引逗，都未激起毛的一丝微笑。毛一直沉默寡言，严肃静思。^①

据费德林称，在毛泽东讲话时发生了一件使毛感到不愉快的事。当他讲话完毕时，他把话筒让给费德林，以便由他进行翻译。斯大林则对毛喊道：至少应宣布一下，现在是他的翻译，而不是一个新的发言人讲话。这使毛不知所措，并在发言稿中寻找费德林的名字。斯大林接着说，不要这么慌乱嘛，告诉他的名字。毛以“颤抖的声音”宣布了费德林的名字，然后费德林就开始翻译。简直很难相信，斯大林竟然如此粗暴无礼，使毛当众出丑。这显然纯属捏造，这可能是费德林爱好戏剧化的习气所致。^②

此段参阅 1949 年 12 月 22 日《真理报》第 1-4 版；1950 年 1 月 23 日《人民日报》第 1 版；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1 页；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2 年第 5 期，第 98 页。毛泽东讲话的中文本见 1949 年 12 月 23 日《人民日报》俄文本见 1949 年 12 月 22 日《真理报》第 3 版。毛是惟一的外国客人在《真理报》上被注明：他的讲话结束时，全场起立。毛泽东在发回北京的报告中说，他的讲话“被热情”接受。大家三次起立和长时间地鼓掌。根据毛的指示，在中国发表消息时按照苏联塔斯社新闻稿发表。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196 页。

^② 此段参阅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2 年第 5 期，第 98 页及下页。

庆祝大会后，宾主共同进餐并观看演出，毛泽东和斯大林坐在一个曾是沙皇专用的包厢里。演出结束后，观众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①在斯大林生日的第二天晚上，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宴会和文艺演出。毛泽东被安排在主桌，坐在斯大林旁边。^②同样表示尊敬的是这一事实：作为宴会主持人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什维尔尼克，在为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苏联政府等祝酒后，开始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和人民祝酒，他的祝酒是这样开头的：“为中国人民，为在大厅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③

据汪东兴称，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个从晚上 8 点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1 点的宴会，他不习惯这样长的庆典，感到累了。毛泽东后来抱怨说，吃也没好吃的，看也没好看的。回去后不能学这个。^④

斯大林在公开场合这样对待毛泽东，肯定对他自己是有利的。毛泽东刚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了胜利，是“获得非凡成功的当代非俄罗斯国家”^⑤的领导人。斯大林在无数共产党首领、国家领导人和群众运动的代表面前显示他本人与毛泽东的亲近，这只会提高他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⑥

在中国，人们也举行了盛大的活动，庆祝斯大林 70 寿辰。在生日的前一天，中苏友好协会举行了招待会，毛泽东以下的最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1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8 页。在《外交史》这一出版物中错误地把大会后观看的演出是芭蕾舞《天鹅湖》，这显然是与 1950 年 2 月 13 日毛泽东观看《天鹅湖》相混淆了。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十节。

② 《汪东兴日记》第 163 页。

③ 《真理报》1949 年 12 月 23 日，第 1 版。

④ 《汪东兴日记》第 164 页。

这是美国驻苏联大使 1949 年 12 月 18 日在他发给国务院的一份关于毛到达莫斯科的报告中这样说的，见：FRUS 1949, Vol. VIII, P. 637。

⑥ 冈察洛夫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见：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 90.

高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出席了招待会。在生日的当天，有 210 个“人民组织”的 2 万多人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表示祝贺，有上百万的中国人在祝贺的名单上签了名。^①

第六节 斯大林对毛的试探：12月24日谈话

12月22日，即举行宴会的那天，斯大林告诉毛泽东，同意毛两天前的建议，在23或24日举行第二次会晤。毛当即把这一新消息电告北京，并说：“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并将电告你们。”^②12月23日斯大林通过王稼祥约中共领导人，从24日开始，与政治局和斯大林进行会谈。^③

据中国的资料称，12月24日举行的会谈持续了约4个小时。除毛泽东外，中方参加人有：陈伯达、王稼祥和师哲（翻译）。如前所述，毛泽东在4天前通过科瓦廖夫转告斯大林，他首先感兴趣的是谈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问题，以及贷款、贸易和航空协定。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斯大林在12月24日只字不谈条约问题。主题却是越南、日本和印度的兄弟党形势。毛说，中共准备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支持胡志明的抵抗运动。斯大林说，中共可按这条道路走下去。但在这次会谈结束时，斯大林又

塔斯社发自北京报道，见：《真理报》，1949年12月22日第6版。

此段参阅1949年12月22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19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8页。另参阅 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 P.51.

③ 《汪东兴日记》第164页。

没有提出下一次会晤的日期。^①

几年后，毛泽东对苏联驻北京大使谈起与斯大林的会谈时说，他在 1949 年 12 月 16 日第一次同斯大林会谈时，就提出建议签订一个新的条约，但斯大林避而不答。“在第二次会谈时，我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并将中共中央提出同样请求的电报交给斯大林。我建议，为了签约把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则利用我这个建议作为回避的借口，他说，‘这样做不恰当，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叫嚷整个中国政府都到莫斯科了’。”^②

第七节 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告密报告

如前所述，斯大林在 12 月 16 日第一次会谈时明确表示，他不愿签订新的条约，但他认为现在或以后对旧约作些修改是可以的。在 12 月 24 日会谈时，斯大林完全不理睬毛泽东的意愿，根本不准备谈条约问题。这可能也与他当时对中共领导产生的新的极度不信任有关。在与毛泽东举行会谈前不久，他读了科瓦廖夫的题为“关于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实践中若干问题”的书面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8 页及下页；《汪东兴日记》，第 164 页及下页。魏石岩（音）：《第一次……》，第 304 页；邱京（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载于《党的文献》1996 年第 2 期，第 53 页；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P.52。至今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记录。估计，苏联的记录可在总统档案馆找到，编号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239，第 18-28 页。作者曾试图弄明白此事，但无结果。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来访者名单中也没有表明有这次会谈，见：《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载于《历史档案》1996 年第 5-6 期，第 60 页。可见，这次会谈是在其他地方举行的。

^②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苏方谈话记录见：《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105 页。

告。^① 这份报告是科瓦廖夫在来莫斯科前两周开始写，并在火车上完成的。鉴于这份报告具有很大的爆炸力，他担心会引起麻烦，他曾劝说费德林同他一起在报告上签名，但未能如愿。12月24日他以个人名义把这份报告递交了斯大林。^②

科瓦廖夫对中共领导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在报告中试图让斯大林相信，北平的领导人是不可信赖的，因为他们具有资产阶级的、亲西方的、反对苏联的倾向。报告陈述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科瓦廖夫从高岗那里秘密获得的情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科瓦廖夫不断上报这些情报，也确实使斯大林感到很“震惊”（赫鲁晓夫语），斯大林还把其中的几份情报在苏联党中央领导人中传阅，政治局委员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了解到了一些有关情况。^③

科瓦廖夫在报告中指责中共领导无视斯大林的忠告，力求尽快获得美国和英国的承认，尽管美英仍在积极地支持蒋介石。在这方面，中共领导屈从于“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其他资本主义分子”的压力，他们要通过华盛顿和伦敦的尽快承认，使中国资产阶级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阻止中国民主化的发展和中苏友好的加强。在中共党内和中央委员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过去曾是亲美反苏的，而现在却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所支持。在中

显然能看到档案材料的薄一波，发现了斯大林阅读科瓦廖夫的报告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拖延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婉转地补充说，苏方“一段时间是不够积极的”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第一卷第40页。

^②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I》，第90页；《科瓦廖夫，II》，第82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第一卷第40页；科瓦廖夫的日期和回忆录（两者均未发表），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91, 240 ;刘杰成(音):《毛泽东与斯大林》，第130页。另参阅 <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 P.242 f. 赫鲁晓夫记不起科瓦廖夫的名字，回忆录的出版者又错误地把他说成是后来的苏联驻北京大使潘友新。见同上第243页，注24。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I》，第90页及下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8；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 P.52 ; <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 P.242 f.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第一卷第40页。

中央政府中，民主人士的比例很高，政府实际上已变成形形色色的党派联合体。^① 科瓦廖夫自己也认为，他在报告中“对中共领导所进行的批评性评论是相当尖锐的”。^② 看来，他主要攻击的是周恩来和刘少奇。^③ 科瓦廖夫在前往莫斯科之前报告说：周恩来看来“态度消极”，他反对派苏联专家去上海和天津，因为美国和英国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哪里；刘少奇和李立三为了不愿激怒美国和英国，反对来自日本、印度和其他受英美集团控制的国家的代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会议；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的毫无理由的批评。看来，在科瓦廖夫的这份报告以及在此之前递交的关于中共领导的报告中，毛泽东不在批评之列。^④

几年后，毛泽东谈到这份报告时，把它称之为“科瓦廖夫的关于中共领导人反苏情绪的声名狼藉的文件”，并认为这份报告也反映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不信任。^⑤

第八节 “别墅中的困惑”：第二幕

毛泽东的警卫汪东兴说，12月26日晚，毛泽东与斯大林再次进行了约5个小时的会谈。但这只有他一人这么说，可能性似

科瓦廖夫的报告肯定是内容广泛的，至少由12个部分所组成。但这份报告至今没有全文公开。此处和以下陈述的内容主要是来自两个出处：《科瓦廖夫 II》的第82-83页有关外交部分，以及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第一卷第40页。薄一波显然看到了报告的文本。

^① 《科瓦廖夫 II》，第91页。

赫鲁晓夫是这么说的，他的根据是科瓦廖夫在那几个月向苏联领导递交的报告。此处和下段参阅 <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 , P.243。

赫鲁晓夫是这么确信的，他的根据是科瓦廖夫在那几个月向苏联领导递交的报告。但他又说，毛泽东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对这些煽动反苏情绪的人。见同上。

^⑤ 1956年毛泽东与尤金大使的谈话，苏联的谈话记录，见：《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第106页。

乎不大。汪也没有说这次会议的内容。他接着又说，在第二天会谈结束后，毛对他说：苏联方面始终不能理解中国的革命，尽管刘少奇夏天访问莫斯科时已向苏方作了详细介绍。实际上，斯大林始终怀疑中国共产党人的能力，并对国民党存有幻想。毛还说，中国在管理方面有困难，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①

在别墅里，毛泽东忙于处理中国的国内和外交问题，如缅甸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打开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贸易关系问题，以及占领海南岛的问题等。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他与北平的党中央保持着经常的电话联系。其余的时间就用于在积雪很深的别墅院内散步和看电影。这些电影是主人提供的，其中有俄罗斯历史人物的传记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此外，还有卓别林的电影，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影片等。有 5 位苏联专业医生给毛泽东作体检，他们确认毛的器官功能正常，但精神有些疲劳。他们给毛开了维他命和安眠药，劝他戒烟、禁酒、禁肥肉，还要多运动，防止肥胖。^②

据毛泽东几年后自己对苏联大使尤金称，在第二次会谈（显然是 12 月 24 日的会谈）后，形势进一步紧张。“以后斯大林不愿同我进行任何会见。从我方面曾两次试图向他的住处挂电话，

^① 《汪东兴日记》第 167 页及下页。冈察罗夫等三人说，毛泽东在 12 月 23 日至 30 日与斯大林共进行了三次谈话，这也不确切。所说的 25 日的会谈可能就是 24 日开始、持续到午夜以后的那次会谈，或者就是 30 日的那次会谈。据他们说，在那次会晤中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提出问题，没有直接把电报交给斯大林，而是通过电话，即通过使者转告了电报的内容。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91。

此段参阅《汪东兴日记》，第 160、162 页及下页、165、169 页及下页；使者《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1 页；魏石岩（音）：《第一次访……》，第 304 页；1949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197 页；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第 184 页。

但我得到的回答：斯大林不在家，并建议我同米高扬会面。这使我感到羞辱。‘因此，他决定什么也不干，在别墅里睡大觉’。^①

在中国的出版物中还有另一种不大可信的说法，他显然是为了粉饰毛泽东当时所遇到的尴尬和羞辱性局面。按这种说法，斯大林在 12 月 24 日会谈后多次打电话给毛泽东，问候他的生活情况，询问他有什么愿望和想法。斯大林在 12 月 25 日的电话中表示，他本想亲自来看毛，但保卫人员和保健医生不让他出门。^②

比较可信的是王稼祥大使夫人的报告，她当时随丈夫在莫斯科。据她称，中苏会谈陷入了死胡同。斯大林避而不见，使毛泽东“冷落在这里”。毛很忧虑。斯大林则是“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克里姆林宫”。^③

毛继续“在别墅里睡大觉”。由于斯大林长时间不接见他，在新约和其他实质问题上又毫无进展，毛对此日益感到不高兴。12 月 20 日他曾表示希望得到个别苏联领导人的接见，但这一愿望也没有得到重视。1950 年 1 月 2 日他抱怨说，他“到现在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人”。^④月底，毛泽东的愤怒爆发出来了。科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时，毛对科瓦廖夫责怪说：把他叫到莫斯科来，又什么事都不办，究竟干什么来的？难道就是为了来这里天天吃饭、拉屎、睡觉？来这里是为了办点事！有重要的双边关系问题必须谈。谈话时，“感到痛苦和愤怒的毛”用手指着莫斯科的方向嚷道：“不好，不好！”这似乎表

^①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苏方记录，见：《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105 页及下页。

^② 此段参阅《汪东兴日记》，第 165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体》第 437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9 页。

此段参阅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第 187 页。

1959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12 页。

示，他的恼怒不是针对科瓦廖夫，而是针对克里姆林宫的。^① 师哲报道说，苏联客人告辞后，毛泽东的情绪很好，高兴地对他讲，他教训了科瓦廖夫一番，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②

几年后，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证实了他对科瓦廖夫所演的那一幕：“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③

在此两年多前，毛泽东对尤金阐述这段事件时表述得不那么戏剧性。毛泽东说，在斯大林拒绝会谈后他决定什么也不干，整天呆在别墅里。然后，“同科瓦廖夫和费德林进行了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到各地去参观。我不客气地拒绝了，并回答说，我宁愿在别墅睡大觉”^④

斯大林不仅从科瓦廖夫和费德林那里得到关于毛泽东不满的消息。据米高扬称，毛泽东居住的别墅是被监听的。^⑤ 斯大林通过这一途径得知，毛泽东同他的亲信谈话时说，他也许就要回国了。要不他同斯大林会晤，要不他就立即启程回国。

当时，赫鲁晓夫也得知这一威胁。他在回忆录中说：“毛就这样开始对他被监禁在指定的官邸里表示不满，人们什么也不给

科瓦廖夫未发表的回忆录，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92。

^②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7 页及下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9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第一卷第 41 页；魏石岩（音）：《第一次访……》第 304 页。

参阅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中文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4 年第 1 期，第 17 页。

参阅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见《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106 页。尤金在引用“在别墅睡大觉”一句时加了引号。

此处和以下两句参阅米高扬对其子塞尔戈·米高扬提供的这一信息。

他看，谁也不同他会面。他宣称，如果这样下去，他就启程回国。”^①

可以认为，毛泽东知道他被窃听了，并以回国来威胁，对斯大林施加压力。斯大林对此作出了反应^②，他于12月末派莫洛托夫到毛的别墅，并对莫洛托夫说，去看一下，“这是个什么家伙（shto za tip）”。莫洛托夫回去后说，毛泽东是一个聪明的农民领袖，是中国式的普加乔夫，“自然”距马克思主义者还相差很远。据莫洛托夫说，毛对他承认，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这种评论典型地反应了斯大林及其少数亲信对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同志的诋毁，而他们却把自己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继承人和经典学说的解释者。会面时，毛泽东曾问莫洛托夫，他什么时候能见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在谈话结束后建议斯大林接见毛，认为这是适宜的。^③

据中国的一个出版物称，毛泽东在与莫洛托夫谈话时简要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党内斗争等问题，从侧面疏通双方的思想隔阂。^④ 师哲证实了上述谈话内容，并补充说，莫洛托夫对这一谈话并不怎么感兴趣。^⑤

1月1日，罗申大使受外长维辛斯基的委托拜访了毛泽东，毛这次的态度比对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态度要温和得多。但他仍然再次敦促与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会晤。

罗申说，这次谈话的前一部分是“友好与亲切的”。毛还谈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载于《历史问题》1992年第11-12期，第73页。< khrushchev Remembers . The Last Testament > , P.240. （英文本的译文不太准确）

②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曾对其子塞尔戈·米高扬说，莫洛托夫去看毛泽东是对毛启程回国这一威胁的反应。作者感谢塞尔戈·米高扬提供了这一信息。

③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朱耶夫日记》，1991年莫斯科版，第114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7页。莫洛托夫究竟是哪一天去访问的，至今还不清楚。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9页。

⑤ 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 P.52.

到他的健康状况。毛说，经过两周休息以后，他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在最近的4天里，每天可正常睡眠8小时，没有专门服用安眠药。但外出散步不能超过一刻钟，否则会头晕。因此他准备完全静养一周。然后，他希望同斯大林会见，进行实质性的交谈。他还希望会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全体政治局委员）什维尔尼克（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外长维辛斯基，进行“简单座谈”，不赋予“专门的题目”，不讨论“实质性问题”。他建议每天安排一次访问，时间不要过长，最好是在晚上5-6点钟。^①

原先毛泽东说，他要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要把逗留时间缩短为2个月。他打算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6日回到北京。在完成了与斯大林的实质性的会谈之后，他想在回国前的余下时间里向列宁墓敬献花圈，访问集体农庄，看看戏。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大报告，也不想公开演讲。因为从他的健康考虑，这些事是令人疲倦的，而且会重新破坏他的睡眠，并促使头晕复发。原先，他曾打算到苏联各地去看看，而现在由于健康状况和将要进行回国的漫长旅行，他准备放弃这些打算。^②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消息说英国和英联邦全体国家也准备承认北京。此外，毛还谈到中国的军事形势。罗申谈到苏联政府想把数百名在华犯有罪行的日本战犯交给中国。鉴于中国的诉讼程序尚未建立以及首先要审判国民党罪犯，毛泽东建议战犯的移交推迟到

^① 此段参阅罗申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卷宗302，案卷10，第1-4页。第一份记录是给外长维辛斯基的，第二份是给外交部远东司的。

^② 同上，第3页。

1950年的上半年。^①

与毛泽东谈话和共进晚餐后，罗申从翻译师哲那里得知，毛泽东已经有三天感觉好多了，不服药睡眠正常，常开玩笑，心情愉快，喜欢与所有的人交谈。但和从前一样还不能长时间在外边停留，仍然头晕。1月2日医生要为他进行会诊。^②

谈话记录给人的印象是，毛对罗申丝毫没有流露他的恼怒，但在不久前与科瓦廖夫谈话时曾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他的恼怒。关于他的健康状况作为拒绝在苏联旅行的理由显然是一种借口，因为在第二天，当条约问题首次出现解决的迹象时，他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达成了一致意见，去列宁格勒和高尔基城访问。^③

毛泽东把他同斯大林的会谈视为首脑间的、两党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商谈他与斯大林之间所要处理的事务。因此，他对罗申表示，他只愿与斯大林，而不是与苏联的其他领导人讨论“实质问题”。这显然也是毛不同罗申谈条约和其他协议的原因，他甚至也没有同罗申谈他当天要进行与塔斯社记者的谈话^④。毛把罗申只看做是传达其下周与斯大林会晤这一愿望的使者。此外，毛对罗申的成见在这方面似乎也起了作用。这一点在前面已有所论述。^⑤从毛对科瓦廖夫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始终把科瓦廖夫看做是斯大林在中共领导的代表，因此他有理由认为，科瓦廖夫有直接通往斯大林的渠道。

人们可以肯定，毛泽东对科瓦廖夫的戏剧性表演和他要回国的威胁，对斯大林起到了预想的作用。但是，对斯大林改变想法起关键作用的显然是其他的、下面将描述的事态发展。

同上，第 1-4 页。

同上，第 4 页。

后来之去了列宁格勒。详见第四章第十节。

参见下面的第四章第九节

参见第三章第十节。

第九节 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已两个星期了，而公众舆论对会谈的进展情况和结果却一无所知。自斯大林 70 寿辰庆典之后，苏联的媒体大约有 10 天没有提及毛泽东。这在国外引起了种种的猜测，其中，英国新闻社传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①

中国代表团为此很着急^②。斯大林也有些着慌。这也涉及个人形象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声誉问题。当时为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在回忆毛在莫斯科的情况时说：“斯大林想造成这样一个印象：我们同毛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是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③ 1月1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必须回击这一谣言。可能是王稼祥与莫洛托夫谈话时提出建议，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来回应。这个由 3 个问题和 3 个简短回答组成的《答塔斯社记者问》于 1月2日在《真理报》的第 1 版发表了，谣传也就开始消失。^④

在《答塔斯社记者问》中，毛泽东先对中国的良好发展形势作了简要的说明，然后就对他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他打算住几个星期。他逗留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

此段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9 页；《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11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8 页；魏石岩（音）：《第一次访……》，第 305 页；《汪东兴日记》，第 171 页及下页；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92, 及资料来源的提示。但都没有说明，什么新闻社发表了这条报道，什么时间发表的，报道的全文是什么。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9 页。

③ <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 . P.240.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9 页；Shi Zhe / Chen Jian: < With Mao and Stalin > , P.83; 《汪东兴日记》第 172 页 王军延（音）：《中国外交演绎——新中国初期》1995 年北京版第 23 页及下页，没有注明资料来源。关于在中国和西方的舆论反应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93.

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构成这一通告的核心是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毛泽东在回答他考虑的问题时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区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①

《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文本是科瓦廖夫 1 月 1 日受斯大林委托交给毛泽东的，虽然是草稿的形式，但斯大林已在上面签了字。毛泽东阅后说：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他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补充。关于《答塔斯社记者问》中提及的旅行计划，如过去已表示过的那样，他希望访问列宁格勒，并提出在 1 月 22 日或 25 日以前留在莫斯科。在此期间，他愿“与斯大林会晤几次”^②，以便商谈答记者问中提到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请科瓦廖夫转告斯大林，如曾提过的那样，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和布尔加宁，以及会见维辛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他询问，他怎样才能与这几位领导人个别地或一起进行会晤。他还表示有兴趣与陶里亚蒂谈话。^③

毛泽东对答记者问后出现的新形势很满意。在同科瓦廖夫一起吃晚饭时，毛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并对斯大林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实行中国革命方面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他使用了许多恭维话，他当然知道科瓦廖夫会把他的这些讲话立即报告他的委托人。毛泽东说，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问题提出的“12 个条

^① 1950 年 1 月 2 日《真理报》。在同一天，这个（答塔斯社记者问）也由新华社通讯社发布了。见：1950 年 1 月 3 日《人民日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06 页及下页。此段另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0 页；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92。

^② 1950 年 1 月 2 日科瓦廖夫为斯大林写的关于他 1950 年 1 月 1 日与毛泽东谈话的纪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533，第 61-62 页，按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 28 页及下页。

件”和他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已成为中共的纲领和指导路线。接着，他别有用心地说：这两个文件帮助人们粉碎了“一度为王明所遵循的”左的和右的托洛茨基倾向，使中国共产党变得强大和统一了。而斯大林比谁都明白，王明的责任就是在中共内部贯彻斯大林的路线。毛泽东以一种充满激情的、向苏联领导人表示敬意的语言结束他的祝酒：“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没有苏联共产党（布），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万岁！”晚餐后，翻译师哲“秘密地”告诉科瓦廖夫，如果某位政治局委员到别墅来拜访毛，他将会很高兴。^①

毛泽东实际上是可以对这种新的、由于《答塔斯社记者问》而出现的形势表示满意，因为他获得了一个机会，向世界舆论表明：他对现有的条约不满意，对他来说最优先要处理的问题是条约问题。而斯大林同意全文发表这个《答塔斯社记者问》，这表明他终于准备把条约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这也就意味着，斯大林1949年12月16日的声明已被废弃了，当时斯大林曾宣称：苏联领导已决定“对这个条约不作任何修改”。《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发表标志着莫斯科的谈判有了突破。王稼祥大使的夫人，作为事情经过的见证人，证实了这一估计，她说：“缓解了僵持状态，搞活了关系 打开了局面。”^②

几年后，毛泽东在北京对苏联大使尤金说：这个文件宣布，在莫斯科正在进行签订苏中条约的谈判。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斯大林之所以改变主意，很可能是因为印度人和英国人在

^① 1950年1月2日科瓦廖夫为斯大林所写的关于他1950年1月1日与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533，第61-62页，按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29页及下页。

^② 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第188页。此段还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0页；Goncharov/Lewis/Xue：《Uncertain Partners……》，P.92 f., 106。

1950年1月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①

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不仅是对《答塔斯社记者问》发表的意义所作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对斯大林改变态度的原因所作的分析也是可信的。从各种迹象看，毛泽东自己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如前所述，在1月1日，毛泽东接见了罗申大使，并在谈话的一开始就引人注目地指出，印度和英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②而当天晚上，科瓦廖夫送来了斯大林批准的《答塔斯社记者问》的草稿。第二天，毛泽东把他收到的一封电报转给了斯大林。在这封电报中，周恩来复述了尼赫鲁的外长发来的印度承认人民共和国的电报。^③北京的上述行动和它与西方关系的改善，这实际上与上述理由一起构成了促使斯大林改变态度的重要因素，斯大林终于在条约问题上向毛泽东让步了。^④由于受科瓦廖夫报告的影响，斯大林一直以敏感的、猜疑的心情看待共产党中国与英国和美国的接近，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冒这样的风险，由于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疏远而激励了这一接近的发展。斯大林考虑的是如何插手共产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展，参与有关的决定。

完全可以设想，促使斯大林改变想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个因素是要回击关于中苏谈判破裂的谣言，另一个因素是要阻止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紧密接近。除此而外，还有

此处和下句参阅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的苏联记录，见：《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第106页。关于《答塔斯社记者问》另参阅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92 f。

1950年1月1日毛泽东与罗申大使的谈话记录，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卷宗302，案卷10，第1页。

③ 1949年12月3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1，案卷334，第2、12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31、38页。

持这种看法的还可参见Zubok /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 P.60。

另一个因素。这就是斯大林通过情报渠道得知，1949年12月30日华盛顿在一份定为“绝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中确定要改变美国对东亚的政策。这份文件的内容后来被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国行政当局不准备保卫台湾，并要从中国的内战中撤离出来。斯大林可能把这解释为，美国已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持容忍态度。这肯定会加强毛泽东的地位，毛在1949年底就不再相信美国会对中国进行干预。^①此外，斯大林可能已得出结论，华盛顿也将容忍莫斯科与共产党中国结盟。这样，莫斯科与北京以新的条约代替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也就不再会对雅尔塔协定产生负面的影响。^②

第十节 突破

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发表，宣告斯大林想法发生了转变。在发表的当天晚上，即1月2日的晚上，斯大林进入问题的核心，他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拜访毛泽东。这是12月16日以来第一次谈到条约问题。他们二人在20点开始谈话时，询问毛泽东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提出了三种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的公报，仅说明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3、签订

此处参阅 Chen Jian: < China's Road >, P. 89.

^② 此处参阅 Vladislav Zubok, < To Hell with Yalta! > — Stalin Opts a New Status Quo,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 Bulletin, 6-7, Winter 1995/1996, P. 35;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 98, 101;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P. 336-338. 关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记者招待会，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十二节。

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①

毛优先考虑的无疑是第一种方案。他说，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将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在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可以更有效地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实行第二种方案，可以将问题向后推迟许多年，以便以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如实行第二或第三种方案，周恩来就不必来莫斯科。^②

莫洛托夫立即表示同意实行第一种方案，并说周恩来可以来。为可靠起见，毛泽东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回答说：“是的。”接着，毛提出了一个时间表。如果周恩来 1 月 19 日到莫斯科，经过 10 天的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 月初他和总理可一起回国。毛还再次表示希望能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个别会晤。

莫洛托夫当即表示同意实行第一种方案，这说明斯大林已在事前作出了决定。在他看来，如果在《答塔斯社记者问》发表后再实行第二或第三种方案，这会被世界舆论看成是谈判的失败，这对他斯大林来说也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因此，斯大林从 12 月 16 日的立场上来了一个向后转。如前所述，斯大林当时曾断然拒绝签订新的条约。

我们之所以能了解上述毛泽东与莫洛托夫、米高扬会谈的过程，这主要应感谢毛泽东当天晚上发给北京党中央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在一开头就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的发

^① 1949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11 页及下页。关于这次谈话，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39 页及下页。显然，师哲依据的是 1949 年 1 月 2 日的电报。

^② 1949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11 页及下页。

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①

就这样，毛泽东实现了突破。持续两周的“在别墅里睡觉”也就结束了。其余的实质谈判将留给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后再进行。毛的轻松心情也表现在：他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谈话之后开始讨论下一段时间的庞大的旅行和参观计划。其中包括参观列宁墓、访问列宁格勒和高尔基城，参观集体农庄，以及接受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建议，参观莫斯科地铁和兵工厂。^②

毛在同罗申大使谈话时就已提出，他想在莫斯科和附近进行参观。但他同时指出，鉴于他的健康状况，他将放弃原先打算的在苏联的旅行。^③从现在达成的赴列宁格勒和高尔基城的旅行计划中可以看出，原先放弃旅行的理由只不过是一种托词，当时的真正原因是：签订新条约的前景暗淡。通过放弃旅行也是给斯大林一个信号，只要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的条约，他就不做那些能显示关系正常的事，如参观旅行。

1月11日，即周恩来启程来莫斯科的那一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旅行计划。他拜谒了列宁墓。接着，在陈伯达、王稼祥大使和翻译师哲陪同下受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的接待。^④第二天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兵工厂和一个集体农庄。^⑤

毛泽东原计划于1月13日至15日访问列宁格勒，他表示希望参观冬宫、斯莫尔尼宫和一个工厂，如有可能还想去喀琅施达

① 同上。

②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212页。

③ 参见本章的第九节。

④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0页；《汪东兴日记》第177页。

⑤ 同上。

特。^①

启程推迟了一天。1月1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王稼祥、师哲、一位中国少将武官及副手，以及苏联医生等的陪同下乘夜车前往列宁格勒，他在那里受到市苏维埃主席和市党委书记的欢迎。紧接着就驱车前往波罗的海芬兰湾，来到海边的喀琅施塔特，参观了冬宫，传奇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和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在参观沙皇的一个园林行宫时，人们解释说，原计划还要参观的一个中国厅，当天因正在整修，不能入内参观。毛泽东蔑视地对师哲说，俄国人大概不好意思让看这个厅，因为沙皇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又参观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保卫列宁格勒的防御工事及战场残迹。晚上，他参加了欢迎宴会，并去基诺夫剧院观看了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该剧的首场演出是1877年在彼得堡进行的。毛在斯莫尔尼宫过夜，1月16日17点回到了莫斯科。^②

在车站，悬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前来迎接的有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大使罗申和外交部有关司的司长。在苏联报纸上，毛泽东去列宁格勒的报道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表明斯大林需要在12月下旬完全没有报道之后向世界显示，与来自中国的贵宾的关系是正常的，虽然不是很热情。^③

^① 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与科瓦廖夫谈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533，第73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47页。

此段参阅1950年1月17日和18日《消息报》第一版；1950年1月17日和18日（真理报）第一版；1950年1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汪东兴日记》，第179页及下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2-444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533，第73页。

参阅1950年1月18日《真理报》第一版；1950年1月18日《消息报》第一版。

第十一节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友好表示

自1月2日斯大林在条约问题上作出让步后，他又进一步作出姿态，讨好北京的客人。1月4日，《真理报》发表了刘少奇在北京“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诚然，它的发表被推迟了一个半月之久。^①

在讲话中，刘少奇高度评价中国在实践中发展并有效实施的“武装斗争”认为它对具有类似条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各国人民的解放”具有榜样的意义。它是“主要道路”“毛泽东道路”。在工会大会举行之时，斯大林显然拒绝刘少奇的这一观点，认为它是“激进的左倾”观点。会上，亲苏的世界工联领导人激烈地批评了刘少奇，但斯大林考虑到与即将来莫斯科的毛泽东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没有公开表示拒绝的态度。^②

斯大林决定于1950年1月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刘少奇的讲话，这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斯大林在原则上承认“中国道路”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模式。更加明白无误地表示这一意思的是《真理报》第二天发表的文章。在这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的文章中，含蓄地对刘少奇的观点表示了赞同。^③文章中说：“中国人民的斗争是所有殖民地和不完全国家的人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榜样。”接着后面还引用了一段毛泽东的语录，这同样可以认为是斯大林对他的中国贵宾所表示的敬意。

与此同时，《真理报》还发表了以“战斗的中国”为标题的

^① 1950年1月4日（真理报）第3版。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此处和下两句参阅1950年1月5日《真理报》第6版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

18 篇连载文章。这组连载文章出自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之笔，他以颂扬英雄的风格描述了共产党在中国进行的胜利革命。最后一篇文章是以一段对毛泽东的称颂为结尾的：“以领袖毛泽东为首的、在战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最深切的愿望，正在坚定地领导着伟大的中国人民，迈步在和平与创造性劳动的道路上。”^①

同样可视为对毛泽东表示友好的是，《真理报》自 1 月 5 日起连续 5 天把第一版来自“兄弟国家”的栏目留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 4 天被列为头条。^②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3 个月里，它总共只发表了 5 条关于新中国的消息。^③在当时严格实行新闻检查的情况下，只有在最高机关的指示下才可能出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优先照顾。

斯大林为赢得毛泽东好感，还走出另一步。1 月底，斯大林把科瓦廖夫 12 月 24 日递交给他的指责中共领导及其政策的告密信交给了毛泽东。与此同时，他还把科瓦廖夫从中国发给他的密码电报都给了毛泽东，这些电报包含了类似的批评内容，这是科瓦廖夫根据高岗提供的消息所写的。斯大林同时把高岗给他个人的信件卷宗也交给了毛。科瓦廖夫直到 1950 年 2 月才从中国方面的一个秘密报告中得知这一情况。^④

据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泽东时说：“看看吧，您可能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赫鲁晓夫对

① 《真理报》，1950 年 1 月 1-3、5、6、5-13、18、19、25、26 日。

② 《真理报》，1950 年 1 月 5-9 日。

这就是 1949 年 11 月 16、18 和 25 日，以及 12 月 27 和 31 日。参阅《真理报》1949 年 10 月 2 日至 1950 年 1 月 4 日。

此段参阅本章第七节；《科瓦廖夫，1》，第 90 页及下页，92 页及下页（注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第一卷第 41 页；< khrushchev Remembers . The Last Testament > . P.243 f ; Shi Zhe / Chen Jian ; < With Mao and Stalin > . P.52;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97, 319 (Note 111); 《赫鲁晓夫回忆录》，载于《历史问题》1992 年第 11-12 期，第 73 页及下页。

斯大林的这一行为所作的解释是：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和友谊”，斯大林从来不信任任何人，甚至也信不过他自己，他断定毛迟早将识破高岗的告密阴谋。斯大林自己曾对他最接近的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一种友好的表示。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这一行为批判为对高岗的出卖，正如彼得大帝出卖科楚别伊一样。后者向彼得密告了哥萨克领袖马泽帕的背叛计划，而彼得却把科楚别伊的告密信交给了马泽帕。后来，马泽帕处死了科楚别伊。60年代，米高扬称，他迄今也不能解释斯大林当时的这一行为，也不能为之辩护。^①

由于斯大林把这些材料交给了毛泽东，他就不能不与科瓦廖夫拉开距离。斯大林宣称，他只是读了科瓦廖夫的报告，^② 并说，科瓦廖夫写这些报告不是在苏联领导的授意之下，而是出自他自己的动机。他只是一个铁路工程师，不懂政治，没有政治经验，在政治领域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当他陷入了政治，就像耗子进入了风箱。毛问，斯大林是否可把科瓦廖夫作为专家派往中国。斯大林回答说，科瓦廖夫不是专家，他们将派出更有能力的人去中国。科瓦廖夫自己说，他在1月份因患咽喉疾病而未能参加周恩来到达后的会谈。^③

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可靠的材料，说明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斯大林的这一非同寻常的决定：交出科瓦廖夫的报告和其他可作为

参阅《赫鲁晓夫回忆录》，同上第74页；< khrushchev Remembers , The Last Testament > . P.243 f. ; 《科瓦廖夫，I》，第91页。

此处和以下四句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3、438页；师哲：《高岗曾建议将东北划归苏联吗？》载于《炎黄春秋》1993年第4期，第85页；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记——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载于《人物》1993年第2期，第96页；Li Haiwen, A Distortion of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Shi Zhe About Kovalev's Memoirs, in: Chinese History, Vol.V, No.2 (Fall 1992), P.64. 这里援引的师哲关于斯大林与科瓦廖夫拉开距离的陈述包含了一些不可解释的矛盾。总的印象是，师哲当时似乎不知道斯大林交这些材料的背景和材料的内容。科瓦廖夫的陈述似乎更可信。

^③ 《科瓦廖夫，II》，第90页。

高岗等人罪证的材料。斯大林宣称科瓦廖夫在政治上是无能的，这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斯大林怎么能把他派到毛泽东那里，作为自己与毛的联络员，委以如此高度责任的使命？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看出，毛泽东原则上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一姿态，即一种创造更多信任的尝试。当时的中央委员和财政部长薄一波认为，通过交给这一报告，“相互的理解加强了”，尽管某些疑虑还依然存在，它们也不可能完全消除。^①几年后，毛泽东对此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他对苏联驻北京大使说，斯大林交出这个文件，看来是想强调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②对于这种事后的评说，人们不应给予很大的重视。

薄一波说得很对，疑虑并没有消除。这一点在刘少奇 1950 年 1 月底与一位苏联人的谈话中也有同样的表示。刘的这一判断似乎也与他两次经历有关，这就是 1949 年夏在莫斯科的经历，以及 1949 年 11 月北京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上的经历。^③刘认为中国与苏共之间存在着误解，其根源可追溯到过去。中国的进步人士能了解苏联的形势，而他和他的同志所遇到的欧洲和苏联的进步人士，却对中国的形势不清楚，有幼稚的想法。在同苏联同志谈话时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中国的问题仅有很少的了解。对他们来说，中共的胜利是出乎意料的，因此也是不可理解的。^④

刘少奇接着说，外国同志不知道或只是表面地知道，中共的斗争比苏联共产党的斗争要艰苦得多，危险得多。但他们主要知道的是 1927 年的革命，而在那以后还有许多危险的时期和失败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第一卷，第 41 页。

^②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苏联谈话记录，见：《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106 页。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此段参阅 1950 年 1 月 27 日刘少奇与蔡特金的谈话，见库利克：《建立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 1952 年（根据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载于《远东问题》1994 年第 6 期，第 82 页。

的威胁。至于中共中央内部的激烈斗争，许多同志，其中也包括苏联同志，几乎完全不知道。在这方面，与苏联同志也有分歧，因为他们相信李立三犯有严重的错误。但要弄清这些问题是不简单的。苏联和中国的高级领导同志必须共同来研究这一问题。经常是，苏联同志认为一个人很好，而中国同志却认为他很坏。但是中国同志是经过多年才看出他是坏的，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是有把握的。^①

引人注目的是，刘少奇在抱怨中苏意见分歧时，只提到李立三这个有争议的人物。就此而言，刘似乎更应提到王明。^②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关于王明的争论当时还依然很棘手，很有现实性。

第十二节 美国：谈判桌上看不见的对手

自1950年1月2日起，斯大林表现出对毛泽东非常关心，这与当时苏联要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努力是相联系的。自从斯大林看到美国在改变其东亚政策之后，他就开始担心毛泽东要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近。他从中看到的危险之一，就是这将危及他把满洲及其周围地区划为苏联势力范围的目标。除了美国的新东亚政策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加大了斯大林的不信任感，这就是：英国对华政策的新调门，以及对当时科瓦廖夫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的解释。

杜鲁门当时针对议会中强大的亲国民党的共和党反对派，在1950年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美国将不向台湾的国民党

同上，第82页及下页。

② 参阅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并努力避免卷入中国的内战。这里，他依据的是 12 月 30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文件。1 月 6 日，英国政府宣布：它断绝同国民党中国的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准备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看来，这两件相互联系的事使斯大林陷入一个恐慌的境地。在他看来，杜鲁门的声明可能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很快着手占领台湾，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担心美国的干预。如果台湾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被占领，那么，北京与华盛顿建立外交关系的一大障碍也就消除了。北京与伦敦的关系正常化将同样会促进中美的接近过程。^①

斯大林很可能在 12 月底就通过秘密情报系统得知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改变。如前所述，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促使斯大林于 1 月 2 日决定改变过去坚持的态度，同意缔结一个新的条约。同样起了重要作用的还有伦敦和德里即将对新中国的承认。这些消息是斯大林从 1 月 1 日毛与科瓦廖夫的谈话中知道的。^②

斯大林一直担心北京要与西方接近。当他于 1 月初得到科瓦廖夫关于同毛泽东谈话的报告时，重新证实了他的这种担心。毛说，中国要在与苏联缔结了军事、经济和政治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和通商等协定之后，才让外国代表机构进入中国。毛接着说，与莫斯科缔结了这些条约之后，“我们就可立即修订和废除蒋介石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对毛的这段谈话作了如下的解释：毛要威逼苏联“放弃所有在华的利益”。科瓦廖夫接着说，毛在与美建交问题上

^① 此段参阅具有说服力的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98, 100. 也参阅 McGlothlen: < Controlling the Waves >, P.108; Qiang Zhai: < The Dragon, the Lion, & the Eagle. Chinese - British - American Relations, 1949 - 1958 > . Kent, Ohio/London, England 1994, P.44.

^②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九节，第四章第十节。

已放弃了斯大林的建议，不再以断绝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作为先决条件。^①

人们可以断定，科瓦廖夫对毛泽东谈话的解释是夸大了。对科瓦廖夫来说，中共领导人的任何独立的、不同于苏联指示的表现都意味着对苏联的背叛。然而，毛泽东并没有作出什么让斯大林感到背叛的事。斯大林曾建议中国同志，在与西方国家建交时要以它们断绝同国民党中国的关系为先决条件，而这一点在伦敦方面已经这么做了。因此，北平同意英方任命 J·C·哈钦森临时代办作为建交问题的谈判代表，斯大林对此也很难提出指责。此外，北京控制的官方舆论也一直在进行亲苏和反西方的宣传。^②

但从各种迹象看，斯大林接受了科瓦廖夫的这一多疑的解释。科瓦廖夫说，他对毛泽东的意图的估计是他和斯大林的“共同看法”。从斯大林采取的步骤中也可看出，其目的也就是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近美国。在杜鲁门记者招待会后的第二天，《真理报》开始发表文章，它们诱发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华盛顿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正在进行秘密的军事合作。^③与此同时，斯大林改变了他过去在中国同志面前所坚持的、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他在 1949 年夏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现非常谨慎，并拒绝在进攻台湾时给予护航的请求。^④有迹象表明，自 1950 年 1 月起他与过去相反，鼓励北京领导攻占台湾，秘密支持它做相应的军事准备。其中，他允许以 3 亿美元贷款的一半用于购买苏联的军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II》，第 83 页。

^② 1950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35 页。此段还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98 f.;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 the Eagle. Chinese - British - American Relations, 1949 - 1958>, Kent, Ohio/London, England 1994, P.44.

^③ 《真理报》，1950 年 1 月 6 日第 4 版；1 月 9 日第 3 版；1 月 13 日第 3 版；1 月 19 日第 4 版。此外，《真理报》还指责英国在联邦范围内秘密进行“反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见《真理报》，1950 年 1 月 8 日第 4 版。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事物资。^① 据说，斯大林当时还试图劝说毛泽东进攻香港。^② 显然，所有这些步骤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剧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之间的紧张局势，离间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

这种趋势也反映在另一个活动场所。1月6日至7日夜，也就是杜鲁门向新闻界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外长维辛斯基受斯大林的委托来到毛泽东住处，他的谈话很快就转入主题：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取消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资格。他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一项声明，要求宣布国民党出席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开除其代表资格。^③ 苏联将支持这项声明，并要求开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当时的代表是蒋廷黻。在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的情况下，苏联将抵制安理会的会议，直到他被开除为止。毛对这一行动表示“百分之百”的赞成。^④

毛泽东起草了一份致联合国的电文。在此草稿基础上完成的电报于1月8日由外交部长周恩来签署，发到了联合国。电报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它的代表必须被开除出安理会。^⑤

^①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99 f. (即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但这里(注123)把1950年1月中莫斯科同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赴苏联当作一个论证，这是不适宜的，因为根据新的中国资料，刘亚楼1949年8月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已答应在建设中国空军方面提供苏联的援助。见：《中共中央在香山》，第454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

^②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100, 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1月已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类似的要求。见 Alexander: < The Strange Connection > P.94.

^④ 此段参阅维辛斯基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卷宗302，案卷8，第2-3页。维辛斯基版本中复述的这段谈话内容与毛泽东发回的电报是相一致的。见：1950年1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219页及下页。考虑到莫斯科与南斯拉夫之间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指示刘和周把声明电报发给所有安理会成员国，但南斯拉夫除外。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221页。

^⑤ 1950年1月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电报，见：同上；电报文本见：同上(注释)，以及《真理报》，1950年1月13日，第4版。

在 1 月 10 日的安理会会议上，苏联代表马立克支持北京的立场，在已确定的议题之外，提出了一项开除国民党政府代表的议案，并威胁说，只要蒋廷黻不离开，苏联代表团就不继续参加会议。蒋当时担任会议主席，他不让表决，而提议在特别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蒋的提案以 8 票赞成（其中有美国、英国和法国），1 票反对（苏联）和 1 票弃权（印度）被采纳。接着，马立克离开会场。在南斯拉夫和印度的动议下，决定将苏联的提案留在下次会议上进行讨论。在 1 月 12 日举行的会议上，马立克准备离开会场，但在古巴代表担任会议主席后，他又就座了。马立克获得了机会，详细阐述了他对安理会中国席位的立场。^①

1 月 13 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通报了这一情况。维辛斯基说，人们已经做到，在辩论中国问题时不让蒋廷黻担任安理会主席。为达到此目的，苏联代表不得不“退场”。维辛斯基问道，“为了把我们的斗争进行到底”是否有必要由中国政府任命一位它自己的驻安理会代表，以迫使安理会“把问题提到具体的层面上”？毛泽东表示同意。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曾在美国学习过。维辛斯基又说，只要在安理会得不到多数赞成票，中国任命的代表“在法律上就不是全权的”，并“被迫驻在北京”，但无论如何，北京任命它的代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维辛斯基还说，某些安理会成员会感到不安，担心蒋廷黻这位“国民党尸体”的在场会给苏联提供理由，停止它在安理会的工作，这将导致“联合国实际上的崩溃”。^②

^① 此段参阅《真理报》，1950 年 1 月 13 和 14 日的第 4 版。

此段和下段的谈话复述依据的是 1950 年 1 月 13 日维辛斯基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4，第 94—96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 47—50 页。1950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很简要地谈到这一谈话，其要点与维辛斯基的谈话记录相一致。此外，毛强调苏联支持中国开除国民党代表的要求，而美国、英国和多数安理会成员国反对。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35 页。

毛泽东问，美国和英国是愿意联合国继续存在，或是愿意它崩溃。维辛斯基回答说，第一种是正确的。它们需要联合国作为外衣，以掩饰其帝国主义的打算。联合国的崩溃将暴露它们的意图和计划，它们需要这一工具，以便有可能帮助它们掩盖其侵略计划和欺骗国际舆论。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同意任命一个自己的代表，但他要与周恩来商议这一步的各个方面的，预计周将于 1 月 19 日或 20 日到达莫斯科。毛问，苏方是否同意等待？维辛斯基说，只要毛认为有必要与周恩来商议，此事可以推迟进行。从这一回答中可以听出维辛斯基感到有些惊讶，因为在同样情况下斯大林是不会与维辛斯基商议的，而是斯大林自己作出决定。

毛向刘电告了与维辛斯基的谈话，请中央委员会任命一个安理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将人选通知他，等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商定。^①

在此期间，毛并没有等到周到达，而于 1 月 18 日通过电话同周进行了商议，当时周到达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接着，毛把决定电告刘少奇，章汉夫只担任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因为他的威望不够高。毛建议由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担任正代表。周恩来、高岗和李富春也是这个意见。毛还同时给刘发去了一份致联合国的电报草稿。他补充说，如中央委员会同意他的建议，可于第二天把任命张闻天的电报发往联合国，并公布于众。电报中还询问，国民党代表将何时被驱逐，北京的代表将何时能开始工作。毛的建议得到了在北京的领导人的赞同。^②

苏联于 1 月 10 日提出的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于 1 月 13 日付诸表决 在 6 票反对（其中有美国和法国），3 票支持（苏联、南斯拉夫和当时已与中国建交的印度），以及 2 票

^① 1950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35 页。

^② 1950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见同上第 242 页。

弃权（英国和挪威）的情况下，提案被否决。马立克重申他 1 月 10 日的声明，苏联代表团在国民党代表被逐出之前将不再出席安理会会议。接着，他同他的代表团离开了会议大厅。自 1 月 16 日起，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也不再参加联合国下属组织的会议。在同一天，苏联媒体开始以每日的报导来支持中国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联合国的要求。^①

诚然，斯大林并不那么肯定地认为通过这一行动就能把国民党中国挤出安理会。鉴于那里的力量对比情况，不能指望在那里获得多数赞成的表决结果。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在杜鲁门演讲之后才决定要在安理会采取行动的。这一事实和上述不能指望获得多数通过的分析使人感到，这里涉及的是莫斯科的另一策略阴谋，其目的就是煽动北京与华盛顿的冲突，避免他所担心的中美关系的建立。看来，斯大林根本不关心开除台湾代表的问题，他更感兴趣的是安理会争吵的继续。这样一来，他通过在联合国的支持行动向毛泽东显示，苏联是新中国的最强有力的朋友，而美国同过去一样是最大的敌人。当时，斯大林的这种动机已被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等西方观察家所察觉。^②

国务卿艾奇逊 1 月 12 日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的讲话给斯大林的疑虑又增加了新的养分。艾奇逊在其演说中重复了杜鲁门 1 月 5 日关于美国不愿为台湾承担义务的内容。他强调了这样一个方案：在发生了全球大战的情况下，美国的防御线将延伸到太平洋，它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但不包括南韩和台湾。这里已显示出全球“遏制”政策的最初轮廓，它针对的是意想中的

此段参阅《真理报》，1950年1月15、17、19、20日第4版。出于明显的宣传原因，《真理报》在它的报导中没有提及南斯拉夫曾支持苏联的提案。参见《真理报》，1950年1月15日第4版；McClathlen: <Controlling the Waves>, P.155 f.

^② Alexander: <The Strange Connection> . P.95;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100 f., 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苏联扩张主义。一年后，这一政策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它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①

此外，艾奇逊还宣称，苏联正在吞并中国的北部，即外蒙、内蒙、新疆和满洲。他说：“苏联正在努力使中国北部省份独立，并让它们附属于苏联。外蒙古的独立使苏联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在满洲，苏联也几乎成功，而且我坚信，苏联在内蒙古和新疆的情报部门也将向莫斯科报告好消息……事实上，苏联控制中国的这四个北部地区，是苏联与亚洲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最重要和意义重大的事件。”^②无疑，艾奇逊试图以他这段话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打进一个楔子。^③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把这一论点作为他策略行为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例如，1949年8月外交国务秘书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就提出，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新闻机构应优先执行这样的宣传路线：“强调苏联对中国东北、新疆和蒙古进行帝国主义控制的事实，以此加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裂。”^④

然而，在这个时期根本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打算恢复同华盛顿的友好关系。如果有，那么，毛肯定不会同意在艾奇逊讲话的第二天采取严重伤害中美关系的措施：没收美国（也包括法国和荷兰）在北京的外交财产，其中包括美国海军公使的房屋、美

参阅 Alexander: <The Strange Connection> . P.93 f.;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 P.338.

② Dean Acheson: <Crisis in Asia —An Examination of U.S.Foreign Policy> .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23, 1950 ,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 P.254 f.

参阅同上，第101页。

④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 August 1949, Vol.IX, P.535 ,引自 John Hansen Feaver,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 - 1950.The Policy of Restrained Intervention .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Ann Arbor, Michigan 1983, P.402;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 P.101.

国经济合作署在上海的财产。没收措施早在 1 月 6 日就已决定，但直到 1 月 14 日才执行。美国也坚定地实行了反措施：关闭了所有美国驻华领事馆，召回所有在华外交官。毛泽东对刘少奇称，美国撤退在华一切官方人员“对我们极有利”。^①但这些行动的后果之一就是：更多的西方国家把他们准备承认北京的计划搁置了起来。^②

在此之前，毛已向苏联方面通报了这一步骤。他在 1 月 13 日谈到同华盛顿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时对维辛斯基说，“我们需要赢得时间来整顿国内秩序”。为此，他们决定采取两项措施：收回外国人过去根据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兵营，用于自己的需要；没收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署的粮食和财产，这些显然是美国人用于帮助蒋介石的。与采取这两项措施的同时，中国可能还要没收美国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领事馆的建筑物，迫使美国领事离开，没收在上海的大量粮食储备。这一行动将使中国人民感到“很大的鼓舞”，并有助于孤立亲美的中国资产阶级右翼。^③

引人注目的是，维辛斯基的反应非常谨慎。他说，虽然不排除可以达到这些目的，但人们应从各个方面来研究这种措施的贯彻。在研究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人们应注意美国追逐的政治目的，人们应把这个问题同美国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它不仅针对中国，也是针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维辛斯基没有作具体的说明。他指的究竟是什么，不得而知。^④

^① 1950 年 1 月 18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41 页。

^② 此段参阅 1950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35 页；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102; Alexander: <The Strange Connection> P.95。

^③ 1950 年 1 月 13 日维辛斯基关于同毛泽东谈话的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4，第 9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 50 页。

同上，引自同上第 50 页及下页。

毛泽东的另一个步骤：1月18日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胡志明政府。这进一步加剧了同美国，也包括同法国的紧张关系。^① 越南共产党人于是于1月15日向中国提出这项请求的，毛泽东在1月17日的答复中表示同意采取这一步骤。^② 毛泽东支持共产党越南的另外目的是，减轻越中边界的军事负担，那里曾集聚了大量的国民党部队。在南部边缘建立一个兄弟政府，这将加强中国的安全。^③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当时胡志明受到80%居民的支持，控制着三分之二的国土。^④ 诚然，毛泽东支持越南共产党人不仅是出于中国的利益，他自20年代以来就与胡志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感到有义务给予革命的支持，他同样对所有亚洲革命运动的领导人都感到负有支持的责任。

毛泽东不顾他长期以来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紧密关系，转而同苏联一起公开批判野坂的亲美态度，^⑤ 这也表明毛愿意同莫斯科合作，发展反美的亚洲政策。此外，不仅在1月中旬继续不断地在媒体上进行反对美国和台湾的论战，并通过一系列的漫画指责美国的野蛮侵略。^⑥ 有一幅漫画肯定会得到斯大林的特别赏识。在这幅漫画中，有一个标明为“美帝国主义”的垂头丧气的人叹息地凝视着一张欧亚地图，地图上突出地用黑色标

^① 1950年1月19日《人民日报》第1版。参阅 Alexander: < The Strange Connection >, P.95; Leffler: <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 P.340. (但它注明的日期是不准确的)

^② 1950年1月1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238页及下页。

参阅 Chen Jian: < China's Road >, P.104 f.;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106 f.

^④ Leffler: <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 P.340.

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106, 以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⑥ 例如，载于《人民日报》1950年1月14日第1版的、1950年1月16日第6版的、以及1950年1月19日的漫画。

明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暗示中苏结盟反对美国。^①

此外，1月12日艾奇逊演说中关于苏联计划吞并中国的那段警告性的讲话，特别使斯大林感到有必要由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这也表明，艾奇逊的讲话击中了斯大林最敏感的部位。斯大林试图通过协调一致的行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回击美国的断言，而这种回击出自中国人之口比出自苏联人之口更为令人信服；二是迫使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公开宣布与莫斯科站在一起，从而缩小中国同美国打交道的回旋余地。

1月16日，毛泽东在列宁格勒停留了一天之后回到了莫斯科。第二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出现在毛下榻的别墅。莫洛托夫带来了艾奇逊的演说稿，^②援引了其中关于苏联试图吞并满洲和新疆的那段话，并请毛泽东表态。毛以苏方所期望的方式回答说：艾奇逊发表这种诬蔑性的声明是要散布一种烟幕，首先是为掩盖其霸占台湾的企图。毛试图赢得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的信任，他向他们保障，中国领导将对美国伸向北京的试探触角置之不理。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随即建议，北京和莫斯科应发表一份协调一致的公开声明，以回击艾奇逊的诬蔑。^③毛表示同意。1月21日，在莫斯科和北京的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声明。^④

尽管在程序上是同步进行的，但这件事却导致了斯大林和毛

^① 1950年1月13日《人民日报》第6版。

据师哲称，莫洛托夫交给毛一份艾奇逊的讲话全文。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4页。

据师哲称，乌兰巴托也要发表一份这样的声明，见同上

此段参阅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4，第1-7页，引自Wingrove：<Mao in Moscow>，P.32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4页及下页；《真理报》和《消息报》，1950年1月21日，第2版；《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第1版。据师哲称，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外交部长的名义也于1月21日发表了相应的声明；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4页。这一陈述作者未能进行考证。

泽东之间的一次不协调。显然，双方对声明的内容作了大体上的商定，其中如双方都要提及美国驻沈阳总领事于 1 月 14 日发表的讲话，这位第一见证人在其讲话中否定了苏联对满洲的控制，他说除了共同管理中长铁路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把满洲并入苏联的任何迹象。但声明内容中引人注目的是，苏联的声明对艾奇逊关于莫斯科要控制整个东北的说法给予了明确的否认：这里“没有一句真话”，而在中国的声明中没有这样明确的否定。声明说：艾奇逊的看法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和“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可以认为，由于斯大林长时间拒绝签订新的条约，这使毛泽东更加感到斯大林想保持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和在新疆的影响。中共领导，以致国民党领导，对丢失外蒙是耿耿不能忘怀的。就这点而言，毛可能把艾奇逊的攻击看做是一个的值得欢迎的间接帮助，它将有助于在即将举行的同斯大林的条约谈判中加强其谈判的地位。

可以认为，中共没有对艾奇逊的上述看法作出明确否认，这加剧了斯大林因艾奇逊的上述看法而激起的愤怒。在 1 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约请毛泽东和 1 月 20 日到达莫斯科的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会晤。参加这次会晤的只有莫洛托夫和师哲。在这次时间不长的会晤中，斯大林没有就声明内容进行争论，而只是以声明的发表形式和外交礼仪方面的理由批评中方。他同莫洛托夫一起指责毛没有恪守 1 月 17 日商定的意见，当时双方约定应发表一项外交部的官方声明，但毛却以对记者谈话的形式发表了这一声明，即让中国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发表了一个虚构的对记者的谈话。^①但莫斯科的声明是以外长维辛斯基的名义发表的。^②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胡乔木的谈话不能代表

^① 1950 年 1 月 19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以及胡乔木的电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45—248 页；《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21 日第 1 版。

^② 《真理报》和《消息报》，1950 年 1 月 21 日，第 2 版。

官方的观点。这种情况以后不应再发生。人们不能随意行事。“我认为，我们应当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有力量。”^①

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是对的。毛泽东、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确实曾于 1 月 17 日商定，双方应发表外交部的声明。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建议中国的文本由新华社来发表。但维辛斯基说，艾奇逊的演说是美国国务院的官方声明，因此要以同等的级别予以回应。毛当时顺从了维辛斯基的这一意见。^②

毛为什么忽视 1 月 17 日的协议，这一点是不清楚的。从中国发表声明的其他有关情况看，中国似乎并非有意要压低这件事的规格。相反，中国的声明是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 1 版，而苏联的声明是登在《真理报》的第 2 版。此外，《人民日报》在第 1 版全文发表了维辛斯基的声明，而《真理报》只是把胡乔木的对记者谈话摘要刊登在第 4 版。

毛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对外交惯例不熟悉，对协议并不特别认真。但也许是他对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那种好为人师的态度表示反感，故意忽视同他们达成的协议。总的说来，可以认为，触怒斯大林的主要不是中国声明的发表形式，而是声明缺乏明确的否认。但斯大林不愿谈论这个困难的题目，而是通过对不是那么棘手的程序问题提出批评，来表达他的不满。然而，毛泽东始终没有认真接受莫洛托夫的指责，甚至没有做同意的表示，这也使斯大林感到很恼火。

据师哲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指责很恼火，他一言不发。只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55 页及下页。

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4，第 1-7 页，引自 Wingrove: <Mao in Moscow>, P.321。

^③ 1950 年 1 月 21 日和 22 日的《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21 日和 22 日的《真理报》。

是周恩来作了一些谨慎的解释。谈话后，斯大林请中国客人和莫洛托夫去他的别墅，并让毛和师哲乘他的车。在行车过程中，毛指示师哲不要请斯大林到毛的别墅来作客。斯大林从谈话的情景中已领悟到他们在说什么。这就导致“气氛沉重得又像灌上了铅”。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和大使罗申都来到了斯大林的别墅。犹如举行了半个政治局的聚会。晚宴期间，气氛沉闷；整个时间，毛一言未发。^①

师哲还说，晚饭后，斯大林打开了留声机，并邀请大家跳舞。尽管有人多次拉毛上场，但都没有成功。但这也没有使气氛有所改善。在初看师哲这段陈述时，觉得难以相信。然而，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在 1953 年的新年，斯大林邀请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到他的别墅，他打开了留声机，并要求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音乐中跳舞。大家都跳了。^②

在另一方面，也有迹象表明，毛泽东针对斯大林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对美立场的企图，也采取了自己的对应努力，在莫斯科与西方国家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就是：毛泽东 1 月 17 日请刘少奇通过北京外交部把胡志明《致世界各国政府的信》^③ 转发给苏联及其卫星国。^④ 胡在这封信中声明他的政府愿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北京在转发这封信之前已于 1 月 18 日独自宣布了外交承认，以表示对共产党越南的支持。这就使斯大林处于压力之下，不得不通过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以表示对胡的支持。但另一方面，承认胡志明政府就意味着给苏联与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57 页。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58 页；《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289 页及下页。

1950 年 1 月 14 日信件的文本见 1950 年 1 月 31 日《消息报》第 2 版。

^④ 1950 年 1 月 17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38 页。

法国的关系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因为法国发动了反对共产党越南的战争。而当时，莫斯科感兴趣的是要同巴黎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法国政府反对美国重新武装德国和把德国拉入联合国的企图。^①

斯大林最后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迫仿效中国，于 1950 年 1 月 30 日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② 毛泽东早在 1949 年 12 月 24 日就告诉斯大林，中国要承认共产党越南，支持胡志明的抵抗运动。当时，斯大林不得不向毛承诺，苏联也将跟随中国走这条路。^③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深信胡志明同志是一个坚定的、理智的共产党人，他干得很好，应得到支持。”^④ 但是，斯大林对越南共产党人的胜利是持怀疑态度的，后来他曾多次对承认越南表示遗憾“我们太性急了”“承认得过早了”。^⑤ 毛泽东是否只是通过中国的榜样对斯大林施加压力的，或是在会谈时施加了影响，对此我们不得而知。^⑥

1950 年 2 月，胡志明秘密访问了莫斯科，他没有受到斯大林的特别款待。胡志明请求苏联同共产党越南也签订一个类似与中国签订的同盟条约，但斯大林显然因考虑到莫斯科同巴黎的关系，回避了胡志明的这一请求。^⑦ 胡志明希望把他在莫斯科的停

此段参阅 Chen Jian: <China's Road……>, P.104;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107。

② 1950 年 1 月 31 日《消息报》第 2 版。

③ Shi Zhe / Chen Jian: <With Mao and Stalin……>, P.5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6 页及下页;《汪东兴日记》第 164 页及下页 魏石岩(音):《第一次访……》第 304 页。

④ 1950 年 1 月 6 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4，第 16 页，根据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 39 页。

⑤ 《赫鲁晓夫回忆录》，1990 年波斯顿版，第 155 页。

⑥ 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认为，“在毛的坚决要求下，他（斯大林——作者注）承认了胡志明的革命政府”，但他们没有指出资料来源。见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211。

⑦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2 页。

留变为对苏联的正式访问，这也遭到斯大林的拒绝。^① 应胡的请求，斯大林曾在一份苏联杂志上为胡签了名，但后来这份杂志又被苏联安全人员秘密地拿走了。^② 胡志明为控制疟疾在越南的蔓延，请求斯大林提供奎宁药品，斯大林只答应给半吨，尽管这种药当时在苏联大量生产。^③ 当胡志明请求给予军事援助时，斯大林让他找北京。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愿意提供，并于 4 月份向越南派遣了第一批中国军事顾问。^④ 这些情况反映了斯大林在 1949 年夏已向刘少奇表明的一個倾向，即：他要中国同志担负起亚洲革命运动的领导角色，但与此同时，他却要求由他来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如何处理其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斯大林关于承认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决定使西方感到惊讶。西方国家把这件事与苏联在联合国驱赶国民党政府的努力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这标着苏联以进攻的方式试图在亚洲争取主动，“加速东南亚的革命进程”，多米诺现象已初见端倪。^⑤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评论苏联承认越南共产党政权时指出，不应再对胡志明的意图报幻想，不能认为越南运动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胡是“印度支那民族独立的死敌”。^⑥ 在 1 月底法国宣布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为“法兰西联邦内的自治国家”后，美国于 2 月 7 日在外交上承认了保大（原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最后一个皇帝，后改称越南“国家元首”——译注）领导下的“越南共和国”以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⑦

① 同上；（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155 页及下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156 页。

④ 此处和下段参阅 Chen Jian: < China's road >, P. 104 f , 以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此处参阅 1950 年 1 月 31 日美国国务院东欧司司长的备忘录，见：FRUS 1950, Vol. VI, Washington 1976, P. 710。

⑥ 1950 年 2 月 1 日艾奇逊的声明，见同上，第 711 页。

⑦ 同上，第 716 页，720-722 页。

艾奇逊此举的目的是多方面的：鼓励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的民族士气；在中国边境建立非共产党政府；支持法国；以及“对共产党以民族主义为掩饰的、而实际是以统治亚洲为目的的策略表示不满”。^① 北京和莫斯科承认共产党越南导致华盛顿于 2 月初提出建议，加强阻止中国向南方推进的努力，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项加强援助韩国和台湾的决议，这实际上是从 1 月 5 日杜鲁门宣布的战略路线^② 上后退了下来，当时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曾强调，美国将不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并努力避免卷入中国的内战。现在，美国政府对莫斯科和北京的立场都变得强硬起来了，对两个共产党大国在亚洲推行扩张主义的愤怒增强了。^③ 人们还可进一步断言，美国对这些非共产党国家的承认进一步推动了华盛顿在亚洲实行的遏制政策，加剧了亚洲的冷战。

从本节分析的这些事变中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成为斯大林同毛泽东对话中的一个看不见的第三者”^④，这句引自一部典范著作的话也非常深刻地表述了本书所探讨的这个主题。

第十三节 中国的援助请求

1949 年底和 1950 年初，中共领导在一些具体领域向斯大林提出了援助的请求。

一项紧迫的请求涉及的是东北吉林省松花江上的水电站，它正遭到决堤的威胁。毛泽东于 1 月 2 日告诉斯大林，如果大堤决

^① 1950 年 2 月 2 日艾奇逊给总统的备忘录，见：同上，第 717 页。

^②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108. 给予杜鲁门 1950 年 1 月 5 日声明见本节的前一部分。

此段参阅 Alexander: < The Strange Connection, P.95; Leffler: <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 P.340。

^④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104。

口，东北的工业将受到威胁，松花江平原的几百万居民将遭受困难和贫穷，哈尔滨和吉林城市将被淹没。毛请斯大林“指示苏联有关部门，立即组织苏联的筑堤和水电站专家，到现场了解形势和采取必要的措施”。^①

斯大林迅速作出反应。4天后，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了一个积极的决定：将成立由莫洛托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②同一天，维辛斯基外长告诉毛泽东，苏联政府已作出决定，在5天内派4名专家去中国，为期1个月，以便就水利枢纽的设备状况作出结论，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险情的进一步恶化。^③毛表示感谢，并声称，“苏联政府在这件事上给予帮助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1月12日维辛斯基告诉毛，另外7名专家将在近日去吉林。^④

中共的另一个请求涉及的是军事领域。12月底，刘少奇在一封给斯大林电报中根据已达成的协议，请求苏联按计划培训飞行员，以及向人民解放军提供相关的93,000吨高级汽油和38,000吨非高级汽油及10%的所需润滑油和相应数量的其他材料。鉴于航空学校的飞行活动已经开始，因此请求尽快提供上述物资。刘少奇给毛泽东发去了这封电报的副本，由毛把它转交给斯大林。关于由苏联教官培训中国飞行员之事，斯大林和刘少奇

^①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34，第15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30页。

^② 1950年1月6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信，按原件复印件复述，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34，第16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35页。

此处和下句参阅1950年1月6日维辛斯基同毛泽东谈话的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卷宗302，案卷8，第1页；毛泽东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219页。

^④ 1950年1月12日维辛斯基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1月1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4，第97-98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51页。

在 7 月底就已达成一致意见。^①

斯大林满足了这一请求，尽管不是全部。1 月 6 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北京通过毛转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所提出的关于提供“各种商品”的请求，将由莫洛托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审核，他不怀疑会作出一个积极的决定。同一天，维辛斯基告诉毛，斯大林准备给刘少奇发一封回电，说明根据苏军的标准计算后决定，用于此项目的高标号辛烷汽油为 13,400 吨，低标号辛烷汽油为 5,270 吨，以及所需润滑油为 1.315 吨。供货将从 1950 年 1 月开始，6 个月内完成。支付方式可在 1950 年的换货谈判中确定。^②毛对这份回电的内容表示同意，并感谢苏联政府的帮助。他还对苏联方面的核减风趣地说，“我们的人总是想多得一些”，应当对他们严格控制。他感谢苏联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核算，并完全同意这种核算。他说，在燃料消耗问题上确实需要有硬性规定，因为这是有利于中国自己的，中国有义务更节约地使用外国帮助的产品。他在第二天发给“周恩来并中央”的电报中简要，但却不很准确地说，“可以满足我们购买飞机汽油的要求”。^③

中共的再一个请求涉及的是新疆问题。彭德怀从新疆回到北

^① 《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4 页。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此段参阅 1949 年 12 月 30 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4，第 3 页，按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 30 页；1950 年 2 月 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4，第 2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 31 页。

斯大林于 1950 年 1 月 8 日给刘少奇发去了同样内容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4，第 1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 46 页及下页。这份电报由维辛斯基发给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并由他交给了刘少奇，同上，第 47 页。

此段参阅 1950 年 1 月 6 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4，第 16 页；1950 年 1 月 6 日维辛斯基同毛泽东谈话的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 卷宗 302，案卷 8，第 1-2 页；1950 年 1 月 7 日毛泽东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19 页。

京后，于 12 月 29 日给毛泽东发去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了这一请求。毛于 1 月 2 日把它转交给了斯大林。彭在报告的开头扼要地汇报了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于 1942 年同莫斯科决裂，接着又同西北省份断绝了经济往来，从而导致经济日益下滑的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后，那里的情况更加严重。通货膨胀急剧发展。共产党部队的给养不能得到保障。彭担心，如果不立即援助，人民解放军与当地占多数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将恶化。鉴于那里的特别困难的自然条件，很难从中国内地向新疆提供援助。^①

彭德怀接着说，因此，“我认为，必须请苏联方面向新疆提供巨大的援助，以克服当前的困难和开展未来的建设”，必须向部队供应服装、技术物资、运输工具等。新疆与苏联之间必须立即开展“正常贸易”，以使用那里的农产品换取苏联地区的大众必需品。新疆必须同苏联进行经济合作，以便逐步开发自己的资源。过去张治中在新疆时曾同苏联谈过“建立中苏合营石油公司和中苏合作开采稀有有色金属公司”。彭认为，“特别希望现在就同苏联达成一致意见，成立这两个公司”。最后，彭表示深信，西北的辽阔地域和不良的交通状况对“领导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同苏联进行商谈，把协定中预见的阿拉木图至新疆—哈密民航线路进一步延伸到兰州、西安和北京。^②

不清楚的是，彭德怀指的是什么协定。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曾向毛泽东表示同意帮助建立通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

新疆发展情况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此段参阅 1949 年 12 月 29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4，第 4-7 页，按原件复印件复述，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 33-36 页；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同上第 1-2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 31 页。关于电报起草情况和发报日期参阅《彭德怀传》，1993 年北京版第 390 页。

^② 1949 年 12 月 29 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34，第 6-7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 35 页及下页。

国)的航线。^①彭德怀电报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彭要求建立两个合营公司。这意味着,实际上后来在1950年3月27日建立的这两个公司^②是在中方倡议下成立的,而迄今为止的研究认为,是斯大林对中国同志施加了一定的压力才建立的。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在1月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对这份电报作出了反应,并在两个具体的援助项目上作出了承诺,但却只字未提对新疆的一揽子援助问题。^③后来,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提起新疆的援助问题,至少是关于粮食供应问题。他在1950年1月22日同斯大林进行的正式会谈中主动再次提出此事。^④

第十四节 谈判的准备

关于条约和补充协定的谈判,只有在周恩来1月20日到达莫斯科后才能开始。在此之前,双方都在分别进行准备。此外,双方也偶尔进行一些试探,例如在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和科瓦廖夫谈话的时候。1月22日正式谈判开始,2月14日签订了条约和几个附加协定,3月和4月缔结了一些其他一些协议。

在1月2日毛泽东同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之间取得突破的会谈之后,谈判的准备工作就立即开始了。

当晚,毛泽东开始为周恩来的旅行做准备。显然是在同斯大

^① 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239,第13页

^② 《苏中关系1917-1957年——文件汇编》,1959年莫斯科版,第227页及下页。

^③ 1950年1月5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34,第16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39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37页。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十六节。

林通电话^①之后，他向北京领导班子发去了一份电报，讲述了关于谈判的基本目的和主要内容，并向北京的党中央作了相应的指示。^②

电报说，周恩来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为谈判及签订：

——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旧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③，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

——贷款协定。中方建议 3 亿美元，分几年付支，之所以不提更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

——民航协定。这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

——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这不仅对确定中国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也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

党领导应向政务院和政府委员会强调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按中国规定的范围行事，并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的指示表明，他认为将同莫斯科签订的条约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有利于稳定同苏联的未来关系，它还将产生更为广阔的影响。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产生榜样的作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1 页

此处和以下两段参阅 1950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11—213 页。

因为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当初并不了解 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同毛泽东的谈话，他们作出了错误的结论；见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95

用，将导致废除同其他国家的平等条约，代之以平等的条约。^① 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立即表示同意毛与莫洛托夫达成的协议，决定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并通过电报向毛报告了这一决议。^②

1月5日，毛泽东敦促北京的同志要好好准备即将进行的谈判。谈判时必须“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周启程后，中央应继续研究，并随时将意见电告。关于贸易方面的材料，如果在周启程之前来不及准备好，也可在启程后继续准备。应请政务院和政府委员会秘密讨论这一新的条约。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启程前，各成员应严格遵守纪律，一切要听指挥。^③ 1月10日至20日，周和他的小组在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的途中继续为谈判作准备。^④ 在这期间，毛不时地同他们通电话。除了以上提到的毛泽东所表示的意见外，关于中国准备工作涉及的内容至今一无所知。

1月2日毛泽东同莫洛托夫已就缔结新条约达成了明确的协议，但引人注目的是，四天后，外长维辛斯基到别墅拜访毛时，却强调签订新条约所面临的所谓困难。参加那次45分钟会谈的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大使和师哲。

如前所述，维辛斯基来访的主要动因是，按斯大林的要求说服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一个声明，以策应苏联把国民党政府的代表驱逐出安理会的要求。^⑤ 接着，毛泽东谈到关于大约1000

^① 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96. 在此处，他们对毛泽东指示的解释有些偏差。

^② 1950年1月4日周恩来同苏联代办什巴耶夫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卷宗302，案卷10，第45页。

^③ 1950年1月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215、217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4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36页。例如1950年1月18日周恩来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给毛泽东打电话，见1950年1月18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242页。

^⑤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十二节。

名在苏联关押的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的问题。^①最后，毛向维辛斯基谈起即将进行的条约谈判，他说：他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必须签订一个“新的友好同盟条约”。这种必要性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全新的关系”，这种新关系是在人民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接着，毛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对现存的条约重新进行审核之所以更加必要，还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成分”，即日本和国民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武装力量的日本已不复存在，而国民党则已经被粉碎。此外，毛还指出，犹如他在 12 月 16 日曾向斯大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苏之间现存的条约不满。因此，中苏之间签订新友好同盟条约将会有利于双方。^②

维辛斯基回答说，在他看来，关于新条约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重新审核现行条约并对其作某些修改，可能被美国人或英国人用来作为一种借口，对条约（这里指的是雅尔塔协定——译者注）进行有损于苏联和中国利益的修改。“这是不希望发生的，并且是不允许的。”毛泽东表示，“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时”，应考虑到这种情况。^③

在此段重述的对话中有两点使人感到奇怪。其一是维辛斯基再次提出斯大林在 12 月 16 日向毛泽东提出的论据，斯大林曾以此来解释他为什么拒绝对现有条约的修改，“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④在那次维辛斯基也参加的会谈中，斯大林根本不考虑

详见同上。

此段参阅 1950 年 1 月 6 日维辛斯基同毛泽东谈话的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案卷 8，第 1-4 页。

此段参阅同上第 4-5 页。显然为这次谈话作记录的费德林由于不了解事情的复杂关系，把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中苏条约（dogovor）与 1945 年 2 月 11 日雅尔塔协定（soglasenie）相混淆了，正如他在记录 12 月 16 日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时搞混了一样。

见同上。

缔结新的条约。但是，斯大林当时主张的立场在 1 月 6 日已经过时，因为斯大林在 4 天前已通过莫洛托夫向毛表示同意缔结新的条约。对维辛斯基的这一奇怪的态度只能有一种解释：维辛斯基不是政治局委员，他还不知道斯大林已改变了政策，而这一新政策当时只是最机密地在最小的范围内讨论的，也就是说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以及可能涉及中国问题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另一个使人感到奇怪的是，毛泽东对维辛斯基的解释没有进行反驳，像他在 1 月 2 日同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谈话时所作的那样。很可能，毛已注意到，维辛斯基不属于知情者的圈内人，因此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反驳。^①

在同一天，毛泽东与科瓦廖夫谈话时也谈到了条约问题。他提到“英国、缅甸、印度和其他隶属于美英的国家”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此相联系地提出了几点看法。毛说，这些国家急于要承认中国，首先是因为它们要维护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以及要在地下进行反对新政权的活动。它们试图在美国领导下分裂联合政府，制造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分子组成的“第三种力量”，以借助它来推翻民主的共产党政府。为此，他们现在已开始依靠“亲美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这个试图把中国共产党人同群众隔离开来的右翼，在国民党政权垮台后，构成了对中国的最大威胁。^②

根据他的上述判断，毛泽东接着说，中国领导要拖延同承认中国的国家交换使团。“……只有到同苏联缔结了军事、经济、政治的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贷款、贸易和其他协定之后，才

参阅 Vladislav Zubok, < to Hell with Yalta! > —Stalin Opts for a New Status Quo,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6-7, 1996, P.26。

此段和以下两段参阅 1950 年 1 月 7 日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关于他 1950 年 1 月 6 日同毛泽东谈话的报告，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533，第 63-64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 45 页及下页。

让外国使团进入我国。”在这种情况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将孤立，而这些条约将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支持。毛以原则性的声明结束了这一话题：“我们可以在同苏联缔结的这些条约的支持下……，立即修改或废除蒋介石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些论点同毛泽东在 1 月 3 日给北京的指示中提出的力争缔结条约的理由，以及对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所作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① 毛泽东在谈话结束时表示，期望在同斯大林下一次会晤时能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1 月 9 日，毛泽东同科瓦廖夫又进行了一次谈话，毛以类似的方式再次谈到条约问题。他声称，他计划立即废除奴役中国的美中通商条约。但在考虑这些条约时，人们将一定遵守苏方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参与签订的各项决议。毛主张尽快同苏联缔结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贷款、通商等协定。他强调，中国将以这些条约为出发点，重新谈判由蒋介石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这类条约。^②

总之，双方都为即将举行的条约谈判作了许多准备。有关双方内部的准备情况，我们拥有的苏联资料大大多于中国的资料。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的“维辛斯基秘书处”秘密宝藏中可以找到关于同盟条约和旅顺、大连及中长铁路协议的多种草案的复印件。^③ 其中有些草案上还有手写的修改。

苏方的准备工作由一个委员会来主持，属于这一委员会的有：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以及外交部长维辛斯基。^④

详见本节的前一部分。

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P.247 f. 这份报告在这里被注明的日期为“1950 年 1 月”，它可能是在 1 月 10 日至 20 日之间完成的。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1 - 115 页。

同上，第 42 页。

当时既不是政治局成员、也不是书记处书记的维辛斯基在 1 月 2 日之后立即起草了外交部的第一份草案。

——放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份草稿是 1 月 5 日产生的（以下简称第一稿）。^① 显然它是委托外交部法律司的一位官员起草的，它包含了一般“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应该具有的基本条款。这位官员显然得到指示，要起草得尽量简短。

——1 月 9 日，由罗申大使、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远东司负责人库乔柯夫及费德林签署的第一份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报送到维辛斯基。^②

——1 月 10 日，送审稿的两位作者把一份“根据您（指维辛斯基——译注）的指示作了修改的草稿”（以下简称维辛斯基第一稿）报送到维辛斯基。^③

——接着是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有手写修改的草稿（以下简称维辛斯基第二稿）^④

——1 月 12 日一份稍作修改的、作为外交部^⑤准备的草稿（以下简称外交部稿）报送到莫洛托夫和米高扬。^⑥

——1 月 16 日，维辛斯基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修改过的文本，连同一份关于中长铁路的议定书草稿及作为其另一种选择的声明草稿（以下简称莫洛托夫 - 米高扬稿），报送给莫洛托夫。^⑦

——1 月 22 日，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把莫洛托夫作了某些修改的草案，连同关于旅大、中长铁路的议定书以及其

同上，第 12-14 页。这份草稿的签名不能完全认清，可能是“谢斯特里可夫”。

^② 同上，第 15-19 页。在这份草稿上签名的有费德林、罗申、布耶夫、库乔柯夫和格里巴诺夫，同上，第 15 页。

同上，第 20-25 页。在该草稿上签名的有库乔柯夫和格里巴诺夫。

同上，第 26-29 页。

外交部的缩写为 MID。

^⑥ 同上，第 31-34 页。

^⑦ 同上，第 1-6 页。附有一份签字备忘录的附加条款草稿，同上第 7 页。

他文件（其中包括一份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作为“委员会准备的草案”（以下简称委员会稿），一并报送斯大林审核。^①

从上述程序中可以看出，除斯大林外，莫洛托夫对条约谈判负主要责任。人们也可从中看出，是他把“莫洛托夫-米高扬草稿”改为“委员会草案”的。在当时 12 人组成的政治局中，负责苏中谈判的除斯大林外，首先是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其次是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此外，外长维辛斯基也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探讨一下苏联草案的产生。从文本内容和手写批注^②方面看，当时作为参考和对比的文件有：1945 年 8 月 14 日苏中友好同盟条约^③，以及苏联同东欧国家签订的第一批（1943-1949 年）双边互助条约。^④在批注方面，特别提到同罗马尼亚（1948 年 2 月 4 日）、匈牙利（1948 年 2 月 18 日）及保加利亚（1948 年 3 月 18 日）缔结的条约。^⑤在个别情况下，也例举了 1946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苏蒙友好同盟条约。^⑥

关于每个草案的讨论记录，迄今尚未得到。但是，我们可以从个别段落和句子的修改意见（大部分是手写的）中看出，苏联草案的形成过程和决议背后的思考。对草案的分析可以从条约的

同上，第 42-50 页。副本抄送政治局委员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中文译本见附录，文件 7。

同上，第 1-4 页。批注可参阅 4 个条约的有关文章。

该条约的中文文本和俄文文本具有同样的法律约束性。中文文本见：“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958 年台北版，第 505-507 页；俄文文本见：《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19 页及下页。

这些条约的德文本本见：鲍里斯·麦斯纳：《东方条约体系—文件汇编》第一部分：苏联在欧洲的条约体系，第 16-106 页。

^⑤ 《苏联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汇编》第 13 卷，1965 年莫斯科版，第 15-22 页。

^⑥ 条约文本见：《苏蒙关系 1921-1966 年——文件汇编》，1966 年莫斯科版，第 156-158 页。

名称和缔约国的关系开始。

在几乎所有草案中都把该条约称之为《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这同 1943 年至 1949 年与东欧国家签订的条约的名称是相同的。^①只是在最后一稿，即 1 月 22 日由莫洛托夫编审的“委员会草案”改称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称谓为双方在 1950 年 2 月 14 日签署的最后文本所采纳。1945 年 8 月 14 日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称为《友好同盟条约》。因此可以说，1950 年 2 月 14 日的条约的名称混合了苏联同东欧国家缔结的条约以及 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两种称谓。

显然，斯大林和毛泽东都不愿从 1945 年中苏条约的名称上倒退下来。已使用过的“同盟”这个概念，显然比“合作”这个概念所表达的关系更为紧密。^②很可能，在 1 月 22 日前中方表示愿保留这一称谓。毛泽东在 1949 年 12 月 16 日同斯大林会谈时就使用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称谓。^③后来在 1950 年 1 月 2 日同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谈话之后发给北京的电报中再次谈到《友好同盟条约》。^④但是，国际法注重的不是名称，而是条约部分对实际问题的规定。^⑤

有一个在法律上看是无足轻重的，但可能从政治气氛看是有意思的情况，需在这里提及。在 1950 年 2 月 14 日的中苏条约中，契约的对方被称之为“缔约国方”。在作者查阅的苏联同

参阅鲍里斯·麦斯纳：《东方条约体系——文件汇编》，第一部分，第 I—III 页。斜体字是作者所加。

^② 一位著名的东欧国家法和国际法专家也同样认为“同盟”这个概念“显示了缔约者之间的一种特别紧密的关系”。见：弗任茨克：《苏联与亚洲国家的联盟互助条约》第 136 页。

^③ 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239，第 2 页。

^④ 1950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缔约卷第 211、213 页。

^⑤ 参阅弗任茨克：《苏联与亚洲国家的联盟互助条约》，第 135 页及下页。

“社会主义国家”签订的同盟友好条约中，基本上都使用了更为尊敬的称谓“贵缔约方”。苏联同亚洲国家签订的条约也基本如此，如：1966年1月15日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1978年11月3日同越南签订的条约。^①但是也有例外，如：1946年2月27日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的条约、1949年3月17日同北朝鲜签订的协定，以及1955年9月20日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的条约。^②这些条约同样使用了“缔约国方”。但在1964年7月12日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的条约中又使用了“贵缔约方”。^③从这些不同的称谓中似乎还看不出有什么规律性。因此，麦斯纳的看法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从称谓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朝鲜是被摆在同一等级之上。麦斯纳显然要以此来表明，莫斯科对这两个国家的尊敬低于它对欧洲缔约国的尊敬。

但是，1950年2月14日的中苏条约只使用“缔约国方”也并非纯属偶然。这似乎有两个原因。其一，不能忽视的是，1945年8月14日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使用了传统的较为尊敬的“贵缔约方”这一用语。其二，引人注目的是，在所有供讨论的1950年条约草案中都使用了“贵缔约方”这个表述，而只是在最后一稿才作了修改。从各种迹象看，不使用传统的表述很可能是中方要求的，这也许是想以此来表现革命性。^④

条约是以一个引言条款开始的，它在谈判过程中几经修改，但却是一般的文字上的改动。双方在条款中声明两国的关系是睦

亚历山大·乌沙柯夫、迪特里希·弗兰茨克：《华沙条约与其双边同盟条约——分析与文本》，1987年柏林版，第395-399、401-405页。

^② 《苏蒙关系 1921-1966年——文件汇编》，1966年莫斯科版，第156-158页；麦斯纳：《东方条约体系——文件汇编》，第二部分，第39页及下页，第44-46页；乌沙柯夫、弗兰茨克：《华沙条约与其双边同盟条约——分析与文本》，1987年柏林版，第382-385页。

同上，第390-394页。

^④ 参阅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

邻友好关系，深信这种关系将最有利于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并表示决心要为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加强合作。鉴于这种一般条款的法律约束性是有争议的，这里就不作详细的探讨。

但在这项一般条款中有两点是引人注目的。其一，维辛斯基在 1 月 9 日的“送审稿”^②的开头部分，加了一句涉及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的话。他称：“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友好同盟条约……的发展和补充中……”（见“维辛斯基第一稿”）。^③但他在下一稿（“维辛斯基第二稿”）中删去了这一句。^④在以后的各稿中，这一句都没有再出现。显然，维辛斯基在此期间已意识到，这一表述对毛泽东来说犹如一件引人发怒的话。毛泽东已多次拒绝使用这一表述，他要缔结一个全新的、与旧约毫无关系的条约。

其次，在“维辛斯基第二稿”中，在宣布“为了普遍的和平与安全”进行合作这一句中，增加了一句手写的补充：“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这一表述是苏联 1948 年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中普遍使用的，它在以后的各稿中都保留了下来，直至 1950 年 2 月 14 日的最终文本。

在一般条款之后的各条款中（包括草案和最终文本），论述了以下几个实质问题：

- 1 采取共同措施，防止侵略（简称：防止侵略）；
- 2 参加国际活动，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简称：争取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活动）；

此处参阅乌沙柯夫、弗兰茨克：《华沙条约与其双边同盟条约——分析与文本》，1987 年柏林版，第 223—246 页。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16—19 页。

^③ 1950 年 1 月 10 日稿，同上，第 20—22 页。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26 页。

3、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双方应保证相互援助（简称：援助条款）；

4、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另一方的同盟和行动（简称：禁止结盟）；

5 放弃单独与日媾和；

6 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彼此协商（简称：协商条款）；

7 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相互经济援助（简称：经济 - 文化合作）；

8、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未来 简称 旅大和中长铁路）；

9 终结协定

下面，转入对各草案涉及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

1、“防止侵略”

在草案中，这一条款遵循的是苏联 1948 年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的同盟条约的第一条第一款，以及 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第三条第一款。在同三个东欧国家签订的条约中，缔约双方承担义务，“共同采取一切相关措施，以防止德国或其他以直接或间接形式与德国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危险”。在 1945 年的中苏条约中称，双方有义务“在结束对日战争后，共同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以便使日本不可能重新发动侵略与破坏和平”。在“莫洛托夫 - 米高扬草案”中，有一手写的旁注，提示参阅苏联同东欧三国签订的条约以及 1945 年中苏条约的第三款开头。

在所有草案中，这一条都放在第一条第一段。原则上都以苏联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中的表述为样板。但在“第一稿”中没有提“侵略者”，而只是说防止“侵略的危险”。此外还说“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在后来的、包括“莫洛托夫 - 米高扬稿”中，都使用了三个东欧条约的表述。惟一的

两个不同之处是：“一切可能的措施”改为“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及把潜在的侵略者德国替换为日本。在“委员会稿”中，提到潜在侵略者日本，但又把“一切必要措施”重新改为东欧三国条约中使用的“一切可能的措施”这一表述。从各种迹象看，这两种表述的差别不涉及实质内容，而只是修辞上的改动。

2、“争取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活动”

这一条显然也受到苏联 1948 年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的影响，即条约第二条第一段的影响。在这一条里，双方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在所有的草稿的第二条第一段中都包含了相应的这一条。只是在“第一稿”的第一条中是这样开头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是“双方并宣布，……参加……”。在第一和后来的几稿中使用了“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这一表述，但“委员会稿”和接着的几稿又恢复了三个东欧国家条约的原来表述。此外，维辛斯基在他的第二稿中作了两处手写的修改，这些修改在以后的各稿中都被保留了，那是两个小的文字修改：“强调”改为“宣布”；旨在”改为“以此为目的”。这都不涉及内容本身。

3、“援助条款”

这一条对所有同盟条约都具有中心意义。除“第一稿”外，这一条与 1948 年苏联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中相应条款是相一致的。这一条称：“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在德国试图重新推行侵略政策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德国勾结的任何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将立即尽其全力向处于战争状态的缔约国一方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①

^① 参阅《苏联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汇编》第 13 卷，1965 年莫斯科版，第 16、20 页及下页。

此条在匈牙利条约中的表述，略有一点差别。^①

在“第一稿”中的援助条款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允诺，一旦缔约国的一方受到军事攻击，另一方将给予包括军事在内的援助。”这一表述同 1946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苏蒙友好互助条约是完全相一致的。^②在这一表述中没有明确指出攻击者及其同盟者。因此，这一援助义务针对的是广泛的攻击者，这不同于苏联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缔结的条约，那里的援助义务针对的是德国潜在侵略者。此外，还有一点不同之处是：这里没有提“立即”援助。

但“委员会稿”和以后的几稿都完全采用了苏联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中的表述，只是在攻击者方面以日本替代了德国，并加上了“立即”一词。因此，这一稿的援助条款与 1945 年中苏条约的相关条款基本相同，只是在 1945 年的条约中没有规定，援助义务也包括在受到“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袭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

引人注目的是，在各稿中都没有 1948 年东欧三国条约中一句普遍使用的话，即：“本条约的贯彻将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相一致。”莫斯科领导人之所以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同盟条约时没有写进这句话，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还没有它的代表，中国的代表席位仍被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所占据。如果这一推测是对的，那么，这条原则并没有始终贯彻。如前所述^③，在后来的苏联草案中，在“一般条款”中，又加上了这样一句：缔约双方为了和平与安全，在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

同上，第 18 页。

^② 条约文本见：《苏蒙关系 1921 - 1966 年——文件汇编》，1966 年莫斯科版，第 156 - 158 页。

详见本节的上一部分。

范围内，紧密合作。^①

4、“禁止结盟”

这一条款是同盟友好条约普遍具有的经典条款。这一条在苏联草案中被列为第三条。这一条也是参照 1948 年苏联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的条约第三条来写的。该条称“双方有义务，不参加反对另一方的同盟、集团以及行动和措施”。

第一稿中的这一条也有所不同，它缺了“行动和措施”这一概念。^②但这却同 1945 年中苏条约的第四条完全一致。这绝非偶然，因为莫洛托夫—米高扬稿中的手写旁注明明确表明，人们考虑到了 1945 年条约的第四款。^③

在其他各稿的“禁止结盟”条款中，都使用了与三个东欧国家互助条约中的相同表述。

5、“放弃与日单独媾和”

这一条在苏联的各稿中都被列为第四条，参照了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条约的第二条。该条称“双方承担义务，不与日本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第一稿基本照抄了这一表述，只是删去了由于战争已经结束而变得没有意义的“停战”这一概念。“委员会稿”只是说，双方承担义务，“不与日本进行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的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之任何政府或政权，缔结和约”。这就意味着对缔约双方在对日政策上有着更大的约束，因为按新的表述，即使日本已“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也不能与之单独谈判和单

此段参阅乌沙柯夫、弗兰茨克：《华沙条约与其双边同盟条约——分析与文本》，1987 年柏林版，第 174—178 页，特别是 177 页。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13 页。第一稿的第三条中有 3 个明显由于疏漏而造成的错误。

同上，第 2 页。

独缔结和约。

维辛斯基对其第一稿的第四条进行了压缩，删去了累赘的文字，把规定减少到最核心的部分。缔约双方直截了当地承担义务，“不与日本进行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缔结和约”。这一表述被“维辛斯基第二稿”、“委员会稿”和“莫洛托夫—米高扬稿”所接受。

6、“协商条款”

这一条也是友好互助条约所普遍具有的规定。他在各稿中被列为第五条。第一稿的这一条逐字逐句地抄袭了 1948 年苏联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 均将进行彼此协商。”在“莫洛托夫—米高扬稿”中补充了一句手写的文字：“……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这一表述也为“委员会稿”所采纳。

7、“经济—文化合作与互助”

接着，在所有草案中都列了一个第六条，它规定缔约双方有义务进行文化和经济合作，保证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对方的内政。

1948 年苏联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为此提供了样板。在字句几乎相同的第五条中，缔约双方宣称，“以友好合作的精神，以及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 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

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条约中也有类似的条款。在第五条中规定：“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益”¹³；在和平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在第六条中称：“缔约国为便利及加速两国

¹³1948 年 3 月 18 日苏联保加利亚互助条约，见：《苏联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汇编》第 13 卷，1965 年莫斯科版，第 16 页。

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

这些内容在所有草案的第六条中都包含了。在第一稿中说：缔约双方“深信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安全和繁荣之利益将促使两国的牢固和持久的友谊得到发展和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巩固，相互并一致同意依照彼此尊重独立与主权及互不干涉别国内政之原则。”引人注目的是，1945年的条约虽然一般地谈到了合作，但没有像1948年苏联同三个东欧国家的条约那样特别提到发展文化关系，而三个东欧条约却没有像1945年条约那样提出要“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此外，也没有提尊重领土完整（1945年中苏条约第五条）

“送审稿”对该段做了文字上的补充，并表述为：缔约双方“保证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但这里没有提出相互给予经济援助，同样也没有提及尊重领土完整。

“维辛斯基第一稿”又加上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这是维辛斯基推动下增加的。如“送审稿”上的一个手写的旁注所显示，这里是有意识地采用1945年中苏条约的表述。^①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一用语没有在第一稿中就写入，而苏联给予中国援助这一点，在米高扬1949年1月、2月间访问中国时就已达成协议，并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时得到了重申。

在“维辛斯基第二稿”中加进了“尊重领土完整”。这一句的手写文字是：“……遵照相互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这一句均为“外交部稿”、“莫洛托夫—米高扬稿”及“委员会稿”所采纳。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5，第18、20、24页。

8、“旅大和中长铁路”

最为棘手的条约内容是涉及对东北的三个问题：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从分析同盟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各个草案来看，苏联方面在这几个问题上是最无把握的。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那一天，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而斯大林在 1945 年 2 月 11 日雅尔塔协定中已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承担了缔结这一条约的义务。在签订 8 月 14 日条约的同一天，还签订了三个协定。按其中的一个协定的规定，旅顺口作为纯粹的海军基地仅为双方所共同使用，海军基地的防务由苏联承担。在另一个协定和一项议定书中，大连被宣布为自由港，中国以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联，并规定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担任，副主任由华籍人员担任。第三个协定规定，中长铁路归中苏双方共同所有。按协定，中长铁路设理事会和监事会，中方和苏方各占一半成员。但在理事会，中方担任理事长，苏方担任副理事长；而在监事会，则相反，苏方担任监事长，中方担任副监事长。此外，理事会委派铁路局局长一人，由苏方人员担任，副局长由中方人员担任。这三个协定的有效期均为 30 年。^①

在这几问题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人与斯大林的意见不一致，并对谈判结果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同国民党政府一样感到这是沙皇殖民主义传统的继续，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斯大林曾在 1949 年 2 月通过米高扬向毛泽东，以及在年中当面向刘少奇提出：苏军将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从旅顺口撤出，或者，如中方愿

三个协定的中俄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中文文本见：“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958 年台北版，第 512-519 页；俄文文本见：《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198-203 页。关于雅尔塔协定、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条约和三个协定的详细情况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意，可立即撤出；双方可利用大连自由港，直至新政府成立。在 1949 年 12 月 16 日同毛泽东谈话时，斯大林却说，考虑到雅尔塔协定，有关协定要在形式上保留，但同时他重申，苏联军队也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实际上撤离。关于中长铁路，米高扬在 1949 年年初西柏坡会谈时把它称之为平等的。但 12 月 16 日斯大林却说，中长铁路的状况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可根据中方的愿望对有关条款进行修改。类似 1949 年同米高扬会谈时那样，毛泽东在 12 月 16 日回答说：鉴于中国防御能力的薄弱，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苏联军队过早撤离是不利的。但在这次谈话中没有提及大连问题。^①

如果说这个问题曾是 1950 年 1 月初中苏谈判的一个主题，那么，当时苏联提出的解决方案在起草新条约时仍然被完全坚持。在“第一稿”的第七条中是这样写的：双方确认，苏联与中华民国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缔结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各协定继续有效。^②按这一方案，苏联撤军将在 30 年内不予考虑。

关于旅顺和大连，“送审稿”第七条作了类似的、但却更加强硬的规定：缔约双方“声明，与现有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相一致，……1945 年 8 月 14 日关于大连港之协定和 1945 年 8 月 14 日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所有附件，作为现有条约的不可缺少部分继续完全有效”。^③

中长铁路在“送审稿”中没有提及。这可能是当时已有意对这一内容作单独处理。在维辛斯基的秘密档案库中也看不到相应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13 - 14 页。中文译本见本书附件：文件 1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18 页、中文译本见本书附件：文件 2

的草案。这样的草案在“送审稿”附件（1月9日给维辛斯基的信）中也没有提及。^①

此时，苏联领导改变了关于旅顺和大连的谈判意见。根据维辛斯基的指示，迄今为止的第七条被删除了。^② 1月10日“维辛斯基第一稿”的文稿称：缔约双方约定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将友好地重新审核现有的关于大连港和旅顺口的协定问题。在第二段中说，当前驻旅顺和大连的苏联部队将在本条约生效后的2至3年或X年内减少或撤离。^③ 这里仍然没有提及中长铁路。不仅在档案中没有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草案，在上述条约草案的附件（1月10日给维辛斯基的信）中也没有提及中长铁路问题。^④

“维辛斯基第二稿”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主要是不再把对原协定的重新审核在时间上同缔结对日和约联系在一起。这一稿的第七条称：缔约双方约定，当前驻旅顺和大连的苏联部队将在现条约生效后的2-X、3-X年内（手改为：2至3年内）撤离，并在上述期限结束后将对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中国签订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进行重新审核（手写的修改还在“协定”后面加上了：“以及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⑤”）。这一稿也没有提及中长铁路问题。

在“维辛斯基第二稿”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问题所做的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15 页。

^② 同上，第 18、20 页。在“送审稿”上可以看到划掉第七条的横线，同上第 18 页。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24 页。中文译本见本书附件：文件 3

同上，第 20 页。

这一议定书规定，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全文见：“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958 年台北版，第 520 页。当时这一议定书苏方没有公布，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122 页。此件也没有收集到 1959 年出版的苏联条约集，参见：《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第 203 页及下页。

处理和手写的修改，被 1 月 12 日的“外交部稿”所采纳。但在这一稿中仍然没有提及中长铁路问题。^①

在 1 月 16 日“莫洛托夫—米高扬稿”中称，苏联部队将在“在现有条约全面生效后的 2 至 3 年内撤回到苏联的领土之上，撤军将从 1950 年开始”。关于原协定的审核时间问题，这一稿又回到“维辛斯基第一稿”的提法，即：双方约定，“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将重新审核 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和中国缔结的关于大连港和旅顺口的协定”。^②

在本书的附件中附有一份作为“第一选择稿”的《关于批准中长铁路协定的有效性的议定书》，以及作为供选择的“第二选择稿”的关于同样问题的《声明》。两稿都同样确认，“1945 年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在该协定规定的整个期限内继续有效”。在《声明》中“整个”一词被划掉。^③

对旅顺口和大连港问题的处理，“委员会稿”采纳了“莫洛托夫—米高扬稿”所写的内容。只不过这一稿把此段内容从《条约》中划出（在此之前，此内容一直被列为《条约》的第七条），而改为单独的一项《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④第二项议定书涉及的是《苏中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⑤这里重复了“莫洛托夫—米高扬稿”中已谈到的议定书和声明的内容，只不过有两点改动。其一是划掉了“整个”一词；其二是加了半句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24 页。中文译本见本书附件：文件 4

^② 此段参阅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3-4 页。此段中的“以及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一句被划掉了。见本书附件：文件 5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24 页。中文译本见本书附件：文件 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24 页。中文译本见本书附件：文件 8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24 页。中文译本见本书附件：文件 9

话：缔约双方“为保障铁路的有效商务利益”，可以增加“若干补充规定”。^①按照条约内容作出某些规定，以及通过单独的议定书来处理某些问题，这从法律角度看是允许的。^②

从以上条约草案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苏联领导在 1 月 5 日至 22 日期间在旅大和中长铁路问题上的意见形成过程。最初，他们只是想通过新的条约批准 1945 年签订的有关三个协定的有效性。关于撤军问题，他们显然是想按斯大林的建议，形式上不作任何条约上的处理。直到 1 月 10 日，他们才开始形成了具体的意见：苏联军队在条约生效后的 2 至 3 年内撤出，1945 年缔结的协定则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作审核。最后形成的意见是：这些协定要在其规定的有效期届满之后，而不是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后，再进行重新审核。1 月 16 日，他们最终把撤军期限定为 2 至 3 年，并从 1950 年开始。与此同时，他们又回到原先的主张：对有关协定的重新审核要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后。此时，他们还一直坚持，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有效性应予以批准。一直到 1 月 22 日的草案，他们才对这种处理作了一个补充：为了保障商务的成效，双方可以对协定提出“补充规定”。

9 “最后条款”

“第一稿”提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条约的批准和批准书在北京互换。以后的各稿均采纳了这一条的内容。此外，草案还提出，本条约有效期为 30 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无限期继续生效，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于一年前通知对方，终止条约之效力。

在有效期和废除方式上，“第一稿”是以 1945 年中苏条约为样板的。1948 年苏联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缔结的互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50 页。

^② 参阅弗任茨克：《苏联与亚洲国家的联盟互助条约》，第 135 页。

助条约规定的有效期为 20 年，如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每次顺延 5 年。

“送审稿”保留了“第一稿”的废除方式，但把条约有效期缩短至 25 年。在以后的各稿中，有效期又被恢复为 30 年。

这里，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条约是否与 1945 年 8 月 14 日同国民党中国签订的条约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如果有，是何种程度？在这个问题上，维辛斯基曾与国际法专家杜德涅夫斯基进行过商讨。2 月 13 日至 14 日，杜德涅夫斯基给维辛斯基寄去了一份根据最新情况提出的专家鉴定。他的结论是：如果一个新的条约在内容上与一项旧条约类似，或与之相一致，那么，旧条约将继续有效。为避免产生误解，杜德涅夫斯基在其专家鉴定书的最后，建议在新的条约、签字议定书或单独的换文照会中说明，缔约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旧条约中与新条约不发生矛盾的部分将继续有效”。^①

维辛斯基接受了杜德涅夫斯基的建议，在 1 月 16 日的“莫洛托夫 - 米高扬稿”中附有一份“签字议定书的条款”。他称：“在本条约签订之际，缔约双方声明，本条约的缔结并不损害苏联和中国在过去缔结的各条约的基础上所承担的义务。”^②

维辛斯基究竟在这一条中含有什么想法，现在并不清楚，但这一条后来没有再出现。人们可以认为，维辛斯基有他的具体目标，因为在杜德涅夫斯基给他的信中说，这一材料和可能得出的结论“对我们的地位是有利的”。^③

1 月 22 日，关于条约及旅大和中长铁路的两个协定的草案，由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作为“委员会稿”呈交给了斯大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117 - 120 页。

同上，第 7 页。

③ 1950 年 1 月 13/14 日杜德涅夫斯基给维辛斯基的亲笔信，同上，第 117 页。

林。副本抄送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他们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以外，负责谈判准备工作，以及后来与中国谈判的政治局委员。给斯大林的呈送函中写道：“我们送上由委员会准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草案，供审核。”随后附有 12 个文件草案，以及为批准这 12 个同名文件的、将由“中央委员会书记”签署的“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决议”的草案。^①

当时，行文中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这个用语指的就是斯大林，它仅是“总书记”这一称呼的谦虚表述。我们不知道，斯大林是否在这些文件上签了字，因为以上援引的文件均是报送斯大林的文件副本。迄今未能见到的原件可能藏在总统档案馆。

这两个文件开列了以下 12 个文件草案的名称：^②

- 1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 2 关于旅顺口和大连之协定的议定书
- 3 关于中长铁路之协定的议定书
- 4 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偿付苏联向中国提供设备和其他商品的政府协定
- 5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成立苏中民航股份公司的决议
- 6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决议
- 7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决议
- 8 商品交换和支付协定
- 9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决议
- 10、关于派往中国机构、组织和企业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支付条件的协定

同上，第 41—44 页。

② 同上，第 44 页。作者对文件的名称作了不损愿意的简化。

11、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满洲、新疆和辽东半岛领土上由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公司管辖的不动产的决议

12、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中国派遣苏联教授和教师的决议

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头 3 个文件将予以公布。在中长铁路方面还计划签订第二个不公开的议定书，其中将对“某些问题（如铁路管理局的重建期限问题）做详细的说明。有关草案将由委员会另行提出。“上列其他几个文件”的文本或内容是否公开，需经专门的审核。^①如援引的表述所显示，在第二个中长铁路议定书中，苏联领导向中方保证，将重新恢复铁路管理上的平等，它实际上在不久前已作了有利中国的改动。在上面列出的 12 个草案中，只有头 3 个被存放在“维辛斯基秘书处”秘密宝藏中。这就是以上被标明为“委员会稿”的同盟条约草案，旅顺口和大连议定书草案，以及中长铁路的议定书草案。^②

斯大林是否在 1 月 22 日当天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之前仔细阅读了“委员会稿”，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那么，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论及旅顺口中心问题时却超出了草案的框架。^③

第十五节 周恩来率领的谈判代表团

1 月 22 日谈判开始，参加那天原则性会谈的还有周恩来总理，他受北京领导的委托负责谈判工作。周和中国谈判代表团是在两天前到达莫斯科的。1 月 2 日，毛泽东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就签约等问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达成一致意见请周恩来前来

同上，第 42-43 页。

^② 中文译本见本书附件：文件 7、8、9
参阅第四章第十六节。

进行谈判。就在当天的晚上，毛泽东向北京发出了有关周恩来组团来莫斯科的指示，并要求代表团在 5 天内准备完毕。他还希望周偕同贸易部长叶季壮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 1 月 9 日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在周恩来不在期间，副总理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关于周的旅行和董的任命应在周到达莫斯科后再对外发表。毛还请北京领导人考虑和电复：旅行的准备时间是否还需增加一两天，李富春或“其他同志”是否需同周一起来莫斯科。^①

毛最后与苏联领导人商定，周带 17 人于 1 月 9 日从北京启程来莫斯科。他还向北京的领导建议，派一个新疆的高级代表团来莫斯科，它可与周同一天到达，或迟两三天到达。^② 周的政府代表团比计划晚一天离开了北京。代表团有以下一些成员^③：李富春（中共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叶季壮（贸易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伍修权（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赖亚力（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柴树藩（工业部计划司司长）；沈鸿（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苏农官（外贸部机要秘书）；吕东（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张化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欧阳钦（大连市委书记）；程明陞（东北电业局局长）；常彦卿（东北外贸部处长）；王勋（东北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聂春荣（东北机械局副局长）；罗维（东北煤炭局计划处处长）。

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的代表团同毛泽东的随行班子一样，没有一个成员是政治局委员（周自己除外）。其次，代表团中有

^① 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12 页。

^② 1950 年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同上，第 215 页及下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二卷，第 21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4 页；< Chinese Communist Who's Who > . Taipei 1971. Vol. II, Taipei, 1971, P. 122。

来自东北的许多高级官员。这表明，苏联在这个地区拥有特权，这个地区在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同时，这也强调了东北在借助苏联援助，建设中国现代工业方面所具有的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毛没有安排东北的第一把手高岗来莫斯科，这说明高日益失去信任。毛在 1 月底已得知，高岗自 1949 年秋或更早一些时候起，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递送了密告中共领导内部情况的报告。^①

北京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来自新疆的邓力群和赛福鼎也到达了莫斯科，并加入到周恩来的代表团。赛福鼎于 1 月 30 日抵莫斯科，同日与毛进行了第一次关于新疆问题的谈话。^②

邓力群是中共新疆书记，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的国家官员身份是新疆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外事厅和文化文教厅厅长。^③维吾尔人赛福鼎是新疆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他在苏联学习时加入了俄罗斯共产党，在 1944 年至 1945 年成立的反华亲苏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里曾担任教育部长职务。1949 年秋他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并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同一位哈萨克人和一位汉人根据苏联的指示秘密地乘一架苏联飞机从新疆经阿拉木图飞往北京。最初商定由阿合买江提·哈斯本为首的另一个新疆代表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但该代表团乘坐的苏联飞机于 8 月底在贝加尔湖附近神秘地坠毁了。^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赛福鼎被选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务院民族委员会。他直到 1950 年 2 月底从莫斯科回来后才加入中

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八节，第四章第七节。

^② 《汪东兴日记》第 176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61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1 页。最后这一文献提到，赛福鼎是从新疆出发来莫斯科的。

^③ Barke: < Who's Who > . P.51;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 . P.244 (Note 12)。

^④ 参阅 Whiting/Sheng Shits'ai: < Sinkiang: Pawn or Pivot > . East Lansing . Mich.1958, P.142 f.

国共产党。当时，他只能看懂汉语，而不能写。①

毛泽东曾请北京的中央考虑，除了党的领导人邓力群外让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也来莫斯科。② 为什么这一请求没有实现，而决定由包尔汉的副手赛福鼎前往，这一点现在还不得而知。

周恩来在苏联边境受到赤塔地区行政长官和苏联外交部秘书长的迎接，并陪同前往莫斯科。周从新西伯利亚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与毛通了电话，就即将举行的谈判交换了意见。他准备了到达莫斯科时将要发表的演说，并交伍修权翻译。王稼祥大使赶到雅罗斯拉夫尔，在那里迎接代表团。③

1月20日，中国代表团到达雅罗斯拉夫火车站时，受到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身份）的欢迎。（毛达到莫斯科时，出面迎接的是莫洛托夫，米高扬在级别上排在莫洛托夫之后）。到车站欢迎的还有外长维辛斯基，外贸部长缅什可夫，大使罗申，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尼洛夫中将，以及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司长库乔柯夫。周恩来在苏联的记录中被称之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到场的还有王稼祥、陈伯达，以及东欧各卫星国和北朝鲜、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使。④

《真理报》在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一篇关于周恩来到达的报导，并附有照片。它约占据了第1版的四分之一。照片显示的是周恩来在麦克风前发表演说，周围有维辛斯基、米高扬和王稼祥。

关于赛福鼎参阅 Boorman/Howard; <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 . Vol.III, P.87-89; < Chinese Communist Who's Who > . Vol.II, P.150; Bartke; < Who's Who > . P.312.

② 1950年1月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215页。

③ 此段参阅《消息报》，1950年1月21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4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36页。

此段参阅《消息报》，1950年1月21日，第1版；《人民日报》，1950年1月22日，第1版。汪东兴的报告不准确，说周受到莫洛托夫的欢迎。见：《汪东兴日记》，第191页。

《人民日报》也是在第 1 版发表了有关的消息。在后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周恩来的到达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为中苏友好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① 周恩来在演说中强调，他是奉毛泽东的指示来莫斯科的，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引人注目的是他把苏联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在时间上限制在“多年来”。另一方面他向苏联的专制者表示敬意，他称赞“列宁斯大林支持和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一贯政策”和“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周恩来三次使用了“两大国”这一称谓，这表明了态度自信，也强调了平等地位。周恩来在简短的演说结尾强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两国“携手前进”。他第二次向毛泽东表示敬意，援引毛的话说：“中苏友好合作万岁！”^②

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和王稼祥在毛的别墅会面，商议与苏方会谈的方针。因周的驻地离毛的别墅太远，周建议并于第二天搬进了毛的别墅。^③

1 月 21 日是列宁逝世 26 周年。《真理报》发表了一幅纪念会主席台的照片，毛泽东和周恩来是照片上可以看出的惟一的外国客人。毛站在第二排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之间，周在同一排的米高扬和柯西金之间。在大厅里还有毛和周的代表团的十个成员。在纪念会后的招待会上，斯大林、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交谈，“对签订新约的总精神取得了一致看法”。^④ 晚上，毛泽

此段参阅（真理报）1950 年 1 月 21 日，第 1 版；《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22 日，第 1 版，及 1950 年 1 月 24 日第 1 版。在 1950 年 1 月 21 日《消息报》第 1 版发表的照片上还可看到伍修权 and 罗申。

② 此段参阅（真理报），1950 年 1 月 21 日，第 1 版。

③ 《汪东兴日记》第 191 页及下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5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21 页。

东与苏联政治局委员一起观看了关于列宁的一部电影。^①

第十六节 谈判的转折点：1月22日的会谈

从准备到正式会谈的过渡是1月22日晚两小时的最高层的原则会谈。参加这一会谈的苏方人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和费德林，中方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师哲。^② 苏联新闻还报导说，斯大林于1月22日接见了周恩来，^③ 王稼祥大使和外长维辛斯基在场。

斯大林在正式会谈的开始就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可分两类：现有的协定和涉及满洲、新疆等地的当前事务。他建议先从第一类问题 现有协定开始。他说：“我们认为 这些协定应当修改 尽

此段参阅《真理报》，1950年1月22日第1版；《人民日报》，1950年1月23日第1版；《汪东兴日记》第192页；1950年1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251页。

以下的会谈论述依据的主要是苏方的记录：《斯大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简称：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29-38页；英文译本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6-7, Winter 1995/1996, P.7-9. 除了这个文本外，作者还拥有1950年1月23日由费德林和罗申记录并于第二天送维辛斯基审阅的记录稿：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40-49页。其中有几处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修改，但这几乎都是修辞性和纠正拼写错误的修改，并都为最终文本所采纳。有4处内容性的修改将在下面叙述该记录时提及。此外，还参阅了列多夫斯基编写的会谈梗概，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毛泽东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的会谈：新的档案材料》，载于《近代史与现代史》1997年第1期第37-41页。关于会谈时间和参加人，参阅《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载于《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第6页。冈察罗夫、列维斯和薛对1950年1月22日会谈的复述是很不完整的，并有部分错误；见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110-113, 120, 126. 这里不是对这几位作者的指责。如同所有1995年以前发表的出版物的作者一样，他们没有看到苏联的会议记录，而不得不基本上依据师哲的微薄的和不准确的陈述。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真理报》，1950年1月23日。

管我们从前曾经想 这些协定可以保留。”包括条约在内的现有协定之所以需要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 日本已被打垮 这个条约就成为落后于时代的東西了。他请求中方谈谈对“友好同盟条约”的想法。^①

斯大林以此证实了他的想法的转变，这一变化曾于 1 月 2 日通过莫洛托夫传达给了毛泽东。^② 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曾对毛泽东坚持说，“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考虑到雅尔塔协定，“即使对某一条的修改”也是不合适的。他说的“条约”是包括有关协定的条约全部，即包括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补充协定。斯大林在 1 月 22 日提出的关于他改变想法的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虽然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条约包含双方有义务共同对日作战直至“最后胜利”，但当时就已预见到，并在条约签订后的 6 天赢得了战争的胜利。^③ 条约主要涉及的是战后时期，有效期为 30 年。关于斯大林态度转变的真正原因已在本章的第九节论述。^④

毛泽东在 1 月 22 日称，中方还没有具体的条约方案，仅有一些设想。斯大林回答说，可以先交换意见，然后起草相应的条约草案。毛接着说，他认为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巩固现有的友好关系。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有良好的反应。在“同盟友好条约”中，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因为不

^①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29 页。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十节。

此处和下段参阅条约文本，见：《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的 98 - 201 页，特别是第一、八条。

见本书第四章第九节。

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力图阻止这种繁荣昌盛。①

斯大林表示赞同，并说，日本的骨干保留下来了，他们早晚必定还会抬头，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当前政策的条件下。②

毛接着说，他提出的这两点正是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从前国民党仅仅在口头上谈论友好，现在情况不同了，已经具备“真正友好和合作的一切条件”。此外，如果说从前是在抗日战争中进行合作，那么现在的合作应当是防止日本的侵略重演。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问题。“而经济合作将是最重要的问题”。

接着，双方简短地就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应作哪些修改交换了意见。斯大林和毛泽东一致同意删去现有条约第 3 条中的那句话：该条一直有效，直至联合国组织在缔约双方的请求下承担了对日本之再事侵略的防止责任时为止。

在上述第 3 条中的前两句是说，双方有义务在对日作战终止之后共同采取措施，阻止日本再事侵略，并在一方受到攻击时，另一方应提供相互援助。斯大林和毛泽东一致同意删去的是该条的第 3 句。而这一条在苏联的内部“委员会稿”中已经被删掉。④显然，删除这一条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斯大林问，新条约中需要增加哪些条款？毛泽东提出“就国际问题进行协商”。⑤毛说，这将加强中共的立场，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人反对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同苏联接近的政策。

①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29 页。

同上，第 30 页。

同上，第 30-31 页。

详见第四章第十四节。

此处和下段参阅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1 页。

斯大林表示同意。在苏联的内部“委员会稿”中也已包含了这样一项协商条款。这一条在该稿中是第 3 条。^①

此时，斯大林转入了棘手的题目。他问：毛对中长铁路问题有哪些建议。^②

接下来的对话，并没有直接针对斯大林提出的中长铁路问题，而更多的是涉及旅顺口和大连问题。双方通过对话进行小心翼翼的试探。可以看出，双方都很清楚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毛泽东的谈话一般是含糊的、商讨性的、防御性的，有时也有些矛盾。斯大林则更倾向于明确。毛泽东只是在中长铁路问题上表现强硬。但是，从双方的表述中都很难弄清其背后的动机，因此人们只能对此作一些猜测。

这里应首先回顾一下斯大林一年前的态度，他在 1949 年 2 月初，在米高扬西柏坡会谈时曾提出，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应予以废除，如果中方愿意，苏联军队也可立即撤出。^③当时，斯大林是清楚的，他不可能让共产党中国接受他强加于国民党政府的协定。几年后，毛对苏联大使描述了斯大林当时对形势的估计，他说：“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④在西柏坡，毛曾表示反对迅速撤军和修改条约。^⑤当年的 7 月，斯大林曾对刘少奇说，1945 年

详见第四章第十四节。

^①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1 页。

^② 1949 年 2 月 5 日斯大林给米高扬（转毛泽东）的电报，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 I》，第 106 页。详见第三章第四节。

^③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中方的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4 年第 1 期，第 16 页。

^④ 1949 年 2 月 6 日米高扬给斯大林的电报，原件复印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78-79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 13 页；另参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1 页。详见第三章第四节。

8月14日缔结的条约是不平等的，苏军将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离，如果中国党愿意，也可立即宣布撤离。^①从刘少奇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中共只有在建立了自己的海岸防务后才对苏联撤军感兴趣。^②

当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对毛泽东说，“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这表明他当时坚持要宣布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继续有效。当然，他当时还提出可根据中国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并考虑到中国的愿望对中长铁路的协定做个别条文的修改。毛泽东在12月16日表示反对“过早”地撤军。从各种现象看，他也宣称中长铁路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据我们所知，这不是他的真实思想。12月16日的分歧在于：斯大林要法律上保留条约及协定，实际上撤军，对中长铁路的协定可做某些修改；毛泽东却赞成立即废除条约，但反对立即撤军。关于毛为什么有这样的主张，上面已作分析。^③

1950年1月22日，针对斯大林提出的中长铁路问题，毛回答说，或许像旅顺口协定那样，中长铁路协定也实行法律上保留，实际上进行修改的原则。^④毛的回答使人感到有些惊讶，因为斯大林在会谈一开始就已宣称，“现有协定，其中包括条约，需要修改”。这里明确指的是形式上的修改。

显然斯大林感到有点意外。他问道“这是否意味着你们同意宣布‘现有协定’（此时他考虑的显然是旅顺口协定）在法律上仍然有效而‘实际上作些适当的修改’”毛泽东对此的反应说明，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3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5页；《科瓦廖夫，II》，第86页。详见第三章第八节。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49页，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42页
见第四章第三节。

^④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31页。

他所表示的立场并不是他的真实意见，而只是想以此确定斯大林关于形式上修改协定的声明是否是认真的，并试图弄清楚斯大林究竟想如何修改协定。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理解没有表示赞同，而是礼貌地、但却是冷淡地和有些隐蔽地回答说：“我们应当从中苏双方的利益出发，既考虑中国的，也考虑苏联的利益。”^①

显然，斯大林明白，毛泽东对现状是不满的，并表示要对协定作形式上的修改。斯大林甚至也认为毛是有道理的。因此他急忙表示赞同，并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的。”这一观点虽然在 1949 年 2 月米高扬在西柏坡就已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但后来在 7 月和 12 月 16 日斯大林会见刘少奇和毛泽东时却没有再提及。^②毛泽东立即利用这一观点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他含蓄地、却合乎逻辑地接受了修改的方案。但他又假装表示担忧，他说：“但是，修改这个协定不是会触及雅尔塔会议协定吗？”^③

毛以此重复了斯大林 1949 年 12 月 16 日提出的、苏方决定“暂不作任何修改”的理由。^④他想以此诱发斯大林作出激烈的、同时又很仓促的反应。斯大林回答说：“是的，会触及，——那，让它见鬼去吧！既然我们采取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就需要进行到底。的确，这会使我们有些难堪，我们难免要同美国人进行斗争。但我们对此已经适应了。”^⑤

同上，第 32 页。

^② 此段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78—79 页，引自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0 页及下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3 页；甚至：《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5 页；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10—12 页。详见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八节。

^③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同上，第 32 页。

^④ 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10 页。

^⑤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同上，第 32 页。

毛泽东再次表示担忧说：“这个问题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它对苏联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至此，斯大林感到有必要进行辩解，他宣称：“大家知道，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缔结了现有的条约。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可能抛开蒋介石。我们那时的出发点是，苏军驻扎在旅顺口将有利于苏联，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力量。”毛泽东无动于衷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是清楚的。”^①

以上援引的 6 句对话是引人入胜的，也是令人琢磨不透的，它也从心理解释方面反应了毛泽东的论证方式。当毛泽东就雅尔塔协定提出疑问时，这难道只是一个无需回答的修辞学上的反问？此时，毛泽东已知道斯大林准备在形式上对条约进行修改，那么，他这样提出问题是否是要置斯大林于尴尬的境地，要他作出正式的更正，或挑衅性地要他对其立场的改变作出解释？因为斯大林曾于 1949 年 12 月 16 日两次坚持其反对在形式上修改条约的立场，而自 1950 年 1 月 2 日以来又放弃了原先的主张。^②如果是这样，那么，毛就是以此而含蓄地让斯大林明白，他对斯大林当时坚持雅尔塔协定是很不赞成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拒绝这个协定，因为它给莫斯科提供了在满洲的特权，这实际上是沙皇帝国主义的继续。^③或者人们应同意两位俄罗斯作者的推测：毛当初对斯大林的想法改变不敢相信，觉得可疑，故此以坚持雅尔塔协定来弄清情况。^④所有这些解释都有其道理，它们都同样可以用毛泽东 1 月 9 日的态度作为证明，毛那天对科瓦廖夫声称，他计划立即废除奴役中国的美中通商条约，但在考虑这些条约

同上。

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也有类似的论证。他们认为这是毛的一种策略，中国的说法是“欲取姑与”。见：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112。

参阅海因茨希：《1945 年斯大林背叛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载于《亚洲》第 56 期，1995 年 7 月，第 9 页。

^④ Zubok / Pleshakov: <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 Cambridge, Mass/London 1996, P.60.

时，将一定尊重苏方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参与签订的各项决议。^① 难以想象的是，毛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担心违反雅尔塔协定会给苏联带来损害。

此时，斯大林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宣布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前仍然有效，缔结对日和约后俄国军队撤离旅顺口。或者……宣布保留现有的协定，而实际上苏联从旅顺口撤军。”显然，斯大林这里说的是“立即撤军”。^② 斯大林声称，苏方同意其中的任何一个。斯大林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就是 1949 年 12 月 16 日的方案，他再次提出这一方案只是为了作最后一次努力，以争取暂不确定期限地保留该协定。但这同他在一开始时提出的声明是相违背的，他在会谈开始时说，他们认为条约和协定应当修改，尽管从前曾经想保留。^③

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提出的两个方案都与苏联内部制订的草案不相一致，甚至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在 1 月 22 日同斯大林谈话的那一天呈送给斯大林的“委员会草案”也不一致。在这一草案中提出：从旅顺口和大连的撤军最晚于 1952 年，条约审核将在缔结对日和约之后。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斯大林在同毛泽东会谈前根本没有看这一“草案”，还是他在会谈过程中一时冲动地忽略了它。无论如何，与“委员会草案”相比，斯大林的第一方案在废除条约方面对中方有利，但在撤军方

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 248.

^② 在师哲援引的斯大林讲话中称“现在撤退”。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5 页。

此段参阅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2 页。师哲重述了斯大林的这两种方案。他逐字逐句援引了这段话，看来他依据的是中方的记录。见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第 445 页。

面是不利的。^①

毛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考虑。鉴于他对利益形势已作的分析，他当然赞成第一方案。他说：“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并认为，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前仍然有效，在缔结和约后将失去效力，苏军从那里撤退。”毛还表示，希望把旅顺变成军事合作的地方，训练中国的海军。^②

斯大林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会谈很快转入大连问题。斯大林宣称，苏联不打算保留苏联在大连的什么权利。针对毛提出的是否保持大连自由港的问题，斯大林回答说，这个问题应当由中国自己决定。当年罗斯福坚持大连应成为自由港。毛问，大连作为自由港是否意味着符合美国和英国的利益。斯大林说：“当然，房屋的大门都敞开着。”^③

斯大林对大连不感兴趣，这可能有些出乎毛的意外。斯大林没有就撤军问题或是废除协定问题说出下一步的设想。但他明确表示，他要提前废除关于大连的协定。在苏联内部的“委员会草案”中，大连和旅顺口一样：撤军将从1950年开始，最晚1952年撤离；对协定的审核将在缔结对日和约之后。^④当然，斯大林明显反对大连继续作为自由港。

详见本章第十四节，“委员会草案”中涉及旅顺口和大连问题的文字，见附录：文件8。

^②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32-33页。此外，师哲在这里提到（不是逐字逐句的援引），毛泽东当时建议把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因此认为毛提出了这一建议，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但却不能令人信服结论。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111-113. 在苏联的记录中没有出现这一建议。可以认为，毛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

此处参阅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33-34页。最后的一句话在记录草稿中是“其结果是房屋的大门敞开着。”同上，第44页。关于大连问题，师哲逐字逐句援引了斯大林的话：“可由中国自己处理。”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6页。

^④ 参阅“委员会草案”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见附件：文件8。

此时，毛再次表示愿使旅顺口成为同苏联进行军事合作的基地，并补充说，希望大连能发展为经济合作的基地。毛说，在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将无法经营。斯大林没有继续谈论大连，而转向旅顺口问题。他重复说：“这就是说，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前仍然有效。在缔结对日和约后该协定将失去效力，俄国人从那里撤军。”并问，他这样归纳已经谈出的想法是否正确。毛证实说：“这就是基础，这正是我们想在新条约中表达的。”^①

这样，一个重要的绊脚石被清除了。毛的目的也基本达到。使他感到不平等和受歧视的两个协定将提前废除，它们原定的期限是 30 年。至于他对苏军的暂时留驻是何感受，这就难以判断了，尽管这是有期限的，但也是他不得不咽下的一个苦果。

斯大林虽然在米高扬 1949 年初访问西柏坡之前就已决定，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他将废除旅顺口的协定，并从辽东半岛撤军，但是，事态真的发展到这一步时，他又考虑到雅尔塔协定而开始犹豫。他担心公开这样做会导致华盛顿和伦敦宣布整个雅尔塔协定无效。因此，他在 12 月 16 日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1950 年 1 月 22 日，尽管还有些犹豫，但他跳出了自己的阴影。关于可能导致斯大林看法转变的原因，在上面已作具体分析。概括地说，斯大林害怕同毛的谈判失败，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西方大国修好。此外，艾奇逊 1 月 12 日的演说和其他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决定从亚洲大陆脱身，并将容忍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成联盟。在考虑到上述情况后，斯大林得出结论：即

此处参阅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4 页。

使他不再顾及“雅尔塔精神”，他在东亚也不会失去什么。^①

在 1 月 22 日讨论了旅顺口和大连问题之后，斯大林建议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这是最棘手的问题。从斯大林的引言中就可看出，他很清楚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他说：“请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做，你们有哪些疑问？”^②

在中长铁路问题上，斯大林虽然准备对协定作形式上的修改，但他实际上想维持基本现状，只允许作小的修改。这一点在 1949 年 2 月就已表明。当时，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在西柏坡宣称，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但他紧接着表示，苏联方面认为中长铁路协定“不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用俄罗斯的资金建造的。但米高扬又谨慎地补充说，很可能在这个条约中“平等原则没有完全被运用”，莫斯科准备“同中国同志以兄弟方式”来讨论和解决这一问题。^③

在 1949 年夏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刘少奇显然没有讨论中长铁路问题。在 12 月 16 日斯大林同毛泽东会晤时，斯大林说，该协定的某些点可以“在考虑到中方意愿的情况下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作些修改”。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宣称，中长铁路的目前情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有效的斗争。此外，中长铁路可以成为培养中国铁路和工业干部的学校。斯大林听到此话一定感到很放心。^④

参阅 Vladislav Zubok: < To Hell with Yalta! > — Stalin Opts for a New Status Quo,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 Bulletin, 6-7, Winter 1995/1996, P.25. 详见第四章第九、十、十二节。

^②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4 页。

1949 年 2 月 6 日米高扬给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9，目录 1，案卷 39，第 12-13 页，原件复印件，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I》，第 12 页及下页；列多夫斯基：《米高扬，II》，第 100 页及下页。参见第三章第四节。

此段参阅 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11 页。见第四章第三节。

在此期间，斯大林变得有些敏感起来。在 1 月 22 日原则会谈的前几天，他得知中国人开始在铁路方面制造新的、对苏联不利的事实。在科瓦廖夫 1 月 10 日至 20 日期间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他感到中方在改变现行的、按 1945 年 8 月 14 日协定所组建的中长铁路管理机构，使之有利于中方。自从中国技术人员在科瓦廖夫领导下使中长铁路重新运行以来，它“实际上为中国人所管理”，中国人控制了财务，而大部分铁路线上的苏联人员实际上“处于顾问的地位”。^①

如果科瓦廖夫的报告属实，那么，中国人的行动实际上是违背 1945 年中长铁路的协定的。协定规定铁路由一名苏联经理和一名中国副经理管理。^②

科瓦廖夫在报告中还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高岗曾多次称中长铁路协定是“公正的，好的，完全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但是在 1 月 10 日周恩来启程赴莫斯科之前，他通过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音）问苏联经理：“中长铁路将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工作为好？”当苏联经理反问中国人有什么设想时，余回答说，“中长铁路不从东北铁路系统分出去是值得欢迎的”。科瓦廖夫认为，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还没有为中长铁路的共同管理任命他们的代表，以及为什么没有为中长铁路建立与东北其他铁路分开的单独财务核算的原因。^③

科瓦廖夫在结束其关于中长铁路的报告时称无疑周恩来的态度表明，在亲美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压力下，中方把 1945 年中长铁路的协定视为是不平等的，并希望“把铁路变成中国的单独

此段参阅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247 f.

^② 1945 年 8 月 14 日协定第六条，见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958 年台北版，第 513 页。

^③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247 f.

财产把苏方排除出满洲领土”。科瓦廖夫认为，“改变 1945 年中长铁路协定的各项条款是不符合苏联利益的”而应在那里保持原定的秩序。为此，他建议：1、确认 1945 年协定的各项条款；2 要求中方立即任命他们在监事会、理事会和管理局的代表；3、建立混合委员会，起草铁路管理和财产审理的章程；4、在条约范围内建立铁路的单列簿记，否则苏联的经济利益将每天都受到损害；5、把大连的港口和造船厂隶属于惟一的、已开始运行的中长铁路公司之下，不宜建立单独的公司。

如 1 月 22 日毛泽东对中长铁路的第一次表态所显示，科瓦廖夫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毛说：“主要的想法可以归纳如下：在新协定中应该指出，共同经营与共同管理今后仍将继续。但关于共同管理，中方在其中应起主要作用。其次，必须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限问题和确定双方股份的数额。”^②

此时，莫洛托夫第一次介入了。他反驳了毛，并教导说：在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个企业的条件下，通常规定双方的股额均等以及领导职务的轮流制。在旧协定中规定，铁路的管理归苏联方面，但我们认为，今后必需实行领导职务的轮流制。“我们说，每隔 2 至 3 年轮换一次”。^③

周恩来表示反对，他说：“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和铁路局长职务应该取消，代之以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并且规定，委员会主席和经理的职务应由中国人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应当考虑这个问题。”^④ 斯大林

同上，第 248 页及下页。

^②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4 页。师哲对 1950 年 1 月 22 日关于中长铁路的讨论只作了简短的陈述，但内容是一致的。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6 页。

^③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4 页。

同上，第 34-35 页。

断然确定：“既然是共同管理，那就必需实行领导职务的轮换制。这样更合乎逻辑。至于协定的有效期限，我们不反对加以缩短。”^①接着，周恩来把讨论从这一棘手问题引向了第二个也相当棘手的问题，即毛在开始时已经提到的问题。周恩来说：“是否应该改变双方股额的比例，把中方的股额增加到 51%，取代现在的双方各占一半。”莫洛托夫反驳说：“这样就违背了现行双方均等原则。”斯大林为莫洛托夫提供了保护性的帮助，他指出，实际上苏联同“捷克人和保加利亚人”签订的协定都规定了“均等和平等”。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on应该同等参与”^②

毛用一句话结束了关于中长铁路这一最艰难的问题的讨论，这就是他在旅顺口问题出现不一致时曾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为了保证双方的利益，必需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③他同时以此发出了一个信号，他没有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论证看做是最后的话，尽管他当时没有作进一步的反驳。

在旅顺口问题上，斯大林最后是全线退让了。但与旅顺口不同，在 1 月 22 日关于中长铁路的讨论则在三个核心问题中的两个问题上以双方有分歧而暂告结束。在管理和财务问题上，斯大林坚持完全对等。对苏方来说，在管理问题上意味着要改变现状，而在财务问题是维持现状。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坚持对中国有利的立场，以作为新中国拥有主权的证明。双方只是在中国提出的缩短有效期限的问题上达成了总的一致意见。

此时，讨论转向拟定中的贷款协定。斯大林开始说，对已商定的东西应转变成两国之间的协定。^④他这里说的已商定的东西

同上，第 35 页。

② 同上。

同上。

④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6 页。

指的就是 7 月 30 日在莫斯科与刘少奇代表团达成的两党之间的协议。^①毛问，军事装备订货是否也通过贷款偿还。^②斯大林回答说，这可由中方自己决定：可以用贷款偿还，也可以签订贸易协定，在贸易协定的框架内获得这些供货。毛担心地说，如果用贷款偿还军事装备订货，那么，剩下购买工业设备的钱就不多了。他建议，军事设备可部分用贷款偿还，部分用出口商品偿还。

毛还问，是否有可能把工业和军事装备的供应期限由 5 年缩短至 3-4 年。斯大林强调，正如在 1949 年 12 月 16 日谈话时所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方能多快地提出工业设备的定单。定单越早提出，就越有利。斯大林提出，贷款协定的有效期可改为从 1950 年 1 月 1 日开始，因为供货实际上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如果把贷款协定规定从 1949 年 7 月^③（两党达成协议的时间——作者注），那就不能为国际舆论所理解，苏联怎么能在中国人还没有自己的政府之前就同他们签订了协定。从这一说明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当时仍然很重视把国家关系与党的关系分开。在他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两党接触仍然是一种密谋活动。^④

此时毛称赞贷款的条件说只有 1% 的利息这对中国是“非常优惠的”。斯大林插话说苏联给“人民民主国家”的贷款利率为 2%。斯大林重复了在去年 7 月份对刘少奇说过的玩笑话，斯大林

^① 参见《中共中央在香山》，第 455 页；《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 541 页。参阅第三章第八节。

同上。

^③ 在记录草稿中原先写的是“6 月”后被手改为“7 月”。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46 页。该协定与 7 月 30 日签字。

此处参阅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6 页。

同志玩笑地说^①，“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也可以再提高这个利率。当然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斯大林然后称赞中国政府，利用军队从事经济建设。当年苏联也这样做了，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②这时，毛泽东表现得像一个听话的学生，他说：“我们是在利用苏联同志的经验。”^③

此时，斯大林谈起中国请求苏联向新疆供应一定数量粮食的问题。毛补充说，小麦和纺织品。斯大林解释说，为此中方必需提出申请 提出具体数额。毛表示同意。

毛问，对贸易条约应如何考虑。斯大林回答说，到目前为止，仅仅同满洲签订过贸易条约。斯大林指的是他曾多次提到的7月30日在莫斯科同“以高岗为首的满洲人民民主政府”签订的贸易协定。^④斯大林问中国的意见：苏联应“同新疆、满洲以及其他省单独签订贸易条约呢，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⑤

毛的回答有些矛盾，中国希望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同新疆可以签单独单独的协定。斯大林接着问：“仅仅同新疆，那么同满洲呢？”毛明确表示，同满洲不必签单独单独的协定，因为同中央签订的贸易条约是靠满洲提供的货物来保证的。斯大林似乎没有听明白这一解释，而说：苏联方面希望“同新疆或满洲签订的协定”必须经中央政府的批准，中央政府必须对这些协定承担责任。毛依然排除同新疆单独谈判，并声称，同新疆签订的条约“必须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他没有回答满洲问题。斯大林表示

^① “斯大林同志玩笑地说”这半句话在记录草稿上是手写的，是后加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 第 47 页。

在记录原稿中写的是“非常大的成果”。同上。

同上，第 36—37 页。

同上，第 37 页。

^④ 1949 年 7 月 31 日《真理报》。详见第三章第八节。

^⑤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 目录 1，案卷 329，第 37 页。

赞同，并评论说，因为省政府考虑问题不够周全，而中央政府通常看得更清楚。这部分的谈话也表明，斯大林很愿意把他通过高岗建立的同满洲的关系^①以条约的形式合法化。如果斯大林确实有这一意图，那么，他在毛泽东的抵抗下失败了。长久以来，这种特殊关系已成为毛的眼中钉。^②

至此，斯大林显然想结束会谈，他问，还有什么问题？毛回答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他明确指出，首先是恢复和发展满洲的经济。斯大林建议，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来进行这方面的准备。斯大林又问，还有什么问题？毛强调，苏联派到中国的空军团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运送了近 1 万人。毛感谢斯大林的帮助，并请求允许这个团在中国再留一个时期，以便帮助为逐步进军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粮食。斯大林补充说：“准备进军西藏，这很好。应当把西藏掌握在手中。”关于空军团问题，同军人商量后再答复中方。^③

概括起来说，1950 年 1 月 22 日的原则性会谈达成了一致意见，用一个新的条约来代替 1945 年签订的现行友好同盟条约。在旅顺口这一棘手问题上也达成了原则上一致的意见，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废除协定和撤退苏联军队。这表明，斯大林又退回到 1949 年 2 月曾对中共领导表示过的立场。蒙古问题在 1 月 22 日会谈中没有被提及。^④刘少奇在 7 月访问莫斯科时就已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再有要求。^⑤在关于中长铁路的三个问题中，有两个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斯大林虽然同意缩短

详见第三章第八节，第四章第七节。

此段参阅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38 页。

同上。

^④ 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错误地说，在 1950 年 1 月 22 日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问题交换了意见。见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120.

参阅第三章第八节（《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

1945年签订的中长铁路协定的有效期，但他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把铁路管理权交给中国及把中方的股额增加到51%的建议。斯大林坚持完全对等的原则。这些分歧只好留待紧接着要举行的会谈去解决。此外，接下来的会谈还要把已达成的各项原则性一致意见作具体的处理，并转换为条约文本。

第十七节 谈判过程概述

在1月22日的原则性会谈中，斯大林和毛泽东达成一致意见：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委托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两位外长负责同盟条约的准备；经济合作协定则由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和李富春负责制订。^①如准备工作时那样，苏共政治局中负责这次谈判的除斯大林外，有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所有会谈记录和有关文件都要抄送他们。

原订在1月份圆满结束同盟条约的制订^②，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除了两个在2月7日签订的邮电和电话协定外，第一批政治上最重要的协定是在2月14日签订的。这涉及同盟条约和一项秘密补充协定，涉及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及一项秘密补充议定书，涉及贷款协定及一项补充议定书，以及关于废除1945年8月14日条约和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互换照会。上述文件签字后三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启程回国。

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留在了莫斯科，在王稼祥的领导下继

^① 此处参阅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38页。

^② 从现有的双方文件中可以看出，原计划于1月份完成条约的签订。毛泽东在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到的日期是“月底”。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212页。商量的1950年1月22日的条约草案注明的签字日期也是1月。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5，第48页。

续谈判。谈判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则通过电话同周恩来商定。王等的谈判对手是米高扬和副外长葛罗米柯。谈判涉及原计划在 2 月 14 日签订而未能签订的几个协定，因为中方对文本尚有不同意见。正如 2 月 13 日周恩来对维辛斯基所说，这些协定的条文还需作“某些修改和商榷”^①。这涉及关于建立在新疆开采原材料的合营公司的协定，民航协定，以及贸易协定和其他几个与此相联系的经济协定。这些协定最后在 3 月和 4 月签订了。另一个在毛和周启程之后才到达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核算苏联贷款的谈判。^②

为什么毛和周在各项协定尚未全部完成之前就启程，这一点我们尚不得而知。人们会认为，匆忙回国是因北京需要他们。但与此相违反的是，毛在越过满洲里边界后并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在各地，主要是在东北逗留了一星期之久。也许他认为，剩下的协定主要涉及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因此可以毫无问题地留给经济专家们去单独完成。

毛和周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最高层的政策性谈判一般在米高扬、维辛斯基和周恩来之间进行。文件起草等工作性谈判主要由葛罗米柯、罗申、李富春、伍修权、王稼祥、赛福鼎和刘亚楼将军来进行。毛泽东说，在谈判过程中进行了“真正的讨价还价”。^③毛还接着说，这里边鲜明地表现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毛泽东对莫斯科谈判的总体描述是对的，特别是在涉及苏联的满洲特权方面，以及在涉及重要经济利益方面。

^① 1950 年 2 月 13 日维辛斯基与周恩来的谈话，维辛斯基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18 页；1950 年 2 月 13 日维辛斯基同王稼祥的谈话，维辛斯基的记录，同上第 17 页。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37 页。

^③ 此处和下段参阅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苏方谈话记录见《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106 页。

现有的谈话记录给人的大体印象是：中方在礼仪形式上比较谦让，但在某些实质问题上表现顽强；苏方则相反，总体上显示非常自信，摆出一副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大国面孔。^① 这种差异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处于乞求援助的地位所致，也是因为新中国确实缺乏外交经验。

在以新的条约代替旧约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想法在 1 月 22 日同斯大林会谈时基本得到了贯彻。这一点可以从谈判的两个结果中看出。一个结果是签订了新的条约、协定和议定书，以及互换了照会。另一个结果是 1950 年 2 月 14 日发表了一个“公告”，其中称：通过两国外长互换照会，“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②

互换的照会文本是保密的。但互换照会这一事实已在 2 月 14 日所发表的“公告”中提到。^③ 在互换照会中说明 1945 年的条约和协定已经失效，这是周恩来建议的。^④ 周当时提出的草案收藏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之中，并已解密。^⑤ 从周提交给维辛斯基的草案中可以看出，周要以这种形式确认：“鉴于上述条约和协定（指新的同盟条约和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作者注）的签订，条约缔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声明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间所缔结的友好同盟条约和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及所有附属件，均失去其效力。”苏方确认了照会，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王稼祥大使几乎是低声下气地问葛罗米柯，“如果苏方没有异议的话”，中方将由刘亚楼将军来签署航空协定。葛罗米柯冷冰冰地回答说，谁来签字，这是中方自己的事。可以肯定，葛罗米柯是不会想到要问一问中方对苏方确定的签字人是否有异议。参阅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36 页。

^② 《中苏两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缔结条约和协定的公告见：《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卷第 75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卷第 75 页。

此处和下段处于 1950 年 2 月 1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6 页。

^④ 同上，第 21 页。

^⑤ 同上，第 21 页。

并在草案的最后称，互换照会将成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久前，我们还很难对谈判过程进行某种近乎实际的描述。但是在此期间，俄罗斯的档案馆在这方面打开了一个大缝，我们看到了在谈判过程中相互交换的许多文本草案，以及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关于他同周恩来会谈的报告。这些新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历史见证人在回忆录中的陈述进行鉴别，证实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伪造的。这也使我们有可能纠正那些参考资料和评论文章中的错误解释，以及对谈判过程作出基本的描述。

从新获得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各项协议的第一个草案均为苏方所提出。在 2 月 14 日签订同盟条约及其他协议之前，谈判的过程大体如下。1 月 23 日举行了两次会议：一次是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周恩来、王稼祥和李富春之间的会议，另一次是在夜里，除翻译师哲外，中方只有周一人出席，他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进行了会谈。^②在这两次中的一次会议上，苏方提交了一份同盟条约的草案（以下简称“苏联的第一份条约草案”）。^③这个草案至今尚未得到。^④但欣慰的是这一草案的文本与 1 月 22 日呈送给斯大林的内部的“委员会草案”是一致的。^⑤斯大林和毛泽东在 1 月 22 日会谈时一致认为 1945 年 8 月 14 日现行条约中应

① 《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51 页。

② 《克里姆林官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载于《历史档案》1997 年第 1 期第 6 页及下页。会议从 22:10 至 23:40，同上。

参阅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37 页；《汪东兴日记》第 194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7 页；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113, 322, 注 10 及有关资料来源的提示。

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的维辛斯基秘密宝藏中，全宗 23A，目录 235 呈这两页草案被撕去了。

涉及条约的“委员会草案”见本书附件：文件 7。有关《委员会草案》的产生情况见第四章第十四节。

修改的两点，在“委员会草案”中已考虑到了。

中方在审议了“苏联的第一份条约草案”后，由周恩来主笔，对原已准备的中方草案进行了加工。^①除了毛以外，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王稼祥、陈伯达和李富春。^②1月24日夜，中方草案送交苏联外交部。^③维辛斯基把草案的俄文译本于1月26日送给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并于1月28日送给了斯大林。1月29日，维辛斯基通过科瓦廖夫把加工后的中方条约草案交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④

据我们所知，中国代表团于1月25日就已完成了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草案。^⑤各种迹象表明，周恩来没有立即交出这一草案，因为他要等苏联先提出。1月29日，维辛斯基向中方提交了苏联的草案，一同提交的草案还有：关于驻旅顺口苏军运输权的议定书、贷款协定及与贷款协定相关的中国有义务向苏联提供战略原材料的议定书。^⑥

1月26日，中方提交了航空协定的草案。至2月10日，维辛斯基还提交了其他文件，但不是1月22日送斯大林审阅的文件目录^⑦中所列全部文件，如贸易协定和关于支付苏联专家的协定就不在其列。关于建立在新疆开采原材料的合营公司的协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7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37页。

^② 《汪东兴日记》第194页。

中方草案文本见本书附录：文件10。此处和下段参阅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5，第35-55、59-72页。据一位见证人称，1月26日还举行一次委员会会议。见《汪东兴日记》，第195页。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1、7-10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5，第73-76、84-88页。

^⑤ 1950年1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251页。

^⑥ 这些草案的文本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5，第73、77-83页。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草案文本见本书附录：文件11。

^⑦ 见第四章第十四节。

定，直到 2 月 12 日才提交。^①

在 1 月 31 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对苏方的同盟条约以及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协定及两个附属议定书的草案提出了修改建议。^② 同一天，周恩来向维辛斯基提交了关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和协定失效的换文草案，以及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换文草案。

2 月 1 日，维辛斯基向周恩来提交了考虑到周的建议而作了修改的同盟条约草案，以及两个协定和两个议定书的草案。这时，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协定的议定书上，出现了激烈争吵（关于苏联军队的运输权）^③

在 2 月 2 日的会议上，米高扬、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对同盟条约及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和全部附属议定书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在贷款协定的议定书（提供战略原材料）方面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之有关议定书方面也未取得一致。在第二天，双方核对了同盟条约和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的文本。^④

2 月 5 日毛泽东在别墅同莫洛托夫和罗申共进晚餐时，他再次谈到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⑤ 2 月 11 日米高扬、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就不向外国人在两国一定的边界地区提供租让权的

此处参阅 1950 年 2 月 12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48-53 页；1950 年 2 月 13 日维辛斯基同周恩来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18 页；1950 年 1 月 26 日葛罗米柯同刘亚楼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6 页。

此处和下段参阅 1950 年 2 月 1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1-21 页。

③ 1950 年 2 月 3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同上，第 42 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97-100 页。

此段参阅 1950 年 2 月 3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42-47 页。

⑤ 《汪东兴日记》第 200 页。

“补充协定”达成了一致意见。周并表示赞同现有的航空协定的文本，并希望贸易协定也能同这些文件一起签字，如在 2 月 14 日或 18 日。当时，关于苏联专家的报酬协定尚未达成一致意见。^①

2 月 13 日，即签字的前一天，周恩来和王稼祥分别同维辛斯基谈话时声称，贸易协定和建立航空公司的协定，以及在新疆开采原材料的协定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签字的程度，因为相应的文本还需作“某些修改和商榷”。维辛斯基建议，对已基本谈妥的文件应进行草签。中方表示同意。^②

除了 2 月 7 日签订的两个关于邮政和电报电话联络的技术性协定外^③，谈判的全部成果可按其发表的等级来分类，它们是：

1 当时就发表的协议文件：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 年 2 月 14 日）^④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1950 年 2 月 14 日）^⑤

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国的协定（1950 年 2 月 14 日）^⑥

2 当时未公布，但公开报导了缔结消息的协议文件：

^① 1950 年 2 月 12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48—53 页。

^② 1950 年 2 月 13 日维辛斯基同周恩来的谈话，维辛斯基的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18 页；1950 年 2 月 13 日维辛斯基同王稼祥的谈话，同上，第 17 页。

协定文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110—121 页。

^④ 文本见：《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1 版；《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19 页及下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1—3 页。参见本书附录：文件 12。

^⑤ 文本见：《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1、2 版；《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21 页及下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3—5 页。参见本书附录：文件 13。

^⑥ 文本见：《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23 页及下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卷，第 79 页。参见本书附录：文件 14。

关于声明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与协定失效，以及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换文（1950 年 2 月 14 日）^①

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1950 年 3 月 27 日）^②

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1950 年 3 月 27 日）^③

中苏关于建立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1950 年 3 月 27 日）^④

中苏贸易协定（1950 年 4 月 19 日）^⑤

中苏关于货物交换之议定书（1950 年 4 月 19 日）^⑥

中苏关于苏联按 1950 年 2 月 14 日签订的贷款协定于 1950 年

①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缔结条约和协定的公告）见：《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1 版；《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卷，第 74—75 页。《公告》中还提到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这些换文没有列入以上的“协议文件”，因为这只是苏联单方面的确认文件。

有关报导见：《消息报》，1950 年 3 月 29 日第 2 版；《人民日报》，1950 年 3 月 29 日第 1 版；《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27 页及下页。

② 有关报导见：《消息报》，1950 年 3 月 29 日第 2 版；《人民日报》，1950 年 3 月 29 日第 1 版；《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27 页及下页。

③ 有关报导见：《消息报》，1950 年 4 月 2 日第 2 版；《人民日报》，1950 年 4 月 2 日第 1 版；《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28 页及下页。

有关报导见：《消息报》，1950 年 4 月 21 日第 3 版；《人民日报》，1950 年 4 月 21 日第 1 版；《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29 页。该协定已于 1957 年在专家的条约集中公布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47—49 页。

④ 有关报导见：《消息报》，1950 年 4 月 21 日；《人民日报》，1950 年 4 月 21 日；《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29 页。在这里，议定书被说成“协定”。议定书的文本（没有货物清单）于 1957 年发表在专家的条约集中，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50 页。

至 1952 年期间向中国提供设备和材料的议定书（1950 年 4 月 19 日）^①

3、秘密协议：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关于不允许外国人在中苏边境地区从事活动，1950 年 2 月 14 日）

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之协定的议定书（关于苏联驻旅顺口部队的给养权，1950 年 2 月 14 日）

中苏贷款协定的议定书（关于向苏联提供战略原料，1950 年 2 月 14 日）

中苏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及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之协定的议定书（1950 年 3 月 27 日）

中苏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条件之协定（1950 年 3 月 27 日）

中苏 1950 年对外贸易组织交货共同条件议定书（1950 年 4 月 19 日）^②

当初，中苏双方在文件公布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但后来是如何决定哪些文件公开、哪些只报导及哪些保密，我们对此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从一份内部材料中可以看出，苏方最初只愿公布 3 份协议文件：同盟条约，关于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③ 周恩来于 2 月 13 日曾表示应公布所有已签署的文件。如果不能这么做，那就有必要向双方委员会的委员们作出专门的解释。周说：“按照我们的意见，公布所有签署的协定

有关报导见：《消息报》，1950 年 4 月 21 日；《人民日报》，1950 年 4 月 21 日；《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29 页。

该议定书于 1957 年在中国的条约集中公布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51—59 页。

^③ 1950 年 2 月 22 日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42 页。

(俄文: *soglasenija*^①), 既有利于中国和苏联, 也有利于所有人民民主国家, 因为这会更加提高这些国家在全世界的威信。”显然, 周恩来以此暗示, 过去外国同中国缔结的许多不平等条约都是秘密条约。为了同这种殖民主义的行为划清界限, 苏维埃俄国于 1918 年宣布退出所有沙皇强加于中国的秘密条约。^② 维辛斯基支吾其词地回答说, 双方之间并没有谈妥要公布“所有协定和其他文件”。这个问题需要进行讨论。^③

周要求公布所有文件, 这使人不太好理解, 因为这将使中国谈判代表团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 这符合他们的基本思想: 同不光彩的秘密条约的历史传统决裂, 并以此在世界舆论面前树立一个先例, 表明中国的外交是一种全新的、以平等关系为基础的外交。但另一方面, 毛泽东肯定愿意对某些协议实行保密, 这些协议是他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而被迫接受了某些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对中国不平等的条件, 例如, 关于苏联驻旅顺口部队的给养权议定书, 以及同盟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些文件如果公布, 将使中共领导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

当周恩来说“如果不公布, 则有必要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们做专门的说明”。这句话不能从字面去理解, 而应看做是在政府委员会的组成中面临困难。如果毛决定不公布这些文件, 那么他无论如何要向政府委员会中的 34 名公开和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以及其余 29 名委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报这些协议。

关于哪些协议文件要保密的问题, 是在 2 月 13 日维辛斯基和

^① “*soglasenija*” 一词既是协议也是协定的意思。

周说的“人民民主国家”指的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② 1918 年 7 月 4 日 G. V. 契切林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见: 契切林: 《外交政策问题文集》, 1961 年莫斯科版, 58 页及下页。参阅迪特·海因茨希: 《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 1923—1927》, 第 23 页。

此段参阅维辛斯基谈话记录,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全宗 0100, 目录 43, 卷宗 302, 案卷 8, 第 18—19 页。

周恩来谈话之后的那个夜晚解决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过程，我们没有信息，而只知道讨论的结果。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是：除了苏方原打算公布的 3 个文件（同盟条约、旅大和中长铁路协定）外，贷款协定也予以公布。2 月 14 日清晨 5 点 显然是在夜间会议一结束，毛泽东通过电话给刘少奇和胡乔木下达了严格的指示，从新华社为条约缔结而准备播发的社论中删去涉及秘密协议的文字。这涉及条约的补充协定、关于旅顺驻军的运输权的议定书、关于供应战略原材料的议定书。毛认为准确执行其指示是如此的重要 因此他在电报的最后明确提出“务使毫无遗憾”。他还请刘和胡按其指示校阅社论 并强调“务请注意 至要至要！”经过“清洗”的社论于 2 月 15 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关于 2 月 14 日以后签署的协议文件的发表问题，当时尚未作出决定。^①

下面将就各项协议文件的谈判过程作进一步的阐述。首先从 2 月 14 日签订的协议文件开始。

第十八节 关于 1950 年 2 月 14 日签署的 协议文件的谈判

1、同盟条约

1950 年 1 月 23 日，“苏联的第一个条约草案”（它似乎与 1950 年 1 月 22 日苏联内部的“委员会草案”^② 内容是一致的）递交给了中方。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提交了“中国的第一个条约

^① 此段参阅毛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62 页及下页；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124 f. . . 258；《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3 版。

^② “委员会草案”的文本见本书附录：文件 7。关于“委员会草案”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草案”。^①把中国的草案与“苏联的第一个条约草案”相比较，可得出以下结论。

从条约的标题来看，双方是一致的。它最大限度地集成了苏联在此之前同东欧国家签订的条约和 1945 年 8 月 14 日同国民党中国签订的条约的名称，前者称“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后者称“友好同盟条约”。毛早在 1949 年 12 月 16 日就向斯大林提出，以“友好同盟互助”来称谓将缔结的条约。^②所有苏联内部起草的条约草案都使用了东欧条约惯用的标题，直到最后一稿的“委员会草案”才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③毛和斯大林在谈判一开始就已在条约的称谓上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称谓表明了两国的特殊紧密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强调同盟义务，在和平时期强调互助的义务。

因此，师哲的说法是不对的，他说：“互助”这一表述是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加到条约标题中去的。^④一位中国作者甚至把它称之为一个“胜利”。^⑤如同他在其他地方所表现的那样，师哲这么说是试图表明在多次情况下中方在斯大林面前是强有力的。

对序言的一般条款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苏方的草案表述一般，并着重谈双边关系，而中方的草案则更多地强调远东的形势，并在第一句中就号召要同潜在的日本危险展开斗争。这在苏联草案的序言中没有提及。或许，苏方认为在这里没有必要提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51-55 页。该文本见本书附录：文件 10。

参阅第四章第三节。

见同上。

师哲：《陪同毛主席……》，载于《远东问题》，1989 年第 1 期，第 146 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7 页，以及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116 以及资料来源的提示。在西方参考文献中，师哲的看法有时被不加分析地引用了，例如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116;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 P.463。

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116。

及，因为在后面将具体阐述双方在日本问题上的义务（特别是苏联草案的第一和第二条，中国草案的第一条）。苏联草案的风格带有一定的情感性，其中提到“睦邻友好和友谊”，而这些词在务实的中国草案中则没有出现。令人惊讶的是，中国草案与苏联草案不同，没有谈到促进经济发展问题，而毛在 1 月 22 日会议上曾强调，经济合作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① 两个草案都强调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兴趣（中国草案称“远东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并都表示愿依据联合国的目标和原则。

下面就双方条约草案中涉及的内容进行阐述，按上面分析苏联内部各草案时所作的分类。^②

1) “防止侵略”

有关规定构成了两个草案第一条第一句。草案说，双方保证采取措施以制止日本或其他与日本勾结的国家之侵略。在这里，中方草案使用了类似 1945 年中苏条约的语言，“它们所能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苏联草案的措辞则显得有些谨慎，“一切从属于它们的措施”这一表述与苏联于 1948 年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是一致的。

2) “争取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活动”

这一规定在内容上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并在两个草案中都列为第一条的最后一句。

3) “援助条款”

这一规定是同盟条约的核心，它在两个草案中的表述几乎完全一样。都提到“立即”，给予“一切拥有的军事和其他援助”，关于袭击者的定义也是相同的。他不同于苏联 1948 年与东欧国家缔结的条约所说的袭击者，这里指明的不仅是日本，而且指明

参阅第四章第十六节。

② 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与日本同盟的国家，这可能指的是美国。两个草案不同的是关于条约生效的前提。苏联草案说，当一方“被卷入”与日本或其同盟国家的“战争行动”。中方的草案则把生效的前提说成是任何一方与日本或其同盟国“处于战争状态”。苏联草案的这一表述与苏联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缔结的条约是相一致的，并选择了1945年中苏条约的有保留的说法。援助条款在苏联草案中被列为第二条，在中方草案中列为第一条的第二句（第一句是“防止侵略”），中方的表述是否赋予了援助条款以更高的含义或者这仅仅是文字编辑问题，这一点却很难判断。

从双方同盟条款的比较中可以认定，谈判时在场的伍修权所说的一个看法是不准确的。他认为苏联草案曾规定，如一方受到袭击，另一方得以援助。伍说，周对此不同意，并坚持使用“即尽全力”这一表述。伍的这一陈述误导了一些没有掌握双方草案的严肃的作者，如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他们对苏联的动机作出了想象性的推测，认为苏联领导人之所以不愿接受“即尽全力”是因为他们担心由于毛的冒险行动会把苏联卷入一场原子战争。^①

由于没有看到双方的两个草案，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又做了另一个站不住脚的推测。他们认为，当斯大林在讨论援助条款时未能贯彻其意见之后，他似乎又在条约生效前提上提出：双方中的一方必须“处于战争状态”，以代替仅仅是“被卷入战争行动”。这三位作者推测，斯大林似乎想以此来提高苏联参与亚洲军事冲突的门槛。如前所述，情况恰恰相反：“战争状态”这一表述是周恩来建议的。同样依据上述不准确的情况，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又作出了进一步的错误推测。^②

参见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118。
见同上第118页及下页。

4) “禁止结盟”

这一规定在两个草案中构成了第三条。它们几乎是一样的。苏联草案似乎比中国草案走得更远一些，它不仅禁止缔结反对对方的“同盟”和“集团”，而且禁止这样的“行动”和“措施”。

5) “放弃与日单独媾和”

这一内容在苏联草案中被列为第四条，在中国草案中列为第二条，双方都禁止未经彼此同意缔结和平条约。苏联草案还禁止与日本进行谈判。

6) “协商条款”

作出这一规定是 1 月 22 日会谈时在毛泽东的动议下商定的。它在苏联草案中构成了第五条，在中国草案中被列为第四条。双方都同样称，在“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上，均将进行协商。两个草案不同之处是苏联草案称“对两国利益相关的问题”而中国草案称“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①问题。中方是否想通过使用这一限制词开一个后门，以便在一些问题（如亚洲的一些事务）上排除苏联未受请求的干预？此外，在苏联的草案中还附加了一句，两国“将遵循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苏联草案中的这两处表述都与苏联同东欧国家缔结的条约相一致。

7) “经济 - 文化合作与互助”

这一内容在苏联草案中列为第六条，在中国草案中列为第五和第六条。两个草案都同样程度地确认要发展经济与文化联系，以及相互的经济援助。苏联草案还提出“经济合作”。两个草案都强调，在合作中应遵循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中方草案中被概括为“领土主权”）以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在中国草案中还特别强调“平等”和“互利”的原则。这里表明，鉴于中国过去有“不平等”条约的痛苦经验，毛泽东力求公开显

^①着重线是作者加的。

示，中国在同外国的关系上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8) “最后条款”

两个草案都提出条约的有效期为 30 年，废除期为条约期满前的一年，如未表示愿意废除，条约则继续有效。在苏联草案中，延长期为不少于 1 年，在中国草案中则为 5 年，可提前一年表示废除。

苏联草案提出，条约在批准后生效，中国草案则提出在签字后立即生效。苏联草案说，批准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在中国草案中则没有提出批准的期限。两个草案都提出在北京互换批准书。

1 月 24 日至 28 日苏方对“中国的第一个草案”进行加工。^①参加修改的有维辛斯基、米高扬、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由此而产生的“苏联的第二稿”^②于 1 月 28 日送到了斯大林手中。^③1 月 28 日至 29 日夜，这一稿经师哲交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④

“苏联的第二稿”是以中方草案所建议的结构为基础的，只是把第五条和第六条合并为一条（第五条）。除了在序言中的几点改动外，苏方提出的在内容上比较重要的修改涉及“防止侵略”（第一条第 1 段第 1 句）、“援助条款”（第一条第 1 段第 2 句）、“放弃与日单独媾和”（第二条）和“经济—文化合作与互助”（第五条）。

在“防止侵略”中（第一条第 1 段第 1 句）斯大林接受了

此处和下段参阅“维辛斯基秘密宝藏”中收藏的 4 份手改的草稿：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全宗 07 目录 23A 卷宗 18 案卷 235 第 56—72 页。1 月 28 日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把它们提出了修改意见的草案呈报斯大林，并抄送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同上 第 64 页。

^② 交送给中方的誉清稿也收藏在“维辛斯基秘密宝藏”，同上第 74—76, 85—88 页。这一稿是下面所作分析的基础。

维辛斯基在手改稿上批注：“1 月 28 日 送交斯大林”。见同上 第 65 页。

同上，第 73、84 页。

中方的表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从而向中国承担了高于对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义务。斯大林把“排除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再次进行侵略的危险”一句改为“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在“援助条款”中（第一条第 1 段第 2 句）斯大林通过修改定义的花招避开了两个草案中在生效条件上的分歧。苏联草案的原提法是，一旦双方中的一方“卷入”了与日本或与其同盟的国家的“战争行动”，另一方就要给予援助。而中方的草案要求，一旦一方与日本或其同盟国“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就应给予援助。斯大林对生效条件做了新的修改：一旦一方受到“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就要给予援助。从原表述来看，它只是说一方卷入了“战争行动”或“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而它没有涉及战争行动的起因。因此，这就可以理解为：一方自己发动侵略而与日本或其同盟者陷入了战争，另一方也应提供援助。斯大林是否想通过这一新的表述以防止因中国发动侵略而把苏联卷入一场亚洲的战争？如果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是以斯大林的这一侵略概念为依据得出前面提到的论证，那么，他们对斯大林力求防止被卷入亚洲战争的推测是值得考虑的。^①

关于“放弃与日单独媾和”（第二条）斯大林没有理会两个草案的表述，他把未经协商不得单独与日媾和的保证变换成一种积极的正面的义务：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盟国于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共同缔结对日和约。”

在“禁止结盟”条款（第三条）中，“苏联的第二稿”重复了苏联的原提法，不仅不参与结盟，而且不参加有关“行动和措施”。

在“协商条款”（第四条）中，“苏联的第二稿”接受了中国

^① 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118 f.>

的“共同利益”这一表述，但保留了双方必须“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

关于“经济—文化合作与互助”（第五条），苏方为迎合中方，对其第一稿作了修改。改动主要涉及双方保证遵循的一般国际法中的保护原则。斯大林并接受了中方草案中的提法：“以友好合作的精神”，以及“平等”和“互利”。显然，中方很重视这些提法。斯大林在俄文译文上把“*ravenstvo*（大体同意于中文的“平等”）改为在法律上常用的“*ravnopravie*”（直译：平等权）。在2月14日签字的条约文本中，俄文使用了“*ravnopravie*”一词，中文却使用了“平等”，而没有使用相应的“平等权”一词。中方似乎更倾向于“平等”，因为在他们看来“平等”一词显得更普遍和更广泛，更为强调同等的地位、同等的价值和同等的能力。中国代表团显然因不熟悉国际法的术语，而在草案中使用了“领土主权”一词，被斯大林改为国际法的常用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是苏联的第一稿中所使用的表述。^①

中方草案（第六条）提出，相互帮助和经济合作应有助于两国“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和“全世界的繁荣”。这一要求没有被“苏联的第二稿”所接受。苏方并把中方“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的要求，限制为“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这也是苏联第一稿的提法。

1月31日，周恩来宣称，原则上同意“苏联的第二稿”，只建议对两处作文字上的、非实质内容的修改。一处是序言的第二句中“友好关系”改为“友好”。另一处是把第二条中的“战争时期”改为“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最后，他又提出，把第六条改为“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这样，周又以一种

此段参阅《苏中关系 1917—1957年——文件汇编》，1959年莫斯科版，第2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2页。

不可理解的方式重新回到了“苏联的第一稿”的提法，而这曾为中方所拒绝。维辛斯基当即对这后两个建议表示同意。^①

正如 2 月 14 日签署的条约文本^②所显示的那样，苏方接受了周的第一个建议，使用了中国的提法“缔约国双方”。这样，同盟条约实际上于 1 月 31 日就已达到可供签字的成熟程度。2 月 1 日，苏方把最后一稿的条约草案交给了周恩来。第二天，周恩来宣称，该条约草案已被批准。^③

2、关于禁止外国人在中苏边境地区活动的补充协定

这一协定是强加于中方的，它很可能导致中共领导人最为沉重和最不能忘怀的恼怒，因为它同旅顺驻军的运输权一样，使人看到殖民思想的回潮，使人感到羞辱。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协定是斯大林强迫他咽下的“苦果”之一。^④

据师哲称 斯大林在同中国代表团进行的一次谈话 显然是在 2 月 7 日以前的一次谈话^⑤中提出 希望中国政府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居留于中国东北和新疆。由于斯大林的这个在中方看来是干涉内政的要求提得很突然 谈话陷入了冷场。后来 周恩来显然有些激动地反问道，这是否也指那些住在东北的 20 万不持中国护照的朝鲜人以及外来的蒙古人？斯大林举起双手说，这只

^① 参阅 1950 年 2 月 1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20 页。

参见本书附录：文件 12。

^② 参阅 1950 年 2 月 3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42 页。

参阅库利克：《建立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 1952 年（根据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载于《远东问题》1994 年第 6 期，第 78 页，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⑤ 《汪东兴日记》，第 201 页。

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①

我们不知道，毛泽东是否在这次谈话之前已向斯大林表示过，中国也想让非社会主义国家到新疆和东北等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但在 1 月初，刘少奇曾在一份电报中向毛泽东提出过这一想法。刘说：“此间同志认为”，可以向苏联提出，不仅请苏联和其他“新民主国家”在新疆创办开采有色金属和石油的合股公司，而且也请“资本主义国家的集团和企业家”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不仅在新疆，而且也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创办。^②我们也不知道，毛和周是否同意刘的这一想法。如果同意并向苏方提出了，那么，他们的这一想法落空了，至少在斯大林规定的禁区（新疆和东北）不行。

2 月 11 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就补充协定的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在苏联草案的基础上经过双方的讨论而产生的，并在前一天交给了周恩来。这个协定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补充协定

鉴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保障两国国防，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本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6 页；《汪东兴日记》第 202 页；刘杰成（音）：《毛泽东与斯大林》第 297 页及下页 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1995 年香港版，第 77 页。这次谈话是在哪一天，不得而知。师哲给人的印象是，这次对话是在 1 月 22 日的原则会谈时进行的，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6 页。但这一陈述与在此期间获得的上述谈话记录不符。见第四章第十六节。现有的另一件档案材料表明，这次谈话是在 2 月 10 日前进行的，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48 页。

^② 1950 年 1 月 2 日刘少奇给毛泽东的电报，引自（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237 页。

充协定^①达成协议。

不论在苏联远东边疆区^②和中亚各共和国^③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的领土上，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

1950年2月“ ”日订于莫斯科。^④

2月11日，周恩来仅建议作两处修改（在草案中用着重线所表明）。苏方对此原则上接受，因为苏方确认，这些修改没有改变苏联草案的内容和实质。周注重的一点是，这一协定应标明是上述条约的补充协定。这可能是因为周想以此表明，在条约中已确定的平等、互利原则也适用于本协定。第二个修改的含义不太清楚（以“租让权”代替“租让”）。可能是周想以此开一个小的后门，以表示他虽然不是普遍地和先验地承认租让权，但在个别情况下，在提出申请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获得的。可以认为，2月14日签订的协定就是以上援引的样式。^⑤

斯大林要签订这一协定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苏联在俄罗斯传统利益区（新疆和满洲）拥有垄断的存在地位，也是为了在经济上把外国竞争者排除出这一地区。此外，斯大林显然还要阻止外国

苏联草案原称“达成以下协议，，。”

俄文为“Dal'nevostochnyj kraj”。

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作者注）。

^④ 1950年2月12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的附件¹，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53页。另一个内容相同的草案藏于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5，第135页。在这两个文本中都有着重线，有关注称：“划着重线的词是周恩来的修改”。

此段参阅1950年2月12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48-49页。另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121.

新闻机构在这一地区活动，因为它们可能侦察到苏联在满洲和苏联边境地区的形势和军事活动等情况。

从师哲的陈述来看，斯大林原打算只在两个中国边境地区禁止外国人入内。后在中国要求实行对等的情况下，才把这一规定扩展到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师哲所说的这一情况现在还不能从已公布的文件中得到证实。但可笑的是，斯大林早在战前就在这两个苏联地区清除了外国人，并不再允许外国人入内。现在把它们列为对应的两个苏联禁区，这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已。但这与旅顺口的秘密协定相比却是有成果的。在旅顺口苏联驻军的给养权问题上，中方曾要求能通过西伯利亚向新疆运送中国部队，但这一对等的要求未能实现。^①

从上面分析来看，这里所说的“补充协定”实际上具有不光彩传统的“不平等条约”的性质。这一协定如果公布了，毛和中共领导将在中国舆论中受到蔑视，将被指责为再次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此外，这也正符合美国宣传的心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 1 月 12 日宣称，苏联正在吞并中国的北方，其中包括新疆和东北。^②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毛泽东和斯大林达成一致意见，保守协定的秘密。

在 2 月 14 日给刘少奇和胡乔木的电报中，毛泽东指示删去新华社社论中关于缔结条约文件涉及秘密协议的提示。他明确要求删去有关补充协定的提示，包括对这一协定的辩解词：“同盟条约的补充协定乃是为了保障两国国防利益的一项必要措施，这项措施对于中苏两国说来都是有利的。”^③

据苏联的陈述，中方有意拖延这一补充协定的执行，只到 3

详见下一节。

详见第四章第十二节。

此段参阅毛给刘少奇的东北，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62 页；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124 f. . . . 258。

年以后才开始采取措施，而且只限于东北地区。1953年2月，中国同日本开始了关于遣返问题的谈判，这涉及生活在东北的3万名日本人。一个月后，第一批日本遣返人员登船。不属于遣返之列的是1800名在中国已判处的战犯，以及在中国工作和学习的“一部分进步人士和专家”。^①

看来，毛泽东特别感到补充协定是一大屈辱。很可能，苏方没有足够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没有像对待关于新疆“合营公司”协定那样，向中方建议废除这一协定。当1956年4月米高扬访问北京时，毛泽东不满地说，他一直把这个协定看做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特殊的伤害”。在这之后，莫洛托夫于该月的月底签署了一项决定，称这一协定不符合中苏现有关系的精神。1956年5月10日，苏联政府向中方建议废除这一协定。周恩来于5月29日表示同意。^②

据说，毛泽东满意地确信，他已把斯大林强迫他咽下的苦果退还回去了。据说，他指的不仅是补充协定，也指创建合营企业的协定。^③据俄罗斯较新的资料称，即使在废除了补充协定之后，中国在毛泽东活着的时期里始终没有给外国以租借权，也没有让外国人实行企业参股。^④

① 1953年3月14日周恩来同费德林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6，卷宗10，案卷361，第68-71页，引自库利克：《建立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年（根据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载于《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7页及下页。

② 此段参阅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London 1974, P.284; Wingrove: < Mao in Moscow >, P.329，它是基于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的文件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9页。

同上，第78页，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库利克：《建立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年（根据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载于《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8页。

3、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

如前所述，在原先的苏联内部草案中，苏方曾打算在条约正文中解决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问题。直到 1 月 22 日，在呈送给斯大林的“委员会草案”中，才把这一内容从条约中分离出来，转换成两个独立的议定书：一个关于旅顺口和大连的议定书草案；另一个是关于中长铁路的议定书草案。在旅顺口和大连的议定书草案中称，协定将在缔结对日和约后“重新审核”，撤军将在两至三年内实行，并从 1950 年开始。关于中长铁路的议定书草案表明了这样的意图：承认 1945 年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继续有效，但在双方提出的情况下可作出某些小的补充规定。从呈送此草案时的附函中可以看出，在不准备公开的中长铁路议定书第二稿中还规定了“几项实际步骤”，其中包括“重新组建铁路的共同管理机构”。^①

上述苏联草案，在 1 月 22 日两国代表团的原则性会谈后，变成过时的文件了。斯大林和毛泽东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对日和约签订后，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即终止，苏军也同时撤离。在中长铁路问题上出现的争执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坚持重新获得或保持在管理和财务方面的完全对等。毛和周则坚持缩短有效期，并在将来由中方领导管理工作，以及中方的股份应占 51%。^②

1 月 25 日，中方完成了他们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草案，^③但显然没有立即提出，因为他们要让苏方先行一

^① 1950 年 1 月 22 日的两项草案的文本见本书附录：文件 8 和文件 9。有关情况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此段参阅第四章第十六节。

^③ 《汪东兴日记》，195 页；1950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51 页。

步。从各种迹象看，苏联草案^① 约于 1 月 29 日递交中国代表团。^② 与这项协定草案（简称：1 月 29 日草案）一起递交的还有一份附属的议定书草案，它涉及苏联驻旅顺口部队的运输和给养权问题。把这份草案同 1 月 22 日“委员会草案”等苏联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问题的内部草案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最显著的分歧存在于中长铁路方面。总的说来，它的最终解决方案对中方是有利的。如斯大林在 1 月 22 日原则性会谈时所表明的那样，他在中长铁路协定的有效期上作出了让步。如前所述，1 月 22 日“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委员会草案”）确定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长铁路协定的有效性，只是“为保障铁路的有效经营”可作某些小的补充规定。^③ 这就是说，苏联的特权，财产的平均占有和管理上的平等权利，将持续到 1975 年。

如前所述，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1 月 22 日原则性会谈时坚持要缩短有效期，并要求使中国的股份占到 51%，以及中方应在管理上处于领导地位。显然，在这种强硬态度的影响下，斯大林在“1 月 29 日草案”中宣布，准备把苏联在中长铁路的全部权力最晚于 1952 年无偿地归还给中国。这就是说比 1945 年条约规定的期限提前了 23 年。这是使毛感到舒服的一个让步，它意味着中方所讨厌的中长铁路原状将只维持到 1952 年。但如前所述，

苏联草案文本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77-79 页。维辛斯基报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的草案文本见第 79 页。草案文本见本书附录：文件 11。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案卷 235，第 77-79 页。

参阅草案文本，见本书附录：文件 9。

这个原状在此期间已实际上发生了有利于中方的改变。^①可以认为，这个妥协是在 1 月 23 日至 29 日的谈判过程中达成的。但我们还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文件，说明斯大林是如何在中长铁路这个问题上同意作出这一惊人的妥协，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不容易的。斯大林的这一大度行为使毛泽东有可能在公众舆论面前把这一结果作为谈判成绩而加以显示。但是，如下面将要陈述的，米高扬在 2 月 1 日提出了苏联在东北军事运输上的单方面的权利要求，这又使中长铁路的归还期限延长了两年半。毛泽东并不得不出进一步的承诺，放弃他曾要求的对等。正因为担心这将在中国产生消极影响，这一协定只能作为一项秘密协定而不予公开。

斯大林虽然向中国作出了让步，但远没有像布尔什维克政府在 1919 年 7 月 25 日所走的那么远。当时，副外长宣布，苏联政府无偿地将中东铁路连同其全部租借权归还中国。这是一种慷慨的姿态，但它不久又收回了。^②

在旅顺口问题上，把“1 月 29 日草案”同 1 月 22 日“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协定的议定书”草案（“委员会草案”）相比较，以及同斯大林与毛泽东 1 月 22 日达成的一致意见相比较，均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方的地位得到了改善。例如，1 月 22 日的草案称，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将持续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重新审核”，苏联军队最晚于 1952 年撤离。在 1 月 22 日原则性会谈时，斯大林与毛泽东达成一致意见，协定将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失效，苏联部队也将同时撤离。而“1 月 29 日草案”称，苏军将“在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撤离，但最晚不超过 1952 年年底”。^③

确定撤军“最晚不超过 1952 年年底”的协议，对中方来说，

参见第四章第十六节。

详见海因茨希：《苏联军事顾问》，第 25—27 页。

③ 1 月 22 日和 29 日的草案文本见本数附录：文件 8 和文件 10。

是一项重大的成果。这一点甚至超过了 1 月 22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达成的协议。但这一点在苏联的 1 月 22 日草案中已被写入，而只是毛泽东对此一无所知。另外，1 月 29 日的草案也没有再提“重新审核”1945 年协定的问题，而 1 月 22 日草案却说，1945 年签订的协定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重新审核”。实际上，1945 年的 8 月 14 日的协定被前面已经提到的 1950 年 2 月 14 日的换文所废除，并为“1 月 29 日草案”中所说的新协定所代替。斯大林之所以愿意向毛作出让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毛泽东在 1 月 22 日强调，他愿意把旅顺口扩建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①

与 1945 年的协定相比较，还可看出 1950 年 1 月 29 日的方案对中国更为有利的方面。旧协定的第三条规定，混合军事委员会由 3 位苏联代表和 2 位中国代表组成。与此不同，“1 月 29 日草案”确定了对等的原则。^② 在旧协定的第四条中所作的规定也完全被删除了。按该规定，中国“委托”苏联政府“保卫上述海军基地”，并放手让他们建造为此而需要的一切设施。代替这一条的是，苏方在“1 月 29 日草案”中的建议：在日本或其同盟者发动攻击时，可共同在军事上利用旅顺口。中方当然可以毫无顾虑地接受这种参与，因为这种表述实际上是一种“非硬性规定”。此外，它还同这样一个条件相联系，即必须在中国政府提出相应的建议后才执行这一条。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协议没有作出时间的限制。

1 月 31 日周恩来对苏联的“1 月 29 日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他的修改建议几乎全是文字性的，涉及内容的只有两点。一是在协定的标题中把“中国长春铁路”放在首位，即

参阅第四章第十六节。

此处和下段参阅《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01 页。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这再次表明这一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优先考虑的问题。第二个改动涉及草案的第二条第 1 段，周建议改写为：“缔约国双方同意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军事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此相适应，周在第 2 段补充了一句：“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军事设备前的时期……”。周要明确指出，苏方不得拆卸军事设备，以及把它们运往苏联。在此，周恩来很可能想到了 1946 年苏军从满洲撤退时的情景，他们几乎把所有重要的工业设备都拆运到了苏联。^①

在 1 月 31 日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团表示他们实际上同意了周恩来所有的修改意见。^② 斯大林很可能曾想到要拆卸有关设备，他不甘心接受周恩来对第二条第 1 段的补充。因此，他没有说无偿地移交这些军事设备。他在此处手写了一个批注：“在此，苏联的花费应得到补偿。”^③

在 2 月 14 日签字的文本中，周恩来的修改意见得到了考虑。^④ 与此相对应，中方也接受了斯大林的费用补偿要求。这反映在后半句中，“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向苏联补偿自 1945 年以来为维修和建造这些设备而支出的费用”。毛和周肯定对此不会感到高兴，但从总体上考虑到苏联的态度以及整个条约和协定，他们不得不对此表示同意。看来，中国代表团的態度在中国并不是普遍得到赞同的。因此，曾参加莫斯科谈判的伍修权在 1990 年还认为有必要为补偿问题进行辩护，他说，1955 年苏

此处参见 1950 年 2 月 1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1-3，11-14 页。

^② 同上，第 3 页。

同上，第 12 页。

^④ 1950 年 2 月 14 日的协定文本见 1950 年 2 月 15 日《消息报》第 2 版；参见本书附录：文件 13。

军撤退时留下的军事设备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废铁，而是现代的武器。^①

此外，中方也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一项术语上的修改建议。出于逻辑原因，序言中的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改为“中国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②

中方的一大成果是，驻旅顺口和大连的苏军人员如犯法将受中国法庭的审理。在 1945 年 8 月，斯大林曾迫使国民党中国接受了苏联的这一要求，并签订了一项有关的议定书。^③从 1950 年 2 月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来看，这一使中国人感到羞辱的苏联特权被取消了，但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材料，说明苏方是否曾作出很大努力，以维护他们在 1945 年所获得的这一治外法权。如前所述，在派遣苏联专家的谈判中，也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④因此可以说，1950 年 2 月 14 日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的签订，也意味着治外法权的结束。^⑤

与旅顺口的情况不同，苏联在大连问题上并不准备在 1952 年以前放弃其一切权利。这一点从“1 月 29 日的草案”就可得知，草案称“大连港问题”将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再“审核”。这与斯大林不久前对毛泽东所作的声明是矛盾的，当时他说苏联不打算保留在大连的任何权利。^⑥但在这一草案中称，苏联管理和占有的财产将移交给中国政府。如同 1945 年的协定那样，这一草案也同样规定：大连是自由港，“向所有国家的商务和航运开

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经过》，载于：《新中国外交风云》，1990年北京版第 14 页。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11 页。

③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秘密议定书，参阅 Elleman：<The End of Exterritoriality>，P.81。援引自档案文件。

④ 详见第四章第二十一节。

⑤ 关于苏联在中国治外法权的历史，参见 Elleman：<The End of Exterritoriality>，P.66-89。

⑥ 见 1950 年 1 月 22 日原则性会谈记录，参阅第四章第十六节。

放”。在原则性会谈中，斯大林却表示他反对使大连作为自由港，因为这意味着有利于美国和英国。^①在这个问题上，中方最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在苏联内部的 1 月 22 日关于旅顺口和大连的草案（即“委员会草案”）中，没有提及苏联控制的财产问题。但它却提到，苏联部队将不迟于 1952 年撤离大连（如同在旅顺口一样）。使人惊讶的是，1945 年的协定根本就没有说苏联部队将驻扎在大连。至于“1 月 29 日草案”没有提苏联部队问题，这可能是想暂时保留在那里的实际驻军，并共同使用港口。此外，不清楚的是：草案中所说的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将审核的“大连港问题”，指的又是什么。从法律上看，这不可能是指 1945 年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中所规定的苏联特权，因为这一协定已被中苏的互换照会所废除。因此，不能像 1 月 22 日草案那样谈什么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再审核的大连协定，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大连港问题”。

在 1 月 29 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没有对苏联“1 月 29 日草案”中有关大连部分提出什么异议，他只是对第三条第 2 段提出了一个不涉及内容的修改建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替“中国”的称谓）。^②2 月 2 日的会谈情况也有些类似。^③周恩来只是指出，中国并不打算接收苏联迄今为止所控制的财产。他提出，在协定失效后，将由联合委员会来审定哪些企业将由双方共同经营。米高扬问，他具体指的是什么企业。周回答说，修船厂“一定要共同经营”。双方一致同意，这个问题将进一步讨论，葛罗米柯将是苏方讨论这问题的负责人。

同上。

^② 1950 年 2 月 1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21-22 页。

此处和下段参阅 1950 年 2 月 3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45 页。

为什么周恩来接受苏军留驻大连的事实，而且不像旅顺口那样给它规定一个留驻期限？这个问题可能从毛泽东不久前对斯大林说的一段话中找到答案。在 1 月 22 日原则性会谈时，毛说，他认为大连可以成为“中苏经济合作的基地”。^① 就这样：在周恩来作了文字上的修改之后有关大连的部分通过了，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于 2 月 14 日签字了，它基本上就是苏方 1 月 29 日的草案。^②

为什么该协定没有为废除苏联在大连的权利规定一个期限，而它对旅顺口和中长铁路却规定不迟于 1952 年。这显然是一个不清楚的问题。但反过来，同样不清楚的，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大连早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归还了中国。1950 年底，双方在中国的建议下签署了一项议定书，规定苏联在 1951 年初以前把大连归还中国，这一协议已如期执行。^③

根据协商，中长铁路于 1952 年 12 月 31 日归还了中国。^④ 相反，旅顺口的发展却有所不同。周恩来 1952 年 8 月、9 月访问莫斯科时，他联系到朝鲜战争，同斯大林谈到延长苏联驻军的问题。^⑤ 斯大林回答说，这样的请求必须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客人是不能提出这种问题的。”双方商定，通过互换照会来解决这个问题。1952 年 9 月 15 日，周恩来在给维辛斯基的照会中说，鉴于日本缺乏准备同中国和苏联签署和平条约，为巩固和平，并基于联盟条约，请求苏联政府把协定第二条中规定

参阅第四章第十六节。

关于双方的修改情况参阅 1950 年 2 月 14 日签订的该协定的文本，见本书附录：文件 13。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39 页。

^④ 1952 年 9 月 15 日苏中公报见：《消息报》，1952 年 9 月 16 日；《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77 页及下页。

此处和下段参阅 1952 年 8 月 20 日斯大林同周恩来的谈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9，第 55—56 页。预见 1952 年 9 月 3 日斯大林同周恩来的谈话，同上，第 76 页。

的苏联部队撤离时期延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及苏联与日本缔结和约之时。^① 维辛斯基表示赞同。1954 年秋，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他向中国人建议收回旅顺口。10 月 12 日双方在一项公报中宣布，鉴于朝鲜战争停止和印支和平恢复以来远东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防力量的巩固，两国政府一致决定苏联军队在 1955 年 5 月 31 日以前撤离旅顺口，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② 但是从种种迹象看，一部分设备仍然是有偿的。^③

4、关于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的供应权的秘密议定书

斯大林当时虽已下决心废除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在 1952 年底以前把铁路无偿地移交给中国，并不迟于 1952 年底从旅顺口撤军。但是在新的中长铁路协定中，还包含了一个总的规定：铁路的“现有的管理状况”将保持，领导职务应实行轮换制。

“现有的管理状况”这一概念可以先验地作很广义的理解，可以理解为迄今为止在 1945 年协定中所确定的所有规定。苏方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协定将被理解为继续有效。这涉及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长铁路协定的第十一条，该条规定从苏联境内至大连和旅顺的往返运输是免税的。^④ 为确保这一处理至少适用于驻旅顺口苏军的物资供应，维辛斯基于 1 月 29 日向中国代表团递交

^① 此处和下段参阅《消息报》，1952 年 9 月 16 日；《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78 页及下页。

^② 《消息报》1954 年 10 月 12 日；《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302 页及下页。

此段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39 页；<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 , P. 284. 关于从旅顺口撤军的协议，详见赫尔姆·汉德齐克：《苏联撤军的政治条件》II，第 48 - 50 页。

^④ 《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00 页。

了一份“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之协定的议定书”草案。^①

下面就是珍藏在维辛斯基秘密宝库中的该文件的复制文本。^②

议定书

1950年 月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由苏联经中国长春铁路以及经大连港水路运往驻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苏联部队的物资，以及由苏联军事指挥部从旅顺口发往苏联的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免征关税或其他任何捐税和收费。

第二条 第一条提及的物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不受海关之查验。通过中国长春铁路运送的物资将用加封的车辆在中国领土上运输。

第三条 苏联的部队和军事物资将无阻地在中国长春铁路上从满洲里至绥芬河车站之间往返运输，按中国军运现行运费计价。

抄送：

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73、80 页。

同上，第 80 页。另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22 页。

与 1945 年协定的第十一条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一草案在一点上力求使苏联更为有利：与 1945 年的协定不同，苏联物资的运输应不受中国海关的查验。^①

在 1 月 31 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没有对苏方上述谋取更多利益的打算提出异议，但他表明中方是不同意苏联这种单方面的处理意见的，这种处理使人回想起外国谋取特权的旧作风。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至少可交互适用的建议：把苏联草案的第三点改为第一点，接着增加一个新的第二点：“中国军队和军事物资将无阻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运往伊宁（新疆省），反过来沿西伯利亚铁路和土库曼斯坦——西伯利亚铁路以及沿阿拉木图——新疆干线运输，按苏联军运现行运费计价。”这一建议遭到苏方的拒绝。^②

第二天，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提出了一个新的苏联的议定书草案。在这份草案中虽然没有考虑中国的要求，但为苏联的军运加了一个约束性的先决条件：只有在远东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苏联才可以和有权沿中长铁路调遣军队。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再次驳回周恩来要求交互适用的建议。他们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没有任何必要利用这种权利，通过苏联领土来运输部队。第一，因为不清楚新疆现在面临或者将来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战争威胁，也不清楚它来自何方。第二，大家都知道，从满洲经过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乌鲁木齐这条路比较远，也不方便。此外，使他们吃惊的是，中国竟然会提出在运输方面的交互适用的问题，因为周恩来自己曾经肯定地说过，如果

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错误地说，在 1945 年协定中也规定不受海关查验
见：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 126.

此段参阅 1950 年 2 月 1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3、15 页；1950 年 2 月 3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同上第 42 页。

苏联把中长铁路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则同意苏联实际上拥有在中国领土上调遣军队的权利。苏联谈判代表显然还以此来暗示，周恩来在上一天已经表示同意苏联提出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草案。该草案的第二条第 4 段已原则规定了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共同利用旅顺口，同样在同盟条约的序言部分也已表明了这种权利。^①

维辛斯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这些意见显然使周恩来“陷入了尴尬境地”。他不得不解释和论证他的建议。他说，中方最初并没有想提军队运输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同盟条约中已经表明了，必要时，随时可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但鉴于苏方的具体建议，他被迫感到应在形式上要求有同样的权利，因为“中国如没有同时获得在苏联境内运输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列入这样一条，在中国恐怕不好理解”。^②

米高扬强硬地指出，如果中方继续反对苏联的建议，他将撤回这一建议，而要求缩短中长铁路租期，使现有协定的有效期缩短为 10 年。这实际上比苏联提出的“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之协定”草案第一条第 1 段规定的期限还要长两年半。周恩来表示拒绝。周说，现在提出的这一条的新修改稿比原先的为好，即军队的运输只是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实行。他对此不再有异议，但这一问题需要向毛泽东报告。^③

显然，毛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满意的。在 2 月 2 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提到利用苏联铁路运输中国军队和物资的问题。他问米高扬，是否可以写明，必要时可以利用西伯利亚干线把中国军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显然是 1950 年 2 月 2 日）引自 Vingrove: < Mao in Moscow >, P. 325. 根据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的文件所写。Vingrove 没有标明维辛斯基所作的修改。

同上，第 326 页。

③ 同上

队从东北运往新疆。米高扬回答说，中国关于享有通过苏联领土运输中国军队的权利的建议之所以被拒绝，不是因为苏方排除“真正必要时”通过同盟国之间的协商运输军队的可能性。他再次对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吃惊”。“苏联作为同盟国，无偿地交出了巨大的财富：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交出了在这些地区的所有权利，而中方却不同意仅仅在一条铁路上运输苏联军队。如果中方不能作出哪怕是这样的让步，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国？”显然，周对此指责保持了沉默，并在向毛汇报后没有再提此事。^①

毛和中共领导想把废除俄罗斯和苏联在满洲的特权作为巨大的谈判成果加以宣传。正如周恩来所承认的那样，如果公布这个没有对等处理的议定书将使毛和中共领导在中国的舆论面前陷入难堪的境地。这很可能就是最后同意不公布这一议定书的原因。

5、贷款协定

我们还记得：毛泽东是在 1949 年 2 月第一次向苏方提出贷款请求的。当时他向米高扬提出 3 亿美元（为期 3 年）的贷款要求，用以支付苏方供应的白银、原料、机器和其他商品。同年 6 月底，斯大林向刘少奇承诺了所要数额的贷款和 1% 的优惠利息，分 5 年支付，在全部支付后的 10 年内偿还。经几次往返，于 7 月 30 日在两党之间达成了相应的协议，由刘少奇和马林科夫签了字。这一协议在公众舆论面前伪装为苏联与东北政府签订的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②

12 月 16 日毛泽东向斯大林建议，3 亿美元的贷款现在可以作为政府协定签订，这将在中国引起很好的反应。斯大林表示同

同上。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也认为，斯大林驳回了周的要求，见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126 f.

详见第三章第八节。

意。他在 1 月 22 日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向毛泽东建议，贷款协定从 1950 年 1 月 1 日开始，因为此时开始实际供货。关于军事定货，毛建议部分用贷款，部分用出口商品来偿还。

苏联起草委员会于 1 月 22 日就向斯大林呈报了贷款协定的草案，但该文本至今未能获得。^② 但人们可以认为，这同苏方 1 月 29 日递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草案是同一个草案。^③

31 日，周恩来对这一草案表了态，并同时递交了一份自己的文本，对少数几个地方作了修改。例如，他建议第一条第 2 段，把“鉴于中共因其境内长期战争行动而遭受的非常破坏”用语，改为“鉴于中国因其境内长期军事行动而引起的财政困难”。在第五条中，增加了应经批准和互换批准书一句。在第三条第 1 段，周恩来确定，中国不仅以供应原料（以及黄金和美元），而且也提供制成品来偿还贷款。苏方在 1 月 31 日对周的前几条的建议表示同意，只是对最后一条，即以制成品来偿付贷款，表示待考虑后另作答复。^④

后来，关于贷款协定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谈，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原始资料。2 月 14 日签字的最终文本^⑤ 表明，在周恩来提出的要求中，只有关于批准书一条被接受了。周关于用制成品偿还部分贷款的建议（第三条）被苏方拒绝了。在这方面达成一致意见的是：除苏方草案规定的偿还方式外，只允许以茶叶进行

详见第四章第十六节。

^② 1950 年 1 月 22 日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42 页。

同上，第 73、81 - 82 页。

此段参阅 1950 年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 案卷 369，第 4、17 - 19 页。关于中方对第一、三、五条所作的新表述是根据维辛斯基对周恩来草案的复述，见同上第 17 - 19 页。维辛斯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对中方关于第一和五条的建议的复述略有出入，见同上第 4 页。

^⑤ 《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23 页及下页，最终文本请见本书附录：文件 14。

偿付。

6、关于向苏联供应战略原料的秘密议定书

据赫鲁晓夫的回忆，斯大林有一次，可能是在 1949 年上半年，在其亲信中问，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① 贝利亚回答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如果苏联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这里已经把贷款和中国提供有价值的原料联系起来。当毛泽东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苏联领导同他讨论贷款协定时，苏联领导已经把这一思想凝聚成一个一揽子的意图：利用贷款来获得苏联缺乏的重要战略金属。

1 月 29 日，苏方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份附加于贷款协定的议定书。^② 下面就是收藏在维辛斯基宝藏中的这一文件的复制本：^③

议定书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业已签订的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国的协定相联系，双方政府达成如下协议：

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而陷于紧迫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满足苏联政府愿望，并宣布同意在近 10 - 12 年内以每年商品周转协定的方式，把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单独卖给苏

此处和下句参阅《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463 页。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73、83 页。

同上，第 83 页。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没有提及这一秘密议定书。见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 121 - 127。

联。

抄送：

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1月31日，周恩来对苏联草案提出了修改建议，他要求确定这些金属按照世界市场价格出售。此外，他要求延长供货期限，并把第2段改为：“在14年内，从1950年到1963年，以每年商品周转协定的方式，把中国不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供应给苏联政府，苏联政府按照以世界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的价格购买。”周还问，苏联政府是否准备购买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中国政府能不能把部分剩余产品卖给人民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就希望购买1600吨钨。米高扬回答说，苏联准备购买全部剩余产品。^①

中方很快得知，中国国内在金属生产和供应方面面临一些问题。因此他们请求，把铅从供应单上去掉。米高扬表示同意。周恩来对苏方要求在两年内提供8000吨钨的要求也表示同意。但他要求，在前4年的锡的供应量从14000吨减少到11000吨，即减少3000吨，因为开采锡的云南省解放比较晚。此外，日本人在开采地进行了破坏。周还补充说，如果苏联提供帮助，他们可迅速提高产量，完成所要求的供应量。米高扬答应给予帮助，但要中方具体说明，哪里需要帮助。周又接着指出，锑的产地湖南也遭到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破坏。他请求减少锑的供应量，但苏联能给予帮助，也可完成原先要求的供应量。此时，米高扬仍坚持

^① 此段参阅1950年2月1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5-6页。

原先提出的供应量，并答应提供帮助。他还以教训的口吻指出，保持这些数字会刺激中方扩大产量，加大完成协定的责任心。周恩来请求在从中国得到确切的消息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国内的肯定答复，则需要减少供应量。^①

议定书的最终文本至今没有得到。

有材料说明，苏联领导要把战略原料的供应同提供贷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新华社为条约缔结而准备的一篇报导草稿中说：“中国将出售给苏联以苏联所不足的战略原料用以偿付苏联的贷款，这点对于苏联方面也是有利的。”但这一句后来按毛泽东的指示删去了。^②

7、关于废除 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及协定和关于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互换照会

两国外长之间的互换照会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废除 1945 年的条约及协议（这一问题在前面已进行了探讨^③）；而换文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外蒙古的法律地位问题。

1949 年 2 月，毛泽东曾对米高扬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对蒙古人民共和国重新并入中国版图感兴趣。斯大林立即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提出了虚情假意的理由。刘少奇在其 1949 年 7 月 4 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再次谈到这一问题，并以一种心情矛盾的方式提出：蒙古人既然按民族自决原则以全民公决的方式要求独立，中国则应承认蒙古的独立。然而，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同中国合并，中国将对此表示欢迎。关于这个问题只有蒙古人民

此处参阅 1950 年 2 月 3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43-44 页。

此处参阅 1950 年 2 月 14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胡乔木的电报，见：《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 262 页，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258.

见本节。

有权决定。^①

斯大林可能从上述的最后一句话中断定，中国领导要暂时搁置蒙古问题。因此，他在 1949 年 12 月 16 日同毛泽东会谈时没有再提此事。但是，维辛斯基在准备同中国代表团会谈时指示国际法专家杜德涅夫斯基，从外交部的档案中找出所有 1945 年至 1946 年的有关文件。1 月 16 日，杜德涅夫斯基提出了蒙古政府委员会关于 1945 年 10 月 20 日全民公决执行情况的报告^② 等文件，其中称，百分之百的参加者表示赞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没有一张反对票。^③ 但是从报告中也可看出，全民表决不是秘密进行的，人们必须在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如果本人不识字，必须按上手印。此外，杜德涅夫斯基送上的文件还涉及中国于 1946 年 1 月 5 日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承认。^④

从各种情况看，百分之百赞成“独立”也许是事实，因为这不是无记名投票，因为当时斯大林恐怖主义占据着统治的地位，投反对票就等于自杀。一位苏联特务也承认，有不少蒙古人认为，举行公民投票是苏联的动议，“目的是随后占领蒙古和把它并入苏联”。^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几天，乌兰巴托向中国政府提出建交建议。1949 年 10 月 16 日周恩来通知蒙古政府，他的政府决定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⑥

详见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八节。

^② 1950 年 1 月 16 日杜德涅夫斯基给维辛斯基的信，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 卷宗 18，案卷 235，第 123 页。

此处和下句参阅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委员会关于全民公决执行情况的报告，同上，第 129-133 页。

同上，第 124-127 页。

鲁疆宁：《雅尔塔会议与二战前夕和二战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律地位的形成问题》载于《远东问题》1995 年第 6 期，第 59 页。鲁疆宁的陈述和关于全民公决结果的描述依据的是迄今未发表的俄罗斯档案材料；同上，第 56-60 页。

^⑥ 此处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卷第 13 页。

在 1 月 22 日原则性会谈时，毛泽东没有提及蒙古问题。但周恩来在另一次毛泽东也在场的会谈中提出，中国准备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立即紧张起来，并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为什么还要发表声明？他还虚情假意地补充说，蒙古同志不在场，人们没有权利谈论这个问题。周恩来解释说，新中国成立时曾发表声明宣布不承认一切旧的条约和协定，而蒙古的独立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对蒙古的独立表明态度。这个问题也是中国的“民主人士”提出来的。^①

师哲关于周恩来讲词的复述是不准确的，因为上述新中国的声明并没有说国民党签订的所有条约都无效，而是说国民党与外国政府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应予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②

经周恩来的解释后，斯大林松了一口气，并建议中国政府可以先发表这一声明，苏联政府随后发表声明予以支持。^③ 后来，就是这样做的。

1 月 31 日，周恩来向苏方递交了他与维辛斯基外长的互换照会的草案，其中第二点有这样一句：“缔约双方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这已因其 1945 年为此而进行的全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保证。”^④ 通过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50 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0 页及下页。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认为这一谈话是在 1 月 22 日。但在苏联的相应的谈话记录中找不到这一段。这一段谈话一定是在 1 月 31 日进行的，因为周在这一天向苏方提出了互换照会的文本，其中谈到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问题。详情和资料来源见下一段。

参阅 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五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1 卷第 1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卷，第 595 页。

^③ 审查：《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50 页。

此处和下句参阅 1950 年 2 月 1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 案卷 369，第 1、21 页。

维辛斯基对照会内容的确定，互换照会便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一部分。

从中可以看出，互换照会是按周恩来的草案完成的。互换照会虽然没有公布，但在 1950 年 2 月 14 日的联合公报中提到了互换照会。公报说，在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之间的互换照会中两国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这已因其 1945 年为此而进行的全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保证”。^①

这样，双方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它在形式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际上是苏联的一个保护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甘心失去外蒙古。四年后，1954 年 9 月至 10 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北京时，周恩来问他们，外蒙古是否不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② 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怀疑，并再次强调乌兰巴托政府拥有管辖权。

第十九节 文化差异引起的麻烦

2 月 2 日，周恩来向维辛斯基提出，毛希望在今后几天参观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博物馆等。随后苏方安排毛和周参观飞机

^① 《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1 版；《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集》，第一卷第 75 页。

此处和下句参阅 1964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同日本人的谈话；谈话记录的德文译本见：赫尔姆特·马丁主编：《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书简、文章和讲话（1949—1974）》，1974 年慕尼黑版，46 页；日本谈话参加者的报告英译本引自：Dennis J. Doolin：〈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Documents and Analysis. Hoover Institution Studies 7, Stanford, Ca, 1965, P. 43;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P. 285 f. 关于中苏关系中的蒙古问题参阅第二章第二节，以及海因茨希：《苏中边界冲突——起因、过程、前景》，载于《联邦德国东方学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科隆）研究报告》1979 年第 17 期，第 18—20, 22 页。

制造厂、斯大林汽车厂、有关集体农庄和列宁墓。^①毛还分别会见了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大使馆的人员。^②

苏方还建议毛和周安排一些由王稼祥审定的文艺节目。其中，维辛斯基建议毛和周观看芭蕾舞剧《红罂粟花》。^③这是当时在莫斯科深受欢迎的一出舞剧，它是1927年首次公演的、现代主题的苏联芭蕾舞。故事发生在革命的中国。维辛斯基显然以为，这会使中国客人感到特别的高兴。该剧讲的是一位苏联海军士兵来到了上海，遇到了一位中国妓女，他给她带来了革命的思想，并力求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当王稼祥了解了这一剧情后，他建议毛不要观看此剧。毛与王的意见一致，认为这里面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有辱中国人。^④

为不伤害苏方，中方让陈伯达及几个随行人员去观看演出。这是一场专场演出，舞剧的著名作曲家，年迈的热耶哥德·格里尔也出席了。据陪同陈前往的费德林报告称，这几乎发展成一桩轰动的事件。陈对俄罗斯舞蹈演员化妆成黄皮肤的中国人（其中还有一个老鸨）的模样和举止很生气。在他看来，这些人是怪物，是恶魔。此外，陈对这一舞剧的名字也很反感，因为罂粟是鸦片的原料，它在一个多世纪里毁了中国人民。费德林尽了很大的努力才使中国人没有提前退场。在这一事件后，《红罂粟花》

^① 此处和下句参阅1950年2月3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46-47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2页；《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44页；《汪东兴日记》第200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1993年北京版第16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3页。

^③ 1950年2月3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46-47页。

此段参阅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第182页。

暂时从演出计划中消失，它到 1957 年得到了一个新的名称：《红花》。^①

在伍修权的回忆录中，他把中国人在《红罌粟花》事件中的态度说成是努力“维护民族尊严”的表现。^②这一事件表明，苏方主人对中国人的感情敏感性缺乏细致的了解，同样，中国客人对西方的艺术形式也缺乏熟悉。显然，陈伯达更加难以鉴赏西方的艺术形式。^③陈在一次观看《天鹅湖》时，为演员“赤身裸体”地表演，感到不舒服。他在观看电视中一位著名俄罗斯低音歌唱家演唱时大笑起来，并问，这人为什么叫得像公牛一样。费德林在其回忆录中再度取笑了陈。显然，人们不应以此为例，而过高地评价“文化冲突”（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自由演绎），但是从中也可看出，这一文化差异的插曲对谈判的气氛起了不好的影响。

第二十章 2月14日条约签字和毛泽东回国

1950年2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和照会签字。原定的签字日期应在1月份。^④但在签字前的几天，谈判出现了困难。有关情况将在下面描述。

此段参阅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载于《近现代史》，1992年第6期第83-85页；《苏联大百科全书》，第6卷，1971年莫斯科版，第598页。王稼祥夫人认为，陈因能代替毛坐在沙皇包厢里观看演出而冲昏了头脑。当帷幕落下时，他疯狂地鼓掌，损害了民族尊严。毛和王稼祥也有这一看法。但很可能陈只是出于礼貌才鼓了掌，而王利用这件事在毛那里说陈的坏话。引人注目的是，陈在王稼祥夫人的回忆录中是完全被否定的。见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第182页及下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44页。

此处和以下两处参阅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载于《近现代史》，1992年第6期第83-85页。

详见第四章第十七节。

2月2日毛泽东通知苏方，他计划于2月8日或9日回国。^①但到了实际签字的前3天，签约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下来。2月11日，周恩来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提出，可以在2月14日签字，或者推迟到2月18日，因为16日是中国的春节，3天不出报纸。^②如果贸易协定能准备好，可于2月18日举行签字。

签字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赛福鼎、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和罗申的陪同下，观看芭蕾舞《天鹅湖》。脚尖舞的技巧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里举行。签字人是外长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在他们的背后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据师哲称，因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为使照片上显得高大一些，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周较注重以中国传统风格签字，故从大使馆拿来了必要的毛笔、砚台等文具，放在了签字桌上。出席签字仪式的有苏共12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名：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中方出席的还有：陈伯达、王稼祥和赛福鼎。^④

在仪式过程中，两位外长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称颂这是“苏中关系史上……新的显著的一页（维辛斯基）是“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周恩来）与维辛斯基不同，周恩来提到苏联政府无偿地把在东北从日本人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在北京的过

^① 1950年2月3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46页。

此处和下段参阅1950年2月12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51页。

^③ 《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毛与朱仲丽（王稼祥夫人）的谈话，引自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1995年北京版，第183页及下页。朱错误地说毛是同斯大林一起观看这场演出的，两人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她显然是把这次活动与1949年12月22日毛与斯大林一同观看文艺演出弄混了；参阅第四章第五节。

此段参阅1950年2月15日《消息报》的签字照片；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61-463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38页及下页。

去所谓兵营的房产移交给中国，这体现了“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伟大友谊”。这一行动将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兴奋”。与维辛斯基不同，周恩来还利用这次机会抨击了美国：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千方百计企图挑拨离间中苏两国的友谊，现在它们“彻底失败了”。周恩来在演说中四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称之为“大元帅”。维辛斯基只有一次提到毛的名字，称他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①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招待会，约在 12 点结束。晚 9 点，王稼祥大使借条约缔结之际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了招待会。应邀出席招待会的除上述苏共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高级著名人士外，斯大林也出席了。^②

显然，毛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出席。三天前，周恩来曾询问米高扬和维辛斯基，中方“能否指望斯大林同志出席这个招待会”。^③又说，如果不能，“则希望斯大林同志在招待会之前访问大使馆”。周恩来恳请把这一邀请尽快转达给斯大林。苏方答应转达。王稼祥的夫人证实了中方对斯大林出席的极大重视，因为这将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赋予它以很大的荣誉。^④王稼祥以“毛泽东主席和 5 亿中国人”的名义向莫洛托夫发出了正式的邀请信，并恳请说，斯大林出席招待会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心愿”，也是“世界工人阶级所盼望的”。据师哲称，毛泽东也向斯大林表示，希望他能出席中国的招待会，那怕是一会儿。^⑤斯大林回

^① 《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

^② 《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1 版；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63 页。

此处和以下两句参阅 1950 年 2 月 12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51 页。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第 190 页及下页。

^⑤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63 页及下页。

答说，他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这样的招待会。但他将破例出席，并逗留到结束。费德林证实有这样一次谈话，但他赋予了一点不同的特点。^① 斯大林问毛，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这样的招待会。毛回答说，克里姆林宫是苏联举行国家招待会的地方，不完全适合“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当斯大林指出，他从未去过在饭店和外国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恳切地请求斯大林能来（“我们的招待会，没有您……不，不，这是不可想象的。”）他最后得到了斯大林的允诺。

约有 500 人参加的招待会是在著名的首都饭店（Metropol）举行的，这一饭店建于沙皇时期，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王稼祥作为主人，并携带身着传统旗袍的夫人接待宾客。斯大林准时率领有关政治局委员出席了招待会。据王稼祥夫人称^②，毛泽东以拥抱相迎。在祝酒词中，周恩来称颂苏中友谊将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并宣称中国将向老大哥学习。在其他人的几次祝酒之后，斯大林起身祝酒。他表示对周恩来的赞同，然后就出人意料地抨击起南斯拉夫，说它站到了大家庭之外，要走一条行不通的特殊道路，但它早晚将回到大家庭里来。周的演说由费德林翻译，斯大林的演说由师哲翻译。毛没有讲话，只是提议为斯大林的健康和中苏友谊干杯。招待会在午夜结束。米高扬在招待会之后还停留了一会儿，与周恩来和李富春讨论经济合作和贸易等问题。^③

此处和余下几句参阅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载于《近现代史》，1992 年第 6 期第 86 页。

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第 191 页。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64-466 页；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载于《近现代史》，1992 年第 6 期第 88 页及下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2 页；《汪东兴日记》第 206 页；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第 191 页。费德林没有提及这两个演说，而提到斯大林的简短祝酒，斯大林在祝酒辞中感谢历史送来了“一位如此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畏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

2月15日，在北京也为条约的签订举行了招待会，刘少奇主持，约700人参加，其中有中国政府委员会成员、苏联大使馆成员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大使。^①

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在苏联和中国的新闻媒体中都被当作最重要的事件加以庆祝。《真理报》和《消息报》于第二天在第一、二版全文发表了公告、条约、两个协定和两位外长的讲话。在中国，以夸大的风格表示了庆贺。《人民日报》第一版整版地刊登了毛泽东、斯大林、周恩来、维辛斯基、红场和天安门的照片，以及下列口号：“欢迎中苏友谊与合作的新时代！”“中苏两个伟大国家的友谊与合作万岁！”以及“世界劳动者的领袖斯大林元帅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北京以这后一个口号清楚地承认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中的领导地位。在《人民日报》的第二、三版全文刊登了公告、条约、两个协定和维辛斯基与周恩来的演说。在这两版上还发表了祝贺这一事件的评论。^②

2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启程回国。在启程的前夕，斯大林为他们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举行了告别宴会，几乎所有的苏联高级领导人都出席了。胡志明也出席了，他开玩笑地问斯大林，为什么不借此机会也同他的政府签订一个条约。斯大林避而不答。^③

在启程那天，也是中国的新年，莫洛托夫特地来到毛的别墅，向他转达斯大林的良好祝愿，并陪同毛登上去车站的轿车。毛和周还在大使馆同使馆成员及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人一起共进

^① 《消息报》，1950年2月6日，第6版。

^② 此段参阅《真理报》，1950年2月15日第1版，2月16日第1版；《消息报》，1950年2月15日第1版，2月16日第1版；《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1、3版；《汪东兴日记》第207页。

此段参阅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42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66页。对宴会的一个名人轶事的描述见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第192-194页。

晚餐。到车站欢送的除莫洛托夫外，还有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布尔加宁、外长维辛斯基、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大使罗申和其他高级人士，以及共产党国家的大使。车站上举行了通常的告别仪式，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热情的演说。^①演说中不外乎试图给人以印象，似乎他的访问是在纯真的、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他说，在根本利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受到了热烈的接待，两国人民的团结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这种团结必将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毛再次强调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他说，苏联的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毛在结束其演说时对苏联的统治者使用了不能再高的称颂：“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②

随同毛泽东和周恩来启程的还有陪同毛来莫斯科的陈伯达、师哲、汪东兴和叶子龙，以及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和胡志明。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叶季壮、伍修权等留在了莫斯科，以便继续就尚未签字的协议文件进行谈判。^③

苏联的一位副外长陪同毛及其随行人员直至中国边界。毛决定，在所有停靠的大站都下车参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毛参观了一个机器制造厂，一个热电站，并会见了大学的教授。在新西伯利亚，参观了一个兵器厂和一个飞机制造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看了一个收割机厂，在赤塔访问了一个幼儿园。在伊尔库斯克参观了一个茶叶包装厂后，毛对其随行人员遗憾地说，俄

演说文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汇集》，第一卷第 82 页及下页，俄文本见《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8 日第 1 版。

^② 此段参阅《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8 日第 1 版；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68 页；《汪东兴日记》第 207 页。

此段参阅《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8 日第 1 版；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69 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5 页；《汪东兴日记》第 209 页。

罗斯人缺乏茶文化，只会把茶叶碾碎，不懂得各类品种的区别。中国客人在许多城市还观看了当地安排的文艺演出。只是在经过苏维埃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时，毛令人失望地拒绝了当地党政军领导人的邀请，没有下车参观市容。师哲指出，这个地方在 1934 年以前称上乌金斯克，在被沙俄侵占以前原属中国领土。^①

在 2 月 26 日越过边界后，毛、周从满洲里给斯大林和维斯基发了电报，感谢他们给予的“热情和友好的接待”，祝愿中苏友好与合作永恒。毛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在哈尔滨、长春、山海关、唐山、天津等地作短暂停留，进行视察。毛一行人在沈阳停留了好几天，并简短地访问了那里的苏联专家。在此之前，他的旅程是保密的。3 月 4 日，毛和周到达北京时受到了以刘少奇和朱德为首的最高级党政领导人的欢迎。前往欢迎的还有苏联代办和捷克斯洛伐克、北朝鲜、匈牙利和波兰的大使。在此之前，毛曾指示有关部门，只安排约 100 人来欢迎。他的到达直到最后一刻都是保密的。^②

第二十一节 关于 1950 年 3 月和 4 月签订的 若干协定的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启程后，王稼祥、李富春、贸易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刘亚楼和赛福鼎留在了莫斯科。

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69—471 页；《汪东兴日记》第 207—210 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5 页。

^② 此段参阅《人民日报》，1950 年 3 月 5 日第 1 版；《消息报》，1950 年 3 月 7 日第 3 版；《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26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72 页；《汪东兴日记》第 210 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5 页。

科，以便继续就尚未签订的协议文件进行谈判，这些文件是因为中方对现有文本有不同意见而未能于 2 月 14 日签字。这涉及关于在新疆创建合营公司的两个协定，一个关于创建合股民航公司的协定，一个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秘密协定和贸易协定。^①

因为这基本上涉及的是经济合作问题，谈判在苏联外贸部举行。中方的谈判领导人是王稼祥，他的对手是米高扬和副外长葛罗米柯。据伍修权报告说，意见分歧不断出现，这使所有参加者都感到不愉快。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卢布与中国元的比值。看得出来，苏方就是要对中国代表团实行欺诈。中国人作为乞求者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屈服，最终只得接受对中国不利的汇率比值。同样，当双方在苏联专家的报酬问题上出现争吵时，涉及的仍然是钱的问题，即美元、卢布和元。^②

该协定原计划于 3 月 5 日签订^③，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3 个股份公司最终于 3 月 27 日成立，关于苏联专家的协定在同一天签字，贸易协定连同附加协定和三个议定书于 4 月 19 日签字。下面，将对这几个协议文件作进一步的论述。

1、1950 年 3 月 27 日签订的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条件的秘密协定

早在 1949 年 2 月底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就希望苏联能派专家到中国的各个领域当顾问。1949 年 6 月底，斯大林向刘少奇表示原则上同意，但必须事先商量好钱的问题。苏联专家

此段参阅《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25 页；1950 年 2 月 13 日周恩来与维辛斯基谈话（维辛斯基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18 页。另见 1950 年 2 月 13 日王稼祥与维辛斯基的谈话（维辛斯基的谈话记录），同上，第 17 页。

此段参阅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6 页。

^③ 1950 年 2 月 27 日葛罗米柯同阿季左夫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29 页。

必须获得中国优秀专家同样多的生活费。如果需要，苏联政府将给他们以补贴。斯大林在 8 月中同刘少奇进行告别谈话时，他又提出中国政府应为苏联专家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工资报酬，负责其家属的生活安排。他并提出，苏联专家如有犯罪行为，将不受中国法院，而是受苏联法院的审判。这一要求显然伤害了中国人，因为这使他们想起在旧中国的外国特权。此时，北京领导已同意了斯大林和刘少奇于 1949 年年中达成的一般性的“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协定”。^①

1 月 22 日苏联起草委员会向斯大林递送了一份“派往中国机构、组织和企业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报酬条件的草案”。^② 这个草案的文本至今未公开。2 月 10 日前，苏方向中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有关的草案。这一草案至今未能获得。^③

2 月 11 日，周恩来就这一草案中的支付问题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提出了询问。他说，中方不理解第四条的内容，那里说中国政府应每月为专家支付 2000 - 4000 卢布的补偿费。这些金额是作为专家的家庭生活费，还是拨给国家或拨给专家以前工作过的企业？米高扬明确表示，这些金额是作为对专家以前工作过的企业的补偿，但不言而喻这必须是通过苏联政府实行的。接着周申明，如果规定用美元付款，中国政府需要支付更大的数目。对中国政府来说，用商品进行结算，负担会轻些。米高扬回答说，在付款协定中可以规定几种可能性：既可以用商品供应支付，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支付。周接着问道，这个协定是否适用于所有各类专家（军事专家、教育人员等）。周最后问，能否把

详见第三章第四节，第三章第八节。当时是否真地签订了一项正式协定，或只是达成一项协议，这不清楚，该文本至今没有公开。

^② 1950 年 1 月 22 日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案卷 235，第 42 页。

^③ 1950 年 2 月 12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48、50 页。

苏联专家出差中国的期限定为 2 至 3 年。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指出，先定为一年，但可以延长。^①

在第二天周与罗申会谈时，在支付专家补偿费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周声称，为每位专家每月向苏联政府支付企业补偿费 500—1000 美元，这对中国政府来说将是不能承受的。这比毛主席和他的部长们的所得要多很多倍。按 1:4 的比例来算，将折合为 2000—4000 卢布。周要求苏方同意按 3 倍于专家的人民币工资来计算补偿费。2 月 16 日，即周启程的前一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向周申明，补偿原则是不可放弃的，但苏联政府准备接受 1500—3000 卢布的补偿费。周对此表示感谢。^②

在 3 月开始的进一步会谈中，王稼祥问葛罗米柯，在中国的大批苏联军事人员是否都被视为协定中所说的专家，他们的报酬应如何支付。米高扬答应研究这个问题。此外，王建议，在专家的召回和解聘问题上应实行对等原则，即：双方都有权召回或解聘，召回和解聘的一方应支付相应的费用。但苏方草案只规定了莫斯科的召回，为此苏方将承担相应的费用。王的建议遭到葛罗米柯的拒绝。他解释说，苏联草案中的这一处理办法是与迄今为止同外国签订的协定相适应的。因此“改变这一原则，对我们来说是困难的”。王又提出，鉴于中国新闻界已报道了苏联专家到达的消息，应发表一个关于缔结此协定的公报。葛罗米柯回答说，苏联同其他国家缔结这种协定时没有这样做，但他表示这个问题可以研究。^③

^① 此段参阅 1950 年 2 月 12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50—51 页。

^②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Soviet -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 - 1950 > . P.461 f.; Wingrove: < Mao in Moscow…… > . P.330 f. (两者依据的都是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的文件)。

^③ 1950 年 3 月 3 日葛罗米柯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31—33 页。

中方还提出，如何才能积累一笔卢布储备，以便从中支付苏联专家的报酬。王稼祥建议，用售给苏联的大豆的收入建立这一储备。葛罗米柯表示，这一题目可放到贸易协定的范围内进行讨论。^①

关于下级军事顾问的报酬问题，双方展开了顽强的讨价还价。苏联要求给上士军衔的人员（这涉及大部分的军事顾问）支付 1500 卢布的报酬。王稼祥感到这种报酬定得过高。他指出，这种人员在苏联的军饷也只有 500 至 600 卢布。但葛罗米柯顽强地坚持苏方的要求。^②

3 月 22 日，王稼祥向葛罗米柯声明，中方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专家报酬的条件，“虽然涉及上士的补偿部分是苛刻的”。在旅费方面（第三条第 2 段），王提出，在来北京的路费中，中国的这一段可用中国元来支付。显然，在苏联草案中，全部旅费按卢布支付。此外，王要求在协定的第八条中明确规定，这也适用于在协定签字前来中国的专家。王向葛罗米柯递交了一份相应的草案。^③

第二天，葛罗米柯宣称，同意将上士月报酬降低为 1000 卢布，并接受王的其余建议。协定于 3 月 27 日签字。^④后来，苏方未经商定又将相应报酬提高了 15%。^⑤

从谈判过程中陆续提出的文件文本中可以看出，中方在谈判

^① 1950 年 3 月 8 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 案卷 8，第 37 页。

同上，第 39-40 页。

草案文本：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51-53 页。该文本见本书附录：文件 15。此段参阅 1950 年 3 月 22 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谈话，葛罗米柯 3 月 23 日的谈话记录，同上，第 49-50 页。

同上，第 55-56 页；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Soviet -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 - 1950 > . P.462。

此段参阅 1950 年 3 月 23 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谈话，葛罗米柯 3 月 24 日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55-56 页；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 . P.462。

中压低了苏方的一些要价，但这只是就谈判结果同苏方原先的要求相比较而言。这首先指的是对中国人具有重大意义的非物质方面，如：在协定中没有规定苏联专家受特别法庭审理的权利。1949年夏斯大林曾向刘少奇提出，苏联专家如有犯罪行为，将不受中国法院，而是受苏联法院的审判。但斯大林最后放弃了这一条要求。^①

就这点而言，埃勒曼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当1950年斯大林与毛泽东签订了一项给苏联公民以治外法权的秘密协定时，苏联在中国的特权又重新获得了”。^②埃勒曼的观点依据的是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的材料。^③那里说，在斯大林提出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中，最使中国人感到受侮辱的要求就是：苏联人如有犯罪行为将不受中国的，而是受苏联的法庭的审判。而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依据的则是师哲的陈述。^④他实际上两次提到，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其中有特别法庭审理权。但师哲没有说明斯大林是在何时、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一要求的。他虽然没有明确说，但从上下文看，他似乎指的是在1949年8月13日斯大林同刘少奇的告别谈话，师哲在其回忆录中报道了这一告别谈话。^⑤但师哲也没有说，中方是否满足了斯大林的这一要求。

冈察洛夫、列维斯和薛当时并没有看到协定的文本，他们除了师哲的陈述外也没有引证其他的材料，但他们当时却认为：“中国人别无选择只好屈从于斯大林的要求。”从作者已得知的苏联档案材料中却找不到这样的迹象，说明斯大林在1950年1

① 详见第三章第八节。

② Elleman: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 P.81.

③ 此处和下句参阅 Goncharov/Lewis/Xue: <Uncertain Partners, P.125 f.

④ 此处和下句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6页。

⑤ 同上，第415页。详见第三章第八节。

月至 3 月的谈判中再次提出了治外法权的要求。即使斯大林提了这一要求，但协定文本可以证明，他的这一要求未能得以实现，否则这一内容一定会在协定中有所反映。

如果斯大林的治外法权要求得以实现，那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退回到了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羞辱的殖民主义传统。师哲在这一段陈述中愤怒地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传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①

师哲还应当加上一句，斯大林并以此来谋求苏联传统的继续。苏联在 1924 年 5 月 31 日的一项条约中（指《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译者注），曾宣布“放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② 中国政府也曾利用它要求西方国家也放弃这种特权，华盛顿和伦敦实际上已于 1943 年 1 月放弃了这种权利。但是，根据新的材料得知，苏联在 1924 年 5 月 31 日的条约签订后实际上仍保留了一定的特权，并在 1929 年的一项不太引人注意的条约中及 1939 年贸易协定的秘密议定书^③ 中，在法律上确认了这一权利。在后一个议定书中涉及的是苏联驻中国的商务代表处。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和宋子文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秘密议定书中也曾达成了协议，苏联在旅顺口的“军事法庭和军事当局拥有对所有其部队成员的司法裁判权”。师哲究竟是否知道这些事实，或者，他就是有意要美化苏联，这一点我们很难做出判断。^④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6 页。

^② 条约文本见《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82—85 页，此段见第 85 页。

议定书文本作为 1939 年 6 月 16 日贸易条约的“附件 C 包含相应条款的第 1 节第 8 段”被收集在 1958 年台湾出版的条约集中；见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958 年台北版，第 494—497 页，此段见第 495 页及下页。在苏联官方的中苏关系文件集中没有这份文件。上面提到的 1929 年 12 月 22 日的条约在台湾条约集中也没有被收入。

此段参阅 Elleman: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 P.71-81。

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和组织中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指示”^①，其中责成顾问们有义务“始终不渝地维护苏联公民的荣誉”，并有意识地让中国的劳动者对苏联及其代表也表示爱和尊重，每个苏联专家有义务“友好地对待中国的专家和中国人民，不得高傲”。

在1950年2月和3月的谈判中，中国人使应支付的补偿费降低了约四分之一，在军事人员方面，降低得还更多一些。此外，也实现了在中国领土上的旅费按人民币来支付的要求。苏联方面也接受了中国的建议：该协定也适用于签字前派往中国的专家。中国代表团未能实现其也有权解聘苏联专家的要求。斯大林也没有同意中方关于公开协定的要求。因此，该协定是秘密的。

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最多时达到1500人，他们一直工作到1960年。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于1960年7月18日通知中国，召回全部专家。^②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中方对专家进行反苏宣传，忽视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对他们进行策反工作。在此，苏联大使馆没有顾及1950年3月27日签订的“关于苏联专家工作条件的协定”。他们没有遵守协定第九条规定的半年解雇期限。

指示文本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卷221，第21-24页。该指示的草案于1950年3月16日由维辛斯基报送了斯大林，作了几处修改后于1950年3月21日由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同上，第19页。

^② 1960年7月18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照会，俄文本见：德意志联邦档案馆“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与群众组织档案”基金会（柏林），J IV/2/202/280；引文译本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9, Winter 1996/1997, P.249 f。另见赫鲁晓夫1960年7月18日给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信中所附的1960年7月18日照会的复印件。对照会的评论见：Chen Jian: < A Crucial Step Toward the Breakdown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The Withdrawal of Soviet Experts from China in July 1960 > , 载于：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9, Winter 1996/1997, P.246, 249。

2、1950年3月27日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含秘密议定书）

3月27日，关于创办两个中苏股份公司的协定签字了。一个是在新疆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公司，另一个是开采有色及稀有金属的公司，它主要开采的是金、铜、铅和铝。^①这两个协定的文本至今尚未公开，但当时苏中新闻媒体对协定的签订都作了简要报道。^②

据报道，这两个公司是在对等原则基础上建立的，是为了“促进中国民族工业”以及“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它将从事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的勘探和开采工作，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还进行加工工作。产品和盈利将由两国分享，各占一半。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人将由双方轮流担任，每三年轮换一次。第一届领导人由中方担任，苏方任命一位副职。这一做法也适用于总经理及副总经理的任命，但第一届总理由苏方担任。三年后，这些职务将由另一方出任。公司的职员，一半为中国人，另一半为苏联人。这里同样实行岗位轮换制。协定的有效期为30年，协定由外长维辛斯基和大使王稼祥签字。^③

后来，中方提出了指责，说斯大林把这两个协定强加于中国，为的是单方面地从中获利。如前所述，在赫鲁晓夫时期解散这两个公司和废除同盟条约的秘密协定后，毛泽东说，他现在把斯大林曾强迫他吞下的苦果退还了回去。^④师哲说，这两个协定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47页及下页。

^② 《消息报》，1950年3月29日第2版；《人民日报》，1950年3月29日，第1版；《苏中关系 1917—1957年——文件汇编》1959年莫斯科版，第227页及下页。
同上。

库利克：《建立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952年（根据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载于《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8页，及资料来源的提示。

反映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①

赫鲁晓夫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斯大林同中国签订了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这是一个错误，这“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的一个侮辱”。过去，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这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但这也不是没有先例。斯大林同样在波兰、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也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赫鲁晓夫在别的地方还说，“我们在所有欧洲人民民主国家都组织过这样的合营公司”，例如，罗马尼亚就曾对此很恼火。在北京看来，建立这样的公司犹如对中国独立性的打击，是对其领土的侵犯。这种事既不应同中国，也不应同其他兄弟国家做。中国人虽然不满意，但他们没有作任何抗辩就接受了苏联的这一建议。^②

当时翻译协定文本的伍修权强调说，中方从这一合作中也得到了好处。当时中国在技术上没有能力开采这些地下矿藏。虽然苏方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但对中国也还是有利的。^③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陈述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建立合营公司是莫斯科建议的。这不对。我们已经谈到，从现在掌握的俄罗斯档案文件来看，建立合营公司的动议不是来自斯大林，而是中共领导。1950年1月初，彭德怀在一封给毛泽东并转给了斯大林的电报中竭力主张建立中苏合营公司，开采石油以及有色和稀有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6页。

此段参阅《赫鲁晓夫回忆》，载于《历史问题》1992年第11-12期，第68、75页。此文的英文译文与原文出入很大，几乎不能视为真正的译文，它见于 < Khrushchev Remembers > , P.463 ，以及 <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 , P.240 f.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48页。

金属。^①

同一天，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的一份电报，其中也同样建议，请求苏联领导同意在新疆建立合营公司，开采有色金属和石油。^②刘少奇还称，这是“此间同志的意见”，并认为这种企业不仅在新疆，不仅同苏联，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可以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来建立，如新疆同志所要求的那样。我们不知道，毛是否同意刘的意见。如同意，毛是否曾把这份电报或其内容转告了斯大林。如果转告了，斯大林一定坚决反对，因为如前所述^③，斯大林反对外国参与，并为此强迫中方签订了一项关于禁止外国人在新疆和满洲进行活动的秘密协定。

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在回答彭德怀的电报及同一天毛转给他的另外几份电报时，只对其他两个援助请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而没有提新疆及合营公司的问题。^④一个月以后，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一问题。^⑤他告诉米高扬和维辛斯基，中方拥有张治中当年同苏联讨论的关于开采石油和金属的协定草案。中方希望在此草案基础上重新在乌鲁木齐开始谈判。但由于新疆代表团已经来到莫斯科，谈判可以在莫斯科开始，然后在乌鲁木齐完成。合营公司的法定资本由双方各占一半。公司的管理办法将与中长铁路相同，即实行轮换制。拟议中的合营公司的存在期限应当比航空公司的存在期限更长些。在维辛斯基的这份报告中，没有表明

^① 1949年12月2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毛于1950年月2日把它转交了斯大林，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34，第2、7页，原件复制件，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31、36页；《彭德怀传》第390页。详见第四章第十三节。

此处和下一句参阅《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37页。

参阅第四章第十八节。

^④ 1950年1月6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34，第16页，引自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第39页。

^⑤ 此处和此段的余下部分参阅1950年2月3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44-45页。

苏方对此作出了什么反应。

如果中国人在建立这两个合营公司的问题上感到没有被公平对待，那并不是因为苏方强迫他们建立这两个公司，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接受协定中规定的某些义务，从而使他们在产品和利润的分配方面接受了对他们不利的条件。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两个合股公司的“全部产品都运到了苏联”^①，听起来还好像是无偿的出口。鉴于协定明确规定为共同受益，这种无偿出口的说法初看起来似乎缺乏说服力。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已获得的苏联关于谈判的档案文件中得知。从文件内容中可以看出，苏联有权用其股息购买一部分中方所拥有的石油和有色金属产品。显然中方是在一定的压力下才接受这一规定的，因为中国人肯定愿意把他们拥有的这部分产品拿到国际市场上换取他们所短缺的外汇。从上面援引的赫鲁晓夫论述中也可断定，在中国分得的产品中有很大部分被苏联买走了。

赫鲁晓夫也间接地证实了这一解释，他在论述中苏合营公司时确认：“我认为，把北朝鲜和中国开采和生产的、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全部原料和产品都拿到苏联来，这至少是一种愚蠢和背叛。当然，每个国家都需要有硬通货到资本主义市场上……中国也有这样的需求……但在这方面，斯大林是聋子，他不理解，也不愿理解，特别是在打败了希特勒之后。”^②显然，中苏在新疆建立合营公司之协定的秘密议定书中也禁止北京：未经苏联同意不得把开采的原料出售给第三国。这同样意味着是对中国的一种压制。^③

① <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Glasnost Tapes > P. 143.

② 《赫鲁晓夫回忆》载于《历史问题》1992年第11-12期，第75页。

如1992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苏联外交官所说。引自 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 125.

从我们已获得的苏联关于建立合营公司谈判的档案文件中，可以把建立合营公司的谈判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它们表明，中方至少在几个问题上全部或部分地实现了他们的要求。

这两个协定的第一份草案是在 1 月 22 日由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呈送给斯大林的。^① 它把要建立的两个合营公司取名为“苏中金属公司”和“苏中石油公司”。这一文本是在毛和周在莫斯科时递交给中方的，但递交的具体时间不详。接着苏方在周恩来的要求下，按“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的协定”的文本对两个草案作了修改。毛和周离开莫斯科后，参加谈判的中方人员为王稼祥、伍修权、新疆副主席赛福鼎和新疆中共领导人邓力群。苏方代表为米高扬、葛罗米柯和外交部的官员。2 月 27 日葛罗米柯敦促赛福鼎尽快对草案表态，以便能于 3 月 2 日签订协定。葛罗米柯还提醒说，周恩来也曾表示，希望在 3 月 2 日至 5 日期间签署剩下的协定。赛福鼎答应第二天给予答复，并表示中方将尽最大努力使协定尽快签署。^②

3 月 2 日，伍修权向葛罗米柯抱怨说，协定草案缺少一份应附有的地图。他同时也承认中方拖延了对草案的表态，并预计在 3 月 4 日前给予答复。葛罗米柯再次敦促加快进程。3 月 4 日，赛福鼎得到了索要的地图。他再次向葛罗米柯表示，中国的表态之所以推迟了是因为毛晚于原定时间，即 3 月 4 日至 5 日夜才到达北京。在此之前，人们也曾以为毛将从沈阳发来指示。四天后，葛罗米柯更加着急了，他指出“这样长时间地拖延答复，将

^① 此处和下句参阅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42-44 页。

^② 此段参阅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29-30 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43-44 页。

影响我们的 1950 年计划”。^①

3 月 10 日，王稼祥终于谈到了正题。在提出几个文字上的改动之后，他请求对有色金属开采的草案第 5 条作一些修改，在这一条中曾规定中方投入合营公司的建筑材料应为 35 万美元。王请求不要写 35 万美元这个具体的数字，因为投入的建筑材料价值可能比这要高，也可能要低。葛罗米柯拒绝了，当王坚持时，他又表示将对此问题进行审核。关于草案的第十四条，中方请求全部删去，这一条规定苏方用利息购买的商品应免征关税和其他税收。葛罗米柯拒绝了中方的这一请求，但他答应考虑王的另一个动议，即：苏联在新疆石油产品中所占有的那一部分只能卖给中国国营贸易组织。^②

3 月 15 日米高扬与王稼祥达成一致意见：苏联购买的占 50% 份额的有色金属产品将出口到苏联，并免征关税和其他税收；同时，苏联在新疆石油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可以卖给中国国营组织，或无税地出口到苏联。第二天，王稼祥要求对苏方从中国份额中购买的有色金属和石油产品征收中国的出口税。葛罗米柯拒绝了。当王稼祥坚持，并指出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曾有过这样指示，葛罗米柯则强调，这不符合 3 月 15 日同米高扬达成的协议。但到 3 月 18 日，葛罗米柯表示同意这一要求。接着，王稼祥又建议在两个协定的第八条增加一个规定，即“只有在中国当局批准的情况下”公司才能建设铁路和公路，以及架设输电电线。葛

此段参阅 1950 年 3 月 2 日葛罗米柯接见王稼祥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33-34；1950 年 3 月 4 日葛罗米柯接见赛福鼎，同上第 35、40 页；1950 年 3 月 8 日葛罗米柯接见王稼祥，同上第 40 页。

此段参阅 1950 年 3 月 10 日葛罗米柯接见王稼祥的谈话记录，同上，第 41-43 页。

罗米柯认为这没有必要，但于 3 月 18 日又表示赞同。^①

苏方满足了王稼祥提出的愿望，同意就这两个协定的签署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并在签字前公开中方的有关草案。这后一点于 3 月 23 日执行了。3 月 18 日王稼祥对葛罗米柯说，他不能保证如葛罗米柯所希望的那样，于两三天内签署这两个协定；他必须“把所有文本发往北京”。四天后，王稼祥通知葛罗米柯，文本可能于 3 月 25 日达到供签字的成熟程度，因此可以在 3 月 25 日或 27 日签字。最后，这两个协定于 3 月 27 日签字，签字人为维辛斯基和王稼祥。公报称，谈判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和本着相互充分理解的精神”进行的。但这不符合实际。中方没有考虑公布协定的全文。这可能表明，不仅是协定的贯彻有利于苏方，而且协定本身也包含了可能被中国舆论看做有损中国利益的规定。^②

不公布协定文本，这对中共领导来说是个好主意。显然，不公布已签订的秘密议定书更是如此。因为在 3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协定签署的消息后，在中国的爱国人士中就引起了抗议。刘少奇在第二天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就谈到了这一情况。指示中说，在北京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怀疑这两个协定是否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人“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并有人要求退团及向人民政府请愿。刘因此要求，这样的企业不能单独和苏联，也要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要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刘还接着说，就像苏联在 1921 年以后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曾做过的那样，把这种企

此段参阅 1950 年 3 月 16 日葛罗米柯接见王稼祥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44-46 页；1950 年 3 月 18 日葛罗米柯接见王稼祥的谈话记录，同上，第 47 页。

此段参阅 1950 年 3 月 16、18、22 和 23 日葛罗米柯接见王稼祥的谈话记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45、48、50、55-56 页。公报发表在《消息报》，1950 年 3 月 29 日第 2 版；《人民日报》第 1 版；（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1959 年莫斯科版第 227 页及下页。

业租让给资本主义国家。关于这些，中央准备作出适当的解释发表。^①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两个月前就向毛泽东建议，也让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来开采中国的有色金属和石油。^②为此，斯大林于 2 月 14 日强迫中方接受关于禁止外国人到新疆和东北活动的秘密协定。因为刘少奇知道这个协定，因此他的这一要求只涉及上述两个地区以外的地方。看来，刘少奇 3 月 30 日起草的文件没有作为党的指示下发，或者虽已作为指示下发，但实际没有执行。因为据已提到的俄罗斯文献材料称，直至 1978 年没有一家外国企业在中国从事这样的活动。^③

关于这两个公司在建立后的实际运行情况，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知道，它们与另外两个公司于 1955 年 1 月 1 日被撤消了。显然，赫鲁晓夫在 1954 年秋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时推动了这一进程。有关撤消的消息发表于 1954 年 10 月 12 日的联合公报。^④公报并说，鉴于苏联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先进经验，这两公司的建立扩大了相关的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并在中国的经济重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商定，苏联在公司中的股份将移交给中国，并在数年内通过商品供应来偿还。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对这一进程作了如下的评论：“斯大林死后，我们清算了所有这样的公司。建立合营公司不仅伤害民族尊严，而且也侵犯别国的物质资源。”^⑤

此段参阅 1950 年 3 月 30 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246 页。

详见本节的前一部分。

库利克：《建立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952 年（根据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载于《远东问题》1994 年第 6 期第 77 页及下页。

公报的文本见《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第 303 页。

^⑤ 《赫鲁晓夫回忆》载于《历史问题》1992 年第 11—12 期，第 75 页。

3、1950 年 3 月 27 日签订的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

显然，在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之协定的谈判中，出现的麻烦是比较少的。早在 1949 年 7 月初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表示：希望建立中苏航空公司和开辟从苏联经哈尔滨和沈阳至大连、从沈阳至北京、以及从北京经乌兰巴托至苏联的航线。^① 12 月，毛泽东向斯大林和科瓦廖夫表示，希望建立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航线，以及签订一项航空协定。^② 此外，苏联派阿夫塞维奇将军来到中国，“以准备具体措施”。^③

协定文本至今未公开。据当时发表的新闻报道称，这一公司是建立在权利对等和盈利均分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是促进“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当时规定建立 3 条航线：北京 - 赤塔、北京 - 伊尔库斯克和北京 - 阿拉木图。像新疆原料开采公司一样，^④ 企业的领导职务实行轮换制。头两年的行政管理领导人由中国人担任，副手为苏联人。反过来，总经理先由苏联人担任。各领导职务每两年轮换一次，由另一方担任。关于公司的职员，只规定必须由中国人或苏联人担任，但没有像新疆原料开采公司那样规定对等原则和轮换制。之所以有不同，这可能是出于技术素质的原因，苏联人必须占多数，在大部分情况下不得由中国人替代。与新疆公司不同的

^① 1949 年 7 月 6 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45，目录 1，案卷 328，第 54 页，原件复制件，引自列多夫斯基：《刘少奇……》第 47 页，参阅第三章第八节。

^② 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谈话，见第四章第三节；1949 年 12 月 20 日毛泽东与科瓦廖夫的谈话，见第四章第六节。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7 页。

详见本节的上一部分。

是，这一协定的有效期为 10 年（新疆公司为 30 年），该协定由维辛斯基外长和王稼祥大使签署。^①

该协定的第一稿于 1 月 22 日由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签署送交斯大林（它至今没有公开）。^② 四天后，谈判开始。葛罗米柯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工作会议。刘曾于 1949 年 8 月在莫斯科同国防部长瓦西列夫斯基讨论建设中国空军的问题。^③ 1 月 26 日，苏方递交了第一份称之为“工作文件”的草案，它还没有经过苏联政府和维辛斯基的批准。这个文件是以阿夫塞维奇将军的报告为基础的。周恩来对该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苏方最后在周的意见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谈判双方一致同意建立 3 条航线，其中一条经过蒙古人民共和国。^④

2 月 5 日，在葛罗米柯和刘亚楼之间发生了紧张而又棘手的对话。情况是这样的：苏方原不认为有必要，在协定签字前，请求蒙古政府同意飞越其领土。刘却认为，在协定签字前问一问蒙古人是“合适的”。我们很难说，刘这样提出问题究竟是真的尊重蒙古的主权，还是为了使葛罗米柯处于尴尬境地。但是，这揭露了一个事实：蒙古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苏联的一个保护国。这确实使葛罗米柯陷入了尴尬境地。这样做的动机也是清楚的，这反映了对斯大林不愿同中国同志讨论外蒙古问题的一种怨恨。^⑤

中国的资本投入为 375 万美元。在中国将有 14 个机场提供

此段参阅《消息报》，1950年4月2日，第2版；《人民日报》，1950年4月2日，第1版；《苏中关系 1917-1957年——文件汇编》第228页及下页。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42-44 页。

详见第三章第八节。

此段参阅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6-7、9 页。在苏联档案中，中国将军的名字被误写为“Liu Yaolou”，见同上第 6-9 页。

同上。

给公司使用。出现分歧的问题是：谁负责这些机场的维修，是公司还是两国政府。另一个问题是：只是公司的利润上税，还是包括流动资产。刘指出，当时在中国还有私营航空公司，其中一个公司，美国资本占 25%。如果新成立的中苏合营公司比别的公司纳税明显偏低，那么，“参加政府的民主人士、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人就要因为我们作出很大的让步而大吵大闹。实际上，现有的草案使公司免除了纳税，因为这只涉及利润部分。因此，刘说，如国民党时期那样，按流动资产而不是按利润纳税，将更好些。葛罗米柯反驳说，国际上通常是名义上高征税，实际上只收 15% - 20% 的税。因此，苏方建议按最高限额 20% 征税。最后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我们不得而知。^①

中方在主权问题上是很敏感的，例如刘要求，公司购买不动产、企业等必须先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刘补充说，这之所以必要，也是“为了不给其他外国公司提供先例”。葛罗米柯认为作这样的处理没有问题。^②

在涉及协定何时能签字的问题上，中方出现了明显缺乏协调的荒唐情况。2月11日，周恩来通知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说，他认为对现有航空协定的文本已取得一致意见。^③两天后，周和王出人意料地提出，中方还没有准备好该协定的文件，因此不能按预订的2月14日签字。^④同一天，葛罗米柯和刘亚楼确认，人们已就文件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意见。^⑤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刘最

此段参阅 1950年2月8日会谈纪要，同上，第10-11页。

同上，第15页。

^③ 1950年2月12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信，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50页。

^④ 1950年2月13日周恩来与维辛斯基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卷宗302，案卷8，第18页；1950年2月13日维辛斯基与王稼祥的谈话，同上，第17页。

此处和下句参阅1950年2月14日葛罗米柯与刘亚楼的谈话，同上，第20-21页。

后通知葛罗米柯：周恩来已向维辛斯基表示，他认为该协定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在北京签字更为适宜。

不久，中方不愿签字的原因清楚了。这里涉及的仍然是主权和民族尊严问题。刘要求把协定中的中国城市名称按中文的称谓来写，而不是按现有的国际称谓来写。因此中国人要求用沈阳代替“Mukden”，用张家口代替“Kalgan”，用伊宁代替“Kulja”，用迪化代替“Urumchi”。此外，在协定的中文文本中，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词的后面加上一个括号，其中写入中国的旧称谓：库伦。这可能是又一个证据，说明北京对失去外蒙古并不甘心，并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向苏方发出信号。葛罗米柯对中方的修改要求表示同意，“因为这是中国官方的称谓”。刘亚楼接着告诉葛罗米柯，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他于最近几天在莫斯科签署协定，并商定在毛到达北京后的一两天内发表“协定或关于协定的公报”。刘问，协定是否全文发表？葛罗米柯答应以后给予答复。刘最后称，他将努力在两天内使协定的中文文本达到可供签字的成熟程度。^①

这里可以看出，直到 2 月 18 日人们还在讨论是否全文发表协定，或是只发表一项关于协定的公报。就建立新疆合营公司的情况看，中方是反对公布协定全文的，只愿向公众发表一项有关的公报。^② 在航空协定问题上，他们认为两种发布方式都可以。这说明，在这协定中没有中共领导害怕向公众公开的东西。

2 月 21 日，中方违背诺言，没有提交可供签字的协定文本，但他们却敦促尽快签字。^③ 到了 3 月 18 日，刘亚楼依然没有提交最后的文本，并且对苏方提出的 3 月 21 日签字的愿望也没有表

此段参阅 1950 年 2 月 18 日葛罗米柯与刘亚楼的谈话，同上，第 22-23 页。

^② 此处和下句参阅 1950 年 3 月 16 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谈话，同上，第 45 页。

^③ 1950 年 2 月 21 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谈话，同上，第 24 页。

示认可。后来，毛泽东对苏联驻北京代办承认，在他与王稼祥的联系方面出现了拖延，并对此表示歉意。^①当苏联代办再次催促并同时指出，这一拖延将打乱苏联 1950 年的计划时，毛泽东玩笑地说，维辛斯基同志可以放心，“苏联工业的五年计划是会圆满完成的”。此时，葛罗米柯建议先发表一项关于在新疆建立两个开采原料的合营公司的公报，过两三天后再发表关于建立民用航空公司的公报。他没有说明为什么需要有这一时间差。后来的发展也确实如此。这三个协定虽然于 3 月 27 日一起签订，但关于签订前两个协定的报道（不是公报）发表于 3 月 29 日，关于建立民用航空公司的协定则到 4 月 2 日才予以报道。^②

4、1950 年 4 月 19 日签订的贸易协定、货物交换议定书和其他经济协议

1950 年 4 月 19 日签订的贸易协定和货物交换议定书也属于当时不公开的协议。在一则有关的新闻报道中，只用了 4 句话报道了该协定和议定书的签订。关于交换的商品种类，报道中只是说，苏联供应设备，中国供应原材料。^③

该贸易协定的前身就是 1949 年 7 月 30 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在党的一级谈判基础上签订的“苏联和满洲之间的商品交换协定”。当时，苏联报刊曾对此事作过一简单的报道^④，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一报道只是为了使刘少奇率领的党的代表团所进行的

^① 此处和下句参阅 1950 年 3 月 9 日苏联驻华代办谢巴叶夫与毛泽东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 案卷 10，第 84 页。

^② 此段参阅 1950 年 3 月 18 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谈话，同上，第 47-48 页；《消息报》，1950 年 3 月 29 日，1950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1950 年 3 月 29 日，1950 年 4 月 2 日；《苏中关系 1917-1957 年——文件汇编》第 223 页及下页、228 页及下页。

^③ 《消息报》，1950 年 4 月 21 日，第 3 版。

^④ 《真理报》，1949 年 7 月 31 日。

秘密访问变得“合法化”。从实际内容看，这是一项贷款协定。苏联承担义务，向中国提供 3 亿美元的商品贷款。当时，该协定在内部称为“苏中贸易条约”。^①

关于 4 月 19 日签订的贸易协定的谈判，最初是在周恩来、米高扬和维辛斯基之间进行的。毛和周离开莫斯科后，中方由贸易部长叶季壮负责领导谈判。参加第二阶段谈判的还有李富春、外贸部长缅什柯夫和新任命的苏联顾问团领导人阿尔希波夫（他是科瓦廖夫总顾问的接班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于 1 月 22 日就向斯大林报送了一份“关于商品交换和支付协定”的草案。它在第二天以“贸易协定”的名称交给了中方。2 月 2 日，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在以后的几天里讨论这一贸易协定，并完成基本机构的商定，其余问题，如供应量 and 价格等问题，则由贸易部长叶季壮继续商谈。周并问，是否有可能在今后的四、五天内完成关于条约和基本结构的谈判？米高扬回答说，这不仅取决于苏方，也取决于中方。^②

2 月 11 日，米高扬同周恩来谈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的问题是苏方不能完全按北京提出的日期供应定购的商品，原因之一就是如毛泽东曾承认的那样，中方不能即时提出完整的订单。另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定价方面的分歧。米高扬解释说，将对中方的订单进行审核。中方希望在 1950 年就提供像轧钢机、汽轮机这样的设备，而这些设备需要提前一年半制订计划和生产。交货时间将仔细核定。几天后苏方再通知中方，哪些设备和什么时候可以供货。维辛斯基说，中方显然没有充分掌握价格情报。某些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不相符合。苏联外贸部拥有世界市场价

详见第三章第八节。

此段参阅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26 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42 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45-46 页。

格的完整资料，并可向中方提供。^①

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曾敦促说，苏方必须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因为苏方没有备用的设备，工业订货必须一年前预先提出。^②毛回答，对中国来说，编制设备订单有些困难，因为人们对工业状况不十分清楚。1950年1月22日毛问，是否可以把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的供货期限由5年缩短为3-4年？斯大林没有给予直接的回答，而再次强调“中国必须尽快提出工业设备订货的清单”。^③越早提出清单，对事业越有利。

中方根据1949年8月30日贷款协定提出的订单，被列入了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9月19日、11月4日、12月3日和19日以及1950年1月7日关于向中国供货（包括军事物资）的决议。决议中规定的供货总额为3130万美元。其中，850万美元（钢轨和铁路设施）通过贷款支付。^④迄今我们只掌握这些决议中的两项。9月19日的决议规定提供价值2650万美元的飞机和炮兵武器，11月4日的决议规定提供价值630万美元的钢轨。^⑤

显然，毛泽东在斯大林1月22日的敦促下向中国有关人员施加了压力。几天后，完整的中方订单发到了莫斯科。因此，苏联外贸部于2月12日向苏共领导报上了一份1950年向中国供应的商品清单，以及一份中国同期向苏联供货的清单。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单主要包括工业设备和工业制成品，其中有冶炼厂、电力

维辛斯基为斯大林所作的关于1950年2月11日会议的记录，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369，第49页。

^② 此处和下句参阅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13页。

^③ 同上第36页。

^④ 参阅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7，第2、24页

^⑤ 参阅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6，第32、126页，引自库利克：《建立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年（根据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载于《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5页。

厂、轧钢厂、机器制造厂，以及采煤设备、合金制品、钢材、钢管、有色金属制品、铁路设施、卡车、农业机器、燃料、润滑油及纤维素等。并非所有商品都按中方要求的数量供应了，例如；无缝钢管，订单为 6630 吨，实际供货为 2000 吨；钢材，订货为 8456 吨，实际供货为 3000 吨。也不是中国的所有订货都由苏联用自己的产品来供应，如 7400 吨润滑油则从罗马尼亚挂账进口。^① 中国供应的商品主要为原料和农产品，如钨、锑、锌、煤炭、盐、茶叶、大豆、玉米、高粱、肉制品、植物油、羊毛、鸭绒、皮革、裘皮和生丝等。^②

可以认为，争吵主要发生在世界市场价格上，而它又导致贸易协定未能与同盟条约及其他重要协定一起于 2 月 14 日签订。这一点可以从周恩来与米高扬和维辛斯基 2 月 11 日的谈话中看出。周当时说：“如果订单的审核拖延时间，似可以只签订贸易协定，而把订单和价格的审核问题留给外贸部长们和其他专家解决。”^③ 米高扬回答说，这个问题“请中方考虑决定”。

两天后，谈判陷入僵局，以致周恩来没有再回到 2 月 11 日的建议，而确认该协定已经不能签字了，因为协定条文“需要做某些修改和商榷”。^④ 可以认为，米高扬很可能在此期间向中方提供了 2 月 11 日承诺的、苏方按世界市场价格对中国商品审核的结果。苏联外贸部在审阅了双方货单之后，于 2 月 12 日提出了一个内部的估价：苏联商品（包括 1949 年和 1950 年初已供应

参阅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7，第 126 页。

同上，第 1-120 页。1950 年 2 月 13 日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把同样一份清单提交斯大林。同上，第 121-180 页。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0）简介》第 47、49 页及下页。

^③ 此处和下句参阅维辛斯基为斯大林所作的关于 1950 年 2 月 11 日会议的记录，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案卷 369，第 49-50 页。

^④ 1950 年 2 月 13 日维辛斯基与周恩来的谈话，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100，目录 43，卷宗 302，案卷 8，第 18 页。

的价值 3, 130 万美元的商品) 总价值为 1.317 亿美元; 中国商品“约 1.508 亿美元”。北京计算出的数字为: 中国商品的价值为 1.949 亿美元。根据苏联的计算, 中国商品的价值比中方估计的数字低 4400 万美元。这一差额约占 23%。这是中方当初所不愿接受的。^①

毛泽东和周恩来启程后, 谈判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 因为至今得不到这方面的谈话记录。但从苏联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出, 苏方在 2 月底把他们的商品价值从原先的 1.31 亿美元上压了一些下来, 但仍坚持对中国商品的原估价 (1.5 亿美元)。考虑到苏联 3 亿美元的贷款分配到 1950 年的份额为 6000 万美元, 人们根据这一算法可以要求苏联供应 2.1 亿美元的商品, 而苏联已经供应的和承诺要供应的商品只有 1.31 亿美元。因此, 苏方提出了一个向中国供货的补充货单, 总价值为 7100 万美元。其意图就是“抵偿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并确保第一年贷款金额在账面上的实现”^②。这里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会得出这一数字, 而差额应是 7900 万美元。在补充货单的第一部分中, 列入的是中国人预订的、而在原供货单中没有满足其数量要求的商品。现在, 这些商品将按中方要求的数量供应。在补充货单的第二部分中, 列入的是苏方已承诺按中方要求数量供应、但又主动增加供应量的商品, 以及北京至今没有预订的商品。^③

至于双方在中国商品的估价问题上出现的分歧是如何解决的, 从我们现有的档案文件中还不能得出答案。但从参加谈判的伍修权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 中方鉴于虚弱的地位而不得不作出了让步。伍修权把商品按世界市场价格计算的争吵描绘成是

参阅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全宗 07, 目录 23A, 卷宗 18, 案卷 237, 第 1-2、241 页。

② 同上, 第 242 页。

③ 同上, 第 241-249 页。

涉及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问题，它似乎应按商品的一揽子比较来确定。伍修权说，“但苏联在这里要占我们的便宜，他们把卢布算得很高，而把我们人民币的价格压得相当的低。”起初，中方不让步，这就出现了争论，会谈陷入了死胡同。但因为中国对莫斯科有许多要求，在这里展开争吵是不利的。人们请示北京，并得到批准，作出让步，因此最后达成妥协。诚然，比值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①

在这场按世界市场价格估价商品的争吵中，究竟哪一方是正确的？本作者自认为不具备作出判断的能力。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问题相关，可以对 2 月 13 日报给斯大林的苏联贸易协定草案同 4 月 19 日签署的最终文本作一比较。^②在草案的第三条中称，交换商品的价格将“在世界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按美元”计算。但在最终文本中，则改为“按卢布”计算。可以认为，这一改动是中国人要求的结果，类似于“关于苏联专家劳动条件的协定”，苏方最初要求按美元支付，中方力争并最终实现了按卢布支付。^③在贸易协定中关于处理支付结算差额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从以美元为基础（苏联草案第六条第二段）到以卢布为基础（最终文本第七条第二段）的改变。当时美元与卢布的比价一般为 1 比 4。除了外汇问题外，苏联的草案与最终文本没有什么不同。

在经济谈判中，卢布与元的比价是如何解决的，现在不得而知。但上面已经提到，中国人对这一比价是不满意的。^④一项可

此段参阅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6 页及下页；伍修权：《在外交部的八年》，1987 年北京版，第 23 页及下页。

^② 1950 年 2 月 13 日苏方草案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7，第 181-183 页 该协定的官方文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47-49 页

详见本节上一部分。

^④ 详见本节上一部分。

靠的研究表明，从 1950 年 4 月贸易协定签订开始直至 1957 年年底，实际执行的比价为“1 比 1，或 1.03 卢布比 1 元”。^① 这两位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卢布因此增值了，中国人因急需借苏联的帮助，建设自己的工业，而容忍了这一状况。

2 月初，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中国的海军和空军购买苏联有关物资。1950 年中国拥有 6000 万美元的贷款，其中有 2000 万尚未使用，这可用来满足海军和空军的需要。当时，中共领导曾一致认为，大部分的苏联贷款应用于东北，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对全国来说更为重要。^②

1951 年 2 月 3 日，双方同意把贸易条约延长至 1951 年年底。从 1952 年开始，每年签订一次商品交换的议定书，它以 1950 年 4 月 19 日的贸易条约为基础，并以此种方式延长条约的有效性。^③

同贸易协定一起签字的是一项工业商品交换的议定书，它附有 3 份商品清单。^④ 清单 1 列入的是苏联供应的商品，清单 2 列入的是中国供应的商品，清单 3 列入的是苏联将在 1952 年和 1953 年供应的工业设备。此外，双方还签订了内容广泛的、秘密的《中苏对外贸易组织交货共同条件议定书》，其中规定了交货条件、质量检验、商品质量低劣的申述程序等。^⑤ 显然，还签

^① Kang Chao and Feng Hwa Mah: < A Study of the Rouble - Yuan Exchange Rate > in: TCQ. February - March, 1964, P.193.

此段参阅 1950 年 3 月 2 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的给李富春、王稼祥和刘亚楼的电报；1950 年 3 月 3 日周恩来在沈阳中共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两者均引自《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26 页。

此段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50 页及下页。

关于这一议定书当时只作了简单报道。见：《消息报》，1950 年 4 月 21 日；《人民日报》，1950 年 4 月 21 日；《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第 229 页。议定书文本于 1957 年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50 页及下页，但没有附商品清单。

^⑤ 该议定书于 1957 年发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51 - 59 页。

订了秘密的商品过境问题的议定书。^①其中，苏联向中国保证中国商品不仅可以通过苏联领土，而且可以通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东德的领土，自由过境。反过来，中共保证苏联商品不仅通过中国，而且通过北朝鲜的领土，自由过境。这里明显涉及的是加重第三国负担的条约，这表明东欧卫星国对莫斯科，以及北朝鲜对中国的有限主权。同时，这也反映了苏中之间的分工。早在 1949 年夏，斯大林和刘少奇就已讨论过莫斯科和北京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分工。

1949 年 8 月 30 日和 1950 年 2 月 14 日签订的贷款协定、1950 年 4 月 19 日签订的贸易协定及其他经济协定，导致了两国间商品交换的迅速增长。1948 年苏联在中国的出口总额只占第 9 位，1949 年升为第 3 位，并于 1950 年底跃居第 1 位。苏联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份额由 1949 年的 5% 左右（第 5 位），上升到 1950 年头 9 个月的 20%（第 2 位）。^②

随着 1950 年 4 月 19 日贸易条约和上述其他经济协议的签订，整个条约的签订工作宣告完成。李富春、伍修权和其他参加经济谈判的中方人员于 4 月回国。贸易部长叶季壮及其几个陪同人员继续留在莫斯科，直至 5 月才回国。^③

第二十二节 关于秘密情报合作协定的准备

在 1 月或 2 月，斯大林、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讨论了秘密情报

作者只获得了一份苏联的草案。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7，第 184 页。

此段参阅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0）简介》第 52 页。

^③ 此段参阅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9 页。

工作的合作问题，肯定了 1949 年夏斯大林与刘少奇在原则上达成的一致意见，并使之进一步具体化。^①

据毛一年后称，他曾同斯大林达成一致意见，“苏联将不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搞情报，自然也包括中国，但还是搞了”。^②毛还借此机会指责罗申大使招募了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工作人员，为他提供情报，而不告诉周恩来。毛还认为，这件事莫洛托夫是知道的。^③

此外，斯大林与毛泽东于 1950 年 1 月、2 月间再次就情报合作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谈到了一些细节。斯大林指出，苏联在这方面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中国在这方面却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你们比较不受人们的注意和阻碍”。显然，斯大林在这里指的是华侨。他强调了这项工作对苏联的重要性，并表示在技术和资金方面莫斯科负责提供，情报资料双方共享。

毛和周对此表示同意，并商定由专家们进一步商讨具体问题，并把结果写入一项协定草案。关于这个协定的签订时间和具体情况，至今不得而知。

参阅第三章第八节。

^② 此处和以下两句参阅 1957 年 10 月 29 日毛泽东与尤金大使的谈话（尤金 1957 年 10 月 30 日所作记录）；1957 年 10 月 30 日尤金给赫鲁晓夫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5 案卷 589，第 173 - 179 页，载于 < Istocnik > . 4, 1996, P.110 - 114，上述引文见第 112 页。

此段和以下两段参阅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209 页及下页；Goncharov/Lewis/Xue: < Uncertain Partners, P.127。

第五章 结束语和展望

1950年2月14日苏联同共产党中国的联盟条约签订了，这标志着苏中同盟的诞生，这是20世纪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50年代，这一同盟构成了西方安全构想中的一个基本考虑因素。同样，它也是影响50年代和60年代以冲突为标志的中苏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以及80年代初开始恢复关系的一个基本考虑因素。自1996年春以来，俄罗斯联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发展将能走多远，是今日西方大国关注的问题。鉴于这两个演员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多变关系无疑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初看起来，1950年中苏同盟的诞生似乎是一个必然的发展结果，因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都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它们的领导人都信奉同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今天人们可以认为，莫斯科-北京轴心的产生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因为除了意识形态这个基本因素外，在1950年以前，双方之间不断出现分歧，而它们渊源于双方不同的现实政治利益。夸张一点说，这个同盟是在冲突不断发生的情况下产生的。

中共在20年代是一个依附于共产国际指示的支部。到1950年，它发展为与苏联享有几乎平等权利的联盟伙伴。这一历程是艰难的。50年代中，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谈话时，指责了斯大

林的对华政策。他说斯大林有三个严重损害同中国共产党人关系的罪责：他支持了王明；他在 1945 年曾阻止中国革命；以及他不友善地对待毛在莫斯科的访问。在第二问题上，毛泽东似乎可以更加有理由和更加明确地指责斯大林，指责他从一开始就把中共的主要敌人国民党看做是苏联的主要合作伙伴。

出现这一情况的背景是苏联对外政策在这些年里逐步发生了变化。20 年代上半叶，苏联的对外政策遵循的是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的路线，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俄罗斯民族利益为主的方针。在这方面，安全政策曾在初期起主导作用，后来则是扩张动机占了上风。在中国问题上，新路线从 1919 年开始逐步显露。当时，莫斯科收回了原先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自 1922 年起掌管对华政策的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最强大的和进步的力量，它有能力战胜反动的军阀，统一中国，有可能排除所有苏联以外的外国影响。但它也将违反其本意地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作了准备。

1922 年苏联领导通过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建立联盟，以便逐步分化瓦解国民党。这时，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出现。此时，莫斯科向国民党提供武器，而中国同志却一无所得。1927 年，国共联盟的崩溃和苏联的城市武装起义战略的失败，导致了毛泽东和朱德退回江西、湖南山区，他们在那里开始设计新的战略。他们反对同国民党合作，并预见革命将从农村开始，然后向城市发展。毛和朱不听苏联的指示，在山区建立和发展苏区。莫斯科对这种战略持怀疑态度。显然，莫斯科对毛在 1935 年初取得党内领导地位也有疑虑。但当时莫斯科的手臂没有那么长，无法对这一发展施加影响。一直到 1938 年下半年，偏爱王明的斯大林才不得不容忍毛的领导地位。此时，毛开始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以此表明，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要走独立于莫斯科的道路。1941 年秋，毛泽东

成功地清除了王明和其他忠于莫斯科的党内反对派。这些事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解放过程。它导致：莫斯科从此再也不能完全左右中国兄弟党了。

中日战争期间，斯大林把国民党看做是主要伙伴。他考虑的首先是在军事上把日本困在中国，并以此来阻止日本向苏联发起进攻。为了把中国的抗日力量集合起来，他敦促国民党和共产党重新走到一起。但在这方面他仍然把国民党看做是远比共产党强大得多的力量，并给它以大量的武器援助。他对中国同志提出的军事援助请求，不是拒绝，就是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另一方面，他也给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它不采取反对共产党的行动。

1944 年夏至 1945 年 3 月，中共领导积极开展同美国的调情，目的是想获得美国的武器，并在华盛顿和重庆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但这只是一种策略行为，而不是战略的转变。但这一行动显然没有同莫斯科进行过协调，它标志着中共独立外交政策的开始。

在此期间，美国和英国为减轻西方国家在亚洲的负担，要求斯大林参与对日战争。斯大林认为，扩大苏联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的大好时机来了。他的目标是重新建立 1904 年沙俄帝国的东部边界，恢复沙俄帝国在满洲的特权。他背着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于 1945 年 2 月 11 日在雅尔塔同罗斯福和邱吉尔达成交易。作为对他参与对日战争的回报，他将收回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美英承认外蒙的现状及苏联在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的“优越权利”。这一协定意味着 华盛顿和伦敦承认外蒙和满洲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也必须为此承担义务：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政府，保障中国对满洲的主权。

在华盛顿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同莫斯科签订了同盟条约和若干协定，从而以条约和协定的形式把苏联在雅尔塔取得的各项权利确定了下来。国民党政府感到特别沉重的是，在作了顽强的抵抗之后，仍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外蒙。同

样感到是一种耻辱的是：在秘密议定书中规定驻旅顺苏军拥有自己的特别法庭。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治外法权的新版，而华盛顿和伦敦在两年前已放弃了这种特权。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条约也是一剂苦药，不仅是因为苏联承认和支持国民政府，而且也因为外蒙因此而丢失，以及苏联在满洲保持了特权。

按照协议，苏军于 1945 年 8 月进入满洲。它在日本投降后仍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占领了整个满洲。斯大林以此种方式抓住了机会，为实现其在满洲的要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后来他又以撤军作为交换条件，迫使美军从华北撤出。当时，毛泽东把苏联的进军看做是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开始的信号，他将在苏军支持下把这一革命引向胜利。但是，使他震惊的是，斯大林居然劝他不要这样做，而建议他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感到这是对其革命的背叛。但他们在莫斯科的压力下顺从了，因为没有苏联的支持，他们感到势力单薄。

由此可以认为，斯大林在进军满洲之时就已确定，要把满洲变成苏联与中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国，而莫斯科在那里拥有基本的发言权。显然，他当时认为，同共产党人打交道将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根据 8 月 14 日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他要把满洲交给国民政府。为克服这两难境地，斯大林不得不玩弄复杂的两面派手法。1945 年 9 月，他同延安商定采取这样一种战略：苏军表演性地把某些城市的管理权交给国民党政府，但同时帮助共产党人尽可能隐蔽地占领内地。这一计划果真开始付诸实施。1946 年 5 月初，苏军开始撤离，东北大部分地区落入中国共产党人之手，而国民党军队基本上只控制北平至长春和沈阳的铁路沿线的走廊地带。

虽然国民党军队在停战结束后至 1946 年年底几乎占领了东北的所有城市，但从 1947 年春开始，共产党的军队（在此期间称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到 1948 年 11 月控制了整

个东北。它接着向南推进，1949年1月底开进了北平，4月份渡过了长江，4月底占领了南京，5月中解放了上海。

中国共产党的势不可挡的胜利进军却使斯大林陷入了另一个新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自1947年起受到毛泽东的敦促，要改变战略合作的方向，并要在莫斯科接待毛，以便商谈武器、弹药和民用物资的供应问题。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在继续支持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国中只能指望在意识形态上相联系的苏联成为它的同盟者。而苏联出于革命同情的原因也有义务帮助共产党中国。

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同过去一样仍受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同盟条约的牵制，他有义务同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并把所有的援助给国民党政府。他同时也非常想继续保持这些条约和协定的有效性，因为它们是苏联吞并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以及把外蒙和满洲纳入其势力范围的法律基础。此外，他也担心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将使他深深卷入中国的内战。而这很可能导致同美国发生武装冲突，进一步加剧因冷战的扩大而趋于尖锐的对美关系。斯大林还担心，美国因受中国共产党人胜利进军的刺激，而实行有利于国民党的军事干预。

40年代下半叶的苏联的对华政策，就是避免出现美国实行偏袒国民党的军事干预。在这里，斯大林考虑得更多的是苏联的利益，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美国对华干预将迫使苏联作出选择，要么站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边进行干预，从而承担同美国直接对抗的风险，要么，不这样做，而在世界公众面前，至少从国际共产主义的角度看，扮演一个对其中国同志的生死存亡无动于衷的角色。斯大林无论如何不愿在这样两种形势中作选择。因此他对毛泽东实行这样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避免使苏联卷入中国的内战，并教导毛实行一种灵活的政策，不给华盛顿提供任何军事干涉的借口。斯大林的这一策略一直持续到1949年。

类似 1945 年、1946 年在满洲所做的那样，斯大林先实行一种见风使舵的政策。他一方面以变化无常的各种借口推迟“游击队领袖”毛泽东不断要求的对苏访问（斯大林在 1949 年 1 月初的一次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就是这样称呼毛泽东的），并指示苏联驻南京大使于 1949 年 1 月初随国民党政府逃往广州。他不惜忍受中共领导因这两件事而引起的愤怒。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共产党人即将取得内战的胜利，而必须在这个时刻为未来的关系同中共领导加紧协调。1949 年初，斯大林已开始悄悄地调整其对国民党的政策。在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地区，苏联的代表机构表面上关了门，但都秘密地同新的共产党当局保持密切的接触。在东北，苏联同中共的合作是公开的，并以此对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施加压力，力图把它们挤出这个地区。

鉴于同西方的关系的日益紧张，斯大林为加强其实力地位开始要把取得最后胜利的共产党中国变成苏联的同盟者。当 1949 年 4 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时，这个想法就变得更为重要了。当时，担心被包围的恐惧又重新出现了，同中国结盟已成为战略上日益重要的因素，它将减轻苏联在东亚的压力。

1949 年初，斯大林派其亲信米高扬去西柏坡，进行第一次高峰会晤。夏天，他在莫斯科接待了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进行了秘密会谈。这是苏联同共产党中国实行战略合作的转折点。此时，中共领导虽然把触角也伸向了美国和英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原则决定有所变化，他们在原则上已确定要同苏联结成同盟。对这种试探行为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后，人们就可以看出，这只不过是一种巧妙的策略，目的是在华盛顿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制造麻烦，以阻止美国进行偏袒国民党的军事干涉。就此而言，在美国出现的一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把当时在这种策略下出现的形势看做是改善美中关系的一次“错过了的机会”。除上述因素外，当时在中国方面出现的世界革命热情和美国方面对法治

等民主价值的坚定信念，都给恢复邦交造成了障碍。

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承诺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双方商定，这些协议将等到新政府成立后，毛泽东访苏时才公开。虽然中方在西柏坡和莫斯科会晤时已放弃了收回外蒙的要求，但双方对苏联在东北的特权问题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首先表现在 1949 年、1950 年毛泽东访苏之时。后来，斯大林屈服于毛泽东的压力，放弃了他对雅尔塔协定的顾虑，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了同盟条约，取代了 1945 年同国民党政府缔结的条约，并在一项附属的协定中宣布：苏联对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口的特权将最迟不超过 1952 年全部放弃（它原定要持续到 1975 年）；对大连的管辖则立即移交给中国。斯大林之所以改变了主意，这主要是因为他看到美国防御政策在 1949 年至 1950 年之交发生了变化，从而确信华盛顿已不得不容忍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以及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盟。因此，斯大林相信，美国和英国将不会就雅尔塔协定制造困难。

如果把 1945 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的谈判与 1949 年、1950 年共产党政府同苏联的谈判进行比较，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大的共同之处。^① 在谈判中，中国的这两个党都力求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外蒙问题是恢复主权和领土完整）。两者都认为苏联在东北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两位主要谈判人，国民党外长王世杰和共产党总理周恩来，都把苏军进入东北后苏联在大连的地位比作英国在香港的地位。^② 有争议的首先是关于外蒙的法律地位和苏联在东北的特权。至今还得不到证明的是，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中国清代、民国时期和共产党时期的革命动力。关于这一问题，参阅 Jonathan Unger (ed.): < Chinese Nationalism > Ammonk/London, 1996 ;特别是 James Townsend: < Chinese Nationalism > , 见：同上，第 1 - 30 页。

有关论据参阅 Brian Joseph Murray: <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Soviet -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 - 1950 > Ph. D. Dissertation,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nn Arbor, Mich. 1995, P.137 f.

为什么毛泽东在西柏坡第一次遭到斯大林坚决拒绝后就立即放弃了，而宋子文在 1945 年却坚持到最后才屈服。可以认为，当时毛泽东一方面感到斯大林的顽固态度，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权。为了实现其他的愿望，他不愿冒险。

如果说过去人们曾认为，无论是米高扬在西柏坡的会谈或是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会谈，主要讨论的是关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世界革命问题，那么，在拥有了会谈的档案文件的今天，我们知道，意识形态和世界革命问题在会谈中只占据了很小的地位，它在毛泽东的莫斯科会谈中基本没有涉及。双方争论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不是商定世界革命的战略，更多地却是涉及典型的国家利益政治。

现在还没有材料可以说明，斯大林对谈判结果是如何评价的，以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如何。但人们可以认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斯大林可能像局外人所设想的那样，把谈判的结果看做是一种妥协。至于他如何评价毛泽东，人们可以相信赫鲁晓夫的说法，他回忆说，斯大林在同中国领导人会晤后，“根本没有为毛所振奋，也没有说过特别赞扬他的话”。^①

毛泽东似乎应对谈判的结果基本满意。他顶住了斯大林的压力，缔结了新的同盟条约，迫使苏联答应在 1952 年以前（否则要到 1975 年）放弃它在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的特权。与这些成果相比，他不得不作出的某些承诺是比较次要的。例如，在关于苏

^① 《赫鲁晓夫回忆》载于《历史问题》1992 年第 11-12 期，第 73 页。据两位日本作者称，赫鲁晓夫在 1956 年 2 月 25 日苏共二十大上作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说，斯大林像对待一个乞丐那样对待毛泽东。1956 年在美国发表的赫鲁晓夫演说译本支持了这两位日本作者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见：Nagai Yonosuke, Aki-ira Irye: <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 New York 1977, P.213, 222.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发表的赫鲁晓夫演说文本没有这种说法。参阅《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载于《苏共中央通讯》，1989 年第 3 期第 128-170 页。

联驻旅顺部队供养问题的秘密议定书中，他未能贯彻其（不仅是形式上的）对等要求。又如，他不得不在秘密协定中承诺，不允许苏联以外的其他外国公司在东北和新疆从事活动。至于苏联的远东地区和中亚地区也实行对等的处理，那只不过是一种装模作样的举动。此外，他还被迫接受不利的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

毛泽东对此曾作过几次具体的评述。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谈到莫斯科谈判时，既骄傲地指出了成就，但也不回避这一事实：他也作出了妥协。他说，在莫斯科，斯大林不愿签订条约，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终于签订了。^① 但会谈又出现了分歧，^② “我们要求归还中国的长春铁路，他不给我们。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双方在条约、铁路合营公司和边界问题上发生了争吵。^③

另一方面，当毛泽东回顾其在莫斯科的访问情景时，他确实不能不感到恼怒，特别是因为他受到斯大林的冷遇，被封锁在别墅里，两个多星期不同他会谈，从而迫使他在别墅里睡大觉，直到他以回国相威胁。对此，周恩来后来曾指出，毛泽东是作为一个胜利了的国家领袖去苏联访问，本应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但还不如刘少奇访苏时表现得那样热烈，毛泽东遭到了冷落，除了祝寿外，无事可谈。赫鲁晓夫或多或少地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斯大林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是一种“不真诚的殷勤”。^④ 是一种“高傲”。毛泽东因此受到了刺激，但他没有向外流露，除了

^①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引自《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69年版，第432页。

^② 此处和以下两句参阅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省市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同上，第163页及下页。

^③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同上，第163页及下页。毛说的“边界问题”，不知指的是什么。

此处和以下三句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9页。周恩来的这一评述明显指的是1949年12月后半个月的事。

此处和下一段参阅《赫鲁晓夫回忆》，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1-12期，第73页及下页。

一次例外。^①只是在一次为毛泽东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以一种好客的姿态对待毛，而这也是他通常在这种场合所乐意做的。

如前所述，在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曾向苏联大使抱怨说，除了王明事件和 1945 年苏联背叛中国革命以外，他在莫斯科的遭遇是斯大林时期影响中苏关系的三件大事之一。^②他当时曾遭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进攻。^③毛感到苏联领导人怀疑他是“中国的铁托”，认为这种怀疑甚至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④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说，“1949 年、1950 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⑤直到 1950 年冬朝鲜战争时期，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不信任才消失。

从新得到的档案文件看，在朝鲜战争前的准备时期，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不信任依然没有消失。在 1950 年 1 月底毛泽东在莫斯科逗留时期，斯大林已为金日成进攻南朝鲜开了绿灯，他首次宣称，“在这件事上”要帮助金日成。^⑥关于这样一项世界性的政治决定，斯大林却对毛泽东只字未提。几年后毛向苏联大使

显然赫鲁晓夫在这里指的是 12 月底毛泽东对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发脾气，并回国相威胁一事。详见本书第四章第八节。

^②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中方的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4 年第 1 期，第 16 页及下页。

^③ 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见：同上，第 17 页。不清楚的是这一指责指的是什么具体情况。

^④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同尤金的谈话，苏方的记录见：《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第 106 页及下页。1956 年 9 月毛泽东对南斯拉夫大使也说过类似的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 年边界版第 254 页。

^⑤ 此处和下句参阅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演说：《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86 页；毛泽东在 1962 年 9 月 24 日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69 年版，第 432 页。在几个较早的 1956 年 4 月 25 日演说的版本中，没有包含以上援引的这些话。参见 Leung, John K., Michael y. M. Kao, *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 1949 - 1976*, Vol. 2, Armonk, N.Y.1992, P.43 f. 59 - 61。

^⑥ 1950 年 1 月 30 日斯大林给什特科夫的电报，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没有注明文件号。作者得到了一份复印件。此段和下段参阅 Bajanov: <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 - 61 > . in: <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 . 6 - 7, Winter 1995/1996, P.87。

抱怨斯大林缺乏对中国同志的信任。^①毛泽东说，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苏联领导同中方“没有进行充分的”协商。他在莫斯科停留时，曾在朝鲜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不是说要占领南朝鲜，而是大力巩固北朝鲜。”在这之后，金日成到了莫斯科，并达成了某种协议。毛说，但没有人认为有必要事先就此同中国领导人商议。

也许，斯大林没有同毛商议是因为担心毛会提出反对意见，从而宁愿让毛面对既成事实。在此之前，斯大林曾拒绝了毛为解放台湾而向苏联提出的援助请求。斯大林可能估计，只要中国尚未统一，毛泽东就不会为朝鲜的统一而提供援助。可以认为，毛泽东在回顾他在莫斯科的遭遇时，会有一种复杂的、痛苦的感觉。在那里遭到的冷遇加深了他对斯大林的成见，并加强了他要摆脱苏联控制的愿望，但由于对“老大哥”援助的依赖，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样做。看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晤并没有消除相互的怨恨。对毛泽东来说，情况却是相反。

因此，苏中后来的决裂实际上在中苏结盟之前就已开始萌芽。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两个经历。如果说斯大林怀疑毛是中国铁托，因而认为中共将在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的冲突之中站在南斯拉夫党的一边，那么，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如果说这一担心的含义是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不完全受控于苏联，并要走自己的道路，那么，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一点，赫鲁晓夫 1954 年访问中国时就已明显地感觉到了。

此段和下段参阅 1956 年 3 月 31 日尤金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没有注明文件号。作者得到了一份复印件。这段话在 1994 年莫斯科重新发表的这份电报中未作说明地被删去了。这也证明苏联的新闻检查在今日的俄罗斯依然存在。此段参阅 Heinzig: < Stalin, Mao, Kim and Korean War Origing, 1950: A Russian Documentary Discrepancy > .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 - 1997, P.240.

尽管如此，50年代上半期的中苏关系基本上仍是良好的，其特征是双方为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而努力。如前所述，中国在苏联压力下加入朝鲜战争后，斯大林对“铁托式的”毛泽东的怀疑逐步消失。在这场战争中形成的战友关系增进了一定的信任。

在50年代，中国进一步按苏联的模式改造其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苏联在许多方面提供了帮助，如：制订经济计划，建设和改造大型工业企业，改革卫生、法制和教育制度等。据苏联的材料称，在1950年至1959年期间，苏联向中国派遣了1万名顾问，接受了2万名中国人到苏联培训。^①在同一时期里，中国获得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于建设近300个工业企业和其他设施，其中有三分之一属于军事部门。作为交换，中国向苏联提供了矿产品和农业品以及大量的外汇。莫斯科后来说，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无私的援助，那是不准确的。中国人至少为每一个苏联专家和所有的技术援助都付了钱。当时，双方的宣传机构都不厌其烦地描绘一幅无瑕的、开创新纪元的友好图画。在中国流行把苏联尊称为“老大哥”。一首歌颂两国永恒的兄弟联盟的歌《莫斯科—北京》不断在节日里演唱。一位中国诗人欢呼“6亿人加入了和平阵营”，另一位诗人称颂共同设计的长江大桥具有象征意义，说“这座友谊之桥……连接了8亿人的心”。^②

这些图画并不能完全掩盖现实，至少这对双方领导人是如此。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虽然想消除两国关系中的某些不和的因素，他在1954年秋首次访华时撤消了原定30年的合营公司等。但如他所说，他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从一开始就搞糟了。他在谈到这次访问时说“他感到气氛是‘典型的东方式’”；“甜得令

此段和下段参阅 Ivan Arkhipov: <1950……>, in: <USSR - China in the Changing World. Soviet Sinologists on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Soviet - Chinese Relations > Moskau 1989, P.40 - 45.

② 贾丕才(卡皮察):《苏中关系》，1958年莫斯科版，第349、372页。

人反感”“令人恶心”。中国主人对他是“难以置信的客气”，但他看穿了他们的虚伪。赫鲁晓夫回忆说，自从同毛泽东第一次会晤后，他就认定，这个人是不会容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任何一个党超越他自己的党。更为甚之，毛在谋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权地位。从中国回来后，他向他的莫斯科同志说：“同中国的冲突将不可避免。”^①

第一次严重的紧张关系发生在 1956 年，它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相联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1956 年 2 月）的秘密报告中猛烈地抨击了斯大林的罪行及其“个人崇拜”，这在苏联犹如晴天霹雳。赫鲁晓夫事先没有同任何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过这件事，也没有同斯大林去世后自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意识形态领导人的毛泽东商量过。如前所述，毛泽东虽然因其推行的中国政策而对斯大林有很大的保留，但他认为这种激进的清算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国际共产主义的声誉将受到世界性的损害。此外，他还感到赫鲁晓夫的行动，即使是间接的，也是对他个人权威的攻击，因为当时在中国正盛行一种与斯大林个人崇拜相似的毛崇拜。实际上，莫斯科的行动也推动了中共领导层中的毛泽东反对者。在 1956 年 9 月的新党章中就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最伟大的成就”这一提法。中共领导在迟疑不定地对斯大林进行温和的批评时，也对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感到恼怒，因为他们否认自己对斯大林的“错误”应承担的一定的共同责任。^② 苏共二十大后不久，毛泽东对苏联同志说：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斯大林的功大于过；对他的批评方式也应

此段参阅 Khrushchev Remembers, P.462, 466 f.; 《赫鲁晓夫回忆》，载于《历史问题》1992 年第 11-12 期，第 80 页。

此处参阅周恩来的内部报告中关于他 1957 年 1 月同苏联领导的谈话，见：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1993 年北京版，第 302 页及下页。

受到指责。^①他在党的内部报告中说，斯大林 70% 是好的，30% 是坏的。苏共二十大的另外一些事先没有通报北京的决议也在中国引起了恼怒，例如，宣布“和平共处”的理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说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上述这些情况虽然在莫斯科和北京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但还没有导致关系的中断。显然，两国关系的决裂始于 1958 年和 1959 年。以下一些事件对此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领导在没有同莫斯科协商的情况下于 1958 年开始实行“三面红旗”的政策，其中包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声誉很坏的运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试验，试图通过劳动组织的准军事化、所有制的进一步集体化、废除物质刺激和造就“新人”等，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试验也同时向人们提供了可能，最终走上渴望已久的“中国道路”。相关的中国评论指出，北京找到了一种所谓方法，它可使中国一下子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境地，从而超过苏联。这些声音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挑衅。当 1958 年年底中国的试验开始显露失败，饥饿和贫困的阴影笼罩着“三年困难时期”（1959 年 - 1961 年），此时，莫斯科感到他们的正确性已被证实。但是，重大的分歧却在军事合作方面出现了。1958 年北京领导人拒绝了苏联关于建立共同的长波电台和潜艇舰队的建议。苏联原想通过在福州建立共同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沿海建设共同的潜艇舰队来改善其海军在太平洋活动的条件。对此，毛泽东作出了强硬的反应。他同尤金大使谈话时以有损中国主权为由拒绝了苏联的建议。毛说，“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者”，“如果你们这样说，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争论》，1965 年北京版第 73 页及下页。

我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① 1958年7月，因这一争吵而感到担忧的赫鲁晓夫急忙赶到了北京，试图平息这一风波。当时，毛依然坚持拒绝的态度，并重新指出中国的主权问题。赫鲁晓夫恼怒地作出了让步。苏联的这一建议就此被搁置起来。

在50年代，苏联的某些做法也使中国人在感情上感到受到伤害。^② 例如，苏方认为没有必要为苏联专家的入境向北京申请签证，而凭苏联的公务旅行证明即可去中国。又如，没有经中国的许可，就在中国建立一个苏联的广播电台。甚至还发生过这样的事，苏方未事先询问中国人，就发表了苏中的“共同声明”。

1958年还发生了另一件助长了冲突发生的事件：金门危机。当时，北京给人以印象：它要以武力占领台湾的两个小岛，金门和马祖。中国领导人确信，苏联是不愿为此提供军事支持的。^③ 但使中国人感到不快的是：莫斯科相反却要改善苏美关系，维护和平。苏美缓和关系的努力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的怀疑：两个超级大国要共同主宰世界。对此，毛泽东持这样的观点：鉴于苏联在导弹和原子弹方面领先于美国，它不必担心东西方对峙的尖锐化，甚至不必担心由此会引起一场新的、原子大战的危险；至于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它就更加不必对此感到害怕了。金门事件很可能是导致莫斯科采取重大步骤的原因之一。1959年6月，苏联领导人拒绝履行1957年10月15日缔结的军事援助条约中的某些部分，即关于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必要的设计资料，

周/褚：《共产国际……》，第513页。此段参阅同上，第512-514页，关于赫鲁晓夫同毛泽东的谈话参阅一位苏联历史见证人对作者的陈述，但他不愿透露其姓名。

以下的一些信息是作者从一位当年曾在苏共中央机关负责中国问题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的，但他不愿透露其姓名。

此处参阅 Jonathan D. Pollack: < Perception and Ac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Quemoi Decision > . Bd. 1. 2, Ann Arbor, Mich. . Xerox University Microfilms, 1976。

以及帮助中国生产钚。^①显然，克里姆林宫的考虑是，北京在进行军事冒险，苏联无论如何不能卷入，更不能通过提供核技术而卷入。此外，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设计资料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苏联正在发动攻势，争取缔结一项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显然，中国人从苏联的这一态度中得出的结论是：莫斯科是不可信赖的。

可以认为，苏联拒绝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走对抗的道路。此外，苏联在 1959 年 8 月的中印冲突中所持的立场也在这方面起了进一步推动的作用。当时，苏联形式上持中立态度，但实际上同情新德里。

此时，形势日益紧张。当苏联领导在 1960 年初约请毛泽东赴苏会谈时，毛拒绝了。4 月，北京发表了三篇攻击苏联的文章。1960 年 6 月初，中国领导人利用世界工联在北京举行代表大会的机会，攻击了赫鲁晓夫关于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理论。月底，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期间同彭真秘密会晤，他指责中国领导人不了解现代战争的现实，错误估计世界的力量对比。彭真以中国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经验为根据，给予了反击，并声明中国领导人不信任赫鲁晓夫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分析。^②

在这次谈话中，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进行了人身攻击。他以粗

^① 《人民日报》1963 年 8 月 15 日；周 / 褚：《共产国际……》，第 517 页；Arkhipov: < 1950…… > in: < USSR - China in the Changing World. Soviet Sinologists on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Soviet - Chinese Relations > Moskau 1989, P. 44; Alfred D. Low: < The Sino - Soviet Dispute. An Analysis of the Polemics >. Cranbury, New Jersey / London, 1976, P.98 f. 1955 年 8 月苏联领导曾答应了北京关于帮助培养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专家的请求。参见：现代文献储存中心（CChSD, 莫斯科）全宗 4, 目录 9, 案卷 1347, 第 121 - 123 页。

^② 此段参阅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 - 1970）》，1973 年东柏林版，第 95 - 197 页；《列宁主义万岁》，1960 年北京出版；多纳德·扎哥雷阿：《中苏冲突 1956 - 1961》，1964 年慕尼黑版，第 354 - 362 页。

俗的语言骂毛为“旧套鞋”^①，辱骂他为“从鼻孔里挖出理论的菩萨”。^{②③}显然，毛泽东也听到了这些。双方的关系也为之而毒化。此后，赫鲁晓夫还在同中国及其他共产党代表进行非正式谈话时，继续对毛进行人身攻击。邓小平在同苏联人的一次谈话时说道，苏方可以批评他本人，批评刘少奇或周恩来，这都有可能再和解。“但你们直接攻击毛泽东的威望这是不能补救的。”由此可以认为，这种人身攻击（后来中国方面也参加了）在激化冲突方面至少与那些客观因素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也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

1960年7月，赫鲁晓夫在两个月内从中国撤走了苏联专家。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说，苏联专家日益受到监视，并挑唆他们反对苏联的党和政府。^④中央委员会有关部的部长安德罗波夫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不敢持反对立场。^⑤据说，当赫鲁晓夫得知中国的宣传者在苏联专家面前把他称之为“赫秃子”时，他也感到深受伤害。这也可能是赫鲁晓夫决定撤退专家的原因之一。当时，北京曾提出，如撤退专家的决定已无可挽回，则希望能在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内逐步实行。但这一请求遭到了拒绝。^⑥召回苏联专家给中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这一步骤对中美关

赫鲁晓夫使用的原词是“staraja kalosha”（直译的意思是穿旧了的套在皮鞋外面的橡胶鞋）。

原文读为“Budda, kotoryj svoi teorii iz nosa vykovyrivaet”。

此处和下一句包含的信息是一位曾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苏联历史见证人向作者提供的。

^④ 1960年7月18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给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俄文本见：德意志联邦档案馆“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与群众组织档案”，J IV/2/202/280，英文译本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6-7, Winter 1995/1996, P. 249 f.，及陈兼的评论。

此处和下一句包含的信息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中国问题专家向作者提供的。

^⑥ Ivan Arkhipov: < 1950…… > . in: < USSR - China in the Changing World. Soviet Sinologists on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Soviet - Chinese Relations > . Moskau 1989, P.47.

系从合作到对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双方对这一发展都负有责任，但中方的态度在后来更具有进攻性，更强硬。这场冲突的发展最终涉及的是一个地区大国要摆脱一个超级大国的管束，追求独立解放的过程。这一过程应更多地从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的观点，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观点来观察。通过与苏联结盟的实际废除，中国在对外政策上获得了过去120年从未有过的独立性。但代价也是高昂的。由于同美国及其盟国的冲突依然存在，中国除了得到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外，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此外，它还不得不在没有莫斯科援助的情况下独自应付。

对非社会主义世界来说，中苏之间的争斗似乎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争吵，双方都要求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真实意志的执行人，并都认为自己是最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要求。苏联领导人依仗的是：苏联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最强大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是“列宁的党”。中国领导人则认为，他们是违反斯大林的建议而取得了对国民党的胜利，并依靠自己的民族经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走出了自己的路。

但是，冲突的政治核心却为意识形态大论战所掩盖。双方领导人在无数的信件中相互指责对方背叛了纯洁的学说、团结的信条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原则。^①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分歧确实存在，那么，它主要涉及的是中国的论点：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在这方面，中国含蓄地要求领导世界范围的解放运动。^②

^① 参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1965年。对论战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参见约阿希姆·格劳比茨：《中国与苏联》，汉诺威，1973年；海因茨·布拉姆：《苏联1949-1979年》收于《中国与东西方关系》柏林，1981年，第40-44页。

此处参阅彼得·奥皮茨：《中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原则 战略计划》，1977年苏黎士版，第47-56页。

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表现为主动进攻，而苏方的反应基本上限于辩解。北京并日益失去了克制，对莫斯科展开了总攻击。实际上，苏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解释都遭到了攻击，苏联的内政、经济和外交政策也都没有被放过。最后，北京提出了一个尖端的论点：苏共背叛了社会主义，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指责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收回。毛泽东还认为，苏美两大国相互勾结，试图主宰世界（1964年的“中间地带理论”）。苏联领导人反击称，中间地带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在分析国际政治时放弃了阶级的立场（这一点在形式上说是对的）。当时，许多苏共中央机关的外交政策专家，其中包括安德罗波夫，认为继续进行论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谁都不敢反对受教条主义者苏斯洛夫支持的赫鲁晓夫。

至1963年，有迹象表明，双方似乎都不愿走向彻底的断交。但是，那年夏天的公开交换意见，特别是苏共中央7月14日“公开信”的发表，进一步毒化了气氛，从而转向了公开的决裂。中国领导人拒绝了苏联停止论战的建议，并讥讽它是虚弱的表现。当时邓小平在莫斯科会谈时拒绝与苏联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握手，理由是为了节约时间。^①

北京曾希望苏联领导人在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倒台后能做出让步，承认中国路线的正确性，但这一希望落空了。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的庆典。莫斯科最初把它视为一种准备和解的姿态。经常考虑对等的周恩来，此时如能自主行动，似乎将向苏联再走近一步。但在他的代表团里有康生，他是毛的亲信，是中共领导中除毛泽东和林彪外主张对苏实行强硬路线的人，是毛派去的一条狗。因此，周恩来只得要求苏联领导人彻底

^① 这一信息是当年与中国打交道的苏共中央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作者的，但他不愿透露其姓名。

抛弃反华立场。这不仅对苏共领导中占多数的以苏斯洛夫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且对那些主张和解的领导人也都是不可接受的。此外，在庆祝宴会上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事，它进一步破坏了气氛：喝醉酒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傲慢地对贺龙元帅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笨蛋（durak）搞掉了，现在该你们把你们的也搞掉！”勃列日涅夫曾试图平息此事，声称这是在酒精影响下说的，不要当真。但周恩来驳回了这一解释。尽管勃列日涅夫事后以各种形式表示道歉，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提前回国了。^①可能是在康生的安排下，马利诺夫斯基的话被传给了毛泽东。

1966年3月，中国断绝了同苏联“兄弟党”的接触。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只保留外交联系和一般的商品交换。

通过不断强调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强了同苏联的对峙。这种挑战与过去不同的是，它不再局限于亚洲地区，而涉及到全球问题。中国想以此获得对世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北京与莫斯科的对峙只导致少数的几个“兄弟党”公开站在中共一边反对苏共。凡是出现分裂的地方，毛主义的集团一般都沦落为意义不大的零星小组织。

60年代末，在执政的共产党中只有阿尔巴尼亚明确地站在中国一边。倒向北京的6个非执政党是：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西兰。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党基本在亚洲。另7个党在中苏冲突中持友好中立的态度。这除了南斯拉夫外，还有朝鲜、日本、越南和老挝共产党等。这里也可看出地区的倾向。1978年越南和老挝共产党同莫斯科结盟，这不是出于

此处所述情况参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苏联外交官的陈述，他曾陪同中国代表团，并经历了这一轰动的事件。

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安全政治的动机。

荒唐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进一步破坏了同苏联的关系。

1967年苏联大使馆被包围。苏联外交官遭到红卫兵的唾骂和暴力攻击，并在此情况下不得不离开。在官方宣传的极力煽动下，在苏联的广大居民中也掀起了反华的仇恨浪潮，自13世纪和14世纪蒙古鞑靼人奴役时期就形成的、对来自亚洲的“黄祸”的非理性畏惧又重新复活了。这种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仇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容易地在政治上被煽动起来。沃兹涅先斯基和叶夫图申科这样一些自由派作家也以种族主义的声调告诫人们：要警惕来自中国的野蛮威胁，它既是对俄罗斯的威胁，也是对欧洲文化的威胁。

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激起了新的愤怒。

与1956年中国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恩来总理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两天后，在一篇演说中把它比作希特勒对这个国家的侵略，把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①自那以后，中国经常引用列宁的话，把“苏联叛徒集团”的对外政策贬低为“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并以此来区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莫斯科对布拉格的行动被视为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论的贯彻执行。它给北京造成的印象是，苏联领导人将无约束地加剧中苏冲突，甚至会以武力对付中国。

1965年以后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增兵，这也使北京增加了受威胁的感觉。在那里的苏联驻军从原来的17至20个师增加到70年代初的40个师，1985年的53个师，其中包括根据1966年1

此处和下句参阅1968年8月23日周恩来演说，见：《北京周报》，1968年第34期，增刊，第III页及下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第79页；《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北京，第99页。

月 15 日缔结的苏蒙互助新条约而驻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部队。^① 1969 年,一系列边境摩擦“乌苏里江冲突”把两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接着,在其他边境地区也发生了流血战斗。有迹象表明,莫斯科曾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有限的核打击。当时,不仅是两国领导人,两国人民也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疏远。两国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反映血战的深沉影片使两国人民情绪激动。仅从 1969 年出版的反华报刊文章中选编而成的集子就有 11 册之多,这清楚地反映出在苏联报刊上出现的反华浪潮达到了何等程度。当然,中国的反苏宣传也不落后。直至 1969 年秋,周恩来与柯西金总理在北京会晤,商定要继续 1964 年被中断的边界谈判,这时的气氛才有所缓和。^② 在周恩来的敦促下,柯西金承认在共同边界上存在“有争议的地区”,但因勃列日涅夫最后否认这种地区的存在,新的争论又引发了。

边界问题又发展成新的争论目标。经过多次谈判,未取得进展。虽然中国并不像苏联宣传所说的那样,要求归还 19 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被俄罗斯占去的 150 万平方公里,而是要求莫斯科承认这些领土是沙俄的非法所得。但北京要求归还那些甚至与“不平等条约”都不相符的“争议地区”,它约为 3.5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比利时),莫斯科驳回了这一要求,并声称现在的苏联边界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存在讨论一个新的边

^① Harry Gelman: < The Soviet Far East Buildup and Soviet Risk - taking Against China. Rand Publications Series >, R-2943-AF, Santa Monica, Ca. 1982, P. 13 f., 19 f.; 约阿希姆·格劳比茨、迪特里希·海因茨希(主编):《80年代的苏联和亚洲》,收于德国东方学和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科隆)编辑的《东欧与国际共产主义》第 18 卷,巴登-巴登版,1988 年,第 309 页(由 Masamori Sase 绘制的图表);互助条约见:《苏蒙关系 1921-1966 年——文件汇编》,1966 年莫斯科版,第 320-322 页。

^② 此处参阅叶里扎维京:《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谈判》,载于《远东问题》,1993 年第 1 期第 107-119 页。

界条约；但个别地段的边界走向可作精确的勘定。无疑，莫斯科的僵硬态度也出自一种担心，害怕这一让步会为苏联的其他边界问题提供一个修改的先例，例如苏联同日本、同东欧国家的边界。中国的强硬态度也可解释为，维护基本原则和面子，以及贯彻这一意图：在世界舆论面前，揭露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是“新沙皇”，他在亚洲继承了俄罗斯扩张主义的传统。^①

如乌苏里江冲突所表明的那样，中苏关系的紧张危及到中国的安全及安全政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已日益陷入孤立的状态。这些情况导致北京在 1970 年决定，向美国接近，以便结束同华盛顿和莫斯科双重对峙的形势。这一决定之所以能够较容易地作出，这与尼克松政府的声明（及所谓的“尼克松主义”）有一定的关系。当时，美国宣布从越南撤军，并把更多的防务责任交给亚洲的同盟者。早在尼克松总统 1972 年 2 月访华之前，中国已开始改变其路线，这一转变导致了在国际政治上的一个决定性的突破：1971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联合国。

中美的接近使莫斯科在美苏中的大三角关系中处于孤立的地位。^② 因此，自 70 年代初，克里姆林宫就开始努力，一方面针对中国同美国缔结防止核战争的条约，另一方面加强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又没有提出能真正吸引中国的建议。它重复提出内容空洞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动议，如缔结互不侵犯和不使用武力的条约。对此，中国不是反应消极，就是提出苏联不能接受的一揽子建议。1976 年 9 月毛泽东去世。莫斯科含蓄地建议恢复党的关系。但这一友好表示毫无结果。不仅如此，在这以后的两年里，北京发展了反苏主义的内容，增添了新的争论因素。早在 1974 年，邓小平曾宣布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如同毛泽东在十年前

详见海茵茨希的文章：《中苏边界冲突》。

^② 此处和下段参阅 Lowell Dittmer: < Sino - 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1945 - 1990 > . Seattle/London 1992, P.195 - 216。

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一样，它把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因为它们都在推行“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1977年至1978年，中国领导人又迈出了一步。在同非共产党国家的人士进行谈话时，他们敦促建立反苏的“日本、西欧、中国和美国的统一战线”，并让人感到，他们甚至想与所有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起反对苏联的非正式联盟。

紧接着这一尖锐化的戏剧性发展，又出现了向另一方向的突变。1979年4月初，北京向苏联政府提出谈判的建议。这几乎是20年来的第一次，北京向莫斯科表示希望缓和关系。1979年初的路线改变是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政策的结果。这是同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的军事动员式的社会主义的最终决裂。改革政策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一个经济和技术上现代化的国家。它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就有可能避免同一个强大的敌人进行军事对抗，有可能不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事打击能力，从而有可能把用于军事部门的资源转用到民用部门。出于同样的目的，北京于1979年1月1日作出了要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约在同一时间，中国与美国达成了建交的一致意见。过去人们认为，同苏联的修好会影响同华盛顿的关系正常化。现在这种顾虑已成为多余。相反，同苏联关系的改善却为对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此情况下出现了“围绕中国的、浪漫的三角关系”（Lowell Dittmer）^①。

促使中国同苏联恢复谈判的还有另一个理由。中国政府在准备与日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承诺要废除于1950年2月14日缔结的中苏同盟条约（它将于1980年2月到期）为了避免或是减少废约给苏联造成的负面效果，北京在1979年4月3日

同上，第217-230页。

的废约照会中重新提出“正常化谈判”的建议。

两个星期后，莫斯科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 1979 年秋举行了第一轮谈判。就这样，缓和的进程开始了。它虽然在年底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中断，但在 1982 年秋又恢复了协商，以便在今后几年能逐步实行关系正常化，包括恢复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合作。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这一进程加快了。对此特别有帮助的是苏联开始实行以军事缓和为目的的新外交政策。它削减了驻扎在亚洲的 SS20 导弹，减少了在苏联远东地区和中亚地区的驻军，撤退了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并放弃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实际上就排除了北京在 80 年代初提出的“三大障碍”，即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接着，戈尔巴乔夫在边界问题上作出了让步，边界谈判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举行了 30 年来的第一次高峰会议，形成了关系正常化的高潮。借此机会，自 1966 年以来就已冻结的两党关系也开始恢复。另一方面，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仍继续保持友好。由于苏美关系在这个时期也升温了，因此可以说，1986 年至 1989 年在战略三角关系方面出现了全面平衡的积极态势，它类似二战结束后至冷战开始前的那种情况。

显然，莫斯科对北京“六四”事件的批评和担忧，再次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气氛阴沉。更使中苏关系受到伤害的是东欧国家的政局剧变。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戈尔巴乔夫及其“投降主义”应对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变负主要责任。但北京只是在内部表示了这种尖锐的批评，对外则表现谨慎和含蓄。在 1991 年 8 月莫斯科出现政变时，北京的态度也是谨慎的。他们对外称这一事件是苏联的内政，不应干预。但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同情暴动者，内部甚至认为，应像中国在毛去世后对付“四人帮”那样，干脆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逮捕起来。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北京迅速作出决定，同苏联的各继承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发出信号，表示愿意同这些国家，首先是俄罗斯联邦，继续实行发展经济技术合作的路线。同时，中国领导人还表示，它担心世界的命运会被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所左右。当初，苏联执行的是以科济列夫为代表的亲西方外交政策。但在这一“浪漫的”阶段过去后，莫斯科开始对中国的上述设想表示赞赏。当时，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正在走下坡路，并力图通过构筑一个“多极世界”来弥补它的失败。而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却正在野心勃勃地要成为大国或超级大国。此时，这两个国家突然发现，它们因具有共同的强烈反美主义而又呆在一条船上了。1996年4月叶利钦第二次访华时，新的形势被表述为“战略伙伴关系”。后来，由于俄罗斯又向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提出建立战略伙伴的要求，从而降低了中苏战略伙伴关系的显著意义。

在双边关系方面，相互间的合作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加强。贸易在扩大，技术合作在发展，俄罗斯还参加了包括利用原子能在内的中国能源建设项目。新的边界谈判使长期激烈争吵的边界问题获得和睦的解决。除了少数不长的地段外，共同边界被一致确定，并在边境地区采取了许多信任措施。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一事实：俄罗斯已发展为中国最重要的军备供应者。中国以此获得了现代化的武器，如：坦克、歼击机、潜艇、巡洋舰、防空导弹等，而这些武器是西方国家自“六四”以来拒绝供应的。俄罗斯通过这种供应换得了外汇收入，并给军事工业提供了就业的机会。

在此期间，双方都对无限制地发展军事合作产生了顾虑。在北京，人们担心过多地在军事领域依附于俄国，俄罗斯则害怕用现代武器装备一个国家，它将来有可能用这些武器来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乌苏里江的冲突”还没有被忘记，13世纪、14世纪鞑靼人的奴役也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记，“黄祸”的

恐惧刻骨铭心。因此，当有谣言说，北京计划通过大规模的移民逐步占领人员稀少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人们很容易地就相信了。

仅仅这些忧虑就足以使人不会轻易相信，现在的中俄关系会发展成 50 年代“伟大友谊”时期的中苏关系。此外，中国宣称，它无意同任何一个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其中包括不同俄国结盟。这一声明是可信的。鉴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绩，而俄罗斯陷入了失败，中国感到它优越于俄罗斯。诚然，50 年代的紧密关系是在 1950 年 2 月 14 日同盟条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双方都宣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这种共同的意识形态在 50 年代的联盟关系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上述这些因素在 90 年代都已不复存在。因此，在可见的将来，能指望的只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合作，在双边关系方面将以互利原则为基础。考虑到两国对美国而言都是处于劣势的一方，相互将保持同情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只会给双方带来好处。

把沙皇俄国和苏维埃俄国的对华政策作一比较性的回顾，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①自 17 世纪两国开始建立关系以来，在沙皇俄国时期的 250 年里，建设性的关系持续了约 150 年之久，处于紧张的关系约为 100 年。在苏联时期，这种比例关系恰恰反过来：在 75 年的发展过程中，苏中关系竟然有 50 年是处于紧张状态，从小磨擦到军事冲突。最后，像是一种怪论：惟一的一次可能爆发大战的危险竟然出现在苏联时期，在共产党同志统治中国的 1969 年。

详见 Dieter Heinig: < China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Challenge to the Soviet Union >, in: < Sino-Soviet Affairs >, 3, 1987, P. 41-61。

附 件

文件 1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问题的苏方草案（1950年1月5日）

缔约双方确认苏联与中华民国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关于旅顺口和关于大连的诸协定有效。

文件 2

关于大连和旅顺口问题的苏方草案（1950年1月9日）^②

缔约双方声明，与现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相一致，1945年8月14日关于大连港之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所有附件，作为现有条约的不可缺少部分继续完全有效。

^① 1950年1月5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的第七条；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5，第13-14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② 1950年1月9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的第七条；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5，第18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文件 3

关于大连和旅顺口问题的苏方草案（1950 年 1 月 10 日）^①

缔约双方达成协议，关于大连港和旅顺口的现有协定问题将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友好地进行审核。

缔约双方达成谅解，当前驻旅顺和大连的苏联部队将在本条约生效后的 2-3 年或 X 年内减少或撤离。

文件 4

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的苏方草案（1950 年 1 月 12 日）^②

缔约双方约定，当前驻旅顺和大连的苏联部队将在现条约生效后的 2-3 年或 X 年内撤离，并在上述期限结束后将对 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和中国签订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以及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进行重新审核。

文件 5

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的苏方草案（1950 年 1 月 16 日）^③

缔约双方约定，当前驻旅顺和大连的苏联部队将在现有条约

① 1950 年 1 月 10 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的第七条；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24 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② 1950 年 1 月 12 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的第七条；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33 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③ 1950 年 1 月 16 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的第七条；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3-4 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全面生效后的 2-3 年内撤回到苏联的领土之上，撤军将从 1950 年开始。

缔约双方还约定，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将重新审核 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和中国缔结的关于大连港和旅顺口的协定以及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

文件 6

1、第一选择稿

“关于批准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之有效性的议定书”的苏方草案
(1950 年 1 月 16 日)

关于批准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之有效性的议定书

鉴于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之签订，签字者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约定：

一、确认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在该协定规定的整个期限内继续有效。

二、本议定书以俄文和中文书就，作为上述条约的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于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 年……莫斯科

2、第二选择稿

“关于批准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之有效性的声明”的苏方草案
(1950 年 1 月 16 日)^②

关于批准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之有效性的声明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5 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6 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之际，为准确规定法律地位，缔约双方政府声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在该协定规定的期限内继续有效。

缔约双方的全权签字人在俄文和中文的两个文本上签字盖章，以确认此声明。

1950年……莫斯科

文件 7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苏方草案（1950年1月2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符合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深信以最佳方式加强友好关系将促进两国的经济发展，决心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以全力为了普遍和平与安全的利益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为此，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

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相关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危险。

缔约国双方强调愿以最真诚的方式参加所有以确保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完成这一崇高任务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在日本试图重新推行侵略政策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勾结的任何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将即尽其全力向处于战争状态的缔约国一方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与日本进行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缔结和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遵照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间为 30 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无限期继续生效，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于一年前通知对方，终止条约之效力。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条约的批准。批准书随即在北京互换。

为此，两国全权代表将本条约署名盖章，以昭信守。

1950 年……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文件 8

关于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之议定书的苏方草案（1950 年 1 月 22 日）^①

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之协定的
议定书

鉴于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在最短期内加强其防卫力量，双方签字人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达成如下协议：

一、根据中国的变化条件和苏联表示的愿望，苏中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将持续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重新审核。

二、当前驻旅顺和大连的苏联部队将在现有条约全面生效后 的 2-3 年内撤回到苏联的领土之上，撤军将从 1950 年开始。

三、本议定书以俄文和中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 年……于莫斯科

文件 9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之议定书的苏方草案（1950 年 1 月 22 日）

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的
议定书

双方签字人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达成如下协议：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49 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3A，卷宗 18，案卷 235，第 50 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四节。

一、确认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在该协定规定的期限内继续有效，为保障铁路的有效商务利益，可以在一方建议下增加若干补充规定。

二、本议定书以俄文和中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 年……于莫斯科

文件 10

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中方草案（1950 年 1 月 24 日）

中苏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希望通过巩固中苏友好关系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与日本相勾结的其他国家重新发动侵略战争，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这符合中国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

两全权代表相互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危险。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与上述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并宣

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迅速完成这一崇高任务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未经相互协商不得单独或同其他国家一起同日本缔结和约。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商定，为便于和加速中国和苏联的经济建设发展以及为全世界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相互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和开展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七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有效期间为 30 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 5 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文件 11

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的苏方草案（1950 年 1 月 2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 1945 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

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蒋介石集团已被粉碎；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并在中国成立了新的与苏联友好的人民政府，它已把中国联合为统一的国家，并证明了自己能够维护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和中国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苏联和中国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商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行，但不迟于1952年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商定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海军根据地撤退。在苏军撤退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限不变。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商定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审核大连港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国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为进行上述财产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织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 3 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之具体办法，此项办法，俟联合委员会建议，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 1950 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日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交换。

1950 年……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文件 12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 年 2 月 14 日签订）^①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0 年 2 月 1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

^① 《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1 版；中文文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卷第 75—77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1—3 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八节。

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两全权代表相互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有效期间为 30 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 5 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1950年2月14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文件 13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1950年2月14日签订）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1950年2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1945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已被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了新的人民政府；这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并证明了自己能够维护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决定缔结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

① 《消息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中文文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卷第77-7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3-5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八节。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 1952 年末。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会主席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 1954 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设备前的时期，中苏两国政府派出同等数目的军事代表，组织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的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 3 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照现存的界限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为进行上述财产接收事宜于

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织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 3 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之具体办法，此项办法，俟联合委员会建议，经双方政府批准后，于 1950 年内完成之。

1950 年 2 月 14 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文件 14

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1950 年 2 月 14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请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据此，双方政府议定本协定，其条文如左：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共为 3 亿美元；其算法，系以 35 美元作为一盎司纯金。

苏联政府鉴于中国因其境内长期军事行动而遭受的非常破坏，同意以年利 1% 的优惠条件给予贷款。

第二条 第一条中所指的贷款，自 1950 年 1 月 1 日起，在 5 年期间，每年以同等数目即贷款总数的 1/5 交付之，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

① 《消息报》，1950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中文文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卷第 79 页及下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一卷第 45 页及下页。参阅第四章第十八节。

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场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

机器设备与器材的品类、数量、价格及交付期限，由双方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

在 1 年期限中所未使用而剩余的款额，可移用于下 1 年期限内。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原料与茶的价格、数量及交付期限将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贷款的付还以 10 年为期，每年付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 $\frac{1}{10}$ ，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之。第一期的付还于 1954 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之，而最后一次的付还，于 1963 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之。贷款的利息系以使用贷款的实数并自其使用之日起实行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

第四条 为了对本协定所规定之贷款进行结算时起见，苏联国家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各建立特别账目，并共同规定对本协定的结算与计算的手续。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应经批准并在北京互换批准书。

1950 年 2 月 14 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安·扬·维辛斯基《签名》

文件 15

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之秘密协定的中方草案（1950年3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之协定
（1950年3月22日）

鉴于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帮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苏联政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请求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及机构和组织工作。

第二条 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工作期限确定为1年。关于在华工作期限的延长需经双方审定。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召回需经双方负责机关商定，如某位工作不满6个月的苏联专家并非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原因而被提前召回，费用由苏方承担。苏方并有义务派另一位来接替提前召回的苏联专家。与此召回和替换相关的费用由苏方承担。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中国货币向苏联专家支付劳动报酬，他相当于同样工作岗位和技术级别的中国专家之所得或按另行之规定，包括食品和工业品的供应、附加劳动报酬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苏方偿还为派遣苏联专家而付出的下列费用：专家及其家属在苏联境内往返期间的旅费、

零用费、住宿费和劳动工资，每人 80 公斤的行李托运费，以及相当于派遣前在苏联的 1 个月工资的出差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立即以中国货币支付专家及其家属在中国境内往返期间的旅费、零用费、住宿费和劳动工资，以及相当于在中国 1 个月工资的休假补助费（在中国教育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休假补助费相当于 2 个月的工资）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为每位苏联专家（不论其级别）向苏联政府每月支付 1,500 - 2,000 卢布作为对苏联相关企业因派遣专家到国外而蒙受损失的补偿。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为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期间免费提供带有家具、暖气和照明的住房，或支付相应的住房租金。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有义务在苏联专家不超过 3 个月的整个患病期间不停发工资。如果 1 位苏联专家生病超过 3 个月，苏联政府有义务派另一位同级别的专家来接替。

第七条 任何有关本协定的争议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第八条 本协定规定的苏联专家的劳动和工资条件也适用于在本条约签订前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构、组织和企业中工作的苏联专家。

第九条 本协定自签字日起生效，在一方提出要求后的 6 个月期满后 will 结束其有效性。

1950 年.....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全权代表

引文目录

- AARC 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外交部档案咨询处，台北）
- APRF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莫斯科）
- AVPRF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斯科）
- CChSD 现代文献储存中心（莫斯科）
- CGAOR 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莫斯科）
- FRU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 NiNi 《近现代史》(莫斯科)
- PDV 《远东问题》(莫斯科)
- RCChIDNI 俄罗斯近现代史文献储存和研究中心（莫斯科）
- SAPMO - B - Arch 德意志联邦档案馆“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与群众组织档案”基金会（柏林）
- TCQ 《中国季刊》(伦敦)
- TCHC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1. Acheson, Dean, Crisis in Asia - An Examina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 23, 1950
2. Acheson, Dea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orton, N.Y. 1969
3. Bevin Alexander, The Strange Connection. U.S. Intervention in

China 1944 – 1972, New York/Westport. Connecticut/London 1992

4. 阿卡杰耶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对苏政策（1934 – 1941）》载于《苏联 – 日本：纪念苏日建立外交关系 50 周年（1925 – 1975）》，莫斯科，1978 年

5. Ivan Arkhipov, 1950... , in: USSR – China in the Changing World. Soviet Sinologists on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Soviet – Chinese Relations, Moskau 1989, P. 39 – 51

6. Wesley M. Bagby, The Eagle – Dragon Alliance. Americ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World War II, London/Toronto 1992

7. Bajanov, Evgueni, 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 – 61 .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6 – 7, Winter 1995/1996, P. 54, 87 – 91

8. Elisabeth Barker, The British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1945 – 50, London. Basingstoke 1983

9. 沃尔夫冈·巴尔特克：《中国党领导人的传记和分析（1922 – 1988）》，1990 年慕尼黑出版

10. Wolfgang Bartke, Who's Who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righton, Sussex 1981

11. 巴扎诺夫：《中国和外部世界》莫斯科，1990 年

12. 巴扎诺夫：《苏中关系：过去和现在的教训》，载于《近现代史》杂志，1989 年第 2 期第 3 – 25 页

13. Benton, Gregor, and Allan Hunter (edit.),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5

14. 毕先天 (音)：《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载于《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第 53 – 76 页

1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 1991 年

16.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6 卷，莫斯科，1971 年；第 30 卷，莫斯科，1978 年

17. Howard L. Boorman. Richard C. Howard (edit.),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I - V, New York/London 1967. 1968, 1970, 1971. 1979

18. O. 鲍里索夫：《苏联和满洲的革命根据地（1945 - 1949）》莫斯科，1977 年

19.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 - 1970）简介》莫斯科 1971 年

20.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 - 1970）》，柏林（东），1973 年

21. 鲍罗京：《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援助（1937 - 1941）》莫斯科，1965 年

22. 海茵茨·布拉姆：《苏联 1949 - 1979 年》，收于《中国与东西方关系》柏林，1981 年

23. Brandt, Conrad.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New York 1966

24. 康拉德·布兰德、本亚明·施瓦茨、约翰·费尔邦克：《中国的共产主义，文献 - 历史》慕尼黑，1955 年

25.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 - 1939 年）》柏林（东），1973 年

26.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Forces*, Compiled by Hu Pu - yu, Taipei 1971

27.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London/Toronto/Tokio/Sidney/Singapore 1992

28. Carr, E.H. *Twilight of the Comintern*, New York/Toronto 1982

29. 恰里泽（主编）：《尼基塔·赫鲁晓夫回忆录节选》，纽约，1979年。
30. 谢列潘诺夫：《武汉战役的总结》，载于《在中国土地上，苏联自愿人员回忆录（1925-1945）》
31.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 1990
32. Chang Kuo-t'ao, in: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Before 1944*, hongkong 1969
33.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7. Volume One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Lawrence/Manhattan/Wichita 1971
34.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8-1938. Volume Two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Lawrence/Manhattan/Wichita 1972
35. Chao Kang and Feng-Hua Ma, *A Study of the Rouble-Yuan Exchange Rate*, in: *TCQ*, January-March, 1964, S.192-204
36. 哈扎诺夫：《第一手情况》，载于《今日世界》，1997年第5期第62-63页
37. 陈顿德（音）：《毛泽东与蒋介石1949-1976年》，北京，1993年
38. Chen, Jerome, *Resolution of the Tsunyi Conference*, in: *TCQ*, 40, 1969, P.1-38
39. Jerome C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 in: *TCHC*, Volume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ed. By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London/New York/New Rochelle/Melbourne/Sidney 1983, S. 505-526
40. Jerome Ch'e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1937*, in: *TCHC*, Volume 13, 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London/New York/New Rochelle/Melbourne/Sidney 1986, S. 168 – 229

41.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 – 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1994

42. Chen Jian, *A Crucial Step toward the Breakdown of the Sino – Soviet Alliance: The Withdrawal of Soviet Experts from China in July 1960*,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1997, P. 246, 249

43. Chen Jian, *The Myth of America's > > Lost Chance < < in China: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the Light of New Evidence*,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1, No. 1, Winter 1997, P. 77 – 86.

44. Chen Jian, *The Sino – Soviet All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 into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1*, Washington, D.C. June 1992

45. Chen Jian, *The Ward Case and the Emergence of Sino – 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48 – 1950*,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July 1993, P. 149 – 170

46. Tien – fong Cheng, *A History of Sino – Russia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1957

47.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Originally Issued as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 – 1949. Department of States Publications 3537. Far Eastern Series 30*, Stanford, CA 1967

48. *Chinese Communist Who's Who*, Taipei 1971, Band I, Taipei 1970, Band II, Taipei 1971

49. G.V. 契切林:《外交政策问题文集》莫斯科, 1961年

50. 《在第八次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的中国问题》, 汉堡/柏林, 1928年; 米兰, 1967年再版

51. O. Edmund Clubb, *China & Russia. The < Great Game*, New York/London 1971

52. Cochran, Thomas B., Robert S. Norris, Oleg A. Bukharin, *Making the Russian Bomb. From Stalin to Yeltsin*, Boulder/San Francisco/Oxford 1995

53.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London/Sidney/Toronto 1971

54. Cohen, Warren I., Introduction: Was there a > > Lost Chance < < in China?,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1, No. 1, Winter 1997, P. 71 - 75

55. Compton, Boyd,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 - 1944*, Seattle 1966

56. FRU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Vol. II. Washington 1960

57. FRU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Washington 1955

58. 《从延安到北京》北京，1993 年

59. 崔可夫：《在中国的使命——军事顾问札记》莫斯科 1981 年

60. Dai Qing, Wang Shiwei and White Lilies, *Rectification and Purg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42 - 1944*, Armonk, N. Y. 1994

61. 《当代中国外交》北京，1990 年

62. 弗拉基米尔·德基伊尔：《铁托》官方批准的传记 柏林，1953 年

63. 杰柳辛：《苏联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过去》，载于《论据与事实》，1990 年第 5 期

64. Lev Delyusin, 1950s and 1960s... , in: USSR —China in the Changing World. Soviet Sinologists on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Soviet – Chinese Relations, Moskau 1989, P. 52 – 65
65.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 北京, 1994 年第 2 版
66. Lowell Dittmer, Sino – 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1945 – 1990, Seattle/London 1992
67. 德热拉斯: 《与斯大林的谈话》, 法兰克福(美因), 1962 年
68.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北京, 1969 年
69. 约尔根·多梅斯: 《推迟了的革命 – 中国国民党的政策(1923 – 1937 年)》柏林, 1969 年
70. Doolin, Dennis J.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ino – Soviet Conflict: Documents and Analysis. Hoover Institution Studies 7 . Stanford, Ca, 1965
71. Dupuy, Trevor N. .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New York 1969
72. Eastman, Lloyd E. .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CA 1984
73. Eastman, Lloyd E. .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 1927 – 1937, in: TCHC. Volume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 – 1949, Part 2, 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London/New York/New Rochelle/Melbourne/Sidney 1986, S. 116 – 167
74. A. I. 叶里扎维京: 《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谈判》载于《远东问题》, 1992 年第 5 期第 39 – 63 页; 《远东问题》, 1993 年第 1 期第 107 – 119 页
75. Bruce A Elleman,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Soviet Union, 1917 – 1960, in: Republican China, 21 . 2

(April 1996) . P. 65 - 69

76. Joseph W. Esherick (Edit.),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1974

77. Feaver, John Hansen,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 - 1950: The Policy of Restrained Interven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 Ann Arbor, Michigan 1983

78. 费德林 :《斯大林与毛泽东》 载于《近现代史》 , 1992 年第 5 期第 98 - 113 页 ; 以及 1992 年第 6 期第 83 - 95 页

79. 费德林 :《夜间的会谈》 载于 1988 年 10 月 23 日《真理报》

80. 费德林 :《斯大林和毛 : 莫斯科会谈》 , 载于《远东问题》 , 1989 年第 1 期第 149 - 164 页

81. 《哲学百科》第 5 卷 , 莫斯科 , 1970 年

82. Fisher, Louis, *Russia's Road from Peace to War.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17 - 1941*. New York/Evanston/London 1969

83. 迪特里希·弗任茨克 :《苏联与亚洲国家的联盟互助条约》 , 收于约阿西姆·格劳比茨、迪特里希·海因茨希 (主编) :《80 年代的苏联与亚洲 - 苏联在印度洋到大西洋区域的政策的目标和局限》 巴登巴登 , 1988 年

84. FRUS 1944, Vol. VI. China, Washington, D. C. 1967

85. FRUS 1945. Vol. V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1969

86. FRUS 1946, Vols. IX.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 D.C. 1972

87. FRUS 1947 . Vol. V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1972

88. FRUS 1948, Vol. V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1973

89. FRUS 1949, Vol. VIII FRUS 1949, Vol.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1978

90. FRUS 1949, Vol. IX.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1975

91. FRUS 1950, Vol. VI FRUS 1950, Vol.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1976

92. Keiji Furuya, Chiang Kai - shek. His Life and Times. Abridged English Edition by Chun - ming Chang, New York 1981

93. Raymond L. Garthoff,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in Manchuria, 1945 - 46, in: Raymond L. Garthoff (Edit.), Sino - 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New York/Washington/London 1966

94. John W. Garver, Chinese - Soviet Relations 1937 - 1945, New York/Oxford 1988

95. John W. Garver: Comment: Mao The Comintern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in: TCQ, 129, 1992, P. 171 - 179

96. John W. Garv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92

97. Garver, John W., Chiang Kai - shek's Quest for Soviet Entry into the Sino - Japanese War, in: TCQ, 102, 1978, P.295 - 316

98. John W., Little Chance,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1, No. 1, Winter 1997, P. 87 - 94

99. John W. Garve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CQ, 113, 1988, P. 29 - 59

100. Gelman, Harry, The Soviet Far East Buildup and Soviet Risk - taking Against China. Rand Publications Series, R - 2943 - AF, Santa Monica, Ca. 1982

101. 吉潘斯基：《共产国际在行动中（1947 - 1948 年）——

档案文献》，载于《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49-170页；
同上1996年第2期第157-172页

102. Gittings, John, *Survey of the Sino - Soviet Dispute. A Commentary and Extracts from the Recent Polemics 1963 - 1967* . London/ New York/Toronto 1968

103. 约阿希姆·格劳比茨：《中国与苏联》汉诺威，1973年

104. 约阿希姆·格劳比茨、迪特里希·海因茨希（主编）：
《80年代的苏联和亚洲》，收于德国东方学和国际问题联邦研究所（科隆）编辑的《东欧与国际共产主义》第18卷，巴登巴登，1988年

105. 格鲁宁：《国民革命前夕和期间的中国共产党（1921 - 1927年）》第2卷，莫斯科，1975年，内部发行

106. 郭恒钰、劳特勒、费尔伯、季塔连科、安德森、格鲁林、格里奈戈耶夫（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汇编》，第一卷，1920 - 1925年，莫斯科，1994年

107. Steven M. Goldstein,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1948 - 1950*,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it.),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laware 1989, P.143 - 154

108. Sergei Goncharov, John W. Lewis, *Xue Litai: <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 . Stanford, Cal. 1993

109.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纪实 1919 - 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出版（限国内发行）

110.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集 1925 - 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内部发行）

111. 格里戈列夫：《巴维尔·米夫（1901 - 1938年）》收于《著名苏联共产党人 - 中国革命的参加者》，莫斯科，1970年，

第 88 - 101 页

112. Gwertzman, Bernard, *Literary Detective on Trail of Soviet* < Diary > .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3. 1. 1976

113. 赫尔姆·汉德齐克：《苏联撤军的政治条件》，见《三个事件研究：亚洲 1925、1946、和 1948》，SWP - 第 332 页。Fo.Pl.13b/86，艾本豪尔，1986 年

114. 赫尔姆·汉德齐克：《苏联撤军的政治条件》，见《三个事件研究：50 年代》，SWP - 第 352 页。Fo.Pl.2.2/90，艾本豪尔，1990 年

115. 哈里曼、阿贝尔：《秘密使命，作为罗斯福特使访邱吉尔和斯大林（1941 - 1946）》，1979 年，斯图加特出版

116. He Di,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44 - 1949*,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it.),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laware 1989, P.31 - 50

117. He Di,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 - 1950*, in: *Chinese Historians*, Vol. 5, no. 1, Spring 1992, P.1 - 16

118. Head, William. Pace, *America's China Sojourn*, Ph.D. Dissertation,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80,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Ann Arbor, Michigan 1983

119. Heinzig, Dieter, *China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Challenge to the Soviet Union*, in: *Sino - Soviet Affairs*, 3, 1987, P. 41 - 61

120. Heinzig, Dieter: < From the "Middle of the Road" to "Yibian Dao": Changes in CCP Foreign Policy in 1949, in: *Notions et perceptions du changement en Chine. Me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Volume XXXVI. Colle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Paris 1994, P.59 – 72

121. Heinzig, Dieter, Otto Braun and the Tsunyi Conference, in: TCQ, 42, 1970, P. 131 – 135

122. Dieter Heinzig, The Otto Braun Memoirs and Mao's Rise to Power, in: TCQ, 46, 1991 P. 274 – 228

123. 迪特·海茵茨希：《苏中边界冲突 – 起因、过程、前景》，载于《联邦德国东方学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科隆）研究报告》1979年第17期

124. 迪特·海茵茨希：《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 1923 – 1927》载于《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第1卷，联邦德国东方学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科隆）编辑，1978年巴登 – 巴登出版

125. Heinzig, Dieter, Stalin, Mao, Kim and Korean War Origins. 1950: A Russian Documentary Discrepancy,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 – 1997, P.240

126. 迪特·海茵茨希：《1945年斯大林背叛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载于《亚洲》第56期，1995年7月，第6 – 15页

127. History of the Sino – Japanese War (1937 – 1945). Compiled by Hsu Long – hsiun and Chang Ming – kai, Taipei 1971

128. Hsiao Tso – liang, 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 – 1934, Seattle 1961

129. Hu Chi – his, Hua Fu, the Fifth Encirclement Campaign and the Tsunyi Conference, in: TCQ, 43, 1970, P. 31 – 46

13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1994年

131.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见：《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1990年版第22 – 32页

132.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两卷，1989年北京出版

133. 黄正(音)主编：《刘少奇一生》北京，1995年

134. Michael H.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96
135. 阿申·伊格纳托夫：《艰难的个人主义发现 - 俄罗斯的价值变化和价值冲突》，载于《联邦德国东方学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科隆)研究报告》1997年第22期
136. Akira Irye,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1974
137. Harold 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eco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1961
138.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1938年
139.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1974年
140. 蒋经国：《负重之源》台北，1960年
141. Johnson, Chalmers A. .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CA 1962
142. 朱列夫：《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中共武装力量 20 - 40年代》莫斯科，1983年
143. 卡利亚金：《在不熟悉的道路上——军事顾问中国札记》莫斯科第2版补充版，1979年
144. Kampen, Thomas, *The Zunyi Conference and Further Steps in Mao's Rise to Power*, In: TCQ. 117, 1989, P.118 - 134
145. 贾丕才(卡皮察)：《在不同的纬线上》载于《今日亚非》1995年第5卷第12 - 18页
146. 贾丕才(卡皮察)：《在不同的纬线上：外交家札记》，莫斯科，1996年
147. 贾丕才(卡皮察)：《苏中关系》莫斯科，1958年
148. *Khrushchev Remembers. With an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Notes by Edward Crankshaw*, London 1971
149.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Glnost Tapes*, Boston 1990

150.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London 1974

151. Kimball, Warren F. (Edit.), Churchill &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 I - III, Princeton, N.J. 1984

152. 戈特夫里德 - 卡尔·金德曼：《在工业时代世界政治中的远东》，见：德国袖珍本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世界历史》第6卷，慕尼黑，1970年

153. Donald W. Klein, Anne B. Clark,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Band 1 . . . New York/London 1967; Band 2, New York/London 1968; Band 3 . . . New York/London 1970; Band 4, New York/London 1971 ; Band 5, New York 1979

154. Klochko, Michael A. . . Soviet Scientist in Red China, New York 1964

155. 伊·瓦·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载于《远东问题》，1991年第6期，第83-93页

156. 伊·瓦·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载于《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77-91页

157. 彼得·库夫斯：《重新看待〈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载于《东欧》，1991年第1期，第69-77页

158. 彼得·库夫斯：《一位跟上潮流的英雄——关于一个被禁的俄罗斯毛版本和中苏对话》，载于卡·海因茨、固德隆·瓦克尔、刘惠茹（编著）：《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汉堡，1993年，第209-331页

159. 库库什金：《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1943）》，收于《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年，第350-379页

160. 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1952年（根据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载于《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第111-125页

161. 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 1952 年（根据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材料编写）》，载于《远东问题》1994 年第 6 期第 73 - 84 页
162. 郭维仁：《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析》第一卷，1966 年台北第 1 版；第二卷，1968 年台北第 2 版；第三卷，1970 年台北第 1 版；第四卷，1971 年台北第 1 版
163. 郭恒钰等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 文献汇编》第 1 卷 帕德堡 / 慕尼黑 / 维也纳 / 苏黎世，1996 年
164.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 1924 - 1927 年》，Paderborn, 1979 年
165. 郭恒钰：《毛通往权力的道路与共产国际》 Paderborn, 1975 年
166. 列多夫斯基：《高岗事件》，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内部材料，莫斯科，1990 年
167.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毛泽东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2 月的会谈：新的档案材料》，载于《近现代史》1997 年第 1 期第 23 - 47 页
168.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周恩来 1952 年 8 - 9 月的会谈》载于《近现代史》1997 年第 2 期第 69 - 86 页
169. 列多夫斯基：《世界对苏中条约的反应》，收于戴万金（音译）主编：《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谈判》，台北，1995 年
170. 列多夫斯基：《美国的中国政策和苏联外交 1942 - 1945》莫斯科，1985 年
171. 列多夫斯基：《中共中央代表团 1949 年 6 - 8 月在莫斯科的秘密使命》未公开发表的手稿
172. 列多夫斯基：《中共代表团 1949 年 6 - 8 月对莫斯科的

访问》载于《远东问题》1996年第4期第66-83页

173. 列多夫斯基：《中共代表团1949年6-8月对莫斯科的访问》载于《远东问题》1996年第5期第84-94页

174. 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对苏联的访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第一部分，未公开的手稿

175. 列多夫斯基：《毛泽东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对苏联的访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第二部分，未公开的手稿

176.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年1-2月）》载于《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96-111页

177.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对中国的秘密访问（1949年1-2月）》载于《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94-105页

178. 列多夫斯基：《1942-1952年在中国做外交工作》载于《近现代史》1993年第6期第102-132页

179. 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未公开的手稿

180. 列多夫斯基：《美国与中国的国民革命》，莫斯科，1979年

181.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介石 - 1945年12月 - 1946年1月蒋介石儿子在莫斯科的秘密访问》，载于《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第100-129页

182.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宋子文关于苏中条约的谈判1945年6-8月》未公开的手稿

183. 列多夫斯基：《外交札记》载于《远东问题》，1991年第1期，第106-118页

184.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 1992

185. Leong, Sow - Theng, *Sino - 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 - 1926*, Canberra 1976
186.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革命遗弃它的儿女》 科隆 / 柏林，1961 年
187. Leung, John K. . Michael y. M. Kao, *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 1949 - 1976*, Vol. 2. Armonk, N.Y.1992
188. Levine . Steven I. .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 - 1948*, New York 1987
189. Levine . Steven I. . *Soviet - American Rivalry in Manchuria and the Cold War*, in: Chun - tu Hsueh, *Dimensions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Washington/London 1977
190. Li Haiwen, *A Distortion of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Shi Zhe About Kovalev's Memoirs*, in: *Chinese Historians*, Vol. V, No. 2 (Fall 1992) . P. 64
191. 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记——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 师哲访谈录 载于《人物》 1993 年第 2 期，第 90 - 96 页
192. 李海文：《毛泽东与斯大林交往》，载于《瞭望》 1992 年第 52 期，第 90 - 96 页
193.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李越然回忆，全岩池（音）整理，北京 1989 年
194. 李致绥：《我曾是毛的保健医生》 德国贝尔基希 - 格拉德巴赫，1994 年
195. Liang, Chin - tung, *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 1942 - 1944: The Full Story*. Asia in the Modern World Series, No. 12, St. John's University 1972
196. Liang Chin - tung, *The Sino - Soviet Treaty*, in: Paul K. T. Si (Edit.),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 - Soviet War 1937 -*

1945. 对日抗战之中国国民政府, Hicksville, N. Y. 1977

197. 列多夫斯基:《安·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载于《当代文献》1996年第1期,第90-96页

198. 林军(音):《中苏关系1689-1989》,哈尔滨,1989年

199. 弗雷迪·利滕:《奥托·布劳恩早期在中国的作用(1932-1935)》,慕尼黑东欧研究所的研究报告,《Working Papers》第124期,慕尼黑1988年

200. 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ort Washington, N. Y./London 1956

201. 刘杰成(音):《毛泽东与斯大林》北京1993年

202. 刘杰成(音):《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北京,1997年

203. 《刘少奇年谱1898-1969》,第1和2卷,北京,1996年

204. 《刘少奇选集》东京,1967年

205. 刘石清(音):《试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载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1988年第2期,第69-74页

206.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1986年

207. 《列宁主义万岁》北京1960年

208. Low, Alfred 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n Analysis of the Polemics, Cranbury . New Jersey/London, 1976

209. 鲁疆宁:《雅尔塔会议与二战前夕和二战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律地位的形成问题》,载于《远东问题》1995年第6期第52-60页

210. Colin Mackerras, Robert Chan, Modern China. A Chronology from 1842 to the Present, London 1982

211. 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1968年;第3卷,北京,1969年;第4卷,北京,1969年;第5卷,北京,1978年

212. [日] Minoru Takeuchi 编著：《毛泽东记》第 6 卷，东京，1970 年；第 10 卷，东京，1971 年
213. 《毛泽东年谱 1893 - 1949》，第 1 - 3 卷，北京，1993 年
214. 《毛泽东文稿》第 5 卷，书简、文件、演说和讲话，德文译编和中文原文，由赫尔姆特·马丁主编，马丁·克罗特协助，刘金凯（音）、Tienchi Martin - Liao、彼得·席尔编辑，慕尼黑 / 维也纳，1982 年
215.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出版地，1969 年
216.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1994 年
2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卷，1949 年 9 月 - 1950 年 12 月，第 6 版，北京，1992 年（内部发行）
218. 《毛泽东选集》第 2 和 3 卷，北京，1953 年；第 4 卷，北京，1960 年；第 5 卷，北京，1977 年
219. 赫尔姆特·马丁主编：《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书简、文章和讲话（1949 - 1974）》，慕尼黑，1974 年
220. Ronald L. McGlothlen, *Controlling the Waves. Dean Acheson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Asia*, New York/London 1993
221. Mclane, Charles B. .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 - 1946* . New York 1958
222. 鲍里斯·麦斯纳：《东方条约体系 - 文件汇编》第一部分：苏联在欧洲的条约体系；第二部分：苏联在亚洲的条约体系，汉堡大学国际法和外国公众法研究室编辑，汉堡，1951 年
223. 梅里克塞托夫：《40 年代……》，收于《在变化的世界中的苏联和中国：苏联中国问题专家谈苏中关系的历史和前景》，莫斯科，1989 年，第 23 - 38 页
224. 《赫鲁晓夫回忆》载于《历史问题》1992 年第 11 - 12 期，第 65 - 85 页

225. 《中国的军事战役：1924 - 1950 年》台北，1966 年
226. Brian Joseph Murray, *Western Versus Chinese Realism: Soviet -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 - 1950*, p.H. D. Dissertation,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nn Arbor, Mich. 1995
227. 《在中国土地上 - 苏联志愿人员回忆录 (1925 - 1945 年) 》莫斯科，1974 年
228. Nagai Yonosuke, Akira Iry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1977
229. 《我们的朋友中国 - 手册》莫斯科，1959 年
230. 京特·诺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源和表现形式》，科隆 1959 年出版
231. Robert C. North, *The Communist Movement 1927 - 1937*, in: TCHC, Volume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 - 1949* . Part 2, ed. By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London/New York/New Rochelle/Melbourne/Sidney 1986, P.168 - 229
232. 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econd Edition, Stanford, Cal. 1963
233. 《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 -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上的报告》载于《苏共中央通讯》，1989 年第 3 期第 128 - 170 页
234. Edgar O'Balance, *The Red Army of China*, London 1962
235. 彼得·奥皮茨：《中国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原则，战略计划》苏黎士，1977
236. Ovchinnikov, Yuri (Edit. and Trans.), *Comintern - CCP Relations: The Anti - Japanese United Front in China (I & II)* . New Documents from the Comintern Archives, in: *Chinese Law & Government* . Vol. 30, No. 1. 2 (January - February 1997 . March - April 1997)

237. 《彭德怀传》北京，1993
238.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月》，见《中共党史风云录》北京，1990年版，第349页
239. Suzanne Pepper, *The KMT – CCP Conflict 1945 – 1949*, in: TCHC, Band 13, ed. By John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Cambridge/London/New York/New Rochelle/Sidney 1986, P.723 – 788
240.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北京，1965年
241. Pollack, Jonathan D. . Perception and Ac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Quemoi Decision, Bd. 1 . . . 2, Ann Arbor, Mich. . . Xerox University Microfilms . 1976
242.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载于《历史档案》1996年第5-6期第3-61页
243.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载于《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第3-39页
244. 邱京(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载于《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第51-55页
245. 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Edit. . .),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 – 1949*. Boulder, Colorado 1981
246. James Reardon – 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 – 1946*, New York 1980
247. Rue, John E. . *Mao Tse – tung in Opposition*, Stanford . . . Cal. 1969
248. 《俄中关系 1698 – 1916 年——文件汇编》莫斯科，1958年
249. Tony Saich (Edit. . .),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 . Armonk, New York, London 1996

250. Saich, Tony,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 Vol. 2, 1991
251. Sajpidin Azizi . *Omur Dastani* . Bd. 2, Peking 1990
252. 《苏联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汇编》第 13 卷，莫斯科，1965 年
253. 夏乐平：《毛泽东编年史——生平和著作》慕尼黑 / 维也纳，1976 年
254. Schram, Stuart R. . *Mao Zedong. 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 Hongkong 1983
255. Stuart Schram: 《毛泽东》(法兰克福 美因)，1969 年
256. Stuart Schram: 《毛泽东 - 重新评价初探》香港，1983 年
257. Stuart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 - tung,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New York/Washington/London 1969
258.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 - tung, Vol. IV* . Peking 1961
259. Service, John S. . *The Amerasi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 - China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7* . Berkeley, CA 1971
260. 沈志华：《朝鲜战争揭密》香港，1995 年
261. Michael M. Sheng, *America's Lost Chance in China? A Reappraisal of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1945* .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1993 . P. 135 - 157
262. Michael M. Sheng,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 - 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 - 1937*, in: *TCQ*, 129, 1992, P.150 - 170

263. Michael M. Sheng, *Maoist Dualism and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35 – 1949*, Diss. . York University,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nn Arbor, Michigan 1994

264. Michael M. Sheng, *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The CCP – Moscow Relations before 1949*,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1 No. 1 . Winter 1997 . P.95 – 104

265. Michael M. Sheng, *Response: Mao and Stalin: Adversaries or Comrades*, in: *TCQ*, 129, 1992, S. 180 – 183

266. 石殷红(音):《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于《近现代国际关系》, 1986 年, 第 12 期, 第 61 – 70 页

267. 石元华(音):《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 1994 年

268. 《师哲》载于《独立报》, 1994 年 7 月 5 日

269. 师哲:《高岗曾建议将东北划归苏联吗?》载于《炎黄春秋》1993 年第 4 期, 第 84 – 85 页

270. 师哲:《陪同毛主席访苏》载于《人物》, 1988 年第 5 期, 第 5 – 21 页

271. 师哲:《陪同毛主席访苏》, 收于《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 1992 年, 第 47 – 73 页

272. Shi Zhe, *With Mao an Stalin: The Reminiscences of Mao's Interpreter, Part II, Liu Shaoqi in Moscow*, in: *Chinese Historians*, Vol. VI, No.1 (Issue No.11), Spring 1993. P.67 – 90

273.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 师哲回忆录》北京, 1991 年

274. Shi Zhe, Chen Jian, *With Mao and Stalin. Shi Zhe's Memoirs*(未发表的草稿,它是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的补充)

275. 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北京, 1993 年

276. 师哲:《陪同毛主席……》载于《远东问题》, 1989 年

第 1 期，第 146 页

277.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与中国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 - 1974）》，莫斯科，1977

278. Snow, Edgar,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London 1963

279.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1961

280. 《苏中关系 1917 - 1957 年——文件汇编》莫斯科，1959 年

281. 《苏蒙关系 1921 - 1966 年——文件汇编》，莫斯科，1966 年

282. 《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莫斯科，1954 年

283. 《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朱耶夫日记》，莫斯科，1991 年

284. 埃娃 - 玛丽亚·斯托尔贝克：《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 1945 - 1953》，关于冷战背景下苏中结盟的产生历史的研究，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第 1 和 2 部分

285. 向青、石志夫、刘德喜主编：《斯大林与中国革命》，北京，1994 年

286. Tai Wan - chin, *The Conclusion of the 1945 Sino - 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Joseph Stalin's Negotiating Style and Skills*, in: Tai Wan - chin (Edit.), *The 1945 Sino - 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谈判（1945 年）*,台北，1955 年，第 105 - 133 页

287.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1995 年

288. Teiwes, Frederick C. . *The Formation of the Maoist Leadership, from the Return of Wang Ming to the Seventh Party Congress*. SOAS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Research Notes & Studies Series,

No. 10 . London 1994

289. Teiwes, Frederick C. .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N.Y./London, England 1990

290. 《苏联大使尤金 1957 年 10 月 30 日发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电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 号全宗，65 号目录，589 号案卷，第 173 - 179 页 载于《原始材料》 1996 年第 110 - 114 页

291. Thornton, Richard C. . 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28 - 1931. Seattle/ London 1969

292. Thornton, Richard C. .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mintern Strategy for China: 1928. in: Milohrad M. Drachkovitch and Branko Lazitch (Edit.), The Comintern: Historical Highlights, New York 1966

293. 齐赫文斯基：《我的一生与中国》 莫斯科，1992 年

294. 齐赫文斯基：《秘密外交行动：1949 年 6 月周恩来与美国人的非正式谈判》 载于《远东问题》，1994 年第 3 期第 133 - 138 页

295. 齐赫文斯基：《1949 年斯大林同毛泽东的信函交往》，载于《近现代史》 1994 年第 4 - 5 期第 132 - 140 页

296. 季塔连科等 7 人（主编）：《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 - 文件汇编》第 2 卷（1926 - 1927 年），第 1 和 2 部分，莫斯科，1996 年

297. Townsend James .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it.),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London 1996, P.1 - 30

298. 台北外交部编：《中外条约集编（中华民国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958 年，台北

299.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决定的一年（1945），斯图

加特，1955 年；第二卷：考验和希望的几年（1946 - 1953），斯图加特，1956 年

300.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波恩，1957 年

301. 芭芭拉·图赫曼：《沙与风 - 美国和中国 1911 - 1945》，斯图加特，1973 年

302. Nancy Bernkopf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 - 1950*, New York 1983

303. Adam 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 - 67*. London 1968

304. Unger, Jonathan (Edit.),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London 1996

305. 亚历山大·乌沙科夫、迪特里希·弗兰茨克：《华沙条约与其双边联盟条约 - 分析与文本》柏林 1987 年

306. Lyman van Slyke (Edit.),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Stanford, CA 1968

307. 曼夫雷德·法索尔德：《错过的机会？1949 年美国对华政策》载于《现代史季刊》，1983 年第 2 期，第 242 - 271 页

30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的条约》第 12 卷第 5 部分：与共产党国家的条约，由亚洲研究所（汉堡）奥斯卡·韦格尔、沃尔夫岗·莫尔编辑，由鲍里斯·麦斯纳撰写的前言，威斯巴登，1971 年

309. O. 弗拉基米洛夫：《40 - 80 年代的苏中关系》，莫斯科 1984 年

310. P.P.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 - 1945 年》莫斯科，1973 年

311. 尤·弗拉索夫：《关于父亲的故事》，载于《远东问题》

1990 年第 6 期第 124 - 134 页;《远东问题》 1991 年第 1 期第 171 - 181 页

312. 尤·弗拉索夫:《关于父亲的真相》,载于《论据与事实》1990 年第 18 期第 4 页

313. Vlasov, Jurij: < The Story of Father > . in: < Far Eastern Affairs > (Moscow) . 1. 1991 . P.189 - 207.; < Far Eastern Affairs > , 2. 1991 . P.193 - 208.

314. Dmitri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New Rocklin, CA. o. J.

315.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 1979 - 注释年表》,由约尔根·哈夫曼、贝尔德·约尔丹、雷纳尔·米尔凯收集,由罗兰德·菲尔伯、伯恩德·考夫曼加工编辑,柏林(东),1980 年

316. 王其珉(音):《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台北,1965 年

317.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北京 1993 年

318. 王方明:《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 1957 年一次亲切讲话》载于《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2 日

319. 王进:《略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苏“一边倒”政策》,载于《中共党史研究》增刊,1990 年,第 108 - 112 页

320. 王军延(音):《中国外交演绎 - 新中国初期》,北京,1995 年

321. 王明:《中共 50 年与毛泽东的叛变》柏林(东),1981 年

322. 汉斯·瓦斯姆德:《世界政治大纲——日期与发展趋势(1945 至今)》慕尼黑,1982 年

323. Henry Wei, China and Soviet Russia, Princeton, New Jersey/Toronto/London/New York 1956

324. 魏石岩(音):《第一次访问苏联》,载于《毛泽东的足

迹》,北京 1993 年,第 302-308 页

325.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 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3

326. Westad, Odd Arne, *Losses, Chances, and Myth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ino-Soviet Military Alliance, 1945-1950*,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1. No.1. Winter 1997, P.105-115

327. White, Theodore H.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 N. Y. 1979

328. Whiting, Allen S.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1960

329. Whiting, Allen S. *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 New York 1953

330. Allen S. Whiting and General Sheng Shi-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 1958

331. Wilbur, C. Martin, and How, Lienying: *<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 Cambridge. Mass./London 1989

332. Wilbur, C. Mart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London/New York/New Rochelle/Melbourne/Sidney 1983

333. Wilson, Dick, *Zhou Enlai. A Biography*, New York 1984

334. Paul Wingrove, *Mao in Moscow, 1949-50: Some New Archival Evidence*, in: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Vol. 11. Dec. 1995. No. 4, P. 309-334

335. P.P. 弗拉基米洛夫:《中国特区 1942-1945 年》柏林(东), 1976 年

336. O. 弗拉基米洛夫、W. 亚桑采夫:《毛泽东政治传记摘编》柏林(东), 1973 年

337. Aitchen K. Wu .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A Study of Sino – Soviet Relations*, London 1950
338. Wu Tien – wei . *The Sian Incident. 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26, Ann Arbor, Michigan 1976
339. 伍修权：《在外交部的八年》北京，1987年
340.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1991年
341. 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经过》，收于《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1990年，第10–14页
342. Wylie, Raymond F. .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 – tung, Ch'en Po – 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 – 1945* . Stanford . CA 1980
343. 夏珍多(音)：《苏联红军进驻10年》见《中共党史资料》第43(1992年)，第125–153页
344. 向青(主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1985年上海出版
345. 向青：《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载于《当代文献》，1989年第6期。
346. 徐焰：《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香港，1993年
347. Yang, Benjamin, *The Zunyi Conference or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 A Survey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in: TCQ . 106, 1986, P.235 – 271
348.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载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04–117页
349. Yang Kuisong, *The Soviet Factor and the CCP'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40s*, in: *Chinese Historians*, No. 1 . Vol. V (Spring 1992) . P. 17 – 34

350.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东北战略演变与苏联》，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60-71页
351.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 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1992年北京出版
352.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88年上海出版
353. 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实（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限国内发行），北京，1983年
354. Young, Aihur N. .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 - 1945. Cambridge, Mass. 1963
355. 余湛、张光友：《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见《新中国外交风云》北京，1990年，第15-21页
356. 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载于：《中共党史资料》第48期第148-155页，北京，1993年
357. Yuan Ming, *The Failure of Conception: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9 - 50*,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it.),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1945 - 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laware 1989, P.143 - 154
358. 多纳德·扎哥雷阿：《中苏冲突 1956 - 1961》慕尼黑，1964年
359. Zajcev, Valentin, *Ljubimaja mnogotirazka prezidenta Tajvan-ja*, in: *Zumalist*, 2, 1996, P. 42 - 45.
360. 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239，第9-17页
361.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会谈记录，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239，第29-38页

362.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北京，1992年
363. 曾克林：《星火—革命回忆》第7卷，沈阳，1983年
364. Z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 – 1958*, Kent, Ohio/London 1994
365. 《中国党史大事年表说明》北京，1983年
36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北京，1991年；第14卷，北京，1992年；第15卷，北京1991年；第18卷，北京，1992年
367. 《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1993年
368.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1919 – 1949年）》北京，1991年
369. 《中国共产党党章》华东新华书店出版第4版，1949年，无出版地，未编页码
37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卷（1949 – 1951年），北京，1957年
37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略》第1卷，第1部分，长春，1994年
372.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卷（1949 – 1951），北京，1957年
37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 – 1956》，北京，1994年
374. 《周恩来年谱 1998 – 1949》，北京，1990年
375. 《周恩来年谱 1949 – 1976》，北京，1997年
376.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 – 1975》，北京，1993年
377. 《周恩来传 1898 – 1949》，北京，1989年
378. 周文琪：《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军打过长江问题的探讨》，载于中央党校内部出版物，刊名不详，北京，1992年，第9页及下页

379. 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 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武汉出版（限国内发行）

380. 《朱德传》北京，1993 年

381. 朱元石：《刘少奇 1949 年秘密访苏》，载于《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74-80 页

382. 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北京，1995 年

383. 齐默曼、韩军（音）：《新疆（东突厥斯坦）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1917-1945》波鸿，1984 年

384. Zubok, Vladislav, < To Hell with Yalta! > —— Stalin Opts for a New Status Quo,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 Bulletin, 6 - 7, Winter 1995/1996, P. 24 - 27

385. Vladislav Zubok,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ss./ London 1996

译者的话

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苏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直至 1991 年苏联解体，这 70 年的中苏关系史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篇章。这一方面是因为中苏关系不仅对中苏两国，而且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它遗留下了许多神秘的历史空白点，以及许多令历史学家争执不清的问题。苏联解体后，莫斯科档案馆的大门部分地打开了。许多中苏关系的历史见证人也陆续发表了他们的回忆录。这些新的资料来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中苏关系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德国著名学者、德国联邦东方学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前副所长兼亚洲部主任迪特·海茵茨希博士，在他几十年从事中苏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查阅了汪洋大海般的苏联和美国档案文献，参阅了大量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和各国有关历史学家的著作，并亲自采访了许多历史见证人和学者，写出了一部关于中苏关系的力作：《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这部内容翔实、引证了大量历史文献的著作，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中苏关系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一般说来，这 70 年的中苏关系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921 年至 1945 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官方关系的同时，苏共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共进行秘密的联系；1945 年至 1950 年，苏联分别